

允斋文存



罗章龙回忆录

Memoirs Of Luo Zhanglong

(上)

漓江出版社

Memoirs of Luo Zhanglong (Volume 1)

《亢斋文存·罗章龙回忆录》(上)

First Published in 2005 by Fellows Press of America, Inc.
Copyright © 2005 by Luo Zhanglong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copyright holder.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o 1-933447-00-1
Published Date: September, 2005

Written by Luo Zhanglong
Reorganized by Wu Wen, Luo Xingyuan, and Luo Pinghai
Edit by Yun Zeng and Xiaomei Wang
Cover by Li Gelang

12937 Honey Locust Cir., Euless, TX, 76040, U.S.A.
Web: <http://www.fellowspress.com>
E-mail: mailmaster@fellowspress.com

溪流出版社出版品受国际版权公约保护
版权所有，禁止翻印，转载，复印，改编，违者必究。

Fellows Press of America, Inc. (溪流出版社) 出版的一切作品均不代表本社立场

本出版品缺页或装订错误请寄回更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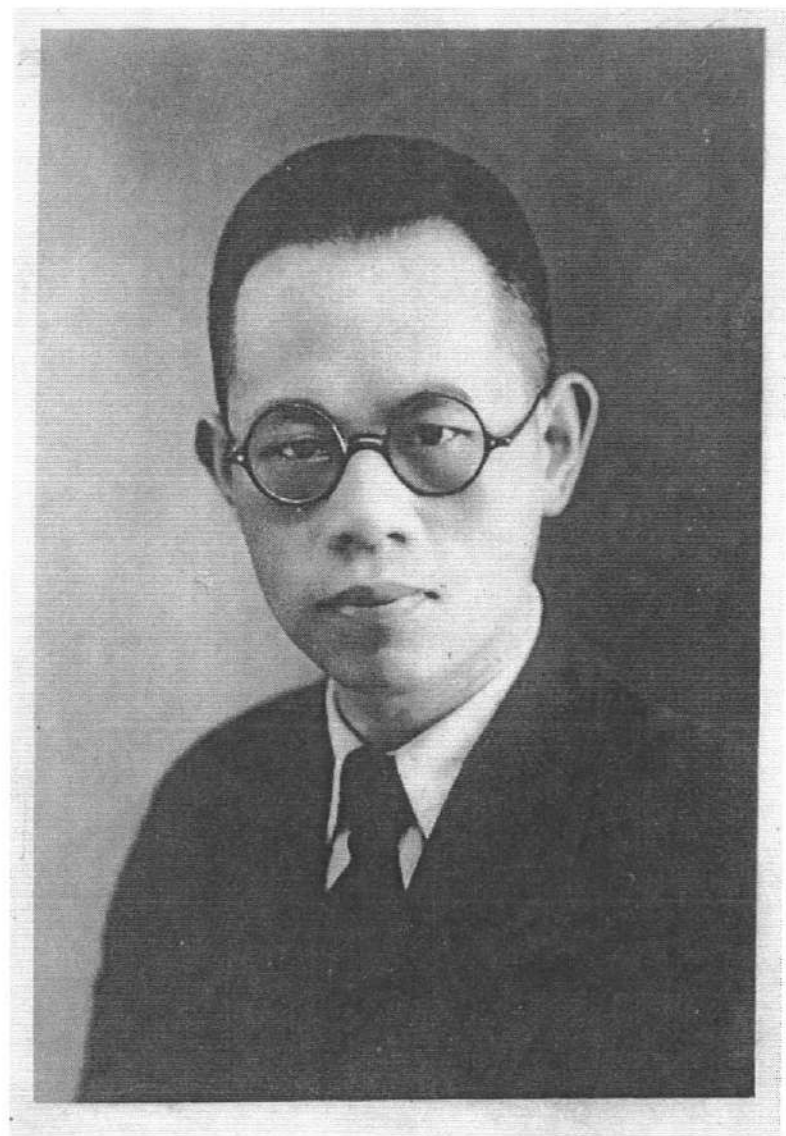
亢斋文存

罗章龙回忆录

(上)

溪流出版社

Fellows Press of America, Inc.



一九三六年，罗章龙在开封河南大学任教



一九五六年，罗章龙六十岁摄于武昌蛇山



一九五六年，罗章龙与孙女罗星原摄于武昌蛇山



一九六五年春节，罗章龙与长子罗平海（前左）、长女罗梦平（后右）及外孙女罗星原（后左）

二大 时间盛暑 同瑞俊住
 二大 上海英界
 代表坐斗室中
 散座无长桌
 陈时来时去
 代执行主席
 议案分小组讨论
 国际代表为谁
 二大 Y宣言抄
 代表人名
 中委人名 毛向蔡入选
 北方李、焘

罗章龙关于参加中共“二大”的手迹

罗章龙关于参加中共“二大”的手迹原文：

二大 时间盛暑 同瑞俊住
 二大 上海英界
 代表坐斗室中
 散座无长桌
 陈时来时去
 代执行主席
 议案分小组讨论
 国际代表为谁
 二大 Y宣言抄
 代表人名
 中委人名 毛向蔡入选
 北方李、焘

原文大意（括号文字为整理者补）：

二大 （召开）时间盛暑 （我）同（王）瑞俊住（一室）
 二大 （在）上海英（租）界（召开）
 代表（们）坐斗室中（开会）
 散座无长桌
 陈（独秀）时来时去
 （我）代执行主席
 （大会）议案分小组讨论
 国际代表为谁（记不起）
 二大 Y宣言抄
 代表人名
 中委人名 毛（泽东、）向（警予、）蔡（和森）入选
 北方（区委当选中委有）李（大钊）、（张
 国）焘（、罗文）虎

（2005年8月6日整理）

星原覽：
今后橋因存稿
出版事宜決定
委託你全力照
管不得有誤

羅仲言章龍

1989年4月21日



一九八九年，罗章龙手迹

康慕義齋著作出版事宜
委託孫女星元辦理

羅章龍

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二日于北京

一九九三年，罗章龙手迹

出版说明

《罗章龙回忆录》（原名《亢斋忆旧——罗章龙文存之一》）全书近八十万字是根据罗章龙先生生前定稿的回忆录《亢斋载记》、《亢斋散记》和一些零散回忆文章由整理者无文、罗星原、和罗平海编纂而成。中国大陆的人民出版社曾抽取部分篇章，并由罗章龙先生对其中的某些内容作了增补，出版了名为《椿园载记》的回忆录约二十三万字于1984年内部发行。今次出版则是罗章龙先生回忆录首次全文出版。

《椿园载记》在出版时得到了罗章龙先生本人的增补、手校以及有关中共党史专家对历史事件的核实，并将罗章龙先生原稿中的第三人称叙述改为第一人称。鉴于这种情况，《罗章龙回忆录》收入了《椿园载记》全文作为上编，将未被抽取的部分按罗章龙原稿体例收入作为中编、下编和续编。本书稿的整理情况见《整理者说明》和《后记》。

本出版社是根据整理者送交的全部录入文稿编校这部著作的。上编的《椿园载记》的脚注除注明整理者的补注和本社编辑的编者注外，为罗章龙先生在出版时所作；中、下和续编中的所有脚注都是整理者和本社编辑所加。整理者加脚注以“补注”标明，本社编辑加脚注以“编者注”标明，作者自己所作的注、按、解和补充仍然按文稿原样保留在文中。整理者对原稿中“疑错字在其后加正字，并以〔〕标出；漏字填补用〈〉标出；衍字保留原字用[]标出；”的部分，本社编辑为方便读者阅读做了技术性处理，不再保留这样的标示。现文中的〔〕为作者原文所有。对于整理者所加的内容重复的注释，本社编辑做了精简。

溪流出版社 2005年9月

出版说明

《罗章龙回忆录》（原名《亢斋忆旧——罗章龙文存之一》）全书近八十万字是根据罗章龙先生生前定稿的回忆录《亢斋载记》、《亢斋散记》和一些零散回忆文章由整理者无文、罗星原、和罗平海编纂而成。中国大陆的人民出版社曾抽取部分篇章，并由罗章龙先生对其中的某些内容作了增补，出版了名为《椿园载记》的回忆录约二十三万字于1984年内部发行。今次出版则是罗章龙先生回忆录首次全文出版。

《椿园载记》在出版时得到了罗章龙先生本人的增补、手校以及有关中共党史专家对历史事件的核实，并将罗章龙先生原稿中的第三人称叙述改为第一人称。鉴于这种情况，《罗章龙回忆录》收入了《椿园载记》全文作为上编，将未被抽取的部分按罗章龙原稿体例收入作为中编、下编和续编。本书稿的整理情况见《整理者说明》和《后记》。

本出版社是根据整理者送交的全部录入文稿编校这部著作的。上编的《椿园载记》的脚注除注明整理者的补注和本社编辑的编者注外，为罗章龙先生在出版时所作；中、下和续编中的所有脚注都是整理者和本社编辑所加。整理者加脚注以“补注”标明，本社编辑加脚注以“编者注”标明，作者自己所作的注、按、解和补充仍然按文稿原样保留在文中。整理者对原稿中“疑错字在其后加正字，并以〔 〕标出；漏字填补用〈 〉标出；衍字保留原字用[]标出；”的部分，本社编辑为方便读者阅读做了技术性处理，不再保留这样的标示。现文中的〔 〕为作者原文所有。对于整理者所加的内容重复的注释，本社编辑做了精简。

溪流出版社 2005年9月

出版说明

《罗章龙回忆录》（原名《亢斋忆旧——罗章龙文存之一》）全书近八十万字是根据罗章龙先生生前定稿的回忆录《亢斋载记》、《亢斋散记》和一些零散回忆文章由整理者无文、罗星原、和罗平海编纂而成。中国大陆的人民出版社曾抽取部分篇章，并由罗章龙先生对其中的某些内容作了增补，出版了名为《椿园载记》的回忆录约二十三万字于1984年内部发行。今次出版则是罗章龙先生回忆录首次全文出版。

《椿园载记》在出版时得到了罗章龙先生本人的增补、手校以及有关中共党史专家对历史事件的核实，并将罗章龙先生原稿中的第三人称叙述改为第一人称。鉴于这种情况，《罗章龙回忆录》收入了《椿园载记》全文作为上编，将未被抽取的部分按罗章龙原稿体例收入作为中编、下编和续编。本书稿的整理情况见《整理者说明》和《后记》。

本出版社是根据整理者送交的全部录入文稿编校这部著作的。上编的《椿园载记》的脚注除注明整理者的补注和本社编辑的编者注外，为罗章龙先生在出版时所作；中、下和续编中的所有脚注都是整理者和本社编辑所加。整理者加脚注以“补注”标明，本社编辑加脚注以“编者注”标明，作者自己所作的注、按、解和补充仍然按文稿原样保留在文中。整理者对原稿中“疑错字在其后加正字，并以〔〕标出；漏字填补用〈〉标出；衍字保留原字用[]标出；”的部分，本社编辑为方便读者阅读做了技术性处理，不再保留这样的标示。现文中的〔〕为作者原文所有。对于整理者所加的内容重复的注释，本社编辑做了精简。

溪流出版社 2005年9月

出版说明

《罗章龙回忆录》（原名《亢斋忆旧——罗章龙文存之一》）全书近八十万字是根据罗章龙先生生前定稿的回忆录《亢斋载记》、《亢斋散记》和一些零散回忆文章由整理者无文、罗星原、和罗平海编纂而成。中国大陆的人民出版社曾抽取部分篇章，并由罗章龙先生对其中的某些内容作了增补，出版了名为《椿园载记》的回忆录约二十三万字于1984年内部发行。今次出版则是罗章龙先生回忆录首次全文出版。

《椿园载记》在出版时得到了罗章龙先生本人的增补、手校以及有关中共党史专家对历史事件的核实，并将罗章龙先生原稿中的第三人称叙述改为第一人称。鉴于这种情况，《罗章龙回忆录》收入了《椿园载记》全文作为上编，将未被抽取的部分按罗章龙原稿体例收入作为中编、下编和续编。本书稿的整理情况见《整理者说明》和《后记》。

本出版社是根据整理者送交的全部录入文稿编校这部著作的。上编的《椿园载记》的脚注除注明整理者的补注和本社编辑的编者注外，为罗章龙先生在出版时所作；中、下和续编中的所有脚注都是整理者和本社编辑所加。整理者加脚注以“补注”标明，本社编辑加脚注以“编者注”标明，作者自己所作的注、按、解和补充仍然按文稿原样保留在文中。整理者对原稿中“疑错字在其后加正字，并以〔〕标出；漏字填补用〈〉标出；衍字保留原字用[]标出；”的部分，本社编辑为方便读者阅读做了技术性处理，不再保留这样的标示。现文中的〔〕为作者原文所有。对于整理者所加的内容重复的注释，本社编辑做了精简。

溪流出版社 2005年9月

整理者说明

罗章龙先生，湖南浏阳人，生于一八九六年，卒于一九九五年。先生原名墩阶，曾易名仲言，字章龙，号沧海，笔名文虎、纵宇一郎等。先生早年参与中国近现代共产革命活动，中年以后退出政界，于大学执教，晚年复出，参与中国革命历史的史料工作。

约在八十年代初，先生年近米寿，曾草拟成“文存”纲要一份，并有部分篇目的内容简介，其意在寻求刊印传世；先生去世后，其生前友好与学界友人对整理遗稿事宜甚为关注，无一不望此极具史料价值的珍贵文字能完整传世以飨后人。如此，则整理编辑文存，既为罗先生生前意愿亦乃众人所望。

先生文集定名为《罗章龙文存》，文字总量粗估在二百万上下。计划分五种编辑成册：之一，亢斋忆旧；之二，亢斋诗草；之三，亢斋建学；之四，亢斋译稿及之五，亢斋拾遗。

“亢斋”系“亢慕义斋”（Das Kommunistisches Zimmer）简称，原意“共产主义小室”，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场所。先生曾为该研究会的首任书记，也是中共北京大学支部的首任书记。先生毕生的政治道路、学术活动自与该研究会的宗旨分不开，步入晚年以“亢斋”之名撰写个人回忆。今文存五种仍行“亢斋”之名，乃循先生所念。

文存之一的《亢斋忆旧》分四编：上编、中编、下编和续编，约八十餘万字。所收各篇文稿的写作时间、誊抄保存情况，由先生后人罗星原在“后记”中做简略说明。

《亢斋忆旧》的前三编收两部文稿：“亢斋载记”和“亢斋散记”，是先生在上世纪中叶记忆旺盛年代里完成的力作。八十年代初，先生从“亢斋载记”中抽取部分篇章，加之“亢斋散记”中的少量篇章，整理后交北京三联书店刊印，于一九八四年出版了《椿园载记》。此次将《椿园载记》编为《亢斋忆旧·上编》，采用了先生对“三联”版的手校订正本。

“亢斋载记”遗存的未刊篇章，编为《亢斋忆旧·中编》。根据先生后人保存的重抄件，列所餘篇目计有四十七章，残缺五章，实际整理出四十二章，全部编入“中编”。其中四十章为原文全收，另两章略有改动，因部分内容既非先生亲历，且缺乏史料，明显不为“忆旧”，故予以删节，并作注明。另遵先生之意，于“中编”插入“附录”七篇。

“亢斋散记”遗存的未刊篇章，编为《亢斋忆旧·下编》。根据先生后人保存的抄件，存稿计三十四章，因其中的“曦园”全篇、“新民学会”的大部已被“上编”所用，不再重复，故“下编”实收存稿三十二章整篇和“新民学会”一章的餘篇。

三编之馀，再编《亢斋忆旧·续编》。“续编”所收篇章都是“载记”和“散记”篇目之外的，并插编有“附录”七篇。

录入整理《亢斋忆旧》时，对全编章节、段落序号的标示方法重新做了统一处理。考虑到先行抽出的篇章在出版时已重编序号，存稿序号散乱而不连贯，编“中编”与“下编”时，取消了原篇章序号，但仍保持存稿各篇的前后顺序。

全文文字订正用符号标出：疑错字在其后加正字，并以（ ）标出；漏字填补用〈 〉标出；衍字保留原字用[]标出；辨认不清的字以□代；原文缺字以◇代；凡不影响文义的错别字订正不予标注。全文标点基本依照原标点，征得罗氏后人同意，对极少数标点符号做技术性处理，不注明订正情况。

文稿原有注、按、补充等文字，均依样录入；整理者所做更动、订正、注释，均在脚注中以“补注”说明。

《亢斋文存》整理者 2004年7月

罗章龙回忆录

(上)

上编	1
1984年版《椿园载记》修订本自序	3
一、新民学会	5
二、北京大学	21
三、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	27
四、“五四”运动	33
五、曦园	41
六、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47
七、北京中共建党小组与社会主义青年团	61
八、“亢慕义斋”及其活动	71
九、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	79
十、中共北方区委	93
十一、中共北方区党报——《工人周刊》	99
十二、陇海铁路大罢工	114
十三、东方民族大会	134
十四、京汉铁路八月罢工的胜利	137

十五、北京迤东地区的罢工斗争	144
十六、京绥铁路罢工	169
十七、正太铁路罢工	173
十八、“二七”大罢工	181
十九、中共“三大”及中央执委会	201
中编（《亢斋载记》存稿）	227
一、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229
附录：罗章龙谈历次党代会	231
二、中共二代会前后	236
三、中共北方建党与建团工作纪要（1921年至1926年）	238
四、中共中央南方建党纪要	242
五、环龙路国民党执行部	250
六、国共争衡——三月二十日政变	255
七、欧洲十国行纪	262
附录：欧游十国诗	270
八、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276
九、北航纪事	278
十、北方革命复兴	284
十一、北伐筹备会议	297
十二、广州访问记	300
附录：广州一周记	305

十三、文虎重返北方后再离北方之前北京印厂案 （1926年）	311
十四、中共扩大会与上海暴动	313
十五、莫斯科东方大学	319
十六、革命高潮——武汉国共合作政府	322
十七、中共中央与湖北省委及其工作	328
十八、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332
十九、国共分歧	334
二十、湘鄂军阀武装叛乱	340
二十一、中共中央与湖北省委间关于应变问题的争议	342
二十二、国共分离	346
二十三、国共危机恶化过程与最后决裂	350
二十四、武汉国际人士及其撤退	353
二十五、中共全党组织新部署： 巩固全国革命阵地，加强斗争实力	357
附录：郑超麟给罗章龙的信	359
二十六、南昌兵暴	361
二十七、中共八月汉口会议	368
二十八、湖南秋收起义	379
二十九、文虎重莅武汉	393
三十、临时中央扩大会议与泛暴动主义	397
三十一、大革命失败前后中国南北新旧军阀反共大屠杀	407

罗章龙回忆录

(下)

三十二、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	421
三十三、中央工委及全总（1928年至1930年）	434
三十四、六届三中全会及其瓦解	448
三十五、四中全会篡党实录	454
三十六、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	476
附录一：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	488
附录二：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文件（四份）	493
附录三：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通信选（五件）	499
三十七、米夫策动残酷斗争，祸延全党，断送中国革命	503
三十八、上海东方饭店事变：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中央委员 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二十三人蒙难	507
三十九、中共临时中央书记向忠发等倾巢投敌	513
四十、临中北方书记宋明诗、于芝生联翩投敌 （非常委员会北方惨案）	516
四十一、苏区反右，“你死我活！”	518
四十二、中国工农革命文艺阵地全线崩溃	520

下编（《亢斋散记》存稿）	523
一、浏水先行事略	525
二、新民学会	532
三、非宗教同盟	540
四、中共在北京的先行组织——《新青年》	545
五、京师大学与蔡子民	547
六、北京大学新闻学会	550
七、燕都横议	552
八、京华尘影	554
九、怀冰庐语	557
十、译事余论（亢斋自学记）	561
十一、冰窖胡同政闻	563
十二、亢慕义斋载记	567
十三、长辛店日营八表	571
十四、天津诸彦	573
十五、羽檄纷驰在山东	574
十六、大西北革命复兴	576
十七、劳动文艺	578
十八、金陵聚散	580
十九、钱塘江行	582
二十、黛茜	584

二十一、三暴见闻	587
二十二、愚园路地下生活	591
二十三、邓安石轶事	594
二十四、但一言行录	600
二十五、云岭兴亡	603
二十六、关于赵世炎二、三事	605
二十七、螻生文评	607
二十八、南海风云	610
二十九、潇湘简牍	616
三十、云梦丛谈	619
三十一、莫京春秋	623
三十二、六届四中全会侧记	627
三十三、三渡剑门	629
续编	631
一、生死战友简忆	633
二、党史上的向忠发及其集团	644
附录：向忠发纳妾	664
三、上海东方饭店会议前后	667
附录：[美]伊罗生·艾萨克斯：《草鞋脚》序言（节录）	672
四、回忆陈郁同志	674
附录：陈郁同志在延安中央党校时的思想总结（节录）	678

五、关于东北建党的回忆	682
六、东北行纪	691
七、大革命时期中共军运工作纪略	696
附录：罗章龙谈西京兵变	708
八、回忆国立湖南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会	716
九、致中共中央政治局润之主席函（1949年8月）	729
十、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函（1979年10月）	732
附录：《前共党中委罗章龙宣言》及当事人的说明	740
十一、罗章龙自传	745
十二、椿园年表（节选）	792
附录：罗章龙著述目录	818
十三、罗章龙自撰简历	837
后记	841
罗氏后人要说的话	843

罗章龙回忆录

上 编

(1984年版《椿园载记》修订本)



《椿园载记》自序

《载记》之作，源于抗日战争时期。时大好河山沦于敌寇，国难深重，展望国家民族前途，令人坐卧不安。中国大革命功败垂成，其前因后果诸问题，亦时时萦回脑际。我从华北开封河南大学西迁汉中城固，执教西北联合大学，每在课余，探索上述问题，并忆录史实，草拟论文，以备遗忘。在城固十年之余暇中，积稿成帙，初步整理得三十万字，其中一部分便是载记的题材。

一九四七年，我回长沙岳麓山湖南大学任教，住至善村。乃重访秋收起义诸胜迹。我自长沙参加秋收起义（一九二七年九月），时过二十余年，旧地重游，往事仍历历在目，于是又写了一些资料。适为杨树达教授所见，颇感兴趣，认为所记新颖真实，非局外人所能道，殆属旷代逸史。因劝我赍续勿辍。我决心亲临一九二七年九月间各处战场遗迹，进行考察，于是寻觅附近水陆洲、洞庭庙、牛头洲、捞刀河、猴子石、大托铺、暮云市、麻园岭、识字岭、杨家坟等秋收起义旧址，访问一些健在的有关战士及英烈人物遗属，开拓了新的意境。

一九五三年院系调整，湖南大学解散，我调中南财经学院任教（后扩充为湖北大学），寓蛇山抱冰堂，邻胭脂山（原中共湖北省委所在地），隔江与汉口丹水池、汉阳琴台相望。二十多年前当地乃武汉国共合作政府“京兆地区”。作者时适在中共中央工作，并兼汉口市委书记、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主任，当年北伐军攻下汀泗桥、克武昌、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戡定夏斗寅叛乱、荡平黄安、阳新反革命武装叛乱诸役，作者均躬与其事。

我怀兴奋心情，忆触目惊心之往事，访旧地，探史迹，重履武汉政府所辖三镇地区和长江中上游，东至九江、黄蘓，西达宜昌，南往岳阳与澧县，北出武胜关等地区。在此期间积稿略具规模，乃将全稿分订成册，私心颇觉自慰。

07 · 090094

但是这些卷帙，当时无法印行，正不知如何处理。一九六六年七月“扫四旧”运动，动乱中全稿大部散失¹，多年辛劳毁于一旦，良堪惋惜！但当年斗争史迹和生死与共的同志英雄风貌，仍深铭心版，永难忘怀，乃思重写，以复其旧。

一九七八年夏，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会同湖北省党校、湖北省革命博物馆、湖北农讲所、武汉大学、湖北财经学院等单位，在武汉东湖翠柳村舍举行座谈有关党史问题，邀我主讲，历时一月有余，事后与会同志朱玉莲、于桔楠、张俊、廖鑫初、张英宣、甘俊、罗梦平、罗星原等，协助我写成了一份《东湖座谈录》。

九月，我应邀赴北京，参加李维汉同志主持、由中国革命博物馆和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联合举办的大革命时期党史问题座谈会，座谈至春节结束。会后，革命博物馆同志整理了一份座谈记录稿，其中部分曾发表在《党史研究资料》上。

一九七九年六月我奉调来京后，各省市地区来访的同志较多，谈论的问题尤为广泛、具体，更引起我对当年先行人物的怀念。他们在大革命艰难时期，犹如闪电爆雷、声光灿烂，奇情壮彩的英勇史迹，不应长期沉霾。在一些同志的敦促建议下，我才重加董理，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重新回忆，补充、整理成《椿园载记》。谨以此书奉献给我国大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共产主义伟大真理而奋斗、献身的英烈们。

由于时间仓促，本书内容失当与谬误之处所在都有，至希读者不吝指教，以便再版时改正²。

在本书整理过程中，曾得到夏立平、黄高谦、赵春濂、季国平、张德忠、高荣光、李峻晨、陈文伟、王庆淑、李长盛诸同志帮助，盛谊至为可感。谨此致谢！

罗章龙 一九八三年九月中秋节于椿园书屋

1 “文革”中罗家被抄，回忆文稿散失一套，复本尚存。—补注

2 此段末，作者补有“（下略）”字；篇末另补有“重版序”“刊误表”“图片”“引得INDEX”字。—补注

一、新民学会

二十八划生“征友启事”

一九一二年，我由浏阳至长沙求学，就读于长沙第一联合中学，于一九一七年上期毕业，其间我结识了毛泽东。

一九一五年五月中旬某日，我赴司马里第一中学（校址为南宋时辛弃疾练飞虎营遗址）访友，于该校会客室外墙端，偶见署名“二十八划生征友启事”一则¹，启事是用八截湘纸油印的，古典文体，书法挺秀。我驻足浏览，见启事引句为《诗经》语：“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内容为求志同道合的朋友，其文情真挚、辞复典丽可诵，看后颇为感动。返校后，我立作一书应之，署名纵字一郎。逾三日而复书至，略云：接大示，空谷足音，跫然色喜，愿趋前晤教云云。旋双方订于次星期日（五月二十三日）至定王台湖南省立图书馆见面。是日，适逢久雨初晴，丽日行空，空气清新宜人。同学陈君圣皋²也欣然同往。

定王台位于长沙东城，乃汉长沙定王发所筑。昔人诗尝以潭州与定王台并列，如“定王虚旧业，潭郡古雄州。”北宋时朱晦庵登定王台诗云：

寂寞藩王后，光华帝子来。
千年余故国，万事只空台。
日月东西见，湖山表里开。

1 二十八划生征友启事时间，约在1915年夏秋之间，有关征友动机可从毛泽东致黎邵西信中见到（1915年9月），信中云：“人谁不思上进，而当其求涂不得，歧路彷徨，其苦有不可言者！”

2 陈圣皋，湖南浏阳人，联中学生，学冠侪辈，偶觉多异行，1927年前后，陈任里仁小学校长，后辞职隐沦以终。

从知爽鸢乐，莫作雍门哀。

定王台表里湖山，风物开廓可观。上午九时左右，我们到达定王台省立图书馆。但见阅览者熙攘杂遝，人数众多。在走廊处有一少年仪表端庄，器宇轩昂，心知即所欲晤见之人。我们乃趋前为礼，彼此互通姓名，方知少年姓毛名泽东，字润之。二十八划乃其名字的笔划数。略谈数语后，圣泉则去阅览室看书，润之建议到院内觅一僻静处倾谈。进得院内，寂静无哗，我们就坐在一长条石上，直谈到图书馆中午休息时止，足约二、三小时始别。

谈话内容涉及很广，包括国内外政治、经济以至宇宙人生等等。而对于治学方针与方法，新旧文学与史学的评价等，谈论尤多。谈到音韵改革问题，主张以曲韵代诗韵，以新的文学艺术代替“高文典册”与宫廷文学。在旧文学著作中，我们对于离骚颇感兴趣，曾主张对离骚赋予新评价。

关于治学问题，润之认为，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均属茫然！因此主张在学问方面用全付力量向宇宙、国家社会作穷源竟委的探讨，研究有得，便可解释一切。关于生活方面所涉及及较少。临别，润之表示“愿结管鲍之谊”，并嘱以后常见面¹。

我归后翌日，适一师同学彭道良来访，谈话中提到定王台事，彭乃询其详，我以实告。彭笑道：“昨日之事可称三奇会。”我问何故？彭云：“圣泉与兄为联中二奇，益以毛奇，岂非三奇？”时黄昆吾同学在侧，因问毛奇之名何自来？彭从容解说道：“我与二十八划生同班同学，颇知其为人品学兼优，且具特立独行之性格。他常语人：‘丈夫要为天下奇（此乃宋王廷珪送王邦衡诗句），即读奇书、交奇友、著奇文、创奇迹，作个奇男子。’伊本人近所写日记，亦有惊人语，如云：‘力拔山兮气盖世，猛然而已！不斩楼兰誓不还，不畏而已！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忍耐而已！’（后发表于一九一七年四月一日《新青年》三卷二号）合而观之，此君可谓奇特之士，因此同学中戏称为毛奇，且语意双关。”（毛奇（Molkt）系德意志建国时普鲁士著名将领，在普法战争中功绩卓著。）

后我又以彭所语往询同乡陈赞周（圣泉之弟，亦在一师肄业）。

1 斯诺著《西行漫记》内称毛自述：“征友初得三个半人，第一个为罗章龙，另外还有两个。”据所知其中一个为湘阴黄煥，即黄铭功老师的侄子，亦联中学生，体弱多病，早逝了。所谓半个人指李降郢。后邹彝鼎提到此事云：按通俗解释，一个人是完全的人，半个是残缺不全的意思，含有贬义。但较古典此语亦有所本。昔苻坚谓仆射权翼曰：“吾以十万之师取襄阳，唯得一人半耳。”翼问：“谁耶？”坚曰：“释道安一人，习凿齿半人也。”（见《高僧传》）

又毛泽东于1915年11月9日寄黎锦熙信提到：“两年以来求友之心甚炽，夏假后，乃作一启事张之各校，应者亦五、六人，近日以来稍快惟此耳！”记述此事。

赞周道：“润之气质沉雄，确为我校一奇士，但择友甚严，居恒骛高远而卑流俗，有九天俛视之慨。观其所为诗文戛戛独造，言为心声，非修养有素不克臻此！直谅多闻，堪称益友！”我闻赞周语后，心益释然！乃写诗纪其事：

定王台晤二十八划生

白日东城路¹， 娜瓊丽且清²，
风尘交北海³， 空谷见庄生⁴。
策喜长沙傅⁵， 骚怀楚屈平⁶，
风流期共赏， 同证此时情。

自定王台谈话后，每遇周末，我们两人经常约定到天心阁、城南书院、长郡中学、韩玄慕、板仓杨寓等处晤谈。或到郊外云麓宫、自卑亭、水陆洲、溁湾市、猴子石、东南渡等处远足游览。

天心阁为长沙东城古堡，地势高峻，俯瞰全城，极形胜。天心阁有古铁炮百余尊。联云：拔地千寻，四面云山齐首俯，距天一尺，九霄日月正肩摩。

板仓杨寓位于河西，岳麓山自卑亭迤北。有稻田数十亩，均为长沙东乡杨氏祀田，庄前有古樟林高数十尺，广荫数亩，前有小溪，自山麓流入湘江。其后平原即岳麓书院。

一次，我与润之一起步行去韶山，走到长沙与湘潭之间，离长沙三、四十里处，甚为乏累，就在路边休息。见一位老农在茅屋边打草鞋，润之就与他攀谈家常，边谈边帮他锤草，搓绳，编织，织好后又帮他吧草鞋锤平。我见润之对打草鞋的工序很熟练，便问，你会打草鞋？他说，我会，走路很费鞋子，大家都应该学会打草鞋。

在长沙，我陪润之到过许多地方。长沙附近有个拖船埠，那里有座禹王碑，传说禹王曾在此拖过船，古史说：“大禹治水，栉风沐雨，八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入。”润之对他颇有兴趣。认为禹王是个劳动人民，对他怀有好感。

对于湖南历史上先进人物的遗迹，如：楚国屈原的故居（玉笥山），

1 东城：指长沙东城，定王台所在地，当时晤二十八划生处。

2 娜瓊：见伊世珍《娜瓊记》，传说中的神仙洞府，藏书甚富。

3 北海：指唐李邕。长沙定王台图书馆藏有李北海书写的麓山寺碑文。

4 空谷：即空谷足音，比喻极难得的音信或事物。作者见到二十八划生的“征友启事”，立即投函询问，旋得回信，中有“空谷足音，趫然色喜”，语出庄子《徐无鬼》篇：“夫逃虚空者……闻人足音趫然而喜矣。”趫（qiǒng穷）然：行人之声。庄生：指庄周。

5 策：指汉贾谊上皇帝的《治安策》。贾太傅即贾谊，曾为长沙王太傅。

6 骚：指屈原所作的《离骚》。屈平即屈原。

汉朝贾太傅祠，岳麓山上的崇德寺（唐朝诗人杜甫流浪时曾在此寺住过），长沙的飞虎营（南宋文学家辛弃疾将军在长沙练兵的地方），以及王夫之的家乡等地，我们都回去访问过。

新民学会成立

定王台会晤后，长沙各校续有青年学生加入谈话，历时约二年，遂共同发起组织新民学会。

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四日，是个星期日。这天，在岳麓山周家台沔痴寄庐举行了新民学会成立会。

沔痴寄庐坐落在溁湾市小镇，湘江的西岸，系宁乡人周姓所居。周以耕、商为生，有水田庄基方圆数十亩，竹篱茅舍，木屋十余间，宅前有晒谷坪。成立会即在坪前举行。

沔痴寄庐于日军侵犯长沙时遭炮火毁灭，后又重建。一九五〇年，我与陈启民教授同往访主人周家七爹，三人同在舍前拍照留影，但该屋后被拆除。

出席成立会的约十余人，我亦赴会。会议通过新民学会公约，并选举了干事会。会员中以萧旭东与毛泽东年资较高，分别被选为学会总干事和副干事。

我当时曾写新民学会成立会诗：

济济新民会，风云一代英。
沔痴盟众士，溁水泛流觞。
佳气郁衡麓，春风拂郡城。
庄严公约在，掷地作金声。

初期会员除我外均为长沙第一师范学生，其中以何叔衡（字瞻帖）年龄最长，瞻帖为新民学会发起人之一，他平日生活节俭，待人如己，遇事白出主张，不屑人云亦云。平生自矢：“甘作奸宄之敌，不为乡愿之亲。”文采特出，有射石殒羽气概。尝谓：“屈原清狂，冥思独到，文采富丽，经纶殊感不足。李白佻达不入大雅，杜甫拘谨，字句杂有腐儒之见。”但又云：“太白流夜郎，杜陵恻生别，他们究竟比常人要高一筹。”其风趣如此！

东游返旆

新民学会在一九一七年冬季曾对会员升学问题加以详细研究。当时有人主张就地升学或就业。瞻帖率先提出会员留学东瀛路线，经过

讨论，群谋僉同，决定由我先行，其他人俟得我回讯后再继续出发。瞻帖向我说：“目前不急于就业，再读十年书，然后定事业方向，大器晚成，水到渠流。”并在平浪宫设宴，为我饯行。大家热情洋溢，并赋诗赠别。我遂乘华盛轮船东行赴沪。启梗前，润之到码头送行，当面交给我一个信封，说内有诗一首相赠。启封一看，系题为“送纵字一郎东游”的七言古风，诗云：

云开衡岳积阴止¹，天马凤凰春树里²。
年少峥嵘屈贾才³，山川奇气曾钟此。
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⁴。
洞庭湘水涨连天，艤舫巨舰直东指⁵。
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
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⁶。
沧海横流安足虑⁷，世事纷纭何足理。
管却自家身与心，中心日月常新美。
名世于今五百年⁸，诸公碌碌皆余子⁹。
平浪宫前友谊多¹⁰，崇明对马衣带水¹¹。
东瀛濯剑有书还¹²，我返白崖君去矣。

何叔衡¹³、萧子昇、陈绍麻、彭道良诸君亦到码头送行。

轮船越洞庭湖沿长江东下，沿途停泊九江、安庆、南京、镇江等城市。我得上岸，畅游名胜古迹。抵上海后，我向日本大阪公司购得舱位，准备转轮往日本神户。正待出发时，忽闻东京发生日警迫害

1 我东行前，连日阴雨，轮船起碇时，积阴转晴。“云开衡岳”句，见唐代韩愈《岳庙诗》。

2 天马凤凰，系岳麓山区两个山名。

3 屈贾，指屈原、贾谊。

4 鲲鹏，古代传说中的大鱼和大鸟。见《庄子·逍遥游》。

5 艤舫，指巨轮。

6 稊米，一种形似稗的草，实如小米。语出《庄子·秋水》：“不似稊米之在太仓乎？”

7 沧海横流：指社会动荡不安。

8 名世，即闻名于当代。《孟子·公孙丑下》：“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

9 余子，见刘克庄《沁园春·梦孚若》词：“天下英雄，使君与操，余子谁堪共酒杯”。

10 平浪宫在长沙北门外，轮船停泊处。友谊多，指到平浪宫送行的新民学会会员。

11 崇明，指上海崇明岛。对马，指对马海峡。

12 东瀛，指日本。

13 瞻帖于临别时，曾书短句赠我，云：“若金发砺，若陶在钧，进德修业，光辉日新！”其中若金发砺句，语出《荀子·劝学篇》：“金就砺则利”。陶钧，指制陶器所用的转轮。杜甫《瞿塘怀古》诗：“疏凿功虽美，陶钧力大哉”

中国侨民风潮，闻讯后，我激于义愤，乃退船票登岸，中止赴日本。

我在留居上海期间，接触到一些留日归国同学，了解了东京风潮内幕及留日学界内幕。又从结识的北京、天津南归同学中得悉北京一些学校正酝酿新思潮的动向，十分令人神往。

在上海，我购得《新青年》杂志数期，返湘后送与学会同志传阅，大家被陈独秀的思想所吸引。我也将此行经过及留沪见闻向大家作了报告，我认为当时日本政治闇黩，学术剽袭，无甚可师学之处。建议东行计划从此可以打消，主张今后改辙北向。

新民学会北征

自从我东游返湘后，对于学会方向问题经常在讨论计议中。当时有人主张到南洋去谋生，但感不切时宜。我在沪时了解到北京文化界潜流正在变动不居之中，因倡议北行。另外，《新青年》上刊登的赴法勤工俭学的介绍（一九一七年四月号），也引起大家的关注。蔡和森更是急切地跃跃欲试。在萧子昇和蔡和森先行赴京安排勤工俭学事之后，于一九一八年暑假期间，决定由何叔衡留守长沙，润之和我等十余人首批赴京。我们一行由长沙乘轮船直航武汉，经山汉口大智门车站登火车过花园、广水，出武胜关。时值秋汛季节，火车抵河南漯河寨（郾城），适遇附近沙河上涨，孟庙村一带水漫路基，火车停止前进。我们只得下车宿郾城县，观览寨景，知该地古称元辉寨，东界沙河，北界里河，为河南一重要市镇。隔了一日，水始退。我们行三十里至大石桥。从大石桥又步行二十二里，到任庄休息，再经九里到许昌。许昌乃古魏国都城，我们观看了当地古迹，登文峰塔（许昌旧城在城东十里许）。车行凡二日，到达北京前门车站。我先寓浏阳会馆，此地为谭嗣同旧居，流风余韵，发人深省。

浏阳会馆位于宣武门外北半截胡同。据会馆执事刘长班谈：“戊戌政变蒙难人谭嗣同曾住会馆北屋。”即“莽苍苍斋”旧址。书斋陈设笔、砚仍旧。谭有遗照尚悬室中，其中之一为着夜行衣装束，手舞大刀，栩栩如生。谭当时有随侍二仆，名罗升与邱顺，均浏阳人。谭禁囹狱中赋绝命诗，有句云：“去留肝胆两昆仑（奴）”，即指二仆而言。

初到北京，人地生疏，食宿昂贵，这对我们这群穷学生来说，是很困难的。好在当时湖南各县多在京设有会馆，大家分住在各县会馆。但各县会馆彼此相距甚远，会员们相聚，往来步行，费时旷事，诸多不便。我与润之商议，共同租了一小房子景山东街，遂同搬至嵩祝寺

后三眼井吉安所夹道七号居住。吉安所原来是清廷皇室停放梓宫及灵柩的行宫。清室覆灭以后，该地成为废址，宫殿依旧。其迤东有一夹道，有几所矮小住房，据说原是抬灵柩的工人住室，后来因陋就简，又搭盖矮房出租。因地势偏僻，房租亦便宜，便由子昇出面租了三间小屋。先是子昇、绍麻、润之、焜甫、玉山、荣熙和我七人搬入，后来，和森亦由布里村迁来，共八人。子暉住隔壁八号。当时诸人分住东西二室，子昇、润之、绍麻和我住东间，其余住西间，每室有一铺通炕，由于人多炕窄，每席仅宽一砖半，只能跼足而卧。润之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中记述此事：“八个人聚居三间很小的房子里，隆然高炕，大被同眠。”湖南人被子大，摊不开，只好合盖。“大被同眠”此句出于唐书典故，尚有象征团结之意。

初始，大家在外吃饭，食费昂贵且不习惯，于是商议自行炊爨，各事所宜，无分劳逸，体弱及事冗者亦伴食无碍。尝因缺乏炊釜，乃以搪瓷面盆做锅。北京米贵难买，经常以炒面调成糊，加葱花、盐末充食。一次子昇做了一面盆浆糊，大家外出劳累了一天，虽饿亦无法下咽。房东是一满族少妇，人极腼腆，平日很少出门，只从窗户里探望我们，有事则让其七、八岁的小女儿来通话。她见我们不会做面食，觉得好笑，便亲自出来教我们发面蒸馍。还有送水的山东人老侯，也愿意帮忙，他说：“我不要你们工钱，我做好馍和你们一起吃就可以了。”并将自己的炊具也搬来，每天为我们做饭，和我们一起吃馍馍、咸菜。

我们八人只有外套二件，出门时轮流着穿。因室小人多，地狭不足以回旋，入冬以后，则昼往沙滩北京大学第一院图书阅览室避寒，夜则返寓围炉共话。那时生活很苦，大家从中得到锻炼，不以为苦，反以为乐。我们还步行游历了许多地方，交结了许多工农朋友，由于工作学习紧张，物质生活的困难就不在意了。

吉安所同人生活一直维持到一九一九年一、二月间。这时，子昇赴法，润之回湘，我亦因参加北大学生会工作和其他学术团体活动而改寓他处。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

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九日，由湖南到北京的新民学会会员有：和森、子昇、子暉、赞周、焜甫、芝圃、星煌、鼎丞、和笙、云熙、润之和我等。除润之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我在北大文科学习外，其余都到留法预备班。

赴法勤工俭学是新民学会会员北上的一个重要任务。至于勤工俭学运动的缘起，是到了北京，经多方了解，事隔多年之后，才逐渐知其内幕。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壮丁大部上前线参战，农业、工业缺乏劳力，因而法政府从西班牙、意大利等国输进大批工人，亦与中国政府签订合同，招募三十万华工赴法做工。北京政府为此成立了惠民公司，由张弧出名承办签证、输运事宜。前后输送了几十万华工赴法做工。张则乘机中饱。在法的李石曾等人见张获取暴利，亦想从中捞到好处，于是也向法政府商取招募华工的代理权，亦发了一笔横财。李石曾直隶高阳人，清代巨宦李鸿藻的后人，父亲亦为大官，祖传遗产很多。大战期间（一九一四—一九一八）赴法留学，学生物学兼营商业。他精通法语，往来于法国上层社会，在法国外交界亦有地位，对中国官场也很熟悉。他在法国经营了一些工厂和企业，其中较大的有巴黎豆腐公司。当时社会上有人提倡素食主义，结果李大赚其钱。他过以这些为资本，勾结法政界上层官僚，获得了招募华工的权力。但过不久大战结束，大批军人复员，劳工不再缺乏，部分华工亦被遣送回国。这一来一往，中国官厅都是有利可图的。但李石曾颇有用心计，看到华工不能继续去法，这事已无前途，但又不愿放手，就转向中国学生，鼓动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一则继续招募工作，二来也可博得青年学生的信仰，便于今后在政治上有所活动。

李石曾以创办华法教育为名，要求法国政府步美国后尘，退还庚子赔款，筹办里昂大学。赔款额达几百万法郎。以此，李便可以上下其手，取得该款的支配权。李还伙同汪精卫、吴敬恒等中国教育界的上层人物，向国内青年鼓吹勤工俭学的好处。为扩大自己的力量和影响，他们办刊物，立门户，树旗帜，大肆宣传勤工俭学运动。一九一七年四月间，他们开始在《新青年》杂志刊登广告，介绍留法勤工俭学规章。于是，勤工俭学运动在全国兴盛起来了。

湖南新民学会首先响应，子昇与和森先行到京联系，接着第一批会员于一九一八年八月间来到北京。当时李石曾已回国，并在北京大学兼课，他当即表示欢迎。是年冬，李石曾曾邀子昇、和森、润之和到我西山寓所商谈赴法留学问题。李在席上谈话自称，他平日信仰世界主义，反对强权，强调无政府思想，在学术上研究生物学，奉拉马克（Lamarck，系法国生物学家）为师，兼以工学救世。李并宣称自己不茹荤酒数十年，长期吃素，平生自奉俭约，借以取信于我们青年。他装得清流自许，貌为崖岸。我们也深为所动，认为勤工俭学一事非常紧要，作为一种反抗旧思想和反抗剥削阶级的利器，奉工学读为主义，决心大力提倡，并推润之执笔，写出勤工俭学的实施方案。经子昇修

改文字后，送交李石曾，李表示同意。新民学会诸人在最初推动这一运动，出了大力。湖南学生以及四川等地青年，一时响应者极众，如水赴壑，不能自止。其中大多数为失学、失业青年和穷苦学生。我也为此奔走呼号，在青年学生群中作过多次讲演，倡导世界工学运动，并在《新生活》等刊物上作文——《世界工读运动的讨论》。事后回想，不免有些不切实际，系主观片面之臆说，经过深思熟虑后，深觉今日万事应从中国做起。润之亦认为，这些只是一时冲动，所谓“急不择路”，此路未必走得通，但事已至此，欲罢不能，只好徐觅良途。后来，我和润之都决定暂不出国。

湖南学生汇集北京，等待放洋急如星火，而华法教育会徒托空言，无补实惠，于是湖南同学被迫自筹旅费。关于湖南学生筹措赴法旅费方面颇多曲折。先是在清朝末年铁路风潮中，湖南省为商办粤汉铁路曾收集民股二百万元（自由募集）；米盐公股一百二十八万元（由湘省出口米捐与盐附加税，积累而成）；长沙房捐四万元，以上共三百三十二万元，存放北京银行，均为湘籍官绅把持中饱。辛亥以后从未理落。此事渐为外间所闻，旅京学生声言查账。经手人湘绅熊秉三、范静生等，为和缓舆论攻讦，乃声言愿从此款中提出数万元，作为津贴湘籍赴法学生费用。于是，乃由熊、范二人出面在湖南善后协款中拨出一万六千元，作为湖南学生赴法路费贷款，发每人四百元。第一批接受贷款学生共四十名，其中法文专修馆二十名，保定留法预备班十六名，其它四名。第一批放洋赴法的有蔡和森、陈绍麻、熊光楚、萧植蕃、郭名忠、欧阳泽、成湘、黄昆吾、何长工、李蕃、刘明俨、孙发力、罗学瓚、萧拔、王守素、李维汉、陈毅、侯昌国、王人达、龙协群、陈炎、罗汉、张增益、陈闻纳、穆青、娄绍丞、贺果、李富春等。同时蔡和森以个人名义向上海纱厂资本家聂云台（湘乡人）请求帮助，聂允其请，捐三千元作蔡全家赴法用费，始得成行。新民学会会员离京赴法时，同人纷纷赋诗赠别，我写五言律诗一首云：

送新民学会会员赴法（一九一九年冬）

雪月映西山，冰封渤海湾。
围炉忻笑语，别意动燕关。
徙倚双轮动，踟蹰落日阑。
车书观万国，海上有书还。

一九二〇年间，中国留法学生集中巴黎者数以千计，其中湖南学生四百人（有一部分是自费赴法，如徐懋恂、曾琦等），因觅工不易，

赴法勤工俭学是新民学会会员北上的一个重要任务。至于勤工俭学运动的缘起，是到了北京，经多方了解，事隔多年之后，才逐渐知其内幕。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壮丁大部上前线参战，农业、工业缺乏劳力，因而法政府从西班牙、意大利等国输进大批工人，亦与中国政府签订合同，招募三十万华工赴法做工。北京政府为此成立了惠民公司，由张弧出名承办签证、输运事宜。前后输送了几十万华工赴法做工。张则乘机中饱。在法的李石曾等人见张获取暴利，亦想从中捞到好处，于是也向法政府商取招募华工的代理权，亦发了一笔横财。李石曾直隶高阳人，清代巨宦李鸿藻的后人，父亲亦为大官，祖传遗产很多。大战期间（一九一四—一九一八）赴法留学，学生物学兼营商业。他精通法语，往来于法国上层社会，在法国外交界亦有地位，对巴黎豆腐公司。当时社会上有人提倡素食主义，结果李大赚其钱。他过以这些为资本，勾结法政界上层官僚，获得了招募华工的权力。但过不久大战结束，大批军人复员，劳工不再缺乏，部分华工亦被遣送回国。这一来一往，中国官厅都是有利可图的。但李石曾颇有计，看到华工不能继续去法，这事已无前途，但又不愿放手，就转向中国学生，鼓动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一则继续招募工作，二来也可博得青年学生的信仰，便于今后在政治上有所活动。

李石曾以创办华法教育为名，要求法国政府步美国后尘，退还庚子赔款，筹办里昂大学。赔款额达几百万法郎。以此，李便可以上下其手，取得该款的支配权。李还伙同汪精卫、吴敬恒等中国教育界的上层人物，向国内青年鼓吹勤工俭学的好处。为扩大自己的力量和影响，他们办刊物，立门户，树旗帜，大肆宣传勤工俭学运动。一九一七年四月间，他们开始在《新青年》杂志刊登广告，介绍留法勤工俭学规章。于是，勤工俭学运动在全国兴盛起来了。

湖南新民学会首先响应，子昇与和森先行到京联系，接着第一批会员于一九一八年八月间来到北京。当时李石曾已回国，并在北京大学兼课，他当即表示欢迎。是年冬，李石曾曾邀子昇、和森、润之和到我西山寓所商谈赴法留学问题。李在席上谈话自称，他平日信仰世界主义，反对强权，强调无政府思想，在学术上研究生物学，奉拉马克（Lamarck，系法国生物学家）为师，兼以工学救世。李并宣称自己茹葷酒数十年，长期吃素，平生自奉俭约，借以取信于我们青年。他装得清流自许，貌为崖岸。我们也深为所动，认为勤工俭学一事非常紧要，作为一种反抗旧思想和反抗剥削阶级的利器，奉工读为主义，决心大力提倡，并推润之执笔，写出勤工俭学的实施方案。经子昇修

改文字后，送交李石曾，李表示同意。新民学会诸人在最初推动这一运动，出了大力。湖南学生以及四川等地青年，一时响应者极众，如水赴壑，不能自止。其中大多数为失学、失业青年和穷苦学生。我也为此奔走呼号，在青年学生群中作过多次讲演，倡导世界工学运动，并在《新生活》等刊物上作文——《世界工读运动的讨论》。事后回想，不免有些不切实际，系主观片面之臆说，经过深思熟虑后，深觉今日万事应从中国做起。润之亦认为，这些只是一时冲动，所谓“急不择路”，此路未必走得通，但事已至此，欲罢不能，只好徐觅良途。后来，我和润之都决定暂不出国。

湖南学生汇集北京，等待放洋急如星火，而华法教育会徒托空言，无补实惠，于是湖南同学被迫自筹旅费。关于湖南学生筹措赴法旅费方面颇多曲折。先是在清朝末年铁路风潮中，湖南省为商办粤汉铁路曾收集民股二百万元（自由募集）；米盐公股一百二十八万元（由湘省出口米捐与盐附加税，积累而成）；长沙房捐四万元，以上共三百三十二万元，存放北京银行，均为湘籍官绅把持中饱。辛亥以后从未理落。此事渐为外间所闻，旅京学生声言查账。经手人湘绅熊秉三、范静生等，为和缓舆论攻讦，乃声言愿从此款中提出数万元，作为津贴湘籍赴法学生费用。于是，乃由熊、范二人出面在湖南善后协款中拨出一万六千元，作为湖南学生赴法路费贷款，发每人四百元。第一批接受贷款学生共四十名，其中法文专修馆二十名，保定留法预备班十六名，其它四名。第一批放洋赴法的有蔡和森、陈绍麻、熊光楚、萧植蕃、郭名忠、欧阳泽、成湘、黄昆吾、何长工、李蕃、刘明俨、孙发力、罗学瓚、萧拔、王守素、李维汉、陈毅、侯昌国、王人达、龙协群、陈炎、罗汉、张增益、陈闻纳、穆青、娄绍丞、贺果、李富春等。同时蔡和森以个人名义向上海纱厂资本家聂云台（湘乡人）请求帮助，聂允其请，捐三千元作蔡全家赴法用费，始得成行。新民学会会员离京赴法时，同人纷纷赋诗赠别，我写五言律诗一首云：

送新民学会会员赴法（一九一九年冬）

雪月映西山，冰封渤海湾。
围炉忻笑语，别意动燕关。
徙倚双轮动，踟蹰落日阗。
车书观万国，海上有书还。

一九二〇年间，中国留法学生集中巴黎者数以千计，其中湖南学生四百人（有一部分是自费赴法，如徐懋恂、曾琦等），因觅工不易，

初由华法教育会给每人每日补助五法郎，至一九二一年一月止。华法教育会宣称：自是年二月份起与学生断绝经济关系。学生群起申诉，被置之不理。李石曾对学生表示决绝，于是勤工俭学运动陷入困境。子异曾从巴黎写信给我，表示勤工俭学毫无成功希望，本人想离开巴黎。其它学生，家资富裕者继续留法或进里昂大学，后来，部分勤工留法学生由上海中共中央介绍先后赴苏联，大多数则被遣送回国。

但李石曾等却为此事欺世盗名，声誉大增。他与法国政客赫里欧勾结，取得法国政府退还的庚款，办了里昂大学，扩张已派势力。后又回国勾结军阀、政客，盗卖北京故宫古物，立成巨富。继又设立投资银行，进行政治投机，取得了特殊地位，得鱼忘筌，不复再谈往事。

新民学会在长沙时，初议议全体赴法，但到北京以后，审度情势与长沙所闻不同，我鉴于国事日非，大变将临，忽然去国，良非本怀。曾以此意函告瞻帖，瞻帖复函也以为然。润之亦中途易辙，停止赴法。但和森则坚持赴法，谓势成骑虎，舍此无它途。陈绍麻初犹豫，未起程。其弟绍常坚请行，绍麻遂护送其弟出国，后竟客死巴黎，诚非始料所及！杨楚亦病歿于巴黎。

在勤工俭学运动告一段落后，我与润之共留北京从事学习与工作，期望在北方开辟一个新的革命阵地。当时，北京是中国政治、军事、文化中心，是全国铁路枢纽地带，兼为国际通衢，居高屋建瓴之势。先是我自东游返旆后，便拟投考北京大学。此事瞻帖首表赞成。他说：“师范同学受限制，非服务期满，不能投考国立大学。”所以特别希望我能进入北大学习，为新民学会在北方工作开辟先路。当时的会员中，主张我投考北大者还有和森与芝圃等。和森在一九一八年七月致子异信中所云：“罗君到省未？北京大学报名在本月二十五日截止，请电知，速定行止，盖罗于此必须另辟住处，则后来者，愈有地步也。”信中所谈，均涉及我投考北大问题。

润之原则上同意上项意见，但更具体指出说：“我们同志不应该堆积在一起，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开辟一个方面。各方面的阵地都要开辟，各方面都应该决定打先锋的人。”

当时全国国立综合大学只有一个北京大学（清末称京师大学堂）。其招生范围包括国内二十一个省，各省分有一定名额。北方诸省占名额多，南方各省名额较少，录取颇受限制。我既考入北大，同时，润之亦通过守常介绍，进入北大图书馆任馆员。他的具体工作是管理报纸杂志阅览室（每月工饷八元）。我们两人在北大时期，都积极参加北大的各种学术及青年活动，参与建立新闻学会、哲学会等学术团体。

自新民学会北上后（即一九一九年前后），北方革命形势有如春

云渐展，各方面均有进步。我乃作长期坚持的决心与计划。但此时润之忽怀念乡国，浩然有归志，遂决定辞去现职南行。行前，我们两人连日在沙滩红楼聚谈，商定去留大计，往往深夜始散。当初，我殷切挽留润之继续在京工作，因向润之说：“北京方面不宜削弱力量，你去后学会力量不免单薄，何以为继？”润之回答说：“学生身份比职员胜得多，那时你自会有办法的，莫急就好！”于是双方商定三年为期，南北分途努力，必能有所成就！他辞去北大职务，于一九一九年二月离京南行，迤返长沙。润之南归后，北方新民学会工作由我独当一面，自尔以还，彼此天各一方，南北分途，共着祖鞭，奋勇前进。直到四年以后，两人人才在上海中央会合。

润之返回乡里后，诸方面工作颇有建树。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中旬，湖南新民学会联合各界人士发起驱逐湘督张敬尧运动，润之率领驱张代表团来到北京请愿。他初进京即到北京大学西斋找我，会商发动湖南旅京学生进行响应事宜，组织“湖南旅京学生联合会”等。后来他迁住北长街九十九号（福佑寺）。他曾出示旅京代表名单约三十人，加上北京新民学会会员，湖南旅京学生及各界人士，共数百人，声势颇盛。并于十二月二十一日在北大召开慰劳湖南代表团大会，与会代表痛斥张敬尧祸湘罪行，慷慨激昂，驱张活动在京进行月余后，未获进展，于是在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八日即在湖南会馆举行群众大会，会毕游行到新华门北京政府请愿，声势大振。驱张运动结果，迫使张敬尧去职离湘，傅良佐继任，以暴易暴，湘政鲜所改进。润之于一九二〇年夏离开北京绕道上海回湘。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

新民学会的会员有五十多人，后来发展到七十多人。会员与干事会通信，这是学会给会员规定的义务。每个会员一年要给干事会写一封信，这样一年至少就有好几十封。干事会以毛泽东为主。会员与会员之间的通信数量最多。这些信由毛泽东收集汇编成册，现在看到的有三集，还有个附录。

收在集子中的信不多，平均每人一封，个别人有几封。这些通信应分前期和后期。前期是学会成立不久的一两年内，主要是讨论学术和意识形态问题，同时也谈了些有关生活方面的问题，如身体锻炼、婚姻问题等，这是初期的情况。后期从一九一九年以后到党成立之前，着重讨论政治问题，这是自然的发展，中心问题是改造中国与世界，再就是中国革命的手段，是采取苏俄十月革命的道路，还是采取其他

道路。

当时，会员与会员之间有什么问题就通信讨论，内容也广泛。我到北京后，陈绍麻、萧子昇等多次写信，要我出国。他们说我一个人留在北京，朋友都走了，很单调，主张我出洋留学，专心读书。陈绍麻认为我专心做学问，搞个专业合适些，他表示自己要在法国长期蹲下去，将来回国立志著书立说，不做官。但润之不同意，瞻帖也不同意。润之说，那些舍近求远的想法不免有离开现实的意思，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应凝神一志以赴之。这段话对我有很大启发，我认为很对。润之从北京到上海后又给我写信，他怕我动摇，勉励我坚持。这样，我就长期留在北京工作了。可见，会员之间互相勉励颇有影响，作用也大。

我和润之来往通信的事，现在有文字记载的前后有好几次。从一九一五年征友启事开始，到一九三〇年前后十五年中，断断续续地通信从未间断过。在通信集里发表了两封信。一封是一九二〇年七月我写给他的，当时正是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工作开展之时。他接到此信后，接着就回了两封信。他第二封信的第一句话就讲：“昨信谅。重翻你七月二十五日的信，我昨信竟没有一句答复你信内的话，真对不起。今再奉复大意如下。”可见他对通信解决问题是很注意的。第二封回信是发表了。这就有三封了。有关资料目录上载有他在一九二〇年六月还给我写了一封信。这样，四封信已有文献可证。

一九二〇年六月，他在上海给我写信，大致内容是：说他出京到上海的见闻；询问他出京后，北京大学内部发生了些什么情况和问题，对北大颇为关心；还提到邵飘萍，这是他所关心的人。另外在信中还鼓励我说，你在北京有困难，朋友们都走了，我们的力量比以前少了些，不要走，要乐观，要坚持下去。信中热情洋溢，讲了好些感动人的话，又谈了些生活方面的情况等等。我写信希望他不必操心，我已经习惯了。

此外，往上追溯到一九一七年，他还有信给我。这封信情文并茂，我当时曾能背得出来。一九一七年，润之游览了南岳，登上了祝融峰，在下山归途中，走到衡阳南边的中伙铺，在路边的一个小饭店里给我写了这封信。他用的是湖南草纸，有两、三张，信写得很详细，说看到了南岳，第一句话就是：“诚大山也！”意思说果真是座大山，对南岳的风光描绘了一番，文风与“海赋”格调相仿。他还谈到了古今名人志士笔下的南岳，特别提到了唐朝的韩愈宿南岳庙的诗，这首诗刻在岳庙的石板上。这些内容谈了一大段。信的最后说：为了给你写这封信，整整花了我大半天的时间，因此，今日不能登程了。信中还寄给我一首他游南岳写的诗。可惜这封信散失了，没有保存下来。

现将我在一九二〇年给他的信，和他的回信录后（见《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二））：

润之兄：

你六月三十的信，辗转交付，今日才到我手里，我读过之后，非常喜慰。你们这一年的劳苦，代价不小，有志竟成，足矜愚儒。希望你今后的生活，更趋高尚，日进无止。

自从你赴沪后，我因不知你住所，又是彼此忙着，所以少通信。但我们意气相期，理性上的交谊不浅，这些小处，何必介意！我所以觉得你的话，还嫌琐碎，润之！几经锻炼的老伴侣（战友），现在还这般客气，岂不是太斯文了么？

你的意思，注意一省的事业，想将湖南办好，我也很赞成。零碎解决，本来是很切实的入手处，于此，我只祝你成功，并不用再申私见。

学会会务发达，我觉得很高兴。现在中国最缺乏的就是知识界没有善良的有势力的士气，因之没有舆论，没有是非。青年学生，浮沉人海，随俗靡化，这便是国病。我希望我们的学会，竭力反抗这一点，便不怕没有成绩了。至于现在一班所谓学会性质，无非预谋干禄，把持一界饭碗，滔滔皆是，尤其盼望大家力避其染，自己估量一个最高的价格。“会务报告”内容如何？我当然可以贡献点意思，但是请你将要目告我，不然，我胸无题目，殊觉茫然。湘江¹出版请寄下一阅。所谈湖南青年界研究兴味不大浓厚，你还是先觉的人，责任自然很重，再出版的要求，更不可少了。

你下学期担任课么？最好多挪出些自修时间。耀灵急节，岁月易逝，无法可以挽回。况思想学术，节节僵化，更不可不注意。你的英文近想大有进取，关于肄业的近况及预计程序，也可以告我一些么？至于我自己，本想在此二年（已过），便图出国。不过现在形势又不同了，出国的事，还须延展。我校虽不是十分好读书的处所，北京却是个顶好藏书的地方，我不是身体的无用，想也有些境界了。自去年来，我读书又颇有点头绪，厌世观念，自谓绝少，不过有些旧识，近来都远去了，生活不免有些不快，但这也是偶然的感受，不算甚么。我们达教胡同的团体（曦园），因人数中减，已告解散，现在我搬到马神庙西斋（第一寄宿舍）居住，以后将继续住下，以后的生活，自期更当秩序些，安慰[定]些，有甚么话时，再向你谈。我省教育界情形，想有大改造，大建设。但是关于学款，可有了把握没有？关于人才，新到了些好名角没有？你们最好将教育状况，通信京报，俾我们大家明了。

章龙上 九·七·二五

¹ 湘江指《湘江评论》。

章龙兄：

昨信谅到。重翻你七月二十五日的信，我昨信竟没有一句答复你信内的话，真对不住。今再奉复大意如下。我虽然不反对零碎解决，但我不赞成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我主张湖南人不与闻外事，专把湖南一省弄好，有两个意思：一是中国太大了，各省的感情利害和民智程度又至不齐，要弄好他，也无从着手。从康梁维新至孙黄革命（两者亦自有他们相当的价值当别论），都只在这大组织上用功，结果均归失败。急应改涂易辙，从各省小组织下手。湖南人便应以湖南一省为全国倡。各省小组织好了，全国总组织不怕他不好。一是湖南的地理民性，均极有为，杂在全国的总组织中，既消磨特长，复阻碍进步。独立自主，可以定出一种较进步的办法（湖南宪法），内之自庄严璀璨其河山，外之与世界有觉悟的民族直接携手，共为世界的大改造。全国各省也可因此而激励进化。所以弟直主张湖南应自立为国，湖南完全自治，丝毫不受外力干涉，不要再为不中用的“中国”所累。这实是进于总解决的一个紧要手段，而非和有些人所谓零碎解决实则是痛不痒的解决相同，此意前函未尽，今再补陈于此。

兄所谓善良的有势力的士气，确是要紧。中国坏空气太深太厚，吾们诚哉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他替换过来。我想这种空气，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兄以为何如？

“会务报告”专纪会务，不载论述文字，尚未着手编辑，大略每季一册尽够了。此外会友通信，发刊通信专集，为会友相互辩论商讨的场所，兄处有与会友间往还信稿，不论新旧，请检出寄弟。

“湘江”尚未出版，固因事忙，亦怕出而不好，到底出否，尚待斟酌。弟本期在城南附小办一点事，杂以他务，自修时间很少，读“岁月易逝，无法挽回”，“思想学术，节节僵化”诸语，使我不寒而栗。我回湘时，原想无论如何每天要有一点钟看报，两点钟看书，竟不能实践。我想忙过今冬，从明年起，一定要实践这个条件才好。求学程序预计，略有一点，迟后当可奉告。

讲到湖南教育，真是欲哭无泪。我于湖南教育只有两个希望：一个是希望至今还存在的一班造孽的教育家死尽，这个希望是做不到的。一个是希望学生自决，我唯一的希望在此。怪不得人家说“湖南学生的思想幼稚”（沈仲九的话），从来没有人供给过他们以思想，也没有自决的想将自己的思想开发过，思想怎么会不幼稚呢？望时赐信为感！

弟 泽东 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在一九二〇年间，新民学会主要成员分布在北京、长沙与巴黎三处。此时国际与国内政治动态瞬息万变，对于“国是”主张，众说纷纭，见仁见智，各有不同。如北京会员主张社会革命总解决；长沙会员提出湖南省建国问题；巴黎方面对于改造中国采取的革命方式意见分歧，莫衷一是。上述情况，可从学会会员通讯中见到（现存通讯虽然为数不多，但亦可见一斑。此外，还有很多会员信函未能刊出）。

我在北大时，对当时中国革命，主张走苏俄十月革命的道路。与此同时，正酝酿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实践方面，主张与产业工人群众结合一致，进行社会革命，期望中国实行彻底改造，来个总解决。

在北洋军阀统治时代，全国黑漆一团。当时湖南会员方面鉴于国事势如乱丝，无下手理落处。他们憧憬历史上的斯巴达和普鲁士所走过的道路。因此“湖南建国”之说应运而生。一九二〇年三月间，长沙方面公布了《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宣言》，鼓吹一省建国的主张。润之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给我的信中，亦主张湖南自立为国，“湖南人不与闻外事，专把湖南一省弄好。”理由：一是中国太大，民智不齐。二是湖南的地理民性均很有作为，全国各省可因此激励进化，并与“世界有觉悟的民族直接携手。”他也同意我在信中的意见，强调说，造成“善良的有势力的士气，确是要紧。”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润之在给向警予信中又明确提出：“湖南自立为国，务与不进化之北方各省及情势不同之南方各省离异，打破空洞无组织的大中国。”意思是说，当前的中国是一个大而无当的大国，宜实行分治。对此，我自北方去信，表示异议，提出北方同仁的主张，因此发生争论。这次辩论，在一九二〇年间，我们两人的几次往来通信中，均有详细反映。记得在一次通信中我说道：“我们在北方难道能组织一个‘汉沙’？成立威尼斯小邦或佛罗伦斯小城国一样的组织吗？这当然是不合理的。”这个问题到一九二一年南北渐归一致，“湖南建国”的问题就不存在了。

巴黎方面会员的情况又有所不同。他们虽然离开本土，远适异国，对中国当局政情变化不甚了解。但是，对于中国的政治改造，也曾提出过他们各自的看法。这从蒙达尔尼会议纪录中可以窥其大旨。当时，萧子昇在来信中，认为学会政策与方针，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和森赞成马克思式的革命。”而此时，北京已正式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大力开展科学社会主义革命宣传与组织工作，并深入产业工人阶级基层，推动工会革命斗争。

新民学会成立初期，大家一致，精诚团结，去私存公，力争上游，会务蒸蒸日上，会员自十余人发展至十数倍，会员分布南北，隐然为

中国革命重镇！

在中共成立以后，我和润之分负北方与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责任，实际指导当地工人斗争。“二七”大罢工后，在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三大”的选举结果，我们两人联袂参加中枢领导！同时蔡和森、向警予等亦参加三届中央工作。山是南北壁垒，殊途同归。毛、蔡、向和我四人均湖南新民学会会员。我们自四年前北京分散后，现又从各方齐集来到上海中共中央共事。当时代英戏称之为“新民学会大团圆”。某日，代英与中夏到中共中央开会，闲谈时又向我提及此事。中夏说：“几年来新民学会主要成员由分而合，看似偶然，其实也是必然。”中夏所谓“分”是指一九二〇年我留京，和森赴法，润之返长沙。“合”是指当前四人又合在一起共事而言。

由于中共成立，新民学会对外停止活动，过去的新民学会会员大多加入中共组织。

二、北京大学

一九一八年九月我考入北京大学，学了两年预科和四年本科后，于一九二四年毕业。后因工作需要，又往还于北大达三、四年之久。

北京大学建于清朝，原名京师大学堂。宣统元年即辛亥革命前，清廷宣布“君主立宪”制，废科举，立新学，模仿西方国家政制（在这以前清朝只有“国子监”，为皇族的大学），创建了这所大学。其目的主要是造就官僚。学生多为仕宦子弟。学校行政为封建官吏所把持，他们多半出身科举。学校的教学也多由举人、进士担任。所以，它仍是一所旧式学校。辛亥革命后（一九一二年），改名为北京大学。

蔡元培出长北大

一九一七年，任用蔡元培长校（前任校长为张百熙）。蔡曾是翰林院学士，长期从事教育，又是留德学者，在学术界很有声望。他到任后，对推动北京大学的新旧更替起了较大的作用。

当时，学校风气很坏，腐败污习极深。师生中追求物质享受，讲究吃喝玩乐，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者大有人在。学生中还流行一种小报，叫《消闲录》，系私人团体主办，每天出刊，销路为北京各类小报之最。它单讲怎样过生活，鼓吹最好的娱乐是听戏、捧名角。教师中也有人公开宣扬混世主义。他们引导学生混文凭，并以不谈政治为信条。我和毛泽东刚到北大时，每与论及，无不大感惊异。

当时，学校教师大致可分为三部分人：旧派人物占大部分；西洋学者居次；思想激进的民主分子数量最少。进士出身的林纾和颇具名望的翻译家辜鸿生，可说是北京大学的逊清遗老。他们主张复辟帝制，公开向学生灌输封建保守思想。由于他们的学术地位，深得一部分学

生的崇拜，因而影响也较大。留学西洋的教员中，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有亲美派。他们推崇美国的“民主制度”，大力奉倡杜威的实证哲学。而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则歌颂英国的“议会制度”，羡慕英国的生活。甚至有人公开说：“假如中国有一天亡国了，我希望亡在英国手里。”这自然是属于极端的例子，亦足见当时教师中的思想状况。此外，还有一些是亲日派的人物。以上这些人物构成了北大教师的主要阵营，与新式人物尖锐对立。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对待苏俄十月革命以及对宗教问题上，他们与后者是针锋相对的。

在新旧势力斗争中，蔡元培是倾向革新的。蔡先生长校时，倡导和支持了多种学会。如进德会、新闻学会以及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进德会是针对学生中以求学为猎官之阶、教师中以“风雅”而相尚（指玩妓、纳妾等）的腐败习气而创立的。蔡元培亲自主持进德学会，提倡生活简朴，号召会员不做官，不纳妾，不狎妓等，以冀收移风易俗之效。

他在任人上采用“兼容并包”的方略，引进一些新人。在治学上提出“陶冶中西”的方针。这也许是由于他尚无足够的力量，以革除根深蒂固的旧派人物，只好采取新旧折中，使旧势力不反对，新势力从容展布，学校也得以暂时安定。但这种兼容并蓄，也使北大的人事杂糅，鱼龙混杂，贤愚互见。蔡的一生也深受此影响。

在引进新式人物上，蔡先生是很有胆识的。其中最著者为引进陈独秀。

陈独秀

陈独秀字仲甫，安徽怀宁人，前清秀才。父亲是个守备军官，门第平凡。但陈先生对旧思想的批判很有魄力。他笔阵纵横，独具风格。他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在思想、学术界尤为突出，深为蔡先生所赏识。为请他到北大任教，蔡亲自登门拜访。陈先生当时住在前门西河沿一间普通旅馆里，两人面谈之后，就礼聘陈仲甫先生为文科学长（相当文学院院长）。依当时门第之见，一位二甲进士出身的翰林屈尊于一个初露头角的秀才，这也是很不平常的事。

陈先生任文科学长后，没有教课，专心致力于教学改革。他在校务会议上多次提出改革学制，修改课程的倡议，见识卓著，但开始颇有些阻力。陈先生不善交际，一旦居于众多教授之上，于他也不自安。有些自命不凡的人，瞧不起陈先生，对蔡校长的做法也不以为然。而蔡先生对陈先生却极为尊重，对陈的倡议和言论极力支持。文学院的

人事、行政，一切均由陈先生主持，不稍加干涉。陈先生负责文科的改革，分成了中国文学、哲学、史学和外语的英、德、法、俄等七个系；先后延聘了许多著名教授，济济多士，盛极一时；课程也有较大改进，不但必修课增加，还开了新的选修课。象李大钊先生开的《唯物史观》，把马克思学说搬进大学讲堂，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事。陈先生改革教学的这些措施，促进了学术研究和思想解放，使北大在思想界、学术界居于领先地位。从而博得了一些人的信服，终于在北大站住了脚。

陈先生到北大后，把《新青年》编辑部也搬到了北京，主编改由陈先生和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胡适、鲁迅、沈尹默等轮流担任。当时中国处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北洋军阀政府统治之下，内忧外患达于极点。《新青年》高举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旗帜，提倡民主，提倡科学，主张政治革命，宣扬新文化，反对旧礼教，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特别是发表李大钊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学说的文章，在当时中国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新青年》宛如火炬，照亮了全国青年前进的道路。

我进北大时，陈先生已在校任职执教了。在中学时，我就是《新青年》的热情读者，尤爱读署名独秀的文章。进校初期，又听到有关陈先生的许多惊世骇俗的传闻，对他是很敬仰的。但我认识陈先生，却是很偶然的。

当时，我所在的德文班有三、四十人，彼此学历很不一样，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从国外回来的，他们大多是外交官的子弟，随家在德国、奥国、瑞士学习，回国后又转入北大继续升学，如商章逊；一部分是在青岛大学读完两年以后，转入北大重读预科的，青岛大学为德国人所办，用德语授课，德文水平较高；再就是象我、宋天放、李梅羹这样的普通中学毕业生，在中学学过四年德语。这个班由于程度参差不齐，老师授课颇感困难。同学们学习进展也不一致，对学习进度不免意见分歧。为此，我们开了几次班会，进行协商，最后确定向学校交涉，请求解决。班里决定从三种程度不同的同学中各推一名代表主持此事。我是代表之一，和其余两位同去见文科学长陈独秀。事先我们还拟了一个书面报告，由年长的一位代表面呈陈先生。陈在办公室接见了我们，说：“你们来干什么？”

我们申述来意后，提出分班的要求。陈先生听后说：“分班？办不到，目前教员和教室都没有多余的。”

我们接着提出：“是否可采用甄别的方法，部分同学经过考试合格后，可升到本科学习。”陈先生听到这里，打断了我们的话，说：“你们学生是想读书，还是想早毕业？你们希望早毕业好做官为宦？”

多读两年书有何不好？”

我们申辩说：“不是这个意思。再说，早毕业进入社会、转入仕途也不是坏事。”陈先生听后便有些光火，说：“你们根本不想认真读书。你们平时对社会上的重大问题也不愿研究，只知道考虑个人……”声调越说越高，语气失和。同学们听了也不耐烦，起身就走，结果不欢而散。

陈先生送我们出门时，似有悔意。我在班上年纪较轻，在申述理由时，越次发言颇多，出门时走在后面，陈先生边走边对我问道：“你哪里人？”我回答说：“湖南人，湖南联合中学毕业生。”他听后点点头说：“你且留下，我们再谈谈。”我留下后，陈先生问我：“你说说看，这事该怎么办？”我回答：“同学们的意见是合理的，并不说过分。没有教员和教室也不是您的责任，可以转告学校有关部门，让他们解决！”陈点点头。我又说：“同学们要求通过甄别考试提前毕业，也是正当的。有人想做官入仕，不能说我们都是怀有做官的思想。今天没有解决问题，大家不会就此罢休。”陈先生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我谈完意见就告辞走了。

代表们回去报告交涉的经过后，果然，大家不以为然。经过讨论，又派我们三人再去找陈先生。这次陈答应了，同意向学校反映，设法分班。并说，提前毕业事还要经教育部核准。一场风波得以解决了。经过这件事后，我认识了陈先生，此后，我和他的交往也逐渐多起来了，印象也逐步深入了。

陈先生当时确具革命领导者的品质。他学识渊博，才能出众，目光敏锐，敢说敢干。与刚从美国留学回来，倾心于美式民主，宣扬实用主义的胡适相反，他常向我们谈到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对巴黎市民攻破巴士底狱和建立工人政权的革命壮举十分向往。他常说，人类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并以“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的豪言与我们青年共勉。“五四”时他一再强调，要采取“直接行动”对中国进行“根本改造”。他的这些言论非常符合当时激进青年的心意。青年们对他十分敬佩，亦步亦趋团结在他的周围，正是在他这些号召的鼓动下，易克嶷、匡互生、吴坚民、宋天放、李梅羹、王复生、刘克俊、夏秀峰、张树荣、吴慎恭、吴学裴、王有德和我等各院校的青年学生，在“五四”前夕，秘密组成了一个行动小组，外称“十三太保”。在“五四”那天采取了“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的直接行动。

陈先生不只是号召青年行动，他自己也身体力行，“五四”后不久，六月十一日，他亲自带领我们上街散发《市民宣言》。那天，当他从新世界香厂游乐场屋顶向下撒传单时，被侦探发觉了，他走到天

坛就被逮捕了。陈先生被捕可以说是“五四”运动中的一大事件。

陈先生早就为北洋政府所注目，他被看作“过激派”的“元凶”，军阀恨他入骨，早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被捕时所散发的《市民宣言》，就足以罗致重罪。《宣言》中强烈要求政府“一、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的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二、免去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輿、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三、取消步兵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四、北京保安队改为市民组织；五、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这五项要求揭露了北洋政府勾结日本、出卖主权的罪行，指名道姓地要求惩办当政的显要，并提出了解除反动政府武装这一要害问题。《宣言》最后说，政府如“不完全听从市民的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农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的改造。”这就是，要采取革命手段来推翻政府了，在这帮杀人不眨眼的反动军阀眼中，岂不是犯了“忤逆大罪”。如今，陈先生落到了他们手中，真是凶多吉少，若是被他们杀害，将对“五四”运动造成严重后果。

李大钊先生一向对陈先生十分敬重，看到陈先生落在敌人手里，非常着急，马上领导同学设法营救。大家首先想到的办法，是将陈先生的被捕消息通告全国，借以造成强大舆论，使北洋军阀政府有所顾忌，不敢胡作非为。果然，这个消息由北京学生致上海学生的电报传出后，全国舆论沸腾，函电交加，要求释放陈先生。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亦大声疾呼，抨击北洋政府。

李大钊先生想了各种方法来营救陈先生。这对当时的警察总监吴炳湘等人产生了一些影响，北洋政府中一些人也怕事情闹得不可收拾，才于九月中旬将陈先生释放出来。

陈先生出狱的喜讯传来，大家十分欣喜，李先生尤感高兴，特写了一首诗《欢迎独秀出狱》，全文如下：

(一)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他们的强权和威力，
终究战不胜真理。
什么监狱什么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
所以真理拥护你。

(二)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相别才有几十日，
这里有了许多更易：
从前我的“只眼”忽然丧失，
我们的报便缺了光明，减了价值，
如今“只眼”的光明复启，
却不见了你和我们手创的报纸！
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叹息，
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
好象花草的种子，
被风吹散在遍地。¹

(三)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有许多的好青年，
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
“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
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
他们都入了监狱，
监狱便成了研究室；
你便久住在监狱里，
也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

李先生的诗表达了他和陈先生的友谊，也反映了“五四”时期给青年一代带来的革命风貌，为当年北大青年所进行的斗争留下了一块纪念碑。

陈先生出狱后，并没有停止战斗，他随时有被再次逮捕的危险，他先是隐居在刘文典先生家中。李先生考虑他的安全，遂与我们反复研究，最后征得陈先生同意，决定护送他出京。李先生亲自就如何护送问题精心设计，并为此一度亲到天津，作出了周密妥善的安排。一九二〇年底，李先生带了我们几个学生，与陈先生一起，都打扮成商人，雇了一辆骡车，趁着晨光曦微悄悄出城，由小路经廊坊前往天津。李先生是位老成持重，胆大心细的人，他一口道地的河北口音，乡情又熟，因此，他们顺利地到达了天津。

一九二〇年一月，李先生又在天津亲送陈先生登上开往上海的轮船。从此，陈先生结束了在北大的教学生活，而开始了新的征途。²

¹ 此段诗尾，作者补有“对未来革命估计”“十几个信徒”两行字。— 补注

² 此篇末，作者补有“[注] 据说 曾到过昌黎碣石山转往天津 不悉此事”字，概指陈独秀离京去津。— 补注

三、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

一九一八年以还，北大学术研究与活动盛极一时，其中以哲学研究会与新闻研究会会员人数最多，均公开活动。其活动情况由当时的校刊《北大日刊》择要公布，至今犹斑斑可以考见。

北大新闻学会

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为我国最早研究新闻学的团体，历时也较长。除课堂研究外，兼重实践。会员中，参加当时的革命行动者不乏其人。其中邵振青便是代表人物之一。

溯至辛亥革命后，中国新闻事业如雨后春笋，一时勃兴起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日报刊行颇多。当时北大同学在课余之暇自办刊物兼从事新闻记者工作的不乏其人。北大创办了各种周刊，于是同学爱好新闻事业遂一时蔚为风尚，谭鸣谦、谭植棠、高尚德、区声白、毛润之与我等诸同学，自办刊物并经常为各报刊撰写稿件。同时，也喜欢研究有关新闻业务的理论与实践诸问题。

可是当时北大没有设置“新闻学”课程，北京各大学中，也没有设新闻专业。一天，我和几个同学在景山公园散步，途中谈及此事，大家觉得何不联合同学，共同来研究这门学问。回校后我们便去向徐宝璜教授请教。徐教授是江西人，新从美国回来，会谈之下，十分热忱。自称：“在美国时，已学习过几门有关新闻学的课程”，很愿意指导我们学习。同时，我们又将这个意思，告诉了常向我们索稿的邵振青。邵氏是《京报》报社社长，浙江人。为人聪慧开朗，一表非凡。他亲为《京报》写社论，编新闻，时感人力不足，因向北大同学组稿。他曾主动写信给蔡元培校长，倡议设立新闻学研究会。

此事酝酿多时，经北大师生多人共同努力，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终于在一九一八年十月成立。讲习会址在沙滩东口红楼三十四教室，先后参加的会员五十余人，均系北大同学。蔡元培校长因势利导，并积极参加学会工作，被选为会长。徐宝璜与邵振青选为导师。徐先生还兼任学会总干事，亲授新闻史。他自编的讲义约百余页，内容新颖。高徐先生诲人不倦，心地诚实，有心做一个中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高徐先生海人不倦，心地诚实，有心做一个中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讲到一段兴时，他滔滔不绝，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毫无倦意。讲到一段落，他发问责答，十分认真。有时，发给每人卷纸，令大家作题实习。如发现错误，立即援笔批改，我们着实获益，短期讲用，一生受用不少。

新闻学研究会每周讲习三至五次，主要在第一院文科三十六教室举行。学会还举办一个临时性的小型报，是为北京全市运动会开幕而出版的，会毕随即停刊。经过五个月的讲习后，举行了一次结业仪式，蔡校长亲自主持毕业典礼，由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发给文凭，文凭上有会长蔡元培与总干事徐宝璜的亲笔签名，大家如获珍宝。计学会会员中取得证书者共五十五名。其中得听讲一年证书者共二十三人，即：

何邦瑞、谭植棠、区声白、倪世积、谭鸣谦、黄欣、严显扬、翟俊千、张廷珍、曹杰、杜近涓、徐思达、杨亮功、章槛诒、傅馥桂、温锡锐、缪金源、冯嗣贤、萧鸣籁、欧阳英、丘昭文、罗汝荣与陈公博等。

取得听讲半年证书者共三十二人：

李吴祯、陈秉瀚、徐云光、姜绍谟、来焕文、马义述、杨立诚、易道尊、毛泽东、罗璈阶、钟希尹、常惠、吴世晋、王南邱、鲍贞、韩荫毅、陈光普、朱存粹、华超、朱如儒、舒启元、刘德泽、梁颖文、倪振华、杨兴栋、曲宗邦、慰士杰、黄琴、吴宗屏、高尚德与陈鹏等。

上述诸人其思想分野与政治倾向，互不相同，如谭植棠、谭鸣谦、陈公博、毛泽东、罗璈阶、舒启元、高尚德等均先后参加中国共产党，其余分别参加不同政治团体者，不遑悉举。尚有一部分会员从事革命文学活动，思想进步，均曾积极参加“五四”运动的直接行动与新文化革命运动。

由于北大师生同心合力，新闻学研究会办得很有成绩，声誉日盛，因此，他们被誉为中国新闻学界的拓荒者。

一代报人邵振青

在北大新闻学会的学习研究和活动中，还应郑重提到邵振青。他

是北京大学新闻学会的倡议者和促成者。北京大学新闻学会的开展当时虽然名义上由北大校长蔡元培负责，但蔡因校务殷繁，实际工作均由导师二人主持。同学实习辅导则由邵振青独立承担。因此，他实负重任。大家对邵都怀有好感。我由于工作上的关系，与邵接触频繁。他的言论和行动，后来渐渐与中共北方区委党的政策发生共鸣。一九二六年，他以“宣传赤化”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入狱，枪杀于北京天桥刑场。他对党的革命事业是有卓越贡献的。

邵振青，字飘萍，浙江东阳县（一说金华）人。在浙江高校毕业后，曾为中学教员，同时兼任地方报纸通讯员，辛亥革命时曾与杭辛斋经营浙江《汉民日报》（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该报与浙江旧势力抗争，与官厅立于反对地位，因此邵被逮捕三次，拘禁九个月，最后《汉民日报》竟被封闭，邵乃东赴日本，自设东京通讯社，向中国各大城市供应新闻稿件。他又在北京自办昭明印刷厂。邵在北方时与李钊过从颇久，结为文字之交，实为后日加入政治活动之媒介。邵到北京后，创办《京报》，参加新闻学会，一生事业从此发轫。

邵振青是具有革新思想和较有魄力的新闻记者，他是最早创建中国新闻学专业的拓荒者。

一九一九年四月，他为徐宝璜所著《新闻学纲要》写序时，说：“自蔡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以来，各种学科，渐臻完备，又注意于临时讲演，以补教科书所未及。……窃叹我国新闻界人才之寥落。远观欧美及日本近年以来，新闻之学，与日俱进，专门著述，汗牛充栋，其新闻事业之发达，亦即学术进步之效果耳。去年之春蔡校长有增设新闻讲演会之计划，余乃致书以促其成。比得蔡先生复书，极承奖饬，斯会遂于暑假以后成立，请教授徐伯轩先生主任其事。蔡先生复以余从事新闻记者有年，并函聘为导师。自维于新闻之学，素乏研究，而以蔡先生之所期许，于理又不敢辞，遂与伯轩先生分任演讲。区区之意，欲为未来之新闻界开一生面。”

从上述文字可见邵振青对新闻学极有抱负，慨然欲为中国新闻界别开生面，可谓前无古人。不仅如此，同时邵还写有《实际应用新闻学》一书（一九二三年八月北京京报馆出版）。他在该书序言中开宗明义阐明，我国新闻界所最需要者，为培养各种外交记者（访员 Reporter）。他说：“记者精神上之要素，以品性为第一，所谓品性者，乃包含人格操守，侠义勇敢，诚实、忍耐，及种种新闻记者应守之道德，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泰山崩于前，麋鹿兴于后，而志不乱。”他参考欧美日本学者专门著述，及自身十余年来实地经验所得，以极浅显之理论，供有志青年之研究，书中所述理想的外交记者应“取法乎上”。邵振青又认为从事新闻事业应对各国

社会思想有真知灼见。他著的《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一书流行国内。他在采访新闻时强调政治经济与劳工诸因素。

各工厂，举凡工矿中之黑暗，工人之待遇，工资，时间，工头制度，徒弟生活，工人团体（教育训练），罢工酝酿等均应为社会记者所特别注意，邵特别重视劳工运动，关于同盟罢工问题，他主张采访下列各项新闻：1) 公司组合，工厂及地方名称，2) 工厂等所有者及经理人姓名，3) 罢工者人数，4) 以前该地有无罢工其时日及原因（与今次比较），5) 劳动者方面代表的姓名，6) 今次罢工的真正原因，7) 劳动者方面提出条件（如对工资削减不平，及加工资要求等），8) 工厂方面提出的条件，9) 劳动者与工厂争论始末，10) 现在的工资，11) 劳工时间，12) 工资及时间，近来曾行改革否，13) 与其他地方企业的工资时间比较，14) 劳动者的团结力，15) 劳动者中破坏团结作业者，16) 罢工前途的预测，17) 劳动者已受到社会方面的同情，18) 上次罢工时，19) 与工厂接洽总代表姓名，20) 解决前途的推测，调停者活的结果，21) 罢工业务的种类产额及现况，22) 新劳动者雇入之预计量，23) 雇主等的威吓行动，24) 警方之处置，25) 罢工的结果，26) 工会方面的光景，27) 工厂方面的态度，28) 罢工者罢工中之生活费所从出，29) 商业及公众所蒙受的影响等。由此可见他同情罢工追求新闻自由，思想是激进的。对新闻学理论与实践是有深刻修养的。

邵在北大新闻学会讲授新闻实践，他自己承认学问根底不佳，其实他文采丰富，议论通畅，思想敏捷，真是下笔千言，倚马可待。他在这方面给我们的训练影响很大。他最能干的是采访新闻的手段，他自嘲“守如处女，动若脱兔，有鬼神莫测之机”。例如当时刺宋渔父要犯洪述祖正在北平就逮，他运用方法从洪之妾手中获取洪氏亲笔日记露布《京报》，幽燕人士，无不惊其采访绝技。

邵为人做事极能干切实，且机警肆应，故《京报》销路首屈一指，广告收入大为增加，他以报社经济力量，支持北方区革命事业，做了许多对革命有益的事情。

邵振青对于非宗教运动工作，曾作出重要的贡献，当年北方区党组织曾给予良好的评价，事情大概经过是这样的。

我当时担任北大中共支部书记，除联合北京国立八校教育界师生和北京新闻界共策进行公开集会讲演外，并出版《非宗教论》一书。

该书中刊有八英寸铜版肖像三十四幅，另有中国分省宗教“教毒”地图一巨册，内有总图二幅，均须用锌版。

此项工作均由邵振青所主办的昭明印刷厂承印办理。他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不少的义务援助。

当年《京报》在《非宗教论》一书上刊登广告，首称：“《京报》

由邵飘萍主干，专门学子十余人，分任编辑。”所谓专门学子，大都系北京大学学生，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他们是通过北京党组织派往工作的，由邵本人负责培养训练，后来都渐渐成为新闻战线上的干部，有才能的记者和编辑。

与此同时，邵振青在本位工作上，又不断向我们党组织提供了关于北洋军阀政府方面的重要军事、政治、经济等一系列情报资料。同时他又从东交民巷外交团、路透社、电通社、法国、德国等为我们取得特殊重要的新闻消息。这些工作都很有价值。

一九二三年二七大罢工期间，中共北方区委政治宣传任务十分繁剧，而北京地区白色恐怖严重，缇骑密布，禁网森严，我与北大支部同志高君宇、缪伯英、宋天放、江囚、刘伯青等坚守岗位，隐蔽居住，在骑河楼等处主编《京汉工人流血记》。一夕数迁，不遑宁处。当时印刷发行条件极端困难，排字、铸版、打纸型、装订等项工作，原来主要放在北京大学地下室印刷厂秘密进行，后因发行数量激增，人力物力均感不足，幸得《京报》尽力支持。这样《京汉工人流血记》数以万计的发行量，方得顺利完成。因此，同志们都说这是《京报》对革命工作雪中送炭！

一九二二年前后，我党在北方发动八条铁路的同盟罢工和唐山、开滦大罢工，在革命宣传方面出版了《工人周刊》，创立劳动通讯社，同时也得到邵飘萍的同情和支持。此后，我作为北方党的负责人经常和他联系工作，在北京市工会工作方面成立了革命的印刷工会，《京报》印刷厂工人也参加了这个组织。

一九二三年六月我离开北京到上海中共中央局工作。随后又奉命出国，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旅途中我和邵飘萍仍保持通讯联系。

一九二六年，北方革命如火如荼，向前发展。我负责铁路总工会工作，曾留居北京数月，知道《京报》工作也极有进步。邵振青在主持《京报》期间，在一九二四年时，热情拥护国民政府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歌颂俄国的十月革命。在《京报》出版“纪念马克思诞辰专号”和“列宁特刊”，一时人人争购，号称“洛阳纸贵”。其中部分编辑系由北方区委派往工作的，大都是北京大学学生。由于《京报》内容刷新与充实，销数骤增至六千份以上。这在当时，已是相当不错的了。

邵振青生平性格开朗，交游极为广阔。曾先后受聘任上海《申报》驻京记者，日本东京《朝日新闻》驻沪特派记者，在京时与《泰晤士报》记者 Morison 往还，增加了他在国际上的声誉，因此他名满京华，誉望极高。但誉之所至，毁亦随之，他却处之泰然，尝对我说要从事革命就难免“尽如人意”，但求心无愧怍就够了！但反动政府对于他

的政治背景是多方进行侦查的，所以最后以“宣传赤化”罪名将他杀害，这决不是偶然的事。如所周知，邵振青在军阀专政下，从事新闻记者工作是备受压迫的。他在政治上与中共北方区地下党发生联系后，更引起军警方面的经常注意。《京报》的言论和新闻，旗帜相当鲜明。因此一九二三年二七惨案发生，《京报》一度被查封。该报被封时，军警搜查，如捕大盗，他仓促间从屋顶逃出，暂避居于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当时安福系内阁即以扰乱京师治安罪名照会公使团引渡，并行文全国通缉，他乃仓皇逃往天津。

一九二六年二月，《京报》再被搜查，他走避东交民巷，四月二十四日晚间化装回馆清理文件，在琉璃厂被警察捕去，同时《京报》被封。

二十五日，北京各界推举代表谒见奉军第三军团长张学良，请求释放。张学良说：“取缔宣传赤化分子，早经奉天军事会议决定，警厅奉令执行，邵不过其中之一人而已。”邵在警厅受到军法审讯，二十六日清晨被绑赴天桥枪杀。他临刑时态度从容，面不改色。

邵为中国新闻事业，为中国革命做了大量的工作，最后为人类伟大目的，贡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是求仁得仁，中国人民对他永远怀念的。

四、“五四”运动

行动小组

我进入北京大学的第二年——一九一九年，爆发了著名的“五四”爱国运动。其发源地亦在北大，我躬与其事，见闻较为亲切。

当时的北大一如前述：自蔡元培出长北大后，力图把旧式的北大办成一所新式的学校。他聘请各方面有名望的人物来校任教。这些人中，又以当时有进步思想的学者为主。蔡先生的这些主张和做法，对形成北大活跃的学术空气，使一些进步的学者云集北大，从而成为一种文化上的新力量，无疑起了颇大的作用。

文科学长陈独秀所主办的《新青年》，更成为革命青年意识形态的启蒙刊物，它大力宣传“科学与民主”的新思想。陈独秀和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撰写了很多批判旧思想的文章，特别是十月革命后，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方面，更是一马当先，不遗余力。如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在当时影响很大。同时，这些新思想也有力地冲击着封建礼教，孔孟思想的集中地——落后的北京大学。其势犹如江河决口，沛然莫御。

北京大学内部这些新、旧思想斗争的展开，随着一九一八年末——一九一九年初的社会政治变动和政府外交上的吃紧，也就一天比一天扩大，一天比一天活跃。它的具体表现之一，乃是各种社团的涌现犹如雨后春笋。在当时主要还是学术性质的社团，如哲学、新闻、进德三个学会，是以学校名义组织、由蔡元培先生领导的。除了这种“官方”的以外，在当时也有一些学生自己组织的团体，较重要的如国民杂志社、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辅仁社等等。

其中的国民杂志社，在“五四”运动中曾起过中坚的作用。该社的负责人周长宪、吴迪恭等，均是北大法律系学生。周还是《国民》

杂志的主编人之一。国民杂志社的成员遍及北京国立八校，在北大的会员尤为众多。

李大钊和其他一些教授，如吴虞、杨怀中也经常参加一些学会的活动。

除上述各种社团外，还有各班、各系、各科（院）的学生会组织。但从整个北大说来，还没有正式的全校性的学生会组织。在院一级的学生会中，以文科、理科的学生会组织比较整齐、比较坚强，而其他则不十分严密。除北大外，国立八校如高师、工专、医专、法政、俄文专修科、法文专修科、农科等，也都有各自的学生组织。还有跨院校的会社组织，如湖南学生会，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即“共进社”的前身），新滇社等等。

参加各种学会的成员，有一批追求进步、立志社会改革或思想激进的青年。其中有不少人，从此走向革命，参加了党和团的组织。

以上种种事实表明，“五四”运动前夕，在青年学生中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为即将到来的暴风骤雨式的群众运动奠定了思想和组织的基础。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八日，巴黎和会开幕，消息不断传来，各校学生对于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奴颜婢膝的种种倒行逆施愈益不满。二月九日，北大学生曾集会，专电中国政府派往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陆宗輿等不要退让。在平日，学生中讨论国是的活动也愈益频繁，他们通过各校组织，经常聚会。我参加了一个以湖南学生为主的小组活动。这个小组的人数起初虽然不多，只二、三十人，但有代表性，国立八校的同学都有，但以北大同学为主，小组及其成员具有组织力量，可以发动各校的运动。这个小组的主要成员是：易克嶷、宋天放、匡互生、罗汉（海潮）、吴予坚、李梅羹、吴慎恭、刘澄宇、陈德荣、吴铿、张树荣、王复生和我。小组没有设正式委员会或书记，对外也没有名称。其中许多是我过去辅仁社的同学。小组成员常常碰头，议论当时的重大政治问题。他们也都是些学校学生会和社团的负责人或积极分子。平时则分散活动，遇有重大事情，小组便集中一起讨论。¹

四月底，青岛事件发生，巴黎噩耗传来，广大学生群众非常愤慨，小组讨论就集中在这个外交问题上。议论一番后，大家认为静等政府处置是没有希望的，必须发挥国民外交作用，采用民众的力量来制裁。于是，一致主张“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为了有效地推动运动，我们组成了秘密行动组。这时，国内外形势急转直下，行动组有人主张

¹ 此页，作者补有“打虎需要亲兄弟，小组人不在多，而要精。”字，未标示补入处。— 补注

采取暴力手段制裁卖国贼。大家都同意这样作，于是分头准备。组内成员有不少同学是南方人，身强力壮，具有南方强悍民风 and 勇于斗争的精神。大家斗志昂扬，并推定易克嶷、罗汉、匡互生及我为全组负责人，具体部署，分途进行。

经过商量研究，确定宋天放、吴慎恭等去探查卖国贼的住宅，查明行动的门路、进出的路线；另外，易克嶷、刘澄宇等想办法认识曹汝霖、陆宗輿、章宗祥等人的面貌。为认识曹、陆、章等人，大家想了一个办法，北京的廊坊头条胡同，是几家照相馆的集中地，当时政府一些官员为了显示自己，将个人的照片都陈列出来。我们就派人到照相馆去对号。这些准备工作都是事先完成的。

到了五月一、二日，最先是北京大学内部从下而上的进行了各级学生会的讨论。学生组织掌握在中年级同学手里，经过从班到系层层发动，于五月三日晚召开了学生大会，决定次日在天安门前开北京各校学生联合大会并举行大规模游行。行动组连夜讨论，安排了几项工作：第一，推定执行主席负责控制大会主席台；第二，派专人负责指挥几个大学带队掌旗的；第三，组织交通队和口号队，口号队还设有英语的，标语、传单也分中西两种文字，目的是让外国人也懂得大会的意义；第四，作好打卖国贼和可能发生冲突的准备。

五月四日这天，十几个学校的学生队伍潮水般云集天安门，北大的队伍到得较晚。我们到那里时，小组的一些成员正在进行演说和鼓动，群情振奋。接着，就宣布出发游行。

游行开始时，没有公布详细路线，按过去习惯，游行是经东西长安街、东单，西单、前门一带。这时有人提议到东交民巷去，向日本公使馆提抗议。群众跟随着校旗，浩浩荡荡，呼着口号前进。除了小组的负责人，谁也不知道这次游行要去攻打赵家楼。队伍在东交民巷受阻，经过一番交涉后，领队就簇拥着校旗，改道把队伍带到东城猪市北边的一个较大的胡同（赵家楼就在这里）。我们领头的四、五个人见胡同里外已布有军警队伍，曹宅铁门紧闭，没法打开，便想走后门进去。但经研究又觉不行，怕调动中队伍走散了。最后决定派三个人搭人梯，从事先探明的窗子里爬进去。我们陆续攀登进去十余人。其中匡互生、罗汉、吴予坚和我都先后由窗口进去了。当时，院子里站着一排军警，都上着刺刀。我们在门外的同学，不断地喊口号，有的还用砖头、大石砸门，其势甚为汹涌。警察未奉上级命令，不敢擅自开枪，也不敢随便乱动。我们进去的人，有的去给警察作解释，宣传爱国反日。有几人乘其不备，将大铁门打开，人流象潮水一样涌进来。我们没有找到曹汝霖，只发现了章宗祥，大家一涌而上，把他痛打了一顿。章宗祥被打时，有一个日本人扑在章的身上，连声喊叫：

“不要打了”。还有一个时髦的年青女子，见状吓得不得了，有人叫她离开，并护送她到另外的地方躲避。后来，匡互生等同学没有找到曹汝霖，气愤地将屋子里一些易燃的挂画都扯下来，集中起来点火烧了。——匡互生又名日休、务逊，湖南宝庆（今邵阳）人。他是我们行动组的中坚分子，高大个头，有股侠义劲，敢说、敢干，但思想倾向无政府主义。

火一起，外面的军警就包围进来了。群众开始撤退。因有些人负责掩护断后，结果有三十一、二人被军警逮捕了。其中有几个是行动组成员，如易克崑、吴予坚等。

“五四”这天游行示威与火烧赵家楼的行动，北京大学及其他学校的教职员均没有参加。《北大日刊》当时对于五月四日运动也心存顾虑，亦未加报导。

为了援救被捕同学，五月五日上午，北大召开了学生大会，蔡元培校长也出席了。会上，决定成立统一的北大学生干事会，决心把斗争坚持下去，进一步争取全市学生的联合行动。

“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的行动毕竟在社会上产生了效果，卖国贼的气焰低落下去了，反动政府也着了慌。五月七日，被捕的同学全部获释，但是军阀政府又提出“追查肇事学生、依法惩办”和“严禁学生扰乱社会秩序”等，进一步迫害爱国学生，而对卖国贼却不予惩办。学生们继续坚持斗争，外出讲演，罢课抗议。这一运动已得到全国各地响应，声势也愈来愈大。

从六月一日至六月三日，演讲、请愿斗争更为激烈。这是“五四”运动后的又一高潮。几天来，从清晨到傍晚，北京及全国各地赴京请愿的学生，布满大街小巷，到处是游行的队伍，到处是呐喊的声音。“六三”那天，我和班里同学组成一组，按约定到东城讲演。时值炎夏，烈日当空，同学们挥汗如雨，但仍不顾疲劳进行宣传。不久，忽来一队军警，将我们组全部捕去，关进北河沿北大三院临时监狱中。此时北大三院大门外沿河一带遍布军队帐篷，已将三院团团包围。当天下午，北大学生会和北京学生联合会，发动了一、二万人赴新华门总统府请愿，要求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出来接见学生，回答问题。这次请愿规模声势之大，斗争精神之坚韧、顽强，在我国学生运动历史上是空前的。

爱国学生的革命行动，使军阀政府极为震惊。当晚，徐世昌总统在中南海召开了内阁阁员紧急会议。以北洋军阀段祺瑞的参谋长徐树铮为首的一些武职官员，认为学生无法无天，“太猖狂了”，叫嚣要用“武力解决”。徐树铮还建议把大炮架到景山，轰平北大；另外，徐世昌等人主张“和平解决”。但是，虽然内阁会议做出了“和平解

决”的决议，没有炮轰北大，徐世昌还在接见方豪等十名学生代表之后，表示同意学生提出的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惩办卖国贼、释放被捕学生等要求；而另一方面，徐树铮等却早已做好了镇压学生的部署。我们请愿队伍在深夜解散回校途中，又一次遭到反动军警的大逮捕。关进北大三院临时监狱的人不断增加，行动组的成员全都被关进去了。被捕的学生当中，还有不少女同学。

北洋军阀政府镇压学生运动的暴行，激怒了全国各界民众。罢课、罢工、罢市之举蜂起，全国陷于一片混乱之中。在举国一致的强大压力下，北京政府不得不向爱国学生让步，于六月五日下午下令释放被捕学生。六月十日，北京政府下令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六月二十八日，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拒签和约。至此，伟大的“五四”运动便胜利地告一段落了。

值得一提的是长辛店的铁路工人所组织的“救国十人团”。它在“五四”期间曾到北京，参加了学生运动。

我们这个行动小组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北方小组成员，或青年团的基干。“五四”运动对我们来说，是一次革命的演习，也是一次很好的锻炼。

“辅仁学社”

“辅仁学社”成立于一九一三年。它是由湖南长沙长郡中学部分同学组成的。成员有三十多人。学社名称取其意为“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是个研究学术的团体。

长郡中学原为长沙府中学堂，辛亥革命后改名长郡中学。因它是由长沙郡十二县公款筹办的，故又称长沙第一联合中学。

“辅仁学社”简称“辅社”。一九一八年前，“辅社”的大部分成员都已中学毕业，其中一部分成员，有的升入大学学习，有的出国留学。它虽是一个纯学术团体，主要是以研究科学知识为主，但后来，它的许多成员在各次政治斗争以及某些地区的斗争（如湖南的驱张运动）中，都成了其中的领导者或积极分子。

毛泽东和部分“辅社”成员，过从甚密。一九二〇年他因驱张运动到北京时，“辅社”在京的部分成员曾组织欢迎会。现尚保存在革命博物馆的一张照片，就是当年“辅社”部分成员与毛泽东等在陶然亭合影的纪念。照片中，除毛泽东和我外，还有周长宪、易克崑、匡务逊和陈兴霸等。现在尚记得的“辅社”成员除我外尚有：

易克疑（赓甫） 北大文学院¹
 陈兴霸（远谏） 北大法学院
 周长宪（邦式） 北大法学院
 吴汝铭 北大法学院²
 宋天放 北大法学院
 罗海潮 北大法学院
 吴汝霖 政法专科
 匡务逊（日休） 北京高师³

以上是中学毕业后到北京的成员。留在湖南以及其他地方的成员

有：

张孝骞 湖南湘雅医学院（后留美，是我国著名的医学专家）
 彭治朴 湖南湘雅医学院（后留美，是我国著名的医学专家）
 张 维 湖南湘雅医学院（后留美，是我国著名的医学专家）
 熊亨仁 后为长沙女中校长
 萧盛礼（乐天） 警官学校
 彭光闾 保定军官学校
 陈忠杰 商务印书馆编辑
 郑家俊（点石） 留学德国柏林大学
 刘克俊 北大毕业后留学德国柏林大学⁴
 曾祥梓 留学日本帝国大学
 萧 成 星加坡中学任教
 萧延煦 联中毕业
 杨 堃 联中毕业
 周 立 联中毕业
 曹 昌 联中毕业
 沈开益 联中毕业
 邓毓灵 联中毕业
 龙若云 联中毕业

“五四”时期，“辅社”成员中参加直接行动小组者有易克疑、匡务逊和我。“五四”后，我参加发起组织“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吴汝铭、吴迪恭参加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匡务逊组织高师工学社。

后来，易克疑回长沙；刘克俊、郑家俊赴德国留学；张孝骞赴美留学；曾祥梓留学日本。由是“辅社”社员星散，自动停止活动。

1 此行后，作者补有“192 入党”字。— 补注

2 在“吴汝铭”后，作者补有“宋天放、罗海潮均”字，从周长宪至吴汝霖划出连线，补有“192 党员”字。— 补注

3 此行后，作者补有“团员”字。— 补注

4 郑家俊、刘克俊两行末，作者均补有“1927 入党”字。— 补注

“辅社”社员彭光闾、萧乐天参加军事行动，反对北洋军阀，为革命独树一帜（护国军）。¹

“共进社”

一九一八年暑假期间，我刚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预科，寓居三眼井吉安所左巷七号院时，与我们一墙之隔的左巷六号，住有陕西旅京同学李子洲（即李登瀛）、刘天章、杨钟健、杨晓初等。六号院共有十来间房子，全由他们包租了。他们组织了“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编有《秦钟》、《共进半月刊》等刊物。“五四”后，正式定名为“共进社”，亦是北大较著名的社团。“共进社”人多势众。从吉安所左巷到西老胡同、中老胡同、东老胡同及至沙滩，都有他们的寓所。李子洲是“共进社”的主要领导人，人们尊称他为“大脑”，在他和“共进社”周围，团结了一大批陕西的进步青年学生。他们朝夕相处，往来频繁。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居住在别处的陕西同乡，也多来左巷六号聚会，热闹非凡。其中有刘含初、屈经文、耿炳光、方仲如、营尔斌、潘自力（以上均为北大同学）、杨明轩、魏野畴、魏惜言（以上为北高师学生）等。

当年，“共进社”在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倡导科学与民主及传播马克思主义等许多重大问题上，都很有影响。

我们原是一墙之隔的近邻，“共进社”的李子洲、刘天章、杨晓初、杨钟健、魏野畴等，与我和毛泽东、蔡和森、陈绍麻、萧三等“新民学会”的会员相处较熟。饭后茶余，常聚在一起谈天，从国家民族大事到学术思想问题，以至生活趣闻，无所不谈。

我们寓所距红楼很近，只有“一箭之地”。学校钟声、哨声声声相闻。在“五四”期间，北大学生会或北京学生联合会一有号令，吉安所左巷一带便闻风而动。北京学联的总务科，全是“共进社”的人。李子洲等同志工作得很出色，每次集会、游行，在他的带领下，很快就能把游行需用的大、小旗子制作齐全，及时写出和刻印好所用的标语、传单。李子洲嗓门宏亮，富于鼓动。北大成立学生干事会（简称学生会）时，李子洲被选为学生会干事。

在稍后发生的罢课斗争，“救国十人团”的宣传活动和“六三”请愿斗争中，“共进社”的同志们，都是积极的参加者和组织者。“六三”晚上及以后的大逮捕中，“共进社”的社员也大多被投进监狱。

1 此处，作者补有“可参阅椿园诗草第八页萧乐天将军歌”字，即岳麓书社1987年6月版《椿园诗草》。— 补注

在激烈的斗争中，我们和“共进社”结下的战斗情谊，历久不渝。

一九二〇年三月，李大钊和我们在北大秘密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党的“一大”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公开活动，并征收会员，李子洲是最早报名参加的基本会员之一。“共进社”的刘天章、魏野畴等，也是其中的基本会员。

“共进社”很多同志，早期就加入了党的组织。他们回到陕西后，对陕西各地党组织的建立、根据地的开拓，都有许多建树。可以说，他们是党在陕西地区进行斗争的早期开拓者。

五、曦园

曦园是由国立八校一部分思想激进的同学组织的。它是一个倡议并实行泛劳动与自由研究的大专学生的团体，成立于一九一九年秋季。地点在北大附近东皇城根达教胡同二号。主要由北京大学、北京高师、北京工专、医专与农专等校同学三十余人所组成。其成员犹能记其姓名、学籍者，除我外尚有：

- 邓中夏 湖南省宜章县人，北京大学文学院二年级。
- 张国焘（特立） 江西省萍乡县人，北京大学理学院二年级。
- 吴汝铭 湖南省长沙县人，北京大学法学院旁听生。
- 李梅羹 湖南省浏阳县人，北京医学院二年级。
- 杨人杞 湖南省醴陵县人，北京大学文学院一年级。
- 易克嶷 湖南省长沙县人，北京大学文学院三年级。
- 刘克俊 江西省安福县人，北京大学法学院二年级。
- 萧镇湘 湖南省醴陵县人，北京工学院四年级。
- 杨亦曾 湖南省新化县人，北京大学文学院四年级。
- 刘 汇 直隶省大兴县人，北京大学文学院四年级。
- 陈 锡 湖南省邵阳县人，北京大学理学院四年级。
- 吴学斐 湖南省长沙县人，北京大学法学院旁听生。
- 杨副时 湖南省宜章县人，北京中学学生。
- 罗 汉 湖南省浏阳县人，北京法文专修科。
- 马元材 湖南省新化县人，北京大学文学院一年级。

以上诸人大部分是五四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有的还是行动小组的成员。

曦园同学提倡泛劳动主义，他们泛观中外古今，认为中国古代哲人多从事劳动，如：舜耕历山，陶于河滨，渔于雷泽；传说版筑；胶鬲渔盐；百里奚贩牛；卜式牧羊。至于西方人杰如：哥伦布、瓦特，

大都为水手与工人。故特别强调学习应躬行实践，不宜徒托空谈。

基于上述理由，我们在曦园订有公约，规定成员务必亲身参加园内劳动，如值班、烧饭、做菜、洗衣、挑水、扫地等，事必躬亲，一律不得雇用仆役。食堂伙食多按本人经济能力负担用费，或多或少，自愿决定，共度互助互济的生活。成员衣食住行等一切，均力求简单朴素，并不得闲逛荒嬉，出入娱乐场所、酒楼戏院等。严格实行“三不”，即：不做官、不纳妾、不狎妓。成员们厉行新风尚，提倡发扬互相批评精神，彼此互为诤友！我们并提出，要以新道德代替奴役道德，同时提倡青年采取行动，调查、访问北方地区工矿、农村与城市贫民的生活，寻求解决社会问题之方案。坐言起行，奋发有为。

在曦园，每个成员都积极参加学术活动。

学术活动划分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两大范畴。订定必需阅览的图书目录，由各人认定专题研究，坚持自学。在这方面，我保存有部分学习笔记，主要内容于后，可能有助于了解当时一些青年的学习情况。

在自然科学方面，主要要求认识当代自然科学的成就，远自银河系与太阳系诸天体运动情况，近及地球史发展过程，并进而要求阐明运动与时间及空间的关系。此外，关于物质的转化，生命的成因与毁灭，亦为大家所共同关注之问题。关于天体发生与发展问题，除钻研哥白尼、伽里略、开普勒的著作外，还参阅了康德诸人的著作。

康德著的《宇宙发展史概论》认为，宇宙在洪荒时代，是以气体状态的星云团开始旋转运动的，一切天体均系通过星云旋转运动而凝聚结成。宇宙诸星体经过亿万斯年，仍然走向由成而毁的过程，最后消失在太空之中。星云学说所阐明的天体运动正与中国庄周的“方成方毁”之说吻合。同时并参看康德著的《普通自然史与天体理论》（1755年出版）。

在地球成因方面，则研读德国地质学家加贺孚（Karl Hoff）所著《地壳自然变迁史》（1834年出版），及其他有关地质学著作。

在生物学方面，主要集中阅览英国达尔文著的《物种起源》（1859年出版）、德国赫克尔著的《宇宙之谜》（Emst Haeckel, Die Weltraetsel）（当时尚无中译本）。

在解剖学与生理学方面，需要攻读希腊语文，以求直接阅读亚里士多德、盖伦（希腊医学家）的著作。同时，更应看乌伦甫特（德国细菌学家）等人的著作。

特别提出研究生物学与生理学。生物学注重进化论（包括物种发生与胚胎学发展史）及生物组织与解剖学；生理学包含动物与植物的功能。前者指动物感官及运动学，后者指营养，新陈代谢与生殖遗传

等。

在生理学方面，则读英国威廉·哈微（William Harvey 1578 - 1657）的著作。哈微发现血液循环系统，尝云：“一切生命由于卵。”

通过解剖学与生理学进一步研究人类学，从而对人类躯体构造的规律性有所认识。在人猿进化过程方面参考的专著主要为：

法国动物学家戈甫洛（Geoffroy de Sant-Hilaire 1772 - 1884）的一系列著作。他长期实地研究世界各地栖息的猿猴，掌握了大量资料，因而断定人类是从东南亚一种已绝种的狭鼻猿猴进化而来。这类著作可谓“益人神智”！

以上是属于自然科学方面的学习情况，在此以前我们头脑中充满许多杂乱无章的“天问”式的问题，如月球是卫星中的大观园，有广大的艺术宫殿等等。道听途说，十分茫然。

至此，对于自然界现象，有了科学的、比较明确的认识，知道人类生命起源于象蛋白质、氨基酸一类物质；细胞分裂、胚胎发育是生命发展的物质过程，不是什么“生死轮回”之说。“死”与“生”是一对相对的概念，而死不是生的继续，所以二者又是绝对概念。这都是当时在短期中学习自然科学书籍的心得。

在人文科学方面，当时要求精读兼选译下列诸种世界名著：

1. Plato, Republik (柏拉图：《共和国》)
2. Tomas Moor, Utopia (1) (托马斯谟尔：《乌托邦》)
3. Saint Simon, Idel Sosity (圣西门：《空想社会主义》)
4. Montesquier, Vom Geist der Gesetz (孟德斯鸠：《法意》)
5. Rousaw, Emil (卢梭：《埃米尔》)
6. Fourier, Phanlang (傅立叶：《方兰》)
7. Robert Owen, New Lanark (欧文：《新协和村》)
8. Adam Smith, Wealth (亚当·斯密：《原富》)
9. Karl Marx, Das Kapital (马克思：《资本论》)
10. Hegel, Philosophy (黑格尔：《哲学》)
11. Nitze, Ueber-Menschen (尼采：《超人哲学》)

当时，文科同学大都在北大哲学系听讲，所以在哲学方面富有研究兴趣。据一般见解：“一元论是统一的世界观，即物质与精神世界的统一；二元论是物质与精神世界彼此分离、互不相涉。”在研习哲学过程中，我们主张一元论及其相应的认识论，同时反对形而上学（玄学）。理解到所谓美育，是“真善美”的一种圆满的哲学信念。

对无机世界与有机世界，应作融会贯通的解释。对于时空问题的理解：“空间为外界的直观形式，时间为内在的直观形式”（康德语）。

这种哲学思想表现在文学方面。我们认为歌德在其著作《浮士德》、

《普罗米修斯》、《诗与真实》等诗篇中，阐扬一元哲学达到了完美的境地。

怎样探讨真理、追求真理，体现在认识的实践过程中。认识真理方法分别为二：一元论者主张认识是一种自然过程而非奇迹，认识是一种生理现象，主要源于大脑皮质，即思维器官；一切认识均非先天存在，而是后天由于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如历史经验）所形成的。二元论者主张认识是一种超自然过程，它是一种先验过程而与实体定律无涉。下面是历史观的笔记：

关于历史观，大字长宙，横尽虚空，竖尽往劫，不可纪极！就人类历史言，自广义言历史时间非常短促。据推算，世界史在其全一亿年中（假定最小数字）相当于一天二十四小时中的五秒钟；至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则更是白驹过隙，不足以喻其短促。

人类发生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与一般生物界进化史并行不悖。如所周知，物种起源的主要论旨，是说一切物种由于通过遗传而继续生存；由于适应环境而发生变异，物竞天择，百世难改其度。人类社会制度也应该是如此，不断传递与不断改变，适者生存，违者止息。绝少数人主观愿望所能更改。

中国历史见于文字记载已历四千余年，历代鼎革形式不一而足：或禅让篡弑（尧舜禹的传说）；或征诛相伐，其间统一与分裂交互发生，战争不息。要而言之，长期以奴役制度（农奴与工奴）为主，以贵役贱，以富役贫，产生等级制度与门阀思想，可谓万变不离其宗。与奴役制度平行，势所必至者，乃发生反抗运动，民众运动起于不平。如火炎上，如水决堤，历代鼎革，遂不可避免，无论任何强力与压制，绝难制止，于是乃有改朝换代之事，循环不止！

中国数千年“相砍”的历史，形成一种反动的旧史观，旧史观乃由皇权神圣，万世一系，“受命于天，奉天承运”，神器至上等正统观念所构成。所谓正统与儒家的宗法思想，同理学的道统观念一脉相通。它把纲常名教、忠君守节等奴隶思想强加于人，根深蒂固，遂成痼习。所以旧史学阿谀专制，崇拜偶像，以此相尚，人民违之者则遭受迫害，诬为“叛逆”，称为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

自两汉以来，历代史官均祖述班马，奉为主臬，视同金科玉律。翻开二十四史所歌颂咏叹者均属帝王将相，至于后妃宫妾，外戚宦官，官僚地主，富商巨贾，以及食客、鹰犬之徒，对于统治阶级及其附庸厮养不惜大书特书，津津乐道，连篇累牍，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如此史书，实属玷辱人类尊严，无以复加。

按照上述论证，可知吾人对于“圣贤经传”必需从其时代与地域加以分析和批评，都应本新史学精神去观察理解和估价。

因此，如建立新史观，首先在于破除中国二十四史的陈规旧套，肃清历代御用史官之一切陈词滥调。与此同时，又必需建立新的历史观点，也就是说建立以人民群众为历史中心的观点，遵照新史观重写当代历史、批判古代历史，使历史还其本来面目。按照新史观写述历史，具体要求有以下诸事：

1. 废除两千年来一脉相承的历史正统论：成王败寇；
2. 泯灭过去正史与野史的分界；
3. 是非善恶一本于群体的至公大正的精神；
4. 历史题材主要内容着重治与被治、贵与贱、富与贫、诸阶层间的奴役关系；
5. 记载以人民的创造进化为中心，强调国民经济、技艺、创造与发明。

曦园同人为集思广益起见，还共同商订了一个读书计划，将世界学术名著逐一加以浏览；同时又由于个人研究兴趣有所互异与外文阅读能力的差别，各成员又自订读书计划与研究专题，二者互为补充，有相得益彰之效。

曦园同人鉴于当代欧美出版之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书刊典籍虽浩繁，但其中译成中文者为数有限。于是同学们加强外语学习，并着手从事原本翻译工作。我当时选定康德哲学与西方宗教问题等为定期目标。康德为近代世界著名学者，学问道德素为西方所崇仰。康德于一八七四年十一月受到东普鲁士国王手谕谴责。其一生言行触犯时讳，尤为可同情。当时北大图书馆馆藏德文书籍丰富，阅览方便。浏览所及，见到康德著作有《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逻辑学》，均属第一流名著。为更进一步探索康德学术思想，我和北大同学商承祖共同商议着手从事翻译康德几种主要著作，拟从译述过程中透彻了解康德全部思想体系。我们入手的方法是先阅读与译述康德传记，然后译述其他主要著作。关于康德生平原著，德国出版界流行极广，堪称浩繁，其中富尔伦德（K. Vorländer）所著实为当代善本。译写过程遵循“信、达、雅”三原则进行。首先二人各自阅读原著，每日十页为度；其次交换阅读初译稿，遇有疑义共同提出，互相研究讨论，务求不失原意。待双方大致取得一致，然后作为改正稿。第二阶段工作经过时间较长，两人反复商讨，期于至当，无误为止。最后交由我执笔整理全稿，修饰润色，字斟句酌。前后费时一个多学期，全书方告完成，后由北大校长出函介绍，委托上海中华书局哲学丛书委员会排印出版。这部《康德传》自一九二二年二月初起，连续重版

¹ 此处，作者补有“[注]详情参考《康德生平》‘序言’，198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字。—补注

多次，为当时国内《康德传》中文本唯一译著。

康德著书，哲理幽奥，文笔高深，素称难解。其中有些语句虽心知其意，却极难表达。因此我们在译述时往往遇到困难。记得英马奴埃·康德曾有下列名句：“有两种事物充满心灵中，如果持续的去思索便觉得不断地惊异，这就是在我头上星辰密布的天空和内心的道德规律。”（引自《康德传》末章语）上述简短格言与警句原意颇不易表达，我们二人斟酌损益，易稿数次，经时既久，始获定稿，举此为例，可见一斑！

继《康德传》出版后，我曾选译赫克尔《宇宙之谜》（Haekel: Welt Ratel），同时又选译 Goete Faust 与 Storm: Immsee 稿存篋中，因人事殷繁，均未及整理出版。

我与商承祖，共同从事译著工作，前后经历数载。承祖字章孙，原系北方人，其父宦游广州，故寄籍番禺，但不谙粤语。其父商衍縻为清朝探花，曾出使德国。章孙幼年随父母出国，就读于柏林大学，辛亥回国，后转学北京大学德文系。他在北大毕业后，赴德国汉堡大学担任汉文教授，前后三年，回国后任南京大学教授兼德语教研室主任，译著德国文学书籍多种。

曦园生活于一九二〇年七月结束，曦园存在时间约一年左右。虽然时间短促，但对于我个人思想洗濯，生活磨炼，却有不少收获，如建立新史学，否定宗教，对新型革命思想的酝酿，颇有影响。

在曦园结束后，我迁入北大西斋居住，转入新的学习与实践。之后，我们的生活逐渐从纯书斋转入到产业工人群众中去，即深入中国工农兵群众而开展新的革命活动，前后达十五年之久。¹

¹ 此页末，作者补有“译学会议”“亢斋八册书补”字。— 补注

六、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五四”运动大大地触动了学术界、思想界。“五四”运动的结束，意味着轰轰烈烈的革命告一段落，大家也想进一步研究学问。于是，以“五四”运动中的核心小组部分成员为基础，成立了曦园这一生活团体，大家在科学领域中广采博收，其中一些人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又不满足于原来过于广博的研讨方式，于是我们一些人开始酝酿新的组织形式，我们直接取名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一些更为志同道合，倾心十月革命道路的人的结合。酝酿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促成了曦园的解体。当然曦园的解散，还由于一些高年级同学已经毕业离校等其他因素。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始是一种秘密团体，因为当时社会上嫉视马克思主义，认为它主张“过激”，形同“洪水猛兽”。在我们对此还未深入研究时，为了不致引来不必要的干扰和非议，我们暂时保持秘密状态，更有利于会员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文献的研究。当然这时的组织形式仍是比较松散的，除了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阅读和译述外。还从事一些工人运动的实践。这个研究会的会员到一九二一年夏，发展为十九人，其中一些核心会员已成为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成员。学会设有书记二人，由王有德和我担任，我兼负学会对外联络责任。

有一次，研究会的成员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开会讨论会务，不少人感到研究会长期处于秘密组织状态，不能扩大影响，我们不能以学院式的研究来对待马克思主义，而应作为一种终身的事业，这就更感人力物力的不足。持这种意见的会员，其中有一些已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了，而且已经从事工人运动实践很久了。但也有人担心，若要公开，会碰到一些问题，会受到一些阻力。经过反复商讨，最后大家决定公开，好在社会上争取合法地位，至少要在北大取得合法地位。只

有公开，工作才能开展。为了减少阻力，我们进行了多方面的工作。校长办公室的秘书同我们很接近。还有《北大日刊》的一位编辑陈政，北大哲学系，浙江绍兴人，他是蔡元培先生很信任的人，也表示同情我们。可以通过他们向校长办公室做工作，争取对我们的支持。蔡元培周围有些守旧的顽固派，他们当然会持反对态度，但蔡元培本人对学校新生力量有相当认识，做事颇有勇气。为争取蔡先生的支持，我们预先做了一些工作。蔡元培先生曾留学德国，中年以后还学外语，很好学。有一次他演讲，内容是批评宗教思想，主张以美育代替宗教。我们去给他做记录。他讲演的内容在理论上颇为深奥，我们事先预习了一些参考书，所以记录做得深入浅出，平易易懂。送给他看时，他认为表达了他的本来意思，便对人讲：“能记录到这种程度就算不错了！”因此，他对我们的印象很好。此后，我们就不断同他接触，希望得到他的赞助。

学会最后决定先在《北大日刊》上登一个启事，把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牌子打出去。记得启事的草稿曾几经修改，由我定稿后，大家推我和另一同学去找蔡元培先生，请他同意将启事登在《北大日刊》上。我向蔡先生陈词略云：“中国二千年来学术思想界先后受儒、佛思想的影响甚大，时至今日，儒、佛思想已不能范围人心，行见新的思潮必将起而代之。”蔡先生颌首，我继续说：“卡尔·马克思的学说在本质上运用，均有超越前人之处，我校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是试图对于革新思想界，做些促进工作。”我强调：“凡事‘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马克思学说今后对中国人行将发生不可估计和极深远的影响！”蔡先生详细阅看了启事和发起人的名单，终于欣然同意，我们兴辞而出，同学们闻讯也喜形于色。下面即是登在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的《北大日刊》上的启事原文：

北京大学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

马克思学说在近代学术思想界底价值，用不着这里多说了。但是我们愿意研究他的同志，现在大家都觉得有两层缺憾：（一）关于这类著作博大渊深，便是他们德意志人，对此尚且有“皓首穷经”的感想。何况我们研究的时候，更加上一重或二重文字上的障碍，不消说，单独研究是件比较不容易完成的事业了。（二）搜集此项书籍，也是我们研究上的重要先务。但是现在图书馆简单的设备，实不能应我们的要求。个人藏书，因经济的限制，也是一样的贫乏。那么，关于书籍一项，也是个人没有解决的问题。

我们根据这两个要求，所以各人都觉得应有一个分工互助的共学组织，祛除事实上的困难。上年三月间便发起了这一个研究会。现在我们有同志

人了。筹集了一百二十元的购书费，至少要购备《马克思全集》英、德、法三种文字的各一份。各书现已陆续寄到，并且马上就要找定一个事务所，可以供藏书、阅览、开会、讨论之用。我们的意思在凭着这个单纯的组织，渐次完成我们理想中应有的希望。

现在谨致意校内外的同志们，盼望你们热心的赞助，并欢迎你们加入共同研究。今将我们暂拟的几行规约写在下面：

一、本会叫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

二、对于马克思派学说研究有兴味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都可以做本会底会员。入会手续，由会员介绍或自己请愿，但须经会中认可。

三、研究的方法分四项：

- 1、搜集马氏学说底德、英、法、日、中文各种图书；
- 2、讨论会；
- 3、讲演会；
- 4、编译刊印《马克思全集》和其他有关的论文。

四、本会设书记二人，担任购置、管理和分配书籍事务。

五、会员有分担购置书籍费的义务。

六、本会书籍，会员得自由借阅，但须限期缴还。如会外人想借阅时，须经本会特别许可，并交纳保证金。

通讯处：（一）北京大学第一院王有德君

（二）北京大学西斋罗章龙君

发起人 高崇焕 王有德 邓中夏 罗章龙 吴汝铭
黄绍谷 王复生 黄日葵 李 骏 杨人杞
李梅羹 吴容沧 刘仁静 范鸿劼 宋天放
高尚德 何孟雄 朱务善 范齐韩

启事刊出后，报名者十分踊跃，同学辗转相嘱，国立八校同学亦争相报名，外地也有来信要求入会者。有鉴于此，我们又在《北大日刊》上发表启事云：不论何人，凡愿加入本会者，都可以接洽，外地可以通信联系。并增设李骏处为一新联络地点。

启事刊出后也引来一些非议，冷嘲热讽不乏其人，如某经学教授看后，对启事中的一句话，“皓首穷经”的典故，很不以为然。该教授在课堂上讥讽道：“儒家群经汗牛充栋，浩如烟海，马克思何许人？他写过几篇文章，值得‘皓首穷经’吗？”宋天放即席回答：“儒家十三经中孔子亲自写作的如《易经文言系辞》、《春秋》等，为数本来不多，这是人所共晓的事。马克思所著的《资本论》卷帙浩繁，博大精深，方之孔丘论著，有过之无不及，难道一般人都通晓吗？”某教授闻后，自觉失言，默然无以应。

蔡先生左右的人很有谋略，很能办事，但颇为保守。我们找蔡先生刊登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这件事，就没让他们知道。等到《北大日刊》将启事登出来以后，他们说：“今后学校不得太平了。”

经月余，会员已增至四、五十人，学会准备借北大会议厅开成立大会，蔡先生也颌首许诺，还应我们的邀请，参加了成立大会，并在会上讲了话。会后，我们还共同照了像。我继任正式成立后的第一任书记。学会成立后，我又去找《北大日刊》的编辑，让他替学会致意校长，提出找一所房子作图书室和办公地址，希望学校对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与其他学术团体一视同仁。该编辑应允后，先找到当时的总务长，试探性地了解一下房子问题，总务长表示犹豫说，如果此端一开，学校以后将穷于应付了。言外之意，即使有房子，也不愿拨给。干事会商量结果，决定还是由我出面去找校长本人交涉。我以研究会书记的名义去会见蔡先生，此事总务长事先已给蔡讲过了，蔡心里是明白的。一见面他就对我讲，你们的房子可请蒋总务长解决，与学校其他学会同等待遇。结果给了两间颇宽大的房子。房子应有设备齐全，火炉、用具都有，还派有工友值勤。事后，日刊编辑对我讲，这次你们碰上好运气了。蔡先生左右有人很不赞成此举，他们对学会是心怀敌意的，他们认为答应给房子事小，从此，北京大学将不得安宁了。但蔡告他们：“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正因为要学校安宁，所以才要安置他们哩！”翌日，学会即搬进新址。从此以后，北京大学师生生活中政治风气和精神面貌渐渐改观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蔡元培先生确实是一个很有胆识、很有远见的教育家。

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公开征求会员时只有十九人，到年底开成立大会时，已有五十余人。

一九二二年初，我因忙于劳动组合书记部事，而辞去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具体事务，经过新会章的制定和改选，成立了黄绍谷、范鸿劼和李骏等四人的新干事会。

与此同时，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基础，先后成立了北京大学党支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成员中有少数北大印刷厂的工人，我兼任党支部书记，黄绍谷任团支部书记。以后，北京八校也逐渐建立了共产党和共青团的支部。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人名录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最初发起的十九人，绝大多数是北大学生，李守常先生是赞助的，他没有在启事上签名，但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

当然会员。

发起人名单没有一定的顺序，按签名先后排列，现将十九个发起人当时的情况略作介绍：¹

高崇焕：河北人，北大法学院学生，在“五四”运动中是活动分子，北大学生会的负责人之一。

王有德：云南少数民族学生，外貌有点象广西人（或是彝族）。他原来在昆明进过军事学校，毕业后当了个下级军官。当时他看了些进步杂志，不满现实，辞掉了军职来到北京念书。他绕道越南坐海船到上海再至北京，沿途千辛万苦，用完了所带的全部旅费。到北京后，他凭学识考取北大，但无钱入学，人生地疏。既没有熟人，语言也不通，处境十分困难。一天，蔡元培坐车外出开会，王在路上拦车。蔡初很惊愕，继见他模样很朴实，便问他有什么事？王说：“我是北大新生，想跟校长说几句话没有机会。”蔡答：“那就另约个时间谈谈。”王有德回去后写了份“万言书”，介绍他自己的经历。蔡见他文采颇佳，很重视，问他有何要求，经王说明后，蔡说：“你到总务处报个名，以后每天上完课后，做一、两小时的工。”王有德想学德文，但没有基础，于是重新学起。王是中年人，诚实能干，我们大家就帮助他的学习和生活。他在工作过程中入了党，在北方来说，他是少数民族地区中第一个党员。后来他搞工运工作，很勇敢，是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得力的工作者，起过很大的作用。

邓中夏：北大中文系学生。他父亲在日本留学回国后考取了法官，在司法部工作。当时我们很需要这方面的人，他对我们的工作有帮助。邓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早期成员之一，任平民教育讲演团主任。

吴汝铭：湖南长沙人，法学院学生，是第一个报名志愿到长辛店担任劳动补习学校教员的。这个工作很艰苦，并无薪资，他一直任劳任怨，坚持不懈。吴后来入了党，任长辛店支部的第一任书记，兼京汉铁路总工会秘书。

黄绍谷：湖南岳阳人，当年是共青团北大支部负责人，是北大最早的团支部书记，后来入党。

王复生：云南人，学法文，是研究会法文组的组长。他在家乡时当过小学教员、校长，作过一段工作，后来到北大来念书。他曾在河内读书，所以法文学得很好，是北大法文班会的负责人，其弟儒廷。王氏兄弟号称“夜郎三王”²。

黄日葵：广西人，是我在上海遇见的日本回国学生之一，是研究会日文组的组长。他在日本学了三年、四年，文章写得很好，后来入了

¹ 此段侧，作者补有“简介重写”字。——补注

² 夜郎即在今云南省地区，三王系指王复生、王德三和王有德。

党，做了不少工作。

李骏：湖北人，英文系学生，英文很好，后来也是党员，参加翻译工作。

杨人杞：即杨东莼，湖南人，任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教员。

李梅羹：北大德文班学生，原来是学医的，以医专学生的身份加入研究会，以后转入北大读书。后来到苏联，在第三国际东方大学当翻译，是党员。

吴容沧：杭州人，坚持在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当教员，参加了许多次斗争，既勇敢，又机智，能吃苦耐劳，是党员。

刘仁静：湖北应城人，北大英文系学生，是党员，后任《先驱》主编。

范鸿劫：湖北鄂城人，北大英文班高才生，英文系学生会领导人之一。

宋天放：湖南浏阳人，德文班班会的负责人之一，为人忠诚，做了不少工作，是党员。

高尚德（君宇）：山西榆次人，北大英文班学生，原系山西太原学生联合会主席，文学院学生，是最早加入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成员，后来参加了“二七”大罢工。

何孟雄：湖南江华人，起初是北京工读互助团领导人之一，工读互助团有几十个人，这个团体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以后何到了北大，入了党。

朱务善：湖南澧县人，北大学生，平民教育讲演团团员。

范齐韩：北大法律系学生，湖南人。

上述十八人，加上我十九人，其中党、团员十六人。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先后发展的会员数字，说法不一。据我所知，曾前后统计过几次。第三次统计时有会员一百一十人；一九二二年第四次统计时有一百五十人；一九二三年“二七”前统计时有二百五十至三百人。以后我离开北京，可能又有些变化。解放后我找到一份记录有一百五十一人的名单。沧海遗珠，上述名单也是不完全的。兹将名单附后。

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及部分会员名录¹：

罗章龙（书记）	湖南浏阳	北京大学文学院
王有德（干事）	云南昆明	北大文学院
高崇焕	河北	北大法学院

¹ 此处，作者补有“表改为长栏 补齐简历”字。— 补注

邓中夏	湖南宜章	北大文学院
吴汝铭	湖南长沙	北大文学院
黄绍谷（干事）	湖南岳阳	北大文学院
王复生	云南昆明	北大法文系
黄日葵	广西桂林	北大中文系
李 骏（干事）	湖北	北大英文系
杨人杞	湖北	北大文学院
李梅羹	湖南浏阳	北大德文系
吴容沧	杭州	北大
刘仁静	湖北应城	北大英文系
范鸿劫（干事）	湖北	北大英文系
宋天放	湖南浏阳	北大德文系
高尚德（君宇）	山西	北大英文系
何孟雄	湖南江华	工读互助团
朱务善	湖南常德	北大文学院
范齐韩	湖南宜章	北大文学院
李子洲	陕西榆林	北大文学院
李大钊	河北乐亭	北京大学
安体诚	河北丰润	天津政法学校
吴先瑞	湖南平乡	长沙一中
张人凤	河北	平民学校
陈公博	广东	北大文学院
彭礼和	湖南长沙	长沙联中
王 铮	台湾基隆	北大文学院
刘 恕	湖南长沙	清华大学
李宝成	济南	津浦铁路工人
梁 成	广东江门	达士通讯社
梁鹏万	河北唐山	京奉铁路工人
邓 培	广东香山	京奉铁路工人
史文彬	山东济南	京汉铁路工人
张泰清	河北张家口	京绥铁路工人
贺其颖	山西离石	太原中学
王仲一	山西太原	太原中学
许兴凯	河北大兴	高师
贺 闾	湖南邵阳	高师
蔡 庸	山东	北洋大学
石评梅（女）	山西	女高师

缪伯英(女) 湖南长沙 女高师
 夏秀峰 湖南长沙 北京高工
 萧镇湘 湖南醴陵 北京高工
 舒大楨(舒治) 湖南长沙 北大中文系
 李鸿斌 河北滦州 唐山交通大学
 许孝炎 江苏 唐山交通大学
 张剑鸣 河南 唐山交通大学
 许启元 江苏 唐山交通大学
 戴培元 河北任邱 河北大学
 任开国 东北 北京大学
 郝英(赤耳) 安徽阜阳 北大印厂
 王儒廷 云南昭通 北大法文系
 游泳(天祥) 福建 唐山交通大学
 韩麟符 天津 南开中学
 安幸生 河北沧州 天津中学
 王瑞俊 山东莒县 济南中学
 于方舟 河北静海 天津学联会
 郭增昌 山西太原 保定军校
 杨明斋 山东济南 教员
 王忠秀 河南登封 北大文学院
 王净尘(敬臣) 河北保定 北大文学院
 辛璞田 河北天津 天津学联
 辛克让 河北正定 石家庄中学
 陈为人 湖南酃县 衡阳师范
 姚佐唐 安徽桐城 津浦工人
 王璧 安徽安庆 徐州铁路工人
 许鸿儒 江苏滁州 津浦铁路工人
 葛树贵 河北良乡 长辛店铁路工人
 林育南 湖北 武昌中学
 施伯皋(洋) 湖北竹山 湖北法专
 胡信之 山东 青岛日报
 张隐韬 河北元氏 军官学校
 刘少游 云南昆明 北大文学院
 张兆丰 河北保定 河北讲武堂
 戴朝震 湖南浏阳 北大法科
 侯绍裘 江苏淞江 松江中学
 恽代英 浙江湖州 武昌师范

白秀卿 河南洛阳 小学教师
 魏野畴 陕西关中 北京高师
 张昆弟 湖南益阳 第一师范
 郭寿生 福建 烟台海军学校
 李之龙 湖北 烟台海军学校
 李求实 湖北汉口 武昌外语学校
 许白昊 湖北汉阳 武昌工人夜校
 谭平山 广东 北京大学文学院
 茅延贞 安徽安庆 保定军官学校
 王荷波 福建闽侯 浦镇铁路工人
 马尚德 河南确山 河南开封师范
 王克新 河南信阳 信阳中学
 王新元 湖南长沙 上海交通大学
 李树彝 湖南郴州 北大文学院
 张树荣 湖南浏阳 北京法文专校
 罗汉 湖南浏阳 北京法文专校
 陈延年 安徽怀宁 上海震旦大学
 柯庆施 安徽歙县 芜湖中学
 刘子倩 四川简阳 川东师范
 李希逸 河北静海 北大文学院
 董鸿猷 河北唐山 开滦煤矿
 李渤海 山东 北大文学院
 罗运麟 江西萍乡 北大理科
 冯品毅 河南 北京高师
 谢连清 台湾 厦门集美
 高玉涵 安徽合肥 安徽中学教员
 王右木 四川重庆 东京早大
 李味农 安徽巢湖 安庆中学
 赵醒依 江西南昌 九江店员
 张春木(太雷) 江苏常州 南开中学
 谢怀龙(女) 浙江杭州 启秀女中
 刘天章 陕西三原 三原中学
 沈干城 浙江萧山 沪杭铁路工人
 谭因甫(女) 湖南长沙 北大中文系
 杨善南 湖南长沙 北京法政专校
 陶永立 河北唐县 保定育德中学
 高仁山 浙江 北大教授

江浩 河北天津 众议院议员
 李季达 四川 法文专科学校
 孙云鹏 河北天津 正太铁路工人
 孙津川 江苏江宁 沪宁铁路工人
 李青山 山东潍县 胶济铁路工人
 阮永钊 安徽芜湖 北大英文系
 奚贞(女) 上海浦东 北大英文系
 郝克勤 河北沧县 北大印刷厂
 王力 奉天营口 大连报记者
 徐名鸿 广东大埔 北京高师
 凌芝藩 湖南湘阴 京汉郑州技术员
 刘志丹 陕西 榆林中学
 陈毅(仲弘) 四川 省中法大学
 王人旋 湖南浏阳 湖南第一联中
 匡务逊 湖南邵阳 北京高师
 吴明 湖南 法文专修班
 高语罕 安徽 芜湖中学教员
 陈启修 四川 北大教授
 李季 湖南平江 北大文学院
 刘孝恕 湖南浏阳 清华大学、麻省理工学院
 耿白钊(丹) 湖北 武昌文华留英
 邵振青(飘萍) 江苏 《京报》主编
 贺恕 湖南衡阳 第三师范
 朱圣之(女) 湖南 衡阳师范
 田波扬 湖南浏阳 民国大学
 潘心源 湖南浏阳 民国大学
 廖汉星 湖南衡阳 衡阳三师
 彭泽湘 湖南岳阳
 孙光余(琅工) 湖南湘潭 北高师
 李书渠(须除,伯刚) 武昌 武昌外语
 杨锺健 陕西 北大理科
 陈兴霸 湖南长沙 北大法科
 周长宪 湖南长沙 北大法科
 鲁士毅 浙江 北大理科
 王力心 河南信阳 信阳师范
 赵子健 湖北 扶轮学校教员
 田奇瑞 湖南 北大理科

唐宏经 大连 铁路工人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那时我们已注意在工人中发展会员,在上述一百多人的名单中,就有二十五人是工人。如李宝成,津浦路工人;梁鹏万,京奉路工人,邓培,京奉路工人;史文彬,京汉路工人;张太清,京绥路工人;姚佐唐,津浦路工人;王璧,徐州铁路工人;许鸿儒,津浦路工人;葛树贵,长辛店工人;王荷波,浦镇工人;沈干城,沪杭路工人;孙云鹏,正太路工人;孙津川,沪宁路工人;李青山,胶济路工人;唐宏经,大连铁路工人等。他们主要是长辛店、唐山、石家庄、郑州等大厂的工人。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正式成立后,我们一面公开接纳会员,不断扩大这块阵地,一面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研究活动。一九二二年二月二日,我们发表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第三个通告。通告这样写道:

会员公鉴:

本会正式成立,已经一月有余。其间经过新旧两个年关,耽误日子不少。故仅仅只开过两次讨论会,一次纪念会。起初会员虽不足二十人,现在已增至六十三人了。

本会成立之时,都讲实用,不事虚文。所以简章未定,至今尚付阙如。惟经一月余试验的结果,每次开会,例必有新会员数人加入。因此书记又不能不每次将本会议决几条实用的办法,当众重述一次。书记固不胜其烦,旧会员亦甚觉其讨厌。为免除这个困难起见,特详细通告于此,务希查照。

一、研究方法

(1) 讨论会——每星期六晚七时开一次(准时开会,过时不候),先由会员一人阐释该题之内容及其要点,然后付诸讨论。一次讨论不完,下次续之。

(2) 讲演会——每月终开一次。暂时敦请名人学者担任讲演员,由书记负责接洽。俟本会研究确有成绩后,则完全自行担任。

(3) 特别研究——完全由会员自动的自由组合,现已有了三个:

A. 劳动运动研究 由几个感觉此项知识之需要的会员组成的。每星期三晚集会一次。

B. 《共产党宣言》研究 由几个感觉西文程度不佳的会员组成的,采此书为教本。每星期一、四、五晚请会员一人教授之。

C. 远东问题研究 材料分三种搜集, 英文的、日文的、中文的。已在酝酿中, 尚未开会。

以上三个小组会, 任何会员皆可随时加入。

以后拟实行固定的分组研究如下:

- 第一组 唯物史观
- 第二组 阶级斗争
- 第三组 剩余价值
- 第四组 无产阶级专政及马克思预定共产主义完成的三个时期
- 第五组 社会主义史
- 第六组 晚近各种社会主义之比较及其批评
- 第七组 经济史及经济学史
- 第八组 俄国革命及其建设
- 第九组 布尔什维克党与第三国际共产党之研究
- 第十组 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弱小民族掠夺之实况——特别注意于中国

但会员研究, 选一组选三四组或全选皆可, 只要力量来得及。请即来函认定, 以便刻期着手实行, 至要至要!

我们的研究活动得到了李守常先生以及北大一些进步教授、讲师的大力支持。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九日下午, 守常先生在北大第二院大礼堂给会员们作了马克思经济学说的讲演。这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召开的第一次公开讲演会, 参加的人除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外, 还有许多尚未入会的人。他们都为守常先生的精彩讲演所深深吸引, 反响很强烈。此后, 我们又多次组织这样的讲演会、纪念会, 吸引更多的人,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随之日渐发展、扩大起来。

学会的图书室, 收藏中、外各种图书、报章, 并于每日下午四时至八时开放(星期日在上午八时至十二时开放), 供会员借阅。我记得一九二二年二月,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曾出一个通告, 向会员报告此事。经查此报告登在《北大日刊》上原文如下: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四)(一九二二年二月十六日)

本会现已有西文书籍四十余种, 中文书籍二十余种, 兹报于下:

社会主义丛书

Communist Manifesto (Marx and Engels)

1 此处, 作者补有“注北大日刊”字。— 补注

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ce (Engels)
 The Books on socialist Philosophy (Engels)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Marx)
 The Origin of Family (Engels)
 The infantile Sickness of Leftist Communism (Lenin)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Lenin)
 共产党宣言 (马学会德文译书组译, 打字印本)
 阶级斗争 (恽代英译)
 马克思资本论入门 (李汉俊译)
 马克思经济学说 (李达译)
 社会主义史 (李季译)
 社会问题详解 (李季译)

经济丛书

Wage Labour and Capital (Marx)
 工钱、劳动与资本 (袁让译)

历史丛书

Revolution and Counter Revolution (Marx)
 The 18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Marx)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Marx)

俄国问题丛书

劳农会之建设 (列宁著)
 讨论进行计划书 (列宁著)

杂志报章

Soviet Russia (苏维埃俄罗斯)
 Asia (亚细亚)
 Weekly Review of the Far East (米勒评论)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国际共产党)
 大陆报 共产党 新青年 先驱 工人周刊 劳动周刊 济南劳动周刊
 长沙劳工周刊 晨报 民国日报 时事新报 申报 广东群报 时事月
 刊 妇女声

以上各书, 或系会有, 或系私有, 皆有符号, 归众共览。尚有四、五会员出金购买一百四十元之英、德文书籍, 当不久可到, 并告。

当年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所进行的这些工作，是很有意义的，成绩也是不小的。它不仅扩大了我们的视野，丰富了我们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使我们进一步接受了马克思的革命思想，为后来开展革命斗争活动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骨干。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逐步成为党的外围组织，不再是一个学术讨论团体，而是直接参与革命的行动组织了。而当年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绝大多数会员，后来都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全国各地分别担任党、团领导工作或参加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为党的事业做出了他们应有的贡献。学会的活动据说一直延续到一九二六年以后，不过，我早已离开北大，此后就不知其详了。¹

¹ 此页作者补有“译书工作，译学会议”字。——补注

七、北京中共建党小组与社会主义青年团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名称，是后人起的。在过去，对内对外都没有用过这个名字，现在既然用惯了，为了称呼方便起见，我们还沿用这个名称。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范围在北京，北京区委则是稍后的事。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从五四运动以后，一些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学生，自发地组织起来，做些宣传、翻译工作，同时也有过一些行动。后来，组成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些工作，得到李守常先生的支持。我们经常聚集在守常先生的办公室里探讨一些有关理论和实践的问题。在这些谈话中，自然而然地涉及到需要建立一个更为严密的政治组织。我记得守常先生常提到：“我们应该组织起来，要吸收很多人，只有这样才能做一番事业。”许多同学向往俄国十月革命，向往俄共组织，也迫切想建立类似的组织。我们不止一次、也不止一个人，更不止在一个地方酝酿这个问题，但真正组织起小组，还是在 一九二〇年五月，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到北京来，在李大钊办公室召集了几次座谈会之后。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后，苏俄内部许多事情还没有就绪，远东还有白俄捣乱，赤塔政权还未解决，因此中俄关系没有解决，中俄之间尚无来往。

一九一九年三月第三国际成立，中俄也开始有了往来。共产国际是支持远东各国的民族革命运动的，同时俄国革命胜利后，处于帝国主义封锁包围之中，因此他们也需要找同盟军。于一九二〇年五月第三国际的使者维金斯基偕译员杨明斋来到北京。

那时听说维金斯基来北京是经日本到中国的，又有人说他是直接

来中国的。维金斯基来北京之后，首先见到了李大钊。

北京大学经五四运动以后，在国际上有了一些声望，当时欧洲一些国家，渐渐与北大有往来。一是图书的交换，二是北大的同学出国留学，只要由北大出一个证明，证明学习过什么课程，国外大学都承认有效，而其他学校则没有此种地位。

李大钊是北大教授兼图书馆馆长，他在当时写了不少水平很高、语言精彩的文章。《新青年》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数他的最多。他公开赞扬十月革命，是我国最早宣扬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因此，他在那时，就享有很高的名望。维金斯基到北大会见李大钊是很自然的事。

维金斯基访问李大钊也不是盲目而来，而是事先做了些准备工作。首先维金斯基了解到李大钊先生是赞成十月革命的。他同李大钊见面谈了一席话之后，便要求见见参加过“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一些同学。这样李大钊先生就找了几个同学和维金斯基见面。人数不多，其中有我和张国焘、李梅羹、刘仁静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

我们同维金斯基见面的谈话会，是在图书馆举行的。会上，他首先介绍了十月革命。他还带来一些书刊，如《国际》、《震撼世界十日记》等。后者是位美国记者介绍十月革命的英文书。他为了便利不懂俄文的人也能看，所带的书，除俄文版外，还有英文、德文版本。维金斯基在会上还详细介绍了苏俄的各项政策、法令，如土地法令，工业、矿山、银行等收归国有的政策，工厂实行工人监督与管理，苏俄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管理全国经济工作的制度，列宁提出的电气化的宏伟规划等，他还讲到苏俄在十月革命胜利后，面临种种困难，为了解决困难，不得不临时实行军事共产主义、余粮征集制等等。这次谈话内容相当广泛。当时我们很想了解十月革命，了解革命后的俄国，他谈的这些情况，使我们耳目一新，大家非常感兴趣。这就使我们对苏维埃制度从政治、经济、军事到文化都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看到了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轮廓。

维金斯基这个人工作很细致。他来了之后，除了开座谈会，介绍苏俄情况，了解中国情况之外，还找人个别谈话。通过个别谈话，可以了解座谈会上不易得到的情况。他是一个有知识，有工作经验的人，对大家提出的问题，回答得恰如其分。他的英文德文很好，能用英语直接与同学谈话。他对中国的历史，中国的问题颇有研究。关于五四运动，他问得很详细；对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相互勾结的情况看得也清楚；对五四运动，辛亥革命以前我国的历史也很熟。他同李大钊先生谈得很融洽，对李大钊先生评价很高。他在座谈会上曾暗示说，你

们在座的同学参加了五四运动，又在研究马克思学说，你们都是当前中国革命需要的人才。他勉励在座的人，要好好学习，要了解苏俄十月革命，正因如此，中国应有一个象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我们认为他谈的这些话，很符合我们的心愿。我个人体会，通过他的谈话，使我们对十月革命，对苏维埃制度，对世界革命都有信心了。

维金斯基住在东城王府井外国公寓处。进行几次座谈后，又邀约我到他的寓所谈过两次。我们谈话是漫谈性质，主要是了解个人学习、工作情况，涉及面也很广泛。有一次谈话我记得比较清楚。当我坐下之后，他象谈家常一样，问我，“你是哪里人？”我说：“我是湖南人。”他找了张地图看了看，说：“这离北京很远吧！”他还说：“你们同学中间，南方人不少，家离这里都很远。”然后他又问，你们是如何学习的，从前读过一些什么书，现在在读什么书，学校里现在教些什么，学些什么？我就把学习的情况，看过的书刊，一一同他谈了。同时把我们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也跟他说了。我说，现在我们学习的书很少。他就把北大地址、个人名字及通讯处都记下来，并答应回去以后寄些读物来。此外，他还同我谈了一些青年的理想、前途等问题。他还说，俄国在革命以前是非常落后的。维金斯基是学经济统计的，他对苏俄国民经济发展的有关数字记得很清楚，谈话时列出数字说明革命胜利后工农业生产的增长，他说这些成就的取得主要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从这次谈话中，我了解到维金斯基十月革命前在美国学习多年，研究政治经济学，学习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对美国工人运动研究也很全面，后又游学欧洲。维金斯基年纪四十开外，文质彬彬，学者风度，在谈话中，他表示来华前，对中国问题曾作过研究，特别是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他很关心中国革命的发展。从他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确实阅读了不少有关中国问题的书籍。他曾谈到义和团和同盟会主要人物的思想及活动等，又询问五四运动以来北大学生运动的情况，从《新青年》杂志起旁及北大内部教员、学生的思想情况。通过与他谈话，我感到维金斯基是一个学问渊博、思想革命的人。他还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作了详尽介绍。在两人漫谈间，维金斯基强调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他谈到中俄两国的国情，从过去及展望未来，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说帝俄时代俄国经济比西欧落后五十年到一百年，工业生产尤为落后，汽车、拖拉机、飞机、电气设备都不能制造。钢铁工业的产量比美国落后七倍，比德国少三倍，燃料比美国少十七倍，比英国少十倍。外国资本占全俄一半，外资工业占百分之五十以上，外国银行占全俄金融资本三分之一。当前追赶上去的唯一办法，就是采用社会主义革命。俄国十月革命正在开辟一条新的道

路。

他谈话辩才横溢，感情奔放。他的说理内容切实、新颖、动人。他的一席话，使我在政治方面的视野与过去显然不同了。我们憧憬共产主义革命的远景，更是看得真切，一往无前了。

在他离京前，我们召开了一次会，会议地点在北大图书馆办公室。这个会可说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大会，他以第三国际代表身份亲临小组参加会议，是相当肃穆的。他在会上作了讲话，说他的访问是双方共同的需要，说参加座谈会的人都是信仰共产主义的中坚分子，拥护十月革命，积极参加当前革命斗争的先进分子，同意应邀参加座谈会的人是共产党员，并表示要向共产国际汇报。守常在会上简明致词，感谢第三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关怀。还说：我们这些人只是几颗革命种子，以后要好好耕作，把种子栽培起来，将来是一定会有收获。之后，他还赠送了一些书籍刊物作为礼物。他行前与我重谈了一次话，主要是有关双方联系的事。我们后来源源收到从国外寄来的外文书刊。他在北京工作结束后，由守常写信介绍到上海，是作为北京小组写信给上海的。他决定离开北京，转往上海访问，临行时对我说：“我们谈话很有意义，不是‘老生常谈’，不久的将来会有重要结果。”连称“此行成功，后会有期！”握手道别而去。¹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初的成员有：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李梅羹等人。后来加入的有邓中夏、高君宇（即尚德）、范鸿劼、缪伯英、吴汝铭、王仲一、宋天放等。当时我们已明确几点：第一，我们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我们是拥护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三，我们是要搞工人运动的。在这三点上，我们与无政府主义的看法有根本的不同。

当时，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的中坚分子，参加过工人运动的，后来都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以后工人党员渐渐增加了。当时的工作没有严格的分工，主要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大家推守常作为小组领导人，其他人遇到什么工作做什么工作。后来工作渐渐发展，开始有了简单分工。张国焘主持组织、交际；邓中夏主持学生、青年与共青团工作；我负责宣传，主编《工人周刊》，兼管北方工人运动。刘仁静主要搞翻译工作，当时彼此分工界线不明显，可以说是既分工又合作。

北京大学社会主义青年团

¹ 此段末，作者补有“注：老生常谈 Anno is diel”字。——补注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的一件大事，是成立北京大学社会主义青年团。

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仿效苏俄共青团在青年中建立的组织。当时，少共国际有位代表格林（Green）继维金斯基之后来到北京，他原是莫斯科共青团的书记，他的到来使北大社青团和少共国际建立了联系。

青年团员的年龄应比党员小一些，但那时青年团没有年龄限制，因大学毕业一般是二十五、六岁。李大钊和我们都是团员。

北京大学社会主义青年团约在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前后成立。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六日统计团员有四十七人，月底团员增加到五十多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是由共产主义小组决定的。开会地点经常借用二院校长办公室（当时叫会议室）开会。我主持了首次成立大会。会议的议程包括：报告筹备经过和讨论章程，章程是以少共国际转来的青年团章程为蓝本的。最后选举了团的委员会。会议进行得简短顺利，就这样开始了团的工作。大致每隔一月开一次全会。

大约在第三次大会后，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在我们开会时，混进了一个名叫关谦的谍报员，他是北京军阀政府步军统领衙门派来的。并在次日就把会上情况呈报给步军统领王怀庆了。他在北大社青团组织中，活动了很长时间。这是事隔多年之后，从敌伪档案中发现的，倒是十分有趣，给我们保留了当年北大社青团活动的一鳞半爪。尽管关谦不可能悉知当时社青团活动的内幕，但援引他的报告，也可略知当年的情况。

关于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活动情形致王怀庆报告

为报告事：窃三月十六日早，由陈德荣电招，谦于下午二时到北大第二院共产主义青年团会议。谦此为第一次到青年团大会，须有二团员介绍，故谦于一时到陈德荣处，约王伯时同往。适值无政府党陈廷璠、黄兼生、陈友琴、邵光典等在座，讨论将来统一会议之通知书，订期八月十号至二十号在汉口或广东召集，以便合力进行，谦亦签名“伊知”。发起人又议如何联合或攻击陈独秀之方法，因独秀与广东无政府党势同仇敌，每日在广东《群报》（青年团报）与《晨报》（互助团报）两相攻击，然独秀又来函至京，甚为和蔼，联络凌霜、廷璠等人，议决由北京方面去书独秀，劝勿自相伤斗，总以协力推倒现政府为要，如其再事反对，则进为排斥也。因阅广东报论说，遂延至二时四十分，谦方与廷璠、德荣、伯时同到青年团会议。查是日到会者共二十四人，探知其姓名者如罗章龙、李一志、徐六几、张作陶、顾文仪、徐文义、郭文华、宋价、何孟雄及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廷璠、伯时、德荣。由书记报告：俄国少年共产党人格林现年不过二十岁，住天津，时来北京，住灯市口十二号，已来京两星期之久，今来函陈述赴津有事，不克莅会，惟希望我们即日选出赴世界少

年共产党大会代表，此次会期为四月二十五日，会址柏林，总机关或在莫斯科分处，说明川资由伊代垫云云。查期限已近，此次会议最关紧要，将来国际间运动与信用，是吾人必须参加，愿望今日同人，以投票式慎重公推一人为北京代表，随同格林齐往。于是以何孟雄多票当选。随即建议临时设一审查委员会，以五人组织之，专收此次各同志对于赴会之意见书，并审查将来赴会提议各案事。谦于选举时，并未投票，因未知各人之名。遂于事毕由德荣起立介绍，谓谦热心改造之好同志，请众赞成入会后，谦谓连日病魔，今日不克多发言论。后各甚歉！唯声明愿牺牲一切，以追随诸君之骥尾，建设新社会之义务云云。后各人稍有议论，当即散会。预定收齐意见书再作钱行之大会云云。……兹将经过情形呈请

堂宪大人钧鉴

关 谦 谨呈
 中华民国十年三月十七日

从关谦的谍报中，看出这个密探是骗取了个别团员的信任，才混入团内进行活动的。当年团组织的一些重要文件及会议情况都被他窃去了。

在关谦呈王怀庆的报告中，附有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致国际少年共产党大会书一份。其全文如下：

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致国际少年共产党大会书（1921年3月）

诸位同志们：因为交通上的阻碍，竟把远东和社会主义者运动的国际中心隔离，所以我们久想和世界具有革命精神的青年联络，但未能如愿以偿。自从接读国际少年共产党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格林君的信，我们在三月十六日召集了一个特别会议，并决定派代表出席这个会议，但是在中国还没有一个中国青年社会主义者的总会，所以我们的代表只有发言权无表决权。

我们的青年团成立只有四个月，现有团员已过半百之数，值我们相信，我们的团体将来必然发达得很快。

我们的报告将用种种的可能的的方法，送达国际少年共产党的总局或东方局。

国际少年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之主义——万岁！

北京青年团上

三月底，我们召开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大会，商议成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一事。开会的情况也被关谦窃走了。他在四月二日给北洋政府步军统领的报告中说：

为报告事：窃于三月三十日下午一时三十分，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北大第二院开第四次大会。查是日到会者共二十五人，探知其姓名者，有李大钊、罗章龙、张国焘、刘仁静、高尚德、宋价、顾文萃、王伯时、郭[郑]振铎、徐六几、张作陶、陈德荣、李一志、顾文仪、徐文义、郭文华等。首由书记张国焘报告：在三月十六日以前，共计会员四十七人，现又加入八人，共计五十五人。但内中已有出京者七人。这几日极力设法筹经费，今由会员所缴来之款及特别捐等，共得现洋九十六元五角，并陈述料理何孟雄出发种种手续。次由李大钊、顾文萃提议，本团事务日渐纷繁，实际上发达得亦很快，所以应极急进行的手续，势必多起，兹拟设立一个事务所及筹备油印机，使总机关成立，以利办理。随付表决，多数赞成。事务所由调查股极力寻找，而油印机由李大钊、顾文萃担任筹措。惟会计刘仁静发言，谓设立事务所必添设什物，经济上应请各同志设法特别捐助云云。再由团员张君临时动议，将本团旧有之四股制及委员制，改正为执行委员会，设置委员十一人，分书记一人，会计一人，组织三人，教育三人，出版三人，并说明改组之理由：（一）旧有之四部制及委员制，有互无关连之弊。（二）将来本团人数增加，势必不能人人俱负事务上之责任，或因此影响本团精神。若改行执行委员会制，则可以免此二弊，况同志皆系负责者，有事时自可随时分担职务等语。即付讨论，大多数同意，当即投票改选。公推张国焘为书记委员；刘仁静为会计委员，顾文萃、高尚德、祁某为组织委员；宋价、王伯时、某为教育委员；李大钊、郑振铎、某为出版委员。并议决：每星期执行委员会集议一次，大会每月一次。又由陈德荣提议，谓昨接同志李芟来函，谓本团象少爷式的平民集合，试思此语极是，欲救此弊，便须多介绍工人、中学生入团云云。公议赞成。至于如何向全国中学生及工人宣传，请同志发意见书，由大会决择。并公议办理同志赴俄调查及赴俄留学事；筹经费及造预算，事务所问题，因组织改变，须修改章程等事，统归执行委员会斟酌办理后报告大会。议至四时十五分始散。谦连日到无政府党人处，探悉该党近日并无特别议案，但各人拟半月刊出版底稿而已，前日有上海无政府同志张秀书、邹进二人来京，谓由上海方面派赴俄调查，随后一星期内尚有同志二人北上云云。查该二人准于一日晚由京出发。并由陈德荣转来汉口萧俊章来函，报告抵汉后之进行及请助资事，原函抄呈[略]。谦又觅得青年团代表何孟雄带交国际少年共产党书，原函译呈。以上均数日经过情形，合亟报告。按各方面进行，日见紧急，至于如何联络资助等情，以便窥其全豹，而易进行之处；恭请核夺施行。呈请

堂宪大人钧鉴

关 谦 谨呈

四月六日和二十四日，我们又开会研究开展纪念“五一”活动的情况。关谦探知后，也把这两次会议的情况于四月八日和二十五日先

后都给北洋政府步军统领写了报告。他的报告是这样写的：

关于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筹备“五一”活动等事项报告

为报告事：兹探得共产主义青年团于四月六日在北大第一院开执行委员会，所讨论之事有六：（一）筹备五一运动，使群众游行，为劳动大会以作平民自决之始。（二）筹备五一运动时，刊行一、二种小册子，征求团员文稿，以为社会运动之文化品。（三）讨论委托团员分任职务问题。（四）调查北京之平民学校及平民讲演所，并设法使变为社会主义化。（五）印刷及其他工人组织问题，以便鼓吹工党联盟，要挟资本家。（六）讲演会之筹备及如何研究主义等事。……合亟报告。呈请堂宪大人钧鉴

关 谦 谨呈
四月八日

关于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大会情形报告

为报告事：窃于四月二十四日下午二时，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大第二院开第五次大会。查是日出席者十六人：李大钊、王伯时、谌小岑、王永禄、易道尊、王复生、张国焘、高尚德、祁大鹏、宋价、刘仁静、罗章龙，不知姓名三人及谦等。首由书记张国焘报告前三次执行委员会所议决之事：（一）修改章程，请大会通过。（二）“五一”运动已付印一种小册子，定名“五一”，二千本；又一种明信片式之纪念品乙千张，皆于三十日前分散工厂。又一种简明宣言传单，注重工人每日工作八小时，星期日停工，仍支薪金，鼓吹抵抗资本家，要求加薪，于五月一日散发各处。（三）会址因无适宜之处，暂设于平民讲演所内，以便办公。（四）陈述前次国焘与李实赴津，联合该津会，亦拟于五一日发布传单；及到唐山，此处本无青年团，经伊等联络工业学生¹数名，从事组织，并于五一日由京派代表及印刷品助辅进行，谓该处工人俱粤民，较易传播也。（五）宣告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同志来函，拟于五月一日开工团成立大会，是日招集工人演讲游行，请京派多数同志莅会帮助云云。次由会计刘仁静报告：收支数目尚余十七元二角，随即讨论。何孟雄来函，谓在满洲里京、沪、津赴俄同志十三人被拘，转解于黑龙江陆军监狱，已十余日，饱受痛苦，因伊有格林介绍赴莫斯科书，故只好承认赴俄考查教育，请设法向学务局或本校去电证明释放。当由书记发言：幸未被搜出本团证书及致大会书，“因该件缝在棉衣内，大半由格林带去”，尚易营救，此次是同人公推他去，现在被捕，理应尽力请公决办法。即由李大钊云：接各处来函，皆说上海代表自认过激，以致招祸，而学务局及本校事前未发证书、护照，此种彩色断然不允援救，且时隔多日，恐更有不便。兹有黑省友人熟识督署，托为设法，料有八九成功。

¹ 指唐山路矿工业学校的学生。

惟昨与之预算，往返交际等费，至少所需三百元，再加孟雄回资，合计四百元应用，请公决如何募捐。当议由到会人先行认出特别捐，有李大钊签十元，张国焘、刘仁静各五元，高尚德及谦各四元，其余各捐一、二、三元不等，共计筹得四十九元；则所差尚多，拟再以分担法，每团员二元，除出京十数人，预得一百元；其不敷之数，李大钊提议向北京方面无政府党筹负小半数，“因该党亦有刘仲容、刘稀、孟知眠三人被捕”，附带代为设法；其余之数，再由热心同志分头募捐，李大钊担认总包足此数，并于未筹足以前，由伊垫办，以促救出。又议设“五一”运动委员会，推选法即：举出七人，如王永禄、罗章龙、王复生、高某等，先期设法联络北大印刷工人及各校役，财政部印刷工人，同文、新社会、国京各报工人，在北大“五一”以前集合，帮助其游行运动劝诱及派传单，预备印刷品或国旗，担任散布，并选出三人赴长辛店，及二人赴唐山，协助进行，所有各费，由会计发通知，征收四、五、六月份各团员常费及请特别捐；并请各团员于三日内拟运动法之意见书，七日内交常费及特别捐等事。……合亟报告。

呈请堂宪大人钧鉴

关 谦 谨呈

关谦谍报中提到何孟雄被囚，确有其事。先是格林来华还负有邀请中国青年团参加少共国际大会的使命，当时还没有全国性的团组织，于是指定一些青年团体选派代表列席。北大社青团选派何孟雄为出席代表，北方还有一些青年代表，如王铮等人，一行十多人，大部为青年学生，年长的不过二十四、五岁，年轻的只有十五、六岁。他们初次出国，非常兴奋，沿路高谈阔论，更无秘密工作经验可言，也不熟悉北方语言和东北生活习惯。以致引起地方军警的注意，当他们一到满洲里时，就全体被捕。

何孟雄等在黑龙江被捕后，当地督军孙烈臣极为重视，亲自审问。孙系行伍出身，质朴无文。我们的同志在审讯中据理力争，庄谐并出，使孙非常难堪，遂延未结案。

自我们接到了何孟雄由黑龙江狱中的来信后，了解到他们被捕的经过和狱中生活。虽然已是早春天气，北满一带仍是风雪载途，严寒铺地，狱中困难极多。我们乃先寄去寒衣、食物和药品等，鼓励他们坚持下去；同时筹款托人向黑龙江当局疏通转圜。何孟雄已是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我亦向北大校方请求出面营救孟雄出狱，得到校长首肯，嘱我代拟电稿，说明案情原由，并经他审阅后，由学校拍发。经一段时日后，得到黑龙江同意开释的复电。于是我们又派人持北大公函前往东北办理免保手续，将他们领回，此案遂告结束。据督署办案人宣称：“咱衙门向来是‘捉贼容易放贼难’！这次算京

师大学堂有面子，一切免究。这重大案子就轻易处理了。今后难免还要打交道哩！”

何孟雄等一行回京后，风尘满面虬虱遍体，但精神还饱满。孟雄说：“此次坐牢，殊出意外，但机会难得，确也增长了不少见识。”自此，孟雄起用笔名“江囚”，意指曾作过黑龙江的囚徒。我为此曾赋诗赠他以纪其事，诗为：

闻道邻邦济水流，网罗冲决压神州！
少年意气峥嵘盛，万里龙江作楚囚！

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初期，也容纳有其他社会主义派别的青年和无政府主义者参加。因为当时的青年中，信仰空想社会主义、信仰英国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人，为数不少，有的则是无政府主义者。但这些青年，在反帝、反封建、反复辟、反孔等重要问题上，与我们是具有共同点的。在党成立以前有些活动就是联合进行的，如：“五四”运动中，我们就曾并肩战斗过。对于信仰无政府主义的青年来说，其中以北京大学学生为主。他们提倡“互助”、“泛劳动”；他们对统治阶级、军阀是仇视的，主张采取激烈行动。但他们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而他们周围也团结了一些人。我们认为，在这派人中，有部分是可争取到我们阵营中来的，争取的策略是多做些细致的工作，有的确被争取过来了，如工读互助团的何孟雄、罗海潮、吴容沧、张树荣等人。为争取他们，双方进行过多次辩论，最后他们同意了我们的观点，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当时对于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要求并不是很严格，因为入党没有候补期，往往是先入团，经过一段时期考察再根据表现吸收入党，年龄限制也不严格，李大钊和我们一样都参加团的活动，所以，在一段时期中，团成为党的预备队伍，许多同志都是先吸收入团，经过一段实践考察后才转为党员的。¹

¹ 此页末，作者补有“会议泄密，事出有因，查无实据，防范失严。陈德荣退团后，真相渐明。乃交团委追查澈查，仍未见效”字。—补注

八、“亢慕义斋”及其活动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由于得到校方的支持，学校拨出西斋宿舍中两间宽敞的房子，作为学会的活动场所。这套房子，我们都亲切地称它为“亢慕义斋”，其中“亢慕义”¹是德文译音，全文意思是“共产主义小室”（Das Kommunistische Zimmer），对内习惯用“亢慕义斋”或“亢斋”，我们的图书、资料以及对外发出公告，都是用的“亢慕义斋图书”印记（北京大学图书馆现在还保存着六十年前珍藏下来的盖有“亢慕义斋图书”图章²的德文书八册）。这些图书一部分是由北大图书馆购进转给学会的，大部分则是第三国际代表东来后，陆续由第三国际及其出版机构提供的。³

“亢慕义斋”，既是图书室又是翻译室，还做学会办公室，党支部与青年团和其它一些革命团体常在这里集会活动。“亢斋”的地址在景山东街第二院，地名“马神庙”，又叫“公主府”，同校长办公室相距不远，有校警站岗，闲杂人等不得入内。它在校内是公开的。有一个时期守常常到这里工作。

“亢斋”室内墙壁正中挂有马克思像，像的两边贴有一副对联：

¹ 当年对“亢慕义”进行汉语译音时，曾借重于古汉语的释义。按：《周易》乾卦，爻辞云：“亢龙有悔”，历代注释者自东汉郑玄、唐孔颖达，到南宋朱熹等均释“亢”为“极”、“穷高”、“亢阳之至、大而极盛”等义。《周易》文言传云：“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综言之，“亢”乃“盈、高、穷、极”之义，即吾人理想的最高境界，极高明而致幽远的境界，故称为“亢斋”。

² 亢斋图书室成立后公推我和天放等主持图书的征集和对外联系，以及图书的编目、出纳等事务。当时由我设计，天放自刻“亢慕义斋图书”章一枚，图书正方形长宽各32毫米，篆文六字左右直列分二行，每行三字。天放素善治印，篆文简朴，线条清晰，六十年后犹可想见其治印风格。

此条注释下，作者补有“附各册书内容及封面照片”字。—补注

³ 此段末，作者补有“八册书简介附照片”字。—补注

“出研究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还有两个口号：“不破不立，不立不破”；四壁贴有革命诗歌、箴语、格言等，气氛庄严、热烈。自分得房子后，大家欢腾雀跃，连日聚会。守常也和大家一起朗诵诗歌，表示庆祝，亢斋同人如贺天健、宋天放和我们都写诗纪念。

对联“出研究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是宋天放的手书，取自独秀和守常的诗句。上联意指搞科学研究和干革命，革命是准备坐监牢的；下联“南方兼有北方强”，意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里，有南方人，有北方人，守常称南方人为南方之强，我们则誉守常等为北方之强，南方之强又加上北方之强，表示南北同志团结互助，同心一德。这副对联概括了当时学会生活奋发图强的精神。

“亢斋”中“不破不立”“不立不破”的口号，反映了北京大学的斗争。当时的北大，是新旧思想矛盾集中的地方，一方面代表校内的斗争。当时的北大，是新旧思想矛盾集中的地方，一方面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如日方升；另一方面，守旧、复古思想其势犹炽，唯心主义、宗教思想也相当活跃。北大开唯心论的课，听讲的人不少，学生中研究印度佛经和老聃、庄子思想的人也很多，许多留日、留英、留美的先生们，也把西洋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贩运到中国来，可说是五花八门，样样货色都有。蔡元培当时的思想是居中偏左的，对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人怀有好感。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把马克思学说立起来，就无法破对方，不破对方，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也打不起来。为了开展思想意识形态的斗争，我们努力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宣传马克思主义。当时也有有利条件，蔡元培先生很强调学习外语，课程安排上，外语比重相当大，有英、德、法、日、俄、西班牙语以及拉丁文，印度梵文等七、八种之多，都开了班。我们亢斋的翻译组就是吸收这些外语系的同学，计有三、四十人，其中德语有十来人，英语二十多人，俄语四、五人，法语五、六人，日语也有一些人。此外，还有老师辅导我们。

开始，我们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和《震撼世界十日记》，还翻译了一些宣传唯物论、进化论的西方科学书籍。这些书当时可以印行，在我们也是个练习过程，锻炼和提高了我们的外文基础和翻译技术。以后，慢慢翻译马克思的著作和十月革命以后的书籍。前后规划有二十种，陆续译成付印，一九二三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根据人民出版社通告（广州昌兴新街二十八号），该社编译社会主义新书和重版书籍共计四十八种，其中标明康明尼斯特丛书十种，列宁全书十四种，均系亢慕义斋翻译任务。又马克思全书十四种，是亢慕义斋与上海、广州同志分任编译的，书中编译者大都用笔名，其他九种亦同。

我兼任德文翻译组长，蔡校长对德文组非常关心，他曾在德国莱比锡（Leipzig）大学修习哲学、历史、美学、文学等课程，他刻苦学习，成绩优秀。回国出任北大校长时，在北大设立了德语系。他对德

文翻译极感兴趣，我们最先翻译的一本书是《英马鲁埃·康德传》，接着我们翻译了《共产党宣言》，以后又试译《资本论》。对于翻译我们提出三个标准，即：信、达、雅。信是忠于原著；达，即要用中文通畅地表达出来；雅，还要有文采，要讲究语言修辞。我们德文组先后翻译了《马克思传》、《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初稿，我参加了这些工作，并为执笔人。《共产党宣言》原著理论深邃，语言精练。但要达到以上三条标准殊为不易。我们先是就原著反复诵读，并背诵一些精辟的段落，不懂的地方就集体研究。然后直译，但译出来后仍自觉不能完全满意。后来，我们在必要的地方试加了一种解释性的文字，使读者明白文章的含义。例如：《共产党宣言》第一句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对于这句话研究时间很长，觉得怎样译都不甚恰当，“幽灵”在中文是贬义词，“徘徊”亦然。于是加了一段说明文字：“有一股思潮在欧洲大陆泛滥，反动派视这股思潮为洪水猛兽，这就是共产主义。”以后，我们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本油印出来了。由于当时不便公开，同时恐译文不尽准确，只在内部传阅学习。在以后公开发行的《共产党宣言》之前，在北京见到的油印本，可能就是在这个版本。

《资本论》是巨著。我们的思想理论水平不够，但很想翻译，开始是直译，参加这个工作的有一位北大教授和德文组的同学。这个本子是最早的中文本。我因工作忙碌没有参加译完，但以后仍续译成出版了。郭大力译的《资本论》是在一九三八年，这是十几年后的事了。我出国在欧洲还碰到参加译《资本论》第一卷的同志，当时他还继续在做翻译工作。

在一九二一年前后，我们在亢慕义斋做翻译工作，是因为有以下几个有利条件：

首先是北大有大量新出版的西文书，可以说，北大是当时中国各大学中拥有进步书籍比较多的地方。

其次，北大有一个相当强大的外文队伍。因当时北大对外语教学很重视，各种外语都有名教授。有的是中国名教授（杨丙辰、辜鸿铭等），有的是外国教授Volker，刚和太等。¹

非宗教同盟

这段时间，我们除了集中精力从事马克思学说的研究和翻译工作外，还做了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即组织非宗教同盟。

在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年间，亢慕义斋同人就积极探索科学与宗

¹ 此段侧，作者补有“译书，改增订《康德生平》，增马堡学派新康德主义”字。一补注

教关联问题。当时在巴黎的萧子昇与我通讯频繁，大都是讨论北方新民学会工作与新文化及学术建设诸问题，同时亦涉及宗教与科学的关系问题。双方强调了在思想领域内，当前不应回避宗教问题。一九二〇年十二月萧子昇归国到北京后找我，我们共同商定组织非宗教同盟事，并定期邀约北大师生组织讲演会。主持者多为北大哲学协会会员及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随后由我与蔡校长商量进行办法。蔡校长在思想上反对各种宗教，主张以美育代宗教，所以力赞此议。商讨结果，大家决定组织非宗教同盟（Un-Religion Bunde），并由北大师生联合国立八校师生共同发起。

非宗教同盟成立后，公布了非宗教同盟纲领（李墨耕与我共同起草）。非宗教同盟的基本成员，是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为基础，采取广泛方式，联络了北京各校的部分师生。蔡元培、陈独秀、李守常等是当时学术界著名人物，也是非宗教同盟的重要成员。非宗教同盟在北京方面的会员后来发展到二百余人。¹

非宗教同盟的目的首要是反对神道设教，肃清迷信，解放思想，反对玄学，为科学大众化开辟道路。其次是打倒封建思想，发扬民权主义，为民主政治奠定基础。非宗教同盟的活动是在各校开展活动的基础上，扩大其组织到京外各工厂和中等学校的，包括社会各阶层及劳动人民。

非宗教同盟的常规活动，起先是以北大为基地，组织公开的学术讲演。如蔡先生以“美育代宗教”为题作讲演，具有深邃的哲学与美学的学术水平，有很强的感染力与说服力。学术界轰动一时，影响显著。后来非宗教讲台渐渐推广到全国各大城市，与各地教派正面交锋起来。当年王尽美就在济南亲自组织过反宗教的群众运动。

随后，我们出版了《非宗教论》，这是一本反映当时思想战线斗争的重要文献，曾一时风行全国。

《非宗教论》是一九二二年六月出版的，全书有十万七千多字。²对于出版《非宗教论》，当时的京报社、华俄通信社、光报等都从人力、物力给予大力支援。为出版这本书，邵振青采用支付广告费的方式，捐助许多纸张，印刷也是按成本计算的。当时铜版印刷价格昂贵，费用均由京报社一力担承，它所提供的资助是最多的。

在《非宗教论文集》一书中，我们列入书首者有世界著名科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戴楷尔（René Descartes）、服尔德（Francois de Voltaire）、狄倍鲁（Denis Diderot）、边沁（Jeremy Bentham）、拉普拉斯（Pierre de Laplace）、拉马克（Jean Lamarck）、孔德（Auguste

¹ 此处，作者补有“增补”字。— 补注

² 原为“一万七千多字”，作者将“一万”改成“十万”，又补“改正字数”字。— 补注

Comte）、许峨（Victor Hugo）、达尔文（Charles Darwin）、卡富尔（Camills di Cavour）、贝尔纳德（Claude Bernard）、巴枯宁（Alexandre Bakounine）、马克思（Karl Marx）、卢月（Clémence Royer）、邵可倡（Elisó Reclus）、纳凯（Alfred Naquet）、克鲁泡特金（Pierre Kropotkine）等人的照片，并附简略的传记及他们关于“非宗教”的名言，如马克思的像下有他的名言：“宗教是人群的鸦片”，意指宗教能使人迷惘，失其性灵，人们应迷途知返。克鲁泡特金的像下有他的名言：“人群思想，进步很慢，正如一个人睡了很久，方才清醒过来。在清醒后，就即刻要将皇帝、教士所用来缚他的锁链去了，恢复原有的自由，方得安乐。这条锁链丢去了以外，还要攻击向来诱惑他，禁锢他的宗教偏见，自己找一条新生活的道路，从新走去。”

在法国女经济学家卢月的像下有她的名言：“自然的法则决不会为一个想象的上帝所扰乱，宇宙的秩序，是由于各星球间有‘以太’一类的东西在那里运动，互相维系成的。宇宙是一种自然物，是一种公共的组织，不是经什么造物主的意思可以创造，可以毁灭的”。

《非宗教论》是由旭东、墨耕、明斋、怀龙、咏裳、振青和我共同组稿编辑、发行的。《非宗教论》的序是由我执笔写的。“非宗教论序”中有以下说明：

非宗教论，是非宗教丛刊的一种。我们第一次汇集非宗教同志的言论，得了萧子昇、罗章龙、罗素、蔡子民、张耀翔、陈仲甫、周太玄、吴又陵、李幼椿、李石曾、李守常、汪精卫、朱执信、王抚五诸君的文字共数十万言。以各个人的文字为段落；除首列附有近世界非宗教大家肖像插图者外，以著者姓氏笔画多寡为先后将它合编起来，按实定名，叫做“非宗教论”。

还有各同志关于信教与自由一类的文字，我们预备另行编辑。各同志非宗教的文字，也有未汇齐或汇印以后又有新著的；我们预备在第二版以后，随时增订。外国同志非宗教的书报，我们也要择要翻译，努力介绍。

“海内外各地同志，有以非宗教文字惠寄我们的，无论何项，均所欢迎。”

当时，非宗教论文来自各方者为数颇多，因此，我们预定出两集，后因有事迁延，未来得及继续印行，只出一集。此书是当时很有影响的读物，京、沪各大图书馆，均有馆藏。

在《非宗教论》中，我们共收入三十篇论文，执笔人是：

萧子昇（法华教育会秘书） 五篇

罗章龙（中共北大支部书记、北方区委委员、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 二篇

- 罗素（英国哲学家） 一篇
 蔡元培（北京大学校长） 七篇
 张耀翔（北大心理学教授） 一篇
 陈独秀（中共书记） 二篇
 周太玄（四川大学教授） 二篇
 吴又陵（北大讲师） 一篇
 李幼椿 一篇
 李石曾（华法教育会会长、北大生物学系教授） 四篇
 李守常（北方区委负责人、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 一篇
 汪精卫（国民党中委） 二篇
 朱执信（国民党《建设》杂志主编） 一篇
 王抚五（北京大学教授） 一篇

我在《我们何故反对宗教》的论文中，首先指明了“宗教是社会革新的大障碍”。为论证这个观点，我从三个方面加以阐明。

第一，社会改造的动机，起于不满足现实的生活。我们目击现代不安的社会，剥削阶级的横暴，愚贫小民这股可憫——凡有血气者，没有不惊心动魄、图谋挽救的。可是宗教徒对于这等重大的、紧急的问题，偏有些糊涂的解释。他们主张，人生罪过是与生俱有的；环境的压迫是应该容许的。人人只当熬忍眼前的痛苦，图谋未来的超升。是以他们所努力的仅有超人的神界，虚空的幻想界，与实际生活绝无关系。推原人类社会，所以有改善的希望，全在乎他们时时有自觉的动机，有革新的要求，若是尽象宗教家的理想，直可谓是自杀，这岂不是一件绝可危险的事吗？所以宗教上这种暗示，我们认为它与人类有生死存亡的关系，无论如何，不敢赞同。

第二，社会革新的信仰既是立脚于近世纪的进化论上，并且同时承认人类具有伟大的能力，可以驾驭自然界多种质力，渐次完成我们各样的理想。因为我们相信社会是进化性的，故一切文化制度风俗，递演递变，变动不居，由野蛮而开明，由简陋而繁颐，人类应常怀善于推陈出新，勇无前的气概，才是正当的态度。说到宗教的理想，可就大不同了，他们的极乐界是悠悠无为迎送岁月的。他们的宇宙观是“天造地设”，一切归上帝统御的。所以社会间一切应行解决的问题，在他们看来，简直是“好事”，他们自视，俨同刑余的囚犯，尽毕生的力，还不能了却自己浑身的罪过。试问时至今日，社会的动态，日趋险恶，莽莽大地，一切表现尚不能脱去原始人类的痕迹，我们的责任便是兼程并进还恐不及，象这样袖手旁观，谦让未遑，任听自然界的宰制，那就除非甘心毁灭社会不可。这是我们的信仰与宗教根本冲突之第二点，万不能疏忽的。

第三，革新社会是以科学真理为依据，科学的态度是明显的，分析透的，实验的。宗教教义恰与它相反，它是神秘的，笼统的，唯心造作的。以神秘的、笼统的、唯心造作的方法去求知识，现代稍有常识的人，都可以断言它不但无益，且有危险。关于这层已为人所易晓，并且前期宗教与新学术反复论列，已很明了，所以不加详述。现在我们只问：科学贡献的成绩能不能否认？如果不能，这个与科学势不两立的主体，决保不住不倾覆了。宗教倾覆，科学愈益昌明，即社会的革新就有希望。统上三点言之，不过举出荦荦大者。总之社会是亟待改造的，宗教则给予人以不正当的安慰；社会是进化性的，宗教则以一定的偶像为归宿；实际生活的改善是人类能动性的表现，宗教则宅心于超尘的想象界；人类的最大价值是尊重本能，宗教则毁灭人格，遏抑个性；科学的真理是救拔人类的唯一途径，宗教则到处与他刺谬，此处虽然还有其它的事实没有一一指出，可是仅凭这几件显见的罪案，也就万难饶恕了。

在这篇论文的后半部分，我进一步阐明，任何宗教都是“建立在神秘的基础上的”，是“违乎理性的”。“宗教的一个绝大谬误的见解，就是崇拜偶像的存在——广义的偶像——并且对于所崇拜的偶像均有唯一而限于一的一元心理。”因此，我认为宗教“是人类精神上—层极深厚的壁垒”，是人类进步的极大障碍，应大声疾呼“打破宗教！”

在《再论反对宗教》一文中，我驳斥了几种为宗教辩护的借口：

- (一) 宗教可以安慰人生；
- (二) 宗教可以鼓舞人类向上的勇气；
- (三) 宗教可以增进道德。

最后我得出的结论是：“总之以上诸端，均是以宗教为生命人的梦想，据我们看来，宗教的成绩只有杀人，战争，遏抑个性，阻碍进化。纵然有一二无庸反对的地方，也不是他们的特有性，并且常有利不胜弊的危险，我们于此应该寻求其它的方法——科学的方法——去代替它，决不是因循苟且可以了事的。”

当时除《非宗教论》一书外，尚编辑出版了《中国教毒图（分省）》，此图系将各省耶稣教流毒情形，详细绘出，按教堂的实数一一标明，并有教毒总图两幅比较教毒漫衍的情况，以及蔡元培先生反对宗教的论文，编成册出售。

非宗教同盟活动的开展，使国内宗教迷信者大感不安，于是北大教授钱玄同、周作人、沈兼士、沈士远、马叙伦等一九二二年于三月三十一日发表宣言，反对非宗教同盟及其发起人（另一些人则暗中破坏）斥责反宗教运动是违反约法与宪章的，对北大主持非宗教运动者

大肆攻击。这时候陈独秀挺身而出，于四月十一日在北京《晨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信教自由》的公开信。该信全文如下：

启明玄同兼士士远幼渔诸先生：

顷在报上得见公等主张信教自由的宣言，颇难索解。无论何种主义学说皆应许人有赞成反对之自由；公等宣言颇尊重信教者自由，但对于反对宗教者的自由何以不加以容许？宗教果神圣不可侵犯么？青年人发点狂思想狂议论似乎算不得什么，象这样指斥宗教的举动，在欧洲是时常有的，在中国还是萌芽，或者是青年界去迷信而趋理性的好现象，似乎不劳公等作反对运动。私人的言论反对，与政府的法律制裁不同，似乎也说不上什么“干涉”“破坏”他（人）的自由，公等何以为此惊慌？此间非基督学生开会已被捕房禁止，我们的言论集会的自由在哪里？基督教有许多强有力的后盾，又何劳公等为之要求自由？公等真尊重自由么？请尊重弱者的自由，勿拿自由人道主义许多礼物向强者献媚！

弟 陈独秀白

四月二日

这封信发表后，一方面使争论告一段落，另一方面对广大青年给予很大的启发。

当时在青年思想界，由于旧社会痼习尚存，因此有些不明事理的青年学生，起初以为尘世纷扰，怀有出世思想，认为信仰宗教可令心境宁静得到解脱，读了《非宗教论》后恍然大悟，纷纷表示毅然放弃出世思想，参加非宗教同盟。

综观《非宗教论》的要点：a、宗教、迷信神权及祭司与科学对立；b、宗教定于一尊与民主不相容；c、宗教派生之变相宗教（教条主义）亵渎人类尊严，祸害与宗教无异；d、铲除宗教与变相宗教后，人类始获真正自由与平等；e、政治应与宗教及变相宗教分离，否则便成为专制独裁与暴政。《非宗教论》对宗教颇发挥反击力量，由是反宗教运动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

北方区委对这件事很重视，认为这在思想上是反对唯心主义，宣传唯物主义，在政治上反对帝国主义，在教育上是反对文化侵略。

当时党中央也很重视此事，认为北方区发动的反宗教运动是意识形态的重要斗争，足使帝国主义、中国统治集团惶然不安！我们还收到不少国外学术界的来信，说明此运动的国际影响良好。

九、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亦称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以下简称书记部），正式建立于中共“一大”之后，其迅速发展则在一九二二年间。书记部在一九二一年初只是一个人数不多的工人革命宣传组织，后来逐渐发展成为领导数十万工人斗争的司令部。书记部成员以学生和工人为主，这个庞大的男女青年队伍包括有各项专才。他们之中有学政治、法律和经济的，也有学理工农医的，还有学文学、艺术以及军事的。他们在工作上各尽所能，发挥自己的力量，接触面极广。当他们和广大工农群众结合起来以后，战斗力就更加强大了。他们团结一致、勇敢坚毅、不屈不挠地在城市与乡村进行严酷的对敌斗争。在早期工人运动中作出了可歌可泣的牺牲与贡献。现就其源起组织、活动业绩等简述如下。

在书记部成立以前，北京大学学生数人，即后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但是该会原是一个研究革命理论的团体，固然会员在进行研究的时候，同时也进行了某些革命活动，但究竟不是革命行动的集团。因此在中共北方地区小组建立后，才开始认真从事实际革命工作。经过多次研讨，认为应该建立一个接触工人运动的机构，并派人到长辛店、南口、唐山等地进行探索，借与当地工人建立工作关系。在这个时期中，我和张国焘、何孟雄等分途到上述各地旅行访问，结识了当地工人某些组织的领袖多人，又通过这些认识更多的人认识了更多的工人群众，初步建立了工作据点，这就是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前身。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称源于外文 Trade Union Secretariate. 其

中 Trade Union 系“工会”之意，早先日本人译作“劳动组合”；Secretariate 则系“书记处”之意。合起来即“劳动组合书记部”。这一名称可能是由马林引荐到上海的，他早年曾在日本作过工运工作。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共党组织决议在上海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年八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正式成立，主任为张国焘，办公处设在法租界渔洋里六号。张国焘领衔发表宣言，签名者二十六人，其中少数为中共党员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如张国焘、李启汉、李中、李震瀛、袁笃实、张秋人等。以及青年学生李新旦、刘荻人、顾耕野、汪洋、杨意贞、董锄平等。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宣言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七日报的《共产党》月刊第六号上刊出。其大意是阐述工人阶级的产生及其痛苦生活，客观上要求团结，团结应采取产业组合形式。书记部是联络各劳动团体的总机构，并着重与国际的联系。书记部作为产业工人群众的战斗组织，它与当时上海一般有名无实的工会有根本上的区别。一九二一年八月书记部出版《劳动周刊》，通讯地址：上海公共租界北成都路十九号。该刊每星期六出刊，自一九二一年八月至一九二二年六月，前后十个月共出版四十期。书记部又在小沙渡设立劳动补习学校，由李启汉主持。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在北京成立了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由我负责。在济南、广州、长沙、武汉分别成立各地区劳动组合书记部，济南由王尽美，武汉由林育南，湖南由毛泽东，广州由陈公博负责。总部仅在上海地区工作。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时约一年，工作进展极为困难。一九二二年六月一日李启汉忽被捕，六月九日解往上海会审公堂，判刑三月，同时《劳动周刊》及书记部被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查封，停止活动。李启汉在上海西牢居三月，接着于一九二二年九月被引渡到上海护军使署继续关押，直到一九二四年十月始获释，前后在狱中历两年四个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被封、李启汉被捕下狱后，当地工作无法继续，总部名义虽存但无具体工作。其他各地书记部仍照常工作，均由党中央直接领导。

中央九月扩大会议

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以后，北方工人运动有春云渐展之势，但面临许多新问题，人力与经验俱感不足。此时中央自上海来信，通知北方区派代表前往出席中央扩大会议，主要是讨论推动工人运动与产业工人区域建党与团的组织等问题。

中央扩大会议是在一九二一年九月间召开的，这是陈独秀从广东回

到上海担任中央书记后第一次召集的扩大会议。

上海中央负责人仅陈独秀、张国焘及国际代表等人，当时对于如何开展中国工人运动尚无经验，所以召开扩大会议的目的主要是讨论如何发展工人运动。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等处代表。北京方面为邓培与我，武汉为许白昊，上海为李震瀛、袁笃实，山东为王尽美，湖南为毛泽东，广东为冯菊坡等，合计有代表十多人。

代表住在上海新闻路三元里，会期五天。会上由国际代表作关于工人运动的报告，各地代表作当地工人生活问题报告。讨论后决定了一个工作计划，并调整北方书记部组织及确定北方分部范围、人选等问题。北方书记部仍由我负责。

我曾向独秀陈情，北方工人运动范围甚广，工作繁难，最好另由中央选派经验较丰富的同志前往负责，本人目前无此能力。独秀笑道：“你说谁有经验？大家不都是一样！你不做谁做？”几句话把我说得无词可对。最后独秀又说：“你回去做，有什么为难的地方随时来信，大家商量，必要时，以后可补充人员。”我尚犹豫，独秀断然向我说道：“你不要舍近求远，应把读书计划全部放弃，再来向我讲话。”我无法再辩，承诺暂行负责。独秀转嗔为喜，立促我北返。在会议上，我与尽美向中央建议调尽美到北方区工作，中央赞成，但山东党组织不同意。后来各方继续商量，最后结果是山东书记部与北京合并，尽美调到北京，山东党组织由邓恩铭负责，北京区党委另派专人驻济南协助山东党委工作。一九二一年十月山东书记部正式合并于北方书记部。尽美到京后任书记部秘书兼京奉路工会特派员。北方书记部工作范围管辖北方十二个省和十六个大城市的工人运动，即：顺直（河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热河、察哈尔、绥远、甘肃、奉天、吉林、黑龙江和北京、天津、开封、太原、济南、青岛、西安、兰州、沈阳、长春、哈尔滨、郑州、洛阳、徐州、蚌埠、张家口。后来为全国铁路总工会所管辖的全国各铁路工会，亦包括在内，所以事实上北方书记部涉及范围很广。沿铁路南至上海、武汉、广州、安源、昆明、腾越、蒙自等城市都有工作联系。

北方工运工作开展

中央扩大会议结束后，我从上海回到北京，将扩大会议决议向中共北方区委报告后，即讨论具体措施。在讨论中大家说到，咱们当初曾从事工人群众中的组织宣传与教育活动，创办《工人周刊》，开办

长辛店补习学校、劳动通讯社，并在南口、丰台、唐山等地开展工作，今后就从这些据点向前推进，努力工作，坚持勿懈，自然会有成就。最后，决定了北方工运工作的初步方案。

(一) 选定长辛店、唐山、南口和丰台四处作为工作试点。因为上述四地是北方铁路工人集中的地区，且长辛店、南口靠近北京，丰台为交通枢纽站，唐山是靠近北京的最大煤矿。(二) 在上述各地设立两个或三个工人补习学校，向工人灌输革命意识，讲述罢工斗争知识。(三) 试行开辟工人斗争战线，设法争取参与领导北方区内重大的工人自发斗争。(四) 加强党报《工人周刊》编辑阵容与发行工作。(五) 在铁路、矿山城市建立党与团的组织。(六) 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制定合法斗争与直接行动的罢工斗争方案。(七) 调查了解情况，决定对抗交通系斗争方案。(八) 筹办工人运动讲习班，训练工会工作人员。(九) 在工人集中地区筹办工人消费合作社，减少商人居间剥削。特别重要的是密切注意激发工人的斗争意志，有计划地推动与组织工人群众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并且对于任何自发斗争都要积极参加、引导和组织，使其获得成功，以扩大书记部的政治影响。

当然，要实现上述方案，就当时北方书记部人力条件来说，是相差很远的，只凭书记部极少数青年学生奔走呼号是无济于事的。因此会议决定北方区党员以全力参加书记部工作。后来，又从公开后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征集一批志愿工作人员，参加北方书记部工作。

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征求志愿工作人员一事，开始采取自由报名的办法，但是结果报名的人寥寥无几，大多数会员思想上存在着顾虑，除恐耽误学业外，主要认为学生去做工人运动既无“出息”，又无“前途”，于己有损，于事无益。有鉴于此，乃重新研究，改进征集方式与办法。在北京区委会议上经过多次讨论，大家认为要求一个学生献身工人革命运动作一个职业革命家，既是革命实践问题，也是建立有关革命人生观问题，因此会议决定发起一个关于革命人生观的辩论。通过这次活动，多数会员在革命事业面前有了明晰的态度，但是学生在参加工人运动方面仍有思想隔阂。为此，党决定由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辩论当前中国革命方向问题，使大家明了工人运动对革命的意义，消除思想分歧，统一斗争意志。当时在青年学生中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对工运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中国历史一贯是以专制为特色构成帝王、军阀、官僚的武力统治，各朝代鼎革不论其名义若何，实质上均以砍杀终局，此起彼伏，演成数千年无休止的残酷斗争局面，这正是中国历史演进的特征。数千年积习是难以一朝改变的，过去“平民伐罪，顺天应民”固是一片谎言，当今共和民主，同属有名无实。所谓民国统治实是徒有共和虚名，对人民却无实惠，中国革

命是难以超脱封建专制轮回的。因此某些人公然宣称“所谓共和政体，也不过为野心家驱使罢了，结果仍是武力统治的变形，过去鼎革后人民在新暴政下依然是遭受涂炭的命运。”总之，他们认为不管什么形式的革命，“牺牲的是劳苦大众，交替执政集团都是不劳动的、说谎话的政治骗子。历史上几千年来都是人民骷髅铺的道路，都是打冤家的道路，‘民治’、‘民享’都是做梦。”因此，他们不愿意参加这个行列。第二种意见是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认为在世界历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东西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虽然不同，但工人阶级在未来革命中必然占主要地位。在这些国家以共产党为领导，通过工人运动，运用统一战线，团结革命势力，等候时机成熟，经过国内革命战争可以推翻反动统治，建立全国性革命政权。而且通过此种途径可以根本消灭武力统治，消灭割据，实现民主政治，这是减少人民牺牲与物资损失，一劳永逸，保全国家元气的办法。同时也可以导入真正民主政治，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改造，进入共产主义。俄国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一举成功也是这样。赞成这种意见的人很多，并认为中国历史大都是农民揭竿而起，由群雄割据，建立专制王朝，暴政相循，如环无端。今后改弦易辙，可以工人为主力领导革命，可谓别开生面，造福人民，好处实多。针对上述两种意见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经过反复辩论，结果渐趋一致。会上大家认为持前说者虽言之成理，但对人类未来历史全盘否定，亦属不当。人类历史虽长蒙专制暴政的侵袭，但人民民主终不可抗，历史发展进程最后将仍导致民主政治。自此以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大多数会员对社会主义革命实践渐渐接近。但要做到人人自觉躬行，则并不容易，何孟雄等加入书记部工作经过，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何孟雄原系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后加入社青团但久未参加实际工作。他向人表白，革命应先把理论弄明白才能实践，否则便是盲从附和，实际是怕供人利用；也出于对个别同志狂妄自大心怀不满。党组织数次派高君宇等去同他们谈话，何仍观望不前不愿参加实际工作。我考虑到：何孟雄不只是一个人问题，他具有代表性，我们应好好地说服他们。我先将此意告缪伯英（伯英先入党），伯英说：“我说过，他只是不同意。”我乃往见何，何固执成见，说：“我们的工读互助团可能失败，书记部良莠不齐，我与他们共事，岂不是帮倒忙！”我说：“你夫妇名‘英’称‘雄’（孟雄与伯英），可是不参加实际革命，不唯道理上说不过去，也会遭旁人议论，‘何’其太谬！”（双关语）何默然不语，有顷，答道：“我也自知不对，老实告诉你，我们大家还担心的是‘去一木偶，招来毒蛇’，所以可虑。”¹我道：“这是你过虑处，近于宿命论，只能坐享其成，不能革命，革命要自己掌

¹ “去一木偶，招来毒蛇”句后，作者补有“[注]语出伊索寓言，ISOSFOBEL”字。

握命运。”我们两人辩论竟日不决。次日伯英告我说，“孟雄平日好高骛远，目中无人，你昨日谈话，他似意有所动，你如不直言针砭，他就难以自拔。”翌日我再往，继续向何进言“劝驾”，何不再坚持，但又忽转话题道：“中国革命的命运，固然应山群众自己掌握，但须以党内实行充分民主为条件。”我答：“革命千头万绪方在起步走，只要大家意志坚强统一，内部谁敢专制？万一将来党内发生变人，群众自然把他打倒，也不会是难事。”何说：“内部如此，可是外来干涉违反民主也是完全可能的，所谓‘赵孟能贵，赵孟能贱。’你能保证吗？”我道：“有话在先，万一不幸有此事发生，不难一例对付。况且外力干涉源于内奸，只要没有内奸，外祸就不易侵入……。”这情况我与孟雄连续谈了三次，他才表示接受书记部工作。后来，伯英告我说：“这次确是孟雄思想上的一大转折点，只要引擎开动，车子就自然向前飞奔！”立即决定派孟雄到京绥铁路为特派员，负该路全责。自此许多同志如李树彝、贾纡青等也先后加入书记部。这是书记部的重大收获。自此书记部组织渐渐充实起来，先后派遣特派员驻路工作。张昆弟、陈为人、王仲一、萧明、余立亚、李震瀛等相继派往各铁路开展工作。

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成员如下：罗章龙（主任）、王尽美（副主任兼秘书）、邓培（唐山大厂负责人）、史文彬（长辛店工会委员长）、孙云鹏（正太路工会会长）、王荷波（津浦工会委员长）、时奎元（开滦矿工会会长）、张汉清（京绥路工会会长）、傅书棠（胶济铁路负责人）、伦克忠（青岛四方纱厂负责人）、王符圣（陇海工会负责人）。特派员：京绥路：何孟雄、张汉清、王旭文、马净尘；京汉路：吴汝铭、凌楚藩、项英；陇海路：游天洋、王忠秀、魏荣珊；京奉路：王瑞俊、王麟书、韩玉山；津浦路：王仲一、张振成、孙鸿儒、李保成；胶济路：郭恒祥、李青山；道清路：董昌荣；淞沪路：余立亚；正太路：袁子贞，刘明俨、贾纡青；粤汉北段：郭亮；株萍路：朱绍莲、李涤生；开滦五矿：李昌兴；天津市：安幸生、李培良；北京市：陈楚梗、萧明；唐山市：李树彝、彭礼和、吴先瑞；郑州市：汪平万；济南：李味农、刘俊才；南满铁路：唐宏经（大连工学会），时间稍后（余从略）。

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

开办劳动补习学校，也是颇费周折历尽艰辛的。早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之初，我们就酝酿筹办劳动补习学校。筹备时间颇长，所遇困难亦多，兹举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为例，以概其余。

1 此段末，作者补有“45人”字。— 补注

一九二〇年暑假，我与梅夔、国焘等第一次来到长辛店。长辛店距芦沟桥不远，在桑干河南，昔人诗称：“山形依督亢，天影接桑干”，昔荆轲入秦，持督亢地图，即指此地。那天是星期日，三人先到芦沟桥芦苇荡行猎，就地野餐，餐毕到车站访问一个电报房工人吴敏珂。他原是北京法文学校学生，山东人，“五四”时曾到过北京大学西斋，与我相识。吴热情招待，引导大家去参观慈禧太后回銮时的花车，大家就在花车旁合摄一影。随后吴引导去访工人住宅，会到了他的同乡史文彬等人，史又引大家到大厂内外参观，后在史家闲谈，情意颇洽，直到下午才搭车返校。从史师傅谈话中知道长辛店机车厂于一八九七年开办，成立已二十四年，厂址原在芦沟桥畔，由英国工程师创建。一九〇一年因扩充厂址，改由法、比两国工程师任厂长，有外籍工程人员与职员约四十余人。现任厂长孙瑞章，副厂长谭继先与王荫春，比、法总管为若曼与札曼，他们是直接压迫工人的。长辛店技术工人多来自德州及天津，职员多属于交通系，体力工人多就附近定州一带招募而来，工资最低，勉强维持本身生活，一般人无力抚养妻室儿女及父母。他说：“工人们总是憧憬穿暖吃饱，劳动适度，精神舒畅，言论自由，这都与北大先生们所见相同。但终不过是‘镜花水月’，一时空想……”

在多次访问工人区生活以后，大家渐渐向工人进一步谈论有关政治性的问题。工人们，特别是老年工人，对学生隐约怀有若即若离的态度，这就是当时所称为“工学界限”问题。很能说明当时“工学界限”的，有这样一个例子。社会主义青年团派贺其颖找孙云鹏谈话（其颖是山西人，所以最先被派到正太铁路工作）。见面时，其颖向他宣传社会主义革命的道理，云鹏聆毕问道：“小伙计，你们卖的是哪一号膏药？”其颖不由得着急起来，连忙解释道：“我们决不是哄人的江湖医生，我们是诚心诚意来同你谈造福工人的革命问题……。”云鹏不待对方答毕，把话岔开说道：“这些话我也听得不少了，卖瓜的都是夸自己的瓜甜，究竟怎样，我们工人脑筋简单，实在闹不清楚。”随后他就提出一连串的疑问，其颖虽加以讲解，但云鹏总是半信半疑，追问得他紧了，他就不说话了。其颖颓然而返。工学界限使学生与工人不易接近，因而影响革命宣传与组织的深入，这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开始有人主张采用旧社会拜把子结兄弟的办法与工人建立友谊，李启汉、杨殷等曾采用过这种办法，与工人在神像前烧香歃血为盟，发誓云：“一人有事，众人帮忙，一人丧命，大家报仇！”但是旋即发觉此种落后方式，缓不济急，且易滋流弊，遂决定禁止采用。

为了解决工学界限，曾举行多次会议专门讨论，最后结论是要求生活方面忍苦耐劳，与工人打成一片，就是说，学生生活工人化，使

工人感到学生不是外人，而尤其重要的是对于工人心中的疑难问题耐心解释，使双方观点渐趋一致。关于前者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曾动员发起普遍访问工区与工人交朋友的运动，以后每逢大礼拜（工人休息日）就有不少同学几人一队分途到长辛店、丰台、南口、石家庄，甚至更远的地方进行访问调查。他们往往裹粮步行到郊区很远的工人区铁路道棚及门头沟煤矿等地去进行访问，写成笔记，返校后向会员作报告。他们报告丰台见闻时说道：“此地所见妇女儿童面色凄凉，如同囚犯，劳动者长期在自然灾害与人造灾难交替中过生活，都在饮泣吞声地吃着杂粮饼子。”同样的访问与报告不乏其例。

仅仅通过访问调查，是不能彻底解决工学界限的。当时党组织曾认真加以分析过，认为工学界限来自两方面：一是从工人本身疑虑所产生的，这是认识问题；其次是来自工人以外的政客官僚对工人与学生挑拨离间造成的。前者源于贫苦工人的自卑感，他们素来认为工人是命运安排才受苦受难，大学生是金枝玉叶，将来做官为宦的人，是统治工人的候补者，学生与工人并不是一伙儿，怎能一道结交共事呢？这其中一定有蹊跷吧，工人还是安分守己不要同学生瞎混，工人的事，还是工人自己来干，莫让学生插手为好。至于政客官僚们唯恐学生叛逆造反，扰乱秩序，所以不断向工人聒噪：“学生是危险人物，是过激派，穷党。他们是专门来煽动工潮，借此捣乱的，你们千万不要上学生的当！”这样更加深了工人和学生的隔阂。

工学界限问题是工作最大难关，必须采取各种方式缓和工人情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除采用实际行动以团结工人外，又特别注重召集各型工人会议，进行宣传、解释。在双方多次互相访问后，召开工学座谈会，讨论工学联合、工人团结等问题。座谈会多在例假日邀请工人来京游园时举行，或到长辛店、南口等工厂所在地方举行。有时联合几个地区的工人和学生共同开会讨论互感兴趣的问题，经过长时间互相讨论，一些误解得以澄清，感情日见接近。后来，书记部把当年保留下来的一些辩论中的“问题与解答”整理成文，为后继者参考，兹介绍如下：

（一）学生多属社会上层人物子弟，来到工人区，动机何在？究竟何所为而来？恐其中难免有诈。

解：学生为革命而来，为帮助工人反抗剥削者与压迫者而来，并无不利于工人处，于工人本身无损失可言，工人可放心，学生决不会从工人手里拿走什么东西。当前，中国革命的敌人很多，靠工人单枪匹马是推倒不了很多强大的敌人的，所以革命是工农商学兵各界共同的事业。革命不怕人多，为什么独对学生防避，今后我们应多讲工学的联合，化除工学界限，推心置腹，不分彼此。工学界限化除后，参加革命的人就更多了，主意也多了，力量也增大了。

（二）工人数量少，生活苦，知识浅，力量薄，只求安分守己工作，实在用不着提出革命大题目。工人们承担不了这个大担子。工人想进行政治革命，未免太不自量了！

解：工人数量不算少，所占地位也很重要，能生产万物，不要小看了自己。工人的生活贫困和不自由，这与军阀独裁和官僚剥削有密切关系，统治者是病源，对症下药就是革命、推翻统治者。古人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工人难道没有责任吗？至于说工人人数少，可是统治我们的敌人，他们人数更少，两方的区别是统治者有党派有集团组织，所以显得有力量，工人无组织，所以斗不过他们。工人应该组织起来，才能保护自己的利益，最后把统治者推翻。

（三）学生天天叫嚷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可是我们既没有军队，又没有军舰，行吗？

解：工人在没有武器以前第一步是团结，工会就是不可侮的力量，往后就能取得武器，打倒敌人，达到革命的目的。各国工人革命足为我们的示范。

（四）学生年轻阅历浅，一股冲劲，热心革命，难免不受人利用。工人跟学生走，易受牵累，恐招致将来后悔！

解：学生心地光明纯洁，才讲革命，在革命中遇困难一肩承担，决无利用工人谋取富贵的意思，更不推卸责任，也不会拖累他人。工学一条心，就会真正把国家的事办好。如果有坏心眼的人，有心打算利用工人火中取栗，争取个人权力地位，我们工学界联合，可以把他们打倒。

（五）学生与过激派通声气。过激派杀人整人，不让人自由，私通外国，人说是卖国贼。

解：今天的卖国贼是官僚政客，只有他们与外国签订条约出卖国土，出卖主权。学生没有条件卖国，却是尽忠报国，是坚决反对卖国政府的人，不主张杀人、整人，也不主张剥夺人们自由。

（六）书记部大都是南方人，南方人为何要来北方革命？

解：革命不分南北，正如读书、做工不分南北一样。南方人来到北方做工、读书，南方人也自然可以在北方革命。革命不嫌人多，革命成功后南北人一体沾到好处，所以应该化除工学与南北界限，大家同心协力一体干革命。

……

除此以外，为了使工人和学生在日常生活各方面互相接近，当时北方书记部还要求工作人员在工作中严守下列公约：

（一）献身革命工人运动，百折不回，誓为实现真诚无欺的民主自由而奋斗。

(二) 不争夺地位荣誉，万众一心为革命，时时站在最前线。

(三) 胜则相让，败则相救，牺牲个人利益。

(四) 廉洁奉公，生活朴素，重视劳动，尊敬妇女，不嫖不赌，不捧角，限制谈恋爱，禁绝一切败坏道德的行为。

因此后来有人称书记部为新的清教徒、政治童贞。事实上书记部人生活均极清苦，通常生活水平规定不得超过普通工人，收入逾定额时，余者一律交作党费或捐助工会。去各路工作，来往多乘煤车或货车，以节费用。

除了思想上的隔阂，学生在工作中仍然遇到其它的困难。如生活习惯与语言隔阂，均使工作进展增加阻力。由于书记部的南方同学乡音很重，生活习惯与本地劳动人民多所异趣，时有格格不入之感。如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中有位广东同学来京不久，自告奋勇到丰台工马，初凭热情在车站住了数日，毫无所获，失望而归。他半开玩笑似地埋怨自己说，“我实在不行，这工作真难办，恰似白狗吃青天，不地埋怨自己说。”但是在大家的坚持下，所有遭遇的困难都逐渐被克服了。

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教员几乎全是南方人，南人操北语非常别扭，不止是笑话百出，有时更构成误会。因此《工人周刊》的编辑宋天放编成《应用京话词汇》，油印多份，供大家学习。兹举数例：见年长者称“二哥”、“大哥”便不礼貌；店主人称“掌柜的”、“当家的”；乱说话为“胡诌”；乱行动为“瞎闹”；散步为“遛跬”；话多为“唠叨”、“罗唆”；不要为“别”（如“别嚷”、“别闹”）；烟酒不叨用称“在理”；洋车为“胶皮车”等等。当时大家把这本应用词汇揣在怀里随时翻阅，过了些时，居然可以说出对方能听懂的蓝青官话了。

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于一九二一年正月正式开学。学校位于车站迤南工人住宅区一个名叫铁匠营的小胡同内，门字低垂，伸手可触檐瓦，计有屋三间，一大二小，东大间作教室，中小间作办公及阅报文娱室，西小间为教员卧室。史文彬即住在学校附近。娘娘庙在车站迤东，庙前有广场可容数千人，工人群众较大集会则在娘娘庙举行。一九二一年五月长辛店工人第一次在此举行纪念五一劳动节集会，散发了《五月一日》及《工人的胜利》的小册子，争取八小时工作，这在中国是空前盛举。大会结束后，长辛店教员全体参加游行到车站，教员吴容沧把手中大旗插在火车头上，一直开到南方去，沿路换车头时，工人把旗传下去，一直带到江岸。

1 此段末，作者补有“[注]北方流行语，武大委琐，小人受人欺侮。讳称武大郎，尊重武松二哥”字。——补注

在补习学校任教的有：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主任吴汝铭，教务主任李实，教员贾祝年、张纯、吴容沧、罗运麟、王铮、杨人杞、张至刚和我等。洛阳劳动补习学校主任白眉珊、张宝泉。唐山劳动补习学校主任梁鹏万。天津劳动补习学校主任安存斋。丰台、张家口、吴淞、徐家棚、沟邦子、大槐树、长沙、九江、昆明、包头等处均先后设立过补习学校。

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开办初期，北京党组织决定由我和国焘、梅羹、中夏等几个党员轮流前往任教员，朝去暮返，或每周驻校一、二天，随时换班。授课教本由教员自行编印，学生所需纸张笔砚由教员捐助不收费用。后来因为国焘出国，中夏离京教书，我事繁，乃改为专任教员制度并推定一人负责，长期驻校。该校负责人为李实，继为吴汝铭，后为吴容沧，前后易人数次。各劳动学校教材由书记部教育委员会编辑，内容取材于《共产党》月刊、《工人周刊》、《向导》、《苦力》、《劳动界》及《国际通讯》英、德、法文版本的资料等。

劳动补习学校教员大都是经过审慎选择的，所以对待工作十分认真。他们平日经常向工友们讲解革命大义（工友二字即最先为长辛店教师所采用），同时对工友生活非常关怀，事无巨细，有求必应，故工人称学校为“工友之家”。

某次修车厂工人吴国有屡受工头欺压，无处申诉，乃到北京大学西斋找书记部负责人商量对付办法，并说如能直函外国总管讲明事实或能得直。时王复生适在侧，因就其所讲情节书一法文信嘱吴带回递交札曼。札曼立召工头与吴对质，工头意料不及，以报告不实受责，吴遂从宽发落。吴事后逢人便讲，王先生摆连环计把他从困难中搭救出来了。人问何故，吴说：“王先生给外国人写的信，大环套小环，中间杂些芝麻雨点”（指信中的法文及标点符号）。说得伙伴们大乐起来。从此工人中到处传开了，说书记部真不错，真正能替工人们办事。

和工人相结合

起初书记部人到工人区时，双方称呼均表示客气，北大学生见工人称某师傅，工人见学生则称某先生，后厮混渐熟，双方互称老史、老罗，更久则互以绰号相称。如呼老史为麻哥、老王（俊）称二毛子（王原为天主教布道师）、陶善琮为张良。后来工人对学生几乎每人都给以绰号，如见书记部人生活简约，不御烟酒，不近妇女，则称为清教徒，张国焘足智多谋称为张孔明（kodomo1 共青团员，转为张空明，

与Коммунизм谐音)，见王铮年幼天真称为小炕馍，高君宇举止斯文称为老夫子，李震瀛体貌魁梧称为关西大汉，邓中夏好夸海口称为邓大炮，何孟雄对人说话腆腆称为小闺女，王尽美机智勇敢称盖韩一信，吴容沧性如烈火称南方蛮子，吴汝铭极度近视称吴瞎子，王仲一粗犷耿直称为王提辖，宋天放温文尔雅兼善书法，称为宋学士，其他绰号不一而足，依各人体态性格，颇多贴切。当时以绰号称人者表示亲昵，受之者不以为忤，此时一切嫌疑悉化为乌有，彼此推心置腹，一心向前！特别是当工人们亲眼看到书记部人在历次罢工斗争中总是冲锋陷阵，勇往直前，前仆后继，虽牺牲累累仍百折不回而深受感动。这时他们心坎中的任何疑虑不仅完全冰消瓦解，而且信心倍增。所以孙云鹏对人说：“书记部是真心追求民主政治的人，绝对不是在政治上玩猴把戏的，是工人们难逢难遇的。今天如果再有人攻击书记部的话，那他们一定是不识好歹，不辨邪正的人了，我们一定不答应！”联老史（文彬）说：“今日中国整个工人阶级都应该与书记部结义，联合干咱们的事业。”因此他首先请求入党，曾三次到北大西斋找我谈话。

在游天洋烈士追悼大会上，高碑店工会代表康景星说：“书记部为咱们，咱们一定跟书记部一道，任何刀斧也斩不断咱们工人与书记部的关系”。此时工人们不只是对书记部有了正确认识，就是对一般部的关系也渐渐养成认识和分析能力。如某次北京几个议员到长辛店政治问题也渐渐养成认识和分析能力。如某次北京几个议员到长辛店工会参观，其中一位向工人讲话，题目为“劳工神圣”，说了些时髦的恭维工人的话。讲毕，工会负责人致答词说：“劳工神圣当分别去看，自由平等的劳动才是神圣，才是光荣，如果是受剥削受压迫的劳动，不自由的劳动，那便是耻辱，刑罚与苦役，资本主义统治下的工人哪有神圣可言？我们工会的目的是追求自由劳动，反对不自由的劳动！”某议员聆言，立感不安，其赞工人见解透辟，自悔失言。

北方书记部成立之初，成员只是为数不多的赤手空拳的男女学生，却面对着强大的北洋军阀、买办洋奴交通系。他们动员御用报刊谩骂诅咒书记部是一群乱党、叛徒与匪帮，人人得而诛之的国贼罪人。北政府所属军警机关经常搜捕书记部工作人员，置诸重典，投之监狱，并封闭其机关，制止其活动。当时特别敌视书记部的还有交通系的附和者工贼集团。

交通系原为梁士诒、叶恭绰、郑洪年等买办政客兼财阀所组织的小集团。他们在光绪末年进入邮传部为小京官，窟宅其间，结成帮派，入民国后助袁世凯称帝为恶，后又勾结安福系卖国借款，从中渔利。由于国营交通企业拥有独立生产工厂、铁路警察武装、职工教育系统、交通银行等庞大的机构，又兼经营陆海运输和电讯等，对外借债，获

有大量回扣收入，故在政治经济上形成特殊势力。铁路工人运动发展，直接威胁交通系本身利益，故当长辛店工会开始组织时，他们便全力抵抗，以企苟全禄位。交通系的组织是采取各部门分立办法，职工教育有扶轮学校、技术训练所等。职员有同人会，不与工人混合。在工人中间，开车、车务与工厂工头各有独立组织。如交通传习所、精业研究所、车务见习所、留法预备班，分隶于交通系直接领导。凡工人就业、升降级、生活福利、工资、教育等事均由该系掌握。他们根据派系路线垄断一切，顺之者生，逆之者亡！京汉铁路在组织工人俱乐部时期，即与交通系开始正面冲突。叶恭绰、郑洪年、赵继贤等策划反“过激党”、反工会，种种活动，层出不穷，荼毒工人无所不用其极，但其中不少阴谋行动被书记部击退。京汉路罢工前，交通系认为有机可乘，立即动员该系爪牙猛攻书记部，因此沿路多处机关被破获，北京、保定监狱中政治犯猛增，铁路工人失业数量亦有加无已。他们对工人所欠血债累累，陇海铁路秘书游泳（天洋），洛阳工会秘书王忠秀，津浦工会会长张振成，西直门工会秘书王净尘等被害，均为交通系所指使。李味农、伦克忠、胡信之等被杀害，亦与交通系有关。一九二七年夏北伐军到郑州，全国铁路总工会特派员在郑州组织工人罢工响应，事为交通系所闻，指使军警逮捕郑州铁路总办事处工作人员汪胜友、司文德，处以破坏交通罪，九月将汪、司二人枪杀于郑州长春桥畔。以上所举不过荦荦大者，交通系的罪行实属罄竹难书。

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所规定的革命计划，在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三年间的工作实践中，经过罢工斗争，改善了工人的经济生活，取得了工人的自由权利，提高了工人的政治地位。与此同时，北方书记部创建了全国铁路总工会、北方矿工会、各大城市产业与地区总工会，并进一步成立了全国总工会。由于上述工会组织与罢工斗争的发展，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北方广大地区内，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支部与社会主义青年团。这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中共北方区党的组织乃通过若干次重大的罢工得以迅速发展。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立与发展对团结青年学生工人固然起过很大作用，但在北方产业工人区域，特别是铁路矿山城市地区建立党与团的组织，则完全以几次重大罢工为契机。所以自从一九二二年间，北方路矿工会接连十余次的大罢工有如万弩齐发，表现出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巨大威力，同时也使中国工人政党名实相符地成长壮大起来。

中共六届中委史文彬（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在一九二九年回忆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时，写道：“京汉铁路工人与北京的革命学生（劳动组合书记部）在这样极困难的环境下艰苦地，忍耐地开始团结工人的力量，他们与交通系奋斗，与军阀

官僚奋斗，与厂长、站长奋斗，与当地的土豪劣绅、工贼等奋斗，在二年多长期奋斗中，大的罢工、小的罢工，以及一切合法的、非法的争斗，不知经过了几十次，才将北方全部铁路的重要站口工会先后成立起来，京汉铁路工会便是当时用力最多，工会力量较为雄厚的地方”（史文彬：《“二七”的精神是什么？》载《中国工人》第六期，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出版）。

当时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成为国内外革命工会联络地点。中国工会代表参观访问往来如织，南北工会通过北方书记部互相联络。各地工会发生罢工斗争时，北方书记部遂成实际斗争中宣传、组织、募集罢工基金的中心机关。同时各国工会与赤色职工国际派人来远东活动时，必来北京访问，与北方书记部交换政治情报、革命书刊，并由劳动通讯社发布有关新闻稿。国际工会代表如沙发洛夫（Safalow）、里卜西·士莫尔吉士（Smolgies）、西马文（Simaon）、尼科尔逊（Nikolson）、希尔曼（Hielman）、罗伯尔特（Robert）等均先后来北京访问，与北方书记部互相交换意见，讨论国际工运策略、罢工基金、工会统一战线等问题，并将讨论记录陆续在国际通讯外文版刊布。

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重心固然是放在工人运动方面，但是在工人运动打开了局面之后，又把力量投入到铁路沿线的广大北方农村，发动农民斗争，争取和保卫农民，特别是贫农和雇农的政治和经济的权利。

十、中共北方区委

党的第一次全国会后，在原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基础上，中央决定成立北京区委（包括山东）、广东区委、江浙区委、湖北区委、湖南区委等，以便更好地领导各区工作，开展各地人民革命斗争。

北京区委的组织及其成员的演变，是由简而繁，前后互有更迭。区委书记一直由李守常担任，我主持过区委组织工作，高君宇曾负责宣传工作，邓中夏负责青年工作，缪伯英负责妇女工作，李梅羹任区委秘书。一九二五年北京区委改称北方区委（这一名称与其管辖地区更相符合些，为叙述简便计，本章一律用北方区委名称）。以后区委成员增加，工作繁重，天津、唐山、北京、东北等地，亦先后成立了地委。

中共北方区委当年领导地区很广，除北京、天津、唐山、石家庄等顺直省地区外，还包括河南、山东、山西、陕西、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甚至和云南、贵州也有联系，除此之外还包括全国各条铁路等。

北方区委在组织上受上海中央领导，但还有它独特的地位。当时国际代表和苏联公使常驻北京或路过北京，因此在政治上还接受他们的指导，如维金斯基（一九二一年），马林（一九二三年），加拉罕（一九二四年）均驻过北京，一九二二年陈独秀也一度驻在北京。

当时北方区实行集体领导制，在党中央指示领导下进行工作。凡重要决策和方案，均通过会议慎重研究，详细讨论，多数表决，然后付诸实施，通过先后成立的工委、农委、青运、妇运、民运转交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共青团等机关贯彻执行，并责成各部门互相协作。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独秀以中央书记名义向全党各区发出通知，强调建党工作和开展工人运动，事前又在上海召开了工作会议，确定全党以主要力量用于开展工人运动，并建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

等，共庆胜利。

北方区委在守常同志领导下，集体领导形成制度，不论他外出度假或出国开会等，都能照样运行自如。一九二三年春，寒假期间，守常应邀去武汉大学讲学，借以扩大宣传阵地，我们也极力赞助他去。当时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正筹备建立京汉路总工会，临时时守常让我兼为主持区委工作。岂知守常走后，吴佩孚突然大肆镇压京汉铁路工人。面对这一白色恐怖，北方区委留京同志贯彻集体领导，应付局势，坚持工作，临危不乱，并积极开展斗争。这个期间，没有一个人擅离职守。这是守常平日对区委同志严格要求与训练的结果。

区委干部之间是团结互助的。在区委工作的许多人，都是守常的学生，大家对他非常尊重。他当时有教学工作，除北大外还在北高师兼课，课程排得满满的，社团活动以及社交活动也很频繁。因此，一些具体工作我们也都尽力承担，不去多麻烦他，事后向他汇报。

北方区委的各项工作

北方区委除了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外，还积极开展了包括上层联合战线、民族运动、军事工作和农民运动等各项工作，除工人运动将专文介绍外，这里仅对其他工作作一简单回顾。

中共北方区委成立以后，守常同志就很注重抓好上层联络工作，后来慢慢发展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即我党有关国共合作、联合战线的工作。这项工作对我们开展其它工作，争取朋友，孤立分化敌人，赢得有利的稳定局面是很重要的一环。守常在这方面独担重任，贡献最多。他在国共合作、主持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等一系列统战工作中，为党作出了重大贡献。

先是守常同孙洪伊、王乐平、汤化龙等宪法研究委员会的人（这些人原属研究系）有接触，他通过和这些人的往来，慢慢发展，认识了不少国会议员。

当时国会议员中，靠近共产党并和北方区委有往来的有张继（参议院议长），比较接近；吴景濂（众议院议长），若即若离；有山东王乐平、范鸿均、丁惟汾，河北江浩、王衡、李鼎声，山西周宾、焦易堂等二、三十人。北方区委对他们作了些团结争取的工作。他们在必要时就站出来帮我们说话，当时这些议员虽无实权，但在制造社会舆论，揭露敌人方面却有一定作用。一些公开活动，由于有他们的参加，扩大了社会影响。如北京第一次十月革命节纪念会，是在北京大学第三院召开的。守常同志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演。当时到会的人很

多，其中教育界、议会两院、各部会的人来了不少，他们有的还在会上发表演说，使会议开得很热烈。

再是一九二二年越飞大使到中国，在苏联大使馆举行了一次几百人的盛大招待会，到会的都是北京的名流，其中议员不少，我们也去参加了。蔡元培先生在会上讲话说：“我们大家济济一堂。”我们纪念“五一”的活动，不少社会名流也参加了。这些活动都增加了我们在社会上的影响。

我们搞开滦五矿罢工时，议员中也有帮助我们的，一方面他们在议会中发言质问当局，另一方面帮助我们募款。“二七”罢工时，我见到两三个议员骑着毛驴去长辛店，其中有一个叫王素民。当时环境很危险，这可不是不容易的。“二七”罢工后，长辛店举行追悼会，议员们也有去参加的。

还有一个银行界的议员对守常谈，你们太穷，工作开展不容易，搞群众运动，需要经费，我可以支援。类似这样的事情还很多，当时很有一些议员团结在北方区委的周围，为我们说话，提供一些情报，有时还作一些掩护工作。

做好上层工作，我们就能方便地了解北洋军阀政府中的一些内幕和动向，这对我们决定斗争策略是有帮助的。有些事我们知道后，就及时写文章在《向导》上加以揭露，唤起群众觉悟。当时帝国主义的情况，我们比较容易知道，因为帝国主义之间矛盾重重，他们常常要在报刊上互相揭露；而军阀内部的情况，我们就不容易知道。通过这些关系，往往就能知道军阀的内幕。如曹锟贿选一事，我们最是从议员嘴里听到的，于是我们就写文章揭露曹锟。我们有组织地把一些内幕资料写成文章，送报刊发表，这对直系军阀是一个打击。当时议员中的江浩、李鼎声、王法勤都是比较进步的，是守常的好友，其中一些人后来也加入了党，在国共合作中发挥了作用。

北方区委也很注意农民运动，守常曾对北方地区农民武装斗争作过一番深入的研究。根据北方区委对北方各省农村所作的详细调查，区委会议提出了加强北方农民武装斗争的报告，并作成方案付诸实施。守常根据该项材料写成题为《鲁豫陕等省红枪会》的文章，刊登在《政治生活》周刊上，作为当时指导农民运动的重要文献。

一九二五年守常刊布的《土地与农民》一文，长达一万余字。文中阐明了北方区委关于北方土地政策的决定与策略问题，提出以贫雇农为主导的农民协会，进行土地改革，与广东农民运动遥相呼应。北方区委还输送干部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为北方地区培植农运骨干。

北方地区是汉、满、蒙古、回、藏各族聚居地带，同时也是历代

民族矛盾集中的地区。当时（一九二三年）守常同志就注意到民族问题的重要性，指出应当在北京蒙藏学校发展党与团组织；培养民族干部，并建议设置在北方区委领导下的民族工作委员会，由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籍隶热河、绥远、察哈尔等地区的同学组成，其中有王仲一（张家口人）、韩致祥（热河人）、何资琛、李渤海等同志参加，并开展民族运动工作。当时在蒙藏学校中建立党、团组织，又在内蒙古旗盟中发展党组织，由是奎璧、荣耀先、吉雅太、乌兰夫等同志先后被吸收入党，自是内蒙古地区革命工作日有起色。一九二五年建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同时在喇嘛中进行了统战工作，使他们中有些人走上了革命道路。

北方区委对军事工作也是十分重视的。区委成立后，当时在组织部下设立一个军事运动工作小组，由我兼管。这时区委重视军运工作的主要原因：一是北方区是北洋军阀政府军事力量集中的地区，北方的革命斗争运动存在着随时遭受敌人武力镇压的危险；二是北洋军阀的部队内部不稳定，且士兵大都来自农村，有条件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北方区委进行军事工作，先是从各军事院校入手的。当时北方有保定军官学校、清河陆军大学、烟台海军学校、各省区的讲武堂等。这些军事院校招收的学员大多数是青年学生，我们利用这个特点，向他们宣传革命思想，渐渐地在学校发展起党、团组织，党的影响和力量也慢慢渗透到北洋军阀的部队中去了。如在曹锟的部队中，在冯玉祥的部队中和其他军阀的部队中，都有我们的同志在开展工作。另外，我们对北洋军阀部队的情况、兵工厂的情况，也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并派人打了进去。一九二五年，我们成功地在内蒙组织了党的武装队伍。到一九二六年，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区委的军运小组随之发展为军事工作委员会，其成员有我、张兆丰、张隐韬、郭增昌、李之龙、郭寿生、茅延楨、廖星庭等。

军事工作的初步开展，对我们组织罢工斗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在开滦五矿罢工中，由于我们做了董政国旅的工作，争取这个部队的部分军官和士兵同情工人罢工斗争，因此减少了许多阻力。同时，我们还派军事人员训练工人纠察队。

从一九二六年起，北方区委先后派遣部分军事工作干部和学员，到广州、武汉、内蒙等地参加北伐战争及革命斗争活动，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从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北方区委工作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大使馆案发生，守常被捕牺牲，北方区委工作受到了很大的挫折。

1 此段侧，作者补有“补兵运 烟台支部”字。— 补注

十一、中共北方区党报 —— 《工人周刊》

《劳动音》

《工人周刊》的创办要溯源到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早期的刊物《劳动音》。

一九二〇年上半年，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酝酿组成后，会员一面研究和译述马克思主义著作，一面特别注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与实践。部分会员分赴铁路、矿山和工厂进行调查、访问，获得了有关工人劳动、生活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也体察到一些问题，包括如何在工人中传播阶级革命的思想，启发工人阶级觉悟等。其中一些调查报告曾发表于当时的报刊上，但为数有限，影响也不够深远，大家感到有必要自办一个刊物，专门研讨和报导有关工人方面的问题和消息，以唤起社会的广泛注视。随后不久，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诞生，这种想法就更趋迫切，为创办一个旨在工人中进行革命思想教育的刊物，已是势在必行了。于是，与上海小组的《劳动界》、广东小组的《劳动者》创刊的同时，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劳动音》也应运而生了。它于一九二〇年的十月革命节出版了创刊号。我参加了编辑工作，但主要编辑者是北大学生陈德荣。陈是湖南浏阳人，北大旁听生，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

《劳动音》的宗旨，在它的创刊号上《我们为什么出版这个“劳动音”呢？》一文中，曾表示为“使国内各工人容易联络，及使留心社会问题的人，做研究的资料，使热心社会改革的人，去求解决的方法，更使世界的劳动者和社会改造家，明白我们国内的劳动真相，来设法帮助我们解决，共促文化的进步，世界的和平，人类的幸福。”

这时的《劳动音》，还不能完全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内部思想也不统一，多少带有学院式的气息和无政府主义色彩。

不久，发生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中无政府主义者退出的事件，这对于加强党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上的统一，无疑是好事。此后，《劳动音》的出刊工作就由我承担了。

《劳动音》在长辛店、南口等工人聚集区发行后，颇受工人欢迎，每期可销售二千份左右，办到五、六期时，因言论触及当政者，而遭北京军阀政府的查禁。有人说，后又改名为《仁声》¹继续出版，我已记不清了。那时我正忙于在长辛店筹办工人补习学校和组织俱乐部工作事宜。刊物没有能维持多久，就停刊了。

《工人周刊》的创办

次年的四、五月份，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一次会上，讨论到如何加强党的宣传教育问题。这一时期，我们在长辛店、南口等地的局面已经打开，长辛店的工人补习学校，已是遐迩皆闻，外地工人纷纷来信询问。工人俱乐部也在组织酝酿中，工人运动的经验急需交流推广。于是，有人建议恢复《劳动音》的出版。我建议新办一个刊物，作为宣传品，介绍各地工人运动的状况和经验，启迪工人的阶级觉悟，鼓动工人运动。既是党的喉舌又是工人自己的言论机关。对此，大家不谋而同，一致主张立即办起来。有人还提议办成一个《工人日报》，大家随即考虑到人力物力不济，一时不易成功，最后决定先办一个《工人周刊》，并推定我来主持筹办工作。开创的经费由同志们筹措，各人当场认捐，集资八十多元，已够办创刊号的费用。守常说：“最近可再拿出五十元，一定要办好这件事。”就这样，大家齐心协力开始了筹办工作。当时新闻纸是从日本或瑞典进口，价格昂贵。幸得北大印刷厂工人大力赞助，设法弄来一些廉价纸张，并承担印刷任务。经费方面还得到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和各地工会、俱乐部及工人的多方支援。

《工人周刊》从刊头到版面设计都是自己动手，甚至捡字、排印，我们也和工人一起利用业余时间去做，这样可以节省开支、缩短时间。创刊号的版面是由子青设计的，宋天放亲题刊头，由于刊头一时不易制备，他又亲自用木头雕刻出《工人周刊》四字，制成印版。这样，《工人周刊》终于按原定计划出版了。

创刊号大约在一九二一年六、七月²中间出版。

1 《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一文中提到此事，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文件》。

2 据现保存的最早一期第12号，按日推算，若不脱期，约在七月下旬，但当时由于种种原因，脱期是经常的。据《共产党》月刊第6号（1921年7月7日）报导：《工人周刊》已出六期，按此推算，当在五月中旬，但该刊本身已是延期出版了。

印刷与发行

《工人周刊》是党在北方的主要党报，它始终旗帜鲜明地宣传共产主义思想，鼓吹工人运动，因而为历届北洋军阀政府所深恶嫉视，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尽管秘密印刷出版，但仍屡遭查禁，报刊工作人员横遭缉捕、关监。加之，刊物经费主要仰仗党员自筹，经费十分拮据，以致经常脱期，停而复出不知几次。其艰难困苦程度可以想见。但报社同志屡败屡战使刊物得以继续出版，坚持下来。从一九二一年开始到一九二六年止，前后有五年之久，累计期数约在一百五十期以上，成为大革命时期持续最久的党刊之一。可惜这份刊物留传下来的期数很少，不到十分之一。最早的一期为一九二一年十月九日出版的第十二号，最晚的为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第一三七号，现在已经中国革命博物馆汇集整理，准备重印。

《工人周刊》在长期出版过程中，印刷地点几经更易，最早是在北大讲义课所属印刷厂印行的，曾得到当时任讲义课主任李辛白先生的协助。李系安徽人，一九一九年八月自办《新生活》周刊，常因拉稿关系与我认识，我曾为《新生活》写文和荐稿，往还较熟。因请他协助承印《工人周刊》和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一些文件书刊，李欣然同意。双方并言定印刷费用只算成本。印刷《工人周刊》事对外严守秘密。时北大印刷厂领班工人郝克勤系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借助于他，我们得到许多便利，每遇经费困难，一时难于筹措时，即可通融记帐。《工人周刊》的印刷多挤工余时间进行，工人亦多方赞助，有些人后来加入了工会或党组织。

郝克勤于一九二三年三月《工人周刊》被京师军警督察机关查封时，被牵连入狱，禁锢二年。中共北方区委设法营救，得释后，介绍郝到河南工作。在工作中郝取得中共党籍。后于赴洛阳途中为当地驻军所捕，解往开封。某军阀见郝佯示优容，郝向他侃侃而谈革命道理，冀以感动他，该军阀断定必为中共重要分子立判死刑，杀郝于开封南关外。

“二七”后北大印刷厂不能再承印《工人周刊》了，便改在虎坊桥商务印刷厂秘密印行。当时，那里已有一个工人党支部，后来又改在大栅栏里一个小印刷厂印行，直至一九二六年被军阀政府查封止。

《工人周刊》第一期试印一千五百份，逐期增加至二千份，后来发行激增，由三千份最高升到六千份，以后长期稳定在五千人左右。该刊发行范围不仅限于北方，遍及全国，远至东南亚、远东赤塔、海

参崴和法国等地华工中间，影响很大。

每逢《工人周刊》出版时，大家都齐集参加义务劳动。其中有的是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成员，或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和党小组同志等。大家齐心协力，包扎付邮，如遇所需邮票不足，即由参加人员自动捐赠，务期当天将全部《工人周刊》发出，才算完毕。

如遇星期天或假日，往往是我和宋天放、李梅葵、缪伯英、席咏怀、王复生等，分途乘车亲自将《工人周刊》带到长辛店、丰台、门头沟、南口各工厂送发，并就地征求工人对报刊的意见，和邀约通讯稿件。

当时，我们在各地都聘有《工人周刊》通讯员和经理发行人员。开始《工人周刊》是作为非卖品，由当地经理人员负责发送到工厂工人俱乐部或工人读者手中。凡索要者都可向当地经理人员联系。后来，随着读户的稳定，为减少同志们的负担，约在一九二二年后，改为销售，每份一枚铜元，基本作到独立维持。此后，仍由当地经理人员销售，他们既是经理者又是通讯联络员，成为《工人周刊》社的派出代表，他们还肩负调查工作，经常将当地工厂中工人劳动状况、工人的要求和困难反映到劳动组合书记部来。

随着发行量的增大，读者分布亦愈广阔，运送刊物的工作交由王文彬、孙云鹏、张清泰等负责。他们通过各条铁路机车与各路车务工会负责人进行运送，采用此种方法，迅速可靠，避免反动政府的检查，尚可节约邮资，简化手续。

声援罢工斗争

在《工人周刊》创刊号上，宋天放就手书有“为工人阶级的喉舌，为工人阶级呼吁”及“工人阶级第一份自己的新刊物”等语。此刊在其漫长的发行过程中，始终不渝地坚持了这一方针。

我为创刊号写了发刊词，其中大意是：中国工人阶级是我国历史上新兴的阶级，他赋有改造旧政治、旧经济、旧文化的重任，是革命的力量，但在历史舞台上，他长期受统治阶级的压迫与剥削，没有政治、经济的自由，本报是广大工人阶级的喉舌，将为保卫自身的权利而说话。

《工人周刊》从创刊起，就积极报道各地工人受剥削、受压迫的困状，刊载工人劳动、生活状况的调查，如对南口工人的调查报告。如介绍长辛店工人斗工贼、建立工人俱乐部的情况，特别着重报道工人反抗压迫、要求改善经济现状的罢工斗争。每有大罢工发生时，除

积极宣传介绍外，并号召各地工人团结起来，声援罢工斗争的工友。如对一九二一年十一月陇海路第一次大罢工，一九二二年的香港海员大罢工，京汉路八月罢工，京绥、正太、津浦、道清、粤汉、京奉等各条铁路的罢工斗争，开滦煤矿大罢工，京汉“二七”大罢工、焦作大罢工等，无不作了详尽的报导和声援，并由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派往领导罢工的人员亲自撰文报导。

一九二一年陇海路罢工期间，《工人周刊》从第十八号直到第三十号，连续报导罢工情况，并发表评论号召各路工友急起援助，直到取得胜利。我代表北方区委和以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负责人的身份，前往参加领导陇海路大罢工，曾以记者名义发表了《陇海路劳动考察记》，详记这次罢工情景与工人组织情况，后又由通讯员慕敢写了《各铁路工友应急起援助陇海路罢工》的评论文章，着重号召各路工友以实际行动从经济上予以声援，现分别援引如下，以窥一斑。

调查：陇海路劳动考察记（记者）

我此次因陇海路罢工，特专程前往考察，此行有几层重要意思：（一）调查风潮真象及援助。（二）调查劳动组合实况。（三）说明工人对于社会改造的重大责任。（四）宣传劳动组合的意旨。（五）介绍世界劳动运动潮流。现在漫游归京，特将重要各点简单记下，以供热心劳动人士参考。

查陇海路此次罢工前后经过十日，参加罢工工人计两千余人，路局损失约七十余万。真可谓在中国劳动运动史上一桩极可惊异的事了。但是问他们为什么能做这般巨大的事业，必须先明白他们觉悟的程度，要明白他们觉悟的程度必须看他们组织的情形。该路工人半年前，可谓毫无动静，数月以来，内受洋人的虐待，外感宣传的影响，沿路四大站（开封、徐州、郑州、洛阳）均已先后于一月内成立工人团体。现将他们组织的内容略述于下：

（一）开封

开封工人组合机关现名“老君会”是一九二一年十月廿一日成立的。地址原在车站南庙拈梅寺，十一月十七日移至鼎济亭第一号。计房屋十三间，每月房金十五元，内分账房、招待室、老君堂、演讲堂、教室等。……会员一百八十人，会长林芝荣，副会长张良彦、熊福海，会计方立荣、凌必应，正干事魏荣山，文牍任子湘。行车升火的工人有五十人，小工六十人，大工三十人，木工二十人，铁工二十人。行车工人的工资，自二十六元至四十六元，小工的工资自七元五角至九元，升火工人的工资，自十三至二十一元，大工的工资自十九元半至三十元，木工的工资自十二元至二十元，铁工自十八元至二十七元，各种工人都有家眷，家眷概居工厂附近。工人子弟，多半在私塾念书。会员每月捐一工工资，会中每月共收一百八十元。每星期集会一次，每晚八人值日。会中设备了许多报纸乐器，每星期集大会一次，每年阴历二月十五全体宴会一

次。

(二) 徐州

“徐州陇海工业补习所”是该处工人一九二一年十月十日成立的。地址在北关外北站观音庙，计房十一间，每月房金十元，内分讲堂，会客室，寝室等。……会员三百人，行车升火工人五十人，大工一百五十人，小工百人。他们的工资：升火工的工资自十二元至廿一元，行车工的工资自十八元至四十元，大工工资自十八元至五十元，小工自六元至十元半。会中的正会长是宋桂森，副会长宋启勋、朱明勋。总干事代表陈仲山，副干事代表陈凤、王汉卿、杜玉田、王思义、鄂明喜、傅阳春、朱占魁、王璉魁、张云峰、谭金玉、黄金才。评议员六人。调查刘吉祥。招待三人。干事员二十六人。文书王哲堂。庶务员二人。会员每月捐一天工资，会中每月共收百三十六元。开支相同，内中设有阅报室。藏书很多。集会的期间不定，遇着相当的时候随时召集。

《工人周刊》第22号 1921.12.18.

评论：各铁路工友应急起援助陇海路罢工（慕敢）¹

这次陇海全路工友罢工的举动，是为铁路工人争人格，争生存的最大关头。本来无论何处工友都应该向他们表十二分的同情，然最当急起援助的便是铁路工友。因为他们这次的起因是受总管虐待，生活不安，等等。这些事既可在陇海路发生，也可在京津、京奉、京汉等处发生。外路工人如果今天袖手旁观，往后这些虐待轮到自己的时候，也会无人帮助你们了。所以现在表面上虽是援救他人，实际却是为将来援救自己。也许因这次各路互助的声势，可以增加铁路工界的威权，使资本家畏惧，可以无形中消灭将来的虐待。那么，援助陇海罢工，更是各路工人应该做的事了。

至于援助的办法，各地工人也有已行的（参看本号劳动新潮栏陇海路罢工续志），大家自然可以仿效，但是最要紧的便是援助经费，因为罢工中工友们的生活费和其他的活动费，在在需钱，如果经费不够马上便难支持，支持不住便要失败了。如果失败那就不独陇海工人的不幸了，恐怕凡是铁路工人都永会变成奴隶牛马。工友们！这是大家的生死关头，大家努力捐输罢！攻破这个关头，以后的好处正多着呢！

《工人周刊》第19号 1921.11.27.

一九二二年一月爆发了著名的香港海员大罢工，我们闻讯后，即在《工人周刊》上广为介绍，发表综合文章《香港海员罢工的现状及各地援助的踊跃》、《香港海员罢工快要得胜利了》、《海员罢工之最后五分钟》，一面鼓舞罢工斗争的海员工友，一面教导各地工人从声援中吸取罢工斗争的经验教训，如平日要多集“准备金”、要注意

¹ 此处，作者补有“工刊特约通讯员，系安徽人”字。——补注

加强与各工人团体间的联合、只有组织强大才能与资本家斗争而取得胜利，从罢工中学会罢工。

一九二二年十月爆发的开滦五矿同盟大罢工，《工人周刊》对此不遗余力，派遣记者及其所属“劳动通讯社”人员，分赴天津、唐山进行采访报导，并向全国各大报刊发稿。可惜这一期间的《工人周刊》荡然无存，不能引述以飨读者。

一九二三年举世闻名的“二七”斗争，《工人周刊》更是站在前列。从一九二二年底就不断报导京汉路总工会各地分会筹建和活动情况，著文《为什么要组织总工会》号召进行“行业”的大联合，还积极筹备“全国铁路总工会”并对此进行讨论，借以提高广大工人对总工会的认识和觉悟。由于《工人周刊》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政府的坚决斗争态度，号召工人逐步由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深为反动军阀政府所嫉视，京汉路大罢工伊始，《工人周刊》就迅即遭到军阀政府的残酷镇压，无端加以“实含过激主义、关系地方治安颇大”的罪名予以查禁，工友遭逮捕，编辑人员遭追缉，致使本该一月底出版的第六十三期无法付印，刊物濒临绝境。

《工人周刊》全体同志，经历“二七”惨杀后，部分同志遭监禁，余下同志不顾军警缉捕，仍然坚守岗位，再接再厉，一面进行大量善后救济工作，一面冒着危险迅速编辑了《京汉工人流血记》一书，揭露敌人的狡猾凶残。经过重整旗鼓，继续斗争，此书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即由北大印刷厂工人奋力赶排出版。该书成为我党全面报导“二七”斗争最早和最翔实的一本历史文献。

接着，于是年五月一日，又使延误已久的第六十三期作为“五一特刊号”和读者见面了。该刊转载了我写的《京汉工人流血记》的自序，君宇、树彝、先瑞和我都在刊内撰文抨击吴佩孚军阀政府的罪恶行径，并总结了“二七”大罢工的教训，指出进一步开展斗争的目标。我以文虎的名字写了《年年五月一日》一文，痛斥了大小军阀和帝国主义者们的罪恶。从该文可以看到当时的宣传情况。该文的内容如下：

“自一八九〇年五月一日起，这个五一劳动节来了又去，真不知有几番岁月了。我们对于平常的节日，总不免带有许多伤感过去的情绪，只有对于五月一日这一天，却是一年一年的翻新，很含有未来的意义。因为自一八九〇年到现在，世界的无产阶级是一天盛似一天勃兴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已经占据世界最广大的疆土了，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已经在苏维埃俄罗斯之前发抖了。所以我们以过去的五一推测未来的五一，是可以预卜资本主义的灭亡的。

我看看桌上的赤色工人日历，知道几年来的今日，真有许多壮伟的举动，是很可感念的。单就德国说，当一九一六年德国的军国主义疯狂的时候，全欧

洲被战云遮蔽了资本主义的各国政府拿爱国主义的招牌鞭策成千成万的青年工人和农民到战壕中去死。这些被骗的人如饮狂药一般，视死如归去替资本家军阀拼命，谁也不敢说一个不字。独有柏林的共产党和工人等，看明白了这个骗局，乘着‘五一’这一天，结队千万人，举行要求和平的大示威运动，要给资本家军阀政府一个很大的打击。这次运动死伤很多，我们劳动界领袖最可钦佩的加尔·李卜克内西特就在这天被捕了，后来更被杀害了。从此德国百年来的霍亨坐伦皇朝也随着倒了，德国的共和国出现了。

一九二〇年今日，正当苏维埃俄罗斯内忧外患交乘的时候，欧洲各国正竭力图谋扑灭劳农俄国的基础，不断的明抢暗劫向苏维埃俄国进攻，那天就有德国共产党和独立社会党在柏林举行赞助苏俄的大示威运动。这次示威运动的结果，唤醒许多欧洲的工人和资本家隔绝，使劳农俄国明白变成世界工人的祖国，使许多不成材的国际主义者受了一场很大的教训。

到了去年今日，德国全部，无论是乡村也好，小市镇也好，到处均有三个社会党人的大队伍游行示威，罢工巷战，弥漫全国，也是给了全世界资本家军阀一个很大的威胁。

劳动界的兄弟们啊！五月一日四字真是启示我们向仇人进攻的符咒啊！你们有未了的心事么？有不两立的仇家么？封闭我们五十多个工会的是谁呢？杀我们开滦煤矿的十数个劳动弟兄的是谁呢？枪毙我们的指导者施洋的是谁呢？杀我们江岸、辛店工友四十余人的是谁呢？驱火车头轧毙粤汉工友的是谁呢？囚辱我们的兄弟在保定军法处和其他监狱的是谁呢？开除我们无数的工友，使我们全家冻饿的是谁呢？伙同仇人们压迫我们的又是谁呢？兄弟们！我们的仇家谁也知道是现在到处的大小军阀和军阀的走狗，洋资本主义者更是我们仇敌中的最厉害最可恨的啊！

五月一日告诉我们向仇敌进攻了，我们快挽着手前进罢！”

“五一特刊号”在《五月一日》的简介中，说明“五一”节的来由，并号召市民起来争取六件事：

- (1) 农工集会结社自由！
- (2) 打倒军阀——吴佩孚萧耀南曹錕！
- (3) 释放京汉罢工被捕者！
- (4) 恢复各铁路及各业工会！
- (5) 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及罢工刑律！
- (6) 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在该月出版的《工人周刊》第六十四期上，我以文虎的名字写了《本号发刊的话》，讲述了刊物发行的困难，准备改为出版有关劳动的书籍，当时已出版的有《京汉工人流血记》和《五月一日》两种。现将该文录后：

“亲爱的阅者诸君！大家想必都知道，‘二月七日’惨杀以来，我们劳动界的形势是怎样的情形了。一方面，我们劳动界的兄弟们看清了敌人的真面目，无情地向军阀，官僚，资产阶级和洋资本主义进攻，一方面仇敌方面的反动也是很厉害的：囚辱我们的同志，断绝我们的交通，禁止我们的言论，甚至要将我们的工会全数摧残。在这样情景之下，我们发表言论的刊物自然更困难了。本刊是北方劳动界的言论机关，我们相信曾经对于我们劳动界有不少的贡献，我们的阅者至少在五千人以上。但是这几期来，因为印制的监视，邮局的检查，及本社所受万恶政府军阀种种摧残和压迫，竟使我们不能如期出版，想读者诸君早已明白这些原因了。所以本刊在此期内，便改变计划，刊行有关劳动的书籍，现已出版的有了两种。我们的意思便是要有系统的宣传我们的主义，想尽点较大的义务。

但是就最近时候看来，外界要求的十分迫切，使我们这个周刊再不能不按期出版了。不过因为我们的精力大部分既用在编书上面，所以本刊的篇幅更不能不改订一下。故自本期改成现在的新篇样。我们一方面竭力图谋对劳动界尽本社原来应尽的义务，一方面还请读者原谅和指教。”

我们还看到，在第六十四期的杂感《忘不了》中说，“我们相信无论处在何种轻视和压迫底下的工人，对待自己的权利一定忘不了。……现在潜伏不动的工人，对于这些不共戴天的仇敌，一定忘不了。为反抗和支配而结合的营垒——工会，被摧残了，封闭了，这是工人的第二生命，我们相信除一时都死掉，绝了种，不然，图谋恢复和发展的思想，一定忘不了。”又在《慰勉京汉工人几句话》中说“各路团体都坚如铁石，且都能表示他的精神所在。我们京汉路工人遭了这次惨杀后，受了种种困苦，团体进行，势不得不暂取守势，然亦事在人为，他们各路都能干，难道京汉路就永远除外？干！干！干！恢宏前业，慰死的灵，吐活的气。起！起！起！大家联合起来，干事要干到底。”《去年“五一”的回顾谈到今年“五一”》中说“想要自己解放自己，就要自己得着支配权力。人类自从有史以来皆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一阶级征服一阶级，现在无产阶级要消灭经济政治上的压迫，惟一的方法，就是靠自己勇敢的精神，自己跑到权利路上去，掌握政权，毫不容讲客气就算举起铁腕权力，屈服一班被支配阶级，到那时无产阶级方可仰首扬眉吐气了。”

在这两期的《工人周刊》，集中反映了中国工人阶级经过“二七”惨案后的风貌，他们并没有被压服，而是对反动军阀怀着满腔的义愤和切齿的仇恨，并且正以大无畏的英勇气概，准备重整旗鼓继续斗争。同时也认识到“要消灭经济政治上的压迫。”唯一的方法就是夺取政

权。表明我国工人阶级，经过“二七”之役更加觉悟、更加勇敢和更为自觉了，工人阶级已成为我国政治舞台上—股不容忽视的伟大力量了，我们党也经受了锻炼而且成熟了。回顾所走的历程，也不过三年时间，这一进步是何等巨大！

坚持阶级教育

《工人周刊》始终把阶级教育放在优先地位，报导和声援各地工人罢工斗争自然属于其中内容之一。另外，在报导世界各地的工人运动的同时，揭露帝国主义和形形色色的资本集团和军阀们的伪善面目，也是启发工人阶级觉悟的重要方面。在每期的《劳动新潮》和《调查》、《特载》等栏内，都载有各地工人的组织情况和活动。在《评论》栏中，编辑以评论方式对该期某些内容加以引申，如之君的《敬告陇海中路工人》（第二十号），《读了〈本社旅行记者的来信〉以后》（第二十一号）等，我在第十二号中以景云的笔名写了《我们工人所感觉的“双十节”》—篇评论，揭露军阀官僚的虚伪性，工人不应盲从附和，振奋起来求自身的解放，涤荡“双十节”的污痕，重新估定其价值，其全文如下：

“我写下这个题目，心中说不出有无限的感叹，我们如果在这个庆祝声中，昧着良心，追随大家闹嚷一回，倒也没有甚么可说；这‘双十节’到底有什么，无意识的举动，我们是不甘附和的。简单一句话：这‘双十节’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工友至少应该认识他一下才对。

说到这里必定有人以为奇怪，定会问到：‘国庆日岂不是已过了十次，难道现在才去认识他？’这却不然，听我细说。

大凡一个纪念，必有他自身的真正价值，换句话说：我们所纪念的日子，必定他实在值得纪念。如果他本身的价值于我们无甚重要，甚至于有害，我们反去纪念他，这不是很愚的举动吗？我们是工人，试想当年十月十日所谓‘革命’于我们有什么关系？一流士绅阶级个个存着功名利禄的心事，摇着革命的旗子，干他们自己的把戏，除却少数死事的外，一旦高官厚禄便什么都抛却了。他们的事业不过写了一块共和招牌，连清室皇帝的名号都没有动弹着；他们的伙伴大部分厚拥资财在租界内堕落，八九年刀兵水旱尽交给无辜的柔懦的同胞去承受。——然而这还不过就普通的情形说说，论到我们工界的事那更不消说得了：我们的罢工权，他们的法律承认了么？我们生活卑陷，他们行政上看到了么？大多数国家工人的参政权他们容纳了么？我们颠连困苦的境遇，是不是做了他们的牺牲？……不必细表，大家一想，便知道这流士绅阶级对我们的冷

酷了。那么，他们的举动在我们看来，基本上已无甚价值，还值得去纪念吗？

回想今日以前，年年今日，我们每次都要加百十倍的痛苦，但是每次总有些虚伪盲从的庆祝，甚至全国烽火，军阀官僚私斗最厉害，人民被戮辱最残酷的时候，偏偏北京的长街马路还是满目‘普天同庆’，‘共享升平’的许多彩楼，这样无耻的行为，难道不是无聊的吗？是工人应该盲从的吗？

工友们呵！这不值得庆祝的纪念日，我们再也不要无意识的附和他了。我们倒要借着这个机会，唤醒同阶级朋友的觉悟，示威！反对！求我们的自身幸福，扑灭士绅阶级，解放全人类，才是我们正当的态度！所以我们希望全国工界同胞自此以后振奋，团结，发一个大誓愿，到明年今日至少要做到我们的事业一部分，要扫荡廓清十月十日的几条污痕，要重新估定十月十日的价值，这才是我们的伟大的责任。

进一步说：我们要将这类的纪念节的精神，完全改造（如法、美共和成立纪念日，南京政府成立纪念日）……务使部落的化为国际的，阶级的化为平民的，暗淡的化为光明的，简单一句话：我们有一天要联合世界的工人，一脚踢翻现代恶社会的种种坏制度，建设劳动者理想社会，这便是我们理想中的大可纪念的日子了。”

《工人周刊》以通俗易解的形式，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十月革命的道路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如江因（何孟雄）的《无产阶级战术》（第三十号），在分析了资本主义“营寨”赖以统治的基础，是“组织得很精密的”以后，接着肯定了工人阶级是人类多数，必胜无疑，但要战胜资本家只有联合起来组织无产阶级自己的军队，进行阶级斗争，第一步，把国家变成无产阶级的国家，定出无产阶级的法律，剥夺有产阶级的所有权，工厂中一切的管理归工人自己去管理……这种以马克思主义鲜明的阶级立场，对工人进行完整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思想教育，成为《工人周刊》的经常内容之一。又如江因在第二十九号的《谁是工人之友？》—文中，教育工人在为自身解放斗争中，如何识别真假朋友，不致上那种打着工人之友的旗号，实际上却是资本家的走狗和暗探的当，只有象马克思、列宁这样的共产党人才是工人求解放的真正朋友。

《工人周刊》在积极宣传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建的必要性时，还翔实地教导工人如何按照民主集中制的方式，组成全国铁路总工会。

此外，《工人周刊》还辟有专栏《工人常识》，向工人教授文化、技术知识。《工人谈话》、《工人之声》专栏则直接刊载来自工人的要求和呼声。《工人周刊》当时已成为工人不可缺少的读物。

工人心目中的《工人周刊》

《工人周刊》自发行以来，备受工人的爱戴和欢迎。各地工人把它作为自己的指导机关，成为中共北方区委和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工人中的代称。如在一九二一年陇海路罢工胜利后，陇海路工会致《工人周刊》社的函中称：

“……同人饮水思源，知道此次罢工的所以致胜，是由于各地的联络；但是联络的指导，则赖贵社的功劳，同人深感大惠，没世不忘！但是同人知识浅乏，以后究竟应怎样进行？千祈贵社不弃，时常指导！则同人更感激无量，此致大安——洛阳陇海路同人俱乐部启”。类似的函件，不遑悉举。

工人和《工人周刊》关系十分亲密，工人对《工人周刊》爱护备至，各地工人生活尽管十分困苦，为了使刊物得以维持，不时捐赠款项，集腋成裘，三元、五元不等，补助刊物邮费纸费，一般我们都在《工人周刊》上予以刊载、鸣谢。《工人周刊》也不负工人愿望，如给郑州京汉工人俱乐部的复信（十九号）中重申“敝社当不畏强御，申张公理，拥护工人，特此奉闻。”它以实践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工人周刊》篇幅适度，文风最讲实际，体裁自成一格，长短不拘，其长文如江河，波涛滚滚，短文似剑光火花，笔触犀利，词旨明白畅晓，言简意赅，最能指导工人运动的斗争方向。

《工人周刊》每遇重要文章均经编委会成员集体讨论，然后才发稿。因此该刊文章在工人中极有威望，并受到各方赞誉，认为她“办得很有精神”、“不愧乎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是全国劳动运动的急先锋”，是“为全国铁路工人谋利益的”。这些誉称，对于《工人周刊》是当之无愧的。

《工人周刊》社与劳动通讯社

一如前述，《工人周刊》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刊物，但是以《工人周刊》社的名义对外发行。一九二一年十月，中共中央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各地分部，大力开展工人运动，中共北方区委也在前后建立。一次区委会议上，决定扩大《工人周刊》的发行，扩大《工人周刊》社，凡是各地工会或工人愿意加入的，都可以成为社员，作为社的通讯联络员和经理发行人员。同时在《工人周刊》上发表启事如下：

“本社现改为全国工人言论机关，内容愈加扩充，并于介绍各地

劳动界消息尤其注意，国内外同志如有以各该地劳动界新闻投稿的，毋任欢迎。”（第十二号）

这时的《工人周刊》已成为中共北方区委的党报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机关报了。不过对外则仍以“工人周刊社”名义出版。而“工人周刊社”也就成了北方劳动组合书部的别称。

《工人周刊》设有编委会，一九二三年前曾任过编委常委的有李守常、宋天放、高君宇、何孟雄和我，我担任主编。除上述诸人外，还有编委杨明斋、缪伯英、陈为人、吴汝铭、王忠秀、李梅羹等。发行部负责人刘伯青，成员有郝克勤、陈楚梗、舒大楨、李启元等。

在《工人周刊》编委会下附设有北京劳动通讯社。劳动通讯社在各地招聘有通讯员和特约记者，他们采集了大量的新闻报导，除部分供《工人周刊》选用外，还向国内各大报刊如北京的《晨报》、上海的《申报》等发稿。劳动通讯社的编辑委员会成员有王有德、高君宇、韩麟符、吴容沧、王儒廷、于方舟、黄璧成、缪伯英、李梅羹、黄绍谷、邓仲懈、梁鹏万、阮章、黄日葵、杨明斋、马素英、王立刚、王懋廷等。发稿负责人为刘铭勋。各地特约通讯员和记者有王英谱（台湾人）、李凤池、高步安、金太瑞、许兴凯、阮啸仙、赵醒侬、孟冰、李书渠、李树夷、席咏怀、唐徽等。

一九二三年九月“三大”会后，我调往中央局常委工作，《工人周刊》交由吴汝铭负责。一九二四年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工人周刊》改为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的机关刊物，归属中共中央铁路职工委员会宣传部。时我兼任铁委宣传部长，曾兼管过一段时间，编辑发行地点，亦由北京迁往当时铁总所在地郑州。后来，《工人周刊》于一九二六年改由李善元任主编，编辑发行地点迁往天津。一九二六年北方局势益严重，大部分北方干部南下，《工人周刊》在一九二六年底停刊。

“劳动通讯社”后与《京报》合作采访，邵飘萍亲加指导，业务蒸蒸日上，邵于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六日被北京政府所杀，其“罪状”云：“邵振青勾结赤贼，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枪决，以昭炯戒。”故邵实为“劳动通讯社”而致死。邵既被杀，劳动通讯社被迫停止发稿。

《劳动界》与《劳动周刊》

《劳动界》周报创刊于一九二〇年秋，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出版，主编为陈独秀，编辑有：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吴芳、李少穆、

李震瀛、陈为人、袁笃实等。该报于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五日创刊，一九二一年一月十六日停刊，共出二十三期。因独秀于一九二〇年底已离沪去粤，所以未能继续出版。

《劳动周刊》创刊于一九二一年八月廿日，由上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出版，编辑主任张国焘，编辑李震瀛、李启汉、李新旦、刘恩人、董锄平、汪洋、韦素兰、杨慧贞等。先是李震瀛为主编，一九二二年春李震瀛调来北方，改由李启汉主编。一九二二年六月李启汉被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该刊亦于六月被勒令停刊。

有人说，《劳动周刊》被封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迁至北京，《工人周刊》改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刊物。实际上，《工人周刊》早在一九二一年十月以前，即发表启事改为全国工人言论机关，远在《劳动周刊》查封以前，二者并无关联。另外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与各地分部并无垂直领导关系，从未发号施令。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要管上海及其附近地区的工人运动，各地分部则受当地中共区委和中央领导。一九二二年六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被查封后，已属名存实亡，以后只作为一种名义，用来对全国性工人活动发布文告而已。

《工人周刊》建刊时的主要编辑人员

高君宇——高君宇原名尚德，一八九六年生，山西静乐县人，山西第一中学学生，一九一八年进入北京大学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之一，担任学会英文翻译组长，任《工人周刊》编辑。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日出席莫斯科远东大会，返回后担任北京《政治生活》周报主编，并加入书记部工作，自强不息，闻过必改，对工人革命有卓识，一九二四年尝云：革命基本问题是怎样善于运用政权使为人民创造真正的幸福，物质平等与生活自由。生前他又说：“夺取政权是第一步，正确发挥政权作用更为重要，善于运用政权主要是珍惜人民权利。我们革命不只是继往而着重开来，不择手段维持政权与运用权术数是革命的敌人。只有诚恳与永恒地为劳动群众，全面消除剥削与压迫，其他的任何形式独裁道路都走不得，如此才能免于堕落。否则彼此以诈伪相尚，革命便失去诚心，人民痛苦亦将原封不动。这样，以革命始必以反革命终，如此陈陈相因，实属出尔反尔，此与过去朝代更迭何异？何必多此一举。”因此，君宇痛恶一切偶像与专制。君宇在斗争中废寝忘餐，为工人运动打头阵，积极参加工人运动与“二七”斗争，曾为我著的《京汉工人流血记》写后序一篇，强调革命性的党的作用。后因积劳体弱，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五日以肠炎病在北京协和医

院逝世。君宇自题像云：“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为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即此可以想见其为人。君宇去世后，其未婚妻石评梅（山西人，女师大学生）经理其丧事，葬于北京南郊陶然亭锦秋塾畔。一九二八年石亦病歿于京师，骈葬君宇墓傍。我于一九三一年过北京时往谒其墓，憩慈悲院，悼以诗云：

浩浩愁怀棘满园，城南零落旧山川，
一腔孤愤双人冢，寂寞寒烟又几年。

杨明斋——山东平度人，清代秀才，家贫，少时出国至海参崴作华工，俄国十月革命后，参加革命，徒步西行经黑河、赤塔至莫斯科参加工作，为苏俄党员。他曾向守常道及经历，守常大加赞赏，称他“万里投荒，一身是胆”。一九二〇年返国，初任国际代表翻译，继留北方，在济南发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旋到北方区委工作，亦在《工人周刊》工作。杨时年已四十许，独身无家室，朴实好学，具工人本色，住北京地安门大街鼓楼福祐寺偏院，翻译著述所有收入除少数自维生活外，余数均作为党费交出，暇时为书记部同志讲解俄文语法课程，炕头中西书籍散乱。他无嗜好，所著《评中西文化》一书，蜚声国内，其书内容分四卷十六章，一评“中西文化及其哲学”，二评“先秦政治思想史”，三评“农国辨”，四总解释。全书主要在解析中西文化之由来及其社会进化史之结果，并说明中西政治、经济民族性格不同之所由然。

明斋平日自甘韬晦，埋首革命，后来不知所终。

云南三王：王复生——字儒廷，原留学越南中学，后来返国为北京大学法文系学生，深邃于法国文学，主持法文翻译事。其弟懋廷亦在北大法文系。一九二六年任黄埔政治教官，后改名王德三，任云南省委书记。又一九二一年王有德亦为《工人周刊》工作，自称：“拙有余而巧不足”，主持德文翻译组，对一切新要求有从头来的勇气，初进北大时欲习德国文学，但德文无根底，他遂从头学习德文。以上三王均云南人，即所谓夜郎三王，擅长文字，醉心民主，均长期在北方党报工作。¹

¹ 此段侧，作者补有“改写”字，段末补有“庶咏怀”字。——补注

十二、陇海铁路大罢工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爆发的陇海路大罢工，似惊雷震响在西起观音堂（河南境内）东至连云港的千里铁道线上，自此以后，我国工人运动走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

这次罢工的最初发动者是洛阳大厂的工程师游天洋（游泳），罢工开始后，中共北方区委立即派我前往协助和领导这次罢工斗争，罢工坚持了近十天，最后以实现工会提出的经济要求和撤换法人总管若里等条件而胜利结束。

这次罢工可说是我党初出茅庐，直接领导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罢工斗争。当时距我党正式成立还不足四个月，党员人数很少，没有实践经验。但是同志们却抱着对马克思主义的笃实信念，以不计成败，勇往直前的精神去干，最后终于开拓了道路，团结统一了陇海全路的工会组织，涌现和锻炼了一批受群众拥戴的党的优秀战士，为北方地区以后进行的大小数十次斗争奠定了基础。取得这些成果是我们开始所未料及的，也使我深深感到马克思主义只要和工人运动相结合，就会出现奇迹般的力量，改变工人阶级和它的政党的面貌。这和当时的一些空谈的改革家们和所谓的社会党人以及国民党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陇海路工人的境况

陇海铁路是横贯河南、江苏二省的国民经济大动脉，它在郑州和徐州与京汉铁路和津浦铁路相交，在政治、经济、交通运输和军事方面都占有重要地位。

当时，陇海铁路被三大反动势力统治着。陇海铁路是靠比利时借款修建的，根据合同规定，比利时的资本家及其代理人掌管着路政大

权。他们掌握着铁路上的计划、人事、财务、材料、行车调度的权力，事实上又有确定铁路客货运价的实权。这是陇海铁路上的第一种势力，也是最主要的反动势力，代表着帝国主义的利益。第二种势力是北洋军阀政府以梁士诒、叶恭绰为首的交通系的政治官僚集团。当时，北洋军阀政府内阁虽然经常更换，但交通总长多由交通系充任，他们的爪牙布满了各条铁路，在全国铁路上的势力已根深蒂固，对陇海铁路进行着严密的控制。一九二〇年七月直皖战争后，交通系在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支持下组织了内阁，由梁士诒任总理，叶恭绰任交通部总长。交通部设立职工教育委员会，在各路开办学校，如郑州就组织了“交通传习所”，在陇海铁路上，指使其爪牙利用同事同乡的关系拉拢一部分工人组织团体，破坏工人阶级队伍的团结，争夺铁路工人群众。第三种势力是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军事政治集团。当时，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的军队进驻河南，坐镇洛阳，在陇海铁路沿线的洛阳、郑州、开封、商丘等地驻有重兵，对河南和陇海铁路实行反动的统治。这三种反动势力之间虽有明争暗斗，但对陇海铁路工人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却是完全一致的。

陇海铁路工人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下，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生活上受虐待，过着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生活。陇海铁路工人的劳动时间很长，全年的工作日数为三百四十天，星期日亦不停工，多是每月在分班时休息一日或两日。工人又被分为长牌工（即长期工人）和短牌工（即临时工人），每天的劳动时间一般都在十至十二个小时，最长的达十六、七个小时。但工人的工资却极其微薄，被帝国主义分子称为“廉价劳工最好的猎取市场”。铁路上雇佣外籍人员很多，而比我国人员的薪金要高数十倍或上百倍。例如：当时外籍会计处长月薪为二千六百法郎，车务副处长月薪为二千四百法郎，如以六法郎折合一银元计算，均在四百银元以上，并且还享受有回国休假、旅游报销等待遇。而中国的一般职员月薪为三十二元至四十元，工人的薪资却仅有四元至十二元，悬殊如此之大！而当时的米价每石要十六元。我国工人生活之苦可以想见。工人为了生活，不得不仰鼻息于工头。工人为了进厂工作，必须先向工头缴纳一笔贿赂金；进厂后，为了保持工作，还须给工头一笔酬劳金，逢年过节要送礼物。河南地处中原，是军阀混战的战场，直系军阀吴佩孚不仅截取车辆，强迫工人运兵运粮，还经常霸占路款，克扣工人工资，有时只发给工资的八、九成，拖欠薪资更是常事。他们奴役和惩罚工人的手段，更是花样翻新，无奇不有，对工人任意虐待、污辱、打骂和惩罚。工人在政治上也毫无自由可言，组织工会和罢工，是非法的。陇海路局以北洋军阀政府制订的“暂行新刑律”、“治安警察条例”、“治安警察

法”为依据，明文规定：同盟罢工者，要判处有期徒刑或处以罚金。“最高当局为维持社会秩序的安宁……决定采取一切力量，来制止一切工人的集会及行动。”甚至明文具体载明禁止工人在以下情形中举行集会：“有领导怠工情形者，有领导罢工情形者，有领导要求增加工资情形者，有破坏社会秩序及公共安宁者，有违反一切良好道德习惯者。”这种残酷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生活折磨，使陇海铁路工人心中蕴藏着民族恨，凝聚着阶级仇，反抗的情绪十分激昂，一触即发。

中共北京区委和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十分重视陇海铁路工人运动的情况。当时的陇海铁路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非常尖锐、非常突出的地方。由于陇海铁路工人长期受帝国主义、资本家的剥削压迫，具有强烈的反帝反侵略的民族意识和阶级觉悟，最容易接受革命思想。加之，陇海铁路有五千左右工人，又多集中在洛阳、郑州、开封、徐州等地，有利于阶级的团结和战斗，易于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当时几年间，全路有些地方时而发生过一些自发性的小型怠工斗争，带有浓厚的帮会色彩，迫切需要有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基于上述特点，我们把陇海铁路作为开展工人运动的重点地区之一。

早在一九二〇年秋，与我党有过联系的唐山交通大学毕业生游天洋同志到洛阳陇海路局工作。他平日利用自己工作的方便，深入调查工人的劳动、生活情况，了解工人的要求，宣传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与此同时，我们通过《工人周刊》征聘了一些通讯员，并在洛阳、郑州、开封、徐州等大站设点，设有经理人员，散发《工人周刊》，经常不断地介绍国内国外劳工解放运动的消息，开拓工人的眼界，促使广大铁路工人从沉沦于数千年的旧传统中觉悟过来。还邀约洛阳、开封、郑州等地工人来长辛店参观、学习办工会的经验，为此，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进行了一系列工作。

罢工的缘起与爆发

一九二一年三月，陇海路局把洋员若里派到洛阳充任机务厂总管。他为人奸险，一味强横虐待工人超过历届前任。他还使用了法属安南殖民统治的一套方法，这就更加剧了这一地区的民族和阶级矛盾，促成工人迫切要求组织起来，为自身的利益进行斗争。于是游天洋在克服了重重的困难，仿效长辛店的办法，最先在洛阳建立了工会组织。

导致陇海路罢工的近因，则是徐州站“八号门事件”，那是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八日下午下工时间，厂方虐待工人，有意延长工时，将

八号栅门锁闭，工人气愤不过将门挤破。事后，厂方想借此破坏该厂工会团体，无端开除工人领袖二人，工人起而抵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同月十七日，洛阳机务厂又发生比国洋员狄孟（Dimon）殴打前去上工工人，工人不服，群起评理。狄孟强词夺理，反而开除为首的二十名工人。而这时的工人已不是一年前的工人了，他们已经在“老君会”的名义下组织起来了。在事件发生的当天（十七日），陇海路洛阳老君会在游天洋的主持下召开了紧急会议，详细地分析了机务厂和全路的形势，认为要使比国资本家屈服，非采取罢工手段不可，而且要把机务厂的斗争扩展到全路去，联络全路工人实现总同盟罢工。根据会议决定，成立了游天洋、白眉珊、黄文渊、王符圣等人组成的罢工委员会。并即时派人来京与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联系，请求派人指导；同时派人到郑州、开封、商丘、徐州等东线各地联络。洛阳机务厂从十七日起首先举行罢工，如得不到答复，则于二十日全路响应，实现总同盟罢工。于是，一场革命风暴在洛阳上空迅即爆发了。

罢工开始后，工人向路局要求撤换狄孟、不再有虐待工人的事件发生，限三日内答复，诿料路局无视工人要求，反加训斥。工人闻讯，莫不义愤填膺，全路其他站老君会组织亦纷纷致电响应洛阳老君会的罢工号召，成立罢工委员会，准备全路总同盟罢工。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午后，陇海铁路线上的洛阳、郑州、开封、徐州等地火车头汽笛齐鸣，冲天怒啸，此起彼伏，宣布了陇海全线罢工开始了，当时的《申报》、《晨报》曾作如下报导：“陇海路洋员管理路政，平日本属严厉，工人皆啧有烦言，自新总管若里接办后，对于工人，犹为峻厉，因此工人‘反动’愈甚，竟于今日（二十日）实行罢工。今日开封西赴郑、洛，东赴归、徐之车，均未开驶，而由徐西驶、由观音堂东驶之车，均未到开封，陇海全路工人完全罢工，已可证明。”千里陇海铁路，象断了脊骨的长蛇，僵死在中州大地。

罢工实现后，陇海全路机务工人以汴省陇海老君会的名义，发表了《敬告全国各路同胞同业弟兄们恳乞救援》宣言书。宣言书在深刻地揭露了陇海铁路大总管若里的十大罪状和这次罢工的起因之后，庄严宣告：陇海铁路“同人等不能受亡国奴之耻，作无人格之工人”。提出：“务恳我各路工人协力，与本路工人作同一之举动，以救同人，为中国争人格，不受外人无理之欺凌。”为争国格，正义凛然！

罢工开始后，游天洋曾派急使来北京，向北方书记部报告详情，并请求支援。但该使在途中被阻，未能及时赶到。因此北京方面对此急剧发生的情况，知之不详。十一月十八日清晨，我同王敬臣、马净尘夫妇（王敬臣原开封圣安德烈中学生，后进保定育德中学）因事乘

车去长辛店，在车站上偶遇电报房工友，他悄悄地告我：“郑州东西两路客货车都已不通了。”我忙问发生何事，他说：“还不太清楚。”我立即赶到前门站火车房，问一个刚从郑州段来的司机，从他口中知道陇海路工人确于十一月十七日举行罢工，至于详细情况他也不十分明白。并说，连日此路交通系分子很活跃，谣言蜂起，郑州已戒严，检查过往客人极苛！我想此事关系重大，应与同志们立商对策，沉闷的陇海路局势或可借此打开，乃匆匆搭乘十二点五分的班车回校。

是日下午二时，我到图书馆办公室，会晤守常，把在长辛店所得的陇海路消息详细告诉他，并请召集区委扩大会议商讨对陇海路罢工的支援办法。守常听后很兴奋，立即让刘伯青通知：今晚七时举行区委扩大会议。六时半起，大家陆续来到，会议准时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李守常、罗章龙、何孟雄、高君宇、李梅羹、王仲一、缪伯英、王铮等。守常首先说，今晚的会系临时召集的，但很重要，时间可能比平常要长一些，请大家认真讨论。我便将陇海路罢工消息作了说明，以及同守常交换意见后的建议也在会上提出。当时会场讨论十分热烈，大家对陇海路罢工寄予很大同情和希望，但也存在一些困难，主要是陇海路到目前为止，既无真正的工会组织，也缺乏较强的党、团力量。当时究竟从何处下手，可说茫无头绪。会议沉静片刻后，守常问陇海路方面有无支部联络？我答：“那方面尚未建立支部，但是《工人周刊》却有几处通讯关系。”当时书记部初期除在辛店、南口、唐山等少数地点设有工作站外，大多数地区和工人并无组织联系，只是派人以书记部名义或《工人周刊》名义分别在各路聘有特约通讯员、发行员等。记部名义或《工人周刊》名义分别在各路聘有特约通讯员、发行员等。石家庄以南无郑州、洛阳、徐州等处亦属这类情况。梅羹接着说：“石家庄以南无正式工会组织，郑州、洛阳有《工人周刊》通讯员兼发行站，洛阳有《工刊》通讯员游泳，开封、徐州力量更弱。”素喜说话的孟雄此时发表意见，他说：“陇海路向来是交通系势力根深蒂固的大本营，上层员司的组织极有力量，工人待遇很低，缺乏斗争训练，对书记部来说是薄弱的一环，最好在罢工消息证实以后由书记部发表援助罢工，公开宣言，看形势发展，再采取具体对策。”但君宇不同意这样做，他说：“陇海路政治形势不宜于采取这种宣传方式，应设法深入罢工斗争中去，正确了解敌情，推动工人群众向革命工会走。”仲一适从太原来，列席会议时附议君宇的意见，朝着孟雄悻悻地叫道：“人家已行动起来，我们却在说空话，看你有啥用？照你的话，那么书记部的招牌不如索性摘掉吧！”仲一性格历来是长枪大戟，对人不讲情面的，一席话说得孟雄哑口无言，也把大家提醒了，于是众人都主张采取积极办法去领导陇海路罢工，会上讨论渐集中在如何行动起来的问题，经过半小时讨论，大家意见逐渐一致，认为陇海路既已罢工，

书记部理应去领导，纵然有困难也应立刻派人前往。

经过区委扩大会议讨论，会上作出如下决定：（一）以书记部名义派人前往洛阳与陇海铁路罢工指挥机关联络，对罢工给予全力帮助，并发挥领导作用。（二）书记部准备力量在时机许可时派一个组前往协助工作。（三）通知各工会公开捐款援助陇海路罢工，并通电各公众团体支援，同时决定以中共北方区委及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名义进行下列工作：（1）设法筹建北方铁路沿线各车站、矿山、城市党与团的组织工作；（2）建立上述各地革命工会组织；（3）建立上述地区宣传联络及党报书刊通讯网；（4）搜集敌方反宣传及反动组织活动情况。

当具体讨论派人去洛阳时，书记部同志人人都争相表示愿意前去，但讨论了很长时间没有作出决定。最后守常捻须颌首以目视我说道：“还是你去走一遭吧！至于书记部的事，人手不够，我可以抽出时间帮同照料。”我正在踌躇未及作答，仲一忽催促道：“不容迟疑，放大胆些！”此时大家都主张我去，遂决定下来。接着守常问我打算几时起程，我不加思索回答：“今夜就走！”守常说：“行！越快越好！但你这次赴洛阳距西宫不远，这事却千万不能让当地军阀知道，以免别生枝节。”我说：“对！我一定注意！您放心吧！”守常立刻告诉大家协助我成行，并帮同办理各项工作交代等事，当场又决定在我离京期间书记部事务由伯英、孟雄代理，《工人周刊》主编由梅羹、王铮代理。散会后，守常和我又谈了些问题，向我说：“交通部素来注视我们行动，你不要大意，应谨慎应付以防万一。”又嘱咐道：“陇海的事‘大而化之’完全交你去办”（大而化之是守常平时说话时的口头语）。我答：“我一定尽心力去执行区委决议，随时向您报告！”我与孟雄立即回到西斋交代工作，伯英代整行装时，并随手取书一册放在提包内，预备车上阅览。君宇、仲一忙于筹措旅费和到车站购票，一时间大家分头忙于办理诸事，孟雄陪我到车站附近小餐馆等候。顷之，君宇、梅羹、伯英均到，伯英转达守常的话，说钱不够用，来信再汇。她并送来半新旧长毛围巾一条，高檐吕宋帽一顶，既可御寒又可化装障面。君宇说：“伯英对事、对同志真是细心，想得周到！”说罢快到开车时间，我请他们先回去歇息。当晚十二时，火车自北京出发，我静坐车厢，思潮激涌，回味北京会议上讨论情形，心怀惴惴，惟恐虚此一行，辜负众意，久久不能入寐。车过漳河，已进入河南地界，南下客车沿途旅客上下频繁，我独坐车厢，静聆旅客们谈话，其中偶然也听到关于陇海罢工消息，传说不一。有的说罢工风潮已经平息，有的说沿途桥梁被毁，工人被押数百人，更有的说陇海全路都陷

1 此段侧，作者补有“加伯英吩咐一段话”字。— 补注

入恐怖状态。我心中疑惑不定，暗自忖度，“百闻不如一见”，忽忆庚甫有言“潮汐满海，艖公自有主意乘风破浪。”想到这里，心也就安定下来了。

车到郑州，但见站上人山人海，拥挤不堪，郑州街市旅店客满，浴室、饭馆席地坐卧的人弥望皆是，闹成一片，大多是因陇海路罢工无法转车的旅客。我正在为难，找不到落脚地点，猛然想到扶轮学校¹有《工人周刊》投稿员赵天俊与钮传琪。就扛起被盖行李前往扶轮学校访赵、钮二人。赵适外出，只见到钮，我说明来意后，钮说：“车校访赵、钮二人。赵适外出，只见到钮，我说明来意后，钮说：‘车既不通，外人自然无法前去，交通系对外封锁极严，沿途军警密布，预防局外人插手罢工，你只好在此等候几天再说。’”

正在无法可想时，忽闻钟声响，钮即携书去教室上课，临行时嘱我在房内坐候。顷之，有一青年工人抱皮球从外进来找钮传琪，见房中有客，遂坐下攀谈，知我从北京来，青年亦有表兄阚育先在北大读书，常寄《工人周刊》与新文化书报与他。二人谈话渐及陇海路罢工问题，因问我在郑住处，我以路过此地，西行无车事相告。青年工人自言姓黄名璧成，现为陇海路火车房擦车学徒，其父任陇海铁路郑州车房司机，人缘颇宽，可以设法找车西去。说后，黄即带我到钱塘里会见其父，并怂恿其父设法找车，其父允诺，外出时嘱其子陪客人在家坐候。黄父名文渊，清末时为秀才，应试不第，弃儒为工，自号工隐，言谈不俗。黄有二子，均扶轮高级班毕业，长子钰成，在徐州站电厂任职，幼子即璧成，新补学徒，好高骛远，自云喜读奇书，其父多纵容，不甚干涉其行动。璧成素好交游，奋志进取，受阚影响，并有弃工赴京读书计划。

黄父当时到车站去约一小时，即匆匆回家向我说：“今晚陇海路有公事车开洛阳，系工会专车，已与司机说好，可以附乘前往。”我即回到扶轮学校取行李，璧成亦同行，二人在外进餐，谈话范围很广，同时璧成又细细询问到北京有关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情况。届暮时黄璧成代负行李，向车站走去，及我到月台时，黄父子二人已先在，即登守车（即公事车）。黄父又把司机找来郑重介绍，附耳叮咛数语，始与我握手而别。公事车深夜始开出车站，我在车中静坐一隅，筹思到洛阳后行动计划。车行极速，颠簸殊甚！思潮起伏，一种患得患失心情搅扰，竟夕不安。公事车于沿途加水停车时，司机王符圣时来找我谈话。王是礄山县牧马集人，与黄文渊为结拜兄弟，时任陇海路司机工会委员。王与我谈话情感颇为融洽。车快到洛阳，王问我到洛阳找谁？我答：“看望一个朋友。”王又问：“贵友为谁？”我率直告他：“找游天洋。”王闻言大为动容，见左右无人，低声说：“你是从北

¹ 扶轮学校，由交通部直接开办的中学和小学，又称扶轮中学、扶轮小学。

京大学来的先生吗？天洋是咱们的军师哩！”我就将来洛阳的使命，向王符圣实说了。王喜不自胜，满面笑容说：“果不出我与老黄所料，下车后我陪你去找天洋，如果你一人去是见不到他的面的，你来洛阳的事千万不能让洛阳的狗子（指交通系人）或鬼子（指法国洋人）们知道，否则就要误了大事。”

下车后，符圣引我先到他家中歇息，向家人介绍伴认我为东路亲戚，晚饭后亲送我到天洋住处，符圣手持电筒，撑手杖在北风疾劲、崎岖多石的山坡小路上摸索前进，行约半小时，抵达一所小洋房，此即罢工工人地下指挥部。二人抵小洋房门外，符圣先去叩门。门启，有一老工友向王低声问话，再次通报往返，始邀二人进入室内。但见天洋睡衣拖鞋从内急忙迎出，一见面紧握我手摇了几下，说道：“您一路辛苦！我前已派人到北京请您去了。”边说边把我们往屋里让，我进入天洋卧室，但见桌灯明亮，炉火通红，桌上堆着文件，架上满列着中西文书籍，壁端悬挂长剑一柄，油画数幅。三人坐定，谈了片刻，符圣即告辞回家歇息。

天洋开始谈了一些陇海铁路工人的生活状况和罢工的远因和近因，根据天洋的分析：陇海路一般工人的生活地位比较京汉路要差，洋人对工人的虐待很凶，交通系员司的势力相当强大。平时员司和工人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次罢工天洋以中间立场尽力调和两者间的冲突，但是，双方隔阂并未完全消除，目前员司不愿罢工扩大，怕因此增长了工人的志气，所以主张早日结束。反之，工人惧为员司所卖，总是不很相信他们。至于工人与工人之间，员司与员司间还各存在着帮派的界限。我们谈着谈着，话题随即转到罢工策略问题上，天洋郑重说道：“我们起初一鼓作气，把全路罢下来了，工人群众热情固然很高，也很勇敢，但是，我们没有罢工经验，目前工人队伍是很散漫的，因此大家有些着慌，怕失业。敌人以逸代劳，老是照着我们的弱点发动反攻，加以交通系施出种种阴谋分裂工人队伍，破坏罢工，看形势很难乐观；又交通系很想借助于当地军阀武力镇压罢工，工人领袖中有人胆小怕事，惟恐闹出乱子，下不了台。因此罢工正面临着胜败关头，成功固有希望，如应付不好，也难免不遭到失败。”

我从天洋简短的谈话中了解到罢工的整个局势，一方面敬佩这个青年人聪明练达，同时也看到罢工确实潜伏着危机，于是将自己的见解向天洋坦率陈说。我说：“只要工人内部团结一致，就没有什么可怕！军阀武力也不是轻易可以出动的。我们应全力把工人组织起来，维护罢工秩序，坚持下去一定会胜利达到要求。”天洋听了感奋非常，我们一直谈到深夜，拟成一个坚持罢工方案，才告休息。这个方案包括下列几点：（1）选出七个具有代表性的罢工中坚分子组织中心行动

第四条，因工作忙，夜间加点，以六小时算一工。

第五条，每年终加双工资，每月有两个星期日休息给工资，中国三大节歇工，照给工资，每年应有两星期官假，照常给工资。

第六条，司机、生火，在车应做十小时，以外另行加点，饭资司机每日五角，生火三角。

第七条，按年准给回家来往免票，司机及工头二等票，其余工人三等票。

第八条，各工人加薪，因公受伤者，照给工资，自己生病者，一年愈后准复原差。

第九条，如因工亡故者，恤赏六个月工资；若因病亡故者，恤赏三个月工资。

第十条，开工后小过不准裁人，大过任行。

于是延续近十天的陇海路大罢工遂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在工会取得胜利后宣告结束。陇海铁路督办施肇曾和路局代表被迫签订十条复工条件的消息一经传出，全路工人欢欣鼓舞，洛阳、开封、徐州各工会同时奉总工会命令复工。

罢工胜利后工会开会决定（一）召集全体工人大会，庆祝胜利；（二）通过组织陇海全路总工会，一切按照书记部所规定工会规章办理；（三）陇海铁路总工会加入劳动组合书记部为会员；（四）请书记部正式派专人驻徐州、开封、洛阳工会工作。中共北方区委不久开始在沿路各站建立党组织。

罢工胜利后，洛阳工会组织工作已复行巩固，乃依白眉珊建议扩大工人子弟学校班次，并加设工人夜校。洛阳以西当时尚无工厂，道棚工人仍有几百人尚未过工会组织生活，并对工会诸事隔膜，当经工会商定由天洋陪同我去西路巡视，并将分散的道棚工人组成小组，能经常过工会生活。当时陇海铁路修到陕州观音堂，乃由工会派轨道车送我们至会兴镇并在道棚住宿一晚，道棚工友从此对工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事毕天洋与我东返，车行抵洛阳迤西五公里处时，突有一个穿着军服大汉在道旁土山上瞪目窥伺，及车驶近时大汉忽叫嚷停车，工人见其行迹可疑，似为暴徒，大声呵斥。大汉向前接近轨道，意欲拦车，工人不理，加劲摇车，飞驶而过，遥闻大汉仍顿足大骂不止。当时实不知此怪汉为何许人，且意欲何为。事后道棚工会负责人查明，系当地交通系所派遣的刺客云。

从会兴镇返洛阳后，我拟动身经郑州返北京，天洋告我陇海全路只有徐州工会处在最东地区，平日几乎鞭长莫及，愿乘此机会陪我随陇海路东行，直到徐州，借此可巡行全路一次，为巩固基层作些工作，我当即赞成，遂决定东行。工会乃派天洋及二委员陪同前往。我遂于

十二月初乘车向郑州进发。临行，白眉珊率学生一队到车站送行。学生唱自作陇海罢工胜利歌，握手道别时道：“此地一别，不知何时复会？”

车到郑州时，郑州陇海路工会及京汉路工会黄文渊父子等五十余人均到月台会见，文渊对我说：“东去沿线安徽帮工人人居多，可令璧成同往，诸事方便。”我和天洋遂请璧成登车同行。

我们一行五人同车东驶，车过中牟，璧成言：“前面商邱站为东路大站，有程胜贤为皖帮工人领袖，下车可见到东路工会规模”（程在桥梁厂作领工，桐城人）。因事先已电话征求程的意见，程表示欢迎。车到商邱站时，程胜贤已率领下班工人数百人到站迎候，引导我们到工会住宿。当晚召集全体工人讲演大会，讲演后并依照洛阳工会规章，选举各部门组织，至是工会阵营更趋统一。

次日，程送我们登车，各馈香芹一束，情意至殷。并以电话告知徐州车站工会沿途招待。我们一行离商邱车站向徐州进发。车抵铜山北站，时已日暮，徐州工会会长及黄钰成等人在车站迎候，工人数百聚集月台，手执灯笼火炬，引至工会休息。但见工会内外电灯通明，门外旷场高悬煤气灯，中央扎彩搭台，室内炉火熊熊，所有木器家具床褥均系新置，工人家属妇孺熙来攘往，如过元宵灯节。饭后即举行欢迎兼同乐大会，庆祝罢工胜利，演出山东、河北琴书，池州小戏节目，会场群众称兄道弟，欢笑喜谑，热情洋溢，直闹到深夜始散。

工会会长当晚召集工会委员座谈，在座诸人来自全国各省，亲友遍布南北铁路、矿山、轮船及诸大城市工厂，彼此互相介绍，提出一张几十个同乡、熟人的介绍名单，作为推广书记部报刊通讯联络参考之用。这个礼品后来为书记部在全国范围内工作提供了极大便利。

在徐州停留几天，璧成与钰成夫妇导游云龙山、戏马台、子房山诸胜。我离铜山时，正值深夜，璧成、钰成、天洋、符圣以及当地工会委员、工友群众数百人齐集月台相送。天洋在车快开动时与我握手惜别，口称：“文虎兄，你此来可谓雪中送炭。”

陇海罢工胜利后，工人群众阶级觉悟普遍提高，沿路各大站开始建党建团活动，于是下列诸处在一段时期内先后建立有党组织：洛阳为王符圣、游天洋、白眉珊以及后来的王忠秀等；郑州：魏士珍、李泊之、郭启先等；开封：魏荣珊、马景山；徐州：程胜贤、黄钰成等；商邱：王连陞、姚鼎三；连云港：萧学文、韩森青；观音堂：傅敬宗、水湛寅。同时并成立社青团的组织。

我从徐州北行至德州，瑞俊来会，报告山东近日情事。抵天津北站，安存斋来见，三人同车返北京，时已十二月月上旬（10日），此行前后历三星期。三人先到区委见守常诸人，久别重逢，晤谈甚欢。守

常说：“文虎长时行旅劳顿，且先回西斋，洗浴换衣休息，明日长谈。”

翌日为星期日，天气晴朗，守常邀大家到西城后街寓所召开北京区委全体会议。会前厨司老李做了一顿白菜饺子，大家饱餐后开会，先由我汇报了陇海路罢工情况，大家谈了意见。为了表示庆祝，会后，由到会诸人自由唱歌，弹琴讲故事，说笑话，并未讨论其他繁剧问题。

会后，梅葵说：“文虎离京数日渺无音信，道路纷传河南拿获煽动罢工南方乱党，北京区委乃派老曾前往查明事实真象。但是他到郑州后，无法赴洛阳，又见风头不妙，乃在郑州住了几天，悄然回到北京，向区委谎报：陇海罢工业已平息，文虎下落不明。守常初信以为真，十分着急，数日后始得确实信息，非常生气，责备老曾荒唐，说他‘平日无一事可靠’云。”又吴汝铭言：“陇海路罢工胜负未明时，该路交通系员司组织原想把持洛阳工会，收为己系工具，后来各项阴谋均未奏效，眼睁睁看到陇海工会正式加入北方书记部，不胜气愤，逢人便攻击书记部做不花本钱的买卖，全凭口舌之力把陇海铁路工会几千人一古脑儿拉过去了！”

后来洛阳吴佩孚特派白坚武到北京大学向金刀（指守常）追询此事经过，守常略具以告，白回报大帅。吴说：“这次北大书记部人在北方铁路与交通系斗法，居然神出鬼没，打败南方财阀，他们确实有些办法哩！”

王会长舌战西宫

不多日子，眉珊托人自洛阳捎一信来北京，他向我详告陇海西线新闻颇多，并说：陇海罢工胜利消息传到西宫后，吴子玉大为震怒，对左右说：此举扰乱治安，目无法纪，工人无知，谅不敢出此，必另有人煽动。吴左右对云：“听说北大学生，什么书记部从中策划。”吴说：“此断非小事，亟应查明实情，以凭究办。”因派副官田某到工会传会长到西宫问话。工会主席王同志闻讯坦然前往西宫会谈，座中军法处长出见，态度傲慢，出语不逊，发问道：“大帅有令，你们工会目无法纪，行动自由，按法规难容，以后诸事要小心在意！”会长大声抗议道：“快快收起你这套屁话，否则咱就拒绝和你们谈话了！”其时，吴的秘书在旁见军法官谈吐粗野，王的态度倔强，知其不可以力屈！乃起立转圜，向王婉言道：“请您千万不要动气，不必计较。我们大帅对工会是很尊重的，有话请从容细谈，平心静气。”王会长答道：“咱来是同你们讲理的，不是来同你们抬杠的。”秘书说：“欢迎评理！谁敢逞强！”王接着说：“你们是扛大枪的，咱们是开火车

的，挥钲头的。师长是属陆军部，咱家是属书记部！谁也管不了谁！咱工会权利条约是经北京政府交通部同意批准的，想大帅也知道，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如果礼尚往来，说公道话，那么你好，咱好，大家好，以和为贵。如果有人要逞强的话，那么就是破坏和平。文来文对，武来武打，咱们也不怕。书记部一声令下，全体铁路工友就行动起来，那时再见高低吧！”

这番话，理直气壮，把对方听愣了。秘书半晌不语，仔细一想，双方再僵下去，恐怕会闹出乱子来，那时就不好办了，不如顺风转舵，乃改口道：“我们大帅也是一片好意，千万不要误会！我们既是一家，以后有什么事，大家尽管好好商量。”王会长顺口答：“这样就好，大家省事，和气生财！”说毕，扬长而去！王离去后，吴同幕僚商量，大家觉得“劳工神圣”通国皆知，工会羽翼已成，人多势大，气焰正盛，不可轻侮。如一味硬碰，火上加油，再出现罢工情事，舆论指责，反棘手难办，不如因势利导，顺应舆情，实行釜底抽薪，方可以收拾人心，减少阻力，以图大事。吴闻此议论，亦以为然，于是决定发布谈话，通电全国，声称“保护劳工”。并派秘书到工会解释一切，宣布政府德意。工会见吴软化，经委员会开会研究，决定将计就计，乘机要吴禁止军人干涉工会，两相和好，如同一家，吴亦应允。于是工会借劳动节机会举行工兵联欢大会，西宫士兵纷纷来参加，双方群众意气融洽。事后吴闻悉，大为不安，说：“工会此举显系拆我的台”，但既允于前，亦无可奈何。

由此以后，吴乃包藏祸心，待时而发。

陇海路大罢工胜利结束。过了些时，中央及国际代表先后派专人北来考察此次罢工详细经过，并带有总书记陈独秀写给我的亲笔信，信中有云：“陇海罢工捷报先传，东起连云，西达陕西，横亘中州，震动畿辅，远及南方，这是我党初显身手的重大事件。已派大汉¹等北来，盼兄放手做去，勿稍停步，如有需要，当尽力之所及，作君后盾。”何孟雄笑道：“这总算是好话头！我们大家鼓足气力向前干吧！”

陇海铁路工人一九二一年举行的这次全路性大罢工，确实是我党在工人运动方面的一次创举，一次大规模的尝试。参加领导这次初试的许多同志，如游天洋、白眉珊等，大都在大革命前后牺牲了，他们所开创的事业，和他们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值得永远流传，他们个人的事迹亦应得到褒扬。但由于年代久远，留在我记忆中的具体情况已经很模糊了。所幸的是，上海“一大”纪念馆收存的一本由我在一九二六年编写的小册子——《革命战士集》第一集中，尚保有纪念游天洋同志的一篇短传，现援引如下，以志怀念！

¹ 大汉即李震寰。

游天洋

天洋名泳，福建闽侯人。年十八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即北洋路矿学堂）。一九一九年，被派往粤汉铁路武昌城外鲇鱼套车站实习。君幼性孤介，随兄游学南北，卓然自异。学成后见社会黑暗，民生惨淡，慨然兴改革社会之志，自到鄂任事，常觉职务与所志相距甚遥，居恒郁郁寡欢，纵情游览，不以职守为念。

武汉三镇为长江上游最雄胜之地，江山风物，壮观绝伦，又兼轮轨四通，产业茂盛；为多数人口集中之区。天洋初至时，徘徊其间，胸襟为之一振。旋见帝国主义的疮痍遍地，军阀政治之横暴腐败，劳动贫民生活之黑暗惨酷，怒焉心动，屡思辞去职务投身其间，终以人地不习，情格势禁，无入手办法。

时北京政府为北洋军阀段祺瑞当政时代，段氏鹰犬张敬尧盘踞湖南，仇视湘民，肆意劫掠屠杀，蹂躏三湘七泽几无一片净土。他犹以为不足，听了一位湘绅的建议，划分湖南为九大鸦片区域，勒令全湘农民栽种鸦片，由张按亩抽税，预计一年收入可达一万万元以上。张敬尧发现这一金穴，于是秘密向外购得大批烟种，由湘鄂铁路运入湘境，强迫农民播种。

一日，天洋在车站办公室运货单上忽见有七十万包鸦片种子待运长沙，大为诧异。后多方访问，才知道上述原委，不由气愤已极。他心想，如果这大批毒物运往湖南后将发生一场怎样悲惨的结果！湖南全省人民均将被这批毒物坑杀，就中最受影响的要算是贫苦农民了，因省此，他便决定破坏张敬尧的计划。此时车上已满布武装兵士，是预备押运烟种往长沙的，一切布置停妥，只待下次货车起运。天洋即日将这消息暗中电告长沙、上海、北京各公团及报馆，要各地发起严重抗议，一面秘密向武汉各界及旅鄂湖南人民团体报告，要求他们即利用群众的力量截运，自己却驰回车站设计将车厢压住。

自天洋将这消息公布后，果然不到两天，全国舆论沸腾起来，张敬尧闻讯大惧，深恐功亏一篑，急电鲇鱼套车站火速起运，并严厉责备押运军官迁延误事。军官再四交涉车辆，均为天洋从中阻止。事为天洋前数分钟已得报告急避匿一货车内，卒为兵士发现，弹如雨下，向货车袭击，天洋急逃奔另一月台。适遇武汉学生队伍来站堵截烟种，群众呐喊之声自远而至，才将军士逼退，救护天洋出险。经过这次事变，张敬尧的罪恶愈形暴露，湖南人民驱张的空气骤行紧张起来，张

氏为固位计，遂将烟种全数销毁，以谢湘人。因此衔恨天洋益甚，声言非杀天洋不止。天洋为避仇计，随即辞去粤汉路职务。

天洋自离武昌，仍回北京居住，情怀落寞，无以自遣，后来独自一个赴蒙古作长途旅行，张家口、晋北、多伦、库伦、满洲，均有他的足迹，历尽塞外险要而归。在这次旅行中，天洋身体与精神均受了一番自然的陶冶，信念愈坚。他自言，从那时候起决守独身主义，以便无挂碍地献身社会革命，

一九二〇年苏维埃俄罗斯的革命风云渐渐越过西伯利亚的莽原吹向远东来了。天洋在当时报纸和杂志上常常注意世界革命的消息和理论。一天，他猛然省悟，组织群众是革命事业的基本战略，劳动群众尤其是革命的先锋队，他自觉应该即刻投身到工厂做工去。于是便到洛阳在陇海铁路局觅了一个员司的位置。他到洛阳后渐渐觉得所要做的事稍有门径，他开始联络铁路工人，指导他们组织。可是事属创造，社会人士讥笑他和反对他的人正自不少，即工人自身亦沉沦于数千年封建的传统中而不容易觉悟。天洋经过众多的障碍，克服了无数的困难，几个月后，陇海路工人便在老君会名义之下号召起来了，组织略为就绪，陇海路总罢工潮，便在中国劳动运动史上第一次爆发。

正是一九二一年冬季，天洋领导工人群众，宣布陇海路总罢工，并提出有名的十四条件，发布反对法国总管宣言。此时北方社会骤见到空前的大罢工，人心惶恐不可名状。北京政府尤为震惊，陇海路工人的革命烽火在天洋煽动之下照彻大河以北，大有使军阀官僚不敢轻视之概。

陇海路上爆发的罢工在中国北部既是一种惊人的创举，军阀官僚的交相破坏，社会人士的怨言毁谤，危疑震撼，艰难自不待言。天洋奋勇格斗，不稍顾忌。经过一星期后，胜利毕竟属于工人了。罢工胜利后，天洋在陇海工人群众中似有宗教的魔力，会务发展日益千里，天洋便乘机整顿全路组织，引导他们走上正确革命的大道。

先是罢工时，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文虎君闻讯前往，抵洛阳得晤天洋，与共议攻守之计，事后即介绍洛阳工会加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至是陇海铁路工人组织之老君会遂正名为陇海铁路总工会。

陇海铁路罢工胜利的影响广泛深入全国工人群众，尔后，一九二二年，铁路、海员、矿山、机器等工人异军纷起，摇撼整个军阀政治，构成中国革命历史上最光荣的时代，便是继续这次罢工的扩大运动，所以他的意义是很伟大的。天洋自是索性辞去路局职务，专任陇海铁路总工会秘书。他对于工会运动、革命的政治与经济理论后来渐有科学的认识，天洋的思想已走上科学社会主义的正轨。

正当陇海路总工会形成的时候，敌人反攻的战垒亦在开始构筑了。

法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和交通系等，对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日陇海罢工下之盟是不敢忘记的。他们痛恨天洋，屡以高位厚禄相饵，天洋屹不为动；又屡以武力威胁天洋，亦无效。最后，法帝国主义便建议收买一部分贵族工人，分裂工会以与天洋决胜负。

铁路工人的工资等级是相差很远的，故他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往往不能一致，遂启敌人覬觐之心。此次路局采用欧洲资本家智慧实行分裂工会的政策，用重贿赂收买少数工人后，陇海工会极少数职员便发生了右倾的错误，这个倾向的渐渐发展，工会内部组织便随之松懈起来。天洋睹状愤慨万分，尽力挽救颓势未见即时恢复。敌人审天洋性，怵急，屡遣使激怒天洋，天洋忧愤无极，深自怨愧，遂决计出巡全路，唤起多数群众，驱逐敌探，改组工会。行抵郑州，因过度劳瘁，益以强烈刺激，卧病旅次。天洋在病中越想越气，越气越病，又闻敌方谋之益极，顿失恒态，于某日卒患脑充血症，医治不及，逝世于郑州医院。时一九二二年冬季。

天洋是北方第一个身殉劳工运动的战士。死后，陇海路工人在郑州召开的追悼大会，为北方民众空前悲壮的集合。天洋致死的原因除凶狡的敌人设计倾陷外，最主要的还是他的偏急的个性使然。因为他自到洛阳经过长期繁剧的工作后，性情越发刚暴了，他的处事临变有如暴风骤雨，蓬勃的火焰，令人不可向迳。以这样纯感情的生活，置身极复杂极矛盾的工会运动环境中，自然烦愁与恼怒是时常困扰袭击他的。天洋的生命便在这万分愁劳中负有极重的伤困了。

天洋为人外表颇峻峭，内心充满无限同情，生活真实，奇怀磊落，独来独往，大有古游侠之风。逝后陇海工人群情悲愤，当即激起一个拥护工会的大运动，誓一致团结为天洋复仇。工贼见群众义愤磅礴，相率隐遁，陇海总工会赖此卒保持其统一，历久不衰。至今，河北劳动群众无不知有天洋名姓者。

白眉珊

白南薰字眉珊，河南洛阳人，清末秀才，曾任陇海路洛阳劳动补习学校教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已四十二岁。一九二一年冬，文虎为陇海铁路罢工事至洛阳时，白白请参加罢委会工作，参加决策，多出奇谋。并亲任向导，随同分赴工地从事宣传、组织工作。罢工胜利后，曾至北京，遍游长城内外各地，自言：“河源飞鸟外，雪岭大荒西”皆曾亲历其地。据称青年时期曾步行经年探黄河河源，河源在西宁西南方玛多县，距西宁二千余里，高山湖泊错列其间，藏族居住

地人烟稀少，全县不足万人。归途又探汉水源¹，在嵯冢山，其地虽迹，但居民稀疏，住户也少，在高山洞壁里有远古文字图形云。其汴梁怀古诗云：

驱车过宋门，城阙荒草深。
昔年魏公子，访隐见侯嬴。
笑谈决大计，功名安足论。
慷慨思猛士，卓犖殊不群！
怅望樊楼渺，俯瞰大河横。
萧萧疾风劲，日暮卷黄云。

眉珊尝说：“今日国事紊乱，主要由于物质与精神俱失去重心，所以人心思乱。因为物质平衡则万物互致其用，偏则助长私欲，怀忿逞争，举国不宁。吾人今日从事工人革命亦所以顺应时势，如峻坂走丸，非及地不止。”

我在罢工斗争胜利后离洛阳东去，登车前夕止宿于洛阳子弟小学，与白眉珊联床夜话，聆白所言，学识渊博，高人一等，深觉吾辈生晚，相见恨迟。

临行眉珊出纸笔，嘱留书作纪念，我即书一联相赠，联云：

东观沧海月
西揽太华峰

上联指连云港，下联指陕西华山。

一九二三年，我离开北京到上海中央局工作，旋又出国赴欧洲工作。由于天各一方，工作繁忙，迄未通音信，稍后乃知眉珊与王忠秀诸同志，均不幸遇难牺牲，悲不自胜。²

¹ 此处罗补：1987年西宁考察队到达河源地区，发现黄河源有三处，广袤千里云。
— 补注

² 此页末，作者补有“增订 陇海罢工”字。 — 补注

十三、东方民族大会

东方民族大会，即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列宁在世时在莫斯科召开的。先是一九二一年十月，第三国际派出两名代表来到北京。他们到北京大学后直接找到了北京区委。第三国际的代表均较年青，象是大学生，他们没有翻译，能操英德语言。他们谈话的主要内容是，说明召集东方民族大会的意义。由于东方各民族共产党刚刚成立，还比较幼稚。组织还不够强大，所以需要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组成广泛的联合阵线，以利于各国的斗争。他们还具体谈到会议代表名额的分配问题。东方各国共去二百五十名左右的代表，中国代表为五十名，这些名额由中国南北各区按比例分配。这只是原则规定，具体的安排，可由当地的党组织决定。代表在北京住了几天，商洽此事。关于北方代表的产生，由北方区委确定。至于南方代表可由上海商量决定。国际代表一再强调，各党派各民众团体都要有代表，特别注意要容纳有代表性的人物参加。

这是北京区委首次接受共产国际交给的任务，自然十分重视。经区委研究决定，北京区派出的党和工人代表有张国焘、邓培、张太雷、梁鹏万、高尚德、贺昌、李守常和我。后因我与守常有其他工作，没有启程。山东派出的党和工人代表有王尽美、邓恩铭、王志坚、王象舞、王复元等；山东省民众团体代表为山东省议会议员王乐平。武汉学生代表有林育南等。广东机器工会代表有黄凌霜（无政府主义者）等；广州妇女代表黄璧魂（女，无政府主义者）。直隶学生代表有于树德等。安徽全省学生联合会总会代表有宋伟年、夏揆予、马章祿、唐道海等。此外，瞿秋白以《晨报》记者身份参加大会。还有胡公冕和柯庆施也参加了大会。柯是从北京走的，但不知道他是北方代表还是南方代表。南方还有俞秀松也参加了。党外人士江亢虎也是代表之一。

各地代表确定后，分两路出发。北方的代表在北京集中，经满洲里进入苏俄。南方代表在上海集中，经海路在海参崴登陆后，坐火车到莫斯科。这是一条地下路线。

当时，苏联内部还不很稳定，特别是远东部分。代表团分组出发，并约定旅途中须随时来信报告小组活动情况，注意集体安全。我们收到他们来信，得知均平安越境，到达目的地。柯怪君（庆施）在旅途中曾寄给我几封长信，报导旅途情况。怪君平日爱好文艺，笔触清新，所写通讯采用章回小说体裁，前后约十回，途中所见所闻均跃然纸上。对于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冰天雪地风貌、莫斯科革命文物，列宁格勒冬宫等见闻所及，均作了深刻细致的描写，极富感染力。其文稿内部流播，不胫而走，传诵一时。

《工人周刊》在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二日第二十九号上刊登了一篇特载，题目是《莫斯科的“东方民族大会”开幕了》。是我根据莫斯科的电讯稿撰写的。文章向广大工人读者介绍了这次大会的意义，报道了这次大会开幕的情况，摘引如下，可以了解当年大会的概况：

莫斯科的“东方民族大会”开幕了

“全世界劳动阶级团结的表征；研究太平洋会议所讨论诸问题，远东各国代表百余人参加；演说中还有中国女代表。”

“诸君：‘太平洋会议’是干吗的？就是那些如狼似虎的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几个大资本国商量怎样宰割东方民族——中国尤其是他们的目的物——的会议。我们东方民族到底是听其宰割呢，还是不服气呢？人心不死，谁愿意做他们的奴隶，做他们的牛马，做他们的桌上菜，俎上肉？既然如此，我们东方民族就该联合起来，反对他们啦。这个‘东方民族大会’就是这样发生的。”

“这个‘东方民族大会’，非同小可，完全是我们全世界劳动阶级组织起来的。世界之上，劳动阶级的人最多，我们大家联合起来戮力同心扫除可恶的资本家，推翻这资本家的政府，真是不费吹灰之力。”

“据莫斯科来电，远东各国民族及社会团体代表百余人，本定在伊尔库次克开会，后因他故，改移至莫斯科开。至这个会所决议的事情，大约和‘太平洋会议’所处置之各项议案相符。该会已于一月二十日正式开幕了。”“首由第三国际会长俄人金诺维夫主席致开会词。大意说：‘凡事只怕没有团体，有了团体，就能战胜资产阶级，这是个相信无疑的。故唯一希望，要全世界劳动阶级一致团结起来作战，自然得到最后的胜利。第三国际和以前各种团体不同的地方，就在不仅要变成欧洲劳动阶级的团体，而且要联络全世界的工人；又不仅要文字上通声气，而且要更为事实上的携手呢。今日以前，我们和东方

各国一向不联络，关系很少。这次会议，我们东西劳动阶级大家来商量几个方法，大家来反对‘太平洋分赃会议’，大家来革资本家的命，大家来建设劳动者的世界。”云云。”

“中国代表张国焘演说。他说：‘很好！我们这个会议，有绝大的希望。自此以后，我们劳动阶级，必团结一致；我们各民族间，必联络一气；我们革资本家的命，必一举而成功。’云云。”

“中国女代表王女士演说。她说：‘女子要求平等自由，和男子是一样的。俄国是现今世界上第一个解放女子的国家，载在法律。我们中国女子愿追随俄国，而与世界资本家宣战。’云云。”

此外，还摘要报导了日本的片山潜以及朝鲜、蒙古和美国代表发言的大意。最后主席鼓励大家，“做第三国际的忠实分子。”

这次会议自始至终是由第三国际主持的。当时列宁身体抱恙，没有经常出席会议。但在会议期间，列宁接见了中国代表，其中包括两名工人代表，一位就是唐山的邓培。中国工人代表见到了列宁是很荣幸的。列宁在谈话中表达了他对中国革命的关注，鼓励中国工人阶级不断前进。邓培回国后向我详述了列宁接见时这一难忘的情景。

代表们除会议本身的收获外，还亲眼见到了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对社会主义的苏联有了感性认识，瞿秋白还写了《赤都心史》和《新俄游记》。代表们回国后都很高兴，工作也有了很大启示。例如，黄凌霜回国后写信给北方党，说他放弃无政府主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江亢虎组织社会党，是社会党领袖（后成了反共人物），他写了本回想录，讲了苏联的情况。总之这次会议是成功的。¹

¹ 此段下，作者补有“饿乡纪游声调低沈未宜深究 作为记者 提出若干疑问”字。
— 补注

十四、京汉铁路八月罢工的胜利

陇海铁路罢工胜利后，北方书记部开始筹划北方各大铁路矿山的大罢工。按照当时的情况及力量对比，计划首先从京汉铁路实行中心突破，俟京汉铁路罢工胜利后，以次扩张到粤汉、京奉、京绥、正太、津浦、胶济铁路，并向唐山煤矿、焦作地区与六河沟扩展。

当时，长辛店是京汉铁路的中心，因此，中共成立之初我就和张国焘、李梅羹、吴雨铭等先后到长辛店开展工人运动，创办了长辛店工人劳动补习学校、建立工会。一九二一年七月七日报的《共产党》第六号刊登的《长辛店工会成立》的消息，对当时的长辛店工人运动的状况，作了生动的描述，其文如下：

“长辛店的工人，自‘五四’以来，就有点觉悟了，对于公共的事，很是留心的。今年一月间，他们办了一个劳动补习学校，除招收学生外，还预备好几种报纸杂志，给同人阅看，并且常常请人讲演吸收新思想，所以工人求知知识的机会越多，各人的脑袋，也比前清楚。开会的方法，结团体的能力也渐渐地训练好了。

五月间他们又组成了一个工会，办得很有条理。工会的组织，取代议制，由厂里每科选出来的代表，组织一个代表会，代表会推出正副两个主任。工会所有进行的事务，都由这个代表会议决，再由代表会选出几个干事，去执行议决的事项。代表会定每两个星期开一次常会，有问题就讨论问题，没有问题就自由谈话。

该工会现在办了一个《工人周刊》，已出六期，办得很有精神。他们的努力，实可令人佩服，不愧乎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

制定斗争方案

工会成立后，我们开始了建党建团工作，由于长辛店地位密迩北

京区委，各项工作能及时得到区委的指示，加之本身条件好，所以京汉铁路各站建党工作得以顺利进行。长辛店铁路工人中最早吸收入党的有史文彬，后来又发展了王俊、陶善琮、陈励茂、葛树贵、崔玉春等，成立了党的小组，京汉路的党组织发展较快，后来党在沿线各站如：高碑店、保定、正定、石家庄、新乡、郑州、信阳等站也都发展有党员，当时各站工会负责人和书记部特派员大都由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充任。

一九二二年初，陇海路罢工胜利的消息传到各地后，各路工人都很受鼓舞，也想大干一番。长辛店的史文彬、陶善琮等更是常来西斋，计议“大举”（意指罢工）的事。大伙说：“陇海已走在咱们前头，咱们再不能伏在窝里不动了。”我对他们说：“京汉铁路工人的组织力量原比陇海要强，但是京汉工人面对的敌人也比陇海路敌人更凶恶，所以不能轻率举动。”老陶说：“这倒是的！凡事应深谋远虑，才能旗开得胜。”大家经过多次商量后，准备集议具体实施方案。这时正值第一次直奉战争时期。一九二二年四月的一天，我们约定在长辛店集议具体实施方案。奉直两军在长辛店作战，一时京郊火车停驶，我偕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教员及工先期来到长辛店。二十六日那天，我偕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教员及工会负责人赴铁路东芦苇荡中开会，见到奉军高级指挥十分轻敌，在指挥车上只顾打牌喝酒，当吴佩孚军队从两侧包围上来，未经激战，奉军即溃败。我们在野外边观战边谈论，最后研究确定了一个方案。

长辛店工人俱乐部这时已形成一个坚固的领导核心。工人顺口溜评议俱乐部领导成员时说：“陶（善琮）善谋，史（文彬）善断，王俊能说会道，冲锋陷阵靠的是崔玉春和葛树贵，天大事有北方书记部扛得住。”俱乐部组织亦日臻巩固。开始规划筹各京汉全路总工会，四月上旬在长辛店曾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讨论成立全路统一的工会组织，并以三个月为期，发展和健全基层组织。

所以，这次初步方案也和严密基层、肃清内奸有关，组织不纯就无法进行对敌斗争。另外就当时工人存在的最迫切的要求和生计问题，集中成十二条，作为向路局斗争的要求，发动俱乐部的工人进行讨论，最后再由俱乐部审慎研究确定。

五月，长辛店俱乐部将十二条取舍整理成简单明了的八项条件，作为向路局提出的要求，并为实现这一目标，加紧准备。其时，北方书记部经常有人驻守长辛店，领导基层会议，反复研讨各项具体问题。某日，在俱乐部会议上，在讨论到行动问题时，吴容沧说：“现在俱乐部一般准备工作已经差不多了，要打大仗，目前应先打一个小仗。”史文彬接着说：“不错，老吴说的有理，家贼不除，工人不得安宁，这一仗是少不了的。”随后大伙把话题转到如何对付大工头邓长荣的

办法上。原来，邓长荣是京南一霸，从长辛店建厂以来便独霸一方。他纠合无赖，自组帮会，部下人手颇多，可谓文武齐全，同时邓又是交通系走狗，专事欺压工人，工人们无法对抗，只得忍气吞声。平时他还勾结地方官吏，经常对居民作威作福。不斗倒邓长荣，不用说工人抬不起头，就是地方居民也不得安宁。最后，吴容沧说，“我看这家伙很顽固，别的办法不一定有效，还是先揍他一顿再说。”此时大家都表赞同，当即推定老吴、老崔几个人负责，由陶善琮制定斗邓长荣的周密方案。

这次采用的是武斗方案，在年初，我们就委托留学巴黎的罗海潮先后购买勃朗宁手枪几枝运回国内，方法是他在巴黎旧书店买大型字典一册，将书内按手枪形式挖空，其形状与手枪相吻合，把枪嵌入其中，然后将书密封交邮，寄到北京大学，因字典又重又厚，国境检查容易忽视，得以蒙混耳目运到国内，工会有了少量手枪，与邓长荣斗争，遇到发生武斗场合，大家也就不怯场了。

一九二二年六月的一天中午，邓长荣下班返家途中，走到两个小土丘的夹道处。只见老吴立在土丘上，大吼一声，预先埋伏的一队工人奋力向前，真是迅雷不及掩耳，邓长荣还没有弄清情况，已被工人推翻在地，拳足交加，狠揍了一顿。邓的手下人闻声赶到，向前施救，又被埋伏在旁的另一队工人挡退。邓见势不妙，跪地求饶，老吴当场教育了他一番，然后才放他回去。陶善琮事前告诫行动的工人，对邓只施薄惩，促其醒悟，不得流血，不准伤筋动骨，造成重伤。这次行动就是按此计进行的。行动结束后，即由吴春熙等具名向宛平县递了一张诉状，诉说邓平日劣迹，近又于某日下午因细故在厂殴打工人，工人同他说理，邓不但不听，反追逐工人至厂外大打出手，并列举人证物证，请求拘邓到案究办云云。同时又向北京地方法院、检察厅提出诉讼书，诉邓平日作恶行为等事。邓既受创，忿忿不平，一面声称要施行报复，一面往法院申诉。据此，俱乐部乃部署更大规模的决斗，严阵以待。并动员俱乐部全体工友与邓对抗。同时书记部通过劳动通讯社发布新闻，并由北方书记部在北京邀约记者前来，报告邓的劣行及殴打工人案情。一时京中各报舆论，纷纷表示同情工人，不直邓长荣所为。邓归厂后，正图谋报复，并要宛平县发拘票捉拿工人，县知事说：“此事越闹越大，已引起舆论界注意，况俱乐部方面上千人，书记部上万人，人多势众，不管用文用武，人家都比你强，如果再闹下去，恐怕你下不了台。”随后，地区检察厅传邓到案听讯，各地工会申讨邓罪行的文告如雪片飞来，邓自知处境险恶，乃央求俱乐部成员谢德清等致意俱乐部，表示愿意服罪，请求撤回诉状。史文彬乃决定允其所谓，并由长辛店俱乐部向邓长荣提出：要邓向工人谢罪，限

于一星期后离开长辛店回天津老家去，同时向法院撤回自诉，邓都一应允。从此长辛店巨憨既去，人心大快！

对这次斗争，《晨报》曾连续作了报导。读报于六月二十日发表的《长辛店工人驱逐工头胜利》一文中说：“长辛店工人，攻击工头邓长荣”，“态度极其坚决，誓非达到驱邓目的不止”。“经过坚决不懈的斗争，结果，邓于十四日下午出具悔过书，声明‘誓不再在长辛店工作，为工界罪人’，并亲向宛平县申请撤销控告学校教员及俱乐部职员之案。于是此事遂告一段落，一时长辛店工人为之大快云。”《北方红星》一书也曾记载当年长辛店车辆厂木工马朝龙叙述此事所编写的一首歌谣。后来据说，邓长荣在离长辛店时向其亲信说：“我半世英名，竟为几个毛头小子（指书记部学生）所毁，这番算把我断送了，真是意料不到！”

八月罢工

工人内部主要障碍既已排除，人心振奋，于是全路大规模斗争的时机更加接近，全体工人众志成城，人人思战。八月二十日左右，书记部召集长辛店党与俱乐部负责人到北京开会，讨论有关发动斗争的行动规划。会议对罢工纲领、组织行动等作出了最后决定，并确定二十一日向路局正式提出八项条件。北京方面并将有关罢工宣言、传单等印好，送往长辛店备用。我也于同日晚乘车到达长辛店，住在俱乐部罢工指挥机关铁匠营附近的工友家中。

上项条件提出后，路局局长赵继贤故作镇静。赵为人极为狡诈，平日对书记部防备极严，屡思拉拢工人领袖，行釜底抽薪之计。他曾设法妄想收买书记部，并暗中窥伺俱乐部弱点，意欲蹈瑕抵隙，出奇制胜。因此他第一步采取拖延政策。俱乐部烛知赵的奸谋，立即决定举行罢工，予以反击。再次日北京各报（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刊布了长辛店工人全体罢工的消息。《晨报》在《京汉路工人昨日罢工》的大标题下，详细报导了这次罢工的有关情况：

“京绥路局职工罢工风潮，尚未完全平息，继之而起者，昨日（二十四）又有京汉路大罢工事实发现”，“先是京汉路局全体工人因生活日昂，工资不敷支配，向该局要求加薪，并对于工人之待遇上，亦提议请稍加优渥。路局当事左支右吾，毫无确切之表示。迨二十二日，工人方面作最后之要求，路局漫应于二十三日正午十二时当有圆满之答复。及期，工人代表晋谒路局当局，仍是敷衍。工人大为愤激，各代表遂在长辛店工人俱乐部集议，讨论对付

方法。结果决定坚持永久罢工，不达目的，誓不转圜，此掀天动地之罢工潮，乃一发而不可遏矣。”“工人既全体议决罢工，于是由北京、长辛店、琉璃河及各地铁路之工人，集于长辛店者有三千余人，共同议决八个条件。”工人向路局提出八项条件后，手执白旗，上书“不得食不如死”，“打破资本专制”，“情愿一死”，“不达目的不止”，“劳工奋斗”，“打倒国贼高恩洪”等字样，满布于长辛店一带。

这次罢工开始后，长辛店大厂工人全体罢工，长短客车亦一律停驶，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井井有条。罢工后一日，交通系即谣称罢工乃南方乱党谋乱，并指使流氓分子阴谋混入厂内进行破坏，阴谋嫁祸工人俱乐部，以便为军队进驻工厂造成口实。但俱乐部预见及此，早有防范，当场捕获破坏分子谢德清、韩哲、于庆江等。

政府当局见俱乐部布置周密，敌忾同仇，万众一心，无懈可击，一切狡计无由得逞，深惧罢工扩大，影响其他各铁路，不堪收拾。乃于罢工第三日双方举行会议，同意下列各项条件：

（一）开除总管郭福祥，另有数人查实撤革（工头黄绵绵、王龙山、谈荫棠、徐家楣均革职）。（二）工人俱乐部有推荐工人之权。（三）北段自九月起，中段自十月起，南段自十一月起，工人每日加薪一角。（四）短牌换长牌，凡做工过二年者一律改为长牌（长牌为正式工人）。（五）司机工薪凡递进至最高工薪者即为头等工资。（六）凡奉直战争开车升火工人，应开列名单候奖。（七）北京、琉璃河、高碑店等处须盖立官房，以便开车工人休息。（八）长辛店酌筑休息室。（九）工人因公受伤者在患病期间不得扣薪，并承认在罢工期内不扣薪。路局签署条件后经过长辛店工会委员会同意，乃于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七日下令复工。罢工结束后，工会提出解除法国厂长札曼（Chaman）职务，遣送回国。一九二二年八月罢工以前六任长辛店大厂厂长均法国人，至是废除外国厂长制度。

八月长辛店罢工结果，据路局估计，全路工人，每人每月增加三元，每年增加三十六元，全路三万人每年应增加工资一〇八万元，附列经济条件并入计算，不下二百万元。其他各路若准此推算，路局增加开支近千万元。低工资工人每年增加三十六元，生活亦有所改善。当时工人中流行一白话词云：“书记部，真不赖！（意为真不错）立工会，多自在！领头罢工有担戴，长工钱，歇礼拜，年节包饺子，姑娘把花戴！今后谁禁咱罢工，咱就打破他们的脑袋！”此词传为陶善琮等共同写作。京汉路罢工伟大胜利就北方全局说，可说是对敌人施行中央突破，连弩射敌，敌方遂陷于全线动摇。随后粤汉、京绥、正太、津浦、道清、沪宁、沪杭、胶济各路，远及关外中东铁路等风起云蒸，连续爆发近十次

的大罢工，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造成空前壮举！

八月罢工谢函

京汉铁路八月同盟罢工的胜利，是京汉路广大工人群众在中共领导下坚决斗争所取得的一次辉煌胜利。这也是和全国各地工人群众积极声援和支持分不开的。八月罢工胜利结束后，全国各地工会组织函电交驰，纷纷询问罢工经过。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召开了隆重的庆祝大会，会后由我执笔以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的名义写信给全国各地工会，公开答谢各地阶级弟兄的支援。该信现存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兹录全文如下：

职工会列位工友钧鉴：

我们罢工风潮已解决了，已于二十六日照常工作了。我们这次罢工，经过的日子不久——二十四和二十五两天——可是经过的困苦却不少了！如狼似虎的军阀，竟以为我们是暴徒！但是早在我们预料中，所以我们万死不辞，虽肝胆涂地而勿怯！可笑我们只坚持两天的时日，那班军阀和京汉当局就屈服于群众势力之下，把我们所要求的条件俯首应允了！我们知道你们很挂念着，所以特地将这个喜信报告于你们，一方面还要特地感谢你们！你们这种互助精神，我们真是刻骨铭肺呵！此后，还望彼此努力，同奏凯旋之歌！

敬祝劳动者胜利！顺祝
工友们康健！

长辛店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敬启
八月二十七日

这封信的前段说，这次罢工经过的日子不久，但经历的困苦不少，“我们万死不辞虽肝胆涂地而勿怯。”的确，八月罢工从四月初准备到八月底胜利，是经过四个多月激烈复杂的斗争，全体工人不畏艰险，英勇战斗，胜利真是来之不易啊！

感谢信的后段对全国工会站在革命正义的立场，大公无私地对八月罢工给予全力支持，包括道义的与物质的慷慨援助表示感谢，这种出自阶级友爱的互助使人铭刻肺腑，同时也表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工人阶级精诚团结、奋勇克敌的大无畏精神。

粤汉路罢工

八月罢工的胜利，推进了各路工人运动的高涨，罢工斗争接二连

三地兴起，粤汉路最先接火，举行了罢工。

八月二十七日，京汉铁路工会决定下达复工命令。一周以来，为了应付瞬息多变的斗争局面，大家白天黑夜，通宵达旦，食不甘味，寝不安席，至是始获休息。当大家正在开会讨论复工后有关问题时，忽北京来人，区委有急事要我火速进城。会议开完后，我立即往外走，大家伙说：“吃饭再走。”来人说：“回去再吃。”老史、老陶齐说：“我们送老罗回北大去。”于是四人乘车回京，在车上一面谈工会事，一面嚼着火烧馍。火车到站后我立即赶到北大西斋。时粤汉路工会已派人抵京，报告该路正酝酿斗争，郭静箴来信称该路形势十分紧急，要求北方书记部派得力人员前往该路助战。同时，京奉铁路、山海关、唐山及开滦五矿亦来人报告正在准备斗争，因此，我回京后，北方区委立即召集会议。在区委会议上由老史报告长辛店罢工经过及胜利消息，大家甚为振奋，会场上顿时充满一片欢快声。会上讨论了粤汉路、京奉路及开滦五矿斗争问题，讨论结果，会议决定由长辛店工会选派两人偕同粤汉路代表即日动身回湖南去，帮助他们组织斗争，并由长辛店将罢工中的存余款项先行提出一部，作补助粤汉路办公费用。关于京奉、开滦方面问题，决定我即日动身往唐山，先召开唐山党团会议再行酌情决定。北方书记部也派人前往粤汉铁路帮助组织罢工，不久，粤汉铁路罢工于九月八日爆发。对此，北方书记部发出通知，要全国各铁路工会给予有力的支持，在必要时准备各路同盟罢工助战。粤汉路经过十五天的罢工，终于胜利结束。当时北方书记部主要任务为开展北京迤东地区铁路矿山工人联合大罢工，我自唐山返回后，复于十月一日前往唐山，随即驻唐山参加领导京奉路与五矿罢工。

十五、北京迤东地区的罢工斗争

规划和起步

一九二一年底，在陇海路罢工胜利的基础上，北方书记部进而考虑下一步工作，为贯彻党中央大力发展工会组织的指示精神，亟需对北方地区作全面规划，提出一个方案来。北方书记部一向把产业工人的发动和组织工作摆在优先的地位，经过多次研究，除对几条主要铁路工会作了规划外，还着重讨论了在北京迤东的工业地区开展工作的问題。这里包括从山海关到天津、唐山一带，是北方最大的产业工人聚集地，总计约五、六万工人，他们分布在京奉路各站和唐山铁路制造厂，以及开滦五矿、启新洋灰厂、华新纱厂等大型工矿企业中。

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地位都十分重要，它还是北方的交通枢纽。京奉路斜贯其中，经山海关直达东北三省，为去东北必经的咽喉要道，东面临海，有当时北方最大的吞吐海港秦皇岛，可通往南方各口岸和世界各地，为国际贸易的重镇。开滦的煤矿资源丰富、质地优良，生产我国唯一能用于出口的原煤，当年主要为英国所垄断。唐山地区在国际贸易中居重要地位，因而它对世界的政治、经济有一定影响，曾是英、日等帝国主义争相角逐的场所。它的位置又密迩首都与天津，对国内政治也是敏感地区，能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因此，如能在这—地区，发动数万工人组织工会开展罢工斗争，这对全国的影响能起到高屋建瓴的作用。

由于这一地区的重要，帝国主义者和军阀政府、北洋财团、交通系等官僚政客集团都插手其间，也是他们利益的所在，因此控制也是十分严厉的，“卧榻之侧不容他人覬覦”。可以想见，在这里发动工人斗争，其阻力和将遇到的困难是相当大的。当时，书记部同人都是很年青气盛，在认准其重要意义后，就不计成败，努力去做，务求有

一结果。事后回顾，虽有考虑欠周的地方，但毕竟通过实践，收获是不小的。主要是锻炼了干部，增长了才干，扩大了党的影响，涌现了一批工人出身的革命领袖，如邓培、梁鹏万、王麟书、阮章、只奎元、李兴昌、袁乃祥等和一些优秀干部如王尽美、吴先瑞、彭礼和等。

书记部的规划，是从京奉路入手，组织工会，逐步扩大影响，使开滦煤矿和唐山的一些城市工厂也组织起工会来。而京奉路则又以山海关和唐山制造厂为基点，建立一个全路的统一工会组织。与此同时，开展建团、建党工作。在铁路、矿山和城市工厂工会的组织初具规模后，一伺条件成熟，就发动一场全区性的经济和政治的同盟罢工，以求改善工人的境遇为目的，从而使工会在工人群众中的威望日臻巩固，才能把所有的工人都团结在革命工会的旗帜之下。这一种设想和计划，所要达到的目标虽然有限。但在当时，要实现这一目标，发动一场同盟罢工，真正把工人都组织在书记部领导下的工会中来，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京奉路的工作当时已有了一些基础。很早我们就到过唐山从事调查。我们和当地唐山大学（原北洋路矿学校）的同学有过联系。我记得第一次去找线索，是我和两个北京的学生到唐山大学的。我向那里的同学说明来意，想找唐山地区铁路、矿山及其他方面的工人聊聊。他们当即表示愿意一道来做，于是我们双方联合进行。首先调查唐山产业工人的生活状况，调查之后，曾写了一个很长的报告，以笔名无我刊登在《新青年》（七卷第六号）上。通过这次及其后多次调查，使我们对唐山情况有了比较充分的感性认识。当年，京奉路在唐山有一个广东会馆，在铁路、矿山工作的广东籍技术工人都集中于此，所以我们就从这里着手。我们通过访问工人，慢慢地发现了他们当中有一个叫邓培的，是铁路车辆厂（南厂）的技工。于是我们就去见邓培，前后找了他好几次，他很健谈。我们对他也逐渐有了了解。

邓培是广东香山人，祖父、父亲都是产业工人，邓培进过技术学校，能看图纸操作，还懂得英文并能讲点英语。不会说普通话，有时他说广东话，我们听不懂时，他就用英语来表达。邓培为人正派，思想开朗，手艺好，技术高，带有几班徒弟，在工人中间很有威信，是事实上的头领。他告诉我们，唐山在民国元年，就有人来组织过工党，让他去参加，他没有参加。当时参加的人，不少都是技术工人，这些工人受过英国工党的影响，想在中国组织工党，加入的都是技术工人。当时已有了个锥型的组织，但因中国没有建立工党的条件，人数又不多，还没有形成势力，就很快消失了。以后，陈翼龙在北京、天津组织社会党，公开活动，也派人到唐山组织社会党支部（当时宋教仁从日本回来，想在中国搞议会道路，陈翼龙原系日本留学生，可能是受

了宋的影响，到唐山来组织社会党)。后来袁世凯下令封闭了北京社会党总部，并将陈翼龙下狱处死。自此以后，唐山工人中再没有人来组织政党活动。所以邓培说：“现在你们来组织马克思主义的工会，我是赞成的，但鉴于前两次的失败，你们要作充分的准备。”并表示他愿意参加此项工作。唐山地区的工作，邓培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南厂也通过邓的关系，工作慢慢发展起来了。

一九二一年，经我提出，最后经过北京区委的讨论研究，决定发展邓培为中共党员，他是北方最早的一批工人党员之一。邓培入党后，唐山地区的工作进展更快了。这时，唐山工人俱乐部已经组织完善了，邓培是俱乐部的负责人，后来又办起了唐山铁路工人图书室，陈列有各种适于工人阅读的进步书刊，如《新青年》、《工人周刊》、《劳动周刊》等。随后，唐山的党组织也建立起来了。

山海关与唐山罢工¹

一九二二年初夏，尽美新从苏联东方民族大会回来，主动提出到山海关工作。山海关西靠燕山，东临渤海，地势十分险要，为军事要塞，时为直系军阀所控制，对工人防御亦极严密。当地工人帮派分歧，相互嫉视，开展工作极为困难。但尽美深入基层，亲作苦工以接近群众，进行宣传说服，终于排除各种艰难险阻，博得工人群众的拥戴，进行宣传说服，终于排除各种艰难险阻，博得工人群众的拥戴，约经三个多月，才建立起京奉路山海关工人俱乐部，同时又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

是年秋天，京汉路八月罢工胜利后，一次我与邓培、尽美三人同登山海关，会见了山海关俱乐部和党的负责人佟惠庭，共同研究山海关的形势问题。时适山海关俱乐部发动撵走工头赵某后，其余党陈宏经怂恿路局无端开除俱乐部委员佟惠庭和景树庭二人，恣意破坏工会，工人十分义愤。在此情形下，究竟应采取何种对策。大家分析后，决定趁此开展一个大规模的抗议斗争，以求彻底解决增加工资的问题，并作好罢工斗争的准备。这一工作由王尽美会同俱乐部负责人佟惠庭主持。与此同时，唐山也开展经济斗争，准备必要时发动罢工，与山海关相策应。由邓培准备，我赞襄其事。

唐山制造厂有三千多人，因邓培是制造厂的工会负责人，又是中共唐山地区的负责人，他对唐山地区情况很熟悉。唐山罢工决定由邓培主持。长辛店八月罢工的胜利，对京奉路各站鼓舞很大，工人改善工资待遇也跃跃欲试，九月十一日，我偕长辛店工会代表王俊、须

¹ 标题侧，作者补有“二题分开独立”字。—补注

永德到唐山后，见到邓培，了解当地情况后，建议他立即组织罢工委员会。主要成员有：邓培、王麟书、刘玉堂、阎福堂、罗占先、李福庆、李显廷、梁鹏万等。罢委会组成后，讨论了向厂方提出的条件和要求，并推我执笔，写了一个简短的宣言，提出所议的五项要求。宣言历数了工人的苦况。其文如下：“我们在黑暗地狱的唐山制造厂工作，迄今十有余年。悠悠岁月，来了又去，去了又来。终日精疲力竭，执奴隶牛马之役，为的是资产阶级的繁华富丽。到而今工人的生活，竟至辗转沦落，每况愈下……我们怀着无限悲愤，到此万不能隐忍了！所以于今日提出最低限度条件五则，向路局交涉，限期答复。我们认为这些条件，是起码的要求，只有全部允许，决无磋商余地。现已全体公决，誓非达到目的不止。”

接着提出了如下的条件：

(一) 星期及各种假日，须照常发给全薪。

(二) 工人有入厂十余年或七八年未加薪者，应即日加薪。按月薪十五元以下者加三成，十五元以上者加二成，五十元以上者加一成。

(三) 以后每年应加薪一次。

(四) 此次直奉战争，工人所受损失，应照车房例，包含下列各项，(1) 三年须有二月例假。(2) 每年须有两星期例假，假期中发给全薪。(3) 病假须给全薪。(4) 工人向厂买物及购煤与员司受同等待遇。(5) 每年发给五路乘车免费一次。

九月十三日，向厂方正式提出上述要求，并限三天答复，厂机务处未予理会。我与邓培商议，认为有必要召集全厂工人大会，讲清情况；同时进行宣传鼓动，要作立即罢工的准备。会上可请长辛店工人代表介绍八月罢工斗争胜利的经验，以壮士气；同时可联络山海关、秦皇岛等地工会派工人代表出席。于是，于十四日午后，全厂自动停工，举行群众大会。会前我们做了充分的组织动员，结果全厂三千工人都出席了大会。主席邓培宣布开会的意义后，首由长辛店工会代表王俊演讲，大意谓：唐山工人旧有南北界线，大家要明白这是旧社会的坏习气，工人应不分南北，团结起来为本阶级的利益进行斗争。继续发言的是长辛店工友须永德，介绍长辛店八月罢工的经验。随后有山海关代表佟惠庭演说，唐山与山海关工人应密切联系，一致奋斗，互相支援，“打虎需要亲兄弟”，只有团结起来才可以很快达到目的；并报告了山海关正在做罢工的准备。大会后，全体工人敌忾同仇，战斗精神大为提高。遂于次日再次派代表向机务处交涉，厂方仍一味拖延，迟迟不予答复，直到十月初，工人忍无可忍，乃举行大会示威。厂方才不得不商量退策，经路局同意，答应工人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工人坚持必须答应全部的条件，否则于十月十三日一律罢工。厂方未

予答复，于是酝酿一月之久的罢工，遂于十三日凌晨爆发了。

罢工开始以后，全厂各门派人把守，纠察队长刘玉堂带领近千人的纠察队伍，巡行维持秩序，工人个个精神焕发，与平日大异。厂方这时见工人组织纪律严明，非同小可，十分惊恐，请求警察厅出兵保护。保安队逮走了一些出外联络的工人代表。工人闻讯，积愤愈烈。罢委会随即组织群众游行示威，抗议厂方捕我工人，要求立刻释放被捕工友。

罢委会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路局用大量金钱雇买工人来破坏罢工。纠察队就一面查获破坏事件，一面揭露敌人用金钱收买工人的阴谋，劝告受蒙蔽的工人，不要轻易上当，自相残害。路局吁请当地美国驻兵出来镇压，纠察队就沉着应战，并致函美国兵营，质问他们是国驻兵出来镇压，纠察队就沉着应战，并致函美国兵营，质问他们是国驻兵出来镇压，纠察队就沉着应战，并致函美国兵营，质问他们是国驻兵出来镇压，纠察队就沉着应战，所以美兵也不敢妄动。

罢工坚持近八日，当局无法制止，厂方怕殃及周围厂矿，扩大事态，不好收拾，乃不得不作出让步，答应将所扣的工友放回，并与俱乐部商议办法，基本上答应了所提各项条件，于是在十月二十一日复工。

现在补叙一下山海关罢工事，先是，王尽美赴山海关与山海关俱乐部主席佟惠庭积极筹备，组织罢工。在唐山罢工正在酝酿时，尽美来到唐山找我，商谈山海关罢工斗争诸问题。尽美说：山海关俱乐部已于九月二十号左右向路局提出六项要求，条件如下：

(一) 速开革陈宏经，请我们的代表佟惠庭景树庭二君复职，并将二君停工期间工资完全发给。(二) 每星期日及各种假日，均要休息，并须发给全薪。(三) 凡工人一律加薪，按十五元以下者加三成，十五元以上者加二成，五十元以上加一成。(四) 以后每年加薪一次。(五) 此次直奉战争工人所受损失极大，应照火车房例，同样发给奖金。(六) 关于待遇平等，包含下列各项。(1) 每年须有两星期假，假中发全薪。(2) 每三年须有两月例假中发全薪。(3) 病假必须发给全薪。(4) 工人向厂买物及购煤，必须与员司受同等待遇。(5) 工人家眷来往乘车，须发给全免费票。(6) 每年发给五路乘车免费票一次。

此外，尽美还谈到，廿五号召开露天大会事，当时，全体工人表示，如果路局不答应所提条件，决心坚持到底，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工人情绪十分激烈。我们对山海关斗争情况分析后，认为工人决心很大，罢工准备也已成熟，可以不等唐山，先进行罢工斗争。于九月三十日，我偕尽美同去山海关，正值路局发布一告示，宣谕工人，对工人所提条件几乎未作答复，工人对此愤懑已极。我和尽美见此情形，

知道不采取罢工手段，当局是不会理睬工人的要求，遂决定次日下午召开露天大会，进行动员。开会时，满场白旗挥舞，口号声此起彼落，会场四周大幅标语，琳琅满目，气氛十分激昂、热烈。工人确已发动起来，罢工条件已趋成熟。主席佟惠庭宣布开会，并发言表示俱乐部决心奋斗到底，直至取得胜利为止，工人报以热烈掌声。接着唐山工人代表和秦皇岛工友俱乐部代表相继发言，表示愿与山海关工友一致行动。王尽美也上台讲演，鼓动大家努力奋斗。群众情绪这时达到高潮，高呼“驱逐工贼陈宏经！”“打破奴隶制”等，观者极为动容，足见尽美平日工作之深入，他已深得工人的爱戴。最后主席宣布，限当局三号晚答复，否则举行罢工。

十月四日，山海关工人开始罢工，尽美起草宣言，吁请各地工友实力相援，一时京津各报纷纷载山海关罢工消息。这时唐山工人也正准备罢工事，决定加快步伐，提前罢工声援山海关工友。

罢工后，山海关路局见工人团结坚固，知不可轻侮，并风闻唐山工人要于近日罢工，若卷入唐山工潮漩涡之中，将益发不可收拾。路局即于十月十二日接受工人所提条件，并由该路局长明文批示：“陈宏经立即革除；佟惠庭、景树庭二人复职，补发全部工资。”于是，山海关罢工胜利结束，前后约历十天。

山海关罢工的胜利，曾给随即发生的唐山罢工以很大的鼓舞，唐山制造厂罢工从酝酿到胜利，历时较长，困难程度也比山海关要大，但山海关的胜利给唐山工人带来了斗争必胜的信念。而山海关和唐山制造厂罢工的胜利对开滦五矿工人又是一种促进；对于即将进行的开滦五矿斗争也是一次小练兵，大家更觉有把握了。在山海关和唐山制造厂罢工时，开滦五矿的斗争已在进行中。本来书记部准备同时进行，来一个北京迤东地区的大规模同盟罢工，但由于各处情况复杂，准备工作难易不同，发展形势变化不一，人手也告不足等等，遂造成相继罢工的形势，而又以开滦五矿同盟罢工，规模最大，历时最长最艰巨。但干部、群众有前两次罢工的胜利，信心充沛，始终顽强战斗，不溃散、不分裂、不叛变，足以坚持到最后，使开滦罢工成为震惊中外的大事件。

开滦五矿沿革与斗争形势

开滦煤矿创于一八七八年（在此以前属于手工业式经营），是最先采用近代技术经营的本国采煤企业。庚子条约以后，引进英国资本，变为中英合资公司。该矿由唐山、赵各庄、林西、马家沟、胥各庄五

矿所组成，幅员几百里，年产煤平均为四百五十万吨，当时占中国新法开采煤产量的五分之一。开滦煤矿地跨开平、滦县地区，其中唐山煤矿产量最大，品质优良，靠近海港车站，水陆交通便利，中国北煤南运由此发生。自是以后，天津、上海、香港、新加坡、马尔他等地英国企业用煤、船只用煤与海军的大部分用煤均由此处供应。开滦公同名义上中英合办，但实际经营大权为英方所把持。中国方面以袁世凯及其他北洋军阀股票最多。英国方面东印度公司股东居多。每年纯利平均二百五十万英镑，最高时达一千万英镑。

这次开滦五矿罢工，其矛头不仅是指向英国资本家，而且也指向由北洋政府和军阀官僚所控制的华北财团。

当时，华北财团辖有三个银行，其中，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名义上是官商合办的银行，实际上是北洋政府的国家银行。中国银行享有铸币、发行纸币，代理国库和代募公债等特权。辛亥革命后，中国银行的大权，由北洋政客王克敏、李士伟、徐恩元等长期把持。交通银行是北洋政府国营交通事业轮、路、邮、电四政的金融机构，该行大权归政府独揽。从一九一四年后，它也成为国家性质的银行。这个银行的领导权，开始由旧交通系梁士诒、周自新等所把持，后来又由新交通系曹汝霖、陆宗輿等接手把持，一直是北洋政府新旧交通系官僚们的的主要经济活动地盘。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在当时号称为北洋政府的“中央银行”。

在华北财团各银行中，军阀官僚个人的投资和存款，占有很大比重。据估计，北洋政府主要军阀官僚七十二人，拥有私产总数达六万六千五百四十万银元之巨，其中拥有千万元以上私产的共有二十三人，曹锟和张作霖二人各五千万。这些军阀官僚通过搜刮民脂民膏而积累的巨大财富，大量存入银行，成为大股东或总裁，把持着银行的大权。在开滦煤矿的投资中，北洋军阀银行的股票不少，毫无疑问，开滦五矿工人的罢工，是对他们的直接打击。因此，他们与英国资本家联合起来镇压工人运动，也是必然的。

英帝国主义在秦皇岛驻有重兵，中国军阀通过天津及当地驻军也对矿区十万中国居民进行统治与剥削，方式极为复杂，镇压与欺骗各显其用。开滦矿工在经济与政治高度的专制下面，生活非常贫困，工人每日平均工资二角，工作十二小时，下井一次常把两周的劳动在一周做完，劳动十分紧张。因工死亡仅得恤金四十元（死骡马一匹赔偿金约一百元）。长期以来由于技术设备逐渐陈旧，不断发生矿井淹水、瓦斯爆炸与井道坍塌等种种事故。如一九二〇年唐山九道巷煤矿瓦斯爆炸，造成死工人 432 名，伤 122 名的重大事故，数十里矿区哭声载道。工人自称各历水、火、刀、兵诸劫，并非虚语。因此，工人自发

斗争如厝火积薪，时有所闻。据工人谈，开滦过去自发斗争层出不穷，如一八八二年矿上北方工人曾为要求工资平等（当时南方工人工资高于北方工人）而罢工一次；一八九一年工人为了反抗外国工程师虐待又发起斗争，结果有五位工人被捕。由于英国资本家势力雄厚，而且对付工人斗争有丰富经验，因而矿工面对的是一个相当凶狡的敌人。

开滦罢工的准备

北方书记部于一九二二年初，开始在矿山广大工人群众中进行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会的工作。北方书记部负责人以身作则，动员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非宗教同盟会员，社青团员走出课堂、实验室，投身矿区从事艰苦工作。当时北方书记部的人来到矿井，带有《工人周刊》等各种革命书刊，向工友们介绍一些革命道理和工人进行斗争的事例，如陇海铁路、长辛店罢工斗争的经验。有些来自长辛店的工友向矿山工友进行现身说法，这对于后者启发特别深刻。由于北方书记部同志深入矿井，耐心刻苦工作，与广大工人群众取得联系，在唐山开始建立了地下工会。在组织工会过程中，我们特别注意联合当地矿工各主要帮派，当时唐山工人主要分成南北两大帮派。南派以广东人为主，工程技术人员居多。他们在广东街设立广东会馆，用以团结本帮工人。北派工人人数最多，又分为河北与山东二帮，河北省又分为大名、保府与河间三帮（保府，河间二帮合称顺直帮），北方各帮大多为一般井下工人，其他地方工人数量较少，附属于附近地区帮派，矿区家属、市民合计十余万人。各帮派彼此之间常因就业问题或语言隔阂发生争执，互不团结。书记部同志来后，晓以革命大义，使他们化除畛域，统一组织工会，为此做了不少工作。五矿工会领导机构大都是吸收南北各派中的革命意志坚强的，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工作者所组成。

当五矿分别成立革命工会后，又联合成立五矿工人俱乐部。实际上是领导全矿的总的工会机构。俱乐部成立后，就为改善工人的境遇着想，前面提到一般工人生活的苦况，就是技术工人也因十几年未提过工资，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生活亦很艰难。这是全矿工人最切身的大事。俱乐部为此准备了向矿局提出改善工人生活的要求，同时也作了必要的组织和各项准备。

十月十六日，开滦五矿工人正式向矿务当局提出改善待遇的起码要求，它是通过一封英文信向矿务局提出的，这封英文信由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英文组的同学执笔，采用外交辞令，文字风格力求“西洋化”，是几经推敲，三易其稿，然后打印发出的。

信的内容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叙述矿局对工人待遇不公，列举事实，使矿局感到无词推托。第二部分则明确提出六条要求，合情合理，并不苛刻。六条内容如下：

1. 按下列的标准增加工资：甲、每月工资在十五元以下者增加百分之三十；乙、每月工资在十五元以上者增加百分之二十；丙、每月工资在五十元以上者增加百分之十。

2. 每个年终发给奖金一个月。

3. 星期和新年假日停止工作并发给工资。

4. 廉价煤和慰劳金应和中级员司同等发给（凡支月薪十二元，应有享受这个利益的资格）。

5. 凡服务年限超过二十五年者，应给予和工资相同数目的养老金。如无严重的过失不得撤职。

6. 凡因公受伤者，应继续发给工资，而因公死亡者，应给予和五年相同数目的抚恤费作为慰劳金。

该信是指挥部第一个对外的英文文献，信中措词不卑不亢，颇为得体。另外还大量印发了中西文宣言和传单，向中外社会舆论呼吁，争取对工人的同情和支持。

英文信递交矿局时，并派八名代表前往交涉，代表态度坚决，限当局三日内答复，否则以罢工对待。这八名代表的情况，现查出的记载资料为：

张瑞峰	唐山井下看守人	五十岁
李新章	唐山铸工	三十八岁
刘河	林西骡夫	三十五岁
刘宜美	林西骡夫	四十一岁
孙家辽	林西机器匠	三十二岁
刘忠	赵各庄机器匠	三十三岁
葛定东	赵各庄井下机器匠	四十五岁
廖洪祥	秦皇岛机器匠，秦皇岛矿务局工友俱乐部的委员长	

二十五岁
矿局接信后，见内容清楚具体，无回旋余地。总矿师杜克茹（A. Dosgties）一贯傲视矿工。他对此十分恼火，蛮横地对代表说：你们的条件可以考虑，但劳资双方不能处在政治上平等的地位来谈判，工会不能成立，矿务局也不承认俱乐部是合法团体。代表据理驳斥，始终使总矿师词穷，改称需与天津总公司经理商议后再作答复，借以拖延时日。谁料他返回唐山后，竟带来两个保安队约二百多人，驻扎矿区监督工人劳动，其态度复又如前，同时出布告晓谕工人：不要受人鼓动、利用，凡提出无理要求或作扰乱的举动，本局是一定不能答应

的。他又假惺惺地说：“目下粮米高贵，各样花费又大。本局打算给赚小工钱的人加点工钱。从本月起所有每月赚三十块钱以下的工人，都照加一成。”这和工人提的起码要求相去甚远，尤不能容忍的是派保安队对工人实行监督，实属人格侮辱；且无视工会的存在。这时工会已把上万工人组织起来，岂能受此政治上的漠视，于是五矿俱乐部召集代表开会商讨对策。会议正在林西召开时，竟被矿局侦知，派保安队来驱散，并当场抓走表示抗议的六名代表。工人闻讯后，群情激愤。只奎元找到我和邓培商议，认为罢工势在必行，工人情绪高昂，特别在唐山、山海关、京奉路罢工胜利的鼓舞下，干部都跃跃欲试，俱乐部也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团结更广泛的群众而巩固发展。这也是半年来书记部所预期的计划，几经考虑，认为应当机立断，否则敌人将更有准备，于是决定次日五矿全体罢工，当晚各代表分头通知各矿工会传达罢工命令。于是从十月二十三日起，唐山、林西、马家沟、赵各庄、胥各庄同时举行罢工，井上，井下，机务各处总计三万多工人全部停止工作。一场震撼中外的开滦五矿同盟罢工就此开始了。

矿局方面，对罢工是早有准备的，其主要人物是比利时籍的总矿师杜克茹和英国籍总经理杨氏（Young），起决策作用的是英国董事会。英国是一个工矿业多，工人罢工也多的国家，英国统治者积有对付工人的丰富经验。平日，他们就和当地军阀政府相勾结，采用现代的侦缉手段，注视着工人的一举一动，当唐山铁路制造厂的罢工还在进行时，矿局就和直隶警务处互通情报，对工人严加防范。这里摘录一段事后得悉的他们往返的函告，就可管窥他们所持的一般态度。警务处给矿局的信函中，通知矿局，京奉铁路职工已罢工，很可能也影响到矿区，并说：“闻讯林西矿工人已被铁路职工所引诱，铁路职工答应给予他们数千元作为进行罢工的开销。据说该工人等对于他们的斗争表示热烈同情，并已决定与他们采取一致行动。此事现正在秘密进行，尚未泄露。当探知这种阴谋时，立即派出得力警察和便衣侦探到各处秘密调查，但是因为他们严密地进行阴谋活动，尚未能探出他们的机关所在以及其首领的踪迹，至于已探得的消息可以概括如下：他们拟借煤斛加价为名要求增工资。他们打算提出以下五项要求：（一）在开滦矿务局服务二十五年或超过二十五年的工人每年给予慰劳金。（二）因为生活高涨，全体工人应增一定数目的工资。（三）建立工人医院，工人病伤得在此医院治疗，由开滦矿务局负担花费。（四）工人死亡，开滦矿务局应给予埋葬费。另外，工人因公受伤，在医疗期间，应照付每日工资，不得扣减。（五）全体工人在星期日免于工作，如果需要工作，这天应给予他们双薪。以上五项要求将在他们罢工开始之前提出。如果他们的要求不蒙允许，他们将以罢工相威胁以

求接受他们的条件。这是我们所探来的全部消息，……。查唐山路工罢工风潮现时尚未平静，矿厂相距甚近，煽惑引诱亦势所不免，除飭该署长督飭官警，受姚队长指挥，严密防范，一面晓以大义，切实开导，俾知其各人切身利益关系以维公安外，相应函请查照。”

在另一封信中说：“制造厂罢工现已四天，连日局长（指公安局长）随同路局人员与工会代表讨论要求各条件。该代表等坚持甚力，一时恐难了结。”

矿局给警务处的回函中说，“近来有煽惑者到达矿上，他们为了政治缘故，正在试图制造工潮。这些人引导工人组织联合会，并向敝局提出许多要求。”这里的“联合会”就是指“五矿工人俱乐部”。他们之间互通情报，往还紧密，对俱乐部的活动也早有觉察。

后来在警务处长杨以德给陆军部的呈文中提到：罢工中发现“山海关京奉铁路工友俱乐部”的传单，其首端标有符号。此符号即系俄国过激派。并由此下结论云：“查此次罢工风潮，并非纯系工人生活问题，内中因有由京来唐过激主义杂手其间，前日在唐山罢工机关内查获函件，均属传布过激主义函件。”由此概见当年杨以德坚持施行铁血政策，是认为开滦罢工是一个政治事件，而对书记部的一些活动，又十分警觉，在其发布的布告则更露骨宣称：“查此次工潮，迹其种种行为，确系有奸人主动，图谋不轨，若不赶紧取缔，诚恐祸成燎原。”

为了领导好这次罢工斗争，中共北方区委与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全力以赴，组成强大的五矿罢工指挥机构。决定让邓培脱产，以全部力量投身于开滦罢工斗争，让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副主任王尽美参加指挥部。这些都是北方区委所采取的重大步骤。同时我也参加了罢工委员会，任中共党团组织负责人兼指挥部主任。先后在五矿罢工指挥部工作的主要人员还有：梁鹏万、阮章、袁乃祥、彭礼和、李梅羹、吴先瑞、李星昌、只奎元、董鸿宾、阮永、王麟书、王德舟、贾纾青、王宝仁、金满等二十余人。

这次罢工组织是相当严密的，领导罢工的机构是罢工委员会，对外仍用五矿俱乐部的名义，罢委会系由各矿工会的代表和北京区委（罗章龙）、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王尽美）、唐山地方党（邓培）的代表组成。执行机构为罢工指挥部，以下是各矿基层组织，全体罢工工人都组织在“十人团”中，每十人组成一“十人团”，选团长一人，负责组织 and 召集团内活动。指挥部还设有调查部和纠察部。调查部从事调查内外奸细，查处破坏工会的事宜，如有情况立即报告调查部长，提到罢委会中讨论。纠察部下设纠察队，共有纠察队员近两千人，分设几个大队和支队，纠察队由张隐韬等同志训练，纠察队员中有不少人是经历过行伍生涯的。他们具有战斗经验，由他们督导上阵，能做

到见阵不惊，勇猛顽强，这种精神在和敌人多次枪击的激烈冲突中完全体现出来了。平日，他们巡行于街市，保卫厂矿，守护矿井，维持开会会场秩序。开滦矿工的纠察队在北方的各次大型罢工斗争中，是组织得最好的，远近闻名，当年报刊曾有过详细的报导。

罢工指挥部为适应斗争形势需要，有时设在铁路与工矿中心地区，有时改在唐山大学办公，均以取得广大革命群众的掩护与支持为条件。

罢工指挥部事前充分估计了敌人的反动本性和可能采取的手段，为了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指挥系统始终分散隐蔽，罢工指挥部设在南厂（即唐山铁路机车厂）附近。宣传机关则分设在各矿厂郊区工人住宅内。掌管工会基金的财务机关设在较安全的山海关铁路工会附近。在五矿罢工期间，还在天津租界设置罢工事务联络站，由宋天放、李梅羹等在联络站负责，所有关于罢工新闻公告文件等，均在天津秘密印刷发布，并开辟有内部交通接头处。同时，在开滦罢工期间，党集中了唐山地区的党员，其中包括铁路机车厂（即南厂），开滦五矿、水泥厂、秦皇岛桥梁厂、唐山大学等地的党员，组成开滦罢工中共党团，成为罢工斗争的核心机构，一些重大决策都须经党团讨论。罢工党团设在市外，以备随时转移地址。当时唐山党的领导力量是很强的。在罢工期间，斗争形势瞬息万变，并且多次发生武装冲突，党组织面临繁剧任务，始终保持步伐整齐，临危不乱。这些都说明唐山党组织确实具有相当强的组织与指挥能力。

矿局对付罢工，诡计多端。归结起来，其第一个办法，就是武力镇压，以保护英人利益为名，四处求援，调动军警来镇压罢工。第二个办法就是从内部离间工人的团结，瓦解工人组织，派遣所谓“和平使者”向工会活动。第三是用经济围困方法，威胁工人生活，借以使工会就范。矿主既采用上述各种方略围困工会，工会亦针锋相对，组织反击，如此相激相盈，造成长期罢工局面。

罢工以后，矿局外籍员司感到非常恐慌，一面请天津英领事派兵增援，到矿场保护，同时又请曹锟加派中国军队与外国军队协防。当年开滦五矿虽是一个工矿企业中心，但同时也是一个军事重镇。天津迤东、唐山、开平、滦州一带，军阀政府的军队计有开平镇守使殷本浩驻军一师；滦州第十五师（师长彭受莘）、十三混成旅董政国一旅驻军；天津直隶警务处杨以德所辖的保安队共五大队约三千人。此外，外国军队驻唐山者有英国、印度兵一中队约五百余人，由英国人斯莫莱（Smalley）上校统率；林西、赵各庄分驻英兵各一队，约三百人，由芬尼士（Finnes）上校统率；秦皇岛有英国兵一队约五百人，由詹姆士（Jams）统率。总计在这一地区约有兵力上万人，故英国矿业资本家在获悉罢工消息后，第一是给曹锟发了一个电报，要求曹锟政府

尊重条约，保护英国人的利益。于是，曹锟就派了一个师到矿山来镇压工人罢工。第二是英国董事会在罢工期间，又前后送了一百二十万元给天津警务处处长杨以德，重贿杨以德。杨主张借武力解决，派了大量保安队进驻矿山，伺机镇压罢工。这样，罢工期间，矿上有帝国主义的军队、曹锟的军队，还有天津警务处杨以德的保安队等，构成了对付工人的强大军事镇压机器。

面对上述强大的敌人武装势力，罢委会曾作了详细分析，认为：开滦五矿工人的罢工，仅靠二千徒手的工人纠察队是无法对付上万的武装军队的。如果敌人的这些武装力量都联合一致，对罢工采取强硬态度，那前途就非常可虑。罢委会研究决定，采取分化的策略：争取态度，那前途就非常可虑。罢委会研究决定，采取分化的策略：争取能同情工人的部队，而孤立顽固的势力。于是指挥部通知各矿工会组织宣传队，分途向各驻军宣传罢工的起因，并指出罢工的举动是文明国家的通例，是民主国家工人的正当权利，不可用武力干涉，而这次罢工实出于争取生存权利，是被迫出来的。工会也向军队写信，说明工会态度，揭露英国资本家欺凌工人的罪行，希望驻军不要同工会对抗。我们不仅向兵士做宣传，也向驻军长官做宣传。士兵听后甚为感动。股本浩、董政国等平日对英国资本家及唐山的洋员横行本怀不满，又见保安队军纪败坏、鱼肉乡民的行为，亦大不以为然，群众对保安队更是人人切齿。殷、董在我们做了工作后，采取不干涉态度。某军官说：“我们没有得到什么钱，工人又都是我们的乡亲，我们没有义务来屠杀工人。”他们保证不开枪打工人。股本浩还主动要矿局让步，提出调解方案，并愿意在必要时出面调停。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全力对付杨以德的保安队了。我们对保安队则针锋相对，保安队巡逻，工人纠察队也巡逻，互有冲突。工人纠察队并不示弱。遇到保安队抓人，纠察队就去把人抢回来。有时，保安队出来巡逻，我们纠察队巡逻的人也抢他们的人。在罢工期间，工人纠察队同保安队诸如此类的冲突为数不少。我们集中力量对付杨以德的同时，对外籍军队也极力做争取工作。工会特地用英文书信、传单向英兵解释，英国既称民主政治，工会有罢工自由，更应尊重中国主权，和平相处。我们还招请外报记者，说明罢工要求条件及工会的态度。外籍军官詹姆士表示，英军保持中立，不介入罢工事件。经过一系列工作，在保安队中除一部分特别顽固者外，其他都对工人按兵不动，这样就减少了双方不必要的武装冲突。

当时，英矿局规定：自总矿师以下外国员司一律驻守厂内，守护发电厂、锅炉间、电机绞车、水泵及其他重要部门。但工人及市民平日对矿局的英、比籍高级员司的专横态度，深恶痛绝，因此罢工后，外籍工程人员时恐报复，不敢外出，好象当年义和团再临眼前的。

一次，工人纠察队在赵各庄阻截比国工程师马孟达（Malmendier）

外出求援兵，双方遂起冲突，指挥部闻讯前往解释，马已面无人色。有些外籍员司乘机请假避往天津或竟辞职回国。他们到外地和回国后，造舆论写文章，大肆污蔑说：“现在唐山又出现了新的义和团，是新的土匪。”以致引起英国朝野大为震动。《泰晤士报》曾著文报导此事。

矿局在调集军队对付工人的同时，还从外地招募工人（“夫役”）进矿工作，借以破坏罢工，约在罢工开始后的两三天内，就招来“夫役”约三百名，以后又陆续招来数百名，其中包括一些技术工人（机器匠和电机匠等），大多是在天津招募的，分派到各矿企图代替罢工工人的工作。我们闻讯后，就派工人纠察队设法赶走他们。杨以德则出动保安队保护他们所招募的工人下井劳动，纠察队就把住井口，不让他们下井。总之，敌人施出计谋进行破坏，我们就和他们斗。尽管敌人力量很强大，但我们除注意策略外还广泛动员群众，他们亦不敢小视。在双方搏斗中，情况也十分惊险，十分激烈。在斗争中时时处处都体现了工人群众万众一心，勇往直前，有进无退的革命精神。

最激烈的一次斗争发生在罢工后的第四天，十月二十六日晨八时，罢工纠察队正巡行于西大街，突与保安队遭遇，双方发生冲突。保安队势众，当场抓走纠察队员张隆、高金声、刘福存、高振中、张永利、张永顺、杨荣林等十余人，押囚在警察局。工人闻讯后，群往营救，保安队见工人来势勇猛，遂开枪射击，当场重创倒地者七、八人，轻伤无数。枪声愈响而工人来者愈多，保安队不敢再开枪，只得退守在警署门口，相持数小时始散。这次事件工人表现十分英勇。但事件发生后，也有些胆小怕事者，于是谣言纷起，加之敌人从中捣乱，一时人心惶惶。罢工委员会召集工会代表讨论，结果大家一致认为，这不过是敌人有意制造恐怖，罢工委员会应力持镇静，毋稍示弱，使敌人狡诈阴谋无法施展。指挥部派出宣传队、救护队和纠察队及时援救受伤工人，并到街头演讲、巡逻，劝慰大家不必自相惊扰，罢工秩序因此复获安定。同时罢委会通过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北方区委，在社会上大造舆论，使杨以德和矿局甚为被动。

矿局对罢工采取所谓“糖、棒”政策，在一面重贿杨以德，借武力解决罢工的同时，一面又唆使唐山天主教堂神父、荷兰人薛里渊（Soherion）出面，劝告矿区中信仰天主教的工人“不要为过激派利用，或受人煽动”，企图使工人脱离罢工。他们分矿区进行破坏，以蚕食手段，分裂罢工阵线。秦皇岛经理处运输处长李克碑（Rickey-by）用钱收买一小部分工人破坏罢工，其中一些被罢委会的调查部侦知后，派纠察队制止。敌人所谓“糖”就是对工人作很小的让步，或是收买部分工人，进行破坏，或是派出如薛里渊之流伪装慈善面目，祈祷和平，

我们就采用新闻方式，向路透社发消息而间接传至英国国会和政府。电讯揭露开滦英国资本家的罪行，说英国自称为自由民主的国家，焉能坐视不理。于是英国国会有议员提出质问，英国工党执政大臣到会答辩说：“在工党统治下是不做屠杀工人的事”，意思是说英国工党政府未参预唐山屠杀工人的事件，实属掩耳盗铃。他在国会还要装腔作势，一摊手说：“我的手上没有沾工人的血。”尽管如此，对执政工党也不无影响，后来矿局也受到英政府的一定压力。

在各界对开滦罢工的援助声中，值得提出的是唐山大学的罢课声援。他们由声援罢工转变成驱逐校长的学潮，前后竟长达半年之久。

唐山大学系北京政府交通部主办的专科学校。该校学生曾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小组，随后发展了中共党与团的组织，党员有董宏猷、许元启等。

杨以德屠杀开滦罢工工人的事件发生后，唐大学生出于义愤，学生会组织同学上街宣传，声援罢工，反对政府屠杀工人，罢工进行到二十天左右，斗争处于艰苦时刻，唐山工人到校演讲深得唐大学生的同情，为了以实际行动支援罢工工人，学生会决定举行罢课、上街募捐，并发表公告，痛陈矿工之苦况。今将《唐山大学学生赈工会公告》援引于下：

全国各学校、各工商团暨各报馆公鉴：欧战告终，真理显彰，世人皆知，世界之和平，人类之幸福，非武权之为力，实劳动之为功。而彼致和平造幸福之工人，处此物质文明生活高昂之世界，加以资本家之苛待，外界之藐视，恩人为奴隶，天下至不公平者，莫甚于此！欧美工声，日甚一日，奔走呼吁，以谋增工资、减工时之胜利，辄以极大之牺牲，达其最后之目的。迨者吾国开滦三万余苦工，因生活困难，受迫不堪，方群起向当局要求加薪，及改良待遇章程，此未始非我国劳动界进行之曙光也。夫矿工为人中之最苦者，终日匍匐暗道中，面目黧黎，手足胼胝，其不受矿毒，不死于夭折者幸矣。凡目睹其状，耳闻其情者，当如何悯恤，为之设法以改良此蛮无人道之生活也。今彼工人宣言罢工，已三星期于兹，其始也，矿务局由津雇人替接，以示拒绝，并由保安队来唐保护；后两方相起冲突，保安队即鸣枪轰击，工人受伤者不可胜数。血肉横飞，哀号呻吟，稍有人道者，何忍出此！日前津警察厅长杨以德来唐，复用种种威言，恫吓工人，冀其屈服开工。身为厅长，不察事理，反一味袒护矿局。然各工人已饱受资本阶级之苦虐，此次忍无可忍，不得已而出此举动，是以坚持到底，非达目的不止。夫劳工神圣，人所共知，矿工为同人辟利益，原为同人增幸福，其服务于社会者何如？我人知矿工在社会者何如？我人知矿工在社会中，所处之重要，知矿工所受之苦痛，即当与以特别之同情及援助。且该矿工所请条件，皆出于至诚之心，实至微之要求，可谓让步极矣。今矿局以

图利心切，拒绝要求，日以武力压制，我人纵不愤矿局之断丧天良，独不悯工人之痛苦乎！同人等肄业唐地，闻见较详，爰本赈助之意，认为工人略述苦况，哀告于全国父老兄弟姊妹们，以冀有援助，则不特唐地工人之幸，抑亦劳动界前途之幸也。再者：五矿罢工已越三星期，工人之资斧窘极，维持困艰，危在旦夕，诸君子能解囊慨助，敬请早日赐下，并请汇寄敝会会计贾存鉴代收。

唐山大学学生赈工会谨启

(原载 1922 年 11 月 16 日天津《泰晤士报》)

唐山大学学生会的行动，使反动政府和学校当局十分恼怒，已伏下镇压之机。矿工俱乐部不断派人前往学校帮助学生会工作，同时也邀请学生给工人讲演，同学在矿工支持下热气很高。事为教育部和交通部所悉，急令在京的唐大校长俞文鼎由京赶回；俞文鼎返回后，不顾学生反对，竟无理开除五名学生代表。并威胁学生们说：“学校是靠政府交通部给钱办的，现在你们站在工人方面，反对政府，我们学校还能站得住吗？这岂不是等于自杀吗？”他的这一套言辞，对学生根本不起作用。于是校长又邀保安队进校弹压。这样一来更使学生气愤，且俞文鼎自长校以来恶迹多端，同学遂转而向学校当局展开斗争，实行罢课。十一月十八日，俞忽出布告，以学生行为过激，奉交通部令，着即解散，五名学生代表送天津警厅关押，强迫学生收拾行李，由军警押送天津。同学受此压迫，遂向各界呼吁，并向政府与国会请愿，要求撤换校长，风潮愈演愈烈。这时开滦罢工已经结束，各界转向支援唐大学潮，终于使俞文鼎被撤换。此次学潮，一直持续到次年春天才告结束。

募集罢工基金

准备罢工时，书记部在北京召集路矿联席会议，专门讨论支援五矿罢工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为罢工经费问题。矿工俱乐部代表提出报告，估计当前罢工最大限度以二十天为期，按这一期限计算，工会罢工基金准备尚嫌少，大多数计日发工资的工人更须依靠工会救济，因此决定成立罢工经费募捐组、保管组及监察组。募捐组由各主要铁路工会负责人组织。保管组由罢工委员会负责人只奎元等负责（书记部人员规定不参与财物保管）。监察组由矿工会代表李兴昌等三人和铁路代表甘达等二人共同组织，以邓培为主任。同时，由北方区委报告中央，函达全国各工会就地成立开滦五矿罢工经济后援会，大规模进

行支援及捐款活动。

当时书记部曾有规定，书记部工作人员不参预钱财的管理和出纳，完全由工人代表和当地干部经手，书记部只提建议。

最先由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公开宣传筹备募捐事宜，随后唐山大学也成立了矿工罢工后援会。同时，中国南北各工会，各学生会，国际革命机构，海外华侨各团体纷纷成立开滦五矿罢工后援会，一齐动员，奔走呼号，集腋成裘，募集寒衣药物，源源送到矿区备用，有力地支援了罢工。当罢工面临紧急关头时，罢委会报告存粮存煤将罄，急需补充，否则有断炊之虞。尽美建议急电上海中央，催促汇款，我即用英文发急电(SOS)致上海中央，文云：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Miss Dshun-yin Tanshan in Danger Dragon. 即“上海商务印书馆钟英女士，唐山危急，龙”。此电由唐山在天津联络站派宋天放到北京拍发，第三日即得中央回电。¹事后据说当时中央在开会，大家正为某项问题发生分歧，各逞己见，互不相下，忽接此电，国际代表马林说：一切纷争应立即停止，率先抢救开滦罢工。中央竭力罗掘，得款一万元，即派专使携款到天津，我将款送交保管组负责人领收。当时收款人问道“此款抬头用啥名字？”梁鹏万说：“就写新加坡工党吧！”此款到后，使罢工委员会及时解除经济危机，使局势暂获稳定。

在罢工期内募得的捐款约为五万元，其中党内外募捐一万余元；铁路、海员工会二万元；国际工会方面一万五千元，由魏尔德(Wild)交来；其他方面机关团体五千元。上述捐款均由罢工委员会统一收支。据杨以德当时搜查所获，事后公布的矿工会一部分账簿所记：京奉铁路工会一千元，香港海员工会二千元，驻马店工会机器研究所一百七十元，浦镇机器研究所一百元，大槐树机器研究所五十元，山海关铁路工人俱乐部五百元，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二百元，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三百元，南洋新加坡工党一万元。以上共一万四千三百二十元。实际上当时按各地工会捐款系分批汇寄，如长辛店前后寄款三次，其中一次曾寄三千元，其它各工会亦然。估计全部罢工款项总额约在六、七万元内外。

当时北京《晨报》亦报导过捐款情况，其中记载有“北京方面得款三千八百元，南洋孙某汇来万元，广东海员工会二千元，安源一千六百元，京奉全线助款约七千元，以上共二万六千四百元……”上述记载略有出入。

国内外募集支援罢工经费积有成数后，源源汇寄工会，其中还有少数实物，如医药、寒衣、日用品等。罢工一开始，罢委会就动手考

¹ 此段侧，作者补有“1922年10月-11月上旬留俄，11月15日陈已返国”字。—补注

虑困难工人的救济问题，办理粥厂，搭盖临时伙房，安设巨锅，对于急需救济的工人及其家属按户登记，分区供应稀饭，窝头或其他面食品等。工人在这个“免费食堂”排队依序进食，有条不紊。

罢工委员会负责人每天饭后分区召集群众开会，报告当前罢工新闻，听学生演讲，念罢工小报，当众散发工会宣传品。有时自己带头执三弦或小鼓、竹片，高唱罢工歌曲，杂以鼓词、快书，兴尽始散。时有当地民间艺人演唱“矿军下江南”鼓词，内容是说江西矿山工人在明嘉靖四十五年起义，诛杀贪官污吏，占领江西、浙江十余州县，建立平民政府等。这些内容极为新颖，听众叫座，欢呼不置！办起这个“免费食堂”效果很好，增加了团结战斗的气氛。

开滦罢工正是煤炭产销旺季，书记部在准备罢工期间，考虑到罢工的基金可能问题，曾向各路工会及其他工团作了动员，加紧募捐工作。罢工开始以后，捐款已达到一个相当的数目，但开支也逐渐加多，特别在罢工进行二十天以后，正值天寒岁暮，经费更感紧张，加之，十一月中旬又因机关被抄查，捐款损失了一部分，由于党内外再次积极筹款，才得以维持。大灶食堂直到最后，仍照常进行，始终没有停伙。

矿务局让步与复工

这次罢工，工会原订计划以坚持二十天为期，届时资方损失巨大，将寻求解决。但罢工到二十天时，筹募的罢工费已大部用罄，而来源渐少，时届旧历年关，冰雪沍寒，工人及其家属数万人，嗷嗷待哺，啼饥号寒，工会多方筹措，设法渡过难关。但当时有些家口众多的少数工人，见资方仍顽固不化，主张无条件复工。罢委会便多方抚慰，号召大家坚持到底。正在此时，开滦矿务局董事会据英国公使馆提供的罢工情况：“开滦工潮主持者，正在准备发动全国的铁路工人，发起更大规模的反英杯葛(Boycott)运动，如果这样，英在华北利益将蒙受重大损失。”因此他们为了在华北的长远利益起见，决定对工人做出适当的让步。而杨以德等人仍主张与工会对抗，蛮干到底，并多次向天津开滦矿务总局申言反对和平解决，开滦矿务局董事会，权衡利弊，拒绝其请求。事实上，矿局已因罢工风潮损失浩大，据事后获知的材料，一九二三年二月二日开滦总经理致矿局董事会伦敦开平公司的信中称：“此次罢工意外的直接支付的开销是181,563.94元，同时总稽核估计总损失包括售煤与直接支付的开销共为746,000元。”实际损失要比此数更大。除十月与十一月直接售煤的损失外，车皮已

被分散，正规的营业计划受到障碍等等都未估计在内，至于进行贿赂和收买工人的款项，更是无法估计。

十一月十五日矿局派人向工会表示愿意接受部分条款，杨以德亦将保安队撤回天津。罢工委员会即开会讨论。大家认为距原六条较远，少数委员仍主张罢下去，不达全胜决不上工，但罢工势难再延。因此党团会议又详加研究，鉴于当前局势难以扭转，便作出决定下令先行复工，以待来春再战。经罢委会作最后裁决，遂于十一月十七日由矿工俱乐部下令复工。复工那天，矿局总矿师宣布承诺工人部分要求，其余以后再作商议，矿区保安队全部撤离，释放被捕工人，矿局为工人鸣放鞭炮，欢迎工人进矿上工，于是开滦罢工宣告结束。此次罢工历时二十五天，英资本家共损失达一百五十万英镑。罢工结束后，当地党与工会组织随即转入罢工善后安排和从事保障工人既得利益的工作。不久，我回到北京，此时邓培、王尽美均已在京。北方区委详细讨论了五矿罢工的经验与教训问题。在区委会上，有的同志愤愤不平地批评罢工缺点，说自书记部成立以来，领导了十多次罢工，结果都获全胜，哪一次不比开滦的结果强！但区委决议认为一切斗争要从全局考察，不能片面地挑错儿说话，罢工斗争如同作战，胜败乃属常情，不宜自馁。

另外，开滦煤矿股票在国际市场急剧下跌，在开滦五矿罢工之前，开滦的股票是非常稳定和值钱的。自开滦五矿工人罢工后，股票市场纷纷抛售开滦股票，致使股票价格一直下跌，资方因此也吃了大亏。

铁牛事件¹

在开滦罢工两个星期僵持不决之时，工会中有些急进青工，不能忍耐而主张采用激烈手段破坏矿井，与敌同归于尽，并想借此手段，令其无法生产，以挟迫矿局屈服。有的甚至说：“与其不死不活，不如奋勇向前，宁可人头高挂，决不输却威风！”一时附和的也大有人在。当时全市讹言盛行，一夕数惊！军警戒严，风声鹤唳，真是草木皆兵！针对这种情况，指挥部负责人即将此问题提出讨论，会议上大伙认为遵循正当罢工斗争途径，坚持不懈，估计可以达到胜利。如改途易辙，必须重新部署，不说困难多端，即使勉强执行这些主张，也必定有害无益，况工会大多数会员都不同意这种做法。因此，指挥部决定向这些人多做解释说服工作，顾全整个斗争阵营，坚持原定斗争部署。他们最后明白了，也就不再坚持了。

¹ 此题侧，作者补有“异想天开”字。— 补注

正在这个时候，忽然发生一件极不利于工会的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原来京东地区向有秘密帮派组织，并有矿工加入。他们平日结党自卫，渐至为害一方。马家沟、林西一带帮派组织横行事，所见亦属不鲜！五矿罢工后，当地帮派头领起初是坐山观虎斗，不愿积极参加罢工斗争，更有少数游手坐食之流，颇思乘机捞一把。据邓培谈，某帮头目竟异想天开，说书记部以巨款援助罢工，本身当为一大财主，因此颇思绑架书记部负责人，或勒索，或送官，可借此掳得一笔横财。他们正在设法踪迹书记部负责人行止时，事为罢委会所侦悉，乃转告邓培，因此让我多加小心，注意防范，免堕陷阱。我说：“既有此事，便不应仅作消极防范，这是工人内部的事，要认真考虑，彻查明白，然后予以有效处置。”随即交有关方面加以调查研究，终于把问题弄明白了。原来，在组织工会的过程中，最初是把力量集中在技术工人方面，借以带动一般在册的工人，工会会员也主要是以上述两种工人作为成员。但事实上五矿地区范围广阔，加上生产方面存在某些劳动力不均衡现象，因此矿局经常招募一批季节性工人，这些工人不在工册，叫做短牌工人（临时工）。短牌工人系临时性质，没有被组织在工会以内。他们在工作与生活方面所发生的问题也就在客观上被忽略了。当全矿进行同盟罢工，面临巨大斗争场面时，数以万计的短牌工人没有组织在战斗系列之内，这是非常不宜的事，果然问题就在这里出现了。当时短牌工人人数既多，其中自发性的帮派组织和秘密结社习惯也是普遍存在的。在这些群众的自发组织中，有一派势力较大，共奉一个绰号为铁牛的工人刘宇堂做首领。这一群青年工人沾染旧社会习气颇深，平日自由放纵，游侠自喜，身藏利器，横行无忌。他们自觉没被工会吸收，有问题既无法提出，也无人理会，于是对工会渐生隔阂与误解，时时抱怨工会对他们不公平。有时工会内外双方群众甚至发生冲突。他们中还有个别人异想天开，打算绑架书记部负责人进行勒索，以泄私愤。此事的缘由弄清后，我感到问题重大！当时有人主张派纠察队以武力压制，狠狠教训他们一顿，认为这样他们就不敢乱动了。当指挥部讨论这个问题时，大家认为对短牌工人动武的办法不妥，如果这样，会造成工人内讧，影响大局。经过考虑后乃决定派人把铁牛请来说理。

在工会的一间小平房里，铁牛偕同亲信三人被引进来，他们开始神情有些局促不安（屋外有纠察队站岗），我便向前招呼并同他们握手，他见我服装不整，风尘满面，有些疑虑，问道：“你是大当家吗？”站在一旁的同志答道：“这就是咱们的大掌柜！”铁牛自觉有些尴尬，嗫嚅说：“我们一伙董事会不重视，工会也吃不开，实在没办法！”纠察队长从旁说道：“书记部是工人本身的组织，对书记部绑架行为

打的情况下，仍然奋不顾身，如五矿八代表，北方书记部干部、唐山大学的党、团员和唐山地区的干部等，他们以身作则，带领群众，前仆后继，奇情壮采，尤为不可胜纪。

但是事后有人因身处局外，不明真象，甚至虚构事实，颠倒黑白，借以贬低这次罢工的意义，这都属别具成见与违背历史的不负责态度，理应加以明辨。

开滦罢工人数众多，经时颇长，敌我双方事态繁复，斗争激烈，而且双方互相封锁情报。因此当年除身历其境的主要负责人员外，一般局外人士对于罢工斗争内幕，是难以悉其底蕴而窥其全貌的。

长期以来，对于开滦罢工这一段历史，由于文献不足，当事者风流云散，更增加了研究方面的困难。¹

开滦罢工一文写竟，已届午夜，怀念往事，怅触前情，援录旧作开滦罢工纪事诗四首，以殿本篇。

开滦罢工纪事诗（四首）²

（一）登山海关

风雪榆关道，同君到海隅。
地掀千嶂起，波涌片帆孤。
海岳兼形胜，天人辟坦途。
叮咛五矿事，喜汝建良图。

同游者邓培与尽美。

（二）

开滦半壁半修罗，五矿由来半份多。
慷慨悲歌新乐府，万人齐唱罢工歌。
修罗即地狱。半份指矿井无完全身份的短牌临时工人。

（三）

大地煤山万壑陈，熊熊烈火耀星辰。
如今春动龙蛇起，冀北千秋史册新。

（四）

林西查哨

鐮头镰刀大纛旗，同君会哨到林西。
短衣皂帽齐眉棍，众志成城话战机。
于林西露天食堂座上口占。同行者英韬与咏裳。

1 此段下，作者补有“[注] 只魁元被谤财政真象”字。— 补注

2 此题侧，作者补有“（1922年10月23日—11月28日）”字。— 补注

十六、京绥铁路罢工

张家口的工人运动，最早是铁路工人带头发动起来的，随后逐渐发展到其他各业工人。在初期，工人斗争是自发性的。一九二〇年，京绥铁路工人要求发欠薪，举行过一次经济性的罢工。到一九二一年，因路局不遵守签定的规约，又进行了一次罢工。京绥路工人的斗争是有传统的，党在京绥路发展工人运动虽是循序渐进，但也有曲折和反复。

一九二一年夏，我曾到南口访问，我在车站认识了一些司机、扳道工和调度工等，从谈话中，知道他们中间很多人参加了“精业传习所”，传习所以传授和研究技术为主的团体，成员中大部分是技术工人和下级员司，以天津人为多。他们成为一帮，为了自身的利益也向路局作一些斗争。该团体的主事人张齐贤是一位熟练的技术工人。他读过很多旧书，性格爽直、热情，重江湖义气，和我一见如故。当时铁路上敌人眼线很多，为了不引人注意，我和工友们经常在火车的守车上攀谈。一次，我和张齐贤同坐在一节守车上，车厢不大，中间支了一张木床，平时我们盘坐在床上聊天，入夜则抵足而眠。这天，我们天南海北地扯了一阵后，他对我说：“我平生很想做一番事业，为此要结识一批有才识的人，也就是招贤礼士，我虽比你年长一些，但我看你很有胆识，你肯来帮我的忙吗？我还希望你多多介绍一些北大同学来。”张流露出对北大学生的一种敬慕心情。就这样我们交上了朋友，通过他，又交结了一些人。逐渐地我向他们宣传一些革命道理和共产党的主张，我和张齐贤也谈得比较深远一些。他听后，对我说，“中国是几千年的文明古国，朝代鼎革也很多。社稷的基础和国家力量的源泉虽是我们劳动人民，但是多次革命对劳动人民来说都未彻底成功，现在世界形势确已大变，闭关自守的时代过去了，北大同学提倡工人出头领导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新兴势力，我是工人当然是

很赞助的，理应积极参加和支持你们的工作。但是我们的敌人很强大，我们工人目前的力量却很小，阻力很大，我愿意尽自己的力量，不过我个人力量是不足道的。”他的言谈表明了他裹足不前的态度，思想顾虑重重。接着他又补充道，“不管今后情势如何变化，我是不会反对你们的思想和行动的。”的确他在后来的工会运动中起过相当的作用，帮过我们不少忙，但始终未站到党的队伍来。他的谈话也使我得到一些启发，上层工人由于客观条件不同，内心顾虑很多，畏难情绪很重，于是我下决心去大厂做发动工作。

我找到南口机车修理厂（通常叫大厂），大厂的工人工作累一些，力气活多一些，工资收入也较少，他们受压迫深重，因而革命性强，我在大厂认识了一些工人，其中有一个叫张太清的，为人正直，在工人中也有威望，我依靠他联络了一些工人，他后来成为党员，大革命中牺牲了。当时大厂工人还比较散，帮派也多。我就向他们宣传组织新式工会的必要，只有工人团结起来，斗争才有力量，工作条件和生活境遇才会改善等等。在一些觉悟工人的带领下，工会组织起来了，果然很有势力，慢慢发展到车务工人中间，原来传习所的一些人也倾向过来，合并后组成了京绥路车务同人会（当时工会组织的名称很不统一，有叫俱乐部，老君会或同人会的，往往视各地历史情况，和工人们所乐于接受的情形而定）。这是我们党和京绥路工人建立的初步联系，也为进入张家口市工作开辟了途径。

后来，我忙于陇海路的工作，就推荐何孟雄到京绥路工作，他到那里继续开展工作，进一步打开了局面，成绩显著。一九二一年冬春，书记部就正式任命他为京绥路工会秘书和党团书记。

一九二二年，以张家口为中心的京绥路工人运动，逐步走向高潮，开始，同人会组织中员司占的比重大，会中的权利多为员司所把持，组织比较松散，经何孟雄积极整顿，同人会精神为之一振，会务更有春云渐展之势。

时值直奉军阀战争后，路局拖欠京绥路工人工资达七个月之久，工人的生活非常困难，实在难以维持。同人会派出代表，多次到路局交涉，要求发放所欠工资，要求承认同人会的权益。但路局态度蛮横，拒不承认同人会有代表工人的资格，对所提要求也置之不理。于是工人们十分愤慨，要求工会采取行动向路局示威。

这时唐山五矿罢工斗争正在激烈进行中，北京区委派人到唐山，要我回京商议京绥铁路工潮事，同时我也接到南口工会来信说：南口斗争局势紧张，如箭在弦，一触即发，要我抽空到京绥路一行，以便共决大计。于是我临时召集唐山党组织会议，共同讨论去京绥路的事，会上有人认为唐山形势正急，不主张我即离唐山。尽美却力排众议，

说：“五矿事，看来双方已成相持局面，恐还须经些时日才能解决，为了五矿罢工胜利起见，文虎也应到北京报告实况，调集支援力量；同时京绥铁路亦事关全局，十分重要，如京绥路能速决胜利，对唐山形势也很有利。因此，文虎必须前往，不宜坐失良机。俟京绥路部署就绪或斗争结束，再返唐山也不迟。”大家听后，又议论一番，最后均同意尽美主张。我随即动身返京，并于十月二十五日下午由京直抵南口，找到京绥路工会与孟雄见面，经孟雄详细介绍情况后，遂共同商议方案，决定实行罢工。并通知沿路各站统一行动。我们当即与工人代表研究罢工细节，并强调罢工期间的纪律很重要，是关系罢工成败的，为了对付敌人的破坏，还决定组织敢死队、纠察队。同时还组织一个宣传队，在罢工期间，宣传鼓动是必不可少的，对稳定罢工队伍的情绪，揭露敌人的破坏活动都是十分重要的。这一切都是连夜准备停当的。次日（十月二十六日）又向路局正式提出“补发所欠薪金”，“承认工会的权利”等要求。路局仍然置之不理，工会又提出如不答复，则全路将要罢工。路局认为象过去风潮，不以为意，竟讥讽工人：“看你们如何罢工法？”工人闻讯后，非常气愤，齐集工会，要求拼死奋斗，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是时，工人莫不万众一心！于是，工会决定在向路局提出条件的二十四小时后宣布罢工。十月二十七日，京绥路全线车务与大厂工人近一千五百多人开始了总罢工。

罢工后，工会向各界发表宣言，表示这次罢工实出于不得已，路局迫使工人走投无路，只有采取最后行动，进行罢工，以待解决，并在宣言中将七项要求附后，布告全国，其条件为：

- (一) 工人一律加薪，从要求之日起实行。
 - (甲) 工人月薪，无论多少，一律加增二元。
 - (乙) 工人跑车饭费，一律加至三角。
 - (丙) 每年加薪一次，至路局工人薪资表最高资额为止，但遇社会生活程度超过此项高资额时，须重新定薪资表。
- (二) 每逢礼拜日节日、路局官假、及工人应休息之假日中作工者应给双薪。
- (三) 工人因病身故者，给全薪一年与其亲属；因公遇险身故者，给全薪二年；如系积劳或因公致病者，其假期不论长短，均不得扣薪。
- (四) 直奉战争期内，工人在官假中曾作工者，请照局电，一律补给双薪一月。
- (五) 承认现在的车务工人同人会有代表工人之权。
- (六) 局中因故开除工人，须先期以充分理由通知车务工人同人会，俾有辩护余地。

(七) 工人亦须一律发给与本路下级员司同样的制服。

罢工宣言张贴通衢要道，工人们正气凛然。工人纠察队、敢死队巡行车站、道口。宣传队走上街头，向群众讲演。京绥铁路充满革命气氛，口号声荡漾山城，张家口一派沸腾景象。

罢工坚持两天，一切运输陷于停顿，货物积压，路局顿陷恐慌之中，指使机务段工贼开出车头，企图破坏罢工，同人会会长李连升闻讯，率领敢死队，立即赶到新安街东口一带，截住机车。当时正值初冬，塞外寒气逼人，李带头甩掉上衣，赤膊躺在道轨上。在他的带动下，敢死队队员们也甩掉上衣，挨个卧轨，足延绵半里多远。这时车头步步逼近，队员们毫无惧色，均置生死于度外，场面极为动人。李连升眼看车头逼近，乃挥舞手中旗帜，工人们随即呼喊，声响震天，工贼胆怯，车头被迫停止，这一回合胜利了，工人们无不欢欣鼓舞，认识到众志成城，团结斗争力量强大。反动路局见此招失败，恼羞成怒，加派二百名警察前来镇压。工人们则对警察宣传罢工理由，争取警察对工人的同情。在工人宣传攻势下，警察采取了中立态度。警察对工人的同情。在工人宣传攻势下，警察采取了中立态度。随后，察哈尔都统张锡元，派其参谋长率一营武装士兵包围车站，声言要捉拿李连升，想借此恐吓工人，达到复工的目的。我们估计到敌人的阴谋，要求工人中的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坚决顶住，在这关键时刻不能退让，要他们以行动鼓舞大家，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于是工人们在工会党团的组织领导下，团结一致，顽强搏斗，李连升据理力争，在群众的护卫下，敌人终未敢动手。至此，京绥路的后台、吴佩孚御用内阁的交通总长高恩洪感到无可奈何，指示路局答应了工人所提的条件。罢工仅历时三天，经过了激烈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书记部在该路工人群众中威信大增。该路工会以外的群众组织大都解体，其工人均投奔同人会接受党的领导。

在罢工胜利结束后，我又连夜赶回了开滦。

十七、正太铁路罢工

当年，石家庄正太铁路是在福建派和法国人把持之下。帮派势力相当雄厚，监督丁平澜，参赞许柯山，机务总管施恩孚等。这一帮人从清末到民初三十多年间曾在福州经营产业，后又来到正太路，因此人们说正太路是福建铁路。确是如此，他们把持铁路，任用私人，恣意压迫工人，只要他们的亲信到铁路上工作，不论技术如何，工资至少三十元。当时铁路各工厂的一些工头陈顺来、姚福祥等在大桥街明盛园饭庄外院租一所房，成立石家庄正太铁路工业研究会，每月收工人一日工资作为工人会费，工人多敢怒不敢言。大小工头们每天在会里喝茶闲聊，不为工人谋一点福利。这种研究会只不过是法国人、福建帮的御用组织。

石家庄地方不大，但它处京汉、正太两路的交接点，那时两个车站并存。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所以北方区党组织对石家庄比较重视。工人运动在长辛店展开后，中共北大支部就派人沿京汉路南下，到石家庄发动工人。

石家庄早期的党员

孙云鹏是石家庄铁路工人中第一个党员，系由我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事情的经过是这样，长辛店有了俱乐部后，我便同史文彬一起到了石家庄。史文彬在石家庄铁路上熟人很多，他有一些亲朋好友，还有不少徒弟。我经史文彬介绍，认识了孙云鹏。孙是当地工人的一个领袖，初次见面后，对他的印象是朴实无华，但觉悟不高。在我略略说明来意后，他率直表示不愿参加我们的革命工作。他自找理由说：“我文化水平低，干不了。”虽然孙云鹏拒绝了我们，我还是

决心再做他的工作。因为他在正太铁路上群众基础好，很有威信，对打开局面很有作用。于是，我就留在他家住了两三天。一天孙夫妇二人陪我游览石家庄附近名胜和井陘煤矿。该煤矿是德国侵华军人汉纳根（Hanaken）在远东的一个冒险乐园。在游娘子关时，孙夫人还兴致勃勃地指点雄关，向我口述唐太平公主率娘子军攻城夺寨的传奇故事。在旅游期间，我也乘机向他们讲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故事和苏俄产生的变化，以及共产党的性质和中国工人也要走俄国革命的道路等等。他们也向我提了一些问题，我都给他们逐一解释了。我对孙说：“你们也向我提了一些问题，我都给他们逐一解释了。我对孙说：“你们是铁路上的，到北京很方便，有什么想不通的，可随时跟史文彬一块到北大西斋找我。”经过几天的工作，孙云鹏的认识有了转变，并表示愿意做些工运工作。这以后，陆续有书记部工作人员和他联系。一次，他到北大找了我，这次见面，大为不同了，他主动说：“共产党是正派人，处处为工人着想，你们大学念书的，出校后就有官做，但你们为工人利益东奔西跑，不求官禄。我们工人自己为什么不关心自己的事呢？”又说：“以前我听人说过共产党不可靠，现在看来，这是造谣，是昏话。”孙云鹏的觉悟提高很快，他出身工人，很容易接受党的教育，一旦觉悟，作用就很大。经过多次交谈，我有意发展他入党，我向区委提出了这个意见，经过党组织讨论，约在一九二一年冬至次年春季之间，孙云鹏成为正太路第一个工人党员。孙云鹏入党后，接着又发展了一些进步工人入党，其中有施恒清等，后来又建立了党小组。孙云鹏入党后，工作更积极，他们又把工作推进到阳泉、太原以及整个正太路。

一次，孙云鹏提出，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有吴雨铭协助工作，石家庄是否也能派一个同志常驻那里帮助开展工作呢？我答应了他的要求，这就是以后张昆弟去石家庄正太路工作的缘由。先后被派到正太路工作的干部为数不少，除张昆弟，还有袁之贞、刘明俨、贾纾青、高克谦、吴先瑞等。

张昆弟，湖南益阳人，一九一九年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一年回国后，我介绍他在北方书记部工作，一九二二年入党后，继又派他到正太路任特派员。张昆弟办事稳重，在群众中有威信。

袁之贞，河北霸县人，他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一九一五—一九一六年）到法国当华工，积极从事工人运动。后来回国，在北方书记部工作。他虽是工人出身，文化程度较高，法文、中文都不错。当时约三十来岁，很能干，善于联系工人群众。我们派他到石家庄工作。后来，他成为正太路的一个重要人物。张昆弟有些办不到的事，他却能办好。因张昆弟是南方人，他的话北方人听不大懂，袁是本地人，没有语言口音问题。当时，他负责党的宣传、教育、训练等工作，工作很有成效。

自张昆弟、刘明俨、贾纾青、袁之贞他们到石家庄正太铁路后，组织了工会，在工会中建立了党团组织，张昆弟任党团书记，直属书记部领导。共青团的领导由另一位同志张廷瑞负责。孙云鹏的女儿孙素华当时是团员，也担任团的工作，表现很好，后来我们选送她到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孙云鹏的家属高登五很能干，虽是一位家庭妇女，却为工会做了不少工作，石家庄工会中的许多事她都积极参与，那时许多机密会议都在她家开，她也参加，很有主见。她的轶事很多，十分大胆泼辣，一九二四年孙云鹏被捕，关在天津监狱，高登五亲往天津，一天拦住省长王承斌汽车，上前告状请求释放云鹏，王亦无可奈何，后孙经党营救，适逢冯玉祥政变后，孙云鹏出狱。一九〇七年石家庄总机器厂洋总管唆使工贼李某毒打孙云鹏，高登五知道后，亲到洋总管家问罪，对方自知理屈，道歉了事。

曾派到石家庄工作的贾纾青，湖南郴州人，他到石家庄工作不久，又调往他处。同去的还有吴先瑞。吴是湖南宁乡县人，北方书记部工作人员，先在唐山作工运，后被派往石家庄。那是在石家庄第一次罢工时，他和我一同去石家庄的。还有一个叫刘明俨的湖南人，因说不了北方话，去石家庄不久即调离了。

经过一段努力工作，正太铁路工人的队伍齐整了，斗争情绪也高了。当各条铁路工潮勃兴时，正太铁路工会也跃跃欲试，要求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一九二二年十月前后，他们向路局提出了九项要求，路局延宕经月，没有下文，于是工会决定罢工斗争。罢工前，张昆弟从石家庄来唐山找我，我正在料理唐山罢工的善后问题，已是十一月底了。他见到我后，说：“老孙让我来找您，让您去石家庄一趟，我们初次领导罢工，没有经验，怕有失误。”看来，孙云鹏稳健持重，很有心计。我于是从唐山带了张隐韬、吴先瑞去了石家庄。隐韬是北方书记部中懂军事的人，对作战、训练都很在行，由他负责武装纠察队的工作，所以派他到石家庄领导和组训工人纠察队。吴先瑞一直在唐山工作，领导过罢工斗争，积有相当的经验。我们几人来到石家庄后，立即召开了党团会议，讨论解决三个问题，（一）大家分析了罢工的准备情况，认为时机成熟，可以罢工了；（二）讨论加强宣传组织工作；（三）确定罢工日期，由孙云鹏正式向全体工人宣布罢工命令。会后，我又赶回唐山，隐韬和先瑞留下帮助云鹏他们领导罢工。

九项要求与五项条件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在张昆弟、孙云鹏、刘明俨、贾纾青、吴先瑞、张隐韬、施恒清等领导下，正太路工人举行了第一次大罢工。罢工委员会发出正式罢工宣言，要求路局履行工人所提的九项要求。其条件如下：

(一) 加薪分三等：(甲) 现得薪金十五元以下者，加日薪二角。(乙) 十五元以上至三十元者，加日薪一角五分。(丙) 三十元以上者，照原价加十分之一。

(二) 以后每年按第一条之规定，加薪一次。

(三) 路局增用工人，须先尽容纳工会之所介绍者。

(四) 凡车务处工人以及夜间守厂与屋外操作工人，均应由路局每年发给羊皮大袄一件。

(五) 星期日，国家例假日，及重要劳动纪念日，均须放给例假；按照员司成例，并每年给二十天特假。例假及特假，仍给工资。倘若于假期间加工，而得工人同意者，给双薪。

(六) 路局每月须辅助工会所办之每一工人学校二百元。开办费由路局全给。

(七) 工作时间，不得过八小时，否则，照所增之时间增薪。

(八) 工人因工受伤，除应由路局供给医药费外，其因伤不能做工者，仍发薪，治愈而成残废者，照最后工资给予抚恤至死后三年为止，除由路局给予三百元之丧葬费外，并照最后工资遗恤金于其家属至三十年。又在路局服务，满二十五年，或十五年，而年逾五十五岁者，应照最后工资给予养老金，至死后三年为止。

(九) 由路局发给工人本路常年免票，及无限制之家属免票。并每年发给全国铁路免费通票三次。

宣言发出后，路局仍无反应，罢委会于十七日又发出第二次宣言，除前所要求的九条外，又提出五条，内容如下：

(一) 路局应承认正太铁路总工会有代表全路工友之权。

(二) 罢工期间不得扣薪。

(三) 不得因罢工而借端开除工人，以后路局处罚工人，亦须先得工会同意。

(四) 本会会员有因小故而被革除者，应即复职。

(五) 短工均改长工，以后新上短工，满一年后，亦须改为长工。

同时提出：“这些新旧条件，共计十四条，倘铁路当局不予我们以满意答复，我们决不上工。”

正太路工人在党的领导下，态度十分坚决，各地路局也纷纷来电，表示声援。唐山京奉路职工总会、津浦路工会、汉冶萍总工会、京汉路长辛店俱乐部等以及筹备中的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都来电和

实物支援。

唐山京奉路职工总会电云：

北京晨报转各界同胞：正太铁路的工友们，因为生活问题提出最低要求九条，当局始终无诚意解决，乃于不得已之中实行罢工。迩来军阀及资本之势力到处皆是，同胞若不急起援助并监督这二种势力的行动，则唐山矿局事件难免再见发生。并愿同胞督促正太铁路局及交通部速将该项罢工解决，免得风潮扩大，工友受罪，敝会本同一阶级的友谊表示以实力援助。

汉冶萍总工会电云：

全国各报馆各工会转全体工友暨各界同胞钧鉴：顷接正太铁路全体工人罢工宣言，真令人读之酸心，闻之流泪。作工二十余年没有加过一次薪，工资又极低，不但使工人家中的老小得不到安然生活，就是工人自己也吃不得一顿饱饭，穿不得一件暖衣。请看社会上的生活程度，比较往年增高了多少倍，工人的工资依旧同二十年前一样。以那时所定的工资，谋现在社会上的生活，怎样不饿肚皮，现在就是想拼命工作也快要无命可拼了，慢说一家老小哭哭啼啼望着要吃要穿呢。全体工友们！各界同胞们，这是何等的伤心惨目呀。

全体工友们！我们工人为世界的创造者，为社会尽了无穷的功绩，倒落得自己啼饥号寒，那创出来的利益，全部的被个人或最少数的资本家独占。正太铁路是我国最富的一个运输道路，那些外国资本家操纵我国经济命脉，掠夺我国的贫苦人民，逼迫我们最亲爱的正太铁路全体工友走最后的路，再三要求不遂而至于罢工以求解决，这是何等悲壮的事。那外国资本家只顾他几十万的利益，那管我中国的国弱民穷，他更是最希望中国永久的国弱民贫呢。现在正太铁路的全体工人为争生活的安宁，和改善起见，自动的向掠夺中国人的外国资本家奋斗。他们正在万分痛苦之中，凡我国人都应起来援助这艰难困苦中奋斗的苦同胞——正太铁路的全体工人呢。

坚韧不拔的正太铁路的工友们！你们在痛苦中与外国资本家奋斗，我们万分敬佩你们努力的精神，要抱定宗旨，坚决向前，我们工人所受的痛苦是万恶的资本主义给我们的。我们中国的工人现在是受国际帝国主义，外国资本家的压迫，特别厉害。我们要一致努力打倒国际资本主义，铲除外国资本家，争得我们工人应有的权利和生活的安全。看你们最低限度的要求条件，是十分正当的，为要求生存权和劳动保护权是我们工人应做的事业，何况逼得我们工人受不堪的痛苦呢。

各业工友们！正太铁路的工友们，正在艰难奋斗之中，我们要一致起来作实力的援助呵！

浦镇津浦路工会代电云：

正太铁路总办鉴：昨贵路工友罢工宣言，敝处工友诵读之下，不胜愤激之至。我中国铁路工人近来感生活之苦，待遇之苛，群起纷争，罢工之声相继

而起，贵路待遇我们工友素较别处苦甚，今值此工友觉悟之际，不作设计改善待遇，反加压迫，视我工人如牛马奴隶，置众工友之要求条件，至今三月有余若无所闻。汝等洋资本家残暴贪婪之欲完全表示出来，真世间罕闻见之事也。盼望贵当局早日醒悟，尊重我中国工人之人格，速允要求条件，实汝等洋资本之福利也。

为支援正太路工人的斗争，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也发出通电，揭露外国资本家对中国工人的压迫和剥削，其电文曰：

正太铁路为全国铁路中第一腐败，实权尽操在外人之手，外人以掠夺金钱为目的，遇事贿赂，平素对于工人，视若犬马之不如。十年以来尚没增加一次工资，工人谋一工作，非事先以重金运动不可，一般狐假虎威之员司，以虐待工人向上司讨奖。工人处于九层地狱之下，已非一日。因此工人乃前聚集筹商救命办法，向路局提出九条哀求增加工资，提高地位，当局竟置之不理，酿成工人罢工，交通停止，路局应负其责。至今路局不仅毫无诚意，并求来大兵弹压工人，故意欲陷全路工人于死地。全国同胞、工人罢工，出于路局虐待之所至，工人向路局之所要求，出于救死之一途，万请即本人道上之主张，迅速援助正太全路工友。万一正太全路工友要求之条件一无所得，反遭屠杀种种祸害，即全国同胞之良心必不能忍，凡属于工人阶级中的队伍，尤望本同一阶级切肤之痛，实力援助，使正太工友得到最后胜利。不然，一处工友失败，各处工友都有牵连的。特此电闻。

正太路工人的罢工斗争之如此坚定，除因得到各地工人的有力支援外，还有一个原因，那时我们有了一个后方，就是京汉路。从长辛店、保定、正定等地工人都给了正太路工人的斗争以巨大的援助。在罢工斗争的相持时期，京汉路工会向政府和各工团发出呼吁，其文曰：

(一) 北京国务院参众两院洛阳吴巡帅保定曹巡帅太原阎省长，暨各公团各地商会农会学生会各报馆交通部正太铁路局均鉴：正太路工为生活压迫提出要求，而该路局蔑视工人，竟置之不理。他们现在，已经万不得已罢工了。唉，苦哪！为痛苦而罢工，更是天下最痛苦悲惨的事哪。盼望诸公俯体苦工人之衷怀，援以鸿力，施以臂助，俾得早日解决，而救彼辈于水深火热之中，则感大德于无既矣。细查该路工人所提条件，于要求中可想其待遇状况之难堪，夫当此生活程度日益增高，社会经济日加迫亟，以十余年前之所定工资，来度今日米珠薪桂之生活，虽三尺童子犹知其不可，况终日营营之资本家乎，是诚资本家和劳动者挑战也。而洋资本家每年在华掠夺金钱不计其数，彼之丰衣美食，高楼大厦，罔不由工人血汗得来，是可忍，孰不可忍，是洋资本家真无人心也。我们同属于工人阶级，今为一致攻击我们的敌人——资本家起见，特此对此麻木之社会呼号，仁德之诸君子请命，此而不灵，亦惟有一致实力援

助，以表示社会之悲哀，人形之惨淡而已。倘能借斯转变，转祸为福，使正太路工友同登任席之上，是所望矣。

(二) 全国各工团各报馆以及各界团体钧鉴：正太的路工弟兄们，已于十五日宣布全路的总同盟罢工了。我们还记得，在最近的以前，唐山五矿的洋资本家曾用过手段雇用军阀的走狗——杨以德——去摧残过我们的矿工弟兄，现在正太的工友们，为压迫的苦痛，苛酷来罢工，要知道亦是英国的资本家呀。我们已经注意了！我们绝不放任他们去失败呀！绝不能叫军阀走狗再来摧残他们的呀。危急了！我们京汉和他们是唇齿相关的，决要起来援助的。并希望他们得到大家的帮忙，快快解决，胜利。

高登五巧计退敌

正太路的罢工正值年底，天气寒冷，工人生活益发困难，但他们仍坚持着。家在外地的工人，每天由工会发给每人四个馒头。家在附近村庄的工人，每天回家吃饭。由于路局迟迟不答复所提条件，工人们干脆用苇席搭起窝铺，昼夜值班，严守各厂厂门，工人们用道木横架拦住，不让机车行驶。斗争坚持了一个星期仍无结果，工人们不气馁，就地搭起锅台烧饭，坚持斗争。但经济的确愈加困难，正在这时，京汉铁路正定工会委员长康景星从正定把各路工会援助正太路罢工斗争的现洋运到石家庄。这批现洋运到后，高登五想出一个办法，把现洋分别装在几个箱里，因现洋不多，箱底就垫上一部分杂物，现洋放在上面，在发放救济款时，有意让工人都看见，工人们以为满箱都是现洋。当工人群众领到救济款后，都相互转告，说不要紧了，各路工会支援我们许多现洋，可以继续坚持斗争了。这样一来，人心就更为安定了。

当罢工斗争进入关键的时刻，有人从中破坏罢工，但一时查不出来。一次召开工会会员会议，按惯例，每次召开这样的会议，会员都得凭证入场，而这次会议之前，高登五却暗中告诉纠察队长，让门卫先不要检查出入证，待开会后再说。会议刚开始，她突然登台宣布说，请每个到会会员亮出自己的工会证，并按组坐好。随即派纠察队逐个检查，有些混进会场的人被检查出来，并拘留审查，结果，破坏工人罢工斗争的坏人被查出来了。

罢工胜利

经过整整十天的坚决斗争后，路局无奈，他们派警察所的丁镇金

到石家庄找孙云鹏，示意要解决这次罢工。孙回答说，只要允许我们的条件就开工，否则，决不开工！过了一天、两天，即二十六日，厂方果然通知接受复工条件，共十四条：（一）加薪，除十一月已加一成不计外，凡工人薪金在十五元以下者，一律月加三元，十六元至三十元者，一律月加二元五角，三十元以上者，一律月加二元。（二）以后加薪办法，照京汉路新章程办理。（三）雇用工人，工人代表可以向路局介绍。（四）本路所有打旗挂钩下夜护勇查道护勇，各给皮袄一件，每隔二年一换。（五）放假，本路放假日期，一律给薪，放假期内作工者准给双薪；（六）工人子弟学校，照京汉京奉各路，呈由交通部办理。（七）做工钟点，照京汉长辛店钟点。（八）因公受伤，所有工人因公受伤者，在医治期内概不扣薪。因公受伤立时毙命者，路局给予一年薪资。（九）工人免票，每年准给三次。（十）罢工期间，不应给薪，兹为体恤起见，准给七天薪资。（十一）罢工工人，本路不因罢工开除工人，准一律上工。（十二）已革工人复职，毋庸议。（十三）短工改为长工，凡短工到工满一年者，路局准其改为长工。（十四）加点，打旗挂钩照司机升火一律加点。

正太铁路罢工计十二日之久，路局损失达三十万元以上，终因路局让步而复工。开工那天，全路工人欣喜若狂，上街游行，庆祝胜利，工人手执“罢工胜利”、“全世界的劳动者联合起来”的标语旗帜，并发出开工宣言，气势雄壮，其文如下：

胜利了！我们此次罢工，得到最后的胜利了。

我们的胜利，虽不能说十分圆满，但是这种小小胜利，已不是和我们早先一样的散漫群众所可得到手的，是我们有了团结之后才能得到的。劳动者要解除痛苦和压迫，须得团结起来，这又是一次证明了。团体既然这样有价值，我们以后便当尽力把团体更坚固起来，更扩大起来，以便努力于解除一切痛苦和压迫。又此次罢工，各地的劳动团体，援助我们的力量很不小，在他们固然是因为有了阶级觉悟，明白了直接或间接的利害相关的地方，可是使我们不能不极端的感激他们。还有各位调停人，为我们的事，也费了许多力，也是我们所深深感谢的。我们于今天开工了，在这一天，我们更觉得劳动者阶级的团结之必要，所以我们要高呼“全世界的劳动者联合起来”，并祝“劳动万岁”。

这次正太路工人在罢工斗争中，尽管遇到不少困难，但最后终于取得胜利。经过这次斗争，更进一步扩大了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大大提高了全路工人的斗争信心，使全路工人更为团结。同时，它的胜利，对正在开展罢工斗争的全国南北各铁路、矿山和城市的工人群众，发生了积极的影响，也为正太路今后的斗争准备了有利的条件。

十八、“二七”大罢工

“二七”斗争是中共建党一年半以后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我在党的领导下，协同北方区委诸同志躬亲其事，共同奋斗，倍历艰辛，今将事变过程纪要如下：

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溯自一九二一年下半年起，中共北方区委所组织的八条铁路的罢工（陇海、津浦、粤汉、京绥、京奉、道清、京汉、正太），一般都取得了胜利，对全国均有影响，以后又组织了历时最长的开滦大罢工。

一九二三年一月，中共北方区委开了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总结了北方铁路、矿山罢工的经验与教训，并决定今后的斗争方向。认为过去罢工多偏重于经济斗争，以后要求各条铁路多组织政治斗争，在斗争中应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争取组织工会的自由权利等，把政治斗争口号放在首位。原则既定，便开始规划具体方案。当前的主要工作就是积极成立铁路总工会，首先是成立各路总工会，其中以京汉路总工会最成熟。早在上年四月，首由长辛店俱乐部发起筹备京汉铁路总工会，并成立了总工会筹备会，当时，全线十六个站已先后成立了分工会，连郑州原为交通系所辖的工人传习所的工人也都悉数加入工会，全路形成了统一局面，决定二月初在郑州公开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其它各路也分别筹组总工会。这一方案已向中央汇报，希望在适当时候，在全国范围内采取一致行动。这个决议随后提到在郑州举行的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议上，经决定在二月一日在郑州公开举行京汉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在这次区委会上，守常还提出：“现在北大放寒假了，我应湖北

教职员联合会的邀请，在寒假期间，我准备到武汉大学去讲学，北方区工作请文虎负责。”（一九二四年二月十六日出版的《新学生》第十四期上曾刊载了李守常先生的《纪念“二七”并追悼列宁》一文，其中曾称：“去年‘二七’前几天，兄弟适因事情到汉口……在船上，又知道流血事件”。在一九二三年一月，李写给北大周启明的信中，也谈及武昌高师教授胡小石约请他到武汉讲学的事）当时，学校放寒假有一两个月的时间，我们考虑守常平时很忙，现在利用假期外出讲学，也可以换换环境休息一下。守常往常在寒暑假也要回到昌黎老家，或附近的五峰山住一段时间的。因此，大家一方面同意他换换环境，另一方面也希望他快去快回，因为有的工作需他定夺。他鼓励大家说：“不要紧的，你们会搞得好的，我在不在都一样。”临行时，我去送他，握别时我问：“这次郑州开会，洛阳西宫（吴佩孚驻地）想无意外？”守常沉思片刻后，说：“吴子玉（即吴佩孚）近来正在忙着装点门面，笼络人心，想不致做出什么毁坏自己声誉的事吧！如果有什么事，你去找白坚武谈谈。”他离开北京到上海后住在一品香饭店，曾给我来信，告知旅途情况，未及其他。

当时，大家也都未料到会由于京汉路总工会成立而发生突然事变，所以我们按原定计划到郑州开会去了。

京汉路总工会的筹备工作是公开进行的。上海、北京、武汉、广州等大城市的大报都刊登大幅广告，通知并邀请各团体来郑州参加成立大会。当年的报纸曾对大会筹备情况有如下的报导：“总工会组织，在数月前便已着手，现在才告就绪，定期二月一日，在郑州开总工会成立大会。因为郑州居京汉路中心，全路工人，赴会较便，先期并请了全国各工团代表，和各界人士，到郑观礼。武汉方面前往郑州的，共有三四百人，并赠送总工会匾额和其他物件多种。其他各处代表到郑的，亦颇不少，郑州各大旅馆，一时顿现人满之患。总工会会场，设在普乐戏园，座位极宽，预备大众听讲，其他设备，都费了好些时的布置，数千元的代价，满拟此簇新的工人团体，立时就要涌现在吾人的眼帘，发生吾人的许多美感。”

为使这次成立大会得以顺利召开，京汉路总工会筹备会将召开大会的时间、地点，事先通知了京汉路局局长赵继贤。赵继贤是个惯搞阴谋、诡计多端的政客。他表面同意成立总工会，假惺惺地允许工会代表可以免费乘坐火车去郑州开会，专为代表拨出头、二等车厢，还公告将一月二十八日星期例假移到二月一日，以便代表赴郑开会，并赠送锦旗，以此表示他支持工会成立。而暗地里他却于二十五日密电吴佩孚，加强反革命部署。二十九日，吴佩孚在给靳云鹗的密令中说：“郑州靳总司令鉴，顷接京汉路赵局长径（二十五日）电云，据报二

月一日，本路全体工人，将在郑州开成立大会，各路与会者甚多。以未经地方官厅许可集会，竟敢明目张胆，聚众招摇，不特影响所及，隐患堪虞，即此目空一切，荒谬绝伦，将来群起效尤，愈演愈烈。蚩蚩愚氓，必将误蹈法网，而不自知。瞻顾前途，杞忧无极，务祈麾下迅飭预为防范，切实监视。本路幸甚，地方幸甚等语。即希预为防范，设法制止，为盼。吴佩孚。艳（二十九）。”

大会未开，已为隐忧所罩。

一月二十五日，我同史文彬等到了郑州。在这前后，全国各铁路工会代表已齐集郑州参加京汉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其中有：京奉路王麟书、梁鹏万；津浦路李宝臣、王荷波；正太路孙云鹏、张兴义；京绥路王学闻、张汉清；陇海路魏荣珊、王符圣、程圣贤；胶济路李青山、伦克忠；道清路魏宝鉴；粤汉路李书箴等。此外尚有北京、上海、武汉、广东等省市工会代表共三百余人。

我到郑州后，聆悉各方面报告，知道近日敌人对京汉路总工会召开成立大会非常恐慌，情势变化很快。据洛阳工会党团负责人报告：最近截获保定、北京致洛阳吴佩孚密电数起，其中曹锟与交通系赵继贤等认为京汉路总工会开会是有重大政治阴谋。电文称：“近来书记部工会声势日增，过激气焰嚣张，各路罢工影响铁路秩序极巨”，“最近全路总工会代表借口开会，群集郑州，据报有潜谋不轨情事，市面人心惶惶，一夕数惊。郑州当南北要冲，设有疏虞，后患何堪设想。应该当机立断，严令制止。并查拿该部（指书记部）首要分子归案究办，以遏乱萌”云云。同时又得悉交通系主脑曹锟偕京汉、京绥等路局长亲自到洛阳西宫向吴佩孚面陈北方铁路危机，请吴防止赤化，并且以危词激吴。说什么“赤党一声呼啸，全路为之震惊，此等声势，真要强过几师雄兵”。吴佩孚大为震惊。我们又从各站来信得知：曹锟屡电吴佩孚增兵京汉沿线各站。当时沿线驻防军警约二万人以上，其分布为保定一旅（第十四混成旅，旅长时全盛），长辛店二营（驻宛平县，由张国庆率领），琉璃河一营，石家庄、安阳、许昌、笛信等地各一、二营不等，汉口镇守使一旅，足见曹、吴已有与工会兵戎相见的准备。

得悉各方面情况后，我立即召集了京汉路总工会党团会议，讨论应付曹、吴问题。党团成员包括北京、郑州、武汉三处党员。京汉路总工会党团会议负责人为罗章龙（党团书记）、王仲一和史文彬、许白昊、林育南、李大汉（震瀛）、项德龙、吴汝铭、李求实、康景星、葛树贵等，皆为党团成员。这些人分住在郑州金台、福昌、五洲各旅店。另在钱塘里某号设党团办事处。

一月二十七日，据报：吴佩孚派副官某来郑州活动，并率便衣军

警到工会代表寓所窥探虚实。第二天，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来工会谈话，自称奉上级命令禁止工人在郑州召开大会。接着，总工会筹备处又接到吴佩孚电请工会派代表到洛阳谈话。看来形势已剑拔弩张，冲突之势在所难免。于是，我们一方面大造社会舆论，在报纸上揭露敌人的破坏阴谋，并指出工会坚强决心，严阵以待（如在北京《晨报》刊布消息）；另一方面经党团会议讨论决定派史文彬等五位代表，于三十日乘专车去洛阳见吴佩孚。吴佩孚非常狡猾，他在谈话中，对代表说：“你们工人的事，我没有不赞成的……不过，郑州是个军事区域，怎么能开会呢？你们不开会不行吗？……你们说开会没有什么，我也知道，不过……你们若是非开会不可，我也没有办法了……”吴所称军事区域，并非真实原因，因为当时郑州并非戒严区域。实际上，吴已接到曹锟密令，和听到交通系危言耸听的话，如说“书记部狼子野心，目前集中郑州、开封一带的代表近千人，均系来自南方的革命党人……”，等等，所以吴遂决定采取强硬的办法来对付我们。

三十一日晚，赴洛阳代表回到郑州，在党团会议上报告与吴佩孚谈判经过，知道吴佩孚态度狂妄，情势十分紧迫，求实建议我致函白坚武，晓以利害，要白向吴进言转圜。我说，“事到如今，已不是口舌所能争的了。”大家也都这样认为，赞成以实力与吴周旋。讨论结果，决定必要时以举行京汉路全路政治罢工来争取工人自由权，不达目的誓不中止。当晚并决定总工会按原定计划举行成立大会。

二月一日早晨，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临时宣布戒严，军警出动戒备，如临大敌，禁止工人代表进入会场。但代表队伍及群众仍冲入会场（普乐园戏院），在军警的包围之中，宣布开会。首先由主席史文彬宣布组织总工会宗旨，并痛斥此次强权无理压迫工会的行径，遂即郑重宣布京汉路总工会的正式成立，群众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群情激奋，奏乐欢呼，声震屋宇，既而黄殿辰到来，百般恐吓，显然非欲造成血案不可。但是看到工人势盛，未敢动武。延至下午四时，代表始冲出重围，宣布散会。

风云突变 全线罢工

二月一日下午，军警强迫工会工作人员离境，代表驻地亦被军警监视，总工会在万年春饭馆所定的饭菜，亦不准出售，代表一时完全丧失自由，饮食不得。各团体所赠匾额礼物等亦被毁弃在路旁，总工会会址也被军警霸占，不许工人进出，文件悉被捣毁。

当晚，京汉路总工会党团召集各处代表举行全体会议，谴责吴佩

孚摧残工会。成立会遭到如此严重摧残，代表们忍无可忍，在党团同意下，决定进行政治罢工，并决定成立罢工委员会，统一指挥全路罢工行动。当即通过一项决议和罢工宣言。宣言内容如下：

“全国工友们，各界同胞们，我们京汉铁路的工人，本着国家约法上所赋与的自由，和保障自身利益的宗旨，组织工会。一年多以来的努力，成立了全路十六个分会。我们的总工会筹备了半年多的工夫，耗费我们许多的精力、时间和血汗的金钱，惨淡经营，才得到组织完备，定二月一日在郑州开成立大会。期前邀请各业工团代表及各界人士参与盛典。届期来宾到会者数百人，一切设备完全，准备开会。

咳！意外的悲惨发生了！黑暗的势力横来了！万恶的军阀爪牙（郑州军警长官）用武力横加压迫，禁止开会，封闭会场，阻止我们和来宾在街上行走。所有各地工团所赠送的匾额对联，均遭遗弃道旁。我们神圣的最高机关——京汉铁路总工会——已经被军警占据了。会场中文件什物，均被抄查捣毁。各工团代表及来宾均被监视，言行不得自由，并勒令出境，酒席也被禁止了。满街军警林立，旅馆都有兵士驻扎。一时狂风惨雾，郑州全市陷于黑暗之境。工友们，同胞们，你们想想：这种横暴无理之策，怎么不教我们愤激痛恨呵！这种事，凡是有血性有人心的谁也不能忍受呵！

我们考察这件事发生的原因，实由本路局长赵继贤、南段处长冯溙丧心病狂，捏造谣言，唆使军阀吴佩孚命令郑州军警当局所致。工友们呀，被压迫的同胞呀！你们要看清楚，压迫我们剥夺我们的自由的，解散我们的工会的，侮辱我们的人格，是误国殃民的军阀和他们的奸险的爪牙呀！我们要认清我们的仇人，我们不能忍受这种欺侮和宰割呀！我们要紧紧的团结，反抗我们的仇人，向我们的仇人进攻呀！反抗呀，进攻呀，我们是没有一点恐惧的，因为仇人——军阀财阀和其走狗——的势力都在我们被压迫的无产阶级手里。被穷苦压迫而去求生的警士和兵士，都是我们无产阶级的兄弟朋友。他们明白了，他们决不会帮助仇人压迫我们。我们无产阶级有最大的权力，我们劳苦群众的团结就是我们最大的权力。我们还有最精良最坚强的武器，我们现在为反抗我们的仇人——万恶的军阀，为保障我们的人格，为争回我们的自由，我们要拿出我们的武器了，我们要发出全体动员令了，我们要向前进攻了。工友们！同胞们！我们郑重的宣言：‘从本月四日正午起，京汉路全体一律罢工，不达到下列的条件，决不上工！’我们要求的最低限度的条件是：

（一）要求由交通部撤革京汉局长赵继贤和南段处长冯溙，要求吴、靳及豫省当局撤革查办黄殿辰。

（二）要求路局赔偿开成立大会之损失六千元。

（三）所有当日在郑被军警扣留之一切牌额礼物，要求郑州地方长官，用军队奏乐送还总工会郑州会所；所有占领郑州分会之军队，立即撤退；郑州分

会匾额重复挂起。一切会中损失，由郑州分会开单索偿，并由郑州地方长官到郑州分会道歉。

(四) 要求每星期休息，并照发工资。

(五) 要求阴历年放假一星期，并照发工资。……”

罢工委员会的公开司令部是京汉铁路总工会，决策指挥机构是中共京汉铁路党团。由中共北方区委及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罗章龙、中共京汉铁路总工会支部负责人史文彬、中共北方区工委负责人王仲一（王震异）三人组成领导小组。罢工委员会还建立了包括罢工组织、宣传鼓励、纠察、交通、秘书等机构。

为了迷惑敌人，不致引人注目，决定京汉铁路总工会迁至汉口，而实际指挥机构——中共京汉铁路党团则移往北京，驻守北段，通过全路电讯系统，调动机车，指挥全路统一行动。

二日，我借罢委会部分成员赴汉口，并南至长沙，会见湖南书记部负责人毛泽东、郭亮等，商讨声援罢工事宜，接着又赶回汉口。三日晚，我同罢工委员会委员五人、纠察队员十余人乘坐专车由汉口北开，沿途巡视罢工情况，在信阳、广水、郑州、新乡、安阳、石家庄、保定等站召集当地工会委员、纠察队长等负责人举行会议，要求他们加强团结，遵守罢工纪律，争取最后胜利。沿途所见，罢工准备就绪，秩序井然。

为了扩大声势，吁请全国支援，经京汉路总工会党团向中央负责人报告后，二月三日京汉路总工会罢工委员会向全路工人发出紧急通告。五日我又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名义于北京发出通电，檄告全国各工会团体共同奋斗，电文如下：

“全国各工团钧鉴：此次京汉总工会在郑州开成立大会，横遭军警压迫，已于本月四日上午十一时全路罢工以示抵制，此中经过想贵会现已闻悉。本部素知军阀怙恶，与我工界势不两立，此次郑州事变，不过初发其端。因此对于京汉工友宣言为争自由而战之旨，极表同情。盖军阀今日可施之于京汉者，他日即可施之于他处。如吾人今日饮泣吞声，不复与较，非但全国工会将悉受摧残，吾劳动界恐永无宁日，循至莽莽神州，尽变为军阀官僚游民出没之场，而神圣劳动永沉地狱不能自拔矣。我劳动界年来发扬蹈厉，颇多明达好义之士，睹此惨状，谁能容忍？尚望本阶级斗争之精神，切实援助，是为至要！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冬。”

这样，京汉路大罢工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引起了全国各地的注视。从三日开始准备罢工起至五、六日这段时间内，北段（郑州以北到北京）、南段（汉口大智门到郑州）统由工会派专人严格管制。

沿站水泵、道辙、电报、电话、火车头、轨道车等，统归罢工委员会调度指挥，并预防破坏罢工行为。于是自四日十二时后，全路各项客车、货车、军车、车站、桥梁、工厂、道棚一律遵令罢工，参加罢工的按路局册共计三万人，其实则远远超过此数。

现在回头来分述京汉路几个主要大站，如长辛店、郑州和江岸等分工会罢工前的准备和罢工斗争情况。这些曾详载于我当年所写的《京汉工人流血记》之中，其中包括许多历史文献，现略作补充援引如下，以飨读者。

在长辛店：该处赴郑代表回来后，便召集一委员会，报告总会被蹂躏情形，及总会的决议案后，即开始准备一切罢工事项。越日复召集一全体会员大会于娘娘宫，到者三千余人，工会委员报告情形毕，群众热潮如狂，呼声动天地，均愿为自由而战。大会既散，罢工便随之开始。同时复发表一电，其文如次：

万急，北京大总统、国务总理、交通总长、参众两院、保定曹巡阅使、洛阳吴巡阅使、各师、旅长、全国各工团、各报馆、各邦人士钧鉴：敝分工会接本总工会急电，定于本月四日十二时全路一致罢工，此次罢工原因，完全是为着争自由争人格，敝分工会深恐奸人从中蛊惑，杯弓蛇影，淆乱是非，故将此次罢工原因涕泣详陈之：本路工人因生活困难，员司压迫，即起组织工会，先后成立，本路共组成工会十六所，乃设总工会于郑州，二月一日即京汉铁路总工会之成立日也。原定是日开成立会，约请各地工团代表及各行政机关人员和各界名流硕士与会，借此联络感情，指教我们的缺点。此会之正大光明，谅早邀各界人士洞悉。乃本路赵继贤局长，江岸分局长冯溙，郑州警务局长黄殿辰连电曹、吴两使，诬称工团为不法团体及许多不近人情之语，吴使即电黄殿辰有据某某电称，当相机制止，万勿激生争端。黄殿辰接电后，乃擅作威福，逞其恶性，即严行禁止开会。一月三十一号各地代表齐集郑州，馈送许多礼物，二月一号总工会即派代表迎接来宾，及所赠之匾额对联。其秩序为音队在前，次为代表，次为匾额，次为本地工友，由郑州之第一宾馆迎至总工会，秩序井然，并无喧哗杂错行动。乃黄殿辰召集许多军警，上刺刀，实子弹，阻止工人行走，并派军警数营包围工会。即会场、旅馆，亦使兵卒占据，严行监视各代表行动；饭馆茶铺，不许工人吃喝，工团所送之匾额，尽被兵士捣破。黄殿辰并声言：“我在郑州一日，即一日不许工人开会，所有打破之匾额也不许工人搬至工会之内。你们有能力即行全路罢工，使我黄殿辰屈服，我一步磕一头，将匾额亲送至工会，现在呢？你们快些滚蛋。”唉！民国约法上说人民有集会结社之自由权，工人亦为人民之一分子，何以我工人无之。语云：“不自由，毋宁死”，我们要争我们的自由，争我们的人格，我们只要与侵犯我们自由的人宣战，直接侵犯我们自由的人黄殿辰、赵继贤、冯溙三人而已，我们自不能

在郑州

二月四日上午十二时，即郑州遵总工会命令举行罢工之时，照例发一宣言向外界明白解释。又每一工人手中执有一种传单，其文如下：

“工友们！我们因受种种压迫摧残，逼得无法，出于全路一律停止工作，这是我们最痛心的事！我们要万众一心，坚持到底，要谨守秩序，静听总会解决，至要至要，切嘱切嘱。”

观此知此次罢工精神至为一贯。是日下午，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召郑州分会委员长高彬、姜海士、刘文松三人至司令部。靳见面大骂，出语鄙恶，无复有人类理性，高等置不与辩，将总工会所发罢工通告与彼看。彼看毕，谓“你们是听总工会命令的，你们无权，不同你们说罢。”三人遂退出。五日无事，至晚上，一巡官至高彬、姜海士家，言师长请彼等至第十四师俱乐部讲话。二人至彼，郑县巡警局长黄殿辰亦在彼处，命将二人拘留，加上脚镣手铐，如同大盗一般。刘文松闻讯，谓分会事，三人共同负责，现在二人受苦，彼一人决不躲避，以图苟且，即时驰至该俱乐部，请与二人一同受苦。工人闻讯，大愤又捕去二人，一名王宗培，一名钱能贵。王在家扫地，被便衣警察捕去，谓其时常出入，不是好人；钱从前因其子与警察小有嫌怨，警署挟恨，故借此报复，二人亦均上镣铐，钱双手被麻绳紧缚，两腕尽肿。不是日上午五人同被驱至车站，意在借以示众，威胁工人，工人不惟不惧，反加愤激。是日下午，警署雇人鸣锣，招呼工人上工，工人置之不理。

在江岸

总罢工的第二日（二月五日），萧耀南派其参谋长张厚生至江岸，先使该地警官某，以强硬态度，要挟工会交出杨德甫、朱兰田、张濂光、罗海臣、林祥谦五人，工会答以“如有对于曹吴及交通部正当负责人来，总工会当然有全权代表与之正式接洽，否则，恕不能接待。”延至午刻，忽探报厂内已被大批军队占领，大智门车站已开始卖票，张参谋长在工人家，拘去开车二人，用军警压迫，即行开车。分会委员会闻此，即派纠察团进探，一时集于厂门者约二千人，冲破军警防线，将该二工友抢回。当日上午，军警忽拘去纠察团工友三人，工会

特派代表张濂光、项德隆¹、罗海臣等四人，请军警释放无故被拘的三人，虽军警方面百般威吓，谓须枪毙斩首等语，他们毫不为动，军警无法，始将三人释放。这是敌人方面用破坏不成，继之以威吓亦失败。

先是武汉各工团代表自郑州归来后，各以此次所身历的压迫与不自由，当众发表，有痛哭者，有愤骂者，其奋发激昂的态度，实可动天地而泣鬼神。所以全体议决，愿以死力与京汉铁路工人一致进行。遂于大罢工的第三日，由各工团各派代表数十百人，各持旗帜来江岸慰问，即在江岸举行慰问大会，当时全江岸工友到者约万余人。首由京汉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长杨德甫同志报告招待慰问代表的盛意，并申述此次大罢工之意义及希望。继由各工团代表及真报馆记者数十人演说，无不激昂慷慨。最后由京汉总工会秘书李震瀛代表总工会向众致辞，略谓：“我们此次大罢工，为我们全劳动阶级命运之一大关键。我们不是争工资争时间，而是争自由争人权。我们是自由和中国人民权利的保卫者，工友们！我们京汉工人的责任是如何重大呀！麻木不仁的社会，早就需要我们的赤血来熏染了，工友们！在打倒军阀的火线上，应该我们去作先锋，前进啊！勿退却！”群众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武汉工团联合会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啊！”群众于愤怒之余，遂举行游行大示威，由江岸经过汉口租界以抵华界，历二小时方散，此种闯入租界示威，实为创见。

由于双方斗争激烈，南北情况复杂，虽然当时大罢工的中心设在北段长辛店，我们对外宣称是把总工会移至南方。但军阀与交通系却很狡猾，他们知道京汉铁路工会主要力量仍在北段，认为只有破坏长辛店基地，才能根本解决罢工问题。所以敌人后来先从长辛店下手，于二月六日深夜，曹锟的直属军队率先发难，在长辛店把罢工主要领导人都逮捕了。然后推向南方，郑州、信阳、江岸十几个车站工人先后遭到屠杀。

从二月四日起，我和仲一、孟雄、君宇、梅羹等经常驻守前门车站，与长辛店、郑州及汉口各站联络。六日晚，长辛店消息紧急。印刷厂小赵（赵长润）专程来京报告连日敌我斗争情况，传达史文彬等捎来口信，说有要事，让我速往长辛店商量。

七日拂晓，天气奇寒，滴水成冰。我同书记部小刘（刘伯青）乘交通专车赶到长辛店。下车后，遥见芦沟桥附近军队活动不停，心知情况有异。沿途急行，到达工会时，只见屋内外挤满了人，还有家属妇幼，人声鼎沸，原来是拂晓前，当地驻军闯入工人住宅区，挨家搜索，将史文彬、吴雨铭、陈励茂、武把、洪尹福、吴春溪、杨锡珍、王永泰、卜润舟、李柱、易顺等十一位工会领袖捕去，所以群众愤怒

¹ 项德隆即项英 — 编者注

非常，但一时不知听措。

工会干部杨诗田（党员）前来迎接我们，告诉我史文彬等十一人现正关押在火神庙军营。进到院内后，群众中有高喊：“书记部老罗来了”，当时大家都处于忙乱中，极想书记部来人出主意，形势非常紧迫。我向大家说，军队无理捕去我们工会委员十多人，咱们大伙应该一齐起来，去旅部把他们要回来。大家同意并应道：“好！咱们就去把老史他们要回来！”于是我和工会秘书立即动手写了旗帜标语和“要求释放被捕工友”，“还我们的工友，还我们的自由”等大幅标语。葛树贵吹哨集合纠察队，整理群众队伍，高举标语旗帜，工人大队齐向火神庙进发，一路高呼口号，市民围观，夹道助威，声势极为浩大！

我和葛树贵领队前进，杨诗田压队，工人群众队伍约三、四千人，由工会会址快速涌向火神庙，立即将警署包围。此时庙内有驻军和警察近两个营。先时，我们派代表韩连金持文告向前打话，说明来意，随后又派孙呈武、刘斌进内交涉。军队见群众队伍不断涌来，立即后退，举枪作射击状。不久，敌十四旅四团三营又驰至，双方开始冲突。军队即向工人队伍开枪，工人纠察队副队长葛树贵、杨顺起率领工人高喊：“敌人向我们开枪，我们去夺枪”，于是双方搏斗，卷入混战状态，一时枪声如沸，弹雨纷飞，当时我和葛树贵站在一起，敌人开枪后，均受伤倒地。这次工人惨遭屠杀，后经判明，抬往医院、重伤不治、当即牺牲的有葛树贵、杨诗田、辛克洪、刘宝善、赵长润等五人，其余负伤人员二十九人。除死伤外，又被捕去王永福、刘炳波等二十余人。许多工人同志伤治愈后，继续坚持参加罢工斗争。

我负伤流血倒地后，经由纠察队员救护，突出重围，即让纠察队员迅速将受伤工友救出，护送回家治疗，并通知罢委会诸人离开长辛店到北京集合，准备继续指导罢工。

回到北京后，袁之贞、杨宝昆等已分别派人到西便门及丰台迎候随即召集紧急会议。当场决定将长辛店组织暂移前门工作，函派王尽美与宝昆兄弟到丰台成立机关，从事被难工友及其家属救济工作，一方面又加派王尽美、王仲一等到郑州、石家庄、南口、唐山、天津、浦镇，就近指挥当地铁路同盟罢工。

七日下午，江岸工会遭到屠杀，第三日（九日）接到京汉南路报告称，“二月七日（农历十二月二十二日，过小年前夕）早晨火神庙浴血后，是日下午，汉口江岸车站亦发生萧耀南军队屠杀铁路工人的事，当场牺牲有三十二人，伤两百余人，捕三十五人。当时江岸分会林祥谦被捕，壮烈牺牲，施洋亦被捕。汉口方面军队行凶者为萧耀南（湖北省长兼督军）、张木阶（参谋长）。与林祥谦同时牺牲的还有

曾玉良（扬州人，三十二岁）、纠察队员刘文银（司机）、刘寿其（铜匠）、林材泳（翻砂工）、林元成（林祥谦之弟，信阳升火工）、徐延发（钳工，湖北黄安人）等。长辛店、郑州、江岸既同遭惨祸，各小站分会，备受蹂躏，自不待说。保定分会执行委员长何立泉、白月耀则被曹锟捕去，处以极横蛮之站笼。五百余工会会员捕拿逃亡殆尽，工会财产被抄。高碑店工会干事二人及正定委员长康景星同日被捕，囚在保定陆军执法处。彰德工会办事人，亦先后入狱，或逃亡在外，不能回去。信阳执行委员胡传道，因军警强迫开车，不允，竟被断去一臂。此外，新乡电报生赵密，亦与郑州五工友被捕押保定严刑拷打。郾城南北诸站受祸略同。沿途各站无一幸免。

“二七”全路死难烈士约四十余人，他们是葛树贵、辛克名、刘宝善、杨诗田、林元成、施洋、林祥谦、徐言发、陈芝槐、陈道忠、王起鹏、叶志松、曾玉良、钱惠和、陈年伯、刘长发、朱仁斌、秦均、梅启发、吴采贞、王先瑞、李开元、龚德咏、陈端炳、刘文银、叶青山、梅才咏、刘耀亭、姜和顺、杨庆寿、郑成、李玉、柳成有、胡兴顺、邵成鹰、张福狗、刘寿真、林开广、武把、高斌、丁道启、晏佑来、吴海发、高顺田、胡如树等四十五人。

罢工遭到曹吴军阀残酷镇压。京汉南北各站在全路斗争中牺牲四十余人（见上），入狱百人，负伤者五百余人，失业兼流亡估计将达一千户，家属牵连被祸者不计其数。

“二七”大罢工，由于京汉工人阶级遭到了反动军阀的残暴镇压和血腥屠杀，当时所发生的对外对内各项问题，头绪纷繁，集涌而至，同时得悉京汉沿线军队集结益多，敌人势将继续运用武力扑灭工会，如坚持、扩大罢工，其结果必致战线扩大，造成更严重牺牲。于是经北方区委扩大会议反复讨论，会上虽有人主张绝不复工，坚决与敌人斗争到底，但是区委考虑到，这样做事实在是办不到的，会招致更大的损失，遂决定忍痛复工。

复工通电发出后，区委会议继续讨论善后方略。会议决定：（1）京汉铁路总工会迁往天津办公，由各路加选委员以加强工会组织。汉口江岸京汉总工会办事处立即撤销，原有罢工委员会委员一律齐集天津开会。（2）各铁路同盟罢工一律停止。（3）组织“二七”善后委员会，立即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办理抚恤伤亡，慰问在狱诸工友，登记失业，安置烈士墓葬及家属生活等事务。（4）在北京及其他城市，工矿区举行追悼“二七”烈士大会，编印“二七”斗争的小册子等。会后即派人到京汉沿线各站，京汉以外各线路传达上述决议。北方区委在二月底三月初派人分途到京汉路各站抚慰工人及被难家属，并在北京、长辛店、丰台、天津等处分别设立失业工人及流亡家属住宿站，

从事救济抚恤工作。各工会负责人推选代表组织救济抚恤委员会。工人群众对此项工作一般表示满意。

北方区委扩大会议后，党与工会各级组织正在开始根据决定部署各项工作，准备付诸实现的时候，交通系和北京军警机关正暗中勾结，向中共北方区委与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强烈进攻。交通系为赵继贤主谋定计，迭向曹锟、吴佩孚、王怀庆等多次提出过激党“黑名单”，企图借曹吴之手将书记部人员一网打尽，当时王怀庆在北京通衢大街张贴布告，内云：“主张共产，宣传赤化，不分首从，一律处死。”自此，北京军警手持“黑名单”大肆捉拿中共与书记部人员，灯市口工会招待所被查封，捕去负责人，草厂胡同二号曾被搜查一次，捕去同志一人；北大印刷所《京汉工人流血记》浇铸纸版亦被查获；查封《工人周刊》，捕去工人。此外在天津，《工人周刊》发行人被捕，郑州、丰台等处工会组织亦被查封，逮捕工人、学生达四十余人。一时造成北方空前恐怖状况，真是缙骑密布，陷阱纵横，大有寸步难行之势。

在北方军警大规模搜捕期间，北方区委决定仍按原计划在京召开京汉路“二七”死难烈士追悼大会。随后在上海亦举行“二七”烈士追悼大会。北京追悼会由南城高师学生会名义负责筹备。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在琉璃厂高师风雨操场召开追悼“二七”被难诸烈士大会，由书记部代表王铮，京汉路工会长辛店参加火神庙斗争的工人刘监堂和施洋夫人等来做报告，到会者千余人。大会还通过严惩凶手决议案。来自全国各地的学校、机关、工会代表登台演讲的有三十余人，悲歌慷慨，震动幽燕。会毕举行火炬游行示威，队伍直达民贼盘踞的总统府，高呼惩办祸首，为死难烈士复仇，实现民主自由等口号，并提出七条要求：立即撤退长辛店驻军、释放被捕工人，惩办凶手、启封工会等。群情激奋，誓为争集会、结社、罢工自由的后盾。

“二七”追悼会还收到来自国内外的花圈、挽联、诗文、悼词等约五百余件，会场临时编印《“二七”悲愤录》，传诵一时。

远在南国的中国海员总工会在追悼大会召开之际，也拍来电文：“二七烈士们，你们是中国工人革命的先行者！你们所作是象征人类崇高的道德，无限的智慧，热烈的情操与最大的勇敢。中国人民的真正自由平等，只有追随你们的足迹奋斗才能实现！”

从此以后，全国各城市工矿区年年此日多举行纪念，“二七”成为中国工人哀思奋进的日子。当年有一首流行的“二七”纪念歌词云：“二月七日，正是那年今日，枪神时，芦沟桥畔血，丹水池边雪，保定狱中链，辛店站前旗，万众同仇感，四海知！‘二七’烈士永垂革命史册。”

北方书记部素来纪律严明，在历次斗争中，党员不得擅离职守或撤出战斗岗位，因此全体工作者在复工后，迅速转入地下，继续坚持斗争。“二七”被迫停刊的《工人周刊》，于一九二三年五月又重新复刊。半年以后各路工会渐次恢复，一年后，成立了全国铁路总工会。

当时监禁在保定直鲁豫巡阅使署军政执法处监狱的所谓“二七案犯”三、四十名，军法处审讯数次，均无确实口供。军法处法官追问罢工谁指使，党羽为谁？工会幕后人物为谁？工会与书记部关系？在狱工人坚不吐实，只申辩工会为拥护自由民主，为约法而罢工，不知其它。军法官云：“你们工人都是老粗，懂得什么约法？显见受共产党利用，受北大学生利用，陷罹法网，你们只要供出书记部主持人姓名、住址，政府把他们抓起来，就可以释放你们出去。”工人们故作不知，纷起抗辩，据理力争。法官只得说，“主犯未获，不能结案，你们就不能出去，今后当继续通缉主谋的人犯归案究办。”这些同志坚贞不屈，直到直系军阀倒台后，才由党营救出狱，历时两年多。

《京汉工人流血记》

直到一九二三年六月召开党的“三大”时，我一直留在北京负责北方区委工作，处理“二七”善后事宜，召集“二七”纪念会等。在这段期间编印了《京汉工人流血记》。

关于《京汉工人流血记》的编写经过，先是二月二十一日，我综合京汉全路各站报告，写成《二七大屠杀经过》一文，于同月二十七日在《向导》第二十三期上刊出。但此文限于篇幅，未能将事变因果全貌记述出来。旋接中央来信，嘱编一书详记始末，于是乃动手编写。开始在“二七”后的二、三个星期，曾由长辛店支部和北大支部组织力量，到“二七”罢工沿线，搜集资料、照片。一九二三年三月初开始整理，起初材料太多，后精简大部约有十万字左右，至三月下旬完成。剩下的资料照片，原准备以后有条件再印，后因地下机关被破获，都丢失了。开始动笔时在高师宿舍，后因环境纷杂，敌人眼线很多，工作未便，乃在沙滩附近骑河楼临时找了个小房子继续写作，由李梅羹助理缮校诸事。当时天寒无炉火，二人用芦花败絮裹腿，盘坐在土炕上呵冻挥笔，日夜不辍，边写边印。当时市面上找不到印刷的地方，后由北大印刷厂工人党小组想办法，由他们全包下来的。当时还收集了几十张照片和图片，由于做铜版很贵，受到限制，未能刊出。在编排时，中间有些空白，我们就把平时学习翻译的马、恩、李卜克内西的原著（如《共产党宣言》自译稿）择其名言，以革命语录形式付印

从事救济抚恤工作。各工会负责人推选代表组织救济抚恤委员会。工人群众对此项工作一般表示满意。

北方区委扩大会议后，党与工会各级组织正在开始根据决定部署各项工作，准备付诸实现的时候，交通系和北京军警机关正暗中勾结，向中共北方区委与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强烈进攻。交通系为赵继贤主谋定计，迭向曹锟、吴佩孚、王怀庆等多次提出过激党“黑名单”，企图借曹吴之手将书记部人员一网打尽，当时王怀庆在北京通衢大街张贴布告，内云：“主张共产，宣传赤化，不分首从，一律处死。”自此，北京军警手持“黑名单”大肆捉拿中共与书记部人员，灯市口工会招待所被查封，捕去负责人，草厂胡同二号曾被搜查一次，捕去同志一人；北大印刷所《京汉工人流血记》浇铸纸版亦被查获；查封《工人周刊》，捕去工人。此外在天津，《工人周刊》发行人被捕，郑州、丰台等处工会组织亦被查封，逮捕工人、学生达四十余人。一时造成北方空前恐怖状况，真是缙骑密布，陷阱纵横，大有寸步难行之势。

在北方军警大规模搜捕期间，北方区委决定仍按原计划在京召开京汉路“二七”死难烈士追悼大会。随后在上海亦举行“二七”烈士追悼大会。北京追悼会由南城高师学生会名义负责筹备。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在琉璃厂高师风雨操场召开追悼“二七”被难诸烈士大会，由书记部代表王铮，京汉路工会长辛店参加火神庙斗争的工人刘监堂和施洋夫人等来做报告，到会者千余人。大会还通过严惩凶手决议案。来自全国各地的学校、机关、工会代表登台演讲的有三十余人，悲歌慷慨，震动幽燕。会毕举行火炬游行示威，队伍直达民贼盘踞的总统府，高呼惩办祸首，为死难烈士复仇，实现民主自由等口号，并提出七条要求：立即撤退长辛店驻军、释放被捕工人，惩办凶手、启封工会等。群情激奋，誓为争集会、结社、罢工自由的后盾。

“二七”追悼会还收到来自国内外的花圈、挽联、诗文、悼词等约五百余件，会场临时编印《“二七”悲愤录》，传诵一时。

远在南国的中国海员总工会在追悼大会召开之际，也拍来电文：“二七烈士们，你们是中国工人革命的先行者！你们所作是象征人类崇高的道德，无限的智慧，热烈的情操与最大的勇敢。中国人民的真正自由平等，只有追随你们的足迹奋斗才能实现！”

从此以后，全国各城市工矿区年年此日多举行纪念，“二七”成为中国工人哀思奋进的日子。当年有一首流行的“二七”纪念歌词云：“二月七日，正是那年今日，枪神时，芦沟桥畔血，丹水池边雪，保定狱中链，辛店站前旗，万众同仇感，四海知！‘二七’烈士永垂革命史册。”

北方书记部素来纪律严明，在历次斗争中，党员不得擅离职守或撤出战斗岗位，因此全体工作者在复工后，迅速转入地下，继续坚持斗争。“二七”被迫停刊的《工人周刊》，于一九二三年五月又重新复刊。半年以后各路工会渐次恢复，一年后，成立了全国铁路总工会。

当时监禁在保定直鲁豫巡阅使署军政执法处监狱的所谓“二七案犯”三、四十名，军法处审讯数次，均无确实口供。军法处法官追问罢工谁指使，党羽为谁？工会幕后人物为谁？工会与书记部关系？在狱工人坚不吐实，只申辩工会为拥护自由民主，为约法而罢工，不知其它。军法官云：“你们工人都是老粗，懂得什么约法？显见受共产党利用，受北大学生利用，陷罹法网，你们只要供出书记部主持人姓名、住址，政府把他们抓起来，就可以释放你们出去。”工人们故作不知，纷起抗辩，据理力争。法官只得说，“主犯未获，不能结案，你们就不能出去，今后当继续通缉主谋的人犯归案究办。”这些同志坚贞不屈，直到直系军阀倒台后，才由党营救出狱，历时两年多。

《京汉工人流血记》

直到一九二三年六月召开党的“三大”时，我一直留在北京负责北方区委工作，处理“二七”善后事宜，召集“二七”纪念会等。在这段期间编印了《京汉工人流血记》。

关于《京汉工人流血记》的编写经过，先是二月二十一日，我综合京汉全路各站报告，写成《二七大屠杀经过》一文，于同月二十七日在《向导》第二十三期上刊出。但此文限于篇幅，未能将事变因果全貌记述出来。旋接中央来信，嘱编一书详记始末，于是乃动手编写。开始在“二七”后的二、三个星期，曾由长辛店支部和北大支部组织力量，到“二七”罢工沿线，搜集资料、照片。一九二三年三月初开始整理，起初材料太多，后精简大部约有十万字左右，至三月下旬完成。剩下的资料照片，原准备以后有条件再印，后因地下机关被破获，都丢失了。开始动笔时在高师宿舍，后因环境纷杂，敌人眼线很多，工作未便，乃在沙滩附近骑河楼临时找了个小房子继续写作，由李梅羹助理缮校诸事。当时天寒无炉火，二人用芦花败絮裹腿，盘坐在土炕上呵冻挥笔，日夜不辍，边写边印。当时市面上找不到印刷的地方，后由北大印刷厂工人党小组想办法，由他们全包下来的。当时还收集了几十张照片和图片，由于做铜版很贵，受到限制，未能刊出。在编排时，中间有些空白，我们就把平时学习翻译的马、恩、李卜克内西的原著（如《共产党宣言》自译稿）择其名言，以革命语录形式付印

其间，还把德国革命诗人海涅的诗《宝剑火花歌》和白编的诗句补在空白处。全书的排版和封面设计悉由刘伯青负责，封面是三套版，绘一挥大锤的工人，封面题字是由宋天放书写的。编成后，我写了序，由高君宇写了一篇后记。当时由于印刷工人不多，且都是以义务劳动额外承担的，人手不够，于是我们支部的同志们都帮助排字、组版、摇车、印刷和装订。所以这本书完全是党员们自己亲自劳动印刷出来的，对我们支部也是一次锻炼，使我们学会了从写稿到排字、组版印刷等全部工序。后来对这些工作我们都能干得很好。

《京汉工人流血记》除序言及后记外共十章，并附有“二七”罢工工人死伤调查表和第三国际执委会告中国铁路工人宣言。各章题目是：

- 第一章 京汉工人的狂飚运动
- 第二章 二月一日军阀进攻
- 第三章 如火如荼的京汉路各站鏖战情形
- 第四章 惨杀以后
- 第五章 六路及京沪武汉工团援助纪略
- 第六章 北京市民空前大游行
- 第七章 献媚军阀的北政府及奸商
- 第八章 全国一致的不平鸣
- 第九章 国会方面的调解
- 第十章 结论

在书的序言中，我首先向世人扼要地讲明了编写《京汉工人流血记》目的，并批驳了种种诽谤“二七”罢工的谣言，指出：

“这次京汉路二万多工人因争开会的自由举行总同盟罢工，大招军阀的嫉妒，致演出二月七日的大惨剧，凡是稍具常识的人没有一个不说是民国成立以来极重大的事变；凡有血气的人也没有一个不愤懑填膺的。但是社会上知道此事底细的人却是很少，因为：第一在罢工期内万恶的北洋政府禁止此项消息的传播，第二洋资本主义国家和中国资本家走狗所办的报纸及通讯社等，故意登载些淆乱黑白颠倒是非的新闻，冀以扰乱社会的视听。此外更有一派糊涂可笑的记者，疑心此事是为所谓政争内幕的一幕，恐为他人作宣传，不愿意忠实的登载。因此，社会一般人士竟不能对于社会这样严重的事变，得到一种正确明了的印象。我们对于前二项原因，自然是认为当然的；对于后项的‘记者’也只有怜悯他们无知。倒是‘二七’大牺牲的事实，本社同人至今不能向社会作个忠实的报告，这是我们日夜不安的。

本社同人于役劳动运动，前后三年，本想将这回事变的详细情形，乘此机会，尽情的说出来，但是后来因为各地详细报告尚未寄到，而又限于时间和经

济，不能尽量编入，才决定先行出这个小册子。所以论到这本小册子所介绍的材料未必便能满读者的意，但是那些被军阀与帝国主义摧残和蹂躏的资料，吾人天天处处耳闻目见，不啻千万，何待陈述？所以我们愿读者记取的倒是应该注意这些材料所代表的真意义和价值，这又是我们引以自恕的。”

为进一步从理论上批驳资本家及其走狗们所散布的颠倒黑白的谰言，更重要的是促使社会上一般人士对当时中国社会问题的严重性有所认识。序言以较多的笔墨论述京汉路二万多工人举行罢工的历史必然性。

“我们知道，无论什么事实，决不是偶然发生的。这回二月七日的事，可说并不是发于京汉路的二万余工人，也不是兆于二月一日郑州禁止开会，更不是单为着京汉总工会所提出的几个简单条件——我们如果稍加思索，便能知道二七事变，至少也包含了下列的几个蕴义：

中国自辛亥革命以还，政象纷变，元恶巨憝，迭为起伏，遂形成现在割据的封建政治。封建政治的基础是建筑在黑暗的暴力上面，他们盘踞疆土，瓜分政权，霸占铁路（现在北方铁路已是曹锟、吴佩孚的家产，关外的铁路是张作霖的私有物），他们的表现是与任何进步的思想相反对的，代表这个态度便是荒谬的北洋正统观念！他们反对约法，反对民主主义，反对新文化运动，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一切的民众进步的思想。无论哪一个贼目当政，都是取同样的态度。今京汉路工人的团体既是民众觉悟的组织，京汉工人所争的既是约法的自由，这均是他们黑暗暴力的劲敌，北洋正统迷梦的仇雠，所以我们知道即使设有二月一日的事，他们也是要图谋倾陷的，因为他们卧榻之侧决不容有觉悟的群众的团体和活动。从这一点看来，二七事变是国民直接与军阀抗争，是封建暴力与光明的势力抗争，是被支配者与支配者抗争。

“然而同时我们又知道，这种封建式军阀的存在和兴盛，是全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扶植的，除去现在的苏俄而外，无论英法日美……任何国的政府都是资本帝国主义的政府。他们的基础建设在资本主义制度上面，他们的表现便是经济侵略政策，他们利用中国有卖国丧权的政府，做他们忠实的走狗。利用中国常在内争之中，而不能发展国民经济的能力，以便销售他们的洋货，榨取中国的财源。他们为种种自利起见，于是一面供给军阀的枪械子弹，高利借款供给军阀的饷源，间接的来压迫中国民族；一面又管理税源，开设银行，发行纸币，安设驻防军警兵舰直接的来压迫中国人民。在这种设施之下，他们几无时无地不伙同他们所豢养的军阀政府，来妨碍民众的觉悟，禁止民众的团结，其所取的态度和方法是比较国内军阀更狠毒的。所以这次京汉工人的举动发生，东交民巷的公使团——即北京政府的太上政府——便严厉的训诫北廷要他严厉处置。由此，我们便可以知道二七事变是中国的劳动者与外国资本帝国主

义抗争的表现，是中国民众受外国酷虐侵略后的一种反映。京汉流血的工人便是开始进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先锋。”

在序言的结尾，我们作出这样一个结论：

“我们断定工人运动反对国内的军阀是直接的形式，反对外国资本主义政府是联带的结果。他们进攻的失望，虽然这般的沉痛，但是他们运动的意义却是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明白无比的——所以二七惨变实在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上阶级斗争的一段。大家必须在这个沉痛记载上去体认阶级斗争的真意义。

“最后，如果我们相信中国将永远沉沦，世界人类将必归毁灭，现在就不必多说。要是我们尚有一点为中国民族求自拔，为世界人类谋拯救的意念，我们便应当不迟疑的实行内与封建式的军阀外与资本式的帝国主义作战，我们便应当谋中国民族的革命和世界民族的革命。但是这般伟大的事业，在中国究属哪一个阶级负担，自来有许多学者教授们是很怀疑的。他们的意思：中国劳动者的能力和意识远在西欧诸国劳动者之下，决不能担这般重大的干系，所以近年来有许多革命的青年投身劳动运动，他们见着总以为是愚公移山的笨举动；此外有班堕落的人们满存着传统的鄙夷劳动者的成见，那就更不消说了。自二七事变以来，却表示了中国劳动者的伟大能干和魄力，证明中国无产阶级确能担当中国的革命——甚至于世界革命的责任。这不能不说是惨淡无光的旧社会中得到了一度新的兴奋。从此中国全体劳动者的脑筋里也加了一种新鲜的印象，将自然而然地向革命的趋向进行了。

“至于革命的青年们对于这次惨变，本当无所用其留恋，也无所用其悲哀，更无所谓失望，霎时起灭的报仇雪恨的浪漫心情尤不是真正革命者唯一的态度。我们唯知道以后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责任，是永远在无产阶级的仔肩上，大家只有前仆后继的在此革命长流中涌进，最后的成功，终归于最后努力的人！”

接着，该书分章叙述了京汉路工人斗争的史实和“二七”惨案及其后的救援工作。该书于三月底在北京初版，约印五千册，后改由广州人民出版社重印多次，前后约印五万多册，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发行，畅销南北。

一九二三年五月及一九二四年的《向导》上曾介绍此书，说：“二月七日京汉路的大惨杀，不仅是中国劳动运动史上一大事；而且为民族运动史上一大事。发踪指使的不仅为直系军阀吴佩孚等，而且为英国领事、英国烟厂、棉厂各大班。故是役之意义不仅为军阀与外国侵略家打破劳动运动的新势力，而且为军阀与外国侵略家打破国民运动

的新势力。是书记载详明，分析精到，一字一句，可歌可泣，凡留心中国新兴势力发展的人，皆不可不人手一篇。”

《京汉工人流血记》的出版、发行，其影响有一点我们当时未曾意料到的，即这本书对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加强国共两党的合作也起了一点作用。有一次，孙中山的代表张溥泉在上海曾当面告诉我说：

“一九二四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见孙中山，向他提出国共合作问题。孙开始对同共产党合作理解不足。马林曾把《京汉工人流血记》、《向导》等刊物送给孙中山阅看，孙看后向左右亲信说：‘我想和共产党合作，你们却不赞成，你们自高自大，自以为有军队，有广州地盘，瞧不起共产党，而实际上共产党力量比我们强的地方很多。我当年开始搞革命时，策动群众，少则百、八十人，多不过几千几百人，你们看共产党发动群众斗争，动不动就是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人。‘二七’罢工就是例子。从这一点看，我们还不及共产党。’”孙中山从中国南北多次大罢工认识了共产党的群众基础。所以，后来马林再访孙中山时，孙对共产党有了正确的认识和评价，国共双方在平等基础上开展了革命合作。

《京汉工人流血记》是记载当年“二七”大罢工的重要革命历史文献。它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第一次跃登世界革命舞台的伟大斗争。“二七”斗争距今已六十年了，在此悠长岁月中，年堙代远，史迹沉霾。本书从三十年代起被列为禁书，几历沧桑，始得于一九八一年重版，获见读者，此书的重版，也可以说是对“二七”烈士们的一种纪念。

总计自《京汉工人流血记》出版后，当时，中外出版机构以“二七”大罢工史实为题目出版的书籍、画册等约几十种，其中内容正确的固然不少，但亦有少数材料和党的文件与当时史实不符，如马超俊写了一本书，说“二七”罢工是国民党领导的，有很多国民党员参加等，又如《二七工仇》一书是杨德甫、陈天等人投靠奉系军阀后，假借湖北工团联合会及京汉铁路总工会上海办事处的名义编印的。杨德甫等人在罢工紧急时逃往庐山，离开岗位，只有施洋、林祥谦、曾玉良等共产党人坚守岗位。这几个离开的人在罢工失败后，对党抱怨，发起宣传攻势，攻击共产党。这些人到上海后与反共的军阀政客相勾结，在上海租界挂起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牌子，同共产党对抗。他们将《京汉工人流血记》的文章剽窃了一些，又加以篡改，改头换面，编成《二七工仇》这本小册子。例如，说他们是真正的工人，暗示中共是知识分子；又说他们不卷入政治漩涡，不介入政治，不跟共产党走。《京汉工人流血记》中有第三国际高度评价二七罢工的电报，他们给删掉了。后来，主持编印《二七工仇》的杨德甫等人曾到东北，

找到张作霖说：我们是反对吴佩孚的，是京汉工人。张作霖讲：反吴佩孚是好事，你们有什么要求？杨等讲：我们名义上反对吴佩孚，实际反对中国共产党。于是，张作霖送给他们几万块钱，他们用这笔钱作活动经费，进行反共，到后来，这些人彻底降附军阀，干着工贼的勾当。

“二七”后，党内外议论纷纭，不少人还投来书信，指责、非难这次斗争，有的则表示怀疑，还有一些好心人规劝以后不要采取这种得不偿失的斗争方法……。为了回答某些人的责难，向那些不明事实真相的人们说明“二七”罢工的原因，除编印《京汉工人流血记》外，北方区委还让席咏怀代笔，作了“二七”复信，信中指出：目前，罢工斗争是我国工人阶级反对军阀、财阀，所必不可少的斗争手段，工人阶级为全国人民争自由、争民主，为的是使我们国家摆脱列强侵略和军阀统治，建立一个繁荣富庶、人民丰衣足食、礼让廉洁的新社会，今天流血牺牲是值得的，今天流血斗争，就是让我们的后代不再进行这种斗争。

党内也存在着不同的意见，这时，第三国际发来一个正式电文给中共中央，转到北方区委，表达了第三国际对“二七”斗争的支持。

第三国际认为“二七”是近代革命史上的重大事件，应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后来，党中央在“三大”上作了总结。第三国际的这封电报是党中央在“三大”做“二七”总结的重要依据。

第三国际、职工国际还几次派专人了解“二七”斗争情况，还请工人代表到国际去作报告。共产国际也写过一本有关“二七”的书，一九二八年我去参加“六大”时，他们送给我一本留念。

“二七”烈士，不怕流血牺牲，前仆后继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是令人永志难忘的。¹

¹ 此章末，作者补有“流血记”、“诗词补”、“保阳信”、“不写遗嘱到死不盼生还”、“注评邓书”和“宋天放作《女冠子》一阙词云：”字，其中“邓书”当指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宋词待查。—补注

十九、中共“三大”及中央执委会

一九二三年六月，我离开多年战斗和工作的中共北方区委，去广州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这次会上，我被选进中央局工作。

“三大”前后

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这是二十年代我党最重要的一次全国大会。会议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奠定了国共合作的基础，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是年五月间，中共北方区委接到中共中央通知，决定在下月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要北方区选派代表出席，代表人数根据北方区内党员人数比例，约十至二十名党员中选派一人。要求以产业工人为主体，其次为从事工农革命运动的主要负责人和省、区的书记。根据中央通知，北方区委进行了讨论。事后，发通知到所属铁路、矿山和北方区各大城市的党组织，说明中央即将召开“三大”的意图，要求同志们重视这件事，及时选派代表。对较为重要的地方如长辛店、天津、唐山、南口、洛阳等产业工人区，要求他们选派当地的代表参加。

通知发出不久，又接到“钟英”（当时中央的代号）给李守常和我的信，内容是了解北方区参加“三大”的准备情况；补充了出席“三大”应该注意的事项，多半属于事务和保密工作问题；信中还要求李守常和我都出席“三大”。当时北方区委书记是李守常，我是区委委员，兼管组织工作并任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中央希望我们去，以便于全面了解北方区的工作情况。我们两人也经群众选举，通过为出席“三大”的代表。北方区在所属铁路、矿山及地区支部，经选举产生出席“三大”代表共十二人，居全国各区代表人数之首位。其中

有：

李守常（北方区委代表）
 罗章龙（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兼全国铁路系统党团代表）
 王荷波（津浦略总工会党团代表）
 王仲一（津浦路总工会党团代表）
 王 俊（京汉路长辛店工会党团代表）
 张德惠（京汉路长辛店工会党团代表）
 何孟雄（京绥路总工会党团代表）
 邓 培（京奉路总工会党团代表）
 孙云鹏（正太路总工会党团代表）
 陈 涛（北京地区工会党团代表）
 刘天章（陕西中共支部代表）等

为安全和保密起见，代表们分批出发，尽量做到不乘同一趟车，不坐同一条船。我是先坐火车到天津，转乘海轮去上海，再坐船到广州的。和我同船到广州的有湖北代表项德隆。到广州后，我们立即换上了一套半长不短的“唐装”，一副广东人打扮。广东区委派有专人负责接待。当时广东区委对外的代号是“管东渠”。我没有固定住所，时而住在谭平山家中，时而住在广东区党委机关，有时还住在第三国际代表马林的住所（开滦罢工期间，他曾亲来北方，深入基层，视察工人情况，与我过从较密）。我第一次到广州，道路很不熟悉，几乎每次开会都有人来指引，带我们去会场。广东区委同志担负大会后勤工作是很尽力的（当时一些中央负责同志也没有住在大会会址）。

出席大会的代表，除上述北方区代表外，还有南方各地代表，他们是：

陈独秀、张国焘、毛泽东、朱绍莲、林育南、项德隆、陈潭秋、恽代英、王用章、谭平山、阮啸仙、刘尔嵩等。

还有一些代表和没有表决权的列席人员、以及共产国际代表、少共国际的代表等。总计有三十多人出席了这次大会。这次大会代表的组成，具有相当的广泛性，其中以铁路和矿山工人运动中涌现的新人物占相当大的比重。这是前两次大会所未有的。

“三大”的筹备工作从五月就开始了，到正式开会约近一月时间。筹备工作主要由第三国际代表和二届中央委员会主持。各地代表齐集广州后，在正式会议开幕之前，上届中央召开中央扩大会议，我也参加了这次准备会议。会议主要是讨论准备“三大”的各项问题，由国际代表马林主持。

在扩大会上，马林报告了国际形势和国际工人革命斗争的概况，并强调了建立国际工人阶级革命的联合战线问题。他传达了共产国际

的一个文件，是关于指导国共合作问题的。文件是由英文打字机打印的，由翻译译成中文，全文有几百字，大意说：中国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国民革命，中国革命发展很迅速、前途很乐观，年青的中国共产党现在应该联合孙中山的国民党左派分子共同革命。这个文件无疑对这次会议起了指导作用。这次会议起草了政治报告和准备了决议案。

“三大”的事务性准备工作和生活安排，统由广东区委谭平山、刘尔嵩、阮啸仙等人负责。

“三大”正式召开前，马林还事先找各地代表谈话，特别是工人代表。内容主要是交待和解释国共合作的必要性。这一问题，对工人代表来说是一个新课题。过去各地劳动组合书记部全力做工人运动，对国共合作多不理解，马林的谈话就很必要了。除此之外，马林还向代表谈到了下届中央的组织安排，党章和决议的准备情况，并不厌其详地反复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做的理由。马林在提到“三大”的组织路线时指出，下届中央要多选一些工人同志到中央来，包括长期在基层做工运工作、能联系群众的同志。他谈话涉及的范围很广，除国共合作的政策外，还谈了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以及共产国际的观点和政策。在大会期间，马林是每会必到的。

大会的地址，是在永汉路太平沙望云楼，即陈独秀的住所。他家有一间较宽敞的客厅可作为大会会场。会议有时也在春园马林的住处召开。会议的日程安排有：国际代表的报告，“二大”中央报告，各区工作报告，并分组进行讨论。还成立了若干小组，分别起草决议和文件。这次大会通过并公布的文件和决议有：

- 一、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
- 二、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
- 三、关于第三国际第四次大会决议案
- 四、劳动运动议决案
- 五、农民问题决议案
- 六、关于党员入政界的决议案
- 七、青年运动决议案
- 八、妇女运动决议案
- 九、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
- 十、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
- 十一、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

“国共合作”的问题，是“三大”的中心议题。这个问题在报告和决议案准备小组会上讨论费时较多，最后大家接受了国际代表的意见，并做出了相应的决议。“国共合作”的问题，如果从酝酿时算起，时间就比较长了。早在建党初期，苏俄和第三国际就着手联合国民党

的准备工作。当第三国际派代表东来帮助建立中共组织时，苏俄政府也同时派人来中国活动。先是在陈炯明驻防漳州时，苏俄曾派某海军大将亲率军舰悄悄进入闽南，访问陈炯明，表示愿以军火资助陈扩充军队。陈当时受宠若惊。但是，由于漳州海港设施简陋，海轮不能入港，无法起卸大宗军火，致未实现。一九二〇年冬，陈炯明攻占广州后，引孙中山入粤，于是联合国民党事复又积极进行。

中共“一大”前后，陈独秀曾与孙中山交换对时局看法。随后，陈又介绍国际代表马林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由张继陪同前往桂林会晤孙中山。当时马林化名西蒙博士（Dr. Simon）。张太雷系马林的翻译，亦随同前往。双方在会谈中，广泛涉及苏俄对远东的各项政策。一九二一年岁杪，马林始返沪，旋又到北京，在北方区委会上报告赴广西与孙中山晤谈情况。其双方谈话内容：（1）有关革命的三民主义理论问题，赋予三民主义以革命内容。（2）建立有广大工、农、学生为基础的群众性的新型政党，涉及未来国民党的改组问题。（3）建立革命性新军队，同时改造旧军队，设置军校改革军事教育。（4）苏联以实力援助广州政府，包括财政、经济、军用物资与专家等。

经过这次双方会谈，孙中山同左右详加研究与突破现状有关问题。这样酝酿经年，直到一九二三年全国工运兴起后，孙对中共与苏俄才有了新的认识。最后，孙中山终于下了亲俄决心。他对左右亲信江精卫、胡汉民、张继等说：苏俄是社会主义大国，国力强盛，可与为友。中共是中国新兴势力，我们在推翻清朝革命运动中，黄岗、潮州之役，人数极少，镇南关之役不过二百人，钦廉之役不过一百余人，现在中共组织工农革命运动，群众一起来，动辄成千逾万，开深“二七”罢工规模浩大，震动中外，其势尤不可侮！左右听后，亦以为然，联共政策，遂确定下来。

在这期间，国民党酝酿改组。一九二二年九月六日，成立修改党章起草委员会，并延聘陈独秀加入委员会。十一月十五日提出修改草案，十二月十六日通过。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公布党章，同时发表宣言后成立上海执行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孙中山得滇军杨希闵、刘镇寰之助，击败陈炯明。一九二三年三月孙再回到广州，国共合作条件遂经双方正式商定：即自上而下，在中共协助下改组国民党（包括中央及地方），接受苏俄各种援助（包括军事、意识形态各方面），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

在此之前，一九二二年十月，越飞（Jeffe）来华，旋赴日本与廖仲恺会谈合作问题，表示愿提供物质援助，并晓以利害。越飞后来又访孙中山，双方谈话结果，发表了一个公报，即所谓“孙越宣言”。

又据国际代表报告：一九二三年前国民党以中国革命正统自居，

一部份人认为中共在中国社会尚无政治力量与地位，实在无资格与国民党谈合作，因此主张只联俄不联共。直到“二七”前后多次大罢工发生，中共政治声望猛然增高，孙中山才断然赞成与共产党全面合作，借以增高国民党在工农群众中的影响。

溯自一九二二年下半年始，中国共产党在党报《向导》上先后刊布了几个文件，包括党的宣言及陈独秀的署名文章。在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即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日，陈独秀在《向导》第二期发表《造国论》，主张两大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倡议组织真正的国民军，创造真正的中华民国，建设民主的全国统一政府，采用国家社会主义开发实业。¹

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向导》第二十二期，刊布了陈独秀以《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为题的文章，对资产阶级进行了分析。据该文论证：（1）革命的资产阶级，如华侨及长江新兴工商业家之一部份。（2）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为官僚资本家及买办资本家，如新旧交通系。（3）非革命的资产阶级，不问政治，采取中立立场，如小工商业家。（4）革命的资产阶级应该和无产阶级联合打倒共同敌人，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上面两篇文章可作为当时主张国共合作的代表理论。国际代表马林以孙铎的笔名在《前锋》创刊号上发表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亦表达了同样性质的论点。

“国共合作”在共产党内也为许多人所不理解，特别是工人和作工运的同志，因为国民党并不注重工人运动，在工人中影响甚微。而国民党脱离群众，成份中官僚、政客不少，鱼龙混杂，却为人所共知，许多同志不愿与之伍，反对加入国民党，形成一股阻力。直到这次会议，经过多方工作，“国共合作”始为全党所接受。陈独秀在会上多次提出中共应全力帮助国民党，各级组织应派出最得力的干部协助国民党进行改组工作。自此，“国共合作”乃成为全党的一项中心任务。

对“二七”斗争评价，也是会议郑重讨论的议题。“三大”正值“二七”斗争四个月之后，为总结这次罢工经验教训问题，首由北方代表，书记部负责人提出“二七”斗争的详细报告。报告后展开讨论，有人认为“二七”罢工与军阀武装冲突，如以卵击石，伤亡重大，得不偿失，是闯了大祸，并提出要处分闯祸的人。但是绝大多数代表批判了这种错误意见。在讨论中，马林发言高度评价这次罢工的政治意义，肯定了这次罢工的重要价值，并总结了罢工的经验。我记得这次讨论会是在春园举行的。

原来对于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问题，在“三大”以前，二届

¹ 此段末，作者补有“说朕要点”字。— 补注

中央曾召开扩大会议（杭州会议），作出了决议。这次大会着重总结其经验教训，重申二届中央决议，认为：“二七”事发于北洋军阀统治强盛时期，犹如万马齐瘖之会，风雷乍起，给予北洋军阀一大闪击。事虽未成，但在政治上确有极大影响，足使曹吴气夺，令天下振奋。事后证明，“二七”的政治影响确实很大，北洋军阀从此陷于与全国人民为敌的困境。反对封建军阀的伟大统一行动，由此酝酿臻于成熟。

国际代表在会议上还强调，北方开滦罢工与“二七”罢工从表面上说来，虽都不算成功，但却是中国工人革命运动史上空前的有组织的大规模战斗。开滦反帝斗争、“二七”反军阀斗争与党的纲领要求完全符合，从此以后，中国工人阶级才真正登上世界政治舞台。“二七”后共产国际来电，亦云：“确实说，你们的行动，是已经走到世界无产阶级的行列里了！”在“三大”会上，秘书处并以《京汉工人流血记》作为正式文件分发给各代表。

中央执行委员会

经过讨论和选举，“三大”选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的中央委员九人：陈独秀、李大钊（守常）、毛泽东、罗章龙（文虎）、王荷波、蔡和森、谭平山、项德隆、朱绍莲。新中央委员会名单，系由国际代表向三届大会提出讨论后通过的。国际代表强调，中央委员会组成应以工人运动领导者占多数，其中必须有产业工人。这一原则，为大会所接受，认为是进一步发展工人党的组织的重要保证。因此，“三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显示了工人革命政党，阵容颇为严整，工作效能亦高，为前两届中央所不及。

“三大”选出了五人中央局，其成员为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和蔡和森。推举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委员长主持一切中央局及中央全会会议，与秘书共同签署一切公文函件，秘书负责党内外文书、通信及开会记录、管理党内文件等，会计管理全党财务行政，并对中央机关和各区各地方机关财政、行政负责审议之责，主持审计财务预算和决算有关事务，稽查现金出纳等工作。中央委员李大钊、王荷波、项德隆、朱绍莲则分别参加北方区、上海区、鄂区及湘区的委员会工作。

“三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原在广州，后因地处偏隅，交通不便（当时粤汉路未通），对指导全国斗争不利，中央乃决定迁回产业工人聚居的上海，留中央委员谭平山在广东工作，并改选王荷波入中央局。

中央作出上述决定后，我和荷波都到中央局工作。我们二人原来均在北方区委工作，同时又都担负铁路工运工作，唯恐同时离开北方会影响北方区工作，所以有些顾虑，想保留一人在北京工作。我于是将此意见报告中央，并表示愿意继续留在北方区工作。中央乃将我的来信转商国际代表，意思是，文虎本人有意留北方区，由荷波一人南行，这样可减少北方当前的人事困难。中央和国际代表考虑后表示不同意，批示说：“文虎不能留北京，应该从全局着眼，三代会既已作出决定，就应该全部执行。”国际代表坚持让我和荷波二人均应到上海中央主持工作。

北方区委乃立即举行会议，商定关于我离京交代工作诸问题。长辛店、石家庄、天津、唐山、南口等处党的负责人均应邀来京参加会议。会议对当前工作及人事调整等均作了具体决定。会毕，尽美和我共赴天津，抵津后又参加了天津市有关工作交接事宜。天津会议结束后，决定派尽美回山东报告北方区委决议案。我于一九二三年七月乘津浦路火车南下，尽美亦同车到济南。时尽美患病颇重，临别时，我再三嘱咐尽美去青岛德国医院检查身体，作作透视，并休养一个时期后再工作。我对他表示：“一年期满，我仍当北来，望多保重。”尽美说：“我自觉体力日弱，不知以后如何变化，党需要兄方面甚多，不必一定要回北京。”

车次浦镇，王荷波得信到站相迎，并领我至其家下榻。其室内只有一双人铺，因嘱其夫人至邻家借宿，留我共榻。我遂传达中央来信旨意，荷波漫应之。荷波夜间向我谈说：“虎兄，你大嫂闻你在火神庙蒙难，曾亲往寺院祈祷，她并求签问卜，据称，你在三十六岁还有一跳（即惊险事故），当小心在意。”我听后，暗自好笑，因答道：“我们天天在‘跳’，何待三十六岁？”荷波道，“那个自然，娘们的话，信之则有，不信则无。”二人一笑而罢。次日，我劝荷波就此同行到沪，荷波初尚感犹豫，说不愿离开工厂，怕脱离群众。其夫人在旁催促他说：“你走，我同你一道去好了，是真神到处可以显灵。”荷波遂决定离开多年的工作位置，携眷赴中央工作。

车抵上海，我与荷波寓火车站界路旅社，随至中央接头处。晚间，仲甫来寓，倾谈至深夜始兴辞而去，并约定举行中央局会议。

当时出席中央局会议除中局委员外，尚有共产国际代表、少共国际代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等。会议首由国际代表马林致词，接着是委员长陈独秀报告政治问题及中央局今后工作纲要。报告后即席讨论工作纲要，并进行具体分工。其后，润之因事赴湘，改由我任秘书兼主持宣传部工作。王荷波则任会计，监察财务。蔡和森负责《向导》编委。当时，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是恽代英。代英因事离职期间，

有一个时期由我兼代团中央书记。

在这期间，中央发出的重要文件都由委员长和秘书联署，方发生效力。一般信件则仅署名钟英（中央代号）。中央代号也时有变动，从一九二三年九月起至一九二四年上半年，中央连续发布的通告，大多由独秀或我起草，并由我们二人共同联署。如目前保存下来的十三号通告，就是经中央局讨论后由我起草的。该件的署名：委员长 T. S. Chen 是陈独秀的英文签名；LoDshan-Lung 是罗章龙的德文签名。

国际代表经常列席中央局会议，因我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所以大家国际代表很尊重，实际上很多决议都经过国际代表同意。

随着工作开展，中央局成立了秘书处、组织部和宣传教育委员会。

秘书处：掌管文告、总务、对外联络、交涉等事项。

组织部：主要负责组织、建党、人事调动、党员训练等。组织部长为毛泽东。

宣传教育委员会：主要负责宣传工作、教育工作。宣传方面主要是办中央的党报——《向导》，后又加了《中国工人》，并协助国民党办了上海大学，邓中夏任上大总务。还办了训练班，组织学生出国学习等。我兼负宣传方面的工作。

还设有几个委员会，主要工作是设计、规划、制定方案。有工人运动委员会、青年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等，稍后成立了军事委员会。

工委：王荷波为主任。

青委：实际就是共青团，书记为恽代英，委员为李求实等。

妇委：向警予为主任，下面设妇联。

“三大”后的军事工作，属中央局直接领导，中央及各地没有正式设立军委。

另外各省还有民委，党中央没有。主要是做国民党的统战工作，也就是后来的统战部。

三届中央的全部工作方案，主要可分为党的日常工作与“国共合作”两个大的方面。前者主要包括党的宣传与组织工作，工人运动、农民协会、青年、妇女工作等。后者包括有关改组与加强国民党等工作。

日常工作中值得一提的是，“三大”以来在工人运动方面作了新的部署。其重心特别放在当时比较薄弱的上海、广州与武汉等处。于是开始集中干部在上海建立工人俱乐部，项德隆、林育南、邓中夏、何今亮、李震瀛、刘剑华、李立三等先后调到上海沪东、沪西二区主持工会工作，从而揭开了上海工人斗争的序幕。随后纱厂、丝厂罢工相继兴起，影响波及武汉、广州、青岛及北方各地，工会运动风起云

蒸，经时约一年遂汇合成为全国范围内的“五卅”运动、省港罢工运动和全国总工会的建立等，这是三届中央坚持工人运动均衡发展方针所获致的革命成果。在农民运动与军事工作方面，当时亦渐渐开辟道路，积极建立新的群众组织。

帮助国民党改组，其中包括建立黄埔军校，目的是为了争取工农运动进一步开展。当时最迫切的工作是筹备北伐，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力量，迎接大革命的高潮。“三大”在中共党史上，在大革命高潮进展中，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

关于国共合作，从一九二三—一九二七年都贯彻这个精神，原则始终没有变动。这个时期国共合作，对方是孙中山。孙中山当时特别重视双方平等合作，成立了改组委员会。国民党方面以孙中山为代表，共产党方面以陈独秀为代表，苏联派来了特别顾问鲍罗庭。孙对鲍的意见很重视，鲍在两党合作中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现今留有一个文件，记载了孙中山聘请鲍为总理特别顾问，国民党中央常委，总理如果缺席，会议由鲍罗庭主持，会议决定的问题，要得到鲍罗庭同意。意思是：鲍在国民党会议上有“否决权”，可代行总理职权，权力相当大。为了国共合作，苏联派出以鲍为首的广泛的顾问团。有政治的、军事的（海陆空三军）。军事顾问团以加伦为首席代表。加伦是军事顾问团总顾问，如东征、海南岛战争、北伐战争，加伦决策起了重大作用，大家十分尊重他的意见。广东政府海空军方面，苏联顾问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当时有十几架飞机，由加伦领导。并曾由中共中央派刘云等到苏联学习航空专业。各军政治部主任及政工人员，也由苏联顾问及共产党共同协商派出。

黄埔军校，原来是清朝训练海军的地方。新建的黄埔军校的教官多半是中共与苏联顾问所任命，经费全部由苏联供给。苏联前后分批送给一万多支枪，各种型号的轻重武器都有，质量很好。苏联在莫斯科办了一个专供国民党留学生学习的“中山大学”，去学习的人不少，有名可查的就有一、二百人。我党还派出了一些军官在国民革命军中工作。当时，中国的军官主要来自保定、清河两个军官学校。海军方面，最大的一条舰是中山舰，掌握在共产党手中，舰长是从北方区烟台海军学校党支部挑选出来的。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任务是帮助改组国民党，不少中央委员做这项工作。国民党省党部的改组工作，中共也投入了不少力量。北方是北方区委主持，南方是广东省区委负责。通过改组国民党造成一个国民革命的高潮。

关于中央通告

为了执行“三大”的政策，三届中央产生后，从一九二三年六月至一九二五年一月，前后签发的正式通告约二十四、五件，目前保留下来的很不完全。

“三大”中央拟了一个全国工作规划，内容包括有宣传教育、建党建团、工运、农运、妇运、青年团工作等。各项工作还分别有所规划。中央的通告反映了上述规划的内容。当时的大部分通告由委员长陈独秀和我共同签署。一九二四年夏我以中共中央代表名义被派出国工作，我出国期间的通告则由陈独秀和毛泽东共同签署发表。

目前中共中央机关保留下来的由独秀和我共同签署的中央通告还有五号、九号与十一号、十三号等。现已公布的有第十三号通告，该通告是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发出的，前部分专说国共合作问题，后一部分说的是收回海关问题。

通告十三号：

各区执行委员会并转各地方同志们，兹有两个重要工作，望同志们努力进行。

(一) 国民党改组问题

自大会议决本党同志参加国民党扩大运动以来，以种种障碍未能见诸实行。第一次本党执行委员会开会时，适值国民党有改组之议，遂议决关于国民党进行计划，以冀实行大会之议决案。此时国民党之改组已着手进行，颇有振作之希望；广州已设有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其驻沪执行部业已成立；广州上海二市，已着手党员重新登记，定期开全体大会，分区组织；明年正月在广州召集全国大会，赴此大会之代表，每省六人，由当地推选三人，由总理指派三人，其曾有组织之处，业已准备推选赴会之代表。中局方努力进行复活国民党之工作，各地方同志在此工作中，望依下列步骤切实进行：

(a) 有国民党组织之地方，同志们立时全体加入；没有国民党组织之地方，要即将同志非同志可加入国民党之人数及何人可以负责，报告中局，以便中局向国民党接洽，请其派人前往成立分部。

(b) 在国民党已有组织之地方，本党地方会应即与 S.Y. 地方会合组国民党改组委员会，以主持目前即应进行诸事。改组分区事竣，即应由两地方会在各区指定我们的同志一人组织国民党委员会，受两地方会之指挥。

(c) 吾党在此次国民党全国大会代表中，希望每省至少当选一人，望各区委会与地方会员预商当选之同志，此同志必须政治头脑明晰且有口才者方能在大会中纠正国民党旧的错误观念。旧国民党员中，我们也应该出力帮助其比较的急进分子当选。代表选定后，即报告国民党总部（上海法界环龙路四十四

号），川资由总部发给。

(d) 此次国民党大会中最重要的问题是讨论党纲章程（其草案均见《向导》）及对于时局之策略，代表动身前各区均应详加讨论，俟各省代表过沪时，我们的同志再集会议决一致的主张。

(二) 收回海关主权问题

协定关税制，税则与用人均不能自由行使主权，这是国际帝国主义者致我死命的最毒政策，因为在此关税制度之下，不得列强之许可，不能自由增加进口税，以退外货之输入；不得列强之许可，不能自由增加出口税，以遏原料之输出；如此产业落后的国家，永远不易发展，永远为销行外货之市场。

目前广东海关问题，广东政府原来之目的固然仅在关余，然相持之际已发展到用人问题。我党此时应一面声援广东政府并督促其根本的收回海关全部主权，勿仅仅争在关余；一面主张收回全国海关主权，废除协定关税制，以排斥英货美货为武器，若军阀有表同情者，虽与之合作亦所不惜。

各地方同志们应立即尽力之所能设法联络各团体，以地方公团名义，散发传单，通用全国，游行示威，发起排货。此主张一时未必即能贯彻，然我们断不能失去宣传的机会。

以上二工作，为本党目前最急要之工作，各同志接到此通知后，拟如何进行，并已进行至何程度，各地方务须随时报告区委员会，各区会务须随时报告中局，中局即以此二项工作进行如何为各地方工作勤惰之标准。

十二月二十五日

委员长 T.S.Chen

秘书 Leo Dschan-Lung

第十三号通告前段主题就是讲这件事。

十三号通告后段讲的是争取关税独立自主问题。当时，这件事比较复杂。孙中山的口号是争“关余”。北京政府段祺瑞的意见是与帝国主义协商，稍为提高一点进出口税率，使北京政府财务上有所增加。这个要求最低，当然说不上维护国家主权及人民的利益。“关余”问题是南方政府关心的问题。因为北京政府外债太多，以海关收入担保，还本付息。每年关税实际收入比还债数额多些，多的一部分叫“关余”。孙中山当时在西南组织了一个西南政府，北洋海军有几十条军舰拥护他，纷纷把兵舰开到广东，因此孙要把“关余”争来发海军军饷。共产党认为“关余”是临时的财政措施，我们的目的应该是收回关税自主权。在中共策动下，后来全国爆发了关税自主运动，北京政府被迫召开关税会议，帝国主义亦被迫让步。

“三大”前后发行的主要报刊

中共“一大”前，最先刊行的党报为《共产党》月刊，至“一大”时停刊。“一大”以后，党以全力开展工人运动，当时上海党报为《劳动界》，由独秀主编。北方党报为《工人周刊》，由我主编。

中共“二大”后，国际代表马林来京时，向北方区委提出建议，出版一种英文日报，争取在中国外交界及国际工人运动中扩大党的影响。区委讨论后，决定创办英文日报，并定名为《远东日报》，由北方区委负责筹办，并在南池子冰窖胡同租定报馆馆址，克日开始筹备工作。

《远东日报》编辑部，主要由马克思学会西文翻译组负责。在筹备过程中，立案事宜发生波折，而且一时亦无法购置英文排字机。由于上项困难，经中央商议决定作罢，改在上海出中文周报，即《向导》周刊。

《向导》周刊，原定名为《政治向导》，后简称《向导》。《向导》主编陈独秀，早期编委会成员有国际代表马林、伍廷康以及高君宇、李守常、罗章龙、张国焘、蔡和森等。编委会下设翻译室，有英、法、德、俄、日五个组。《向导》于一九二二年九月初旬集稿，每周星期三出刊。独秀主编《向导》，他几乎每期都执笔写文，仅在一九二二年十月出国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时中断了一个时期；一九二三年十一月间，独秀患慢性肠炎卧床不起，《向导》遂改由我主编了几期。

《向导》编委要求熟悉各国党的过去与现在的政治文献，须经常阅览中、西文报纸，如康民特尔、朴罗芬特尔出版的报纸与月刊，及英、德、法文版国际通讯等刊物。《向导》编委会对读者所提意见十分重视，一般均须作答，或在通讯栏刊布，或个别函复。《向导》编委在集稿前一、二日，齐到编辑室漫谈，交换对于下期题目及内容的意见。有时谈锋所及漫无界限，谈毕亦不必写成文。即令写成文章，由于篇幅所限，亦不一定全部刊出。

《向导》与一些党内刊物、书籍一度曾在北京印刷、发行。由于政治迫害，没有固定的发行机关。如第一期至第三期，总发行所为上海老西门肇浜路兰发里三号徐白民。第四期起始办妥邮局挂号手续。第六期至七期，在北京后门内景山东街中老胡同一号。第八期至十一期恢复徐白民，加北京大学第一院收发课转罗漱阶（我的学名）。第十二期，北京发行改由刘伯青负责（他同时是《工人周刊》助理发行人）。第二十期公开发行集中在北京。第二十一期至二十五期，除北京外，再加广州一处。第二十六期，北京照原址，取消广州发行处，

改由杭州马坡巷法政学校安存真（安体诚）转。第二十九期，杭州发行处撤销，仍恢复广州昌兴街二十八号。第三十期至三十三期，又取消广州发行处，恢复杭州原址。第三十四期又撤销杭州发行处。第四十二期，恢复广州发行处。第四十三期起，独存北京一处，其他撤销。第四十四期起，又恢复杭州原址。一年间《向导》发行不断变易地址，可见其处境的艰难。前后发行人与发行地址，大多数都被军警机关传讯或搜查过。北京大学、杭州法政学校就常为此遭到检查，发行人受到侦缉。¹

《向导》文风泼辣、形式多样。政论文章如刀枪上阵，言辞锋利，英气勃勃，凌厉无前。以笔名只眼、独秀、孤松所为短文及诗，则语调幽默，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一次，在我写的一篇文章中有“延误革命的佳期”的句子，独秀偶然看到，失声笑道：“以革命与佳期联用，实为新颖，形象非凡，气氛乐观。我们平日草文，均属一时急就的篇章。如从文艺角度看，竟无一不是处。”三届中央还出版了一种党内刊物《党报》，记载党内文件和通告，但出版期数不多。

《中国工人月刊》：一九二三年中共中央曾决定办一种工人运动理论刊物，但因人力不足，久未实现。一九二四年，中央再次作出决定办一个革命理论与实践综合性的工人运动刊物，定名《中国工人》，我适由欧洲回国，遂推我负责主编，并组成编辑委员会。一九二四年十月，创刊号问世。后刊行国际职工运动专号，销数很大。至一九二五年五月前后，共出五期。经编委会审定的稿件，累计约几十万字。参加写文者有下列二十余人：邵时威、李守常、徐典、刘伯青、林伟民、若愚（林育南）、邓中夏、赵世炎、项英、辟世（任弼时）、张伯简、张特立、吴雨铭、罗亦农和我等。

《中国工人》当时在国内与《向导》平行发刊，销路仅次于《向导》，而为革命阵营第二大刊物。“五卅”运动发生后，因编委会重要成员工作繁忙，且分居各地，集稿发生困难。一九二五年六月，经中央决定，暂时宣告停刊。一九二九年重组编委会，由沧海（即我的笔名）、石溪（育南）、项英三人负责。一九三一年后，印刷厂因故复停，《中国工人》便成绝响！

《中国青年》是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日创刊的，由恽代英主编。社址设在上海法租界辣斐德路一八六号。一九二六年五月移广州，改由李求实主编。一九二七年五月移到武汉出版，十月迁上海，易名《无产青年》。一九二八年十月，改名《列宁青年》（化名《光明之路》），一九三二年停刊。

¹ 此段下，作者补有“[注]，《向导》文摘，不宜一笔抹煞，以人废言”字。——补注

“中央出版委员会”，是一九二三年十月，中央局会议讨论关于党内外出版方针与机构问题时，决议由中共与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合组而成立的。以我、徐白民、恽代英、顾琢之、苏新甫等为委员，并指定张伯简、成伟、郭景仁等参加专门筹议有关出版事项，第一次会议决定统一中共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出版发行事宜。原在上海南市民国路小北门设立上海书店，经整顿后由徐白民任上海书店经理。并以上海书店为中心，建立全国书报刊物发行网。各地负责人为：

广州《新青年》社苏新甫（一九二六年改设国光书店，由黄国梁任经理）；

武昌利群书社林育南（一九二七年设立长江书店）；

北京大学刘伯青；

杭州法政专门学校安体诚；

长沙文化书社易礼容；

太原晋华书社杜时；

济南齐鲁书社王尽美；

又决定自办国民印刷厂，厂址设在闸北香山路香兴里，延聘胡忧天任经理。

三曾里三户楼

党的“三大”在广州召开后，决定“三大”中央设在上海，“三大”中央局的常委全部到上海集中，常委们陆续到达，有的由湖南到上海，有的由北方到上海，有的由广州到上海，到达上海的时间路线都不一致。到上海后，在闸北找了一所房子作为中央办公处，这就是三曾里三户楼。

三曾里的房子是王荷波租的，离闸北火车站一二里路远。在中兴路与香山路交叉的地方有个小里弄，称三曾里。这个名称很费解，后来才知道这个里弄只有三个门牌，由此而得名。

三曾里的房子结构是普通的二层楼房子，用上海话说叫做两楼两底。我们决定找这地方作办公地点，是因为此地属于中国地界，周围有几十家缫丝工厂和一些手工业工厂。居民以广东人最多，其次为江北人，这个地方既不是贫民区，也不是绅士区，五方杂居，环境条件对工作很有利，所以才定了下来。这个房子，楼上楼下大小共有八、九间房，当时没有户口制度，但住房必须有个户主，我们三户联居，称它为三户楼。毛泽东、杨开慧一户，向警予、蔡和森一户，我一户，大大小小算起来有十口人常住。对外就说是一家人，向警予是一家户

主。

毛泽东和杨开慧带着孩子岸英住在这栋房子的前厢房。那时杨开慧身体好，虽然有了孩子比较劳累，但她仍然挤出时间做了很多工作。

蔡和森和向警予带着小孩住的房间和润之的房间只隔一层板壁。向警予在中央参加工作，负责妇委，兼做工人运动。在三户楼中间，她是年长的一个，做事很有经验。我们推她当户主，中央开会和里里外外的事都由她安排、照顾。

另外，有一个管事务的女同志，叫王熙春，共青团员。她是扬州邗江人，原上海某教会大学英文班学生。她排行第九，外号九姑娘，主要是在秘书处领导下负责对外联系，管理机关内一些政治性和事务性的工作，包括警卫、后勤等。房子上有一个警报电铃，也由她管。熙春同时负责女工运动，组织领导丝厂工会斗争，曾被捕过一次。我们还请了一个娘姨，叫魏贞秀，苏北盐城人，是个丝厂女工，有三十多岁。她是工会成员，不是党员，但很忠实可靠。

三户楼设有公共伙食，由向警予管理，平常吃饭有七、八人。每月休息时间由向警予和王熙春规定。为了工作，我们口头约定了一些共同遵守的纪律，不成文的公约，即不准到外面上餐馆，不看戏，不看电影，不到外面照相，不在上海街上游逛，休息时间和业余时间如要出外，可在空旷的地方散步，假日可到吴淞炮台，兆丰公园，或远处如松江、太湖、虎丘、苏州等地旅行。

中央机关不止这一处，英租界威海卫路瑞兴里也有办公处，其他如共青团中央设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和辣斐德路等处，国际联络处即外白渡桥苏联领事馆，太平洋工会书记处设在英租界汇山路。

经常到三户楼来的有王荷波，他住在英租界同孚路，是我们当中年纪最大的，约四十多岁。国际代表也来开过会，他不常在上海，有时到广州等地去。恽代英当时是共青团的书记，中央开会他也要列席会议。陈独秀不住在这里，离这里有一、二里路，但在三户楼设有床铺，开会晚了或有事不能回去就在这里留宿。我们这个“家庭”对外以“报关行”作职业，即帮人填外文表格到海关去报税。经常来的这几个人对外就说是亲戚串门子的。其他人非经允许不准来。例如，有一次陈独秀的爱人高君曼来找陈，王熙春不认识她，不让她上楼。还有一次，湖南有个青年从长沙来找杨开慧，杨问明来意，知道他头次到上海，很想在此留宿，杨说不行，叫他回去。这个青年远道而来，很难过，杨说你一定要离开，以后也不能来，就把他送到了车站。这只是一个例子，足见其严密了。一些特殊的、经中央允许的人和来接头的人可以来往，这个地方是不公开的。苏联领事馆派专人和我来往，他可以进我们的房子。当时，常委会在楼上的客厅举行。

在三曾里，我们订了《新闻报》、《申报》、《新申报》、《上海民国日报》、天津的《益世报》；订外文报有《密勒氏评论》，这是当时很有影响的一家外报。还订了一些外国杂志，主要是第三国际的英、美、德、法各种文字的报刊。润之主要看中文报，代英、荷波、仲甫和我们都看外文报，有时我们也在一起谈论有关报刊内容诸问题。

毛润之每天早上利用吃早饭的时间看报，把重要的记录下来或剪下来。我们的报纸头天取回来，第二天仔细看，主要是了解政治情况。报纸中最使我们感兴趣的是《申报》、《新闻报》的北京专电，可借以研究全国的政治动向。我们的报纸不是送到所住的地方，而是送到信箱，由小王每天去取。我们的信箱不止一个，在北四川路离苏州河不远的邮政局地下室，也有我们的信箱，也可以收到报纸。

三曾里离环龙路执行部比较远，我们坐车去办公，大家指定一个地方集合，然后坐车前去，大部分坐出租汽车。当时出租汽车很多，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上车。就是专车，我们也不让他开到住处，让它在指定的地点停下来。

我从一九二三年秋搬到三曾里，第二年六、七月才搬走，住了近一年。后来我出国到欧洲工作，以后的情况就不太了解了。向警予住在此地，到丝厂做女工的工作也很方便。这附近有个湖州会馆，是浙江大资本家盖起来的，上海第三次工人起义时，它是最著名的司令部所在地。

三户楼诸人，平日生活十分紧张，如草拟文件、决议，为《向导》及党报撰文，经常静思澄虑直至深夜，但大家以革命为信仰，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改进工作，生活又十分有朝气。“同心若金，攻错若石”，“团结一致，同舟共济”是我们遵守的信条。当时，我曾有诗记述三户楼：

黄浦激浪雪山倾¹，淮海风云会郡城。
东楚山川多壮丽，西方瘴疠满神京²。
亡秦主力依三户，驱虏全凭子弟兵。
谊结同心金石固，会当一举靖夷氛！

按一九七〇年上海房管部门查到解放前一张房产建筑的旧图纸，确认三届中央办公处是在上海闸北区中兴路与香山路交叉的三曾里。但是，原房屋在“一·二八”时，被侵华日军的飞机炸毁了。现在原址建筑了一座新楼，三曾里已看不到踪影了。

1 黄浦指黄浦江。

2 西方瘴疠指西方帝国主义侵略。

国际代表马林

一九二一年至二四年间，国际代表长期在中共中央工作者主要有马林与伍廷康等，二人对中国革命均有劳绩，而以马林的贡献最为显著。

马林自中共“一大”以来便在广东、上海工作。北方会议前后，马林作为国际代表曾留驻北京多日，参加北方区委会议，指导工人运动，同时研究国共合作问题，并提出方案与建议。马林全名：Henker Slievlied Maring，原籍荷兰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在荷京大学读完政治经济学课程后，投身荷兰工人革命运动，担任荷京港运秘书。周游世界多地，后遂侨寓泗水。一九一四年成立东印度社会主义联盟。一九一五年出版荷文《自由呼声报》。一九一八年出版印尼文《人民呼声报》。一九一八年间，马林因迭次著文抨击荷兰政府的殖民政治，被驱逐出境。一九二一年受第三国际派遣来到中国，帮助中共推动工人运动，有运筹帷幄之功。

当时，马林年富力强，兼通英、德、法等国语文，器识宏通，对中国革命问题从世界形势权衡全局，故观察与议论非寻常之见所可比拟。仲甫对马林颇尊重，但二人秉性均倔强，如遇议论不合时，互以盛气相凌。一次仲甫曾向马拒绝国际经费支援，说道：“何必国际支援才能中国革命！”马林颇为难堪。仲甫亦自觉失言。马曾戏称仲甫为“火山”。又一次在中央会议上，仲甫与马因争论，致使会议不能进行，我当时任三届中央常委会秘书，只得宣布暂时休会。马林心平气和去邻室抽烟，陈仍余怒未消。片刻后我说：“时间已到，继续开会。”马问：“‘火山’是否熄了？”我说：“熄了！”马林说：“革命党头脑应该冷静。”时润之亦在场，会议结束后，润之提议：以后开会，大家不能发脾气。我们均表支持。

马林关心工人运动，身体力行，在北方时，尝不顾环境险恶参加工人支部会议。某次在会上与铁路工人谈话，有人发问“革命主要目的何在？”马答：“首在争取政治自由，实现政治自由以后，经济各项改革自然水到渠成。”又问：“敌势强大，如何着手？”马答：“从组织群众力量入手。敌人对我施百吨压力，我们以千吨革命强力回报。”马林这些简明有力的谈话曾给予参加会议工人以极强烈的印象，亦是他长期从事实际工作，锻炼出来的战斗意志和语言。

一九二二年我在唐山领导开滦煤矿同盟罢工，斗争很激烈，双方冲突，死伤很大，罢工遇到重大困难。我即发了一个西文急电到上海

中央，正值中央开会，陈仲甫和张国焯之间因意见分歧，相持不下，马林接电说：“目前唐山问题是党的首要问题，要全力以赴！其他个人争执均属次要。”于是大家转入讨论支援唐山罢工问题，及时作出决定。马林还为此事亲临天津和我见面，反复商讨罢工问题。

“三大”会上，代表们对“二七”罢工问题，认识不一致，马林在会上提出共产国际文件，对“二七”给予高度评价，表示同意国际的看法，以理服人。马林对确定“三大”路线，贡献亦大。

国共合作，起初阻力很大，第三国际授权马林具体执行。中共“一大”后，仲甫与孙中山交换对时局意见，即介绍马林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由张继陪同前往桂林会晤孙中山。直到党的“三大”，马林在这一期间做了很多解释说服工作，对国共合作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马林对中国革命视同自己的事，遇事率直倡议，不稍瞻顾。他曾担任《向导》编辑，很刻苦，每篇文稿都要我翻译讲给他听，不对的地方，就提出看法，要求我们改正。对他自己亦是如此。他在上海时曾向工委提议组织北方矿业工人联合会问题，当时我心不谓然，乃将此事提交中央会议讨论，会议上详加讨论后，认为北方矿区分散与铁路性质迥异，目前只有开滦、焦作煤矿尚有基础，六合沟、枣庄、阳泉与淄博次之，其他矿区尚无眉目。认为根据实际情况决定策略原则，北方至少须有几个大矿工会作基础，才能成立联合组织。目前尚无此条件，因此对马林提议决定缓办。此项决定尚未正式通知马林以前，马林托春木（张太雷）送来亲笔德文信一封面交给我，封面上书 Mandat（命令）字样，内容仍是坚持限期成立矿工联合会事，我即往见马林，将会议讨论情形详告。马不悦，说这是“外交词令”，但亦未坚持下去，此事遂作罢。事后马林自觉前信失之操切，乃在出席会议时加以解释，并撤回前次提议，同时，对中央工委处理问题态度认真负责加以赞许。由此一事可见当时国际代表与中共组织关系互相遵守民主原则，故能同心协力共赴事功。

马林在中国工作颇称顺利，自一九二一年至二四年，中国革命循序渐进，收到确实成效，马林之功不可抹煞。但由于当时国际东方部倾轧排外政策的结果，马林于一九二三年下期被调回莫斯科，改派伍廷康继任。伍为俄罗斯人，原先来过中国，后回国，自此以后长期代替马林职务。马林回莫斯科后与东方部意见齟齬，众口烁金，马林遂辞职重返荷兰，一年以后，我们于阿姆斯特丹又曾相逢。

马林自离开中国后即返荷兰担任码头工会秘书，在汉堡参加国际运输会议，我们同时出席，在会上相遇。会后他约我到荷京阿姆斯特丹一行，我乃与马林同往荷京访问，约经一周时间，即暂寓其家。其夫人热情招待有如家人弟兄，亲切异常。荷兰是世界闻名的航海国家，

其海员工作效率为欧洲之先进。阿姆斯特丹，港政修明，足与汉堡相埒，但见海上艘艘巨舰，往来如织，工人组织极严密，生产与文化均极可观。马林尽数日工夫陪同参观造船厂、堤防口工程以及近郊农场，其中奶油乳酪、蔬菜生产量丰质高，不愧为欧洲诸国的“厨房”。几千年东方专制大国毫无民主传统，视此蕞尔小邦，经济、政治、文化均远所不及。马林对中国革命备极关怀，他告诉我说：“中国是农业大国，无民主习惯，推翻一代统治者在中国历史上极为平常，但要建立民主制度却有重重困难。今天唯有通过工人运动可以接近民主，纵有困难，不宜灰心，舍此以外更无达到民主的道路。”¹在马林家连夕畅谈，情谊隆重，临行时，夫妇二人依依惜别，请留诗以作纪念，我用当地文体写了“十四行”诗相送，他们夫妇均曾学习过汉文，又要求把诗译成中文，我勉强译成下列绝句一首：

海国西来万里轮，威廉霸迹已成尘，²
唐山辛店惊风雨，话到当年情更亲！

夫妇两人阅后，喜甚，互道珍重而别。³

环龙路国民党执行总部

国共合作具体执行时，中共曾多次郑重地进行讨论，各次会议均有国际代表参加。中央局会议曾作出决定，对于国共合作问题中共中央采取下列原则，即：

（一）中共保持独立自主原则，中共党报及中共各级刊物对国民党施政得自由批评，不受限制。

（二）中共领导的工农群众组织不受国民党及其政府干涉，工会、农会享有集会、结社、罢工、纠察自卫之自由。

（三）中共党员（包括团员）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任群众工作，但一般不做国民政府官吏。工人运动领导者及中共所属工会会员不得加入国民党。

（四）在组织方面，自一九二三年七月起，中共中央由仲甫代表

¹ 关于马林在中国工作的概况及其评价，我以后在本书下集中还准备详细加以说明。

² 威廉 Wilhelm 系荷兰开国君主。

³ 此京末，作者补有“[注]：1987年荷兰大学教授 Seteh 来北京访问，见面时谈到在 Maring 家中见我亲笔写给 M. 的信与我在上海中央的通讯处：Shanghai Chung Hua Book Stor KÖnigwham Jugend”字，来访者为莱顿大学教授 Tony Saich。— 补注

中共出席国民党最高会议。党组织自中央到省市各级按系统派遣党员分别协助国民党进行改组工作，包括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党部及基层组织，训练干部，整饬宣传机构，协助国民党工作，扭转该党在民众中的不良影响，帮助国民党改善军事教育训练，建立革命军队等。

根据上述原则，中共中央政治局派政治局委员（时称中央局常委）王荷波、毛泽东、罗章龙三人参加国民党执行部，协助国民党进行改组事宜，后又续派中委李守常、谭平山等协助国民党在北方及广东的改组工作。中共各省委、市委分别派遣中共党员参加当地国民党省市委会的改组工作及军队改建工作。现就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与国民党执行部、黄埔军校的建立诸项略述大要如次：

国民党“一大”

一九二三年十月成立国民党改组委员会，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正式召开。此次会议，中共方面全力以赴，动员党内大部人力协助筹备大会诸事。中共中央决定自中央到地方派遣多数干部参加国民党“一大”中央工作。派遣干部时，曾经过详细讨论，决定原则如下：

（一）李大钊、张国焘、韩麟符、毛泽东、高语罕、恽代英、谭平山、瞿秋白、于树德等参加国民党“一大”中委会，为跨党党员。

（二）原有国民党籍之加入中共党员，由中共方面提名参加国民党“一大”中委会，人名为：林伯渠¹、沈玄庐²、邵力子等。上述名单是党中央向国民党提出的。

（三）省、市党部委员由国共双方经地方党部决定。人名为：夏曦、董必武、宛希俨、于方舟、侯绍裘、江浩、李锡九、谢晋等。作为跨党党员得当选为国民党机构委员。

（四）领导工人运动的中共中央委员及各级工运干部，原则上不参加国民党。如罗章龙、王荷波、项德隆，上海总工会负责人李震瀛、何今亮，北方工运负责人何孟雄，王仲一、张昆弟、邓培、孙云鹏、安幸生、康景星、李宝成，湖北工会负责人林育南、许白昊，江苏工

1 林祖涵（1886—1960），字伯渠，湖南临澧县人，常德师范毕业，东渡赴日本留学，1909年归国在吉林巡抚陈昭常处任吏员，其兄林建藩（修梅）曾任零陵镇守使，曾起义，与国民党有渊源。林于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任国民党本部总务部副部长，并参加改组国民党工作。

2 沈玄庐，原名定一，浙江萧山人，家资豪富，有沙田千顷，清末以捐款报效得任云南露益知县，任满家居，有妻妾仆婢甚多，后在衙前做农民运动，借此与我党接近，随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旋因其媳他恋迁怒于党，遂脱离党，后积极参加国民党清共工作，任国民党中委及浙江省政府委员。

会负责人朱宝庭、孙津川、姚佐唐、余立亚，浙江工会负责人沈干城、朱阿堂、赵济猛，江西工会负责人陈赞贤、王凤飞、袁孟冰，广东工会负责人阮啸仙、刘尔嵩等；均不加入国民党。

独秀对于我党领导工人运动的中委不参加国民党中委会的意见开始不同意，但是中共中央大多数中委都不同意独秀的主张，所以结果仍然决定领导工人运动的中委不参加国民党中委会。

（五）向三民主义注入革命因素。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中共中央提出大会决议草案及宣言内容，决议主要包含下列几点：

（1）对三民主义注入革命因素，重新作解释。

（2）提出联俄、联共与赞助农工的政策。

（3）国民党组织从总理制改革为委员制。

（4）选举时尽量引进国民党左派进入新中央委员会。

因此，国民党“一大”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体现着两党平等精神，从理论上奠定了名实相符的合作基础，两党联合会议决定了国民政府的施政总方针。

上海执行部国民党主持人

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中央决定设置国民党执行部于上海法租界环龙路四十四号，作为国民党最高执行机构。执行部内主要设立组织、宣传、工人农民等部及秘书处。国民党派定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于右任、叶楚傖、茅祖权等分任各部部长。中共方面由中央政治局决定毛泽东、罗章龙、王荷波、恽代英四人参加指导执行部工作（恽代英系代表团中央参加执行部工作），遇有特别重大问题则由国民党总理孙中山与中共中央书记陈独秀协商决定。同时，中共中央又决定派干部沈泽民、邵力子、瞿秋白、施存统、邓中夏、向警予、杨贤江、沈玄庐、张秋人、李成、刘伯伦等参加执行部各部门宣传与组织的基层工作。当时上海社会传称环龙路四十四号为“国共群英会”。

一九二四年五月五日，是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三周年纪念日，上海执行部国共两党工作人员齐集莫里哀路孙的住宅举行纪念活动。并在孙寓的花园中合影留念。当时参加者每人都有一张。六十年后，仅中国革命博物馆馆藏一张，但仍然清晰可见。

在这张相片中，国民党人有胡汉民、汪精卫、张继、茅祖权、叶楚傖、叶纫芳、戴季陶、林焕廷、孙铁人、喻育之、王陆一、周雍能、何世桢、葛建时、陈德徽和向昆等十六人。中共方面有毛泽东、王荷波、罗章龙、恽代英、向警予、邵力子、沈泽民、刘伯伦、韩觉民（团

员)和张廷灏(团员)等十一人。总计二十七人。相片是由一家广东人开设的“王开照像馆”拍摄的。上海国民党执行总部全体工作人员只三十多人,而参加合影的居其中大多数,且都是双方的主要主持人。因而这张相片也就成为当年国民党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实行合作的真实写照,珍贵的历史见证。不仅如此,在党的“六大”以前,中共中央的同志如此众多齐集一起留影的相片也是绝无仅有的。¹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中央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告诫全党党员,不计较权位,不营求私利,努力实干,相忍为国,把完成国民革命视为当前的迫切任务,耿耿此心,薄海皆知。

在国民党中,胡汉民与汪精卫是孙中山的左右手。孙的亲信大都为广东同乡,中心人物为胡汉民与汪精卫,外间称之为国民党“平衡力量”。胡汪二人后乃分道扬镳。

胡汉民,原名鸿衍,字展堂,清末举人,一九〇三年赴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习速成师范,最先加入同盟会,为孙中山所倚重。胡平日对人称“位不过贤书”(意指最小的芝麻官),但自负极高,先是一九二二年五月,胡以代大元帅名义率师由韶关北伐,进入江西,攻下赣州。随闻陈炯明倒孙,即回师驰救,北伐遂无功而还。但胡对此颇炫耀,其部属也称他为胡代帅。

胡头脑冷静,能诗文,吐属隽永,外传说孙中山所刊布《三十三年落花梦序》,重要政治文告及悼刘昆一诸作品,均胡等捉刀。他尝戏用广东方言写咏史诗多首,亦极有风趣,其《垓下诗》有句云:

八千子弟向秦封,破釜沉舟究不同。
咄样多人为你死,因何有面见江东。

胡对中国文、史、书法颇有研究,在办公室有暇辄练字,一心不乱,临“曹全碑”极为神似。

胡平日,高自期许,于人鲜所许可,尝在办公室当众评论汪精卫“华而不实”,戴季陶“有流无源”(指戴作文多译自日文书报),某某“周而不到”,《民国日报》文字散漫无章法,其他讥评尖刻,往往而有。他对我党诸人初亦不甚重视,不久态度渐改,尝对人言:“执行部中共党员各有长处,不可小觑。至于中共群众组织势力更不可侮。”胡对其属下曾说:“仲甫先生,戛戛独造,究竟与众不同。”胡善观察事物,但城府极深。一天会后,闲谈中俄关系,他说:“俄胡善观察事物,但城府极深。一天会后,闲谈中俄关系,他说:‘俄国即殷高宗时的‘鬼方’,当时中俄双方打了三年战争。’语意双关影射时事,因询问我:‘罗先生对中俄关系掌故了如指掌,以为然否?’”

¹ 此段下,作者补有“[注] 补团结文”字。— 补注

我已知其意有所指,因答道:“此乃先生创见,极可参酌,但就‘地望’而言,显属似是而非,且孟轲有言:‘此一时彼一时也’,战争与和平本是常见的事。”胡聆言嘿然,忽扬声鼓掌道:“高见!高见!”遂彼此一笑而罢。

一九二五年胡因廖仲恺被刺案涉嫌,亲往苏联报聘,以贵宾资格出席第三国际第六次大会,其祝词云:

“……我以中国人民、中国工人和农民的名义,对允许我出席这次国际代表会议表示感谢。只有一种世界革命,而中国革命就是它的一部分。

国民党口号是:为了人民群众!这就是说,政权应由工农来掌握。”(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七日胡汉民在共产国际开幕会致词)¹

这是胡言不由衷的例子。一九二七年胡是发动并亲自主持清党的大员。

汪精卫与胡性格各异,但极能干,故时称“汪胡”。汪敏慧过人,善属文,兼擅长演讲,激昂慷慨,感染力极强,满座为之倾倒。汪为人圆通无棱角,善窥人意,对人彬彬有礼,故人乐与往还。在大庭广众间,汪对孙中山称先生,对独秀称仲甫先生,对鲍罗廷称鲍先生,对其他诸人词令婉约无不气顺言宜,即偶发笑语亦令人觉其真挚可亲,故人称其为“政治尤物”!汪对当时国共合作政策始终毫无间言,热诚拥护,对中共遇事体贴入微,奉国际代表若神明。迹其用意无非是想在合作过程中博取个人超额权益足以凌驾胡之上。一次,我与汪精卫同车到静安寺路中华书局工人进德会演讲,汪在车中与我攀谈,郑重说道:“我参加革命以来,由于个人学无专长,至今一事无成,今后愿诚恳向中共工人同志学习,多读革命理论书,在即将来临的国共政府中,贡献微力。”²由此可见汪说话动人处,“巧言如簧”,真是当之无愧!

张继,字溥泉,直隶静海人,是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孙中山指定他专门同我联系,加强执行部的日常政务工作,以提高工作效率。他在日本东京时与独秀友善,回国后时相往还。国共合作,张溥泉实为居间奔走撮合之人。在上海执行部成立前,国共双方接触频繁,多在法租界蒲柏路巨赖达路某里张溥泉寓所。一日,我至溥泉家商谈有关国共合作问题,谈锋所触极广,张性豪放,纵情高论,更无拘束。张云:“同盟会革命得日本友人助力不少,今日苏联拥有红军几百万,只要从库伦出兵,中国局势立即可以完全改观。”张又云:“我们过

¹ 以上三段之侧,作者补有“春秋书法”字。— 补注

² 汪精卫与我谈话时初读《京汉工人流血记》,误以为我是京汉铁路工人,故有意说向工人学习等语,后汪获悉我为北京大学学生,始知其误。

去从事中产阶级革命，十几年间浪费光阴，今后应改弦更张，从事无产阶级革命，还可以‘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张继性情豪迈、健谈，其夫人亦身裁祁硕，丰仪俊秀，对客常提说我们溥泉是个直爽人，赤胆忠心，革命阵营少不了他，却不会做官……云云。张以目止之，夫人佯做不理，侃侃而谈。故外间流言张有“季常之癖”，未知确否？不久，鲍罗廷来到中国，张闻讯十分激动，走访仲甫，谈话中张幽默地说：“国共合作‘鲍姥’实良媒。”仲甫笑颌之。张去后，仲甫对我说：“溥泉说‘国共合作鲍姥实良媒’，老实说，不过炮姥做良媒罢了。”（鲍与炮谐音）从此以后，张溥泉乃成为国共合作狂热拥护者，直到一九二六年间，张溥泉忽一变而为仇共最力之一人。他向上海驻军李宝章献谋，派大刀队肆意砍杀共产党人和上海工人，要“一个不留”。前后竟判若两人。

叶楚傖在国民党原是很重要的人物，叶是上海《民国日报》的主编，同他打交道的人比较多，他又是江浙人，为照顾上海地区，让他来参加执行部。他表面中立，内心非常抵触，我们那时不把他当左派。他是做青年妇女部工作的，我党派向警予做助理，实际上是向一手把工作做起来，叶是不甚管工作的。

于右任，代表西北国民党的势力，是执行部内的左派。于曾任陕西三原靖国军司令，诗文与书法独步一时，有“北方之强”的气质。尝自述身世，言其少而孤贫，有“我亦凄凉托外家，如今橐笔走天涯”之句。为人倜傥风流，不拘细行。如在上海闸北青云里办上海大学时，于对我说外间称上大为“野鸡大学”，并解释说，野鸡投宿榛莽，故与一般大学不同，上海大学是革命道逃藪（如刘华、余泽鸿、黄仁诸同志均上大学生）。他当时支持国共合作，将工人部交给我们。在上海大学当校长时，亦将整个权力交给中共同志。他曾到苏联去过，后把在苏联所作的歌颂十月革命的诗写给我看，以表白他内心是拥护苏联和共产党的。他口诵七绝一首，云：“三原征战绩已陈，我亦关西一老兵（于常以“关西老兵”自称），万里投荒阿穆尔，老而不死做诗人！”亦可见其性情为人之一斑。

另外，谢持代表国民党中国西部力量，辛亥革命时是四川省长，是右派代表性人物。孙让其参加执行部工作，不过是表示团结的意思。茅祖权是长江中部同盟会负责人，当过安徽省省长。在执行部任调查部部长，与仲甫同乡。

以后，戴季陶、朱执信、廖仲恺、邓演达等也先后参加上海执行部工作。戴季陶原名天仇，辛亥革命前的同盟会会员。讨袁失败后，政治失意，生活潦倒，流寓上海，混迹于证券交易所，慕陶朱公（范蠡）为人，易名季陶，后愿望落空，乃乘轮返川，在宜昌投江自杀，

为一渔夫救起。其人文风平庸，但能阅日文书刊，抄译成篇，颇自矜持。平日好饮酒，醉后尝失言。在一次会议上，戴对《向导》文字不满，悻悻地向我说道，“你们太霸道，目中无人，要知你们是‘客卿’，我们随时可以下逐客令！”时汪精卫在傍，对其言感到惊讶，随笑道，你又说醉话了，我们并无主客之分，国共同志，大家都是好兄弟。几句话敷衍了过去。但戴心里并不悦服，耿耿于怀，现于词色。戴在宣传部任部长，旋开始宣传正统思想，扶植政治偶像。以上事例可见他与中共同人貌合神离，意见渐不协调。

在执行部内，左、右派斗争相当激烈。

当时，组织部有一个决策，凡是国民党老党员都要重新登记谈话，每人必须填一张表，经审查同意后，方是改组后的国民党员，发给党证。一天，一个人冲到楼上，胡汉民、汪精卫都起来打招呼，他们三人交谈，我和润之不认识此人。那人说，我从同盟会开始，革命几十年还要填表？可不可以免填？这个人就是谢持。胡说，这是新规定，先生（孙中山）也同意要我们这样做的。此人将桌子一拍，就是不肯填表。汪精卫也出来说：上有总理，下有组织部。意思是要他向我说。他到我们这里说了一遍，大家都不以为然地说，党员人人都要填，胡汉民、汪精卫也填了。要遵守孙中山先生的意见。此人一怒而去。润之说，派人送张表去，要秘书好好解释一下，可以放宽点。后来谢持说：“不能只顾我一个人的面子，扫了大家的面子”，还是填了表，但心里是很不舒服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后，准备召开一个会议，成立上海第四区国民党党部。四区就是环龙路所在的法租界地区，有许多下野的国民党政客住在那里。有的当过军长、师长、部长、省长，大约有千余人。审查后发了党证，同时还清洗了好多。他们在审查时一下子送来许多表，企图蒙混过去。在这个成立会上，国民党左、右派斗争表面化了。右派酝酿要争得更多选票，争取区党部的多数。他们自己估计没有把握，准备采取两种方法。一是合法的争取多数，请孙中山先生出来说话。二是如果办不到，就纠集一些流氓，在会上抢主席台、制造武斗，以破坏选举。我们知道这个情况以后，认为会一定要开好。于是决定我们全体同志，党、团员及同情我们的左派都要出席会议，保证会议胜利开好。右派曾经去请示孙中山，孙没有表态。胡汉民、汪精卫说，开会那天除极少数人留室办公外，其余的人都去。还让新闻记者去采访。当时上海有许多外报记者。当时执行部决定，这个会最主要的是要组织好，主席台不能乱，万一他们武斗，我们要出面制止，使他斗不起来。同时又成立了纠察队，严格控制会场，制止武斗。由王荷波领导组织了一个很强大的纠察队，从主席台到门口设立岗哨。布置好

了以后，王荷波对我说，现在准备齐全了，他们如在外头闹，我们就在外头制止他。开会那天决定我担任区大会主席。第二天我们开会，右派就在外面扰乱，我们内外配合把会场控制得很严，流氓想进来，纠察队把他赶走。右派头子高冠吾多次捣乱都失败了。这一次斗争，右派失败了。他们不服气，在上海各报纸上写文章大肆攻击中共中央，攻击四区会会场主席，当时上海《申新》等报，曾记其事。

国民党执行部成立以后，继而成立黄埔军校，由是建党建军工作着着进展。在两党合作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双方冲突亦渐渐酝酿，逐渐产生和发展，至一九二七年而更趋显著。¹

¹ 页末，作者补有“[注] 新申报报导 1924年五六七月”、“补 仲遇难文 陈群 扣虱诉苦事 高吉人 女 胡木兰 林焕廷财务掌管 书店经理”字。——补注

罗章龙回忆录

中 编

(原《亢斋载记》存稿)

一、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之后，约经过一年半的时候，共产国际代表向莫斯科请示，经齐洛威夫同意，决定在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作为第三国际的支部。中共成立会是一九二一年七月间在上海召开。

一、各地中共小组名录 一代会是以中国各个共产主义小组为基础，截至一九二一年六月上，各地共产主义者党组织成员大致如下：北京，李大钊（守常）、罗章龙（文虎）、邓康（仲瓣）、张国焘（恺荫）、刘仁静、高尚德（君宇）、邓培（少山）、史文彬、李梅羹、何孟雄、王俊、吴汝明等十二人；上海，陈独秀、戴传贤（季陶）、周佛海、李汉俊、李震瀛、李启汉、袁达时、李达、于秀松、柯庆施、高语罕等十一人；武汉，陈潭秋、董用威（必武）、刘芬（伯垂）、林育南、许白昊、张梅先、恽代英、项英等八人；济南，杨明斋、王瑞俊（尽美）、邓恩铭、王用章、王象千（翔千）、王复之、王天章、王崇五等八人；长沙，毛泽东（润之）、何叔衡（瞻岵）、郭亮（静筵）、夏曦（迈伯）、易礼容、夏明翰等六人；广州，谭鸣谦（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刘尔崧、阮啸仙、杨殷等六人，以上共五十余人。

一代会时，仲甫尚留广州。先是一九一九年，仲甫自北京出走到上海，暂时避难于春申江上。后陈炯明据广州，延仲甫赴粤赞襄政务，仲甫遂离沪到广州。

[注]：一九一九年陈炯明部二十一营驻守福建漳州，一九二〇年陈回师占领广州，任广州督军。

二、“毒兽”在广州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仲甫至广州后，即受任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以陈公博任宣讲所所长，锐意革新，宣传社会主义，因此引起广州守旧派的攻击，并动员全国卫道学者向他进攻。在上海中华新报著文申讨仲甫云：“陈独秀之禽兽学说，谓万恶孝为首，

百善淫为先。滔天祸水，决尽藩篱，人心世道之忧，将历千万亿劫而不可复！”（见一九二一年三月八日中华新报）同时上海广肇公所（即广东同乡会）致广东省政府主席陈炯明电，请驱逐陈独秀出境，电文有云：“陈惑世诱民，凶于兵祸，独夫不去，四维不张，乞即下令驱逐。”（见一九二一年三月上海广肇公所通电）广东守旧派称陈独秀为毒兽（谐音）。时上海国民时报亦著文评论其事。仲甫不自安，遂请辞职，作离粤返沪计，陈炯明、孙中山共同挽留，仲甫遂继续任职，决定在广东组织教育行政委员会，计划设立编译局，成立广东大学，在教育方面注重数理化，各校设立实验室。大刀阔斧，革除广东教育界积弊。旋在广州公立法政专门学校作公开演讲，批评各派社会主义，中国应采用俄国的社会主义，应依靠国际社会主义帮助。孙中山初闻之亦表惊愕。自一九二一年三月起，仲甫主编共产党月刊，自后四、五、六、七月各出一号，前后五个月共出版至第五号。仲甫虽未在沪，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大会工作，于一九二一年六月初已开始筹备。各地代表到齐后，于七月间[注]开始举行。

三、一代会出席人 参加一代会有下列各人出席会议：国际代表马林与尼可洛夫；各地代表，北京刘仁静、张国焘，山东邓恩铭、王瑞俊，广东陈公博，湖北陈潭秋、董必武，上海俞秀松、周佛海、李汉俊、李达，湖南毛泽东、何叔衡。

上述代表十三人，但其中无一个工人。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除北京有三个铁路工人外，其他各组均无工人。会议推举特立为主席，首由国际代表报告，着重说明：（a）共产国际第一次大会决议，世界革命形势与远东革命形势；（b）中国革命目前任务强调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对军阀，开展中国工人革命运动。

四、争辩问题 一代会会议在讨论国际代表政治报告时，各地代表意见颇不一致，各代表意见重大分歧点是：一方主张目前暂做一般社会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不采取实际行动，以李汉俊、李达、周佛海等为代表。一方主张开展工人运动。另有些人无一定主张，主张多研究问题。但最后均同意以从事工人运动作为中共总方向。一代会曾通过发表宣言，宣言草稿由国际代表起草，内容严厉谴责军阀政治。关于选举中共中央书记问题，国际代表事先个别谈话，提出书记人选为学术地位、革命意志坚强表现与群众基础条件，经过全体代表酝酿讨论，决定推选仲甫为书记。但据仲甫事后告人：他起初并无意组织一个政党。他认为条件还不够，自己也不适于做实际政治工作，最多只能做个宣传者。关于一代会选举书记事，仲甫说并未征求他的意见，所以他听到选举结果时，非常尴尬，因为会议已经结束，他既无法辞职，辞后又不能再召开一次会议另行选举，所以只得勉为其难。

一代会本身由于上述原因，当时并未公布纲领性文件，大会后在共产党月刊上，以短言为题，抨击中国南北各派政党，正面提出中国共产党的经济使命与政治使命，要言不烦，申述当前中共任务。经过一年以后，即一九二二年六月，中共才正式发表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

五、关于一代会日期 因文献无徵，久无定论，后定为七月一日。但是从《新青年》所记，则称一代会开会期间似为七月下旬开始，八月初结束，究竟真实日期如何，讵难确切证明。

按：《新青年》九卷三号以“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为题一文中，作者陈公博自称：“七月十四日启程赴沪，在上海住十日。……在上海被法国巡捕误认我是日本社会党。到上海的翌日，见到两个外国教授，我和他们去访问一个朋友，谈了片刻，两个外国教授先行。马上来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和中国侦探，一个法国兵，三个翻译，问我们为什么开会？我们答不是开会，只是谈话。他们问两个外国教授是哪国人，我答是英国人，他不信，他即下令搜查，经过两小时，把我们隔离讯问，查无所获，遂去。七月三十一日住大东旅社，卅一夜车赴杭州，游三日。”上项记事，系影射一代会在上海租界李汉俊家开会，中途有法捕房警探到寓查问，及临时迁移会场。种种情节，均与当时会议经过吻合。据另一参加一代会者说，一代会会场在贝勒路李汉俊家，李汉俊家被搜查后改往南湖开会，陈公博不耐，未终会携眷游西湖。后查在莫斯科发现马林 Slievlied Maring 报告一份，内称中共成立日期为七月二十三日，均足与上文参证。

[注]：李达所记，当时国内外有八个小组，出席代表十二人。北京中共组织党员有李大钊、罗章龙、张太雷、邓中夏、张国焘、刘仁静、李梅羹等七人。上海机器工会由李中（高语罕化名）主持。社青团由俞秀松主持。（见一九五五年八月二日李达作中共发起与第一、第二次大会经过回忆，同年十一月印行）。又据参加人陈潭秋所记一代会参加代表九人，一代会主席为张国焘，秘书为周佛海。（原文载一九三六年七月莫斯科共产国际月刊）并志以供参考。

《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附录 罗文虎笔记¹谈历次党代会（中共一大至五大部分）

一大

一九二一年暑期将临的时候，我们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要我们派人去参加会议。我们对会议的性质并不如事后所认识的那样，是全党的成立大会。时北方小组成员在西城辟才胡同一个补习学校兼课，就在那里召开了一次小组

¹ 根据罗氏后人提供的记录件录入。— 补注

会议¹，会上推选赴上海的人员。守常先生那时正忙于主持北大教师索薪工作（原索薪会主席马叙伦，马因病改由守常代理，这次索薪罢教百十个月之久）。在场的同志因有工作不能分身，我亦往返于长辛店、南口之间，忙于工人运动。张国焘已在上海，乃推选了张国焘、刘仁静二人出席。会上未作更多的准备工作，刘仁静赴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会后才到上海的。

二大

一九二二年七月中旬，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上距一代会恰满一年。在此一年中，中共已奠定工人运动阵地，全党党员约半数在北方，以产业工人比重最高。此次全国出席代表 25 名，其中北方代表有李守常、罗章龙、何孟雄、王俊等 8 名。

文虎参加二大，时间盛暑，地点上海英界新闸路，日夜开会，文虎与王瑞俊同往。代表坐斗室中，散坐无长桌，陈仲甫来时去，文虎代执行主席。议案分小组讨论。二大选出中央委员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

三大

三大中央设秘书一职，由党章规定通告须由秘书联署，否则无效，以防独断专擅行为。马林提出，毛泽东附议。陈独秀虽不以为然，但格于众议，不敢申异议。陈有时发脾气便向文虎说：“我一切相信你，你代我签字也是一样。”文虎明知这是他的气话。文虎说：“我们受大会重托，应该按章办事，否则别有用心的必乘机进行挑拨离间，将来怎么向全党交代呢。”陈对此事乃不再说话了。

三大选举结果，国焘落选，主要原因除与马林意见相左外，国焘在二七罢工中临阵怯战，仓皇东下，影响士气，使江岸工会支部首先解体，杨德甫等多人逃避庐山。因此，湖北书记部对他颇有怨言，国焘亦自觉无颜见人。

三大会后，他离沪赴京，我去送行。他向我说：他自离开北方后，高高在上，久已脱离罢工斗争，同志对他批评，自属理所当然。这些话可以说当时他还有点自知之明的地方。

四大

伍廷康，太上皇

四大组织变动，虚君共和，挟天子以令各方。

宣传：彭述之、王若飞、郑超麟

秘书：任作民、张伯简

¹ 罗章龙从未谈及此次小组会参加的人数，他遗存的手稿中另有说明，到会议三人：罗章龙主持，另为李梅耕和刘仁静。下文“在场的同志”即李梅耕。——补注

广东：陈延年（南粤王）

北京：刘伯庄、赵世炎

山东：尹宽

湖南：罗迈

共青团：任弼时

上海：汪寿华（何今亮）

个人迷信，家长制形成。

伍廷康说，北方书记部的人不听中央的，什么事自己作主干，事后才跟中央说一声，不听话。请彭述之、尹宽、赵、王若飞合作，陈独秀接受了伍的意见，四大中央让这些人掌了权。

五大前后

一九二七年文虎自上海动身去武汉

上海三次暴动，仲甫、亦农、何今亮（松年）亲自参加会议领导起义，吴淞方面由铁总委员王荷波、余立亚、黄贺、陈寿昌领导。文虎率武装纠察队从吴淞进入上海区，接应工作。旋因武汉告急，中央决定文虎立即动身由长江水道迅速赴武汉，参加武汉中央分区北伐工作。

一九二五、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棋局分布：

广州：谭平山及陈延年

上海：陈独秀、罗亦农、何松年

北京：李守常、范鸿劫

武汉：鲍罗廷、张特立、罗文虎

江西：陈潭秋

湖南：罗迈、夏曦。

武汉中央分局工作人选：全总、铁总、北方区、鄂湘赣省委、两广、皖豫、陕北、南省委

军务委员会：文虎、叶挺、贺龙、李书城、恽代英、卢德铭、罗章凤。

妇联：张金保、向警予、黄英兰、浦熙春、罗湘南、丰正英。

农联：毛泽东、彭湃、方志敏、陆沉、王凤飞、蔡以忱、王仲一、陈荫林、周以粟。马尚德，后名杨靖宇，河南确山人。王力新，信阳人。安徽袁新集、郭术申。

财经委员会：詹大悲、罗泰钧（葛荪）、陈公博、鲁佛民。

教育委员会：李汉俊、陈潭秋夫人、浦熙春、黄国兰、詹太权、谢远定、罗昭吾、李书渠。

劳工部：罗文虎、谭平山、苏兆征、董必武、王荷波、郭亮、史文彬、陈郁。

外事工作人员：张太雷、向警予、黄平、谢黛茜（杭州）、冯品毅（河北）、

谢廉清(冈)、范鸿、刘昌群、阮永钊、奚真、粟泽。

五大前，沪汉二中央并行不背，以鲍罗廷为首，罗易为副。鲍公馆，政令所出。

五大后，八七会议罗米那则独裁，双为傀儡，全部换班，各级遵命。

中共五大会简述

一九二七年夏大革命面临危机，中共中央为处理当前繁剧革命诸重大问题，遂于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九日在武昌都府堤市立小学风雨操场举行。此次会议参加出席代表八十余人，代表党员五万八千名，为中共成立以来空前盛会。大会主席团二十六人，大部为工会、农会、武装部队负责干部，代表工农兵革命组织的群众数百万人，其中党所领导的正规武装部队四、五万人。大会会场布置庄严肃穆，会场两侧悬有巨幅标语：打倒军阀！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国共合作到底！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un-capitalism 号召全党精诚团结，工农兵团结一致，共同奋斗，肃清反革命一切阴谋与武装暴乱，巩固工农民主政权，进一步促成世界革命！

五大会上，由国际代表作政治报告，大会通过：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职工运动决议。关于土地问题决议、农民政纲、青年与妇女问题决议等。

(大会选举中央委员四十人，内候补中委十一人，成立新中央。)五大中央局分工：书记陈独秀，组织王荷波，宣传苏兆征(林超真代)，工委罗章龙，农委毛泽东。

在共青团五大会上选出CY中央机构，CY中央负责人为恽代英、李求实、任曙与刘昌群等。

五大会

文虎任一九二七年五大会主席团筹备委员，大会秘书长，湖北代表团团长。时任汉口市委书记，湖北省委宣传部长，工运讲习所负责主持。大会开幕时，文虎亲自向大会提出大会主席团团员名单，包括陈独秀、张国焘、罗章龙等，介绍简历约一小时，由大会予以通过。文虎是大会政治决议案小组成员(召集人之一)兼职工运动决议案组长及执笔人，大会后任中央工委书记(直至一九三一年止)。

五大会后，在马日事变后，湖南省委涣散，中央特派文虎、泽东到湖南以中央委员身份整理、领导湖南省委及其后秋收起义行动委员会工作。一九二七年文虎出席中央扩大会议后，继续留在中央任中央工委书记兼全总党团书记直至一九三一年一月止。(十一月扩大会议多数人关于组织纪律问题受到处分。)

当时，中共面临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的残暴统治，在极端困苦的条件

件下，历艰冒险，为争取自由民主与改善经济、政治生活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积小胜为大胜，不断累积斗争经验，终于推动革命局势发展，群众组织力量达到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革命高潮，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国共合作的革命政权，并实现收回汉口、九江英国租界，对内实行国民革命三大政策，公开提出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光辉史绩，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伟大创举。

中共五大会

我曾参加五大会任主席团主席，大会秘书长。大会开幕时执行主席任务，提名通过主席团名单。会场布置主要标语：国共合作到底，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文虎、润之在会场同坐中排凳上，由仲甫作政治报告。陈穿黑色短衬衫，带红领巾(红领结)。罗易、汪精卫、谭延闿均列席参加开幕式，毛泽东当选为五大中央委员。

开幕后中间有几天我因省委事忙，又到过前线军中去慰劳，所以有时缺席，对会场发生过的事不甚清楚，如毛被取消代表资格。(文虎五月间前后曾同润之登黄鹤楼观江景作词。)

润之三大、四大、五大均为中委，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最先发表在党主办的中央日报，有单行本，是非常重要的被重视的文章，当非因此而受到排挤。

二、中共二代会前后

中共中央在一九二二年六月至是年冬间有数事足纪，其一为第一次发表对时局主张，次为中共二届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发布宣言，三为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性扩大会议。上述三事均为当时中共中央涉及全党的重大措施。

一、中共第一次发表对时局主张：中共自成立后，久未对外公开出名宣扬本党政治意见，至一九二二年六月间，中共本身组织已具雏形，工人运动组织亦日臻发展，中国政治正在发生酝酿变化，因此，于是年六月十五日正式发表对时局主张。

中共中央第一次对时局主张，全文分十段，约五千字，主要内容如下：辛亥革命失败的分析。民主政治的要求，非少数政客鼠窃狗盗——几个人更替，而是阶级的起倒，制度的代替。国民党纲是民主主义色彩，但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动摇不定。评法统派，斥联省自治派，斥拥吴佩孚政客。军阀是内战根源，必须打倒。评好政府主义的妥协无用，截兵废督概属空谈。奋斗目标十一项，联合向军阀战争，以求实现。宣言是中共首次公布有系统性的政治主张，有发聋振聩之效，为后此中共诸政治文献所祖述。

二、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其宣言要点：一九二二年七月中旬，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上距一代会恰满一年。在此一年中，中共已奠定工人运动阵地，全党有党员 195 名，约半数在北方，以产业工人比重为最高。此次全国党部出席代表共二十五名，其中北方区代表有王俊、李守常、罗章龙、何孟雄等八名。大会通过纲领，发布宣言。

中共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全文约一万一千字，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国际帝国主义宰割下之中国

(1) 国际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形成中国目前在国际上的特殊地

位。(2)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发展。(3) 欧战中及战后日本与美国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发生冲突。(4) 华盛顿会议使帝国主义对中国由互竞侵略变为协同侵略。(5) 反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势力，无产阶级与民族革命足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第二部分：中国政治经济现状与受压迫的劳苦群众

(1) 各派军阀投靠帝国主义实行割据，应打倒军阀与帝国主义，统一中国本部，对蒙、藏、回族实行民族自治。(2) 三亿农民乃革命运动中最大因素，其中以占百分之九十五的贫农为主，手工业工人无产者化，工人阶级将成为革命领袖军。(3) 工农应和民主主义势力合作，使民主革命迅速成功。

第三部分：中共任务及其目前奋斗

(1) 民主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第二步奋斗在无产阶级具有坚强的组织力与战斗力的条件下，即能随民主革命胜利以后立刻完成。

(2) 中共主张用阶级斗争建立工农专政，废除私有制，达到共产主义社会。中共主张工人与贫农及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统一战线，为共同目标奋斗（凡七条）。中共主张工人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应训练自己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准备与贫农联合组织苏维埃。中共是国际共产党的一个支部，要同全世界革命伙伴并肩前进。并提出国际共产党万岁口号。

三、中共中央北京扩大会议：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下的陇海铁路同盟罢工获得全胜以后，对于中共全国工人革命运动引起极重大的推动作用，北方城市、铁路、矿山的工会运动如春云乍展，气势蓬勃。各地革命斗争浪潮或显或潜，均给予全国革命事业唤起普遍进军的希望。中共中央在当时情况下，乃决定在北京召开全党工作会议，以策动今后革命运动。参加此次扩大会议出席人员有来自国外的国际代表，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央书记及半数以上的中委，各省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与各省书记等共四十余人。会议内容主要是沟通南北革命经验，互相观摩与鼓舞，彼此促进。在会议期间，出席人员分别由亢斋文虎、伯英、君宇等引导，至京内外以及长辛店、南口、唐山等处参观访问，在当地出席工会基层会议，参加党团支部生活及座谈会，通过上述活动，会议成员相观而善，在日后工作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三、中共北方建党与建团工作纪要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六年)

一、中共北方区委：中共北方区委设于北京，区委工作范围包括下列各省市：北京；顺直（后易名河北），省会保定；河南，省会开封；山西，省会太原；陕西，省会西安；察哈尔，省会张家口；热河，省会多伦；绥远，省会包头；东三省，奉天（后易名辽宁），省会沈阳；吉林，省会长春；黑龙江，省会哈尔滨；山东，省会济南。山东原设有书记部，后合并于北方。铁路、矿山等产业工会均隶属北方书记部。以上可知北方区工作范围包括十个省及北京、天津、开封、太原、郑州、洛阳、西安、兰州、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可见当时中共北方区是中国最广大的中共组织。其地理面积是黄河以北与长城内外，东至渤海，西至大散关，北至满洲里，南以江淮为界。在这个区域内，物资丰饶富庶，人口亿万，兼为中国铁路、矿山、重工业与轻工业的重要地区。

从党组织方面说，中国北方区委最初植基于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之上，后来北京大学马克思学会与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党组织基础逐渐扩大，从青年学生转移到人民群众方面，由此不断发展，成立北方区委，是为北方党组织最高机关。与此同时，全国铁路总工会党团最高领导机关亦设在北方，其工作范围除北方区所辖各省市外，还有很多条铁路伸入南方各省市，因此，铁总党团工作又超越北方区以外而分布于全国铁路沿线的各城市。“二七斗争”光芒照耀中国与世界，是近代政治史上的重大成就，良非偶然！

二、中共北方建党工作：中共北方建党工作在工人中以北方书记部工作为基础，故党员分布在广阔产业工人群众地区，因此当时北方党员人数在全国所占数量最多，而党员中产业工人比重最大，有不少

支部是清一色的工人支部。在学生方面党团组织是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基础，该会网罗当时北京国立大专学校以及外省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三百余人，学会会员遍布全国各省，通过广大会员关系，先后在南北各省市吸收会员，直接、间接对于建党建团给予极有利条件。现就北方铁路系统中中共组织扼要简述如次：

1. 北方铁路系统中中共组织：当时北方党组织系统，凡纯系地方性组织则属北方区党部管理，凡属产业工会党组织则归书记部党团所领导，因此各铁路党部起初均直辖于书记部，后来则改属铁总领导，藉以在罢工斗争中发挥统一指挥作用。全国铁路总工会党团成员：文虎（书记）、邓培、王荷波与史文彬。文虎兼任中共北方区区委书记。兹分举各铁路党部委员会组织名称及主要负责人如次：

2. 京汉铁路：京汉铁路总工会党部以长辛店为中心，沿路十六站各有党的组织，直辖长辛店，其分布如下：长辛店：史文彬（书记）、吴汝铭、吴容沧、吴桢、刘宝善、王俊、吴春熙、陶善琮、李玉、杨诗田、崔玉春、陈励茂、张德惠、郭连登、辛克洪、葛树贵、李彬、洪水福、杨顺起等；高碑店：康景星（书记）、王永富、刘秉波等；保定：孙殿臣、韩文荣、阎玉海等；郑州：韩裕山、凌楚藩（书记）、司文德、刘松、汪胜友、姜海士、赵健、王宗培、茅廷楨、廖寅生、韩祥楨等；许昌：林元成（书记）、周道隆、桂森等；信阳：胡传道、王作新、马尚德（杨靖宇）、钱贵良等；江岸：项德隆（书记）、曾玉良、刘文银、刘寿真、林才泳、徐廷发、张能广、罗澄等。

3. 陇海铁路：陇海铁路中共党部中心领导机构设在洛阳，即特派员所驻地，该路特派员兼党书记最初为游泳，后为李大汉，更后为王中秀；郑州：郭启先、梁盛元、魏士杰等；徐州：赵兴国、张嘉铭、葛传庸等；开封：马禹夫、马景山、姜永和、范易、汪厚之、葛际云、陈勉之等；商丘：程胜贤、姚鼎三、常清发等；洛阳：王符圣、游天祥、白眉珊、李忠湘、汪盛才、李震瀛、王中秀等。

4. 京奉铁路：京奉铁路总工会党部设在唐山，此外于山海关、天津、丰台等站成立分部。唐山建党工作始于一九二〇年，先由文虎赴唐山与阮章、梁鹏万等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文虎介绍邓少山入党，一九二一年正式成立中共唐山支部（支部设唐山礼字五条七号）。唐山党部以邓培为书记，山海关党部以王瑞俊为书记，丰台党部以杨宝昆为书记，天津党部以王广元为书记（以上均指该党部创建时第一任书记）。各地党委主要成员如下：唐山党委：邓培（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在广州牺牲）、梁鹏万、王德周、程帝炳、邓曜、李福庆、李显廷、甘达、邝炳义、李华天（一九二五年在天津牺牲）、王麟书（一九二七年在东北牺牲）、阮章（同上）、郑壮、肖仁义、刘玉常、

阎福林、左志（在马家沟工作）、刘焕廷、袁大时、彭礼和、吴先瑞、李树彝、黄钟瑞（凝晖）、许作斌等；山海关：张再兴、何作霖、王瑞俊、程浩、柳正宜、鲁大忠等；天津：安休诚、郝立瑜、江运环、王广秋等；丰台：杨宝昆、孙可发、杨宝仑等。

5. 关外铁路：京奉铁路各站组织全路统一工会后，文虎与瑞俊同出关到东中路、南满铁路沿线各大站建立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等城市的党与团的组织。一九二六年中东铁路五千人罢工胜利后，哈尔滨、长春、大连各地党组织成立，共计南满、大连党组织总负责人为王力，依次为尹逸然、魏南亭（金州南满路工人）、关向应、刘国愚（大石桥路工）等；沈阳：唐鸿景、柴友臣（邦沟子工会）、赵焕臣（新民电路工）、纪郁等；哈尔滨：江英、江铭祥、刘斋勤（均中东铁路工会）、张德昭（哈尔滨工专）、尹致祥等。

6. 胶济铁路（济南-淄博-胶州）：傅书堂、郭恒祥（书记）、李青山、卢福坦、孙秀峰、王元璋等。

7. 道清路（道口-清化镇）：禅佳保（书记）、隋锡文、秦谦、景云芳等。

8. 津浦路：以下列五处为中心，即济南、徐州、蚌埠、滁州、浦镇。济南大槐树：李宝廷、魏福中、刘俊才、田庆复、张辰祚等；徐州（铜山）：姚文兴、黄必成、常兴沛、周克安等；蚌埠：刘基洪、王泽生、马秀等；滁州：徐鸿儒、皇甫云皆、祝连峰等；浦镇：韩连飞、孙章重、张拯成、李正己、王仲一、王荷波等。

9. 京绥路：以南口为中心。南口：张德臣、王净尘、王学文、何孟雄、马俊兴等；张家口：张汉清、傅政德、贾纡青、连有财等；包头：赵淮生、陆海文、史正德等；大同：井连升、程法和等。

10. 正太铁路：以石家庄为中心。石家庄：孙云鹏、袁子贞、高克谦、傅茂公、张昆弟等；太原：杜晓、郭增昌、韩夕成、贺其颖等。

11. 粤汉铁路（武昌-岳州-长沙）：郭静筵、项连生（书记）、邓偕平、鄢维臣、邢吉力等。

12. 株萍铁路（株州-萍乡）：李涤生（书记）、朱绍棠、宁迪卿等。

13. 滇越铁路（昆明-蒙自）：张至刚（书记）、龙润雨、王茂亭、吴度南等。

14. 沪杭甬铁路（上海-杭州-宁波）：沈干城（书记）、汪牲天、徐梅元、贺威圣、谢继等。

15. 沪宁铁路（上海-南京）：孙津川（书记）、王亚明、谷晋余、袁祺、余立亚等。

16. 南浔铁路（九江-回马岭-南昌）：熊好生、钟有贵（书记）、

方筱川、肖家祐、刘文堂、王凤飞等。

17. 广九铁路（广州-九龙）：孙泉（书记，一九二八年牺牲）、吴绍澄、刘旭、方汉文、丘湛等。

18. 广三铁路（广州-三水）：曾广太、罗伯琦、黄潮（书记）等。

19. 潮汕铁路（潮州-汕头）：陶久清（书记）等。

以上仅就全国主要铁路部分党部组织扼要介绍，其他各站由于文献失征，未能详记，大概在二七前后铁总党团所属党组织党团员人数最多时达五千数百名，以后虽时有增减，但在中共全党比重中约占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又北方区建党工作大都分布于各铁路沿线城市，特别是在铁路矿山地区为数最多，这些地区党组织（附社青团组织）的分布是以工会组织为基础，因此书记部工作，同时也是建党的工作的一部。

三、北方各大城市、工厂、矿山、学校、机关、兵营、蒙旗等处建党组织：自一九二〇年开始，由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社会主义青年团与非宗教同盟等团体协助进行，详细发展组织情况，可参阅有关各专题章（如劳动组合北方书记部、陇海铁路罢工、开滦五矿大罢工、天津、济南、郑州、东三省各专章）。

四、中共中央南方建党纪要

按：本文所记为一九二三年至二五年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南方各省建党与建团工作。当时文虎任第三届中央委员会常委兼秘书，恽代英任 C.Y. 中委兼书记。

一九二三年至二五年间，中央局人数不多，仲甫坐守上海，寸步不离，中央及外埠重要会议与党组织建立及当地有关建团重大事项，大都责成文虎前往处理。因此，文虎除参加上海建党工作外，并经常巡行各省区，负责亲理党组织与宣传工作，并督导各地工农运动。在一九二三年至二六年间，文虎足迹遍历大江南北，周行苏、浙、皖、赣、鄂、湘、粤等省区。

一、上海市党组织走向工人群众化：上海市党与团组织当时系归中央直属管理。先是上海在一九二一年前后，工人运动尚未发动起来，因此上海小组成员大都为失业工人学生与失意政客（如戴季陶、邵力子、沈玄庐）等人居多，此外则为少数革命职业家如中共机关干部。自一九二三年三大会后，上海党组织开始建立在工人运动基础上。当时上海市党组织干部主要成员如下：何今亮（汪寿华，上总党团书记）、项英（沪西工人俱乐部）、邓中夏（上海大学）、林育南（上总宣传部）、李震瀛（上总组织部）、王亚璋（上总女工部）、朱宝廷（海员分会）、孙津川（铁路工会）、孙良惠（上总）、江元青（纱厂工会）、戴起甲（内外棉工会）、郑振生（海员工会，后死西牢）、陈杏林（海员分会）、谢庆斋（印刷工会）、张应尤（同兴工会）、王克全（内外棉工会）、林育英（沪东工人俱乐部）、张佐臣（上总）、陶静轩（沪东工会）等。上海党与团组织走向工人群众化以后，党团面貌为之一新，于是造成后来工人斗争的高潮，五卅运动由是勃发。

二、苏南苏北联合会议：中共上海建党工作奠定初步基础以后，

开始着手推动江苏境内各县群众组织与党团建立工作。当时江苏境内长江南部以南京、镇江、无锡与苏州为主（上海除外），江北以徐、淮、扬、泗、南通一带为主。中共中央会议几次提出此问题研究，结果决定由党团双方派定文虎、代英二人负责计划进行。文虎、代英遂首先到松江建立苏南党团组织据点。随后到江南江北各工业城市：无锡、镇江、苏州、南通、扬州、淮阴、徐州等处为建立党团及工会组织创立条件，最后决定在南京召开全苏会议。

1. 松江会谈：当时松江城内有以侯绍裘、姜辉林、张应春等为中心的党团组织共计七人，所以文虎偕代英先到松江。侯绍裘时为松江中学教员兼教务主任（侯为南京高师毕业）。第一日由侯通知各组员在醉白池阁上举行会议，在中央党团代表讲话后，自由讨论健全组织与发动群众方案，会众发言极为踊跃，竟日未告完结，因此第二日又在城外荡湾村继续开会。在两天的会谈中获得一个当前发展党团与群众组织的具体方案，由侯绍裘同志建议，会谈后先由文虎、代英、绍裘三人共同前往苏南各城市分别召开座谈会，同时由南京党及铁路系统党团组织派人赴江北各地联络，一俟苏南、苏北各地组织粗具规模后，即实行在南京汇合召集全苏会议。

2. 江浦集会：江苏全省会议原定在南京举行，嗣因为机密起见，临时将会场改在长江北岸江浦县某铁路工人宿舍内。会议经过时间三日，除政治报告及讨论占一日外，其余时间大都为各地党团组织代表报告当前情况，及讨论各项决议与工作实际问题。同时在会上选出南京党委机构及各县党组织执行机构，并整理建制各项群众组织，包括工会、农民、青年、妇女协会及国民党建党工作。参加江浦会议中央及地方负责人名如下：罗章龙（中共中央）、恽代英（少共中央）、侯绍裘（苏南负责人），以及孙津川、姚佐唐（徐州）、贺瑞麟、高文华（无锡）、史砚芬（南京）、史家贞、万益（宜兴）、徐鸿濡（滁县）、陈兆春、张振成（江浦）、张应春（吴县）、顾衡、温禹成（江苏少共）等二十余人。在江浦会议上正式建立苏南、苏北各城市中共与共青团组织，并先择工业地区成立地下工会，建立江阴、宜兴、淮安、无锡、江浦、滁县等地农民小组。上述党团与群众组织及宣传工作都被列入各个专项决议之中。会议并决定，在江宁成立中共及少共委员会，主持全苏党与群众组织工作。是年八月，少共在南京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

3. 侯绍裘——江南革命慧星：侯绍裘字墨樵，松江人，与文虎同年生，身材颀长，天姿开朗，刻苦强学，且赴事具胆识，苏南各地党组织与宣传均其擘划经营，卓具成绩。又对党外联络刚柔兼济，故同时团结国民党左派而为其重心。侯绍裘中西科学各有本源，文思敏锐，

奋笔草文，顷刻成篇。当文虎、代英与绍裘三人自上海循浦江至松江时，由绍裘向友借用摩托汽艇一艘，沿江东进。汽艇入松江后忽遇大风，白浪滔天，艇身颠簸，危在顷刻，驾驶者为青年学生，平日素未经历狂风巨浪，至此仓皇失措，面无人色，手颤心摇，几失操纵能力。绍裘见状急越至前座，代其掌舵，因应风势驶入港汊，始转危为安，其临危不乱如此。绍裘在松江中学任教，常为学生讲述乡贤夏完淳父子创立“幾社”事，并率领学生到镇江登北固山，又至吴淞炮台，讲述乡土地理与历史，同时启发学生积极参加工农运动，争取民主政治，时被称为江南革命慧星！谓其生命飘忽，光芒如火花一瞥即逝。

[注]：夏允彝为明末“幾社”创始人，其子完淳有神童之誉，二人共仕南明，清兵下江南，松江陷敌，父子陷狱。完淳狱中诗南冠草有句云：“英雄生死路，却似壮游时。”

三、中共浙江省委全貌：江苏江浦会议结束后约二星期，文虎自上海偕共青团中央特派员张秋人，前往杭州出席中共浙江全省代表大会。先是浙江中共及共青团组织人数不多，且多属省会学校成员，自中共全国第三次代表大会后，决定全浙建党工作方向，应着重发展宁波、湖州、海门、温州以及浙西、浙南各县工人运动及农民协会组织。文虎一行首先到宁波，正式建立当地党与团的组织。

1. 宁波建党与胡焦琴¹：宁波中共组织以当地女中及纱厂小组为基础，主要成员为胡焦琴、金志成、席咏怀、卓兰芳、陈鸿等。胡焦琴为女中校长，天姿隽秀，学行卓绝，为全浙宗师。金与席均为该校高材生，卓兰芳与陈鸿为纱厂工人。胡、金等经常穿工人服装到纱厂及码头，向工人进行组织工会与斗争的宣传，在极艰困的情况下，成立宁波地下工会，在海门成立农民协会组织。温州方面在青田、瑞安等处成立秘密农民革命组织。

2. 舟山群岛渔民与农民组织：文虎等与金志成从宁波赴海门、镇海，商定组织舟山群岛的渔民计划。当地渔民主要集中在沈家门一带，岱山为渔农兼作地区。金导文虎在普陀登陆。当地渔民云：普陀相传为善才第二十八参观自在菩萨说法处，全岛居民数千，无一妇女。岱山农民及渔民组织常隐蔽在山上寺庵中进行活动，因此渔农组织即在地区建立小组。时陆铁强自海门来会，因在镇海成立农村联络组织。文虎一行从宁波返杭，绕道诸暨，与当地同志举行座谈，停留一日。文虎回到杭州后，与当地区委商议召开浙江全省代表会议问题。

3. 于秀松与席咏怀等：当时中共浙江区委负责人为于秀松、葛汉臣、沈乐山、赵济猛、席咏怀、徐梅君、沈干城、沈玄庐等。于担任区委书记，老成练达。赵为印刷工人，沈干城为城站铁路工工会主席，

1 胡焦琴，原文稿中又记作陈焦琴。— 补注

葛为杭州市工工会主席，沈乐山为闸口工工会主席。赵为省委宣传部长。唯沈玄庐本身为官僚兼大地主，却刻意深入劳动者中生活，其率先对佃户李成虎实行退佃退租，并参加衙前农民斗争，因此引起大家刮目相看。文虎在沪杭甬铁路开会时，沈闻讯骑自行车，头戴雨帽，皂衣布鞋，暗夜中赶到郊外数十里道棚参加开会。沈在会上倾听大家讨论，并发言道：“我们很早就听说过书记部与共产党来人到工人区后，便象春雨后竹林一样，一夜工夫，毛笋就冒出苗头来了。”随后，沈把革命道理用当地土语譬解，深入浅出，听者无不动容。在会毕后，沈手推脚踏车，步行随着大家走回城站，边走边谈，好象完全忘了疲倦似的。秀松云：“沈时年四十许，其平日养尊处优，极少夜出至郊外远行，自入党后，言行与前判若两人。”

4. 西兴会议：浙江全省会议在杭州举行，实际会议地点临时改在杭州城外钱塘江对岸西兴某姓大院内，参加会议者：中共中央方面有罗章龙，C.Y. 中央代表张秋人，李求实（求实家时住杭州），省委为于秀松、沈玄庐、沈干城、宣中华，海门为陆铁强，定海为金良玉等，宁波为胡焦琴、卓兰芳、陈鸿、樊仲甫、杨眉山等，温州为张农等，共三十余人。会议主要议程为：党中央代表报告，组织问题讨论与决议，职工运动问题讨论与决议，农民渔民问题讨论与决议等。

中共浙江省委起初成员以学生为主，西兴会议以后，浙江省委工作渐渐转入工厂、农村与渔村，省委大都从事工会运动与农民运动，并建立若干工厂支部，以铁路纱厂为主干，不少中学教员与学生均直接参加工农群众工作。这次转变在一九二七年革命高潮中发生过重大作用。现就浙江省杭州与宁波党重要成员简介如次：杭州市：于秀松、沈干城、沈玄庐、金佛庄（军官）、宣中华、宣铁吾、王家谟、张秋仁、谢继善、贺威圣、汪性天、沈乐山（闸口工工会主席）、赵济猛（宣传部长）、贝介夫、葛汉臣（杭总工会会长）、徐白民、宣中禅、潘枫涂（组织部）、何赤华（农运）、王宇春、郑采臣等；宁波：为卓兰芳（纱厂工会）、陈鸿、樊仲甫、杨眉山、李崇照、陈良义、王鲲、胡焦琴、金志成（学生会主席）、王家谟（市委）、池耕襄（工会负责人）、陈铁强（海门书记）、朱效巡、曹阿堂等。

5. 贺威圣、汪性天、金佛庄等被难：西兴会议后不久，当地工人运动与农村工作逐渐开展，杭州市国民党左派组织亦同时建立。因当时浙江军阀卢永祥向国民党输诚，一九二四年九月三日江苏军阀齐燮元、孙传芳与卢永祥发生战争，结果卢败，十月出走。一九二四年十月十六日，孙传芳部夏超在浙江杭州酝酿独立，中共杭州省委实策动其事，夏超独立事谋泄，被孙军袭击失败，夏败死，中共党员贺威圣与汪性天被俘，为孙传芳所杀。又浙江省委金佛庄，于一九二六年北

伐时从南昌赴浙江杭州，与中共浙江省委接洽，途经南京下关时，被驷骑所获，亦为孙传芳所害。经过一九二七年国民党清党运动，以及一九三一年前后中共党内长期残酷斗争，结果，浙江省委中共与少共干部几乎全部牺牲，靡有孑遗！

[注]：金佛庄通晓西文，曾创刊《责任周刊》（萧山出版），译有“劳动与工资”在该刊公布。

四、江西南昌会议：江西建党后于两湖，但其进展颇速。

1. 鄱阳湖社：一九二一年间，江西学生在南昌成立鄱阳湖社，后易名改造社，主其事者为二中学生袁玉冰、黄道、邵式平，大同中学学生邵秀峰，甲种工业学校学生方志敏，第一师范学生邹努等。该社出版《新江西》，提出劳动神圣和改造社会等口号。先是江西南丰赵醒依流寓上海时，与上海书记部人交往，获读北京、上海中共所刊工人运动书报，赵即在上海参加工人运动，并加入社青团。一九二二年十月间，赵醒依自上海返南昌，与方志敏在东湖席公祠瓦子角开设新文化书社（一九二三年被封闭，一九二四年改为明星书社），并于一九二三年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支部，在一年间先后在江西省各县内成立团组织。方志敏原为南昌江西甲种工业学校学生，后赴九江南伟烈大学（即同文书院）附中读书，不久到上海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作，同时又与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讯，受北京马克思学会委托于一九二二年回到江西，在心远大学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切规模均与北京马学会相仿。

2. 南昌建党会议：一九二四年一月，赵醒依来上海亲向中央报告江西社青团工作日有进展，希望最近成立中共江西区组织。中央会议同意江西同志要求，并派文虎偕依返南昌，协同解决江西建党有关问题。二人同船溯江而上，经过九江，沿南浔铁路赴南昌。南浔铁路工会组织，经醒依介绍，会见其负责人。一九二四年二月，共产党江西区党部在南昌成立，赵醒依任书记，曾天宇、方志敏、刘俊山、罗石冰、袁孟冰、冯任、黄道、王枕心、于溟涛、陈赞贤、王环心、王凤飞、邓鹤铭等为委员。工人运动方面，赣州陈赞贤负责，南浔铁路工会负责人为熊好生，划驳工会魏恨秋，海员工会为冯任，拣茶工会为涂克群（女）。江西省委自一九二五年开始开展本省农民运动，最先由方志敏在其家乡弋阳县建立塘湖村农民协会，一年后组织逐渐扩大。一九二七年，方志敏到武汉湖北省委参观湖北农运工作，居数月返赣，策动农民武装斗争。

3. 九江支部建立：江西党组织成立大会完成以后，醒依送文虎自南昌至九江登轮，并在九江成立码头驳船工会小组，使与铁路工会联合。沿江轮船往来九江频繁，同时成立轮船工会小组。不久，遂联合

成立九江党支部，后来参加收回租界斗争。

两人事毕，在候船期间，醒依建议登匡庐一游。二人乃挂竹杖轻装怀茶饼数枚，步行登庐山，攀上绝顶汉阳峰，临含鄱口，时雨后新霁，白云来去湖上，偶从云隙中窥见鄱阳湖小舟如蚁，荡漾波心，如星点水珠，云雾四合，瞬息便失所在。顷刻间忽隐忽现，变幻无定。醒依见状大乐，云，此景平常很难见到，白云：“参加南昌建党大会乃个人生平最值得纪念事，首次登匡庐睹此奇景，更快胸怀！”此日薄暮，二人遂相偕下山抵九江，时轮已到埠，文虎遂别醒依登舟东下，驶向安庆而去。启碇时，醒依尚在趺船东首伫立，挥巾致意。自九江分袂以后，二人即未再会。文虎到安庆停留期间，从当地同志处闻悉特立夫妇在北京被捕消息，乃匆匆东归。

4. 赵醒依遇难：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五日，南昌中共党支部被破获（在黎民中学），赵醒依被捕，九月十六日被军阀邓如琢杀害（详情见《向导》一七五期悼赵醒依文）。赵被害后，方志敏赴上海报告，一九二七年四月中共乃派陈潭秋赴南昌代理江西省委书记。

五、安徽建党：安徽方面中共最初组织为高语罕（笔名李中）等所发起。高原任安徽芜湖第五中学教员，一九二一年五月，高等组织芜湖学社，社员有李宗邨、王肖山、王岳庐等，后渐增加江常师、柯庆施（怪君）、茅廷楨（保定军校）、严季陵（灵峰）诸人。此外，在芜湖方面有万诚，阜阳方面有薛祚汉，潜山方面有余大化等。

六、福建党与团组织：福建福州最初由北京马学会会员成立社青团，由罗明、郑学稼等所发起，后渐及厦门、漳州与闽南。罗明、郑学稼、谢濂清、罗怀盛、郭滴人、阮山、张凯、张高旭、林心尧、兰为仁、兰为龙、张鼎臣、邓子恢等为当地党与团的负责人，一九二七年后主要在农村方面发展。

七、四川中共党与团组织：先是黄日葵自东京返国转学北京大学，即在北京入党，黄谈东京留学界思想近来极静，无波澜，惟四川王右木与江溟涛颇杰出。守常即令其写信，嘱王等归国时来京一晤。黄去信后久无复音，越二年王右木归国，过上海忽往访文虎，时日葵已返广西，文虎亦忘前事，经王说明，始知王归国后遍寻日葵不得，因北京马学会宋天放介绍转辗来沪，到上海书店得悉文虎通讯处，经过时间已逾一年。后中央即派王右木回川筹划建党与团事宜。一九二四年王右木到成都，时在成都高师担任教员，仿北京大学办法组织马学会，研究革命理论，先建立社青团（C.Y.）组织，随后又发展为中共小组。时成都方面有吴、王等数人另组中国青年共产党，吴为当地官僚，政治经历丰富，请求两党联合，王右木据以报告上海中央，中央未理。吴乃走北京，在京时偶遇赵世炎，遂以同乡关系向赵游说，赵乃允其

加入党，时称中共第一个大官僚党员。尔后吴运用纵横辟阖手段，一帆风顺，历任显职。

四川成都至重庆一带有大量矿山、盐井及手工业工人，上海中原拟派王荷波入川协助当地中共党团组织发展工会及农民组织，但因西陲交通未便，迟迟未果行。五卅运动发生，南北局势大变，人手不够，此议遂告搁置。当时四川党负责人为：王右木、漆树芬、刘子青、郑右之、杨闇公等。王右木语文虎云：“‘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定蜀后定’，这是历史经验之谈，希望中央眼光烛照及此，多派几个能手，进入巴蜀奥区，将来一定会有惊人的成就！”从此以后，中央渐重视西陲问题。

八、云南党与工会：云南地处偏隅，交通未便，最先有腾越路及个旧锡矿工人加入北方书记部，随后书记部先后派王懋廷、张延瑞等进入云南组织工会与成立党支部。当时云南昆明支部主要为张至刚、沐璆、王复生、龙润雨、吴度南等。张至刚，河北人，北方书记部成员，白请到云南工作。他说：“云南虽属边远地区，但滇池洱海，形势天成，且毗连国际通途，铜矿与锡矿，驰名遐迩，地位重要，矿工众多，是革命火井，可资割据一方，建立‘劳动人民大理联邦’。”云。张后不幸为龙云所杀。

九、湖北区委：武汉居长江上游，东通吴会，西连巴蜀，兼为南北通途，北接郑洛，南界湖湘，近百年来武汉三镇乃为工商业荟萃之区，形势与中欧莱茵流域大城相仿，故为中国南方中部革命波澜壮阔之地。

武汉中共小组成立甚早，其前期参加中共建党者有李汉俊。李为留日学生，归国后与仲甫结识，付以编《新青年》编辑职务，李复引进同乡董用威、刘芬（伯垂）、陈潭秋等加入组织，成立武昌中共组织，时间是一九二一年夏。湖北区委以武汉三镇为中心，党与团组织成员大部为中等学校教员与学生，当时主要成员为林育南、施洋、李求实、陆沉（卢春山）、庄有义、刘光国、许白昊、唐际盛、林育英、项德隆、何恐、张心余、吴德丰、李子芬、刘昌群、李书渠、刘胤、肖楚女、魏以新、恽代英、黄子通、黄负生、刘芬、夏子栩、徐度直、陈比难、沈葆英、杨子烈、杨子玉等是。

武汉在大革命时代地位非常重要，革命政权发挥过很辉煌的业绩，为革命史上放射异彩。

十、湖南区委（安源附）：湖南中共组织脱胎于新民学会，先是一九一八年新民学会会员十余人赴北京留住，一九一九年三月，毛泽东自北京经上海回湘，主持新民学会，七月中旬创刊《湘江评论》（出至五期停刊）。一九二〇年二月复北上参加驱张运动，四月去上海，七月

复返长沙，九月设立长沙文化书社。一九二〇年春，北京发起马学会，是年十月乃在长沙成立马克思研究会，主持人毛泽东、何叔衡、肖述凡、夏曦与郭亮等，地址在第一师范附小，十二月乃成立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

湖南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继北京、上海之后，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书记部负责人为毛泽东。各地成员：长沙毛泽东、郭亮、夏曦、易礼容、谭影竹、杨福涛、翦去病、欧阳梅生等。从事工人运动，安源袁达时、李立三、刘少奇、汪泽楷、黄五一、肖劲光、余江涛、朱少莲、朱锦棠、易礼容、谢怀德、宁迪卿、蔡增隼、向五九、易足三、何保贞、唐际盛、李涤生、毛泽民等；水口山刘东轩、蒋先云、贺恕、朱舜华、毛泽覃、戴晓云、黄静源、夏明翰、陈勋等；锡矿山肖石月、邹健武（觉吾）、刘炎¹等；平江余贲民、罗纳川、毛简青等，浏阳陈昌、王德吾、王首道等；湘潭罗学瓚、贺尔康、陈佑魁等；益阳夏曦、刘一华、袁铸人等；湘乡王基永、龚际飞、肖述凡等；宁乡熊亨瀚、姜梦周等；宜章颜秉仁、李佐民等；常德滕代远、滕久忠、粟裕等；石门袁任远等。

十一、广东区委（广西附）：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发起人为谭平山、谭植棠与陈公博，三人均北京大学学生，最先加入北京大学哲学会与新闻学会为会员，后又加入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谭等毕业后遂返广州，时仲甫任广州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因北大关系，均被延请到教育委员会工作，在广州从事宣传马克思学说，后来乃组织工会，并进一步成立党小组。广州成立中共小组，后渐扩张成立省委，主要成员为：谭平山、苏兆征、林伟民、何耀全、翟汉奇、杨殷、罗绮园、冯菊坡、陈炳生、杨匏安、彭湃、刘尔崧、梁复园、阮啸仙、罗珠、杨章甫、郑全、白浩之、黄平、陈郁、兰裕业、江秀珠、梁桂华、马骏、陈延年、李森、烂风炉（陈发）、周文雍等。

广西中共党团工作由广东区委兼理，首在桂林与南宁成立党团组织。当时桂林方面党组织主要成员为：谭寿林、梁砥、马骥、黄日葵、韦佩珠等。南宁为雷天壮、雷沛涛、周仲武、梁六度等。

¹ 刘炎，文中又作刘驩。— 编者注

五、环龙路国民党执行部¹

国共合作具体执行时，中共曾郑重讨论多次，各次会议均有国际代表参加。中央局会议曾作成下列决定：对于国共合作问题，中共采取下列原则，即：（1）中共保持独立自主原则，中共党报及中共各级刊物对国民党施政的自由批评不受限制。（2）中共领导的工农群众组织不受国民党及其政府干涉，工会、农会享有集会、结社、罢工、纠察自卫之自由。（3）中共允许本党党员（包括团员）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任群众工作，但一般不做国民政府官吏。工人运动领导者及中共所属工会会员不得加入国民党。（4）在组织方面，自一九二三年七月起，中共中央书记代表中共出席国民党最高会议。中共自中央到省市各级按系统派遣党员，分别协助国民党进行改组工作，包括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党部及基层组织，训练干部，整饬宣传机构，协助国民党解释、澄清该党在民众中的不良影响，帮助国民党改善军事教育训练，建立革命军队等。根据上述原则，中共中央政治局派定政治局委员王荷波、毛泽东、罗章龙三人参加国民党执行部，协助国民党进行改组事宜，后又续派中委李守常、谭平山等协助国民党北方及广东改组工作。中共各省委、市委分别派遣中共党员，参加当地国民党省市委员会的改组工作及军队改建工作。现就国民党执行部，国民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与黄埔军校的建立诸事，略述大要如次：

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最高机构决定设置国民党执行部于上海法租界环龙路四十四号，作为国民党全党最高执行机构。执行部内主要设立组织、宣传、工人、农民等部及秘书处。国民党派定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廖仲恺、于右任、叶楚傖等分任各部部长。中共方面由中央政治局决定陈独秀、罗章龙、毛泽东、王荷波四人参加指导执行部工作，另由少共中央决定恽代英参加执行部工作。遇有特别重

¹ 本章内容《椿园载记》已刊，此处有删节。— 补注

大问题，则由国民党总理孙中山与中共书记陈独秀协商决定。同时中共中央又决定派干部沈雁冰、邵力子、瞿秋白、邓中夏、杨贤江、沈玄庐、张秋人、李成、刘伯伦等，参加执行部各部门宣传与组织基层工作。当时上海社会传称，环龙路四十四号为“国共群英会”。

一、国民党诸政治人：“政治人”一词与近代流行所谓“经济人”相平行。经济人指在经济上以自私自利为主旨而活动的假设的人，政治人与他相仿，不过其自私自利行为是偏重在政治方面。政治人是只知有己，所以极其所至乃变成暴力恣睢，不知民主为何物，更由此发展到党内互相倾轧、伙并与仇杀，其行为则与政治野兽无异。同盟会在辛亥革命以前为民族革命政党，其初期成员颇多志士仁人，献身革命，推翻满清专制帝政，其功实不可淹没。但自辛亥革命成功后，孙、黄与袁世凯妥协，当时所谓革命党人如章太炎、吴景濂、谭延闿、阎锡山、胡瑛、林森等人，大都投降袁世凯担任官职或议员，博取衣禄。孙虽力图再振，但几起几落，终不免仍与南北军阀勾结，沆瀣一气，实行地方割据，专制自肆，涂毒人民。由此可知国民党于民元间，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实与其他政治派别同流合污，可称一丘之貉。特别是国民党号称革命党，而内部互相残杀与互相践踏，在民众中更留下极坏的印象。如谭延闿谋杀焦达峰与陈作新，四川两广国民党自诩自屠，湖北张振武被杀，黄岗许雪秋被杀，胡汉民与陈炯明抢夺广州政权，不惜造成内战等。在人民群众看来，国民党无是非公道，是与国内其他军阀完全没有区别的。

二、总理龙头气派大：诸政治人品格虽属极其卑污，但毕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混了多年，并栽过不少筋斗，所以显得有些江湖本领。国民党上、中层人物多属非生产性分子，文人无拳无勇，脱离工农群众，本身却无实力，所以要求结伙，共同拥戴孙中山为头领，以资号召。他们称孙为总理而不名，有时则称先生，自居徒弟之列。国民党员虽共戴孙为党魁，但组织松懈，更无革命原则，朝秦暮楚，视为故常。独秀尝云：“混蛋的中国社会才会有混蛋的政党”，最初本为讥评国民党而发。中共参加执行部主要工作同志某次由孙邀请茶话座谈，表示联欢。时汪、胡等侍侧，不敢就坐。孙谈三民主义包罗万象，自矜创获，语多浮夸。会毕辞出，有人问仲甫，孙言论疏放，可谓“盛名难副”。仲甫说：“他向来就是如此！”（按：孙在日本成立同盟会，张继等首先加盟，并怂恿独秀加入，独秀不允，盖认为孙为不学无文，后尝戏称孙为江湖医生，因孙本业澳门医师，又称孙为大圣。）孙好色好货与常人无殊，其所居法界花园洋房价值钜万，出入有汽车游艇，其纳◇◇◇为妾事，引起党内轩然大波，孙科及其卢夫人首先反对，孙置之不理，其左右亲信如汪精卫、胡汉民、张继等均表示反

对，向孙力争，并痛哭陈词，谓此事有失体统，损党魁威信，将丧失党员信任。孙恼羞成怒，声称此系个人家事，与党无涉，你们如再反对，即将开除党籍。汪胡等慑于孙之积威，不敢再持异议。但此事传出后，议论纷纷，因此荷波说：“孙龙头气派很浓厚，起居特殊，生活豪华，太不象话。孙妻、妾、子、侄、姻娅如孙科、宋子文、孔祥熙等均富商巨贾，我们与此等人做朋友，无异帮他背黑锅（即代人受过的意思），劳动人民对此举将发生甚么感想呢？将来会有一天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三、国民党诸左派：孙左右亲信以汪、胡为著（均粤籍），汪、胡原书生，无武力作政治资本，故奉孙为偶像。二人在孙左右互相争宠揽权，自余诸人对孙关系，依违两可，饥附饱扬，视为恒态。其中如陈炯明拥兵自重，恶孙独裁，素不直孙夸张，诋为孙大炮，孙陈最后交恶，乃以兵戎相见。孙尝挈其妾出入会场，参加阅兵照相，陈大愤，因此孙在韶关阅兵，就非常大总统职时，陈竟拒绝参加，后竟置孙为民贼，炮轰观音山。

四、胡与汪平衡力量：孙派政治集团大都为广东同乡，其左右亲信中心人物为胡汉民与汪精卫，外间称之为国民党平衡力量。二人初则狼狈为奸，后乃分道扬镳。

1. 胡汉民捉刀能手：胡汉民原名鸿衍，清末举人，一九三〇年赴日本入东京宏文学院，习速成师范，最先加入同盟会，为孙中山所倚重。胡头脑明晰，善观察事物，但城府极深。胡能诗文，吐属隽永，外传孙中山所刊布三十三年落花梦序、政治文告及悼刘昆一诸作品，均胡等捉刀。胡自负极高，先是一九二二年五月，胡以代大元帅名义率师由韶关北伐，进入江西，攻下赣州，随闻陈炯明倒孙，即返师驰救，北伐遂无功而还。但胡对此颇炫耀，其部属时称胡为代帅。胡平日高自期许，于人鲜所许可，尝在办公室当众评论汪精卫华而不实，戴季陶有流无源（指戴作文多译自日文书报），廖仲恺周而不到。民国日报文字散漫无章法，其它讯评刻毒，往往而有。胡对中共诸人初亦不甚重视，历久态度渐改，对人言执行部中共党员各有长处，不可小觑，至于中共群众组织势力更不可侮。胡对陈独秀称“仲甫先生，戛戛独造，究竟与众不同。”

2. 政治尤物汪精卫：汪与胡性格各异，但极有能干，故人称汪、胡。汪敏慧过人，善属文，兼擅长演讲，激昂慷慨，感染力极强，满座为之倾倒。汪为人圆通无棱角，善窥人意，对人彬彬有礼，故人乐于往还。在大庭广众间汪对孙中山称先生，对陈独秀称仲甫先生，对鲍罗廷称鲍先生，对其他诸人辞令婉约，无不得宜，即偶发笑语亦令人觉其真挚可亲，故人称其为“政治尤物”。汪对国共合作政策自始

即毫无间言，热诚拥护，对中共遇事体贴入微，奉国际代表若神明，迹其用意无非是想在合作过程中博取个人超额利益并足以凌驾胡之上。某次文虎与汪精卫同车到静安寺路中华书局工人进德会演讲，汪在车中向文虎攀谈，郑重说道：“我参加革命以来，由于个人学无专长，至今一事无成，今后愿诚恳向中共工人同志学习，希望多读革命理论书，在即将来临的国共政府中，愿贡献微力。”由此可见汪说话动人处真是巧舌如簧，当之无愧！

[注]：汪精卫与文虎谈话时初读《京汉人流血记》，误以为文虎乃京汉铁路工人，故有意说向工人学习的话，后汪获悉文虎为北京大学学生，始知其误。

3. 张溥泉狂热拥共：张继字溥泉，直隶沧州人，在日本东京时与独秀友善，回国后时相往还，国共合作张溥泉实为居间奔走撮合之人。在上海执行部成立前，国共双方接触频繁，多在法租界蒲柏路巨籁达路某里张溥泉寓所。一日文虎至溥泉家商谈有关合作问题，谈锋所触极广，张性豪放，纵情高论，更无拘束。张云：“同盟会革命得日本友人助力不少，今日苏联拥有红军几百万，只要从库伦出兵，中国局势立即完全可以改观。”张又云：“我们过去从事中产阶级革命，十几年间浪费光阴，今后应改弦更张，从事无产阶级革命，还可以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不久，鲍罗廷来到中国，张闻讯十分激动，走访仲甫，谈话中张幽默地说：“仲甫说国共合作，鲍（罗廷）实良媒，老实说不过‘炮’作良媒罢了。”从此以后张溥泉乃成为国共合作狂热拥护者，直到一九二六年间，张溥泉忽一变而为仇共最力之一人，他向上海驻军李宝章献谋，派大刀队放肆砍杀共产党和上海工人，要一个不留！前后判若两人。

五、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经年之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正式开幕。此次会议，中共方面全力以赴，动员党内大部人力协助筹备大会诸事，中共中央决定自中央到地方，派遣多数干部参加一代会中央工作。派遣干部时经过详细讨论，决定原则如下：（1）领导工人运动中中共中央委员及各级工运干部，原则上不参加国民党一代会中央。（2）指定李大钊、张国焘、韩麟符、毛泽东、高语罕、恽代英、谭平山、瞿秋白、于树德等参加国民党一代中委会。（3）原系国民党籍之新加入中共党员，由中共方面提名参加一代中委，其人名为：林伯渠、沈玄庐、邵力子、吴玉章等。上述名单中共向国民党提出。（4）省、市党部委员，由国共双方经地方党部决定。其人名为夏曦、董必武、宛希严、于方舟、侯绍裘、江浩、李锡九、谢晋等。独秀对于中共领导工人运动的中委，不参加国民党中委的意见，开始不同意，反驳道：“如果这样办，那么只有送

些二流子去参加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怎能说得过去？”但是，中共中央大多数中委都不同意独秀的主张，所以结果仍然决定，领导工人运动的中委等不参加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注 1]：林祖涵，字伯渠，湖南澧县人，常德师范毕业，东渡赴日留学，一九〇五年归国，在吉林巡抚陈昭常处任吏员，其兄林建藩（修梅）曾任零陵镇守使，与国民党有渊源。林于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共，时年四十五岁，发须全白，有人问他何必再干革命，林说：“我干我的，反正发已不能再加白了！”人服其勇。后经中共介绍任第六军政治部主任，一九二七年赴苏联避难，居莫四年，一九三一年归国入瑞金任财委。

[注 2]：沈玄庐，原名定一，浙江肖山人，家资豪富，有沙田千顷，清末以捐款报效得任云南霭益知县，任满家居，有妻妾仆婢甚多。后在衙前做农民运动，藉此与中共接近，随后于一九二二年取得中共党籍，旋因其媳他恋迁怒于党，遂脱离党，积极参加国民党清共工作，得任国民党中央及浙江省政府委员，一九二八年被刺身死。事后刺客远逸，亡命东北，在哈尔滨成通公司船坞隐匿。数年后刺客醉后失言，案情外泄，遂被逮，押还浙江，处以十二年徒刑。

六、向三民主义注入革命因素：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中共中央提出大会决议草案及宣言内容，决定主要包含下列几点：（1）对三民主义注入革命因素，重新作解释。（2）肯定联俄、联共与工农三大政策。（3）国民党组织从总理制改革为委员制。（4）选举时尽量引进国民党左派进入新中央委员会。因此，国民党一代会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体现着两党平等精神，从理论上奠定了名实相符的合作基础。两党联合会议决定了国民政府施政总方针，因此有人说这与◇◇放弃原则，皈依三民主义，以护蒋独裁为主的所谓国共合作根本上完全不同。

国民党执行部成立以后，继以召开一代会及成立黄埔军校，于是建党建军工作着着进展，在两党合作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双方冲突亦渐渐酝酿，逐次产生，至一九二七年而更趋显著。

六、国共争衡 — 三月二十日政变

国共两党从其理论、政纲、历史渊源与组织各方面观察，俱鲜共同处。其联合反对当前敌人，本属一时权宜之计。故两党分歧乃属事理当然。开始表现为局部冲突，后尔渐渐显著，最后各思控制全部政权，国共争衡便循此方向向前发展。现就国共双方自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间（北伐前），矛盾与冲突初期发展情况简述如次：

一、国民党上海支部斗争序幕：国民党上海支部为执行部直属支部，所属党员成份，大部是寄寓租界的国民党元老与中级干部，及上海大专学校教员、学生，人数约二千多人。上海支部党员大都是改组时重新登记取得新党证的人。但有一部分元老自恃功高望重，为了保持个人威严起见，不愿重新登记，暗中鼓动一部分党员与执行部对抗，此即当时所谓右派，其主要人名为：谢持、冯自由、何世桢、喻育之、童理璋、周颂西、高冠吾、缪斌、陈群、陈德征、倪弼与周佩箴等。

[注]：执行部改组时经过会议决定，对于国民党旧党员举行重新登记，进行甄别，须经常过组织生活。起初多数旧党员观望不前，胡汉民与汪精卫乃以身作则，带头进行登记，其他老党员无可奈何，只得遵行，但亦有少数人如谢持等不愿填表，以示反抗。

当上海支部成立时，国共双方推举文虎出席该支部成立大会，临指导选举支部委员会，成立新机构。时支部中右派分子计划夺取支部领导权，闻讯到场参加，在会议进行中，右派分子共唆使高冠吾等出头与指导员寻衅，有意制造纠纷。当场高等见到本派党员票数不够，乃决意破坏上海支部成立会议，当场指挥预先纠合的流氓打手冲上主席台，意在绑架执行部派来主持会场的文虎。会场纠察队为维持秩序起见，乃立起制止，将右派领队高等扭住禁闭，并将流氓驱逐出会场，才免肇流血事故。

二、中共党员黄仁被谋杀：上海支部斗争结束以后，国民党右派

分子不甘失败，时思报复，夺回支部权力，后来乃不断发动进攻，雇用流氓刺客，谋杀中共党员，后来中共党员黄仁被右派杀死，上大学生林钧被殴伤。右派分子在上海失败以后，谢持等乃到北京组织西山会议，并搜罗一部分政治失意青年参加西山会议，称太子派。又缪斌在广州参加三月二十日事变，继续与中共及左派作斗争，中共干部在斗争中时有伤亡。

三、广州一代会上双方争执：广州一代会上国民党代表有人提出，总理曾说过：三民主义包括共产主义在内，因此国民党可以容纳共产党。但共产党参加国民党后如仍保持自己的党的组织，在国民党发挥党团作用，则国民党将不能容许。右派以此为藉口，鼓动会场反共。因此，守常立即向大会声明说：“第三国际所属支部共产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而非以党团作用加入，加入后服从国民党主义，遵守国民党党章，参加国民革命。”会后党内有人责守常说过于迁就，守常说：“不如此不能转圜。”某代表说：“话虽如此，但是中共与国民党究竟不能合穿一条裤子走路，我们应有以自处。”守常旋悟，并加意戒备，随后在北方，国民党右派分子许宝驹、王汝珩等竟对北方中共展开激烈斗争，使北京中共组织蒙受极大损失，最后演出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案，均与北京国民党右派分子活动有关。

四、国共间的宣传战：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间，中共中央与国民党间发生过多次笔战。如一九二四年九月间，国民党右派藉口让社青团团刊七号所载三个决议为中共政策要瓦解与吞并国民党，乃印行“共产党破坏国民党证据之一部”公开散发，攻击中共。独秀乃以“我们的回答”为题，在《向导》八十三期刊布一文，答辩指出右派错误为：（1）反对为工农利益而奋斗。（2）集中全力于军事行动。（3）反对蒙古民族自决。（4）与帝国主义妥协。（5）与个别军阀妥协。（6）反俄及所订的中俄协约。（7）诬蔑共产党受俄运动费等。

五、胡汉民党外无党论：右派以胡汉民、张静江、戴季陶、孙科、叶楚傖为巨擘，胡、叶、戴等初虽一度参加国共合作，但一代会后故态复萌，而以胡为最显著。因为胡汉民对国共合作事最初反对甚力，屡向孙进言说：“苏俄与中共狼子野心，不可与共事，前途堪虑！”孙云：“有我在，他们不敢捣乱。”胡默然。但胡对人尝云：“俄居西北，今之鬼方也。昔殷人伐之，三年始克。吾人引鬼入室，将大不利！”但因孙中山另有计量，坚持联俄以张声势，并利用中共为作群众工作，胡难与孙抗，遂隐忍持重，勉为其难，出任执行部组织部长。胡对苏俄及中共，时觉如芒刺在背，惧祸及己身。后赴俄考察，归国人问其留俄感想，他说：“苏俄乃一个革命独占的专制国家，党以外不容他党存在，党以内不容异议存在，这是值得国民党学习的地方。”因此提出

“党外无党，党内无派”口号，以制服中共。此理论后为蒋介石所采纳，作为施行党、政、军独裁基础。

六、《新建设》月刊：国民党在宣传战线上坚持与中共对垒者为戴季陶。戴脱离中共后，即欲自起炉灶，出人头地，因捧孙为大圣，想吃冷猪肉。读其文者谓戴文体有呼风唤雨、飞刀杀人意气，与吴稚晖为文阴阳怪气，有异曲同工之妙。先是一九一九年孙中山在上海设立中华革命党事务所，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麇集上海，刊行《建设》杂志，未几停刊。至是恢复，改名《新建设》，由代英、文虎等撰文，戴恶该刊对己不利，勒其经费，未久即告停刊。

[注]：文虎、代英在《新建设》撰文见该刊第一卷各期。

七、仲甫给戴季陶信：当时戴季陶在理论上攻击中共最力，仲甫于一九二五年八月三十日亲草长函与戴辩论，长达万言，从理论上驳斥戴文缺乏革命观点，并诬枉民众事实，戴理屈词穷，无法自辩，转请求笔下超生。

一九二六年九月张静江为北伐筹款等问题致函仲甫质问，词色甚严，仲甫乃于九月十三日作答，坚持原则不让，谓北伐不能牺牲民众利益，张乃默然。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萧楚女以抽玉笔名刊行小册一本，题为“中国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批评国民党右派人物，词旨甚厉，国民党大为震动，拟大兴问罪之师，以此为藉口，主张两党分家。当时中央有人亦不以萧个人自由发布意见为然，中共于十二月二十日在《向导》申明，该书为个人意见党不负责，以推卸责任。

[注]：据云：戴季陶接仲甫信不胜羞愤，时正饮茶，立将茶杯掷地，对座客邵某云：“请转告陈先生笔下超生，我戴某誓与中共不同戴天！”人言戴号天仇，至此始获真途。

八、黄埔军校壁垒森严：黄埔军校是国共双方争夺军权的焦点，国民党向来是以策动军事政变为主要策略，因此他对军校怀有独占的野心，不愿中共插手。但是在建立军校物质与精神方面，国民党必须依赖苏联援助与中共的支持，所以在建校之始，形成双方对峙局面。同时也在酝酿着冲突，经常保持剑拔弩张的紧张状况。

九、“远方漂来涨水财”：先是国共合作开始时即考虑到建立革命军队，而建立革命军队又须从培养军事干部着手，因此在国民党一代会后即决定设立黄埔军事政治学校。设立军校首须解决经费、武器与军事、政治教练干部等一系列问题。在上述方面是完全依赖苏联供应与中共支持。关于经费问题，鲍罗廷到达广州时立即交付现金十万卢布作为军校开办费，随后又续交五十万卢布，二者合计为六十万卢布。在武器方面，当时广州有中型兵工厂，每月只能生产步枪及马枪约八

百支，子弹一百万发，因此对于当前需要实属缓不济急。于是苏俄决定供给军校步枪八千支，于一九二四年十月运到广州，并即利用此项武器镇压商团暴动，事平得商团步枪五千支，盒子枪四千三百支，手枪六百六十支，各种枪弹四百三十万发。当苏俄政府金钱武器源源来到中国时，中国国民党与广州国民党政府欢声雷动，有人竟说：“这是天赐其便，‘远方漂来涨水财’！”

十、蒋介石被任为黄埔军校校长：先是蒋介石于一九二三年曾到苏联作军事政治考察，归国后主张中国实行共产主义。蒋说：“实行三民主义就是实行共产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就是反对三民主义。”因此建议国民党应加入第三国际，成为共产国际支部。鲍罗廷对蒋言论极赏识，许为军人中左倾中心，即提出以蒋介石任黄埔校长，邓演达任政治部主任。一九二四年春季即在上海执行部招生，由各省、市国民党选拔学生报名投考。在上海执行部考试，第一次招生录取蒋云先、陈赓、刘子丹、胡宗南等四百六十名，其中有少数安南、朝鲜、蒙古及华侨学生如崔庸健、朴太熔、黎铁雄、黎鸿峰等是。黄埔军事政治学校遂于同年五月五日开学。黄埔成立时，苏联派遣军事顾问：克拉却夫 Krachof、赤里般洛夫 Chilipanof、波沙什民可夫 Bocachminkov、加列里 Karely、卢林 Furin、卜里别列夫 Pripelev 等到校作建校工作。中共派遣见习军事党员：郭增昌（山西人）、金佛庄（浙江人）、胡公冕（浙江人）、张隐韬（河北人）、茅廷禎（安徽人）（以上均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及烟台海军学校的李之龙（湖北人）、郭寿昌（福建人）等担任黄埔教练职务。并同时派遣若干中共民运工作人员担任政治教官。

十一、国共双方阵营：黄埔成立初期，由于苏俄慷慨布施，国民党对苏俄与中共依赖正殷，蒋介石对鲍罗廷尊敬如同师傅，遇事言听计从，双方关系尚称融洽。但是随后蒋介石羽毛渐丰，遂心怀异志，一反以前言行，凡关涉双方权益事项，事无大小，斤斤计较，锱铢在所必争，造成壁垒森严的阵容。当时国民党蒋介石占据军事教练的主要地位，在这方面教官有李济琛、王柏龄、何应钦、刘峙、顾祝同、钱大钧、陈诚、邓演达等。学生中拥蒋组织有关麟征、胡宗南、贺衷寒、康泽、邓介民、邓文仪、邦悌、刘咏尧等，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等与中共对抗，双方从展开笔战以至直接冲突。当时黄埔方面中共政治教官有：恽代英、高语罕、颜昌颐、萧楚女、安体诚、王懋廷、周恩来、张秋人、聂荣臻、杨其纲、熊雄、廖化平等十余人。学生方面在一九二四年黄埔第一、二两期起有中共党员蒋先云、陈烈、周逸群、陈赓、段德昌、李鸣珂、陈恭、俞墉、王一飞、李之龙、徐会之、熊受喧、许继慎、余洒度、苏先骏、林彪、刘志丹、李天柱、粟裕、罗荣桓等二十余人。至于校内朝鲜、安南、蒙古学生，其中一部分（如

黎铁雄等）参加中共，另一部分参加国民党组织。时李瑞（后改名阮爱国，即胡志明）、胡松茂、崔庸健等均在广州活动。

十二、东征奏凯：黄埔军校在军事干部训练方面，自一九二五年起加紧进行，依苏联军事顾问沙波什尼可夫的建议，提出训练营、连、排干部计划。一九二六年春特设下级军官训练班，是年夏季又设政治训练班。黄埔军校全体学生三千人，战时编成两个学生军教导团，因此发挥着高度的战斗力量。中共党组织在黄埔军校学生中人数虽然不多，但在两次东征中，却发挥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据蒋先云告文虎说：“一九二五年二月第一次东征惠州时，陈炯明及其同盟军约五万人以上，我方以少击众，得到广九铁路工人援助，运兵迅速，二月十日淡水之役，组织敢死队肉搏坚城，中共军官党员踊跃参加，党员蔡光举、张隐韬、刘峙西、冷欣等率队冲锋，蔡光举中弹阵亡。棉湖之役与敌军林虎主力鏖战，死伤惨重，我方炮兵连奋勇破敌，击溃敌军。四月间东江之敌大部肃清，俘敌七千余人，五月底战事结束，敌军万余人向西溃退，中共党员连长郭俊、刘峙西等阵亡。一九二五年十月第二次东征，占领海陆丰，克惠州，中共党员团长刘尧宸、营长谭鹿鸣、唐同德阵亡，营长蒋先云负伤。在东征战役中，中共党员英勇善战，使蒋介石喜惧交集，既喜中共党员效命疆场，可为国民党服役，又惧中共在军事方面势力膨胀，今后将难以控制，因此数月后即有三月二十日事变。

十三、三月二十日事变：国共冲突以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采取突然袭击，夺取中山舰为发展到最高峰。三月二十日事变以中山舰为导火线，因此首先应将广州政府海军改革情况附带说明。

1. 海军改组：先是广东海军组织非常腐败，由广东系海军军官欧阳格、欧阳林、舒宗鎔等盘踞。一九二五年六月成立海军局，以苏俄西曼洛夫 Simanlov 为局长，哥勒尼 Koleny 为顾问。海军局为清查现有海军舰艇、器材、武器、弹药起见，乃建立军需监督制度，对海军进行彻底整理。国民党当时对西曼洛夫局长并赋以整顿与建立海军的全部权力，用意希望在苏联方面获得舰艇补充，因为当时广东政府仅有四百吨以上级军舰七艘，一百至四百吨级军舰九艘，一百吨以下炮艇四十四艘，共计有大小炮一百二十五座。但苏联认为当前迫切任务是北伐，海军还在其次，所以未注意及此。在航空方面，广东政府原有旧型飞机七架，内一架为水上飞机（法国制造），虽聘西尔哥耶夫为航空顾问，但在国内战争中亦无重大作用。当时海军局为增强主力军舰战斗力起见，乃派李之龙为中山舰舰长。

李之龙：李之龙为湖北沔阳人，初在武昌外国语学校肄业（与李求实同学），后考入烟台海军学校（与郭寿生同学）。一九二一年初因

参加学潮被开除，一九二四年考入黄埔军官学校，取得中共党籍。当时中共党员学习海军者只有李、郭二人，由于工作需要，任李为海军局政治部主任，至是乃改任李为中山舰长。由于中山舰是主力舰，装备各居各舰首位，所以国民党海军旧人阴谋复位，策动反抗，匪朝伊夕。同时蒋对中山舰的炮火威力时感恐怖，认为威胁国民党及自身的生命线。在事变中，李之龙受蒋愚弄，被诱捕，中共第一回合遂告失败。

[注]：李之龙素缺乏革命斗争经验，平日生活浪漫，与名伶某结婚。挥霍无度，被党处分。三月二十日事变后乃脱党携妇赴香港作寓公。一九二七年回武汉工作，武汉政府崩溃后，李于一九二八年春潜回广州，被广州军警逮捕杀害。

三月二十日事变，独秀时在上海，数日后接到事变详细报告，已无法采取有效措施，后乃函蒋介石责其败盟。蒋见目的已达，故仍在口头上向鲍罗廷发誓表示忠诚，鲍见事已如此，无可挽回，只得承认既成事实，忍让了事。一九二六年六月四日独秀致蒋介石信，晓以革命大义，说：“国民党于三民主义共信之外，应有别信，中共对冯玉祥尚且爱护，何况蒋。”劝蒋不应自绝于革命。蒋接信后仍是抵赖敷衍，毫无悔过诚意。

2. 高语罕被迫离穗：三月二十日事变后，蒋见鲍对己优容，乃组织黄埔实力派以植私党，并大肆排斥异己，拉拢中共不肖分子。又藉口黄埔军校政治教官高语罕有讥讽蒋介石言论（说高曾向黄埔学生演说，要打倒北方段祺瑞，就要先打倒广州的段祺瑞。）逼高辞职，高遂于五月二十五日被迫离开广州。当时独秀认为小不忍则乱大谋，中山舰事已吃大亏，语罕问题比起来还小，不应坚持，因令高为文辟谣。某曾批评独秀此举亦属蛇足，独秀亦未置辩。

又三月二十日事变，《向导》屡刊文揭露国民党右派分子缪斌等反动罪行，缪不自安，因央人向◇◇◇说情，冀和缓其事，◇◇◇受缪重托，遂为缪投函辩诬，中共中宣部大哗，认◇◇◇为缪说项，可谓敌我不分，陈延年尤为不满。缪于一九三九年与王克敏、江亢虎、汤尔和、高冠吾等狼狈为汉奸，日本投降后缪被处刑。

十四、大革命高潮及其危机平行进展：国共合作初期争衡局势发展略如前述，但就全局观察，当时国共双方在打倒北洋军阀共同要求之下，内部冲突发展受到相当限制，因此还不致完全破裂。同时就主动合作的中共本身言，当时尚能盱衡全局，以掌握工人运动为革命主力，同时发动农民群众，建立革命群众基础，以与敌党相周旋，尤为重要者厥为当日中共内部团结一致（时东方大学首次组成彭述之等小宗派尚未抬头），实力充沛，故在运用剥算策略时，颇收以左制右之效。从国民党方面观察，国民党从一九二三年至二七年间，内部不断分化，

使中共得以从容应付，推动与领导国民革命斗争稳步向前发展，遂形成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高潮。但自一九二七年后，情势逆转，两党所处形势急转直下。时国民党内部冲突虽然存在，但在与中共对立情形下，却促成内部团结，保持对中共一致，逐渐增大右派实力，对中共反守为攻，而此时中共内部在◇◇◇控制下，长期党内残酷斗争，实力日削，客观上帮助巩固着国民党的统治优势，大革命危机平行进展，最后革命失败遂成定局。至一九三一年以后，中共党本身组织竟全部瓦解，革命路线远离轨道而蜕化变质，此后革命斗争精神与实质，方之一九二七年前中共革命遂成两概，而面目亦全非。

十五、关于所谓两条路线（即上海路线与广东路线）：一九二七年鲍罗廷回国，经过二年后鲍向苏联科学院作中国革命问题的报告，回溯三年前往事说：“三月二十日事发，时上海与广东路线不同，本人对蒋主张制裁。”因此发生所谓大革命前两条路线问题，其实当时鲍在广州负政治全责，季山嘉被逐，蒋首先背盟向苏联顾问攻击，鲍如果认为应该制裁蒋，便应当机立断，立即下令反攻。广州、上海间电讯往返还须经时日，事机迫切，胜负决于俄顷，当时上海中央断无遥为制止之力。不过如果反攻，广州将立陷于炮火之中，胜负未可预断，鲍素持重，所以未出此。三月二十日事变，中共中央及国际代表对蒋介石一致同意采取容让政策，意在赢得时间，完成北伐。蒋长期观察，看透了鲍罗廷心理，所以敢于出此冒险行径。事后国际来电同意此举，鲍回国述职，转回上海时向中央作报告，亦未言及国际对此有何异议及纠正意见。又依常理推断，如国际对此事不同意，对鲍一定给予处分，并撤换其领导工作，对中共中央亦当有所批评或处理，但国际当时既无表示，事后亦无文献可凭，因此，所谓两条路线，显非当时实际情况。因此对蒋介石反共阴谋鲍与中共早悉其奸，党内同志亦洞若观火，当时问题只是选择适当时机，以膺惩蒋。事后判明，最好时机应在蒋进入江西遭遇挫败之际，当时武昌已克，独蒋军一路不进，如乘机撤销其军职，则名正言顺，蒋亦无力反抗。此机一失，遂遗后日大患。

七、欧洲十国行纪

一九二四年六月，文虎因事到杭州参加浙江省委会议，会议正在进行中，沈玉城从上海来，转达中央电云：“有急事须即日返沪。”文虎于会毕偕秀松返沪。下车后往见仲甫，坐甫定，仲甫说：“前晚魏尔德送来莫斯科急电，国际五大会须中共代表出席，又将于八月在德国汉堡召开国际运输工会会议，大家希望你代表中国党与工会前往出席。”（先是二月间，运输国际曾函文虎谈及此事。）文虎因问：“何时启程？”仲甫说此行须在莫斯科出席第三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会后须到德国汉堡、柏林、巴黎等处，顺便接洽及处理许多问题，所以早些动身为宜。为了节省时间，决定经过西伯利亚铁路波兰华沙前去。因立即通知召开中央会议讨论与文虎此行有关任务。中央会上当即决定文虎在往欧洲时应该处理的各项事务。

一、行装与护照：行前，仲甫到瑞兴里找文虎，因问：“行装准备齐全吗？”文虎淡然答道：“没有甚么可准备的。”秋人笑说：“你总不能穿着旧兰布衫和布鞋，在柏林大街上踱方步呀！”随见荷波夫人阿绣捧出衣服一包送给文虎，说：“这是荷波结婚时做的西装，因嫌小，一向没有穿，你带去吧。”文虎试了一下，却还合身。阿绣向文虎道：“你正忙，我比着你的身段到石路估衣铺给你买两件衬衣就是，袖扣领带等就不必再买了。”仲甫说：“这样也好，只是出国护照一事，昨天秘书处派人去接洽，回报说要经几国领事馆签字，数日之内，恐怕拿不到手。”文虎说：“此事已由张宝泉介绍，托寰球学生会朱少屏去办，大概可以快速办好。”仲甫说：“那就叫秘书处派人去催取，你忙你的事去。”说罢，大家方同散去。

文虎先到国际代表处，要他先回电给莫斯科及柏林方面知照，并通知北京苏联大使馆优先签证入境护照，护照所用名字是罗求远，职业是上大教授，任务是游历与考察。事毕，当到环龙路四十四号关照

执行部。时胡汉民与汪精卫均在办公室，见文虎有事远行，知不可留，乃决定请文虎将所遗留工作暂由润之代理，希望事毕早归。越二日，寰球学生会送来德、法、荷、比、瑞、奥等国领事所签护照，沿途均可下车停留游历。

二、东交民巷初见加拉罕：文虎将中央工作交代清楚即登车北行，春熙与长荣等深夜到上海北站相送，火车沿途未停，到北京正阳门下，即往城内与北方区委诸人见面。相别一载，暂获聚首，并知在此期间北方区男女同志陷入囹圄者又有多人，忧思如焚，彻夜不寐。北大旧同学闻讯来寓晤谈者亦竟夕留连，不忍遽去。文虎到京后，即驱车到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办理护照签证，加拉罕 L. I. Kanalhan 大使因事先已得电，亲出招待，不一会手续办理完竣，加留文虎共餐，畅谈各事及通过波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等国境时应行注意事项。文虎见加拉罕器宇开朗，颀长白皙，微有髭髯，仪容甚美，其夫人亦堪称绝代佳人。见其谈吐磊磊，卓尔不群，确是政治界峥嵘人物。

文虎自北京西站登车一路出山海关后转南满铁路、中东铁路至西伯利亚，共行驶约二星期始达莫斯科。在西伯利亚国际列车中偶遇瑞士表商母女二人，同行赴柏林，大半月的旅行生活就在互相漫谈中度过。她当出一本旅行地图，绘有 Daysy 图案，自称乃其本人名字。地图中附全球各地时间差距，其中“苏联时区”详图，记载自苏联国境极东角，中经伯力、赤塔、伊尔库次克、阿姆士克、乌发、莫斯科以至列宁格勒，每经一处时间辄相差五分，前后共差五十分钟。文虎到莫斯科在卢克思 Lox 旅馆晤守常。休息十数日转车经华沙、里明等城，途中稍有停留，经过一星期始达德国西北海港的汉堡。

三、汉堡会议：文虎到汉堡时已届深秋，下车后即偕舍哈罗夫斯基 Cha-chorovsky（赤色职工国际代表）、西马温往访国际运输会议负责人菲门 Pim-men 商谈有关会议诸问题。这次会议原是欧洲运输工人国际宣传委员会所发起，该会为产业组合性质的工会，所属工会包括十一国铁路工会及八个国家的海员工会，其主席为荷兰人菲门与英人威廉 William 二人，共有会员三十万人。出席会议代表凡二十三人，其中苏联运输工会的代表因入境护照未就未到会，临时改由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出席。开会前正值国际运输工人协会亦在汉堡召开会议，因此菲门与威廉提议联合举行，但该会讨论结果只允许中国、爪哇及苏联代表参加，不欢迎其它国的代表，理由是中、苏、爪哇代表在国际方面群众斗争颇有地位。中、苏、爪代表不愿单独行动，结果未参加该会，仍照旧分别举行。此次会议期共历一星期，自八月十二日起至十八日止，结果左派势力大增，文虎当选该会书记兼会刊主编。

[注]：关于文虎出席汉堡国际运输会议讨论与决议情形，详见其

所作报告，在一九二五年五月《中国工人》第三期刊布，可参考。

汉堡自中古以来即为欧洲古汉沙同盟（Hansa）最大的商港，旧为不莱梅汉沙同盟商业战场，对世界一千多个港口通航，有航线二百多条，每年进出口船舶约一千五百万吨，每月出航轮船约五、六百艘，码头装卸起重设备一律是自动操作，因此号称世界运输工人重大基地。同时也是德意志共产党领导工人斗争的重镇，这里的斗争是与德意志共产党相关连的。德共成立于一九一九年一月，是年一月十日，不莱梅成立苏维埃共和国，同年一月十五日李卜克内西与卢森堡被杀。同年四月十三日至五月巴伐利亚暴动成立苏维埃共和国旋即失败。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汉堡工人武装起义，不久即被镇压下去。在汉堡起义失败后，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希特勒在慕尼黑发动武装暴动，同遭失败。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爱伯特 Elbert 下令解散德国共产党，德国共产党转入地下活动，台尔曼出走。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二日，苏联与兴登堡德国签订苏德商约，由是德国工人革命渐告停息。汉堡运输会议的时候，恰是德国正处在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也就是说一九二三年十月下旬汉堡起义的群众斗争苦战三天，方被压服以后不到一年，当时反革命派趾高气扬，普遍实行降低工资、延长工作时间，增加劳动强度。因此大会上一位工人向文虎说道：“计件工资等于谋财害命。”会毕，国际运输工人协会邀请文虎作报告，文虎以“远东工人革命”为题，讲了二小时，听众五千人。汉堡日报记者甄尼 B. Jeny 向文虎详询关于中国革命诸问题，并谈到一九二三年的“二七”斗争。她说这次罢工引起欧洲人士很大的注意，中国军阀是暴力占上风，你们却获得道义上的胜利，道义将是最后的胜利。有一位运输协会会员于听后又与文虎攀谈，自言常出航到中国上海、天津各埠，如有需要可以相助，并可设法秘密运送武器等。文虎回国后派人经常与汉堡进口航轮取得联系，获得帮助不少云。

四、阿姆斯特丹重晤马林：马林自离中国后即返荷兰担任码头工会秘书，他于会后约文虎到荷京阿姆斯特丹（Amsterdam）一行。文虎偕马林同往荷京访问，约经一周时间，即暂寓其家。其夫人热忱招待，有如家人弟兄。荷兰是世界闻名的航海国家，其海员工作效率为欧邦先进。阿姆斯特丹，港政修明，足与汉堡相埒。但见海上滕艘巨舰，往来如织，工人组织极严密，生活与文化均极可观。马林尽数日工夫陪同参观造船厂、堤防工程以及近郊农场，其牛奶乳酪蔬菜生产量丰质高，不愧为欧洲诸国的厨房。东方专制大国毫无民主，视此蕞尔小邦，经济、政治、文化均远所不及。马林对中国革命各极关怀，他告文虎：“中国是农业大国，无民主习惯，推翻一代统治者在中国历史上极平常，但要建立民主制度却有重重困难。通过工人运动可以接近

民主，纵有困难，不宜灰心，舍此以外更无达向民主的道路，可谓徒劳！”文虎住马林家连夕倾谈，多涉及中国革命往事。

在汉堡时有同志自比国来请文虎过卜鲁舍尔与当地同志接谈（熊雄等在比国），因时间不足，中途停留二日，即登车南行赴巴黎。

五、巴黎十日：文虎自荷兰回航转车直赴巴黎。先是 C. Y. 旅欧支部已从上海得信知道文虎现在汉堡，因直函文虎接洽赴法事，文虎遂决定先赴巴黎再回柏林。火车进入法国国境后，大战疮痍经过五年尚未平复，有些地方仍然是一片荒墟。但进入巴黎则歌舞升平，一片繁华富丽景象。昔人云：“人生不到巴黎，枉活一世。”所以世界富翁无不腰缠十万，航海航空，来到巴黎，虽尽数日之欢，胜居乡土十年。

[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十分之一国土为炮灰平毁，私人住宅三十万所，公共建筑物六千所夷为平地。铁路二千四百公里，公路五万公里毁坏无余，无家可归之难民二百余万人。

文虎到巴黎寓十三区意大利广场附近小旅馆内，翌日召开支部全体会议，在会上报告国内政治及党的政策与工作约半日，余时与旅欧支部同志谈工作及转学东大问题等。时留住巴黎支部同志有邓希贤（小平）、聂荣臻、刘伯庄、周维真、李鹤林、赵世炎、陈毅等均四川人，另部分同志如王人达、陈闻福、汪泽楷、肖子璋、李富春、李维汉等均湖南人。支部出版少年周刊，由任卓宣主编，油印发行。勤工俭学在法国分裂为若干政治派别，蔡和森等组织工学世界社后脱变为 C. Y. 法国支部（陈乔年、延年为无政府主义，李立三、罗汉为工团主义）。曾琦等组织青年党，徐特立组织社会民主党（徐原名懋恂，自费赴法），还有些人加入国民党及其它政党。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勤工俭学生结队示威要求生存权与求学权，被警察驱散。十月学生发动占据里昂大学，被军警包围，拘押于炮台内，后来学生一百零四人遂被军警押送登轮，强迫回国。勤工俭学运动至是宣告失败。新民学会会员陈绍床、杨楚、陈馥梅、冯斌、朱子文等因穷困客死巴黎。熊光楚、邹彝鼎等不知下落。至是文虎与支部会议决定，所有支部同志一律送东方大学学习，支部解散。

时陈启修亦在巴黎，（陈留学东京时曾舍身拯溺，蜚声于时，后为北大教授，中西学问均有根底，在北方区加入中共为党员。大革命失败后，改名豹隐，不问党事。）与文虎同寓，暇时常出外游览枫丹白露、凡尔塞宫，登艾菲尔铁塔，塔高三百米，凡一千七百级，又同访芦花博物馆、蜡人馆等处。文虎并代表中共中央访问法共中央于《人道报》馆，与塞马 Semard、加香 Gachon 等会谈。据《人道报》主编谈，他们常译载《中国工人》周刊及劳动通讯社消息。

六、科隆 Koln：科隆乃德国西部工业重心地带，乃德国人文荟萃

之区，曩读哈罗德咏莱茵诗令人神思飞越，故留科隆三日，以遍游附近教堂博物馆等处。科隆又德国各派自由思想策源地。马克思及其论敌“自由人”Freimann派领袖包叶尔 Bauer 等均在莱茵河岸活动。特里尔 Trier 在莱茵地区，为马克思故乡，乃往访问。马翁生于特里尔市，柏来根街 Breiken St，故居为二层楼房，十分寂静，不为当地人重视，与荒烟蔓草为邻。古人云：“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所重视，与荒烟蔓草为邻。古人云：“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信不诬矣。一八四二年一月马克思创办《莱茵报》即在科隆出版，鲁洛 Block，鲍尔三人共任该报编辑，一八四三年一月被封闭。是年秋，马克思离莱茵亡命巴黎。五年后，（一八四八年五月）重返莱茵，主办《新莱茵报》。一年满后（一八四九年）又被逐出境。一八四九年六月，马克思移居英伦苦读著书，历十五年未参加实际斗争，至一八六四年始重新参加革命活动，建立第一国际工人协会。至一八七二年国际工人协会分裂，其活动亦告终止。综观马克思一生，一受困于敌国人，再被迫于同志。一八五〇年他在共产主义同盟竟被后起的“同志”将他斗倒，驱逐他出盟。论者谓其敏于见事，昧于知人，信然！

七、柏林：在德国居柏林时间较长，初寓动物园旅馆 Hotel Zoo，后移居哈罗登堡，居亭主人为古亨夫妇。古亨为柏林大学图书馆员，家藏典籍颇富。休假日共同驾车出游，因此得遍观博物、图书，参观科学文化、剧院、学校、医院，获益良多。曾特访薄次丹 Potzdan 弗里德里希第一王宫，并畅游珊沙西宫（Sansacy，即无忧宫，与南京莫愁湖同义），泱泱大国，风度非凡！宫殿巍峨处，见有旧风磨一处立于路旁，乃弗里德里希时遗物，象征司法独立与尊严。汪湖（Wansee）景物亦极清幽，荡舟其中，尘嚣悉泯。

当时德国共产党已转入地下工作，柏林仅有《红旗报》司对外联络事。文虎曾秘密与德共商谈双方在汉堡互相联络与交换书刊文件等事。经德共介绍，文虎曾到爱森 Essen 参加鲁尔 Ruhr 工人大会，并大会见台尔曼以及几位德共中央的同志。因为台尔曼是汉堡人，所以大家都很有兴趣谈到汉堡暴动的事。台尔曼后被人所胁迫，深为党内斗争所苦，德共力量大为削弱，最后于一九三二年为希特勒所拘，囚于枫林集中营，凡五年率被害死。

八、德国东西战场：居德国时，曾偕御秋等游览欧战遗址。先到东线考察，临观德俄双方大军交锋处。其最大战役为坦仑堡战役（松山战役），Tannenburg 为德俄边境一个山城，双方主力集中会战于此。德军方面统帅兴登堡，设谋诱敌深入，一举而俘虏俄军三十万人。俄军既溃，德军遂转东欧直薄南俄，订结 Litovsk 条约而还。东线战役结束，德主力随又转趋西线。当时德军如飘风骤雨，突破波兰西重重防线，迭克名城。

在德法边境沿线行径 Sedan、Maitz、Feuerbach、Balf 等城镇。此诸地区乃五十年前普法战争大战场。据当地文献说：一八七〇年七月十九日法国对普鲁士宣战，一八七〇年八月上旬，双方战幕正式启开。法国方面动员八个军约二十五万人，由拿破仑第三亲自指挥。普鲁士方面共十四个军约四十万人，由 Molke 指挥作战。双方在亚尔沙斯、福尔巴赫激战，法军战不利，后退。最后色丹要塞陷落，法王路易·波拿巴出降。这次战役，普军俘虏法军官兵共十余万人，缴获尤多。毛瑟如林，巨炮千门，辎重山积。色丹战役结果，使欧洲霸主易位。又经此一战，德国遂以“善战”（战争行家）驰名于世界。德意志国歌有云：“德意志啊，凌驾万邦！Devtsland! Uber Aalles!”即原于此云。

九、奥地利：奥地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以奥匈帝国而称霸东欧，大战以后声光渐暗淡，但其立国规模、物质与精神均有独特之处。因此维也纳乃西欧音乐、绘画、文化名城，兼产名酒，驰名寰宇。文虎所至，当地同学聚餐欢迎，并晤王彦章夫妇。归后又往巨人山 Riesenbergr 游览经旬。

十、瑞士：从巴黎返德国途中到瑞士，在苏黎世与日内瓦盘桓数旬。瑞士兼行德、法语文，经济先进，政治清明，且为永久局外中立国家。境内风光旖旎，人物殷庶，为世界旅游事业中心。钟表输出供应世界，每一个工人生产价值百十倍属于普通人民，故人民生活优裕，政简刑弛。此行亲见到威廉迭尔 Wilhelm tell 剧中所描写的湖光山色。导游者言：“威廉特尔为中古瑞士历史英雄人物。彼原为普通猎夫，偶携子从乡进城，因未向王冠脱帽致敬，被国王训斥，乃令其子立在数百步外，头上置一苹果，然后命令猎夫去射落苹果，如射中，即免其罪。特尔弯弓命射，一发而苹果落地。国王见其箭袋留有一箭，因问猎夫何用，猎人答道：‘如果亦射中苹果，即当用箭相饷。’国王大怒，命拘猎夫，旁观市民数千人，群表不平，齐起斥责国王，猎人乘机号召全市人民起义。市民从之，结果驱逐国王，成立新邦。”此事使历史戏剧化，令人神往！

十一、东欧诸邦：东欧诸邦自地理与政治经济方面言，独辟境界，自成风气，素为世人所瞩目。巴尔干半岛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触发地，由于当地民族复杂，犬牙交错，招致国土分裂，千百年来几人称霸，几人称王，群雄力兢，纷争未休。

一九二四年正当第一次世界战争结束后五年，大战疮痍犹未完全恢复，东欧罢工浪潮高涨，革命此起彼伏！整个世界仍在动荡不安之中，东欧诸邦形势也是这样。文虎逗留柏林、巴黎与莫斯科的时间较长，但来去均经东欧诸邦，下车访问，留连光景，博访异闻，阅历亦

多。如所周知，波兰、捷克号称名藩，实东欧经济政治重心所在。波兰首都华沙 Waschaw 为东欧四战之地，二次被列强瓜分。（按：波兰被瓜分始于一七七二年。）但其人民发奋图强，学术、文化、音乐、艺术奄奄独造，前途正未可限量，今后半世纪内，波兰在东欧地位还当居重要地位，成为大国逐鹿之场，可以断言。过捷克京城布拉格时当见其科学发达，人物殷阜，工业先进，政治开朗，民主运动高扬，令人兴感。我们会见捷共地下组织负责人，并出席市工会欢迎会，对捷克革命发扬怀有高度评价。

在东欧还有一些幅员较小，人口不多的小国，其立国精神亦有不可侮者在。如拉脱维亚 Latria，立陶宛 Litauen 均弹丸小国，国际列车进出国境需时甚短。中国古代传说海上有“十里之侯”，仿佛类似。他们国土虽小，但有金本位货币制度，国事警察与关税员服装齐楚，他们国土虽小，但有金本位货币制度，国事警察与关税员服装齐楚，沿绶带辉煌，剑履鲜明，颇具威仪！旅客游览里加，但见市容整洁，沿街鲜花满圃，同时更可以见到上等旅舍、剧院、博物馆与图书馆、大学等，设备光华夺目，游人如织，毫无简陋之感。最后特别提到塞尔维亚，她是上次大战的导火索。世界闻名的煞拉热阿，位于博斯拉河畔，是一个历史名城。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奥太子斐迪南在塞塞尔维亚煞拉热阿被刺，德、奥、匈集团即以此为藉口，于同年七月二十八日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四年间苦战，十数国参战，造成千万人的死亡。德、奥、匈帝国与俄国沙皇专制同时瓦解。

十二、莫斯科：文虎从德国柏林回到莫斯科后，仍寓留克斯旅馆。在留驻莫斯科期间，主要是向卜洛芬特尔 Provintel 报告汉堡会议情形（当时舍哈罗夫斯基尚未返国），并商谈中国工人运动有关事务。同时出席第三国际会议，向东方部商谈东方大学及有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当时住在留克斯者有日本共产党负责人佐野学，印度罗易 Roy，爪哇西马温 Simaone，朝鲜金◇◇以及其它国家共产党、劳动党等负责人。第三国际、职工国际、联共党、东方大学等负责人时常往来于留克斯间。留克斯为帝俄时代国际性大旅馆，馆内陈设富丽豪华，有波斯地毯，罗马希腊雕刻绘画，餐厅、舞池、浴室俱备。用餐时有乐队伴奏古典音乐，食桌上罗列白脱、面包、鱼子酱、香槟等。最新式汽车，阿卜拉大戏院包厢座位票均优先供应留克斯客人。据估计每一个代表的消费相当于数百农民一年的用费。

文虎第一次到莫斯科时（即乘国际列车路过莫京停留时间），正值召开第三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中共党正式派定代表为守常、文虎与荷波三人，会期为六月十七日至七月八日。会议原定在克宁姆宫举行，时帝国主义国家虎视眈眈，正在加紧攻击世界革命，苏联政府为远嫌起见，乃临时决定禁止国际新闻记者采访。会场约可容千余人，

代表席上装置“译意风”耳机，同时能听到俄、英、法、德、意、西等国语言。会毕组织代表到果尔基、列宁格勒、南俄参观。参加大会代表中被邀约赴汉堡出席会议者，尚有赤色职工国际代表舍哈罗夫斯基，苏联代表托姆斯克、里卜西士莫尔吉斯、布里士金与爪哇代表西马温等。舍哈罗夫斯基声称中、爪代表分途出发，到达柏林汉堡时可到苏联领事馆出示预定口号，取得联系。当时远东国家中，只有中国与东印度在国际革命工会占有代表地位，所以此次东方国家并无其他代表前往参加国际运输会议。

在宁静的留克斯旅馆生活中忽发生一震惊全旅馆的事件，就是东方大学三女生因游船不慎，覆舟灭顶。事由是某星期日东方大学学生多人在莫斯科河上荡舟，舟小人多，载重逾量，舟行至桥边忽告倾侧，水从舷侧灌入，顷刻即沉。其中女生三人不谙水性，惨遭灭顶。虞卿目击覆舟之祸，据云乃由于女生心怯，且无人掌握舵所致。三人均于次日火葬，其中一人为长沙周南女生，乃罗亦农未婚妻。亦农悲不自胜，愤言：“何必东大然后革命！”文虎闻此事数日不宁，并常往亦农处闲谈，以抒其忧。亦农时时谈到东大支部情形，从亦农谈话中透露，东方部时时怀疑东大支部核心组织以外的中国学生，对◇◇◇是否忠诚拥护。至于国内原地工作之人未到东大学习干部，乃是天然的异己分子。亦农关切地向文虎进言：“你的一切条件，特别是群众工作在国际工运的地位是很有利的，但是你如果不能多花工夫靠拢国际，那么只怕有人随便一拨弄，就难免要猛栽筋斗哩！”文虎聆言，对道：“我行我素，管不了那许多！”

文虎留莫京时久，心绪不宁，时思东归，乃就商于守常。守常不以为然，因语文虎道：“你数年来奔走工作不息，劳累过度，致身体极度虚弱。今可暂留此一些时日去医院检查身体，把胃病先治疗一下，并可一同赴南俄休息二周再行回国。”文虎乃将中央工作久旷，亟须回国意愿向守常陈述，守常无可奈何，只得同意，文虎即日动身回国。文虎出国时正当盛夏，现经年之后，已届冬初，仍着秋装，一时无法张罗。翌日清晨，守常推门入室，手持衣服及食物各一包说：“昨有人自乌拉尔来，言西伯利亚已霏雪，我昨叫一飞到街上买了两件棉毛衫给你途中添用。”谈了一会，罗觉亦到。三人遂同乘汽车赴车站，汽车正待开动，守常匆匆下车，又从自己床上取来毛毯一条给文虎，并说：“听说现在软席铺位没有被褥供应，你把毛毯带去御寒吧！”文虎坚不肯受，连忙说：“那你怎么办？”守常说：“你甭管，我自想办法，你要知道沿途是不能买到毯子的，我不能让你冻坏！”随后又嘱咐文虎在车厢中尽量休息，过国境后速来一电，以释悬念。汽车进站，距开车只有几分钟，守常仍陪文虎走进车厢，找定铺位，才

握手连道“珍重”作别，下车而去。文虎与守常共事多年，他的才华、修养、实践和气量均为一般同事所敬佩，公认他为益友良师，当之无愧！文虎在车窗中远远眺望守常及其他送别同志渐远渐逝的形影，感到无限怅惘！（守常送文虎毛毯上绣 L. S. C. 三字，大概是守常名字，该毛毯由文虎珍藏多年，直到一九三一年党内斗争时，全总机关印厂被临中派顾顺章查抄，当做敌产没收，不知下落。）

十三、西伯利亚：西伯利亚有些关隘城镇来时匆匆，不及细加观察，回程就决定多停留些时日，因此在伯尔姆、喀山、乌拉尔、海兰泡、海参崴等处均有耽搁。这些地区如 Perm 是沙皇时代流放革命人士的集散中心地，号称东方的玉门关。回想当年成千万人流亡载道，镣声鞭影，一片凄凉景象，真是“几人此路得生还”！过喀山时曾邂逅李味农等。

途径乌拉尔在欧亚二洲分界处，见有石碑屹立山头，上勒欧洲与亚洲分界处字样。丰碑巍峨，高山仰止，脚踏东西两大洲，瞬息之间，风云万变，顿觉天高地迥，识宇宙崇高与无穷！同行者争摄影留作纪念。初来时值盛夏季节，在贝加尔湖淹留一日。贝加尔湖为世界最深湖泊，特产一种乌鱼，为他处所不见。远眺贝加尔湖北岸，高山环列，山顶为雪线，中层为白松林，近山麓处杂花生树，风光绮丽，风景奇绝。国际列车绕湖南岸，蜿蜒行十数小时，穿山洞大小近百处，工程浩大，有如万里长城，叹为奇境。

远东鸟瞰：最后到达极东大港 Bladivostok，海参崴地处苏联、中国、朝鲜与日本间。海水一泓，连岗四面，气象宏伟，确为远东大港。居海参崴时，何今亮来晤，导游全市及港湾，并出席当地工会会议作报告。淹留经时乃作归计，浮海而南。直航上海，数万里征途，暂告结束。三年以后，再度出国远游，人事变迁，未遑悉纪。

附记：本文原稿共分十章，最先由恽代英与李求实（恽任《中国青年》主编，李任副主编）取去，预定在《中国青年》杂志分期发表，已刊出一章（见一九二五年《中国青年》◇◇期），旋《中国青年》印刷局忽被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查抄，全部稿件均被抄去，印厂主事者亦锒铛入狱，全稿遂石沉大海，渺无消息。因此，本文所述十国游记内容疏略，良深遗憾。现知作者另有欧游十国纪事诗二十五首（见《风云集》），对于当时游踪所及，略见轮廓，特揭出于此，以备参证！

《欧洲十国行纪》附录

欧游十国诗

（二十六首）¹

海参崴

其一

海水一泓彼得湾 连岗四面古名藩
东西形胜襟喉地 世界霸图第一关

其二

寰瀛屹立四邻封 远眄重洋紫气融
海陆空军三万里 飞扬跋扈为谁雄

解：四邻封，指海参崴地处世界纪苏联、中国、朝鲜、日本之间。

阿穆尔

黑浪奔腾色暗黄 庙街仇恨忆沙皇
投荒万里海兰泡 人事纷纭话海棠

乌拉尔

丰碑屹立跨欧亚 浩荡乾坤一剑亲
东望有山生死共 茫茫秋雪伴归人

解：途经乌拉尔山，欧洲与亚洲分界处，见有石碑上勒欧亚分界处字样，时正深秋，已风雪载途。一剑指同行西马温 Simavon，西马温为爪哇共产党总书记，与作者同时出席汉堡会议。西马温笔名一剑（Dolch）。

伊凡

文采风流枉自多 刑人如草恶闻过
金鱼蝴蝶画眉鸟 “一律通分作骆驼”

解：过 K，城外古刑场，史称：伊凡刑人如不胜，恶闻已过。

天象

天旋地转日西倾 北斗高标南斗沉
瞬息风云回大地 时空宇宙变纷纭

¹ 此处依《风云集》原抄件录入整理，与1987年岳麓书社版《椿园诗草》中“欧游十国诗”（二十八首）不尽相同。原件初标二十五首，又改为二十六首，此取与实符者。一补注

解：西行国际列车，过鄂毕河以西，由于经纬度大变，时间与空间观念亦随之变化，如北斗中天，南斗下沉，时钟运行东西差距亦大。

西伯利亚 — 莱茵
电浪飘驰三万里 翩跹忽渡大荒西
盖世风光贝卡尔 深秋又止莱茵湄

解：贝卡尔即 Baikal 湖，莱茵即 Reihn 河。欧亚国际列车自 Sibiria 到 Reihn 一周可达。欧洲地区铁路采用电气车头兼有防震装置，故旅车舒适、安全、迅速。大荒西指黑龙江大荒以西。Baikal See 为世界最深湖泊。湖北岸高山环列，山顶为雪线，中层为白松林，近山麓一带，属夏季繁花盛开，风景奇丽。莱茵为欧洲大河流，在德国西部。国际列车旅伴作者外同行尚有 Tante; Elisabet, Roteand 三人，旅中号称 Klee（三友组）。

游柏林薄次丹珊沙西宫
宫殿巍峨处 风磨老屋空
襟期怀大帝 创业忆三雄
郁郁湖山貌 泱泱霸国风
汉沙馀韵在 学艺重群工

解：珊沙西宫即无忧宫，原文 Sansasl。大帝指弗里德里希大帝 Fnidlicher Grosse。殿旁原有风车磨坊，建工时帝令磨工迁让，磨工不允，控帝与法庭，帝逊谢，令永远保存之。三雄指费喜德 Fichte、里斯特 List 与鲁南 Runland。汉沙指汉沙同盟 Hansa Bvnd。

科恩 — 特里尔
一时功狗云台上 易代英贤草莽闲
惆怅无因见卡尔 参差烟树乱云间

解：科恩即 Koln。特里尔即 Trier 在西德莱茵区 Reihn。卡尔即 Karl. Marx。K. M. 生于特里尔市 Breiken Strasse。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纷纷执政，惟革命派向隅。

巴黎
其一 塞因河
民主象征三色旗 万方亡命会巴黎

塞因河畔遭逃藪 意大利区众所依

其二 枫丹白露
三人巴黎客梦稀 枫丹白露同车归
尊前共听月光曲 淪我炎冰启我思

解：Faintan Blve 译名枫丹白露，在巴黎郊外。月光曲为德国音乐家 Wagner 所作名曲。

汉堡
易北河边商战场 滕瞳万艘影憧憧
汉沙盛业今犹昔 襟带东西五大洋

解：此诗作于易北河西汉沙同盟所在地汉堡。汉堡是世界商业大都会，为西欧通往世界门户。易北河穿越市区流入北海。中古时代汉沙同盟即由汉堡、不来梅、萨克森等城市所组成。同世界上千多个港有通航关系，每年有海轮五万艘出入。

汉堡会议纪要

其一
大西洋畔会群英 十国春秋仔细论
一自汉沙盟会后 如今大地遍知音

其二
西方夜半东方明 协力同心共进军
乳水交融金石固 全球海陆建长城

其三
战略交流亘十春 先锋后进轨同遵
五洲万国工农事 大细不捐且共评

其四
平生自许一工兵 电锯解钢总未停
大踏步前无止境 终开云雾见英伦

其五
海滨别墅剧谈心 雄辩滔滔四座倾

工会宪章从此订 东西革命有传人

解：出席代表凡几十个国家，昔汉沙同盟曾以汉堡为盟主。西方夜半乃用比喻语。国际会议有十年历史。其四指执行主席英国代表 Tomson 闭幕词中语，时英国工运后进，故以伦敦多雾为喻。会毕全体代表在易北河畔海滨别墅举行座谈会，尽欢而散。

亚姆士特丹

小国寡民工造船 殖民海上总茫然
女王奕世夸“尧舜” 城郭人民海底眠

解：作者出席汉堡会议 Hanbvrng Kongress 后应荷兰工会主席菲门 Fimen 邀请前往荷兰，访问 Amsterdam、Rotterdam 等城市。荷兰全国地势低洼，遍地围堤障海，城市低于海面水平，但造船，航运、港务事业甚为发达。又荷兰由女王执政。

在荷京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与马林倾谈竟夕，临别赋赠：

海国西来万里轮 威廉霸迹久成尘
唐山辛店惊风雨 话别当年情更亲

解：威廉指荷兰开国君主 William。

里加

弹丸小国立陶宛 冠带东欧有里加
富庶殷繁文物盛 河山带砺永无涯

解：里加 Riga，为立陶宛 Litaven 都城，国小民富，为东欧形胜之地。

华沙

华沙四战肇瓜争 战火百年意未平
民性勤劳兼勇敢 殷忧启圣兆光明

解：四战即处东欧四战之地。华沙即 Waschaw 为东欧四战之地，三次被列强瓜分，但前途光明。（按波兰被瓜分始于一七七二年。）

维也纳

车轮史辙太匆匆 残霸欧西覆奥匈
音乐名都维也纳 美人醇酒沐春风

解：维也纳 Vienna，为奥国都城。维也纳号音乐城，兼产名酒，为欧洲文化城市。

瑞士

锦绣山河湖水清 威廉特尔旧闻名
尖端工业称先进 万国衣冠慕太平

解：瑞士风景秀丽，人物殷庶，为永久局外中立国，长期和平，故旅游事业发达。以制造钟表仪器驰名于世。威廉特尔 Wilhelm Tell 为中古瑞士英雄人物。末句指瑞士长期国内和平，未卷入世界大战漩涡，经济文化发达。

卜鲁舍尔

寝车飘驰到北京 剑影刀光乱纷纷
闻道工团抒筹略 满天兵气杂风云

解：留北京 Bluschel 时见有工潮发生，双方剑拔弩张。

过旅顺港

浊浪滔天雄鬼泣 路人争诉忠魂碑
阵云扶雨辽西去 白石无言峙海湄

解：旅顺为军港，一九二三年时为日本占领。日俄旅顺战役，死伤惨重，日军阀为愚民起见，勒白石纪功深为识者所鄙夷。

日本海¹

镇日观云风动旗 悠然解得化工思
几经沧海曾为客 海上神山事可知

解：作者于航海时见海市蜃楼、龙卷、神山幻境等。

¹ 此诗写作时间疑非欧游返途中，参见中编《北航纪事》。— 补注

八、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先是文虎在京时，闻悉胡景翼已于十二月十一日进入郑州，乃决定铁总大会移至郑州举行。正筹办间，忽接中央通知，中央决定于次年一月中旬在上海召开全党第四次代表会议，要文虎立即赴沪参加大会筹备及主持大会会场事务。北方区同意文虎赴沪，会毕仍返北京转郑州。文虎遂于一月初乘车南行。到上海时伍廷康等均已先在，国际并派来中国顾问团，工作人员有加仑等数十人。四大会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一日在上海公共租界威海卫路某里举行，出席代表七十余人，各小委员会连夜开会工作不辍，二十二日结束，前后经过十二天。

一、四大会主要议题：大会集中讨论继续国共合作问题，提出国民会议口号以对抗段祺瑞的善后会议。大会通过主要文件为对民族革命运动决议，对职工运动决议与对农民运动决议，分别由仲甫、文虎与润之等人执笔，并由国际代表参加意见。关于职工运动主要是加强北方、上海、广州产业工人运动基础，特别注重开展组织南方各省农民协会运动。

二、大会宣言要点：中共第四次大会宣言全文约三千字，宣言内容要点如次：（1）直系系与反直系（张作霖、段祺瑞、冯玉祥等）各勾结帝国主义互相冲突。（2）中共号召对帝国主义迎头痛击。（3）共产国际、赤色职工与农民国际已经组织了无数万工人农民与资本主义斗争。（4）中国革命日见高涨，中共号召全国人民反对段祺瑞的善后会议，拥护国民会议促成会。宣言提出口号是：打倒国际帝国主义侵略！推翻国内军阀！国民会议万岁！中共万岁！共产国际万岁！全世界工农反资本主义同盟万岁！（宣言全文见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二日《向导》第一百期。）

三、四代会中委名单：四代会选举陈独秀、李守常、毛泽东、罗章龙、邓培、张国焘、王荷波、史文彬、彭述之、陈延年、邓中夏、

谭平山、刘尔崧、项德隆、陈潭秋、蔡和森等为中委，中央委员会互选陈独秀为书记。

四、北方工作开展与深入并重：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中央局授权守常与文虎以中委身份继续参加北方区工作。文虎于会毕后第二日专程直赴郑州举行铁总二代会，登车前，文虎辞别仲甫，并交换对北方工作意见。仲甫说，对目前北方工作布置应扩展与深入并重，党内加强团结，以免敌人乘虚而入。其次谈到孙中山在北京活动应多方拉拢其左右，汪精卫、张继，无使滑脱。谈到对国民党统一战线问题，决定派往执行部工作同志一律撤回，北方应采取同一步骤。最后说：“北方区应对冯玉祥留心，此人太不可靠，谨防上当！已派往国民军工作同志应随时考查，以免被人家拉走！”

五、结语：四大会后全党团结一致，努力奋斗，在很短时间即爆发五卅革命高潮，弥漫南北及全中国，为一九二六年至二七年北伐与武汉国共合作革命高潮开辟广阔的坦途。

九、北航纪事¹

二年前，当文虎离开北京来到上海中央局工作时，原先北方工作，曾经决定由守常与特立共同负责。文虎到沪后，特立即赴北京。

一、特立入狱与出狱：特立赴京首要任务为召开全国铁路第二次代表大会，继续“二七”前后各路工会斗争与组织工会。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即二七周年纪念日），全国铁路代表齐集北京，秘密举行集会，发布宣言（宣言见一九五九年中国工会历史文献卷一，第六十五页）。先是，特立是首先反对国共合作的人，他估计国民党如无共产党相助，她的组织一定由萎缩走向消灭。那时中共一肩承担革命前进，政治革命会更单纯些，革命成功也会更有保障。他既坚持己见，因此与仲甫几次发生顶撞，有时二人竟角角起来。三次大会后，仲甫仍留他在中央工作，他表示坚决不留，请求下放到工会工作。仲甫无奈他何，只得央他到北京铁总负责。并央文虎劝告他心平气和，勿发风动气。自此以后，他到北京一心做工人运动。一九二四年二月，特立在北京被捕。原因是由于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分子北大学生许宝驹、王汝均与杨德甫、谌小岑等共同设谋，向北京军警告讦，军警搜查膳库胡同铁总机关。当时北方区委在敌人严密监视下，活动备受限制，北京步军统领王怀庆出示宣称：“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处死。”北方区机关连续被搜查，损失同志不可计数。因此，守常在莫斯科时即语文虎，回国时务先将北方区问题率先向中央提出，加强人力，充实机构，否则目前局势无法展布，以后困难将愈甚。但中央局当时无人可派，北方问题遂悬而不决。

特立居狱凡九月，备受折磨。至是年十月北京政变，曹锟下野，

¹ 本章与下一章“北方革命复兴”已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资料》第八十辑（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12月版）全文登载，合用题目“重返北方区委工作”，内容略有不同。—补注

经北方区营救出狱。时中央闻讯立电特立南行，他遂于十一月间偕杨子烈、彭礼和、史文彬等行抵上海，参加中央局会议。在会议上，特立表示本人到北方后一年以来，并未完成党所交付的工作任务，愿意重返北方继续做工人运动。中央会议讨论结果：留他在南方做国共合作工作（他此时已不再谈坚持反合作问题）。北方问题候中央下次会议单独讨论解决。

二、北行任务“到北方抓群众去”：会后，仲甫留文虎研究北方问题，咨询意见。文虎说：“北方问题久悬不决，拖延对革命发生极大影响，中央究作何打算？”仲甫答：“我对此事考虑很久，除你以外，再无更适当的人可以去负重责。但目前你又怎能离开中央，所以很是为难！”文虎说：“中央工作固属重要，但目前重心应该到底下组织工人群众，打开北方的沉闷局面，无论如何，不能再延了！”仲甫说：“对！到北方抓群众，该是目前第一等任务。现在就请你提出一个北方工作方案，明日中央会议详细讨论决定，如何？”文虎见仲甫同意他去北方，当晚即召集中央工委及特立、文彬等共同商谈北方问题，根据商谈结果，作成一份发展北方党工作初步方案，向中央提出。次日中央会议以全部时间详细讨论北方问题，并有北方区派来代表参加，会议结果，对文虎所提方案作了补充，立即通过施行。同时中央又接守常来信，要求国◇、文彬等速返北京，特别提到：“北方工人运动仍缺支柱，一时撑不起来。”中央至是正式决定文虎重回北方工作。

三、北方区工作计划：当时中央会议决定文虎到北方任务是：召开中共北方扩大会议，广泛研讨目前局势与行动问题。（1）北方政局变化后重新部署全面工作，并加强陕西、山西、河南等省联系共策进行。（2）天津党组织新遭破坏，江震寰等十余人被害，应设法善后，救死扶伤，妥善安置被难家属。（3）迅速恢复北方工运，加强铁路、矿山工会组织并筹备第二次铁总会议。（4）按照国共合作政策加强京、津、察、热等地党与群众工作，及长城口外农民武装斗争。（5）加派干部吴树敏、王春熙、黄平万、范易、李季达、粟泽、王度、吴汝铭、茅延祯等二十人到北方区工作。（6）整饬北方区共青团工作。（7）派人开辟关外工作，在奉天、吉林、黑龙江等地建立党团与工会群众组织。

四、春熙初离故乡：文虎行前正在摒挡行李，决定由海道北上，仲甫忽来商讨北方区人事调动与分配等各问题，经过一番斟酌损益，确定了最后名单。时春熙在座，见未提及本人工作事（其实已决定她到北方工作），乘间向仲甫请求赴北方工作，仲甫若不经意答道：“去是可以去，可是不准闹脾气！”春熙答：“从今以后，不闹脾气就是，

难道不闹脾气就活不成人！”仲甫含笑云：“果真不发脾气了，那么就一道去北方工作吧！”春熙见仲甫应允，喜形于色，随向仲甫说：“我呢，偶然发点小脾气，总还不会像火山爆发那样大模大样的！”（按：仲甫平日性情易怒，外号火山，故云。）仲甫见她好胜心强，少不得又向她嘱咐说：“北方生活与工作不比上海，一切会更艰苦些，此去风险极大，要加倍注意大家安全……”春熙郑重作答：“我一切谨慎小心，决不有负中央重托。”说罢自觉眼圈潮润，幸尚未被人察觉，乃转身向外，立即到邻室帮同大家收拾行装及旅中医药用具等事而去。此时恰有中央秘书处任同志来问：“何时动身？”文虎说：“有班轮就走。”老任说：“北洋线现有两条轮船，一艘为不定期航船（号称野鸡船）明早启碇，另一艘为大古公司定期班轮，后天晚上开，请选定一船。”文虎尚未答话，适有同志来访，遂他往。春熙不等文虎回话，抢先说：“两船既然相差三十几小时，还是乘坐先开的轮船好，如此可以先到天津，于工作有利。”老任聆悉，说：“这样也好。”遂匆匆告别，办理买船票事去了。文虎因与另一批出发北航的同志谈话，事毕及回室，任已去远，春熙顺便将方才所谈买船票经过告诉文虎，文虎见已作决定，便不再说。是夜，中央诸人再度齐集文虎室中，座谈中央会上未尽之事，以及若干技术联络等手续，忙乱了通宵。次晨文虎、春熙往辞仲甫及其亲友，来到杨树浦码头乘轮。码头上送行男女，熙来攘往，闹成一片，登轮后约半小时船便鸣锣开头，时为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中旬。春熙倚在船舷凝望黄浦江流与十里洋场，对十余年生长的上海不胜依依，掩不住离怀情绪，继恐被人觑破，乃强作宽解自语道：“人间到处是家乡，我才不难过哩！”

五、海上神山：轮船启碇离埠头，向东行驶，出扬子江口，过崇明岛北航。近海处渔舟出没，千帆如织，船行离陆地渐远，海面渐呈寂静。是日天气清明，波澜不兴，春熙静坐甲板上，镇日看云，舟行甚疾，风静旗动，别有一番意趣。天垂四野，云水难辨，遥瞻天际，蜃气空蒙，幻城郭村舍隐约可以辨认。春熙忽然遥指天末惊问：“为何我舟正朝陆地驶去？”谛视之，果见天际似有陆地横在舷前，田园庐舍，望之俨然。但舟行径时，与陆地距离历久不变，二人睹状均以异。久之始悟古有“海上神山可望而不可即”之说，眼前所见，殆即神山，实乃由海上云景幻境构成。春熙云，既经沧海，身历幻境，海上三山之事似亦言之有因，但如无适当天候及云层折光条件亦不能成此云景幻境。文虎数度航行南北洋，以此次所见较为真切，以地望测之，亦与古人航行东海上所见神山相类。近数载间文虎南来北往，乘轮航海已经多次，风涛生活已司空见惯。春熙却初次航海，所以眼簾接触，为大海所陶醉，一切均感到新鲜，兴趣盎然。她自言：“在

扬州生长十年不出家园一步，到上海后又十余年，足迹亦不离长浜路与极思菲尔路一带，此次航旅，视野顿阔。尝思周游世界，博访寰区。”因此要求文虎为她讲述旅行欧洲诸国见闻，自谓将来一定要学好几国文字，自由旅行，知己遍天涯，实人生胜事。

当时所乘轮船排水量约二千五百吨，船长姓傅，宁波人，海上生活已历十五年，紫棠色脸，手脚刚劲，对工人讲义气，能同艰苦，故船工三十余人间，上下情感融洽，工作效率颇高。水手中有阿杜，颇能书写，善识海图，熟悉水情。铜匠林宝符，能说英语，有医疗常识。木工阿谢，农村青年，天真浑朴。船工尝云：船员生活有三态，即神仙、猛虎与牯牛。当海上风波无阻，航行安全迅速时，水手工作逍遥快乐，有似神仙；倘遇猛风恶浪，风雨交侵，大家奋不顾身，工作仿如猛虎；航行中如遭受海难，粮尽水绝，工作仍不能休，则吃苦像牯牛。

六、阿谢海葬：一天早饭后，文虎正在舱内写文，春熙匆匆自外走来，神色惊异，低声说道：“阿谢昨宵急病（急性阑尾炎），治疗无效身死，船中途无寄泊港，据云，阿谢家乡无亲属，船长按死者本人遗嘱及伙伴同意，决定实行海葬呢！”文虎闻耗大惊，急起身往船长室探望，只见船工旅客一群人环绕水手室外围观。有倾汽笛长鸣，船长命大车降低速率，桅梢上悬半旗，船工旅客一律排队肃立甲板上，向阿谢遗体（装在一个密缝帆布袋中，外系巨块石炭）静默致哀。即有老水手二人挥泪将帆布袋缓缓移动，推堕海中。船长下令船开慢车，环阿谢绕行一周，然后掉转船头，向北急驶而去。是日，阿谢海葬事引起全船不宁，工人数日不欢，旅客各怀重忧！妇孺歌声顿寂。春熙见文虎不怪，作壮语道：“人生倘能以大海为归宿，葬身奔涛雪浪中，亦是快事！”文虎漫应之。

七、腥风黑水洋：次晨（海葬事后第二日）天气晴朗，众人方聚甲板上闲谈，时见东方半边朝霞灿烂，海宇生辉，仰瞩天际，有镰状白云，舒卷自如，弥漫海空。又见长幅度波浪自东向西，缓缓推进。水手们惊走相告，谓是台风征兆，不久当有风暴来袭，乃各奔工作岗位，作抗风准备。约经半小时后，阳光昏暗，灰云布空，遥瞻天末，有强大黑风长宽数十哩，挟海水旋转，腾空而至，状若陀螺，自转不息，海水自下而上矗立天空，此即所谓龙卷风，龙卷形成水柱高千百公尺，插入云霄，有倾风涛溢历，高浪蹴天，猛风鞭海，船身震荡，忽行且止，甲板上水花飞溅，桅樯动摇，人从船窗隙中外望，但见茫茫巨浸，叠浪崇峰，天旋地转，目眩神惊，不能立足。特别是海宇蒙蒙，腥气触鼻，令人欲呕！正纷扰间，忽然二副报称船尾舵已失灵，船身左右震撼不能自主，因航行中无法修理，乃择地抛锚，听船漂浮，

如此数日，无法前进。

八、春熙疗疾：正当狂飙疾劲，海浪翻腾，扁舟失舵，千钧一发之际，也就是全船乘员旅客惊慌失措，人人自危，预感到海难即将临头的时候，文虎忽发高烧，头昏背痛，以手探腰际，隆肿如阜，由是卧床不起，寸步难移。文虎自知病重，初犹强自镇静，冀其自愈，数小时后，卧床转侧维艰，痛不可忍。春熙见状大惊，乃出体温表测量病人体温已逾四十度。因问起病情，文虎闭目不语。此时春熙方寸大乱，泪承于睫，遂不断以手巾热敷，冀稍抑病人痛楚，但毫无效果，背疮肿胀益猛，状若巨瓠，文虎偃卧昏迷，渐失知觉。春熙见状束手无策，乃往告傅船长，船长即偕阿林同来诊视。林云：“此乃‘背发’，如无他变，涂敷伊比膏数日后可以减轻，但须防恶化。”（“背发”乃中医书学名，林云，昔范增患背发，殁于彭城，乃急性炎疔疮。）春熙说：“病者高烧四十一度，已入昏迷状态，安能听其自愈！”阿林说：“为速愈计，可用刀划开脓胞，放出血污与脓，立可止痛，但船上无麻醉剂，病人如愿忍痛，我可一试。”春熙见舍此以外，别无良法，因乘病者痛昏入眠时，请阿林速行切开手术，春熙从旁协助进行消毒及安排敷药等事。只见阿林持刀在手，沉吟有顷，忽出病人不意，聚精会神，猛施一刀将背疮切开一巨口（长约寸许），急用双手团团紧压，将脓挤出，但经过十余分钟，疮内余脓，藏在深处仍无法排出。此时文虎虽惊醒尚忍痛不声，阖目咬唇，听其所为。但因痛楚逾恒，肌肉颤动痉挛不止，春熙见状感到痛澈心髓，额际汗如雨下，乃先用消毒水漱口后以吻就疮，闭目用劲猛吸两口，将最后残脓吸出。阿林亟以黄碘敷散疮口，经过严密包扎，简易手术便告完成。事后文虎责春熙猛浪，谓如果病毒入口，危险实不堪设想。春熙微哂云：“没有甚么了不起，前岁我母亲在乡间曾患此症，医生告我此法，我当时遵嘱一吸而愈，这回包你会好的。”果然，经过手术后，痛楚立止，随后创口渐合。文虎病愈后偕春熙前往傅船长及林宝符处道谢（船长曾送食物及内服药），阿林局促不安说：“不用谢我，没有王先生的勇敢果断（阿林只知春熙姓王），我是拿不动刀子的！”春熙为了感谢阿林施手术，酬以现金，阿林坚辞不受，春熙乃从身上脱下毛线背心送给阿林嫂以志纪念。

九、猛风恶浪过成山：狂海既清，文虎背疮渐合，惟因连周饥饿，周身困乏，忽见春熙在侧，形容消瘦，与登轮时丰腴体态判若两人。文虎偃卧静思，此行倘无春熙作伴，困难将更不堪设想。春熙舍身拯人，一切忧烦均为己而发。正在凝思，春熙忽外出，旋匆匆入告，谓船已过成山角，在龙口将停泊一日，可以发信付邮，文虎精神为之振，乃披衣起坐，猛忆瑞俊尚居青岛，乃请春熙代书，将北来情形简

单告知瑞俊，并口占一绝附在函后。同时春熙预写一信致廉思母女，报知旅途所遇。到北京时接廉思回信，全文甚长，盛赞春熙壮游，健美无己，同时勉春熙努力读书求进。最后对疗疾一事，廉思竟调侃春熙“自讨苦吃”！遂令春熙懊恼，久不作复。据阿林谈，从上海到天津共计七百四十四曼儿（Mile 即海里），合一千三百九十公里。船过黑水洋始遇飓风，造次颠沛，船至成山角风浪渐息，已行四百五十曼儿。文虎背发病愈时，正通过渤海海峡，驶抵龙口，离天津尚余一百七十曼儿。从此尚遭遇另一种困难。此船在风浪中飘流，已超过航行定期，船行至最后二日，船上储水已罄，粮食蔬菜亦空。船长下令从货舱中取出温州桔子十数篓，分饷船员及旅客。当初船员乘客，用罐头饼干充饥，食物告罄，便只吃桔子。春熙每日挤桔子水数杯共饮充饥。因在船中饮桔水过多，以后见桔生厌，所以春熙逢人便说：“我这辈子永不吃桔子了。”

春熙与文虎抵天津紫竹林时，第二批出发同志，已齐集在码头上相候，他们已先三日抵埠，到埠后多方打听，不知文虎所乘轮船下落（当时船上还没有无线电设备），因此，先到同志大家感到一场虚惊，见面后问明情由，女同志们抱怨春熙患急性病，先行后到，劳大伙惦念。当时春熙有委屈难诉，但亦不申辩，并以目向文虎示意，悄语道：“我保证过不发脾气，阿对？”（“阿对？”是上海方言，意思是你说对不对？）

十、北方革命复兴

自一九二一年起，北方工人革命初兴，动势渐增，范围日广。至一九二二年而发扬蹈厉，如日方升，虽成败互见，但大势所趋，人所共喻。“二七”以后，中国工人运动被军阀残酷镇压，自由尽失，工人处于暗无天日军事统治下，时思恢复失去之自由，有如瞽者不忘视，矮人不忘起。中国工人厄运直到一九二五年始见转机，北方工人革命乃于此时重见曙光。

一、京东联席会议：十一月下旬，文虎到天津后，即日召集天津、唐山、开滦、山海关、丰台各地党组织负责人举行京东联席会议，参加者主要有梁朋万、韩麟符、于方舟、安幸生、李培良、李季达等。文虎在会上传达中央最近政策方针，并商讨当地各项具体组织工作。会议连续举行两昼夜，先后分别在租界两处房屋举行。会后与各方代表分别接谈，事毕始赴北京。抵达北京后，到石驸马后街会见守常，守常首先提到曹锟下野，保定狱友，均庆生还，可称“洪福齐天”。遂与出狱留京诸人见面，劫后重逢，畅谈革命见闻，其喜可知！史文彬等陷保定监狱，囚二十二个月，出狱后在北京休养四十五天，后经北方区委会重新分配工作，其余被囚工人一律恢复原任工作。

二、北方区委及其组织与分工：次日，北方区委召开全体会议，地点在东城南河沿某号。时国际代表来京，亦参加北方区委会议。在会议上由文虎报告中央工作近况，政治形势及北来任务（见前八点）等。会议进行讨论，经过时间约三日（晚间小组讨论）。参加会议者有北方区委及各城市党组书记，工会系统党团书记共三十余人。会议讨论组织问题时，决定北方区委上层组织照旧，中、下层组织扩大，把工作重心放在工人运动与国共合作方面，因决定在最近期间内充实北京、天津、郑州、开封、西安、唐山、石家庄、保定等城市工会工作及其他群众组织。留京中委在分工方面：文虎抓全北方工人运动，

守常抓国民党工作。北京以次各城市工作分别由刘伯庄、赵世炎、李季达、吴汝铭、韩麟符、于方舟、范易、黄平万等负责。当时北方区及其所属省市党组织主要成员如下：李守常（中委兼书记）、罗章龙（中委兼工委书记及铁总党团书记）、刘伯庄（北京市委书记）、赵世炎（北京市委组织部）、陈乔年（北京市委宣传部）、范鸿劼（北京区委），余略。

北京市工会党团代理书记陈为人，工作人员：刘俊、舒大贞、刘铭勋、肖鸣、于国贞、董学仁、林维翰、陈楚梗等，当时北京市工会地点在南池子小苏州胡同五号。

三、郑州铁总二代会及其新行动纲领：在京东会议及北方区全体会议后，北方党与工会工作有了一番新部署，气象为之一新。文虎此时本拟立即赴河南，但因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虎乃临时改变行程，先行赴沪参加大会工作，会毕始返郑州。一九二五年二月七日，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大会在郑州钱塘里（即二年前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旧址）举行。大会自七日开始，至十一日闭幕，全国各铁路有十五路代表五十人出席会议。大会推举罗章龙、史文彬、邓培与王荷波等九人为主席团，文虎作国际工人运动报告（包括出席德国汉堡运输会议，赤色职工国际会议及太平洋国际工会报告），史文彬作中国政治报告，王荷波作中国工会运动报告。报告毕，讨论工会宣传、组织、职工教育、工人纠察队（包括工人武装问题）等问题。通过决议十余起，选举全国铁路总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大会通过行动纲领共十条如下：（1）恢复所有曾经组织的工会。（2）整顿现有工会，建立巩固的组织基础。（3）力谋工会统一。（4）确立经济基础。（5）救济失业。（6）确保以前罢工争得之条件全部实行。（7）争取工人切身的经济利益。（8）争取集会、言论、罢工的广泛自由。（9）参加国民革命，并参加国民会议。（10）加强工会训练与教育。当时大会详情见铁总出版“二七”二周年纪念专刊。又《向导》一四五期所刊布“二七”三周年纪念追溯一年来铁路工会运动的发展（章龙作），可供参阅。

四、豫陕地区普遍建党：铁总会议召开激发了河南、陕西地区党与群众组织的向前突飞猛进。一方面建立豫陕地区党与团的组织，同时又扩大了当地工农群众组织。当时郑州党组织主要成员为：李渤海、王度、郭大陔、彭树敏、茅延祯、王春熙、廖寅生、黄春和、郭启先等。开封为范易、李求实、马景山、马玉夫等。确山为马尚德、蔡益勤等。信阳为毛作新、钱贵良、王克心等。洛阳为游泳、王中秀、戴培元、黄天白、白眉珊等。与建立河南郑州、开封等处中共党组织同时，并在陕西西安及陕北建立党与团的组织。西安中共组织主要成员

为：刘天章、武止戈、马文彦、张世兴、张景僧、屈武、刘含初、陈九鼎、黄平万、雷晋笙、吕佑乾等。陕北中共党与团组织主要成员为魏野畴、高岗、刘志丹、刘澜涛、贾拓夫、谢子长、杨明轩、李子洲、史唯然、石谦等。山西太原为：贺昌、王仲异、韩少成、杜晓、赵宗佑、郭增昌等。

五、中原天晓、民众登台：当时铁总驻在工人城市的郑州，同时发动河南及其附近地区矿山、铁路、纱厂等产业工人参加革命斗争，组织全省赤色工会。在一九二四年一月间，铁总派赴各铁路的特派员，已先后在各铁路召开各路代表会议，恢复各路工会并成立各路总工会。以铁路工人为首的经济与政治性斗争一时风起云蒸，弥漫中州。河南全省总工会遂于二月在郑州举行群众大会，宣告豫总正式成立。到会会员群众共计五万余人。会场主席均为粗布衣衫，科头跣足的工农人民。主席台悬有一联云：“六代绩沉、英雄破梦；中原天晓、民众登台。”

[注]：河南省会旧为五代与北宋都会，故称六代。

六、冯玉祥饥附饱扬：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冯玉祥倒戈后占领北京。十二月二十日攻下天津，由是国民军夺得京津二市及河北、河南两省地盘。由国民一、二、三军分据之。北京政变以前，由北方区介绍冯向苏联输诚。冯白称为泥水匠儿子，倾向共产主义。一九二五年冯开始向苏联取得军火物资援助，其运输路线经过库伦，军火运输由骆驼二千匹，汽车一百辆组成。自一九二五年四月间起至一九二六年三月止，整整一年间从苏联输入武器，分别交给国民一、二、三军接收使用。内计国民一军获得三寸口径大炮二十四座，炮弹二百四十万发。机关枪九十挺，步枪二万六千支，子弹一百五十万发。国民二军获得大炮十二座，炮弹一百二十万发，步枪三千五百支，子弹四百万发，机关枪四十挺。国民三军获得步枪三千支，子弹三百万发，机关枪五十二挺，大炮十二座，炮弹八百万发¹，迫击炮十八座，附炮弹一千八百发。据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五日冯玉祥在莫斯科亲笔借据，计开收到步枪三万一千支，子弹五千一百万发，机关枪二百二十七挺，大炮六十座，炮弹五万八千发。此外尚有军用飞机十架，铁甲车八辆等。国民军对苏联运来军械由冯玉祥实行郊迎大典，并同时迎接苏联派来军事顾问十七人，分驻各军所在地，协助国民军改进军队素质。计第一军顾问为乌斯马洛夫，参谋长西尔哥耶甫，喀尔边科。孙良诚顾问为赛福林，方振武顾问为安特尔士，马富魁顾问为洛加等（余略）。但冯玉祥后见大批军械已到手，于是对苏俄态度渐变，冯玉祥对（毛

¹ 上数行各述“炮弹二百四十万发”、“炮弹一百二十万发”、“炮弹八百万发”，疑有误。—补注

子）顾问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平日使其单独居住，与军队隔离。中共派往国民军工作人员，冯除暗中拉拢一部使为己用外，对于不接受冯拉拢的中共党员则公然排斥，不令接近国民军，甚至采取非常手段对付。冯尝向郭名忠说：“国民军对中国各政党都可讲合作，惟西披手段毒辣，最难做朋友。”郭闻言大恐，遂投冯以求自容。一九二六年春国民军全部兵力约二十五万人，占有直、热、察、绥、陕、甘、豫等。后奉直联合攻冯，冯为战略关系，是年三月十八日，国民军与三军退出北京与天津，国民二军退出河南，此时冯仍拥有庞大军力，割据自雄。一九二六年九月，冯玉祥军队共编为七军，计二十个师，合计十余万人，这便是冯玉祥后来（一九二七年）联蒋反共的基本力量，且为苏联所供给的精良武器所组成。

七、活曹操马二：冯平日熟读《三国演义》，深谙权谋，一切言行规仿孟德，军中号马二为活曹操。冯到郑后，曾经大量发行军用票，但市面不易流通，冯大窘，乃微行，偶然遇一小贩提篮卖烧饼果子，冯出军用票十元向小贩买饼，小贩无法找零，冯大怒，喝道：“原来就是你在破坏我的军用票！”即叫大刀队将小贩砍死，悬头示众。有人问冯，小贩何罪至于死，毋乃罚得太重。冯说：“这是借头政策，否则军用票就行不通了。”当时为此事曾引起罢市，冯大感狼狈，托人出面转圜了事。

八、降王长胡笠僧：国民二军军长胡景翼，字笠僧，在陕西三原时原隶属靖国军，中途投降直系。胡行径大类冯玉祥，一贯以善于倒戈著名，时于右任曾以诗嘲云：“时去难为穹寨主，时来争做降王长。”胡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进入开封，向铁总送旗匾，表示友好。胡在豫西与刘镇华、憨玉琨军作战时，要求铁总派交通队助胡作战，又由车辆厂代胡制造迫击炮弹，修理军械汽车等。胡对于工人群众组织力量，颇有认识，但毕竟不脱军阀习气，一切唯冯玉祥马首是瞻。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三日，胡手腕患疮进医院施手术，不慎毙命。

九、茅延桢被刺：国民军驻河南时期，中国南北各派军阀代表及政客等均云集郑汴，政学系李根源亦为胡笠僧座上宾。这些政客们除与国民军进行自身交易企获取本派利益外，其共同目的是反对中共与正在勃发的工人运动。冯玉祥尝对其左右说：“对付西披问题我心中无底，不劳旁人代谋，你们以后瞧着吧。”因此国民军头领与中共双方均感到貌合神离，所谓合作只是虚有其表，后来竟发生中共党员茅延桢被刺杀的事。

茅延桢，安徽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国共合作期间期派到河南国民军任联络工作，经常与俄国顾问到各军视察。茅被刺前一周，春熙从他方面获悉冯玉祥近对茅延桢与俄国顾问接触频繁，表示猜疑，

谓茅有刺探国民军军情嫌疑。文虎闻讯，立嘱茅注意，并建议茅暂时离开郑州，候查明实情后研究对策。茅坦然道：“马老二等不敢把我怎样，你放心！”正谈话间王度亦至，告文虎，春熙所云确属实情。因此文虎仍嘱茅速离郑州，且行动须十分机密，勿令对方知悉。茅勉强同意，但称尚有他事须办理，事毕即行。但当茅决定动身时，由于行踪被对方探悉，茅于赴车站时即遇刺。据目击其事者称，茅匆匆行赴车站途中，于僻静街道转角处忽遭遇二军人拦住去路，一人出盒子枪向茅射击，一弹即中要害，倒地毙命。凶手身着军服，但自摘去符号，行刺毕，袖枪扬长而去，军警不敢阻拦。事后文虎偕宫云涛到出事地点察看，并转请地方军警机关缉拿凶手。郑州警察局长摒人告文虎道：“此案案情蹊跷，凶手并未远扬，但恐怕难得归案。”言讫摇头不止。后经查明，此事实系国民军方面主使，铁总曾向冯请严惩凶手，冯阳诺，竟未理落。中共同志及工人无不义愤填膺，乃暂厝茅柩于郊外，派宫云涛经纪其丧事。又茅延祯被刺后，旋发现散兵骚扰铁总办事处，幸经纠察队制止，未肇祸。

十、王中秀等被难：洛阳为陇海路总工会所在地，河南西部重要城市。文虎一九二五年八月与王中秀同赴洛阳，重建当地党与工会组织。当时，铁总特派员游泳（天洋）、工会党团书记王中秀、洛阳市戴培元与黄天白分别负责当地工农运动，并迭次与当地军阀、地主、资本家展开激烈斗争。在茅延祯遇害后一年，一九二六年五月，王中秀、戴培元与黄天白先后被洛阳驻军残杀。（详见一九二六年七月《向导》周报，章龙所写：吊王中秀文。）

十一、孙中山北上之一幕：一九二四年十月，冯玉祥纠合胡景翼、孙岳在北京发动政变，迫曹锟下台，拥段祺瑞出任执政。孙中山乃乘机北上，同行者有汪精卫与张溥泉等。孙中山到北京后各军阀均虚与逶迤，冯玉祥独避不与孙见面，直到孙去世时为止。因冯欲独树一帜，意在孙分饷苏联军火。孙中山北上动机原思与段祺瑞谋取妥协，时段受帝国主义控制，故孙北上前绕道日本，取得日本同意。正因为这样，《向导》（八十三期）初刊布反对孙北上文章，后来中山北上已成事实，遂听其所止。孙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到达北京，次年一月病发，肝痛甚剧，困顿床褥。孙自知病重不起，乃预立遗嘱处理身后财产，有卖履分香之思，其房产等均留归其妾氏继承。当时国际代表及守常乘间向孙左右进言，孙应别立政治遗嘱，否则无以显示革命政治家风度。汪精卫乃执笔草政治遗嘱，后称为总理遗嘱。又代草致苏联电文，时孙已神昏语乱，于三月十一日签字后，次日孙即逝世。罗敬谓倘当无此一着（指政治遗嘱），孙便是白白死去，北上更毫无意义可言。当时国民党右派乘机大放厥词，谓孙中山被中共劫持，乃有此

遗嘱，实非孙本人旨意。后左、右派妥协，乃将错就错了事。孙逝世后在中央公园举行追悼会，段祺瑞推故不到，陈炯明亲挽以联云：“为英雄能杀人活人，罪首功魁，留得千秋青史在；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情私谊，全凭寸许赤心知。”

十二、石家庄与南口地区事变：文虎于三月初偕黄春秋等自郑州返至北京，路过保定、石家庄沿途下车。保定乃京汉铁路大站，为机车房所在地。城内育德中学党与团有人数较多的支部，主要成员为：王仲强、张廷瑞、张至刚、陶永立、彭桂秋、王鹤寿、王净尘、马素英、章锡琛、章锡瑗等。石家庄地处京汉与正太两路枢纽，军阀势力极为雄厚。当地党组织负责人为孙云鹏、张昆弟，会同铁总加派高克谦、傅茂公等充实石家庄工人运动阵营力量，并与当地军警展开极激烈斗争。一九二五年九月间，在斗争中高克谦同志不幸牺牲，使革命遭受重大损失。

1. 高克谦（一九〇六～一九二五），字允恭，直隶省无极县人。一九二一年入保定育德中学，加入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九二三年转学正定第七中学。一九二四年张兆丰领国民三军第三混成旅驻正定时，铁总派高克谦到石家庄铁路工会工作，他为捍卫工会组织曾与工贼刘廷元、裴乐臣发生激烈斗争。正太铁路法国总管向当地驻军奉军旅长窦联芳（李景林部）及石家庄警察厅长吕正朝进贿款七千元，窦遂捕高克谦。文虎得讯往营救，已不及。于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三日深夜，高克谦被杀害于石家庄郊外东里村，年十九岁。

一九二五年三月，文虎偕何孟雄到张家口、包头一带恢复工会组织，在京绥路对敌斗争中亦发生特派员王净尘被敌谋害事。此事发生在京绥路罢工以后，时何孟雄、张世清被交通系告讦几被逮捕，幸为工会救护脱险。半年后乃有王净尘被害事发生。

2. 王净尘（一九〇一～一九二五），直隶密云人，北京大学学生，北京社青团团员。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部员兼任京绥铁路西直门分会秘书。时工会主席为张得臣与王同乡，相处极融洽，对交通系斗争极烈，一九二五年九月被敌谋害死，年二十四岁。（其夫人马素英亦北大学生，马克思学会会员。参见劳动英烈传。）

十三、青济风云：在叙述青济风云以前，应略介绍山东方面工人革命运动的基本情况及其斗争发展的由来。

1. 山东工运基地斗争：青岛与济南乃铁路、矿山与纱厂等轻工业荟萃地区，素为北方工运重镇。青岛日本纺织工业集中在四方及其附近港口，计有八个工厂，中国资本纺织业有华新厂等。此外尚有制油、面粉、火柴等工厂，工人约计十万人。在一九二一年间，山东境内已有津浦与胶济铁路工会组织。在津浦方面，一九二二年八月济南大槐

树机车厂工人一千余名，为了要求发给全部工薪及以前积欠薪水，举行罢工一次。组织罢工者为党员李宝成与李广益等。罢工经过一星期完全胜利，厂方均付出金薪，欠薪亦清。但是八月二十七日，路局交通系设计捕去大厂工人党员薛永顺、白兴诚、张吉平及书记部工作人员宋天寿等，送济南督署军法处关押。当经书记部派人设法营救，乃于半月后全部释放。在青岛纱厂方面，一九二四年北方区协同山东省委，开始在青岛纱厂地区阎家村开办工人子弟学校，最先派陆伯俊任教员，成立华新纱厂工会小组，是年夏天开始作经济斗争，获得初步胜利。陆伯俊介绍李德根、阎昌举、阎学春等成立党团组织，后陆伯俊在济南被害，由王星五继续做纱厂工会工作。李德根被捕后在青岛监狱逝世。但是自尔以后，青济工会仍在地下环境下坚持不懈。

2. 联合行动：青济风云始于胶济铁路与青岛纱厂工人的联合行动。先是一九二五年二月八日，胶济铁路工会在铁总特派员王元璋、伦克忠为路局开除圣诞会会员及恢复工会事，举行罢工。经过十八天，结果承认五条件胜利复工，其主要条件为加薪释放会员、恢复工会等。继此而起者有同年四月十九日至五月十日的青岛纱厂同盟罢工，结果取得九个条件胜利复工。上述两次斗争可说是联合行动的先河。一九二五年初，文虎受中央局命前往山东、青岛、济南等地，同行者有卢夫旦与王春熙等。到济南后即召集山东省委、济南与青岛地委扩大会议。当时，济南、青岛中共党委主要成员有王俊瑞（在病中）、李味农、王元璋、王复元、王翔千、王哲、王崇五、杜华梓、李渤海、卢夫旦、刘俊才、孙秀峰、魏福中、伦克忠、李宝成、韩文玉、郭恒祥、李青山、李青士等。在山东扩大会议上广泛讨论发动全省反日帝、反资本斗争等问题，当通过决议组织山东全省铁路与纱厂联合行动，具体决定是六月间实行胶济铁路全路大罢工与纱厂同盟罢工，立即组织联合罢工指挥机构，由中委、省市书记及委员亲身参加。会毕文虎召集市委商订详细执行罢工方案，并联络青岛大学学生会组织罢工后援会，更与新闻界通讯社记者胡信之等交谈有关斗争中宣传鼓动问题，一切部署竣事后立即发动。时山东书记王瑞俊方患结核病，离职休养，王寄信文虎，文虎乃同春熙到青岛汇泉医院探视瑞俊病，见其病情严重，忧思如焚，不幸于七月一日竟逝世。时山东全省联合行动正在开始，北方区守常来信云：天津有要务嘱文虎立即返京。文虎见山东局势紧张，迟迟不欲行，并集合味农等计议当前局势，味农说：“就目前情况言，山东省委组织人力颇足，只要按预定计划与方案做去，保证斗争可以无虞，北京、天津既有要事处理，文虎可速归。”因此，文虎遂专程返天津。

十四、意外挫折：文虎离鲁后，青岛、济南联合行动一切按预定

计进行，初尚顺利，但最后却遇到意外挫败，并发生重大伤亡。当时首先是胶济铁路举行斗争，结果扩大了经济胜利。在四方纱厂方面，按原定计划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九日上午十时青岛纱厂举行同盟大罢工，罢工大队游行示威时，在四方被张宗昌军队及日厂武装警察开枪射击，当场死工人七名，重伤二十余名，当即捕去李味农与胡信之下狱。旋日本纱厂主以重赂使张宗昌杀李、胡二人以立威，纱厂工潮暂被压平。

1. 李味农：李味农，安徽怀宁人，一九一九年留法勤工俭学生，后转赴莫斯科东方大学，一九二二年归国后，被派到山东工作，兼铁总胶济路特派员。味农不矜不伐，谦虚谨慎，到鲁后与瑞俊共事，相处甚洽，其作法着重青济工会基本组织与训练，工会实力大为增高。时彭述之、王若飞等正企图发动党内斗争，以扩张己派势力，到处游说他入伙。据味农说，若飞曾向他说过：“仲甫、守常、文虎、平山、中夏均北大旧人，他们无形中自成一派，我们也不能毫无组织，否则一定见制于人。”味农不为所动，王遂与味农反目，称味农不识抬举。但味农守正不阿，努力向前。当味农罹难消息到上海时，中央正在开会，仲甫闻讯，宣布停止开会默哀，党内知与不知，无不恻悼，谓东鲁革命遽失长城云。山东党自一九三一年四中全会以后内斗不息，有破坏而无建设，至一九三三年组织归于消灭。

2. 胡信之：胡信之为北方劳动通讯社兼青岛公民报记者，在青岛纱厂同盟罢工时采访新闻被捕。文虎在淄博时据工人谈张宗昌受日本领事指使为保护青岛日人工厂利益起见，历次缉拿外省来鲁煽动工潮的学生，久不得手。某次有一南方学生来济南游历，在城外遇警探盘问，学生御深度近视眼镜，惊惶失措，回身急跑，警探在后厉声呼喊令其止步，彼仍不理，警探向其开枪，立负伤倒地，被抬往医院，不治身死。警探乃以拿获乱党上报了案。此事旋为胡信之所闻，乃据实报导，并谴责张宗昌残民以逞种种罪恶，刊诸京、沪某报，张遂对胡怀恨，隐伏杀机，至是藉口煽动工潮，将胡杀害。

3. 伦克忠：伦克忠，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青岛特派员，为山东中共党部后起之秀。伦克忠山东章丘人，胶济铁路四方车站大厂工人，幼年失学，但登台演讲声震四座，极具鼓动力量。克忠每次在罢工斗争中必英勇向前，人戏称为吕温侯。青岛纱厂惨案发生后，克忠率胶济路全厂工人二千余人组织游行示威，沿途讲演，要求惩办杀人凶手。游行队伍通过聊城路及市场一、二、三路后，整队归厂，张宗昌闻讯，乃于六月二十六日派兵一营以武力封闭胶济铁路总工会，捕去驻会办事人员。胶济铁路总工会乃召集紧急会议，推举伦克忠与韩文玉赴北京向铁总报告。七月伦、韩二人到达北京，住铁总招待所，时北方区

委、铁路总工会、北京市工会、北京学联等团体为六月青岛大罢工事，于一九二五年八月十六日在北京天安门召开驱逐鲁督张宗昌群众大会，到会学生、工人五万人。伦克忠登台演讲，历数军阀张宗昌武力专政、残害自由、屠杀善良、禁锢工人、摧残工会十大罪状，听众大为感动。大会通过决议请北京政府罢免张宗昌，会后并游行示威。时有山东省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处长某，乃将天安门大会目击情况报告张宗昌，张得报后大悲恨，必欲得伦克忠而甘心，乃派副官张斌即张黑子率兵一排到北京，会同北京军警捕拿天安门大会主犯。某日上午，文虎、春熙、克忠、文玉四人正在大中公寓（位于东皇城根迤北，地近沙滩北大第一院，该公寓有房数十间，住客大部为北大男、女学生。听第一院钟声起落，上课、下课憧憧往来不绝），文虎与克忠、文玉同谈话，商讨山东有关问题，忽见春熙仓皇从外入，低声说道：“胡同外不静，速散会。”文虎乃令克忠、文玉山后门出去先行（因他二人非学生），自与春熙殿后，迨克忠、文玉出去时，春熙忽闻外面吵吵嚷嚷声重，乃引文虎至公寓偏院北大另一同学住室暂避。适同学外出上课，侍役因识春熙日常至该室谈话，故开门延客入座。坐定，即有军人自外入院察巡看。文虎伏案阅书，春熙坐床上织毛衣，了无他异，遂未加查问而去。遯者既去，春熙恐其再至，即促文虎起身快避，二人乃各挟书本从偏院角门离开公寓向沙滩红楼课堂走去。后始闻知克忠与文玉离大中公寓后行方数步，即被张黑子上前识出，将二人捕去并留一队军警转身进公寓内搜索，但无所获。克忠与文玉既被捕，即解往济南军法处由张宗昌亲讯，严诘北京方面主使人，克忠破口大骂，二人遂被投狱中。此际北方区动员各公法团纷纷电鲁营救，张益怒。克忠既下狱，张宗昌副官某与克忠有乡谊，思营救其出险，因向张宗昌进言：“伦克忠为一工人，能到北京天安门纠集几万人大会反对督军，其人才勇可知，督军如果使克忠为己用，则可以逢凶化吉。”张意为动，令某向克忠游说，克忠答：“你的意思我很明白，不过督军衙门是容不下我这个工人的。我是主张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军阀统治，组织工人自由国家的。”某闻克忠言，知不可强，据以回报，张遂于旧历中秋节前下令处克忠极刑。克忠从容就义，被害时年二十七岁。文玉被提审时，张见其年幼（文玉时年十六岁，外貌不过十四五岁），乃处徒刑三年。克忠被害后，铁总派人赴鲁料理丧事，葬于四方车站附近，后由四方工会在被难地点立碑以资纪念。张宗昌后于一九二六年在北宁路被刺丧命。

与伦克忠先后被害者有宫以明、房沅、林培武与张怀清。四方纠察队长赵石可亦被捕，后判徒刑，刑满释出。

4. 王瑞俊：在一九二五年北方革命重光中，北方党同志在战斗阵

地牺牲外，尚有不少同志积劳殒命或因公致死，使党蒙受重大损失，如王瑞俊即其著者。

王瑞俊（一八九八～一九二五），字煊梅，亦称尽美。山东莒县北杏村人。幼聪慧过人，入北杏村小学，品行成绩优异。一九一八年考入济南省立一师，好学不倦，誓为良师。越三年，即一九二一年五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时，瑞俊到京参加，后即回济南成立学会，学会举行多次讲演会讨论中国革命新方向问题。瑞俊写革命之真谛一文，内有云：“我们山东是军阀产生的地方，枪炮如林，军官如雨，枪炮多则造成对内屠杀，造成天灾人祸，社会贫穷，万恶渊源都悉由此起。好战的军阀，天生是专制独裁的胚子，政治黑暗与专制是互相影响的，民主政治与军阀的枪杆子是不两立的。社会革命的起码要求就是推翻武力政治，争取近代文明国家人民所应享受的自由平等的权利，即无任何剥削形式的劳动自由，无任何形式限制的居住自由，言论出版自由，集会与罢工自由，因为这些自由是人类尊严所托，同时是军阀统治下最不容许的，所以我们要起来从统治者手中夺回一切人权与自由。我们的手段是用生产人民的团结力量推翻军人统治，同时要以生产人民为实体（不是假藉劳动人民的名义），组织没有非生产人民参加的劳动民主政治，一劳永逸地实现真正的民主，使武人专政根绝，不再为祸患于中国。同时使一切假藉民主实行专政的非劳动人民的政治无由篡夺与得逞。”（见《工人周刊》五期。）

济南马克思学会有会员五十余人，受瑞俊思想言论影响甚深。一九二一年六月，瑞俊与恩铭赴上海参加中共一代会，在会上附议北方代表意见，党应以全力发展工人运动。回济南后，成立山东劳动组合书记部。一九二二年一月，瑞俊出席莫斯科远东会议。一九二二年十月，中央决定山东劳动组合书记部合并于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调瑞俊任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副主任兼秘书，后又兼京奉铁路特派员，驻唐山、山海关工作。自是以后，瑞俊与文虎一九二二年间先后指挥京奉路、开滦五矿大罢工。一九二三年京汉铁路大罢工前后，瑞俊均在书记部积极参加工作，积劳致病（肺结核），于一九二四年回济南作短期休养。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五月间，瑞俊在山东主持党及工会运动，主编《晨钟》报及山东《劳动周刊》，病势渐沉重，缠绵至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在青岛病逝，年二十七岁，计参加革命前后历五年之久。

瑞俊才华俊秀，革命出于至诚，宁静有远谋，克敌致果，守正不阿，文学修养深湛，尤其余事，兹就其生平重要行谊略书数事。瑞俊工作认真，生活不苟，明斋称其为鲁男子，乃革命中上上人物。有人问他孰为下流人物？明斋答：“以‘革命’为敲门砖，欺枉民意，便

是下流人物。”众称杨为知人。当孙秀峰闻李味农曾将彭述之等在党内闹小帮派问题的事转告瑞俊时，瑞俊聆悉大愠，告味农说：“这种行为是中国军阀、官僚、交通系、国民党的余孽，我们应该斥责他们，千万不能附和他们，否则亡党之祸就在眼前，那时革命也就要衰落下去。”味农闻言，肃然起敬，遂不附和彭等所为，彭气为之夺。

瑞俊病重时，以书驰告文虎，文虎乃专赴青岛省视其病于汇泉医院。瑞俊见文虎面有喜色，但自知病将不起。文虎见瑞俊形销骨立，悲怀难抑。瑞俊道：“我们的事业虽然艰苦，但这几年来的方向总算对准目标进行，虽劳而有获，所以也就可告无愧于劳动人民。今后要注意的还是一心一意扩大工人组织力量，一切其它手段都不必理睬。”又说：“虎兄，我们书记部人大都怀有政治洁癖，易为小人所乘，今后可能要付出超革命以上的代价，成败之事固难以定论，但民主自由是革命归宿，只应尽其在我而已。……”时胶济铁路与青岛纱厂同盟罢工事正亟，瑞俊知文虎不能久留，因语文虎道：“我病中能见兄一面，于愿已足，兄不宜久留，免同志久候。”文虎遂匆匆与瑞俊诀别，一周后遂逝世。瑞俊身后，党与工会派人经纪其丧事，并开追悼会以致哀思，各工会代表自四方云集北京，文虎为诗以谏之。¹

王瑞俊²

(一九二五年瑞俊病逝青岛汇泉医院)

忆昔书记部，东鲁萃群英。
王门三杰士，俊才与恩铭。
五君皆魁秀，各领方面军。
岩岩泰山峻，泱泱黄海云。
青齐究秦间，风起复云蒸。
方圆亘千里，车马久经循。
攻守大槐树，转战皇姑屯。
罢工曾卧辙，布撒竞飞文。
凡此诸战役，与君同经纶。
君绩愈益重，君体愈益轻。
积劳染沉疴，心力交相侵。
予闻君病厄，一再临海滨。

1 自“王瑞俊(1898~1925)”起至“文虎为诗以谏之”，原作一段，征得供稿者同意分为四段。—补注

2 原文无谏诗，此根据罗自编《风云集》抄本补录，并附原诗解。诗与岳麓书社1987年版《椿园诗草》所载略异。—补注

访君汇泉院，见君神志清。
遗语不及私，肝胆为摧崩。
医术诚不竞，百药竟无灵。
夺我党之良，昊天何不仁。
叹息斯人去，群工泪为倾。
此恨何时已，沧海欲生尘。

解：王门三杰指瑞俊、像千、元章。俊才即刘俊才，恩铭即邓恩铭。大槐树为津浦铁路济南大厂所在地，皇姑屯为京奉铁路关外大厂所在地。

十五、津沽工潮：是年六月中，文虎自青岛来到天津，住英租界教堂后张宅（张溥泉之弟张毅住宅，张毅时任师长驻防漳州，经其介绍暂寓张宅），与天津市委计划发动纱厂罢工斗争事。当时天津市委地址在张庄大桥义庆里十七号，其主要成员（包括一九二五年至二六年）为：郝文廷、李季达、卢台亭（纱厂工会）、于国楨、郭隆真（女）、李培良、江浩（竹元）、李永声（锡九）、吴汝铭、辛璞田、李希逸、李志新（印刷工会）、张兆丰、安幸生（工运）、于方舟、叶善枝、粟泽、卢妙根、韩麟符（军运）、解学海（农运）、杨春林（农运）、杨自立（农运）等。时天津市委以全力组织纱厂罢工并计划联合海员、铁路等企业共同行动，结果，裕大纱厂等企业于七月实现同盟罢工，为了对抗镇压，群众采取直接行动，反抗资本进攻，相持数周，双方均遭受了重大损失，死伤十余人。

十六、河南焦作矿山八个月大罢工的重大胜利：当文虎驻郑州时，用全力发动河南省境内工农群众成立革命组织，主要为成立河南省总工会与豫西、北、东、南各县农民协会，红枪会与大刀会。中州风云，剑气升腾，飞扬振奋，路矿与城市产业工人斗争，互相支援，此伏彼兴，扶摇直上！

当斗争面临高潮的时刻，文虎偕荷波曾亲自组织以铁路、矿山、新乡、卫辉、郑州、洛阳等处纱厂工人为主体的共同斗争，其中以焦作煤矿联合大罢工，规模宏伟，波澜壮阔，自六月至翌年一月间，前后坚持达八个月之久。焦作矿山工会罢工指挥部纠察队曾占领福公司办公大楼，控制全区矿山及道清铁路，迫使资方同意工会方面提出主要要求，按等增加工资，改善工人生活等。由劳资双方代表（工会代表为吴光荣、冯金堂、龚一清等），举行对等会议，签订二十二条，胜利结束罢工。文虎于签订该项条约后始离开新乡北返。又在此次矿工人大斗争时，当时随文虎到矿山工作的同志有吴光荣、张兆淮、张隐韬（河北大兴）、王忠秀（河北保定）、马尚德（河南确山）、

张景曾（陕西韩城）等十余人，并派遣工作人员到安阳六合沟采取联合行动。唐山煤矿、开滦矿区工会亦同时派工作队到豫协助一切，成立后援会，给予人力物力，支援焦作大罢工，取得相当成就，并补发罢工期内工资。

焦作矿山罢工的胜利，使福公司受到重大损失。当时北方区委认为：“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但一九二六年罢工结束后，工作干部罗士威、吴光荣等被当地军阀谋害。

按：关于焦作矿山罢工事件，近代史及中共党史文件均无详记，本文除著者亲历所纪外，详情可参考福公司档案。

十一、北伐筹备会议

一九二六年六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广州召开北伐筹备会议。这次会议中共中央文献又称为特别会议，主旨是讨论与北伐有关各项重大政治军事决策问题。作出决定后，交付国共联席会议，分别实施。后来有关北伐策略均循此项原则进行。出席会议成员：有中共中央委员文虎，苏联政府代表兼高等顾问鲍罗廷，军事顾问布留尔，及苏联海军局长◇◇，广东省委书记陈延年，此外省委◇◇◇以及其他列席人员等共十余人。

在此次会议以前，中共中央北方区及广东区、各省委等先后开始征集有关资料，并作了长期研究，因此，在会议上提供了一些系统性资料，并附有关的图表与说明书等。因此会议进行，颇为顺利。会议开始时由中委、国际代表、苏联顾问、广东省委书记分别作报告，然后进行讨论。

会议首先认为，北伐是确立摧毁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独裁统治的重大决策。会议规定北伐工作按客观实际情况分期进行，大约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出师长江，占领武汉、南京、上海、福州、杭州、安庆、九江等重要城市；第二个阶段出兵武胜关与江北，占领陇海沿线郑州、开封、徐州、西安、洛阳等城市；第三个阶段出师河北，占领济南、北京、天津、太原、东北、张家口等城市。估计前后需要经历一年多的时间。

会议首先讨论敌我双方力量与形势，根据双方物质条件、兵员人数的统计数字，大致说来，当时北方军阀所占地区广大，人力、物力、财政、军储方面均占有优势。一九二五年间，北洋军阀（以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为主）拥兵共约七十余万人，大炮一千余尊，机关枪一千五百至八百挺，飞机三百余架，其中奉系有陆军一十八万（张作霖十一万，张宗昌七万），直系吴佩孚三十五万人，孙传芳二十三万

人。同时在武器生产方面，据一九二六年初调查统计：北方能自行生产武器工厂，有奉天、太原、巩县、德州等兵工厂，其中以奉天兵工厂规模较大，能生产步枪、机枪、各种大炮、高射炮、绿（氯）气炮、防毒面具等。该厂每年能生产大炮（山炮、野炮、重炮）一百五十尊，炮弹二十万发；步枪六万支，机枪一千挺。太原兵工厂能生产步枪二万五千支，冲锋枪、山炮、臼炮均能制造。河南巩县兵工厂每年制造步枪五千支与炮弹。长江流域有上海高昌庙兵工厂，每年生产七五山炮八座，机枪三十一挺，弹三百万发。南京金陵兵工厂，每月能生产机枪三十挺，弹药八十万发。湖北汉阳兵工厂，每月生产步枪二百五十支，弹药称足。以上合计北洋军阀所辖区域兵工厂每年能生产步枪约八、九万支，机关枪二、三千挺，兵员扩充有极大后备力量。当时广东政府动员参加北伐军队不过五万五千人，其后方之广州石井兵工厂，每月能生产步枪九百支，子弹一百万发。湘桂各省修械所亦能生产少量步枪与弹药。（以上见北方区文虎报告。）

在上述南北兵员、武器条件优劣悬殊情况下，北伐作战作了以下估计：敌方孙传芳、吴佩孚互相矛盾，后方又受奉系牵制，不能全部投入战斗，更因占地广阔，工农群众威胁，调动迟缓，不能随时迅速集中。第一路敌军吴佩孚军驻两湖约十万人，黄河南北亦十万人，我军从湖南急速进军得民众力量响应，实行中心突破，则吴军全部必然瓦解，吴将北逃无路。孙传芳军二十万，分布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四省，处于三面受敌地位，南昌攻下，彼决不能守住江、浙，结果惟有渡江北逃。孙吴既倒，晋阎、奉张必难幸存，其他军阀亦惟有附南方。这是会议初步估计。

会议更从广泛政治角度分析，北伐战争包含着以帝国主义、中国军阀官僚与中国革命政党与人民间几个主要阵容的斗争。当前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官僚的力量表面上是颇为强大，中国新兴革命力量看来是比较弱小的，但这只是相对而非绝对的，它是正在转展变化之中。这是会议上一致肯定北伐战争的重大前提，根据这个前提进一步作成以下的政治分析：具体说来，各帝国主义间是互相勾结又互相矛盾的，彼此间为了争夺势力范围和权益是明争暗斗，漫无休止的；还有各个帝国主义本国内部，由于阶级斗争与政党内争，也不免意见分歧，造成对外政策的不一致（如目前英国保守党与工党的争执）；至于中国南北各军阀官僚政治集团的情况，也大同小异，既互相支援，仇视革命，同时又互争地盘，互争雄长，勾心斗角，各自为政。由此可见对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来说，敌方的各种消极因素，实际发生互相抵消的作用。我军如果运用适当，决策合于机宜，采取伐交伐谋，批亢捣虚，便可以寡击众，以弱敌强，实行三路突破，完成全部北伐工作。

关于帝国主义军舰大炮问题，会议进行辩论，讨论范围牵涉颇广。如所周知，由于从近世纪二百年来，国际帝国主义占有多数军事基地，运用海陆军队前后夷灭了数十个亚洲、非洲国家。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不少人对帝国主义威力，远程大炮，余悸犹存。远事不说，如上年孙中山在广州，当商团武装叛乱时，英帝国政府曾向广州白鹅潭集中军舰，炮位指向永丰舰。当时孙向人说：“我们对英舰绝无抵抗力，只要几分钟，英舰便能把大本营、永丰舰、黄埔军校捣得粉碎！”因此孙遂接受调解，发还陈廉伯枪械。这是前不久发生的事情，可以说说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所引起的破坏作用。这次北伐出征，首先是进入长江流域，长江流域一向是国际帝国主义出没地区，特别是英国势力范围，大不列颠殖民主义的生命线。因此，帝国主义决不会让革命政权在长江流域和平成长起来。话虽如此，但这只是一种片面不全的说法。从会议上前所进行的一般性辩论，已经可以断定帝国主义在强大革命攻势之前，是会渐渐趋向瓦解的，最后必然成为强弩之末。这里最重要的关键问题，就是启发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智慧勇敢与革命组织问题。从各民族革命历史发展考察，人民革命的组织力量是具有超级的政治动势，是不可估计的力量。同时在目前战争局势方面更起着直接的决定的作用。因此必须集中注意发挥群众革命组织力量。据不完全统计，现今全国范围内有组织的产业工会会员已超过一百五十万以上，全国农民协会组织已迅速发动，不下百余万人，革命学生及中层市民阶级组织亦在广泛动员发展中。事实表明，当前革命阵营工农学生群众组织力量确已凌驾敌方之上，而成为军阀帝国主义的劲敌。

会议根据当前实际情况，决定北伐军分三路出征，以迅速行动直捣军阀中坚阵地。（一）西路从广东北江出发，由韶关进入湖南直捣武汉。如此可以进战退守，建立坚强的前进革命阵地。（二）中路越大庾岭攻取赣州、吉安，直下南昌、九江，到达长江南岸。（三）东路经过闽浙二省占领江苏、上海与南京。

会议考虑到上述各路敌我形势与双方力量，互不均衡，因此决定将中共所属兵力，主动攻坚，直捣武汉。武汉既下，便可以推动东南，影响北方及中国全局。这是北伐会议的主要精神，也就是以后三次北伐的全面布局。

会议结束后，将决议交由国共双方中央提出通过实施，以后军政部署原则悉照方案办理，作为基本文件。

[注1]：本文系据一九二六年文虎向中央会议所作报告，报告原文附录会议参考资料全份从略。

[注2]：关于讨论三路出兵、统率调配等军事问题，在会议上原有分歧意见，但当时中共军力不足，颇有顾此失彼之虞，所以后来形成尾大不掉现象，此乃失策之一。

十二、广州访问记

一九二六年三月中旬，文虎同韩麟符从张家口回到北京，与守常见面，时在座有几位工人，谈论赴广州出席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事。守常宣称：“昨接上海中央来信，决定五一节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北方代表名额定为五十名，由北方区委会同各产业工会决定人选，并由老史与文虎率北方铁路、矿山及京、津、郑等城市市工会代表团，前往广州出席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文虎沉吟道：“此间事情正忙，请老史领代表团去吧！”守常说：“开会之外尚有更重要的事，还是同去走一遭。”文虎无奈，遂准备南行，并决定北方代表第一批先行，由史文彬领队。文虎乘车于四月下旬抵沪。文虎抵上海后，往中央参加会议，商议与广州劳大有关诸问题。仲甫忽语文虎道：“此次兄赴粤参加大会，只是附带工作，主要任务是向广东省委详细了解国共合作真实情况和困难，并多同延年谈谈究竟有哪些问题存在？因为上海、广东天各一方，平日电讯往还，语多简略，且过去无适当的人能通盘认识合作问题症结，所以你此番应以全力完成这个工作，并设法多找毛子交换意见，同时广泛收集其他同志言论，整理后带回上海。并且要快去速回，在广州勿多耽搁时间。”文虎聆言，始恍然于守常临行前所说另外有事情要做的语意所在。同时并出席北伐筹备会议。

一、涨海风涛：工会代表分批乘轮赴粤，时与文虎同船者有王亚璋（女）、童昌荣、项英、林贞（女）、林育南及上海工人代表戴起甲、瞿素珍（女）等二十余人。五月天气，船小客挤，轮中郁热，轮船过台湾海峡时风浪极大，幸文虎数经航海，惯历风涛，乃静卧轮舱中，藉息数月来风尘劳顿之躯。文虎与昌荣对榻而卧，漫谈以解闷。昌荣来自武昌，询文虎北方情况甚详，并问近从何处来沪。文虎告以方从包头、张家口回北京。昌荣闻言笑道：“老兄征尘不息，此番去

粤，正如古人所谓：朝驰紫塞雁门，暮泛苍梧涨海。”文虎答：“塞外驼马尚可驾驭，海上石尤却难驯服。”育南问：“何以见得？”文虎因将去岁黄海舟中所遇告之，昌荣道：“此事奇险，在人生旅途上，实在是可遇而不可求。”林贞听罢喟然叹息道：“我辈长年累月坐在缫丝车间，蒸汽沸腾如处雾中（按：林为丝厂女工，时称湖丝阿姐），今日第一次航行大海，始看到天地开阔气象，虽然遇到大风大浪，却长了不少见识。”大家促膝斗室中，剧谈杂以谈谐，不知不觉船便到汕头停泊，从翌日起风平浪静，海不扬波，平安地结束了一千七百公里的航程，到达广州。

二、管东渠：劳动大会于五月一日开始，七日闭幕，大部工作均由省工会负责人苏、史等主持，文虎除任大会党团书记工作外，其余时间均用以访问省委、国际代表以及各方负责同志，进行谈话。文虎在广州停留约一月多，住在管东渠寓（即广东省委代名），周谔博访，略志其概要如次：当时广州为省港罢工策源地，兼为国共合作中心所在，中共中央调配数以百计的工人运动战线干部及党务政治、军事人员充实广东省委机构，而以陈延年主持管东渠全局。

三、政治黑旋风：延年初归国时，奉父命访文虎于中央工委办公室，表示愿到北方做工人运动，因此原定派延年至北方区委工作，后因广州方面需要人孔亟，临时改派刘伯庄去北方，任延年为广东区委书记。当时广东区委全部委员十二人，主要负责人：组织穆青，宣传任卓宣，工委刘尔崧，军委杨殷，农委彭湃，妇委江香珠，少共书记李求实，省港罢工党团书记邓中夏等。延年容貌黝黑，体质顽健，智勇深沉，短于言词，但能文章，操守极严，正直不挠，酷肖乃父。延年幼承家学，受有极严格的教育，尝书“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于座右以自励。少年时代读“互助论”，认无政府主义乃淑世息争，导人类于太平盛世的福音，乃赴法从事工读，实践“泛劳动”理论。一九二二年受勤工俭学失败刺激，乃翻然改图，赴东方大学学习，一年后始返国。当延年信仰无政府主义时，与其父政治意见分歧，长久不通讯息，至是始复归一致。延年归国后在工作中奋勇直前，不畏强御，故时人称其行谊有似黑旋风。同时另有些献媚之徒恭维延年，称延年为南粤王，事为延年所闻，笑云：“黑旋风尚无伤大雅，南粤王尊号真是太糟糕，不敢当！”

四、剥笋策略：广东省委开会时，中央委员及国际代表经常参加会议，当时国共合作在继续发展中，党的政策在筹备北伐与反击帝国主义双管齐下。在处理国共合作过程中经常必须研究对策，以推动两党合作向前迈进。这里中共首先就应该研究国共合作的基本策略问题：广州中共方面（包括国际代表及顾问在内），经常议计对国共合作的

重要策略问题。自当前形势观察，国共间不能长期相安无事，既属双方共喻之事，当时中共中央主要对策是对国民党采取“左提右抑”更迭前进办法。如最初抬孙中山以抑制其他右派分子，随后提拔蒋介石以抑制胡汉民，最后利用汪精卫以反蒋，此种政策鲍罗廷称之为剥笋政策，从表及里，层层剥脱，最后皮尽仅余笋心，与中共合为一体，便是水到渠成。后来鲍罗廷随北伐军到达武汉后，仍向湖北省委反复阐明此项政策。简言之：是采取扩大左派，批评中派，剥离右派。当时武汉省委秘书某概括其旨意综合为下列几句话，即对敌党应采取内溃之若鱼烂（剥离政策），外撼之若土崩（瓦解政策），小犯之若蜗剪（蚕食政策），大图之若鲸吞（合并政策），积势既厚，自然水到渠成。但施行剥笋政策必以下述前提为根据，即中共本身须保有提左抑右的实力，同时使不断新生的左派有力克制右派。如此，才能保证左派力量不断生长壮大，右派力量逐渐瓦解消沉；否则左派不断右倾，右派势力逐渐增加，终必压倒左派，如此剥笋政策最后必致落空。因此运用之妙，存乎其人，并须防止敌方亦仿此策略以伐吾党，方为上策。

五、军事北伐与政治南伐：在积极部署北伐时，广东省委常委谈军事北伐、政治南伐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含义是有两方面。其一，当主力北伐，后方成为革命半真空地带，桂系军阀乘机窃发，夺取两广，实行反共，此是政治南伐一种形式。其二，当北伐军到达长江流域，蒋勾结当地或北方军阀，随时可以放弃革命政纲，走向反共的道路上。当时中共党内不少人均已预见及此，认蒋居心叵测，处心积虑以谋颠覆革命政权。加上北方军阀冯玉祥与蒋介石勾结，狼狽为奸的可能性更大。上述两种意见虽属事先估计，但后来遂变成事实，政治南伐，革命遂不免中途创败。当三月二十日事变时，中共对蒋介石其所以举棋不定，因舍蒋外尚未培养出来新左派，所以直到北伐军到达武汉，才采取与蒋决裂政策，但又未继续进一步坚决打击蒋，反而养痍遗患，使其坐大，最后遂至不堪收拾。如果一九二六年间开始正视此种演变倾向，加以预防，则后来变化尚不至完全被动，听其所止。由于三月二十日事变，时陈延年曾表示不应步步退让，助长敌氛，主张适当反击，以销隐患，并严厉斥责附和蒋为恶者的错误。但当时国际方面却不赞成，认为时机尚未成熟，目前应对国民党加强团结。据此，当时外间遂有广东路线的传说。文虎到广州时，延年向文虎亲述己见，并请转告中央。但此时中央认为成事不说，未十分重视！

六、省港罢工一瞥：中夏自放弃上海大学教职以后，开始以全部时间精力投身工人运动，自到广东以后一心为工会工作，省港罢工即其精心杰作。中夏为省港罢工委员会党团书记，因此他是实际领导省

港罢工的主要人。省委会开会时，中夏、文虎均在座，延年居间说道：“你们久不见面。但广州中夏，已非吴下阿蒙。”中夏情不自禁地说道：“我到广州后已全心全意做工人运动，自觉生活另有一番境界。”省委会毕，中夏约文虎到省委罢委会去参观。大家一同乘车到惠州会馆去。省港罢工始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九日，罢工工人约二十万人，连家属亦称二十五万人，每工会会员五十人选代表一名，共选出代表四百名，组织工人代表会议，由代表会议选举执行委员十三人，组成省港罢工委员会，作为最高指挥机关。其委员如下：苏兆征（正委员长）、何耀全、曾子严（副委员长）、李森（启汉）（干事局长）、罗殊、陈权、徐成章（纠察队长）、黄金沅、杨始开（秘书长）、何来（财务）、谭泽华、徐公侠、林昌炽（三人分任罢委会法庭庭长及审判官）。此外邓中夏（顾问）、蓝业裕（《工人之路》主编），为聘任职。中夏、兆征首先引导文虎参观工人宿舍、食堂、纠察队，继至法庭参观审讯经济犯案件。时法庭庭长曹福松（原为谭泽华，四月间因渎职撤换）办案迅速，公正，作风正派，毋枉毋纵。随赴东园参观劳动学院，文虎向师生作讲演（题为“工人革命”），又转永汉北路参观《工人之路》，由蓝业裕（主编）、谭其英（副编）集合全体工作人员举行座谈。某天，省港罢委会特别举行全体会议，欢迎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团。苏兆征致欢迎词，中夏演说，大意是：自开滦、海员大罢工以来，中国产业工人不断与英帝国主义周旋，先后取得胜利。这次省港罢工所以能够向世界最强大的海军国家挑战，一方面是形势所迫，义不容已，同时我们也是继续朝向工人反英斗争的路前进！过去红毛鬼连次在工人面前败北，这回也决不会放松，只有奋勇直前，才能使敌人败下阵去。据省港罢工委员会估计，这次罢工使香港政府平均每日损失四百万港元，另据英人密尔斯 L. A. Mills 云：每日损失三十万磅（以四百八十日合计一四四百万磅）。英帝国主义如被击败，然后出师北伐，可无后顾之忧。散会后出门时，徐成章与邓发正待出发查哨，中夏对文虎说：“我们同去看看如何？”文虎同意，遂同车出发。在车中邓发介绍罢工封锁线自潮汕到高雷长达千里，罢工纠察队二千名按照班（每班十二人）、小队、支队、总队（各以三队递进）分级编队，隶属罢委会指挥，在沿海封锁线上分区布防，检查客货进出防止奸人破坏，海上有巡逻艇二艘，配有钢炮、机关枪等缉捕武装走私。汽车沿近郊封锁线查看，只见沿线安静，秩序整齐严肃，纠察队并派人骑船参加海上封锁工作。

七、西园谈话：某日延年、代英来访文虎，约他至西园谈话，代英对于黄埔军校蒋系潜在活动知之甚悉，同往者有求实、楚女、存斋等。首由代英将最近国共双方在黄埔明暗斗争问题全面加以介绍，继

作详细分析，及敌我力量比较，最后代英概括为两句话：“迟则失机，急则生变。”但楚女殊不谓然。正议论间，时语罕亦从外至，加入座谈。高与肖平日均为反蒋最力之人，高称蒋为旧社会码头官一流人。肖对蒋为人奸诈、密与右派往来设谋，知之甚悉，力言向党中央建议采取快刀斩乱麻手段，否则滋蔓难图，必贻革命事业以无穷之戚。罕明白提出风雷震荡以起蛰（唤醒党内注意），强弓硬弩以威敌（对蒋不惜一战），态度激昂，声泪俱下。言犹未毕，楚女抗声道：“蒋介石这家伙乃政治老饕，永远也喂不饱的。我们不整治他，他随时便要反动的。”大家知道楚女平素对国共合作意见最多，他说中共代表工农政党与国民党合作，实际也就是与新军阀打交道。楚女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以抽玉笔名刊布“中国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主张制裁国民党右派活动，当时中共中央投鼠忌器，禁止发行，言下愤愤不平，见于词色。大家从国民党右派与蒋介石问题，又转到蒋介石、张静江、孙科等多方向中共党员进行拉拢与分化问题，他们起初着眼向中共上层做工作，中夏、兆征均其对象。

文虎在广州时，一夕，有国民党中委叶楚傖来访，谈论国共关系问题。叶与文虎曾在环龙路四十四号见过，为元老派智囊，自云：“奉张静江命致候罗先生！”并约于次日在长堤酒家聚谈。文虎笑谢道：“春秋之义，大夫无私交。”叶默然知不可强，遂辞出。同时谭延闿曾暗示代英可任国民党秘书长，代英亦未理。但同时确有人受其蛊惑。楚女秉性刚直，语言无忌，他发现中共派遣到国民党工作同志一部分渐失革命作用，唯唯喏喏与敌同流合污，这种人在军队与政府中随时可以发现，号称圆滑人物，这些“滴溜滚的党员”对革命事业最为危险，还有一些政治上特别腐化分子，如邵仲辉、章伯钧、包惠僧、丁默村等，言论行为竟是“革奸”作风。还有人证明：中共派往蒋介石手下工作某些人物，揣摩窥伺，各方拉线，如胶似漆，全失革命气味。尤其是某些政治技术家，专心钻研政治柔术，见机而作，他们对蒋介石肋肩谄笑以取容，并与蒋介石以外其他新军阀勾结，希图他日富贵。此等人守在堤防上，他日洪流一到，堤便土崩瓦解，这些都是当时少数革命败类所为。

文虎在广州停留时，代表中央出席北伐筹备会议，并代表北方区委提供有关北伐的政治、经济及军事方面的书面报告与建议，以备采纳。当时会议决定，北伐打到长江流域再说。文虎留广州事毕，乃于五月中旬后自广州乘轮到达上海。在中央局会议上，将在广州见闻所及关于国共间具体情况据实报告，并即席广泛讨论，起初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最后取得一致意见是操之过急则生变，目前当用最大限度努力，促成北伐，一切等候打到长江流域后再行计议，这便是广

州行的结论。

[注]：文虎于一九二六年五月十日离广州，应延年之请写“广州一周记”，时李求实在广州主编《中国青年》，将该文在一九二六年七月四日《中国青年》一二四期即六卷三期刊出，事隔四十年，内容已不甚记忆，本篇题旨与前文不同，且详略互异，读者可并参证。

附录：罗章龙所作《广州一周记》

五月一日是世界革命党人的佳节，也就是资产阶级年年岁岁多灾多难，多忧虑的日子。

今年五月因为北方政治气候的变化，我和几个朋友便顺道在这一天的前夕来到广州了。我们从这天起，在广州足足住了一个星期，虽然时间不长，却也流连革命的光景，得了许多新鲜的印象。这些印象，固然在我的脑海中不免也有些仿佛是陈迹，没有怎么奇特，可是过去几多时我们在北方灰尘中工作的同志，确实没有见过，所以我不妨把他写下给广州以外的读者们阅看。

这里首先声明的，我所要向读者报告的并不是甚么政治考察的材料，经济的统计，或者是劳农界的真实状况，因为这一些都不是这篇短文范围以内的事，我下面所写的不过是几件凌杂的见闻和不连贯的感想。

五一节，说到广州今年的五一节，最是令人难忘的事。五一节的前一天，全市的工人、学生、兵士及一般革命的民众，人人脑中都浮有一种似骚动而非骚动的不安的情绪，驰骋着明天熟狂的印象。

工人们彻夜不休的为着明天预备工作，他们的街车、自行车来往如织的飞奔，在静悄悄的一夜里布置成功一片明天的庄严伟大的纪念市景。五一那天清晨，我们从寓中出门到大街上，只见大的百货公司，小的店铺均闭门休業了。衙署、学校和兵营，各各悬旗休息，大小工厂不用说都是默然无声地停止了工作。江中船舶断了来往，沿堤一带的码头平日是极杂沓的区域，到此俱臭无声响。马路上只有成群结队的工人、农人、兵士、学生和市民的队伍，他们手散放着雪片的传单，口喊着激昂的口号，耳听着悠扬的音乐，脚下轻踏着整齐的步调，熙熙攘攘的一队一队如春水般的向东较场奔赴。

东较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对过，好一片莽苍的原野呵！比莫斯科的“红场”要大几倍，比北京的天安门还显得雄郁。遍地绿茵的青草，极目四望，足足可容三四十万的群众。

等到十点钟开会时，全场的群众充满了，人山人海一般，赤色的旗帜临空招展，鼓声号声，军乐声，错杂迭奏。飞机航行天际，在蔚兰的空中散布传单。在开会演说的时候，一片春雷似的掌声，激越的口号声，震动四野，使千万人们的热血不自禁地沸腾起来。计是日演说的有工人农人的代表，有革命的兵士和学生，有华侨及商人，有世界各国的工农代表，有被压迫民族与各政党（共

产党与国民党)的代表,激昂慷慨,不用细表。最后全场通过大会决议案,队伍出发游行,走遍全市各大街,才次第散去。在浩荡的群众游行中时时激起悲壮的歌唱:“奴隶们,起来!起来!……”的音浪,隐约的,连续的,绕越广州全市,浮动在万人的心坎里,这是何等苍凉的一幕呀!

黄花岗:擎着赤旗,携着花圈,我们一行人结队步行向黄花岗瞻仰向往已久的七十二烈士坟墓。从市内到郊外铺着很整齐的碎石马路,道旁榕荫匝地,有很清幽的景物。后来我们在强烈的日光底下走尽一程,远远望见一座自由女神像矗立云端,知道是墓道近了。跋涉一个山岗,穿过小小的森林,我们渐渐走进墓门去。在秀美的女神像前,我们一齐脱帽向烈士墓致敬。礼毕,三五同志高立在记功碑上,白云在天,风飘衣袂,俯览全市风物,只见乱山纵横,杂花生树,犹想见当年丛莽七十二叛囚的荒邱景象。这七十二个失败的英雄,誓以性命为孤注,企图打破四千多年的专制王权,创造民主到共和政治,虽然到而今还没有获睹最后的成功,但是伴他们长眠的还有许多烈士,如:史坚如、邓仲元、朱执信、廖仲恺及红花岗四烈士墓,都在他们的邻近;再说远一点,还有“二七”“五卅”述事继志的阵亡战士,流血染遍了中国长江上下,大河南北。并且现在民族革命的巨流中更有千千万万前仆后继革命的青年们准备着或正在牺牲,踏着他们的碧血前进。这样看来,他们的流风余韵也算不寂寞了。纪功碑三四丈,由许多花青长方石块砌成,每一块上刻有捐金献石的华侨汉文姓名,柱端有中山先生手书浩气长存四大字,墓前左侧有碑亭一所,亭中刻石为文为邹鲁手笔,仅略叙营葬烈士始末大概情形,对于当时革命事变经过并没有注意写出,这样震惊历史的煊赫事件,他竟轻描淡写,不肯多着几句,真令读者们气短。于是有人解说道:他做的是古体,这正是他的含蓄处,很合古文义法的。果如所云,那么倒不如像那泰山极顶秦室封禅碑,索性不着一字,岂不更含蓄有意义么?广东是半世纪以来中国革命的发源地,黄花岗天空中自由女神便是指向千万中国革命青年们的灯塔。年年岁岁有无数的男女青年信徒们,远从四方来到顶礼这革命的圣地,他们不仅是凭吊已去的英雄,洒几滴伤时的眼泪,并且要带回满腔革命的种子归散给全国的民众,这是黄花岗最可骄矜之处。在民族解放革命史上有永远不磨灭的价值。“二七”、“五卅”的烈士们已在伟大的民族斗争历史剧中继黄花岗的英雄表演过两幕了,我们待展开那最后一幕吧,中国革命的青年们!

广州一周记(续)

“五五之夕” 今天是马克思诞生一百〇八周年的纪念日,工农两会决定共同发起纪念会于农民大会会场。因为日间我们各有繁剧的工作,所以纪念会定在晚上举行。会场乃从前番禺县学宫故址,现为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临时校舍。

我们于开会前十分钟到会场去,场内已先到有几个广东农民代表,彼此闲话起来,知道现在广东有组织的农民已超过八十万。他们艰难奋斗的历史说起来是很感动人的。因为广东省地主与农民间的冲突是特别剧烈,两者间常常有武装冲突,换一句话说,便是地主与农民间经常发生不断的战争。地主们勾结反动军阀,有的本身便是军阀(如海丰陈炯明家族)压迫农民,在过去许多次数农民阶级斗争中(如在广宁花县,海陆丰争斗尤烈)牺牲不少忠实的农民领袖,毁灭无数的村庄,死伤不少的革命农民。在帮助国民革命军削平反动军阀的战争中,更不知流血多少,失败多次,才发展到现在胜利的局面。现在纪念会场四壁还悬挂许多农民革命的惨影和革命的战利品。那些惨影中有从容就义的农民革命领袖,面貌庄严如生,有伏尸流血的战场,喋血遍野,有被毁后的村庄断井颓垣。种种现象,令人惊心动魄,不忍卒睹。在革命战利品中还看见一把重五斤的阔口钢刀,据说是钟景棠军队入海丰时制造大批这样的刀,是专为屠杀农民的。广东的农人们,你们是以鲜红的血,洗净了罪恶的迹,换了自由的生啊!

灯光渐照耀得全场明亮,工农代表们都先后到齐了。这一间小小的晚会会场里,坐满了五百多个全中国的工农代表。这如同中国两百万有组织的工人农民群众集会一样,代表们的籍贯,北自满洲,南至广东,包含全中国各省份。他们各显出不同的模样,有北方粗鲁的莽汉,有南方憔悴的农夫,有青年的文化工人,有秀丽的纱厂少女;更有方从监狱中出来的,有避官厅缉捕通逃,有自战壕里偷闲来与会的。他们各操着不同的方言,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男的,欢然无间地坐在一堂。这一群奴隶们,不期而会的来自各方,俱要趁着今晚来纪念那首倡解放他们,创造科学社会主义的导师。

开会的秩序很庄严壮烈的表演过去了,马克斯的“圣灵启示”在人们的脑海(恕我借用了这一句话),于是共产主义万岁,沈雄的国际歌声和高亢的少年先锋曲,纷纷起于四座,大家随着歌唱的节奏,缓步退出会场,街灯渐渐幽暗,繁星在天空中闪烁,歌声渐远渐歇,群众乃在革命的酣醉中归去。

记得七年以前中国第一次纪念马克斯的会是在北京大学第二院一间窄隘的私人图书馆里举行,那时只到有十数个浪漫情绪的革命知识分子,没有一个工人和农人,马克思主义到今日总算有些实际了解的人了。

访东园:省港罢工委员会是封锁香港的一个总参谋部,也就是帝国主义所称的赤化党人的营垒,由十三个委员组织的,他的位置在广州市有名的东园。东园原先在广州一家大酒店,与西园南园并称的,园内风景天然,楼台池沼,布置颇有些邱壑,后来酒店不知道如何歇业了,便由国民政府指定做了罢工委员会的办事机关。我们到东园去时该会主要负责人领导我们参观一周。各处办事机关,大半是临时搭盖的草棚。重要办事的人员都由各工会选派充当。这些人很朴实又很活泼的,表现出满腔的朝气。罢工会有武装纠察队三千余人,是省港工人罢工后自由应募编制的。他们主要职务是执行封锁香港政策。有的在

沿海一带港湾驻防，盘查出入船只及来往客货，有的巡行海面及江河任警备侦察之务，有的驻在广州沙面及长堤码头，纠察起落货物。广州国民政府延长封锁香港政策，到现在有十个月，全仗纠察队的宣劳，才有今日。这班赤卫军从前多半是薪金优厚的工人，自入伍以来，生活刻苦万分，住的是上湿下漏四面透风的草棚，吃的是粗黄不能下喉的饭菜，服装用具更属简陋极了。但是他们并不因此觉得些微不满，他们镇天的肩着枪弹与英国军警武装奋斗，与破坏罢工的流氓走狗武装奋斗，半年来也数不清死的多少、伤的多少、被敌人暗中谋害的多少。据该队负责人说，全队人员差不多每星期出外勤都有伤亡哩！我们参观营舍之后，便由队长在会所门前广场上率队指挥操演，步伐进退，号令均很严肃。

罢工会内设有审讯处，专司审讯罢工的人犯。这一位人犯有贩卖英货的，有偷运食物给英国人的，有私往香港做工的，更有些是被雇于英人，设立机关，有系统的包运客货到香港去的，不幸事机败露，被纠察队破获，便将他们拘捕起来，送往置工会究办。我们经该会特别允许后，随往察看他们的监狱，计共有监狱五六所，也同其余的办事机关一样为临时搭盖的草棚。每室宽约丈余，长五六丈不等，里面住的犯人，都是十分拥挤。也有老头，也有幼童和妇女，可是都没隔离，也没有什么标志，情节严重的，手脚加上镣铐，后来我们又到审判室，只见一间纵横四丈的厅屋，审判员两人共据一条长桌坐着，桌前五尺宽的空地为犯人站立的地方，再前有木栅一排，木栅外面站着自由观审的人们，审判员席后有板凳一排，并排坐着十数个由各工会派来观审的会审委员。这天被讯的是一桩包运人犯落港的案件，一个正犯和一个嫌疑犯。细瞧那正犯四十多岁，科头跣足，上身赤着没有穿衣服，头上盘一条重五六斤的锁链，审判员的一个向他发问道：

“你为什么要包人落港，破坏罢工呢？”

他沉默不发一言，也不露一点声色。又问道：

“你的机关设在哪里？同伴还有些什么人？现在可以明白说出来了！”

“没有！”他只有声无气的哼了一句。

审判员于是检出一大堆证物来了，将证物一件一件指给他看，问他可还有什么辩护。这些证物里面，有一封信是他冒充某军团长名义写给人的，内容包含犯罪的重要成份，有一块孙文主义学会的徽章，还有一大卷当票和收条。此时他颜色有点异动，但仍是噤不作响，一味的沉默。审判员商酌了一会便又把他收监了。次问到那一个嫌疑犯，那人年纪很轻，紫棠脸皮，面部很有表情，满口粤语，滔滔不绝的抗辩，我们不懂得究竟说些什么，那两个审判员听了，觉得他与本案确实没有关系，便将主张开释的意思，向后面坐的会审委员们说明，经过他们的同意，即刻便将那少年释放了。

我们出了审判室在东园转了一回，见还有法制局、审计局、军需局、巡警局、护照局，种种机关，各分据园的一隅，这一座歌舞楼室，以前为一般寄生

阶级——军阀、官僚、豪商、巨贾流连荒淫的地方，现在则繁华已逝，歌沉吴绝，变为工钱奴隶们反帝国主义的营垒，这大概就是广州商人们所奔走相告“共产”谣言的根据了。

黄埔：一天清早我们从寓中步行到岭南码头，乘坐黄埔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预备的小艇，缓缓驶向黄埔参观去。艇中的陈设颇为华丽，很象大明湖的龙船或秦淮河的花舫。珠江江面船舶往来的热闹景象，比上海黄浦滩不相上下。大小木船如游鱼一般磨船击楫的荡来荡去，江心更碇泊有许多吨位极大的艘舰巨舰，这表示广州国民革命后商业新兴盛的景象。

还有一样，帝国主义的威仪到此是完全扫除了，我们不仅没有见到一艘外来的军舰，如像长江、白河一样，连号称海王英国的商船全部都逃无踪影了。便是那日本和美国来往商轮，在这里俱是循规蹈矩在工人纠察队检验之下航行，丝毫不敢露一点放肆的神气。我们大家坐在清凉的大理石上，呼吸江上独立自由的空气，手臂乍离枝头的新鲜荔枝，遥瞩两岸的市景和乡景，信口与本地同志谈些粤中革命的掌故，真是平生难得的胜事。绝妙的海珠公园，仪态十分窈窕，许多工人正在和她装饰，还没有完毕，程璧光的铜像，英姿飒爽在高墩上雄视着。我们过了海珠，过了白鹅潭，过了花地，最后便到景物清幽黄埔了。远远看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门的横额，登岸后该校派来几个招待员中，其中有几个是北方时的老朋友。他们引导在全校各炮台巡看了一次，长洲各要塞的位置都很相宜，各个炮台的分布正像舟山海面出没不没的岛屿一般。不过说到建筑的伟大和坚固，那就远不如我们所见的青岛德国炮台了。

我们在炮垒中促膝闲谈，对于黄埔学校的精神十分惊叹！在统一广东的历次战争中，黄埔学生的热血，洒遍了广东全境。黄埔第一期学生五百人中前后战役已死去了三分之二。校内学生分军事与政治二种训练。军事部注意养成军事人才，毕业后充当军官的。政治部所授多政治科目，毕业后在军中做政治工作。军事的政治工作在国民革命军战史上有很惊人的效能。过去东江战争及杨刘战争，党军纪律严肃，有进无退的敢死精神，都是政治训练和党代表执行纪律最显著的成绩。现在黄埔学生俱经过六个月的入伍生活，校中学生生活仍然勤苦得很，不过到处都能表现自由活泼的精神，学生与教官在形式上竟没有多大区别，因为他们同是革命的同志，为主义而结合，自然就不会有什么形式的桎梏了。我们在该校校长和学生的欢迎会席上演说里面，知道他们对于民族革命有极彻底的认识，他们极热烈的拥护革命利益，誓不顾一切为民众而牺牲。对于国民党扶植工农政策的意义尤为了然。后来又谈到北伐问题，会场的空气紧张到了极点，几使我仓卒间觅不到适当形容的字句，古代史上斯巴达征人“祈祷战死”的精神或可仿佛一二罢了。此时我不禁回想到在北方所见那些封建军阀统治下的兵士们，他们过的是雇佣盗匪式的生活，腐败的遗传和习惯泯没了他们的性灵，封建的桎梏了他们的躯壳。他们自己是从来不知死所的，比起来，多么残酷，又如那些文明国（德、法国、美国）被征发的兵士们，他们在资产

阶级欺骗之下，天天喊着“保卫祖国”，“拥护得谟克拉西”，度那虚伪的生活，又是何等愚蠢啊！

太阳渐向江心沉落，我们的游性也消尽了，在暮烟四合中“紫洞庭”载着归人，遥向那光明不夜的广州市，如飞的驶去！

一九二六年五卅纪念追记于杭州。

（《中国青年》第一百二十三期，1926年6月13日出版）

十三、文虎重返北方后再离北方之前北京印厂案 （一九二六年）

京津青济广大地区革命高潮以伟大胜利开始，更以重大牺牲结束，这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当时整个北方形势陷于低潮，中央为了新的部署，即集中全力于北伐起见，对北方乃采取退守政策。为此中央乃决定要文虎与守常离开北京到南方去。在中共中央执行这个政策时，北京忽然爆发了一个重大事件，即北京印厂的案件。

先是北京区委由于革命宣传业务有了很大开展，通过一个民营印厂即北京印刷厂承印一切有关革命报刊，数量颇大渐引起外间注意。工人中有一个工人张镇兴因事请假缺勤，厂方照例扣发工资，张不满。双方发生争吵，结果张为泄愤起见，乃向警署告发，说印厂印刷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书报。警所得报，先派便衣警士前往该厂侦察，获得旁证，乃下令往捕经理。经理闻讯出走，乃传去工人及学徒数人，并派人搜查，得到该厂承印文虎所写铁总报告及其他北方区委所印行报、小册等数十种，数量甚巨，堆满半间屋子。被捕人员初审过后，警所乃派警士缉拿主犯文虎严办。

当时即一九二六年八月，文虎正居住在北京东城乃慈府胡同如意胡同一号内，同住者有铁总秘书王鹤寿，及其他干部工作人员。王为河北唐县人，保定师范生，原是共青团员。王是奉文虎命经常向印厂联系接洽印件的人之一。另一奉命工作的人为陈楚梗（湖南醴陵人，北大旁听生），当警所眼线捕文虎时，在沙滩东口将王捕去。陈楚梗闻讯逃往天津（后在天津被捕解京牺牲）。王既被捕，警所晓以利害，王动摇，立将文虎住址供出。王并引领警士前往如意胡同一号搜查，当查出文虎所写报告手稿文件等，及其重要证据，一切证实王所供是实。搜查时间为八月二十九日上午八时。惟文虎因事前二小时奉北方

区委命离开如意胡同，搬到苏联大使馆居住，当时脱险。北方区委之所以能于事先通知文虎走避，主要是区委守常及时从顺天时报记者最先得到印厂被搜查事，乃用妥速方法告知怀龙转告文虎。（后顺天时报曾报导印厂案。）

与王的行动同时，尚有郑州铁路工会干部魏士杰又被卷入印刷厂的案内。魏士杰原是一个普通工会干部，是年五月郑州工会发现京汉铁路南段驻军寇英杰师长对铁总发生不友好行为，当时工会败类分子南段总管张有通敌嫌疑，铁总乃下令扣留该总段长，暂给停职处分，等候查明事实，再作正式处理，旋在审查中发现魏士杰有附张言论，魏不自安，乃进京求见文虎藉加解释。当魏士杰到达北京如意胡同时，该房正被军警搜查，魏从外闯入时，即被军警扣留，带往警察厅究办。当魏被审讯时，见王已将铁总及北方区委情况输敌，自知不免，乃供证文为北方区委及铁总主持人。此案性质遂定为叛国罪。法官倪弼宣布主犯文虎继续通辑归案严办。王与魏士杰输情于敌，当时外间不知。王后被任为冶金部长，四十年后揭发出来，真相始大白。

再说，文进驻交民巷大使馆兵营后，对于北京印刷厂案一面派杨善南（北方区委组织部干事）前往办理营救被捕人员出狱（王等禁一月后保释出狱），一面会同守常详细报告北方近日发生情况，建议今后进一步作法并请示进止。随后中央派使者松石北来，提出新的建议，大意是说：自五月北伐出师，节节顺利，现已通过岳州，攻克汉口，中共中央决定前往武汉办公，并以全力注意武汉方面的发展。因此中央决定文虎与守常立即回上海转武汉中央参加中央常委工作。

当时对于中央决定，守常原则上同意，但执行方面有分歧。守常认为北方区工作繁重，二人同时离开是不相宜的。因此他主张文虎且先行，他本人候公私各事（包括他个人方面事务）处理停当再离开北京。文此时坚决执行中央决议，并称必要时他自己宁可以留守北京，而让守常先行。但此事虽经文向守常再三说明，守常仍坚持己见，要文虎先行，他自己奠后。这样文又在京停留几天，以促守常同行。惟守常终不同意，最后文乃借松石离京赴沪转武汉而去。（后来守常迁延未赴沪，一九二七年乃发生大使馆案件。）

于此应提及一事，即：文在离京前与守常商议将北方区委建制作了一些适应北伐战略的部署。为了防备万一起见，文建议大使馆兵营留驻人员应尽量减少。临行时文将北方区委积年以来所保存党内外文件、刊物、档案等文献大部分委托韩晋先（太原同志）特制大号木箱四只，寄存第三院北大学生储藏室内（用北大哲学系罗漱阶名义）以保永久。但此项文献箱在日寇进驻时，为北大继任校长汤尔和查出盗毁尽净。

十四、中共扩大会与上海暴动

一、文虎重到上海：自一九二五年冬文虎赴北方以来，大部时间往来于直隶、河南、山东、山西、察哈尔、东北、陕西各省区工作（其中一度到广州开会），至一九二六年因出席中央扩大会议，始离开北方，重临春申江上。先是王春熙自到北方区后，常奔走张北塞外与关东满洲，因水土不服，风尘劳苦，致胃病渐剧，经北方区决定回南方治疗，所以此次同车南下。

二、何刘牺牲：文虎到上海时，上海“五卅”工人革命高潮已成过去。在革命汹涌澎湃的过程中，中共党与工会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工人运动领袖刘剑华、上大学生何秉夷与多数工人及学生等，均在运动中为工人争民主献出生命。

1. 何秉夷：何秉夷，上海大学学生，共青团员，四川彭县人，在南京路被巡捕击伤，死于仁济医院，时年二十五岁。何平素热爱自由，尝自书：“自由即生命，不自由，毋宁死，誓与独裁者不并立于天地之间！”以自勉。在南京路示威时，走在最前列，遂遇难，创痕满身，又被骑兵践踏，血肉模糊！

2. 刘剑华：刘剑华，上海大学学生，参加上海工人运动后改名刘华，加入中共为党员，任上总副主任。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公共租界体育场附近被捕，解送淞沪戒严司令部，于十二月十七日被孙传芳下令枪杀。刘为上海中共党员最先殉难之人。刘平日工作深入工人群众，最先结识顾正洪，顾虽非党员，但对于发动“五卅”罢工曾起重大作用。顾正洪，内外棉七厂工人，江北阜宁人，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因参加罢工，被日本工头枪击腹部，头部并受刀伤，送医院开刀，发觉肠已打断化脓，乃截去一段，草草缝合，返家后伤口迸裂而死。由工会交涉，厂方给一万元抚恤了结，但五卅运动却受顾的牺牲所推动。

按：一九二五年“五卅”时期镇压上海工人运动为奉系军阀张学良所遣派邢士廉军队，是年十月十七日张军自上海撤退，十二月六日孙传芳军进驻上海，时上总自动启封，十二月十二日被孙军查封，一九二六年六月上总再恢复办公，六月二十七日再度被封。自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至一九二七年三月，孙传芳统治上海为时一年又四个月之久，屠杀工人数以千百计，孙失败后蒋介石代起。孙后在天津居士林被一女青年用手枪击毙。

三、中共中央七月扩大会议：中共中央七月扩大会议自七月十日召开，十五日结束，会议上广泛讨论二年来全国党与工农运动的成就、经验与教训，并研究当前革命进展形势及其对策等。在扩大会上，北方区负责人文虎就青岛、济南、天津、河南、直隶等地区工农群众斗争以及伦克忠、李味农、王中秀、黄天白、戴培元、王靖尘、高克谦诸人被害事，提出详细书面报告，又写“北方铁路工人之现状及自救”一文，刊布在七月十一日《向导》一六五期（以上报告及文章均由春熙执笔）。同时何今亮就上海工人五卅运动，邓中夏就广东省港罢工当前局势，分别作成详细说明书，向中央扩大会议提出报告。同时并着重讨论长江中、下游湘、鄂、赣、苏、浙、皖等省配合北伐军事与群众组织等具体方案问题。

四、对北伐问题的决定：会议着重讨论全国加强国共合作问题。先是据广东省委来人向中央报告：关于北伐问题，当时蒋介石与国民党中央某些人怀有一种患得患失心情，对于北伐既恐前进失利，为中共所图，出师胜利又怕中共乘机扩张势力于己不利；同时又虑，出师离粤后，广州工人在后方行动，夺取广州政权。因此中共中央用全力宣传反对广东偏安，同时对广州国民党中央多方解释：在北伐过程中，中共决以全力支持国民政府，决无从中取利之心。鲍罗廷在两党会议上曾正式向蒋剖切说明，使他放心。后来仲甫并在《向导》上刊布《论国民政府之北伐》，该文主要作用在鼓动北伐，并说明中共将帮助国民党，并批评国民党之失，以释群疑。广州国民政府于七月一日发布北伐宣言，九日举行北伐誓师。因此，中共中央在会议期间，于七月十二日公布“第五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号召各阶级革命民众，巩固革命联合战线，推翻国内军阀与打倒帝国主义。

五、组织方面新部署：中央会议面临将来到的革命高潮，在部署全局时决定重新充实各方力量，开展全国范围内群众性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因此在实际工作方面中央决定：从北方调回驻北方中委（包括守常、文虎、荷波等）及一部分得力干部，充实北伐前线、长江流域各省工作，并加强上海防守力量，相机进取。俾在北伐战争中赢得工人革命的新胜利的一部分。在扩大中央会议后，文虎仍被留上海中

央局工作，主要是加强上海工会阵营。此时文虎重任中央工委书记，立即扩大并加强上海总工会党团工作。上海总工会党团成员为何今亮（松龄即汪寿华）、项德隆、林育南、赵世炎、余立亚、张佐臣、李震瀛、孙津川等。李立三与刘少奇原在上总工作，但李立三于上年九月十八日上总被封后，因犯贪污案离开上海（见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上总为外界对李敛钱自私辟谣通电）。刘少奇亦逃往长沙，远离工作岗位。

六、上海十月军事暴动：一九二六年冬初，北伐出师已逾五岭，吴佩孚、孙传芳军事部节节败退，时国民党驻上海策划军事行动者为特派员钮永健。一日，钮来找文虎议军政问题（钮与仲甫原系旧识），据钮谈已向浙江政府省长夏超联络，取得夏超同意宣布浙江独立，届时上海方面有海军军舰一艘亦可发炮声援。钮自称本人有别动队几百人，可发动军事行动，又称此举用意在于扰乱孙军后方，使其首尾不相顾，可以策应上游军事。当时中共中央经过讨论，同意在上海发动暴动，理由是一方面履行帮助国民党的诺言，同时在工人斗争方面自己进行军事行动的尝试。于是派人通知杭州，省委发动工人组织力量帮助浙江省长夏超行动，同时在上海本埠立即着手进行暴动准备。

七、暴动机构与准备：中央立即组织行动机构领导上海暴动，行动机构包括中央工委、军委、上总党团、江浙省委书记等（即仲甫、文虎、何今亮、罗亦农等）。首先是秘密购进武器一批，计长短枪百余支，子弹、手榴弹称足，预先储藏在法租界某里弄密室内备用。

八、夏超独立及其速败：先是浙江省长夏超乘孙传芳前线吃紧，后方空虚之际，乃于十月十六日宣布独立，纠合国民党右派分子马叙伦等组织杭州市政府。中共杭州市委汪天性、贺威圣等参加反孙传芳运动。孙传芳闻夏超独立讯，乃连夜增兵反攻，孙军乘夏超不备，从嘉兴一线出奇兵袭击夏超主力。夏超所部原为警察，素乏作战训练，夏本人亦无指挥作战经验，乃仓皇逃至西兴（钱塘江北岸），被孙军追及杀死。此际马叙伦等早已事先远扬，马等逃走时又未将敌兵压境情况通知杭州中共市委，致中共方面对孙军事行动及敌军入城事茫然无所知，中共党员汪天性与贺威圣被孙军所捕，立遭杀害。

九、敌我力量对比：夏超军事失败事首先为钮永健所获悉，但钮深秘其事，并向上海中共谎报夏兵已逼近沪郊，催促中共按预定计划行动，因钮此时心存侥幸，希望上海军事行动如果获胜，便可以扭转全局立获大功。中共中央一时失察，遂计划照原定计划举行军事暴动。时上海孙传芳守军约一万二千人，租界英、美、日、法海陆驻兵军舰十一艘约一万八千人，当时双方力量既悬殊，所以我方主要希望寄托在夏超军队迅速进入上海，如此可以不经重大战斗取得上海。

十、十月二十三日战斗经过：中央决策既定，暴动遂于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发动，敌方孙传芳军事先已获得消息，遂集中兵力于闸北、南市及浦东等处，控制全市交通要道，并通令市政府宣布戒严，各警署门首戒备森严，配以重武器机枪钢炮等。此次军事暴动，为国共合作具体表现，中央诸人亲临暴动指挥部指示机宜（在以后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八日及三月二十一日两次暴动中亦然），在暴动中上总由何今亮主持，由顾顺章担任上总纠察队总指挥。何今亮足智多谋，不矜不伐，最为工人群众所爱戴。一九二六年七月何亲制定上海工人斗争纲领十一条，遂成为十万工人声宏实大的呼声，所以在当时震动上海工人革命中，何实为实际领导人物。暴动发动前二日，首由上海总工会宣布孙传芳杀害刘华，封闭上总，苛捐暴敛等十大罪状，向市民作宣传动员，随即转入军事行动。军事行动实际负责组织与指挥者为何今亮，在暴动中冲锋陷阵，勇往直前。当时上总成立武装纠察队大约二百余人，下分几小队，辅以徒手工人若干队，由陶静轩、余立亚、奚佐尧等率领，分向浦东及南市警署袭击。此时钮永健别动队未见行动，海军炮声亦寂无声响，中共孤军深入，遂陷重围，二十四日南市及浦东工人纠察队被逮捕一百余人。工人武装纠察队队长陶静轩与奚佐尧等十余人，当场被孙传芳俘虏，纠察队溃不成军，全部武器失落。陶静轩、奚佐尧等被俘后，由上海市长丁文江（丁为地理学者，号称名流，黄缘得任市长）下令枪毙。陶静轩，湖北江陵人，内外棉纱厂工人，上总委员，被难时年二十八岁。

十一、上海十月暴动总结：上海暴动结束后，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讨论此次行动失败与教训，大家一致认为在政策与策略各方面都有重大失误，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1）此次暴动系以国民革命为出发点，换言之是扯非工人阶级旗帜，因此动员工人群众力量不足，并未动摇军阀所托足的基础。（2）资产阶级在联合行动中极其软弱，与估计大有出入，拟议中之参加市民政府的资产阶级代表（如虞洽卿、方椒伯、陈光甫等），对中共关系若即若离，极不可靠。（3）暴动本身纯属军事行动，但又未与外围军事配合进行，遂陷于孤军作战绝境。（4）国民党方面钮永健行为，有类买空卖空，完全失去政治联盟作用。由于上述各项错失，因此有人认为此次暴动在政治上“双重上当”，牺牲太不值得。后来更有人说，暴动如推迟到一九二七年三月一次举行，要比分次举行策略更为明智。对成立市民政府，过高估计总商会力量亦属重大失策。后来经事实证明，上述评论甚为有据。于此应特别指明者，上海暴动失败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一九二六年北伐出师时以蒋嫡系军队担任东南一路，蒋因此得到接近浙苏及上海帝国主义，藉与上海工商界资产阶级联合以壮大自己势力，于是中共在东南失其凭借，

这样在武汉政府瓦解后，中共便进退失据了。

十二、中央书记被拘之一幕：十月二十三日之役，在暴动准备期间忽发生中央书记被拘事。某日晨中共正值例会时间，文虎到中央办公处出席会议，有顷大家到齐，唯独仲甫不见。众人正疑虑间，荣盛忽从外来，春熙因问：“先生在家否？”荣盛答：“不在，他早八时出门来办公室开会，何以现尚未到？”众人面面相觑。荣盛言毕返身出门，春熙追及荣盛，说：“我和你一道去寻找吧！”于是荣盛回到仲甫寓处，二人共坐一会，仍不见他回来。正焦急时，荣盛忽自语：“先生可能是送文章去《向导》校稿处去了！”说毕，荣盛乃引她向宝山路印厂走去，中途忽遇何今亮迎面而来，文虎亦随之，因问今亮：“见仲甫先生否？”今亮答：“未见！方才闸北工会来人，说，今早纠察队在东方图书馆附近截获一穿黄色雨衣的人，等我前往理落。”荣盛闻言顿启疑窦，因早晨微雨，他（先生）出外时手携雨衣。文虎闻语立嘱荣盛返寓守候，以防意外，乃偕今亮往查明事情真相。二人继至闸北工会党团处访问究竟，到工会时，但闻工会中人声鼎沸，正在议论拘获嫌疑犯事，乃入室问讯。工会纠察队引二人进内，大家见文虎与今亮至，众人喧声立止，时有纠察队小队长向今亮报告：“纠察队队员今早巡逻，在工会附近瞥见一人头戴雨帽，低头疾走，问之不答，我等因见他形迹可疑，遂将其拘留。”因为仲甫平日行路时文思萦回脑际，故不甚注意周遭所发生事情，此次对纠察队盘诘，竟未听悉，以致被拘。过了一会，纠察队引一人至今亮前，身着雨衣，手拿报纸，二人谛视，果然是仲甫，不免暗吃一惊！今亮乃佯作镇定，对队员说：“你们且散去。”众既散去，今亮叫队长近前，附耳语道：“此人乃我娘舅汪先生，昨日方从外埠来此，初到上海，路道不熟，又不谙本地语言，竟遭误拘，我送他回去。你们以后巡逻仍应着今日的作法，认真盘诘，不要疏忽怠意！”纠察队长聆言后，信以为真，深表歉意，告辞而出。于是三人归寓，荣盛见面，喜形于色，今亮仍将经过告知，荣盛听罢，笑道：“今日事情仿佛是晁盖与刘唐在搬演戏文，值得庆贺。”三人不禁失笑，时已十二点，扰攘半日，至此始定，但开会时间已过，荣盛乃临时做饭，留二人共进午餐。进餐时，今亮诙谐地说：“今番仲甫先生总算又被拘囚一回，照次数是第三回了。”仲甫道：“这不算是一回，何况是被自己人拘留，勉强计算，只能算作半回吧。”

十三、文虎离沪赴武汉：上海军事暴动虽然以失利告终，但长江中游北伐军事进展甚速，汀泗桥一战，击败吴佩孚主力，北伐军于九月上旬已占汉阳与汉口，此时中央开始议迁往武汉问题。中央经过几次会议研究后，决定分期迁往武汉办公，由秘书处作统一布置。当

时中央意旨决定从上海、广东抽调几个中委及大批干部前往武汉工作。文虎、特立、项德隆、林育南、谭平山、史文彬、王荷波、苏兆征等首先赴武汉成立中央办事处。文虎在赴武汉前，奉中央命返北京一次，任务是妥善安排北方工作，并面约守常南行（详见北京印厂与大使馆案）。在九月中旬，文虎匆匆从北京回沪，时北伐军已占领武汉及九江，直鲁联军负隅南京、上海一线，据英文大陆报载，沪宁二处有帝国主义军舰四十五艘，陆海军三万名（上海外军成立上海保卫军，以邓肯 D. J. Duncan 为司令），日夜巡逻长江下游，掩护孙传芳军搜捕形迹可疑乘客。文虎等一行自上海乘内河小轮绕道江北，先至安庆，辗转换轮西驶，始达九江。文虎在经过九江时，始从当地中共组织聆悉，一九二六年八月间江西省中共组织遭受严重破坏，书记赵醒侬被邓琢如所捕，旋加杀害的详细情形。距上次来江西时已阅时约两年之久，在九江候船时，西望庐峰如苍玉照晴空，汉阳峰隐约在望，怀悼醒侬，挥泪无已！自九江登岸，又经一日始乘轮西上，经武穴、黄石直抵武汉。

十五、莫斯科东方大学

中共在建党之初，参加革命工作之干部，一般是从工农运动斗争阵地直接涌现出来，经过长期学习与工作后，各量才德予以任用。

自一九二二年起，乃采取选送工人学生干部赴俄留学办法。先是第三国际民族委员会东方部在莫斯科设有东方大学，专为培训来自中国、日本、朝鲜、印度、蒙古、爪哇及其他殖民地革命干部之用。

一、苏联义勇舰队来沪：中国学生赴莫斯科通常分水陆两路前往，陆行自北京经中东铁路出满洲里至赤塔西行，人数较多时，一般经上海北航到海参崴。通常苏联义勇舰队商船在解冻期间定期到上海吴淞口外石头沙停泊，因为苏联在黄浦江无自用码头，租赁帝国主义码头每日赁费奇昂，故轮船在长江口外抛锚，乘客须搭乘驳轮前往吴淞口外登轮。登轮后以招募工人名义编组出发，互不交谈，严守生活纪律。船离吴淞后，直放海参崴，自此乘远东省铁路赴莫，时间约五十日左右。

二、中共留学东大人数历年概况：东方大学开办时规模不大，中共自一九二一年起始送第一批少数学生前往该校学习。至一九二三年名额逐渐增加，一九二三年十月间，上海苏联领事馆魏尔德 B. Wild 交文虎一电，内称东方大学决定本期招收中国学生四十名。文虎乃据以转告中央，中央颇感诧异，谓过去每次送学生不过十余名，此次何以竟有这许多名额。文虎当即出示电文，确为四十名。以后每年连续选送学生前往东大，遂以为常。一九二七年秋，因大革命失败，一次选送达百名以上。而由欧洲、德、法支部前往东大之中国学生为数亦多。

三、自中国境内遣送学生五批：由中国境内赴东大学生第一批有彭述之、罗觉、尹宽等十余人。第二批有任弼时、李仲武、许之桢、周兆秋、傅大庆、王一飞、肖劲光等十余名。第三批有王警东、黄逸恭、汪奕年、梁鹏万、刘俊、王鹤寿、张琴秋、彭桂秋、李沛泽、张

锡瑗、沈泽民等四十名。第四批（一九二五年）有向警予、高其度、陈比难、杜叔林等二十名。第五批（一九二七年）有曾钟圣、刘伯承、熊受喧、罗章凤、王壬、夏曦、陈昌浩、于芝生、徐特立、江浩（养元）、王铁城等一百余名。

四、自法、德二国转学学生：由法国支部第一批赴东大者有：赵世炎、陈乔年、陈延年、王若飞、范易、高峰、陈九鼎、王人达、黄平万、陈闻纳、李季达、郭隆贞等。第二批从巴黎赴东大者有邓希贤（小平）、马玉夫、汪泽楷、李味农、郭大猷、任卓宣、汪盛荻（浩）、欧阳钦等，前后亦有数十人云。由德国赴东方大学生有李季、肖子璋、廖焕星、熊雄、王人旋、朱玉阶等（朱在东大未久留，即归国）。以上均一九二七年前事，时文虎留驻巴黎与柏林，曾经手办理留德、法学生入学事。

五、东大的变迁：东大校长原为 Radaek，博学有革命功勋，德意志历史学教授，一九〇七年以来他与列宁共事，曾出席一九一五年德国 Zimmerwald（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为会议主持人。一九一七年参加十月革命，后为第三国际委员，被任为东方大学校长。当时东方大学对东方各国（中国、日本、朝鲜、越南、印尼、印度等国）来的学生，实行助学金制度，每月发六十卢布，并择要发给日用品，学习期间通常为三年，有时则按工作需要加以增减。中共所选送学生，其中有些是中共高级干部子弟或革命烈属子弟。除在东大学习外，还有一部分学生在苏联学习军事技术，如刘伯承在陆军参谋学校，罗章凤与朱瑞在炮兵学校，还有人进航空学校和工程学校从事专业学习。在早期国内工农分子送往东大学生，其中大多数品德优良，对革命工作有贡献，但是，后来由于东方部用人不当，主其事者易为 Mif，利用职权在校内进行宗派活动，培植私党，排斥异己，垄断学校行政，弄得全校乌烟瘴气。不少学生在 Mif 影响下学习松弛，政治质量低劣，不断闹无原则纠纷，如前期归国的彭述之等人所组成的小组织，后期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便是显著的例子。

六、中山大学及其合并：苏联在国共合作期间又成立中山大学（孙逸仙大学）。一九二五年前后，由国民党系统选送学生一百五十名，内广东学生居半数，计七十余名，次为湖南居五分之一，约三十名，其他北方各省四十名（其中女生十多名）。中山大学学生中，部分是国民党中央级干部子弟，另一部分是国民党省级以下子弟及其附属亲随或杂牌反共分子。其重要分子如：康泽、邓文仪、贺衷寒、梁干乔、蒋经国、邵力子等。

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中山大学名义取消，一部分学生送回中国，所余学生并于东方大学。由是东大内部派系复杂，国民党与国家主义

分子等兴风作浪，喧宾夺主，这些就是王明、博古、张闻天、潘闻宥、唐虞、宋明诗、殷鉴与汪浩等一伙，所谓东大支部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后来 Mif 在东大发动夺权斗争，自此以后，M. 独霸东大，关于学生进退、政治生活全归 M. 党徒掌握。M. 家庭出身原是犹太商人，逢迎上司，玩弄阴谋诡计是其所长。他成立宗派后，大批排斥优秀革命干部于党外，从此以后，东方部对中国党独裁专断，坚持宗派统治，经常弁髦党章，排斥异己，一意孤行，而对于中国革命本身及中共命运等重大问题反而置诸脑后，漠不关心，其结果遂延长中国革命，使陷于长期溃败的绝境，至一九三三年后而城市工作全局瓦解！所以自中国革命考察，东方大学培训政策在 M. 领导下，可谓全部失败！M. 本人亦于一九四二年因◇案被杀。

[注]：蒋经国乃蒋介石之子，于国共合作时往东大学习，加入共产党，后转学军事，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反共后被作为人质，经国乃公开发表反蒋文告，一九四二年与叶挺交换释放回国。

十六、革命高潮 — 武汉国共合作政府¹

一九二六年九月六日，北伐军克复汉口后，鲍罗廷、张特立、谭平山即来到武汉主持军政。随后十月攻下武昌，中央派中委罗章龙、项英、陈潭秋、王荷波、史文彬等赴鄂，组织湖北省委、全总、铁总等工会机构，决定武汉工作一切暂由驻汉中央委员会同鲍罗廷共同商议办理。因此自一九二六年十月起，武汉政治党务主要由以上诸中委及湖北省委负责主持。

一、北伐经过：此次北伐第一路迅速成功，首先到达武汉，乃由于中共在政治方面政策正确，作战计划切合实际，将士用命等因素所造成。北伐作战计划以收复长江流域为第一阶段。布留陔尔到武汉时曾就第一阶段作战情况向中共中委、省委作了一次报告。报告大意说：第一次北伐作战完全依照上年广州北伐筹备会议原则实施，一切经过大致符合要求。

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广州国民政府举行誓师大会，动员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七军共六个军（第五军李福林留守广州），北伐共分三路出兵五万五千人。第一路以第四军为主力，向湖南进军（唐生智为副）；第二路蒋介石自领，以第一、二、三、七军为主力向江西进军，鲍罗廷随行；第三路以第六军为主力，向福建、浙江进军。

第一路北伐军进入湖南，以独立团为主力，叶挺于七月十二日率独立团向安仁进军，在淩田击溃敌军一个团，俘敌官兵五十余人，醴陵战役，独立团俘敌三百五十人，缴枪三百支，机枪五挺。第四军进军平江，独立团与三十五团联合击败敌军，俘敌五千人，旅长陆潭被

¹ 自本章起的十章，已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资料》的第66、67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上以《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风雨历程》题连载，刊载时文字被改动。— 补注

杀。八月二十一日占领岳州，二十七日在汀泗桥向吴佩孚主力决战，叶率独立团向汀泗桥、贺胜桥进攻时，吴佩孚决死守不退，亲自上阵督战，杀临阵后退旅长某，枭首军前示众。独立团轮番冲锋，用刺刀作战苦战一昼夜，在重大伤亡后，将吴军主力击溃，歼敌四千人，俘敌二千名，缴枪四千支。即于九月六日进军占领汉口，逐吴佩孚。独立团与三十五团进围武昌，在攻城战役中，阵亡官兵曹渊等一百七十余人。于十月八日晨攻克武昌，俘敌官兵一万一千人，缴步枪一万支，机关枪四十挺，大炮二十门。第一路北伐军首先完成任务攻下武汉，共历时三个月。武昌攻下约一个月，蒋介石始克南昌（第二路十月抵江西武宁，十一月四日攻下九江，十一月八日克南昌）。武汉吴佩孚军队全部肃清，是北洋军阀统治全部崩溃的重要关键，至是吴主力完全消灭。

二、吴佩孚败逃：吴佩孚战败后，仓卒率卫队千余人循汉水而上逃往鄂北，意在入川依杨森、刘存厚以图再起。一九二八年至大竹县，赋长征诗，六月战败再逃绥定，投刘存厚。一九三〇年五月离绥定，刘存厚赠吴二万元被刘湘截击，中途困居樟木场，一九三一年逃往兰州，一九三二年二月至五原，随至包头，狼狽达北京，依张学良为活，张月给四千元。一九三九年冬死在北京，年六十五岁。

吴仓皇离开汉口，其在法租界黎黄陂路寓所被没收，改作第八军特别党部办公处。吴寓为二层楼洋房，吴生平为官，聚敛所得悉藏其中。计有商、周铜器，汉玉、宋瓷，善本古籍，碑帖、字画，端砚、钟表，麝香、人参，佛像都凡五百余目，三千多件，悉为唐生智囊括而去。

综吴一生，行伍出身，打仗是行家，迷信枪杆子。曹锟本无知妄人，吴有拥戴癖，尊之如师父。极愚忠愚孝之能事，对百姓平民满面杀气。

又武昌攻下时，敌军守将陈嘉谟、刘玉春遁入城内文华大学，想借外力保护渡江远遁，该校党员即以此事向省委报告，转知独立团派兵包围文华大学，并责令该校校长孟良佐（西人）交出二人，孟唯唯奉命，陈、刘二人遂被俘。两人随即释放，令其回乡。据阿金曾向文虎谈：她家乡人从普陀来说，刘玉春后在普陀山落发为僧云。

武昌攻克后影响所及，东南震动。首当其冲者厥为江西方面战局，急转直下，迅获解决。先是蒋介石率滇军朱培德（第三军）进军江西。九月二十日攻下南昌，由于孙传芳反攻，南昌复失。蒋落荒走，部队徘徊德安一带不敢前进，蒋介石告诉蒋先云欲等重整军后再战，乃向武汉求援。一月后，于十一月四日攻克九江，乃回师再攻下南昌，江西局势始定。

武汉和江西两路北伐经过略如上述。至于东路出征路线，最先是第一军从广东东江向福建进发，经浙江而达上海。当时福建北军周荫人，实力平常，又缺乏战斗意志，因此未经重大战役，何应钦、王柏龄师十二月占领福州，何等观望不前，且战且止，直至见到长江上游迭奏胜利，势如破竹，才随即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七日攻克杭州，占领上海。三月进逼南京，孙传芳退往江北。龙潭战役后，孙下野。

三、收回汉口、九江英国租界：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武汉国民政府开始行使职权（湖南、湖北两省政府亦相继成立）。武汉国民政府成立后二日，中共湖北省委即运用群众威力实行收回汉口英国租界。自一九二五年以来反英运动在中国南部高涨不息，北伐出师指向长江流域时，英国兵舰向远东增援戒备盖亟。一九二六年九月，英政府调地中海第三驱逐舰队来中国沿江布防，九月间英舰炮击四川万县，造成重大惨案，山是反英运动日趋高涨。北伐军到达武汉时，武汉江面麇集英国军舰，鱼雷艇达二十七艘，其它各国军舰合计三十五艘，以凡帝开德号为旗舰，炮衣退去，昼夜升火，保持作战戒备。

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武汉举行庆祝国民政府北迁与北伐胜利大会，人如潮涌，盛况空前。英舰水兵登陆袭击游行群众，刺死中国海员一人，伤十余人，群众大愤。中共省委（时中央尚未到武汉）决定于四日举行群众反英示威大会，并率到会群众冲入英租界，与英国巡警冲突，群众驱逐英国巡警，高呼反帝口号，声震街衢，巡捕罢岗，商店罢市，工厂罢工，市民齐集街头响应。英国驻汉领事希伯尔·郭飞 Herbert Goffe 见状大惧，狼狈从后门化装逃登江面英国军舰，并派人向武汉政府致意，请求保护个人安全。郭对中国素极傲慢，现在态度忽表软化。

中共省委开会讨论，认为汉口英国租界租期九十九年，应于一九二三年期满时交还中国，现在已逾限四年，中国有理由收回租界。即据理向英政府提出抗议，要求英国立即交还汉口英国租界，同时并派兵进入租界，占据英国领事馆，卸下英国米字国旗，悬上中国国旗。英政府被迫承认武汉国民政府要求，并同时承认交还九江英国租界。一月十四日并收回九江英租界。（天津英租界租期与汉口、九江相同，但因不属于武汉政府治下，所以英仍拒不交还。）

此次英国慑于武汉政府人民群众声威，英政府认为武汉政府相当强大，英国现已成为中国反帝运动中众矢之的，英国在长江上游租界给英国造成极大麻烦。英国人是素重现实外交，所以急流勇退，承认交还租界，藉以和缓反英局势。中国政府不发一弹，收回汉口英租界一事，震动世界舆论，武汉群众纷纷结队进入英租界游行庆祝，经过德国领事馆，顾问鲍罗廷立在阳台上操英语向市民发表祝贺演说。中

共省委代表文虎讲演时万众欢呼，经时不止。事后仲甫从沪来到武汉，在省委会上详询收回英租界经过后，向省委诸人说：“这次我们党总算为武汉市民留了点痕迹，湖北省委做得很对！”

收回汉口英租界事，造成浩大的反帝声势，全国人民对武汉政权耳目一新，其他帝国主义亦屏息旁观，不敢放肆。某次法国兵舰沿江上驶，在黄梅附近江面，炮轰中国守军。守军还击，击死法兵一名。中国据理向法国抗议，法国政府令驻汉口法国领事戴公德 G. de Comte 向武汉政府道歉了事。美领事弗兰克·罗哈德 Frank Lockhart 奉本国政府令，一再向武汉政府声明尊重中国主权。

四、武汉国民政府成立：一九二七年二月下旬，国民党中央在武汉召开二届三中全会，武汉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计三十六名，其中属于国民党的有：汪精卫、谭延闿、蒋介石、宋庆龄、孙科、徐谦、顾孟余、陈公博、邓演达、陈友仁等二十余人。属于共产党籍的委员有：张国焘、谭平山、林伯渠、于树德、韩麟符、杨匏安、毛泽东、高语罕、恽代英等十余人。三中全会选中央常委九人，为汪精卫、谭延闿、蒋介石、孙科、徐谦、顾孟余、陈公博、谭平山。谭平山为中共提名代表共方。在国民党中央，中共委员虽只占五分之一的少数，但主要决策均由两党联席会议决定。鲍以高等顾问名义参加联席会议，实际上拥有否决权。国共联席会议是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国民党二中全会决议设立的。

武汉政府组织在汪精卫未到武汉前，分工为：政务委员会主任邓演达，财政委员会主任陈公博，外交部长陈友仁，交通部长孙科，卫生部长刘瑞恒，农政部长谭平山，劳工部长苏兆征。中共在武汉政府分得劳工、农政二部席位，在省政府则分得工农厅一席。农政部原议为农民部，旨在推行土地政策，组织农民协会。汪、谭等认为目标太显露，不如改称农政部较为含混，中共勉从其意，但实际上面目全非，农政部遂成为闲曹，一切有关事务仍由各省农协自理。谭在部办公只是盖橡皮图章，签发公文而已。农政部设置土地委员会，委员多左派，但无实绩，外间讥为委员会，谓其推诿不负责任。劳工部原拟推史文彬担任（史为党龄最长的铁路工人，京汉铁路“二七”斗争领袖，近从保定狱中释出），因史谦辞，改推苏兆征，史任司长。

一九二七年三月一日，武汉国民政府正式办公。办公地址在汉口南洋大楼。湖北省政府为：詹大悲任财政厅，李汉俊任教育厅，董必武任工农厅长，张国恩任民政厅长（詹、董、张等原均湖北国民党员，一九二二年在鄂西搞军事失败，董系中共党员）。湖南省政府夏贻任工农厅长（五月二十一日去职）。

五、汪陈宣言：一九二七年四月八日深夜，中共中央书记陈独秀

自上海乘英轮到武汉。次日清晨召集原在武汉中委谈话。第三日即四月十日上午，在鲍公馆正式召开中央常委会议，仲甫在会上作政治报告，内容分为几项：（1）上海工人暴动失败后局势。（2）四月五日汪陈宣言及其经过。（3）当前关于武汉工作进展诸问题。就当前政局观察，四月五日汪陈宣言，颇关重要。先是一九二七年四月三日，汪精卫自欧洲返中国，抵上海后即往晤仲甫，商谈国共两党合作问题。（时北伐军已于三月二十一日占领上海，二十五日克南京。）汪陈二人会商结果，决定发表两党合作宣言，在上海各报公布，全文如次：

国民党共产党同志们：此时我们的国民革命虽然得到了胜利，我们的敌人不但仍然部分存在，并且还在那里伺察我们的弱点，想乘机进攻，推翻我们的胜利，所以我们的团结此时更非常必要。中国共产党坚决承认中国国民党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毫无疑问的重要，只有不愿意中国革命向前进的人才想打倒国民党，才想打倒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错误，也不至于主张打倒自己的友党，主张打倒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与军阀）素所反对之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使敌人称快。

无产阶级独裁制本是各国共产党最大限度的政纲之一，在俄国虽然实现了，照殖民地半殖民地政治经济的环境，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程，是否一定死板的经过同样形式的同样阶级，还是一个问题，何况依中国国民革命发展之趋势，现在固然不发生这样问题，即将来也不至发生。

中国所需要的是建立一个各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来对付反革命，不是甚么无产阶级独裁。两党合作本有各种不同的方式，重要之点是在两党大多数党员双方以善意的态度解决此问题，方不违背合作之根本精神。中国国民党多数同志凡是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及其对于中国国民党真实态度的人，都不会怀疑孙总理的联共政策。

现在国民革命发展到帝国主义的最后根据地上海，警醒了国内外一切反革命者，造谣中伤离间，无所不用其极。甲则曰：共产党组织工人政府，将冲入租界，贻害北伐军，将打倒国民党。乙则曰：国民党领袖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这类谣言，不审自何而起，国民党最高党部全体会议之决议，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解释，在共产党方面，爱护地方安宁秩序未必后于他人。对于国民政府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政策，亦表赞同。总工会亦已发表不单独入租界之宣言，对于市政府亦赞成各阶级合作政策，事实俱在，更无造谣之余地。

国共两党同志们，我们强大的敌人，不但想以武力对待我们，并且想以流言离间我们，以达其以赤制赤之计。我们应该站在革命观点上，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协商，开诚进行，政见即不尽

同，根本必须一致。两党同志果能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反间之言不获乘机而入也。披沥陈词，万希各自省察，勿致亲者所痛，仇者所快。中国革命幸甚，两党幸甚！汪精卫，陈独秀。一九二七年四月四日。（见1927年4月5日上海《时事新报》与《向导》周报）

上述宣言，综其要旨不过是说明共产党坚决承认国民党及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毫无疑问的需要，无产阶级独裁制不至发生，中国需要建立被压迫阶级的独裁。中国国民党多数同志不怀疑孙中山的联共政策。最后劝告两党同志须鉴于敌人之武力压迫及流言离间，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事事开诚协商进行，政见即不尽同，根本必须一致。

中共中央开会时，仲甫报告汪陈宣言商谈发表经过，他说当时上海革命危机在酝酿中，宣言真正旨意在争取舆论向蒋示威，使蒋孤立，同时奠定武汉国民党左派政府基础始克完成国民革命。在中央会议上鲍罗廷说：“宣言非常正确必要，且极有力量，符合国际指示，宣言所谈上海事虽未明白指蒋介石，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明眼人一见便晓。宣言对武汉政府一字未提，实则给予武汉政府很大支持。事后证明宣言使国民党左派政府延长了约百天的政治生命。”

十七、中共中央与湖北省委及其工作

在四月十日中共中央会议上曾决定下列诸事：（1）中央机构自即日起迁鄂办公。（2）追认湖北省委前所代行中央处理工作一切有效。（3）重新部署中央及地方党务、政治与军事等方面问题。

一、中央与省委阵容：仲甫来到武汉后，中央及地方党委组织人力才得到充实。当时中央、省委与各方面组织主要负责人大致如下：中共中央书记陈独秀，依次为张国焘、罗章龙、苏兆征、史文彬、毛泽东、陈潭秋、谭平山等分别担任组织、宣传、秘书等部门工作。湖北省委书记张国焘，组织部兼宣传部部长罗章龙，秘书处周唯真，工委书记林育南，农委陆沉，妇委袁浦之，军委顾顺章、叶挺、周恩来。省委各部工作人员有彭湃、吴德峰、向警予、谢怀西等。汉口市委书记吴汝铭，组织许白昊、许之桢，宣传宛希严，工委项英，农委陈荫林，妇委王亚璋等。共青团中央书记任弼时，委员贺昌、关向应、刘昌群、李子芬、李求实等。派往国民党政府工作人员为张国焘、恽代英、董必武、谢晋、林祖涵、谢远定，吴玉章、高语罕、宛希严、于树德、毛泽东、谭平山等。

二、省委办公处：湖北省委办公处先在武昌粮道街尚书巷刘祠，后迁胭脂山刘省长公馆。工会办公处：友益街辅仁别墅及尚德里。

省委房屋虽美轮美奂，富丽堂皇，但在武昌围城时候，门、窗、电灯、电线，破坏无存，家具搬走一空，省委干部只好躺在地板上开地铺，并搬用砖石木板垒成桌子，作为办公用。

某次汉口召开全市活动分子大会，请鲍罗廷作报告，因人数众多，桌椅奇缺，到会三百余人乃以稻草铺地，席地而坐听报告。鲍入室见状，颇感诧异。会毕，鲍临行告省委缺乏家具，对工作效率有碍，设法解决。后来分次租到一些木器，勉强敷用。

省委干部人数虽相当多，约近三百人，但因工作繁重，每人工作

时间都在十二小时以上，夜以继日，恒虞不足，因此大家十分劳累。又因伙食粗粝，营养不足，特别是五、六月间天气炎暑，露宿室外，精神益感疲乏。某夜，汉口市委干部齐集在江边趸船上开会，会毕露宿船头过夜，其中一位同志连宵熬夜失眠，天晓前回到寓所时将通行口令忘记，被纠察队拘留，他精神困顿，就在拘留所地板上呼呼大睡，经队部唤醒查明，省委才派人接他回去。五月间，省委派员到前方劳军，中途轮船失事，死伤多人。

三、省委宣传部：湖北省委宣传部直辖宣传机构有《国民日报》，由沈雁冰主持，《楚光日报》，由宛希严办理，宣传训练班由徐活莹（晴岚）负责。国民通讯社由邵季昂任社长，北伐宣传列车由袁大时任主任，汉口血花世界（民众乐园）由李之龙、唐性天主办。为印刷兼发行党刊物书籍起见，在汉口后城马路济生路口设立长江书店，由苏新甫任经理，又自设印刷厂，由毛泽民任经理。省委宣传部英文秘书原约定由范鸿劫担任，时范在北京。三月间范一度来鄂，文虎留范，范云：此行告假一月，尚须返京一行，料理诸务，并在北京结婚后挈眷南来（其未婚妻为北京司法部部员某之女）。文虎嘱其速去速来，范遂仍返北京。不料一去竟陷北狱，为张作霖所绞杀。

四、武汉工人运动：省委调动党内优秀男女干部四百多人，以全力开展武汉工人运动，在短期内成产业工会、手工业工会、店员工会二百余个，有组织会员五十二万人。并在宜昌、沙市、黄冈、黄石等县组织各级工会，人数超过二十万人以上。省委宣传部先后在武汉及各城市设立工人补习学校、工人子弟学校五百余所，参加学习人数前后四万余人。省委设立工人运动讲习所（所长文虎），培养工会干部一千余人，地址在英租界一三三里，后迁黄陂会馆。

五、湖北农运：自一九二六年起中国农民运动普遍开展，各地组织农民协会，一九二七年春湖南农民协会有会员二百万人，湖北亦近三百万人。广东、江西、福建、河南各省农民组织和斗争均有发展，全国农协会员达九百五十万人。一九二七年三月四日，各省农协代表在武汉召开全国农协联席会议，出席者有农民国际代表卜里次 Blitg，约克 York；湖北省农协代表陆沉、蔡以忱、陈荫林、郭树勋、符间一、刘子谷等；湖南省农协代表滕代远；江西省农协代表张兴万、方志敏；广东省农协代表彭湃；广西省农协代表谭寿林。当即决议筹组全国农民协会，统一组织，加强农民武装自卫，开展土地革命等议案。三月十四日湖北省农民协会正式成立，以鄂东各县为中心，有农协会员二百八十余万人，即在黄安、麻城、黄冈等处开展反抗地主、恶霸运动。当地领导干部主要有邱群生、刘振一、王健、秦绍勤、郑位三、肖人鹄、蔡济璜等五十余人。在黄安曾公审枪决大地主阮纯卿、李介人、

张廷英、吴惠存等，并解除地主团防武装，成立农民自卫队，为后日鄂豫皖农民暴动张本。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随国民党中央搬迁到武汉，设于武昌城黄巷，仍委毛泽东为所长，有学生数百人。发旧枪二十五支，七月十五日午后农讲所解散，枪亦被缴去。省委主办农政训练班有学生五百人，枪二百余杆，政变后随军东下。

六、关于工农武装：中共建党初期即全力组织与开展劳动运动和革命学生运动，一九二二年在工人运动高潮中，斗争渐趋激烈，在工会中工人纠察队普遍建立起后，遂要求进一步建立武装队伍，当时条件拘限于棍棒刀斧之类，虽购有少数自卫手枪，但为数极少（从洋行军火商购进）。一九二三年“二七”罢工后，工会干部渐渐认识到工人武装问题的重要性，后来经过五卅运动、省港罢工，北伐等革命运动高潮中，由于革命需要，各地党与群众迫不及待，渐渐发展工农武装，同时提出改造旧军队的问题。

在近几年时间中，党在南北各省陆续组织了一些武装纠察队，其中较著的有京汉及津浦铁路工会武装纠察队，省港罢工武装纠察队，江西安源、湖南水口山、锡矿山等地工会纠察队，河南焦作矿山纠察队等。最近湖北省工人纠察队、两湖农民协会武装纠察队等等。据不完全统计，各项枪支总数在五万以上，而且都是汉阳造的新枪。在工人纠察队方面，党十分注重组织训练、宣传教育、干部培养与武器供给等问题，并且在工作中培育了一些武装干部。

同时我们也在进行关于改造旧军队工作，比较为人们所注意的有叶挺、贺龙的部队，国民政府警卫团，中央军校学生队以及其他军事组织机构。当时接受党领导的军队总共枪支不下五万人。还有不少在政治方面接受中共的影响，虽难以估计，但也不可忽视。

前述新建置的军队、武装队伍大都是北伐前后惨淡经营，茁壮成长起来的。其中有第十一军的二十四师（师长叶挺），原驻武汉，后移防九江。第四军的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师长贺锦斋、贺炳炎），原驻鄂东地区，后移防九江。驻武汉的国民政府警卫团（团长卢德明、政委罗荣桓），张发奎部军官教导团（原武汉军分校学员改编），在南昌方面有第九军军官教导团（团长朱德）等。

这里值得提到的是：近年来中央及各地主要党组织大都成立了军委的机构，罗致了一些军事专门技术人才，推动了这方面工作向前发展。最先是北方区委成立军事工作人员专门小组，其中有张隐韬（河北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郭增昌（山西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骑兵连长）、茅延楨（安徽人，清河预备学校毕业）、张兆丰（河北

人，西北讲武堂毕业，步兵营长）、郭寿生（闽侯人，烟台海军学校毕业）、李之龙（湖北人，烟台海军学校毕业）、金佛庄（浙江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上述诸人以外，加入中共党员的军官还有：叶挺、朱德、刘伯承、段德昌、张逸、刘志丹、李天柱、宣侠父、徐向前、周士第、粟裕、陈士渠、罗荣桓、蒋先云、陈赓、李鸣珂、韦拔群、曾钟圣、熊宣、王先亚、余洒度等，均属知名将领或后起之秀的革命军人。

七、省委军运：湖北省委干部有长短枪四百余支，并经常经由海轮上购买手枪子弹，以资补充。省委干部全体均参加军事训练，实弹射击，由蒋先云、陈赓等担任教练。湖北省委军委工作颇繁剧，武汉中央军校各军事机关，部队公安机关政治部各方党支部武装工作党员凡一千二百余人，初均由省委指导。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由校务委员会五人负责，名义上是汪精卫、谭延闿、侯连瀛、邓演达、恽代英，实际驻校为邓、恽二人。各连队中四分之一为中共党员团员，主要负责人为李鸣珂、陈伯钧、许光达与张宗逊等。余三分之一为左派。七月间军分校学生改编为教导团属二方面军，在建立工人纠察队同时，又在二十四师新成立教导队，有学兵一千余名。（大队长孙树臣、副队长申朝宗，中队长李鸣珂，南昌暴动后改为警卫队。）

十八、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共中央迁鄂前后四个月内，武汉工农运动风起云蒸，波澜壮阔。当时，北京某报武汉通讯所记，谓如龙蛇起陆，虎兕出山，雷霆震惊，其声势浩大可以想见。但同时，武汉政府亦正处在强大敌人进攻、革命爆发严重危机的前面。

一、当前形势：中共中央处此千钧一发之际，必须对内加强团结，对外动员群众，合力御侮，才能继往开来，引导革命向更高阶段发展。五次代表大会事前筹备事务，主要由中央与省委秘书处联合办理，报告与决议等文件在国际代表参加下进行，制定草案。在决定会议开幕时间后，仲甫去邀请国民党中央代表参加。与汪见面时，汪满口答应，但神不专注，谭延闿首肯，连称一定到会参加。随后决定大会场标语，大会主席团名单。

四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昌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八十人，列席四十人，代表党员五万七千九百六十七人。共产国际代表、少共国际代表团与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团出席大会。会期自四月二十七日起至五月十四日止，共历十八天。会场在武昌都府堤武昌师范附属小学风雨操场。风雨操场是一所砖木结构平房，可容千人，有讲演台，由地面至屋顶无天花板。主席台悬有巨幅红布标语，右为：“把国共合作进行到底！”左为：“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会场四壁主要标语如次：反对帝国主义联合武力镇压中国革命！打倒世界资本主义！打倒蒋介石，打倒反动的资产阶级，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耕者有其田！革命民众组织义勇队，武装保卫革命根据地！

开幕时，首由文虎登台宣读大会筹备会推荐大会主席团二十四人名单，全场起立，热烈鼓掌通过。随后由书记宣布大会开幕，致开幕词。词毕由汪精卫代表国民党政祝词，最后罗易致词。国际其他代表

继续讲演，谭延闿静坐台上，双目微阖，除闻声鼓掌外，终席未发一言。大会开幕仪式完成时，有人建议此次为建党七年来第一次公开举行大会，宜摄影以留纪念，但未同意，遂作罢。

二、工农运动与党组织：仲甫在大会代表上届中央作工作报告，从报告中约略可以见到建党七年以来革命巨舟正向涨满潮汐的大海航行。如一九二一年党成立时，其党员寥寥可数，不足五十人，现已成为工农民众的中坚组织，有党员约六万人，团员五万人，合计十万人。革命工会会员几乎包括全国产业工人，据一九二七年三月统计：中国南部各省包括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广东、广西、江苏（无锡、上海）、浙江（宁波、杭州）等省主要城市，均先后成立了综合性工会，统计全国工会有会员二百九十余万人，全国农民协会登记会员九百五十万人，军队及工农武装力量近五万人。中共政治影响已遍及东南十数省几亿人口地区。由此可见建党以还，由于全党同心协力，勇猛前进，七年之中，成就未可厚非。如再经数年努力，前途希望更大！

三、五大会中心问题与决议：五大会讨论中心问题，见于下列几个重要决议，即：（1）关于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国问题之决议。（2）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3）土地革命问题决议。（4）职工运动决议。前两项决议案是总的政治路线，包括决定国共合作、土地改革方向等问题，均以第三国际决议为蓝本，而且由国际代表与仲甫亲自起草。后二个决议由中央工委、农委起草后，经过大会起草委员会讨论后由大会通过。主要精神是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政权与施行工农民主专政。

第五次大会宣言由国际代表执笔（英文稿），主要内容强调工农是革命的主要动力，阶级斗争与国民革命斗争同时并进。“五四”运动的领导者是小资产阶级式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学生，他们不自觉地趋向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尚未引进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现在的革命由于阶级分化与帝国主义干涉，必须使城市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协作，无产阶级必须与农民联合一致，农民必须与小地主建立同盟。革命政权应该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独裁，最后说国际形势有利于中国革命。

四、中委名录：大会选出中央委员四十人，其中正式中委二十九人，候补中委十一人。中委：陈独秀、张国焘、罗章龙、项英、史文彬、苏兆征、毛泽东、谭平山、彭述之、罗亦农、蔡和森、邓中夏、陈潭秋、恽代英、郭亮、周恩来、李立三、顾顺章、罗迈、王仲一、易礼容、陆沉、罗绮园、林育南、许白昊、张太雷、瞿秋白、吴汝铭、彭湃、陈延年、赵世炎等。

候补中委：黄平、陈郁、张金保、尹宽、唐鸿景、姚佐唐等。

十九、国共分歧

北伐军克复武昌后，国民政府之一部自广州移武汉办公，政府组织初具规模。时蒋介石所率军队局促江西一隅，迭遭挫败，士气沮丧，蒋思回粤练兵，重整旗鼓，对武汉心怀嫉妒。适浙江、江苏二路北伐军进展颇速，孙传芳军心动摇，无力支持，且在武汉方面吴佩孚败绩，江西局势好转，于是蒋介石野心复作。

一、蒋介石兔脱之一幕：先是一九二七年一月，武汉政府电蒋邀其来鄂。一月九日蒋自南昌轻装来武汉，本意在窥测武汉虚实，设法和缓反对空气，并希望暗中拉拢张发奎、唐生智及其他动摇军官，为己用。蒋介石到武汉后见军民气盛，工农斗争潮涌，内部无懈可乘，意态颇为消沉。在南洋大楼招待会上，鲍罗廷用教训口吻对蒋讲话，当众要蒋遵守党纪，服从中央，留武汉工作。蒋自以为身为总司令，当受鲍训斥，极感难堪！但强自抑制，勉力支吾说，本人暂留南昌，目的在督促东路军事，与敌人作最后决战。会后蒋连夜悄然乘自备小艇离汉口回江西而去。

鲍闻蒋不辞而去离武汉讯息，知事态蹊跷，颇以为悔，并预料蒋此番回到江西后，决不会从此罢休，但亦无可奈何。当时外间猜测纷纷，谣诼乘机四起。有人怨鲍鲁莽，不该当面斥蒋，无异打草惊蛇。武昌某支部老教员说：军事与政治对敌，本寓阴谋勾当，因此采用公开激怒蒋的作法实在有失明智。古人说：机事不密则害成。鲍对蒋急不择言，无异纵虎归山，确属误事不浅。

当时省委方面更有人责鲍何不当场将蒋扣留。但是春木说，此事关系重大，鲍个人不敢擅专，一定要请示国际。国际当时政策对蒋只限于运用公开批评方式，所以亦不会同意扣留蒋的办法，否则西安事变当在十年前演出。

一月九日蒋脱离武汉，事后亦有人责备仲甫应负造成日后祸患

任，其实仲甫当时尚在上海，并不知蒋到武汉情事，鲍亦来不及将此事与仲甫商量，故仲甫实无从知悉。至于鲍罗廷因事出仓卒未能当机立断采取非常手段，致时机稍纵即逝，事后亦自引咎。因此鲍后对人言：“自身积错可以沉舟”，殆与此事有关。

蒋不满鲍罗廷由来已久，蒋在北伐前即表示苏联接济如送牢饭（即吃不饱，饿不死的意思），北伐出师后，苏联已断绝供应，故蒋视鲍如眼中钉，自经此次受辱，遂于回到南昌后即来电致孙科等，斥鲍专横，干涉内政，主张解除鲍顾问职务。

二、武汉反蒋运动：时武汉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孙科、顾孟余等乘机主张欢迎汪精卫复职，树立自己一派势力。在中共支持下，自二月中旬起武汉开展反蒋运动，公布蒋介石反革命罪状，并提出“提高党权，打倒昏庸老朽的张静江”等口号。三月九日武汉决定召开国民党三中全会，并即电蒋参加，蒋如来武汉即可设法制服蒋，蒋知不利于己，拒不参加，一面派谭延闿来武汉周旋，同时积极布置军事，作与武汉决裂准备。谭到武汉时，态度更变左倾，同时陈公博代表汪精卫亦来到武汉。于是在国民党左派名义下，三中全会按预定计划进行。在三中全会上决定对蒋介石施行纪律制裁，揭发巩固党权，推翻军事独裁口号，同时在三中全会决定设立农政、劳工二部，由共产党员担任部长，并号召实行乡村自治，召集省民会议以实现政治民主化，坚决赞助工农运动等，由是革命联盟暂获巩固。

蒋介石在南昌闻三中全会对己施行制裁，大为恚忿，召集部下会议决定肃清江西、安徽、江浙中共势力。自三月初起大肆屠杀中共党员、工会领袖，破坏工农会组织。蒋介石于三月十一日在赣州主使杀害陈赞贤，三月十六日在南昌，十七日在九江，二十二日在安庆，二十四日在芜湖，二十九日在杭州等处，先后袭击中共及工会组织，大逞残杀，而以上海四·一二惨案为最著。当时上海资本家立即给蒋一千五百万元，预定事毕再给蒋三千万。蒋如虎附翼，益逞凶残！

四月十二日后约一星期，罗亦农等自沪脱难来汉报告“四·一二”惨杀情况。于是中央会议立即讨论对付蒋介石问题，当时决议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惩办蒋介石。四月十五日武汉国民党中央通过提案，开除蒋介石党籍，国民政府下令革除蒋介石总司令职，以冯玉祥代总司令，唐生智为副司令，并下令通缉蒋介石归案究办。

湖北省委根据决议，决定于四月十七日在武昌阅马场广场举行群众大会，声讨蒋介石罪行，到会工农市民共十余万人。会上群情愤激，国民党中央高语罕（中共党员）登台演讲，痛斥蒋介石反革命罪状，到会群众大受感动。（高身材魁硕，声如宏钟，向会上群众大声斥蒋道：国民政府不是蒋某私人的马桶，可以随着他屁股后面走的，只有

他到武汉来伏罪，听命于政府，断没有政府反去迁就他一个独夫的道理。)

时湖北省委即刊印“蒋介石的裸体跳舞”小册子数十万份。该小册子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秘书刘子青所写，历叙自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事变起到最近止，蒋介石破坏革命的种种行动，分析透彻，痛快淋漓。邓演达阅后，大为动容，立予翻印十万册，遍发各军。(该册底稿系政治部科长章伯钧向省委宣传部取去)其它机关纷纷翻印，后蒋介石曾悬重赏通缉刘。但事经三十年后郭某(沫若)忽出头将此文著作权据为己有，报章宣传误信为真，◇◇谓郭某此种行径实属冒名顶替，乃与杜少陵诗所称：公然抱茅入竹去……对面为盗窃无异。

蒋先云于四月从南昌来到武昌向省委口头报告，蒋介石亲口对他说过，对于武汉政府的各项策划，非常详细。会后先云并写成一个书面报告，长达万余字，在报告中他建议早作军事准备与蒋决裂。当时省委会上一致同意先云的报告，且有人谈到乘蒋目前羽翼未丰，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打击，可将其制服。如此则东南半壁可以收复，武汉政府进战退守措置裕如，并用潜力深入社会革命，北方军阀将无可施为。

三、东征问题辩论：讨蒋会后，湖北省委开会讨论对蒋军事制裁问题，会上一致认为一纸褫职命令，徒托空言，于事无补，建议中央应速决定出师东征，捉拿蒋介石，交付人民公审。次日中共中央会议正式讨论东征问题，出席中央会议如国焘、文虎、荷波等主张迅速动员东征，否则养痍遗患。多数人发言一致同意主张立即东征，其理由：

(1) 全国正处于革命高潮，蒋破坏革命甘为戎首，讨蒋师出有名，名正言顺，于战事有利。且蒋初到南京，人心未附，军心动摇，预计师行所至，必有望风归顺者。(2) 就双方军事实力言，蒋介石直接指挥军队为何应钦第一军的三个师约有兵力二万人；其所影响的军队为，李宗仁第七军一万五千人，第十六军三万五千人，赖世璜第十四军约五千人，浙军第十七、第十九军约一万人，皖军第二十七、第三十七军约二万人，叶开鑫暂编第五军约六千人，柏文蔚第三十三军约四千人，广东军团约二万人，以上合计约十二万人，共有机枪一百五十挺，炮六十尊，其中观望阴持两端者大有人在。武汉政府能直接指挥军队约十二万人，其质量远胜于蒋方，且有雄厚的工农群众组织为其后盾，故当前真正优势应属于武汉。(3) 此外尚有一重大理由即如果东征可顺便将唐张军队送走，使他们向东南发展，后方扼守武胜关，可以全力深入工农群众发动土地革命，扩大群众政治权力与武装力量，其利甚多。

但会议上同时持反对意见者亦大有人在，反对理由是：(1) 武汉

国民政府内部意见不一致，对蒋首鼠两端，如汪、谭均不主张东征，他们说北洋军阀未全部解决，国民党内部不宜用兵贻人口实。(2) 出兵东征则后方空虚，恐北方军阀南下侵入鄂境。(3)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东南沿海帝国主义势力强大，目前应避免与帝国主义接触，否则在强大的帝国主义面前，不降即溃。(此乃由于对当时帝国主义内部矛盾认识不清，过分恐惧情绪作梗，也造成对东征策略的犹豫与怀疑。其实当时帝国主义内部矛盾重重，尚无在远东引起战争的决心。省港罢工，上海工人暴动，汉口、九江英国租界的收回，以及后来许多事实均足以证明。)(4) 最后理由是冯玉祥盘踞西北，拥有强大实力，冯对武汉信誓旦旦，可以为我方出力，如能迎冯出关，则武汉实力增大，蒋势将为之日蹙。而更为重要者是第三国际的意见，当时国际方面意见既认蒋为革命内部矛盾，不宜用兵，同时又认为冯玉祥为可靠的联盟者，所以出师北伐，把冯从陕西迎接出关，足以藉冯力以制蒋，将来革命形势有变化时，西北亦不失为缓冲地带，此即所谓西北路线的形成。因此中央会议讨论结果，决定停止东征，改道北伐，北伐成功实行联冯制蒋，届时冯玉祥从北方出兵南下，直指金陵，蒋可以不战而服。但后来经过事实证明，结果与此完全相反。东征流产，全局皆输。蒋介石知武汉决定不威胁南京，他一方面利用四川军阀及夏斗寅袭击武汉，一方面暗中与冯玉祥勾结反共。自是以后东南属蒋，西北属冯，武汉偏安，势难久持。此乃由于国际对冯信任过深，为冯所卖，以致一误再误，弄得全盘皆输，诚非始料所及！

四、第二次北伐成功与失策：东征既已中止进行，武汉国民政府乃决定出师北伐(所谓第二次北伐)，第二次北伐仍以第四军为主力。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日在南湖举行誓师典礼，随即是第四军、二十军乘车北开，越二日我军出武胜关，攻下信阳。五月二十六日师次临颖，以重大牺牲击溃奉军富双英军，六月六日占领郑州及开封，打通了陇海全线，第二次北伐乃告完成。第二次北伐成功后，北洋军阀土崩瓦解。四月，阎锡山向南方投降。孙传芳军全部崩溃，孙下野后在天津居士林被刺身死。北京方面先是一九二六年直皖系军阀失势，段祺瑞执政政府消灭，关外奉系军阀统兵进入北京，自称大元帅。六月张作霖见局势不利，退回奉天，在皇姑屯被炸死。张宗昌亦遇刺身死。至此北洋军阀统治告终，继起者乃蒋、冯、阎等新军阀，南方则为粤、桂、川、滇等新军阀。

五、郑州会议：武汉出师占领郑州及开封，此时冯玉祥军乘势东出与武汉军会师。六月十日召开郑州会议。十三日会毕，汪、谭、唐等返汉，六月十五日北伐军奉令复员回师武汉。此次郑州会议系由冯玉祥为主角，蒋介石幕后操纵。郑州会议参加人为：谭延闿、汪精卫、

二十、湘鄂军阀武装叛乱

郑州会议与徐州会议是重大的政治危机，紧接着便是蒋介石策动的夏斗寅反水与川军东下，其次是湖南唐生智部队许克祥发动的马日事变。在这几次直接威胁武汉的军事行动后，武汉政治与经济危机更加深入了。

一、鄂西兵变：武汉政府出师河南时，蒋介石见武汉后方空虚，乃自四月二十五日起一面令安徽军队向西移动，威胁武汉；一面重金收买鄂西驻军刘佐龙及第十五军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反水，袭击武汉。夏受蒋命于五月十七日动员西下，连占沙市、岳州，急行军直扑武昌。夏军前锋已达距武昌四十里之纸坊时，叶挺奉命率第二十四师奋勇阻击，战斗激烈，将夏师击溃，俘敌千人，追至新堤始回，二十四师亦伤亡一千二百人，夏军残部向江西方面退却。是役武汉市内全军出堵，后方秩序由工人纠察队维持。中共省委发起组织前线慰劳，由各方组织慰劳团赴战地劳军，士气盖振。夏斗寅攻武汉到纸坊时，中央军校学生组成中央独立师赴援，在金口乘轮覆舟失事，死六十多人。

夏师既溃，蒋介石又收买四川杨森军东下窜扰，杨军于五月二十四日开拔，二十八日到达潜江、天门附近地区，距武汉一百公里，武汉政府调回前线二十军并十一军共五师兵力迎击，杨森军败退。

二、长沙马日事变：长沙马日事变是地主与工农斗争过程中的产物。当时湖南为新军阀唐生智所统治，农民协会蚕食一部乡村政权，二者相激相荡，到无法调和时便发生武装冲突。而酿成武装冲突的主要导火线，厥为试行工农专政的各项打击地主阶级的措施。如一九二七年一月四日，工会、农协会与长沙工农学商会，联合组织湖南省特别法庭，根据惩治土豪劣绅条例，捕杀李右文（赵恒惕的军务司长）、俞敦华、叶德辉、李石卿（铜官恶霸）等人，同时各县先后处决豪绅数十人，如宁乡刘昭、杨致泽，湘潭晏容秋等是。叶德辉被杀，在当

时官绅界发生重大震动。叶德辉为满清遗老，与旧军阀关系极深，素仇苏共，出言不逊。

先是在马日事变前，湖南各地已发生武装冲突。如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一日，陶柳军队捕去长沙工会纠察队三十余名。十五日临湘农民协会委员长李柱中被杀。十八日常德近郊农协委员长被杀。十九日浏阳县工会及农协被军队占领，农民自卫军与工人纠察队被解散。同日晚长沙三十五军留守处向工人纠察队寻衅，解除纠察队武装。此外在湘南、湘西、湘东各县，工农与地主武装冲突均在不断发生。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七日，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与第三十六军、第十五军、第八军军长在武昌举行秘密会议，讨论宁汉合作及分共问题。何键报告唐生智、汪精卫同意镇压农民运动。在武昌会议后约四日，长沙驻军许克祥的三十三团，于五月二十一日夜发动地方政变（王东原三十五团亦驻城外）。五月二十一日晚许团围攻工会、农会、省党部，五月二十二日省工会死四人，省农会死十余人，工运讲习所死伤六人，党校死二人。当晚，在略作抵抗后，工会农会纠察队武装被缴去，监囚被释放。又在马日事变中干部被逮杀者有：学生会负责人田波扬及其妻陈爱云，贾荣吉，省党部秘书贾云伯，省民会议代表李异云、贺国英等均被害。

马日事变系试探性进攻性质，主其事者为湖南军阀及国民党反共分子仇鳌、肖翼琨、彭国钧等。（外间传蒋介石曾汇十万元与仇等，仇等送许克祥五万元，仇自得五万元。）唐生智于事后电许，嘉奖其行动。但当时武汉政府尚未决定全面反共，所以佯作不知，于五月二十六日派陈公博到湖南查办，并暗令许克祥率部向湖南南部广东边境移防。许速令开出长沙。

湘区省委在马日事变前疏于防范，临变不组织力量施行反击，仓皇失措，纷纷离职外逃。书记当晚出走躲避，亦有人赴安源避难，省委无主，一时陷于瘫痪。事变后组织残破，谎造情报，蒙蔽群众，希图卸责，均属错误行为。

二十一、中共中央 与湖北省委间关于应变问题的争议

自中共五大以后，武汉革命危机纷至沓来，中共中央与湖北省委曾经多次讨论应付当前局势有关诸问题。这些问题中主要包括政治斗争总的行动策略，军事部署与组织部署（巩固与发展）等方案。省委与中央曾为此引起重大争议，兹分别简述如次：

一、中共湖北省委紧急倡议与武装行动方案：四、五月间，武汉革命危机四伏，反动势力日益披猖，武汉革命感受威胁，事态恶化，形势岌岌可危！当时全党同志鉴于敌情严重，寝馈不安。起初还有人盼望上级改弦更张，以挽危局，但中央徘徊犹豫，未能当机立断，有所作为。当时湖北省委在中央肘腋之下，实际担任武汉全局工作，地位非常重要，关系全局安危，鉴于事机日迫，不容一误再误，所以省委奋不顾身，义无反顾，大胆向中央及时提出建议，要求采取措施捍卫革命政权，并寻求最妥善的解决方案。

这次扩大会议是从下而上（从支部到省委）发动起来的，同时也是由省委成员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共同做出的决定。最先是省委负责同志分别出席所属各支部会议时，了解到党基层同志对于当前政治、经济、军事危机纷纷表示意见，认为省委应当提出扭转目前局势的有效办法。与此同时，省委成员并分别向留驻在武汉的外省党组织负责同志及代表，革命群众组织等周諮博访，征询意见，所以这次扩大会议是体现广大革命群众意志，来研讨大家共同关心的重大政治问题。参加扩大会议者有本省市及各县代表，各工农兵组织党团书记。又，出席五大各省代表（留驻武汉者）均被邀请参加出席，以期集思广益。所以这是一次人数众多的会议。五月中旬后，在中共湖北省委胭脂山举行。

在扩大会议上，首先由文虎将召集会议意义与议程扼要作了报告，主要任务是集中时间讨论武装行动方案及与此有关的革命群众斗争等问题，并由省委就工会、农会、工农武装等问题分别作了专题报告。在长达亘三昼夜的开会时间中，出席会议的代表集中力量讨论省委报告。由于报告中所提示的问题论旨明确，而且又经过多日充分酝酿，所以经过一般性辩论后，一致同意省委报告，认为当前革命形势有如千钧一发，十分严重！应该组织一切力量积极向敌人反攻，才能冲破反革命的重重包围，消除革命危机，奠定大局，引导全国革命继续前进！

在省委扩大会上，来自各方面的中共党组织的代表们，纷纷就本人工作岗位和本人观察所得谈论到省委报告与建议的重要性。大家共同认识到目前武汉是革命首都，现在存在着严重的危机，这是革命的心腹之患，只有对反革命施行开刀截除的大手术，千万不能采取养痍遗患听其溃烂下去的方法。会议上还有种种具体的分析言论与意见，如云：“自‘四一二’政变后，上海劳动人民日夜盼望武汉政府实行东征，推翻蒋介石政府。但东征胜利应以巩固武汉革命政权为前提，否则后方牵制，难以成功。因此，当前迫切任务是肃清武汉反革命工作，这项工作应放在第一位，其次才能进一步促进全国革命平衡发展。”又有人说：“广东为革命老根据地，目前在桂系军阀统治下，全省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工农生活万分困难，亟盼武汉方面在大局安定后回师广东以解倒悬。如武汉革命政权瓦解，则南方革命将倒退数十年。”北方区委代表说：“冯玉祥新占河南，尽力扩军，横征暴敛，农民反对纷起，现今豫省遍地有红枪会存在，铁路矿山工人革命组织更可以发挥革命作用。又张兆丰同志陈师豫鄂边境，随时可以策应武汉行动。”湘省委代表说：“湖南境内唐生智军队实力空虚，湘赣边境防守单薄，我军随时可以进入湖南。江浙方面局势动荡，蒋介石还未完全取得控制权，也可以乘虚而入。”九江党委负责人谈：“江西境内党与工农会组织力量势不可侮，朱培德军力有限，而且战斗力薄弱，亟盼武汉方面奠定大局，派军东下，驻留江西，整军经武，然后西可以进湖南，东可以进浙江，南可以入广东。只有在武汉革命政权巩固之后，才能采取主动，推进全国革命高潮。”又安徽军阀残部陈调元地位介于鄂东赣北与武穴邻处，不能自保，我军可以偏师袭取安庆，如此屏蔽江西，进战退守，创造割据江东局面。

以上诸代表意见各有所见，但其总的精神是主张进攻，创立新局面。总之就目前局势说，汪唐内部矛盾重重，敌方立足未稳，是可以取胜的。更就当前武汉军事力量观察，武汉全部武装共有军队十二万人，其中坚决反共的有唐生智所部三万几千人。中共正规军约二、三

万人，第四军、第二军约三万人，但论战斗力以叶挺所部第十军为最强，加上湖北工农会组织力量的强大优势，是足以抗击敌军的。又见于历史上不少重大战役大都是利用敌方矛盾，以少击众获得胜利。如中国古代钜鹿之战，项羽以少击众；赤壁之战曹兵八十万，吴兵四万；淝水之战苻坚军六十万，晋兵八万。在西方历史如普法之战，苏俄十月革命均利用地利与人和以少击众。因此在武汉方面如坚决采取主动，有把握控制全局。

由于这次会议议程所讨论问题本质固极清楚，且经充分酝酿，所以在经过一般辩论后随即取得一致意见：通过省委建议并就具体方案执行内容作了广泛的补充。当时出席代表一致表示武汉为当前革命策源地，应集中一切力量不惜代价争取保卫革命首都武汉，立即采取紧急措施，以挽救革命危机。扩大会议讨论结果，通过省委建议与下列紧急行动纲领：（1）以湖北武汉工农组织为中心，夺取汉阳兵工厂储存武器及生产武器，武装工人二十万，农民五十万。（2）在武汉、南昌、长沙三地同时暴动，各县工会、农民协会一齐动手，组织地方乡村政权。（3）各省互相采取联络一致行动，使各省军阀自顾不暇，不能采取联合行动。（4）逐渐扩张暴动区域到长江、珠江流域及其他省份。（5）在各地暴动中推翻国民党政府，逮捕汪、唐，成立工农兵学商联合政权，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军阀、地、资势力。（6）联合各地反军阀势力，扩大暴动区域。（7）作长期战争准备，肃清南方内部后再举北伐。

根据上面的纲领，经扩大会讨论采纳入方案中计有以下几条：

军事方面（1）在武装动员方面，下令叶、贺主力军队（约十五个团）迅速集中武汉三镇，从事战斗准备。（2）中央军校员生全部扩编为一个师，准备作战。（3）中共控制之下国民政府警卫团，准备参加作战。（4）武汉市警察武装一律改编，加强作战准备。（5）武汉工人纠察队、农民协会武装进行扩大编制，准备参加作战。（6）责成汉阳党委迅即取出兵工厂库存枪支、武器、弹药，武装工农及党团员，编成独立师团。（7）派专人到河南，令张兆丰师向武汉移动，策应暴动。（8）电令湖南、江西省委协同一致行动；

在加强革命群众组织方面，（1）组织武汉三镇工人联合行动，以实力进行反击汪唐反动政权。（2）发动全省各县农民协会协同一致行动，扩大农民自卫武装，消灭地主武装。（3）下令各群众组织、青年学生、妇女等团体采取有效行动。（4）通知湖南、江西省委采取联合行动，就地夺取当地省、市、县各级权力，扩大武装。省委一致通过上述方案，公推文虎、荷波、史文彬、苏兆征出席中央会议时向中央及国际代表提出。

省委紧急议案送达中央后，次日中央举行会议提出讨论。在中央会议上，首由文虎即席说明提案理由与内容，并重申省委会议全体成员的决心，申请中央迅速做出相应的决定，成立行动机构，统筹一切，立即付诸实施。文虎强调这是千载一时的良机，稍纵即逝！全党应万众一心，破釜沉舟，力战克敌！

在中央会议上，多数中委纷纷发言附议省委方案，均认为目前舍此以外别无良策。在诸人热烈发言中，国际代表独排众议，表示异见。罗易与鲍罗廷先后发言，他们说话词句语气轻重各有不同，但总的立论却是一致，就是说：“省委建议与国际历来政策精神不相符合。目前任务是加强团结左派，千万不能闹分裂。”他们多次发言，均围绕团结左派问题上翻来复去，语不离宗，主张培养新左派（主要是指邓演达等），别的都谈不到！最后仲甫发言，他认为省委行动方案危险性极大，弄得不好，会招致一败涂地。他引用国际决议说：“新军阀（指蒋、冯）屠杀工农，但他们仍反对北方军阀（八次执委全会决议案）。”言外之意是：革命危机听其发展下去，宁可革命受挫，不能与左派翻脸。仲甫又主张：“保存实力，观察敌人内部矛盾发展，以图他日卷土重来。”因他坚信敌人阵营决不会稳定，中共只要保有相当政治、军事、组织力量，就可以举足轻重，选择作战机会，乘时推动革命向前发展。

此时会场上双方展开激烈辩论，互不相让。正在争论难解的时候，最后国际代表说，此案关系重大，今天难作决定，宣布会议暂停，以后当慎重考虑，从长计议。按照中共中央会议以往惯例，国际代表和书记实际上都拥有否决权，遇到纷争难决的时候，往往他们片言可以息争。所以在这次会议上，省委的建议未经表决就被搁下来了。文虎当场郑重声明保留鄂省委意见（即不放弃原方案主张），于是会议无结果而散。当时出席会议的省委成员，心虽愤懑不平，但亦无可奈何，只有付之浩叹！回省委后，对党员同志还花了很多时间去解释这个问题。以后的工作便是计划如何处理中共武装与转入地下工作的问题。

按：当时就暴动时机上说，事后判断第二次北伐是最好行动时机，当时唐生智军队全部开赴郑州，张发奎部亦在河南，唐部留在湖南只四个团，武汉全为叶、贺及工农武装所控制，所以最初鄂省委提议立即行动，意思是应争取在六月初旬即郑州会议瞬息时间发动。六月初旬大致是指六月五日武汉政府宣告解除鲍罗廷、加仑顾问合同，与六月十日郑州会议时间。但是在郑州会议以后，如果计策适合机宜，没有罗易泄密问题发生，在争取友军等方面，仍然可以采取反击行动。但错过此时以后，再强调进攻，敌方已告稳定，也就不及时了。

二十二、国共分离

一、武汉经济危机：自东征流产，北伐失败，夏斗寅反水于宜昌，许克祥作乱于长沙，军事应付只有招架之功，却无还手之力。同时武汉内部经济危机亦日不暇给，迎面逼来。首先是政府方面的财政赤字，其次是社会经济危机的产生。就政府财政方面说，自一九二六年七月出师北伐，至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前后一年间均处于军事动荡时期，政府开支绝大部分用之于军费。广东政府原有六个军，二个独立师，四个独立旅，官兵共九万人。北伐后第一次扩军，一九二六年六月间李宗仁为第七军，唐生智为第八军，滇黔军朱培德为第九、十军。北伐军攻下武昌实行第二次扩军，唐生智第八军部扩为三军，张发奎第四军扩为二军，其他独立军、师部队各有扩充，共约二十个军，共有官兵二十五万人。武汉方面有正式军队十二万人，每月耗军饷数百万，占收入百分之九十。此项军饷大都由各地驻军就地筹集，武汉政府只靠少量税收维持政费，省政府则靠地方税维持，且税源日少，税率反而日增。因军事时期生产萎缩，交通阻梗，经济调节失宜，地主资本家乘机破坏，于是生产降低，失业增加，物价增高，通货膨胀等现象相应发生，工农实际工资下降，人民生活水平日下，这样形成经济危机，财政奇窘。当时武汉政府主要筹款方式是采取发行库卷，向工商银行界筹募捐款，没收敌产，集中现金等办法，以济急需。经常税收以江海关厘税为主。如第一次向武汉银行借款一百五十万元，四月十四日发行国库卷九百万元，四月十七日集中现金得四百万元，又一次向宜昌商会筹借五百万元。

当时武汉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进口、出口贸易停顿，银行、企业、洋行、工厂关闭，现金逃亡，以致许多工业原料供应不足，煤油、食盐等脱销。同时北方军阀与冯玉祥截断京汉铁路，李济深封锁粤汉交通，蒋介石封锁长江下游航道，

四川军阀封锁长江上游航道，这样共同造成武汉经济的瘫痪。当时武汉三镇共有失业工人及贫民二十五万人，依赖政府救济，给政府带来很多困难。人民生活窘困，谣言横生，更加酿成社会秩序不宁。这一切汪唐等左派人物为推卸责任起见，一律说成是工农政策所造成，应由中共单独负责。

二、工人纠察队解散：在湖北夏斗寅反水及湖南许克祥作乱两次事变后，中共中央处境益臻危殆。当时党内感到未来事变来临，将更有加无已，这是洞若观火的事，为了预防局势更加恶化起见，中共负责人考虑到各种应变方案，并且自然而然地考虑加强武装自卫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当时采取两种方式，一是扩大工农纠察队伍，二是加强中共所掌握的各军队的数量与质量。话虽如此，但是就当前形势看来，仍属缓不济急，因为敌视中共的国民党军阀武装力量自北伐以后是以倍数增加，但是中共自行武装问题却不易实现。在北伐军到武汉后，武装工农问题几乎成为中央与省委经常注意的问题。当时武装工农的方式有二，一方面是成立武装纠察队，直接建立清一色的工会、农会阶级军队；其次是充实改变中共控制下的旧式军队，输入工农出身士兵，派遣党员干部加强训练。自湖北省总工会成立后即开始组织纠察队一千人，湖北省委由文虎出面于二月至三月间设法向汉阳兵工厂取得枪支一批，计三百支。时邓演达任兵工厂厂长，该厂每月可制造步枪二百五十支，加班生产可达三百支。当时邓左倾，对省委要求尽量满足，五月间省委又先后向兵工厂交涉，购买步枪一千余支（每支官价三十五元），同时并为湖南总工会、湖北农民协会购得枪支子弹等装备，但未全部到手。总工会纠察队在收回英租界斗争中，在夏斗寅事变之役，在市内担任维持革命秩序，发挥着颇大作用，因此，军阀唐生智等多方设法攻击纠察队，流言蜚语，杂以挑衅，视纠察队为心腹之患。一九二七年六月间，革命危机日益发展，鲍罗廷既去职，纠察队遂成为反动军阀攻击的目标。国民政府左派分子汪精卫、徐谦等屡次在国共联席会议上，撺掇传闻提出纠察队不法问题，其势汹汹，不达解散纠察队目的不止。仲甫虽经多次加以解释毫无效果，攻势不惟未见和缓，反而变本加厉，外间传说李品仙将冲入友益街实行武力解决。直到六月中旬，仲甫在中央及省委会议上，乃正式提出纠察队存在问题。仲甫说：纠察队问题如箭在弦上，如不解决，对方势不罢休，可能成为爆发国共双方武装冲突的导火线。

鄂省委对于解散武装纠察队的抗议，在讨论纠察队问题时，省委及总工会一致不同意自动解散，认为这样将助长敌人气焰。文虎、周逸群在省委会上力言纠察队不能自动解散，万一国民党不能谅解，我们建议可以移防调到别处训练。这样会议上意见不能一致，讨论很久

没有作出决定。随后国民党方面催促再三，仲甫再召集省委及湖北省总工会负责人开会，讨论放弃纠察队武装问题。当时大家都认为这个问题即是对国民党是否决裂的问题，因此也是决定进攻与退守的问题。当时鲍已离开武汉，罗易代表国际竭力反对与国民党决裂。（罗易尝云：无产阶级并非革命的唯一指导者 Leadership，不过他在革命斗争中执行领导权 Hegemony 罢了。）仲甫对国际训谨服从，为顾全大局起见，就不惜步步退让以求苟全。此时他无可奈何说道：“纠察队几百条枪实在不能起多大作用，为大局着想只有忍痛放弃。”总工会上层分子刘、李等随声附和，主张息事宁人，议遂定。总工会乃于六月二十八日宣布解散纠察队，并将所有枪支子弹一律缴还政府（事实上还留下些枪支子弹并未全缴）。该项枪支交武汉卫戍司令部收，同时致公函于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说明原委。六月二十八日李品仙军队占领湖北工会，引起武汉工人极大愤怒，但欲抗不能，工人们在国际、中央俱表示不满。

纠察队被迫解散是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事件。中共湖北省委半年以来一方面武装工农，成立新型军队，另一方面改造原有部队，上述两种方式双管齐下，逐渐取得三万军队，但是就革命形势不断进展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微不足道。当时所以不能大刀阔斧进行迅速建立党的正式军队，主要是由于国民党的歧视。其次国民党左派在大量扩军，以倍数计算增加兵员，汉阳兵工厂武器生产力不大，所以供不应求，争夺甚烈，而自国外大批输入又受政治、经济条件的种种限制。而自五月以后，国共双方关系日趋紧张，根据国际来信指示，只有对国民党忍辱负重，降心相从，以固团结。于是节节后退，即原有武装亦难自保，遑论扩军？自此以后，敌势日张，革命政权失御，失败遂成定局。而且从一九二七年南昌暴动失败以后，中共既失去数万武器，遂不得不采用牺牲数倍或十数倍生命，凭赤手空拳去从敌人手中把苏联及美国先后送给蒋介石的大量武器夺取过来的办法，来进行反击国民党，其代价可谓浩大。

三、国际忽传来武装二万党军指示：与纠察队自动解散差不多同时，中共忽然奉到第三国际六月间来信，指示中共武装二万共产党员的信件。该信是罗易向中央会议正式提出讨论的，指示要点如下：（1）实行土地革命自下而上，从上而下没收与分配土地。（2）罢免动摇将领，武装二万共产党员，并从两湖选出工农分子五万人组织新军。（3）改组国民党，使它成为群众的组织。该信在中央会议上传阅时，罗易随加以说明，颇感兴奋。仲甫听后默不作声，似有难色，轻声说道：“人是现成的，随时都可编队，只是枪从何来？”说罢，把国际指示信件，提交会议讨论。

大家在讨论这个指示时，中委多认为争取工农武装，在五月以前早就应该提出，那时汪唐对中共尚能表恭顺，但目前形势已非，汪唐态度大非昔比，此时要通过国共联席会议的和平方式来武装工农是行不通的，用和平方式改组国民党，由汪精卫来一个右的清党，现在更是空想。所以国际指示无异临渴掘井，也可以说指示来得不及时，缺少现实性。至于采用非和平方式去取得武装，那就是一个组织内战问题，换句话说，就是要从新军阀手中夺取武器，但是国际来信显然不主张这样做，来信指示紧紧靠拢国民党左派政府，中共不应自树一帜，所以对信件讨论一时竟无结果。而更出意外的是罗易旋将国际指示信出示汪精卫，汪遂以此为藉口，大做文章，说陈独秀图谋不轨，危害党国，并以此为理由，宣布分共。罗易执行国际命令，本意向汪开诚布公，团结新左派政府，结果是与虎谋皮，打草惊蛇，汪竟以恶声相报。事已至此，自觉无可如何，于是外间后来喧传罗易向汪精卫泄露秘密。关于罗易向汪暗中输情有二说：一说罗易奉国际命令行事，非个人行动，究竟罗所奉令内容如何，他人不得而知。另一说罗易素有稚气，对汪深信不疑，接指令后，估计此事不可能秘密进行，体会国际意图，不如明告汪为宜。就以上推论，罗易所为，似非暗中输情可知。

二十三、国共危机恶化过程与最后决裂

中共与国民党左派关系以郑州会议为分水岭。郑州会议前即六月十日前，国共联席会为武汉政府决策中枢，郑州会议后鲍罗廷停止出席联席会议，左派操纵会议迫使中共节节退让，国际接连不断命令中共对国民党左派容忍，并投身到国民党中去，使国民党成为劳动人民的党。但自六月中旬以后，两党关系日益恶化，至七月十五日乃完全决裂。

一、国际十一月决议：自一九二六年以来国际一贯主张中国革命事业应由中国国民党担负，并根据此种观点，发出一系列的指示，如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对中国革命问题决议有云：“中共应该使国民党成为真正平民的党。”因此，当时外间有人推断国际扶植国民党，逻辑上结论必然会解散共产党。

二、四月国际代表宣言：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二日汉口第三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发表宣言，谴责蒋介石背叛革命，其口号是“打倒蒋介石主义，打倒反革命的封建资产阶级，打倒帝国主义，国民政府万岁，国民党万岁”。宣言中竟不提及共产党。一九二七年五月十八日共产国际第八次扩大会议对中国问题决议文中强调说：“坚决反对退出国民党，国民党是中国固有的组织形式，是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与农民合作的党。”又云：“武汉政府及国民党左派，就其阶级成份说，不仅代表工农及手工业者，亦代表一部分中产阶级……他已经走向工农专政的道路上。”决议文中再次指出“应将国民党成为劳动群众的真正伟大的组织。”从国际指示中可以看出当时国际主要意旨：命令中共拥护国民党到底，中国革命宁可无共产党，但不可无国民党。第三国际领导把中国革命大业主观片面寄托在不断蜕化的国民党左派身上。

自五月份起汪精卫开始发动攻势，如五月八日汪下令禁止工人集

会游行，十四日下令禁止工人纠察队行使职权，十九日令对劳资纠纷实行强迫仲裁，二十三日下令保护绅耆，这一系列措施，国共双方展开了激烈斗争。六月一日武汉政府下令宣布苏联顾问鲍罗廷回国，鲍黯然受命，苏联政府默无表示，汪唐等喜形于色。六月五日，江西朱培德遣送苏联顾问出境后仓皇离汉。六月十九日蒋介石、冯玉祥徐州会议，冯玉祥素以“亲俄派”著名，所得苏联武器物资独多，至是倒戈，联蒋反共，苏联仍无表示，冯蒋声势益张。武汉方面受冯蒋鼓舞反共益烈。汪唐趾高气扬，目无中共，着着进攻，湖北总工会工人纠察队遂于六月二十八日被迫解除武装。六月二十八日李品仙派军队进占湖北总工会，限制工会活动，工会开始转入秘密活动，向忠发卷逃。（八月五日武汉卫戍司令部正式封闭总工会及其所属各工会。）汪唐为准备实行反共，在政变前先作好军事布置，七月六日第四集团军唐生智就总指挥职，张发奎就第四集团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唐、张准备以武力逐共，但张代汪发言仍强调国共合作到底。

三、中共中央决议十一条：中共中央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三十日在国际代表监临下，召开中央扩大会议，集中研究讨论国共关系问题，当时感到进退维谷，并无有效方略。当时多数中委见大局岌岌可危，纷纷请求到各省去做群众工作以挽危局，最后中央扩大会议秉承国际指示，通过国共两党关系决议十一条，其主要有六项：（1）承认国民党是工农小资联盟党及其对革命的领导地位。（2）两党联席会议不是国共会议公开执行形式，并非联合政权。（3）工农组织应受国民党部领导监督。（4）工人纠察队可减员或编入军队，纠察队不得捕人审讯。（5）限制店员工会拘捕店东及过高经济要求。（6）禁止童子团执行警察职务。但国民党左派认为中共软弱可欺，即迫使中共党员退出政府。中共中央书记陈独秀深信左派忠于革命，按照国际意图于一九二七年七月一日在“中国国民党的危险及其出路”一文中说道：“属望以汪精卫为中心的国民党左派团结起来，巩固正统的国民党，实现工农中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这次呼吁无效，直到分共前一星期，即七月八日，仲甫仍希望于汪精卫“来一个从左边的清党运动”。（《向导》二〇〇期）

四、国际训令不得退出国民党：一九二七年七月十日国际训令中共中央退出国民政府，但不得退出国民党。七月十日中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七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布退出国民政府宣言，同时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对时局宣言，主要是谴责武汉国民党领袖与封建地主及资产阶级同流合污，同情反革命，并列举下列事实为证：即四月间拒绝公布土地委员会关于土地制度改良的决议案，阻挠劳动法的制定与公布，并发出许多训

令限制工农运动，帮助反动派进攻农民协会，对许克祥屠杀工农采取放任态度等等。宣言严正声明：“中共将继续为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军阀进行斗争，为工人利益及解放农民而斗争。中国共产党永久认为革命利益与民众利益高于一切——较之保存某种政治联盟的领袖结合高出十倍。中国共产党不能放任背叛革命的军人以及犹豫骑墙的政治家，冒充国民党员假借孙中山的旗号以白文饰”（宣言刊在《向导》周报二〇一期）。与七月十三日宣言同时，中共中央提出国民革命的目前行动政纲草案，表明中共政治态度内容：（1）反帝国主义，反对列强武力干涉中国，收回租界，取消外商在华一切经济特权，实行关税自主等。（2）颁布工厂法，劳动保护法，统一财政，合并中、中、交三银行收为国有。（3）巩固革命联合，召集国民会议，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4）工人施行八小时工作制，规定最低工资，扫除封建式劳资关系，保护童工、女工，工人有组织工会、罢工、武装、纠察权等。（5）农民实行二五减租，没收大地主及反革命分子土地，保障佃耕权，严禁高利贷，取消团防局等。（6）对军人实行退伍军人分给土地，改良士兵生活，发清欠饷，优恤残废军人等。（7）对教育确定教育经费，增加小学教师薪金，提倡平民教育等。（8）禁止缠足、童养媳及买卖妇女。男女在法律、政治、经济与教育上一律平等。

五、国共分离：上述纲领是中共在大革命失败前夕留下的重要文献。在政纲公布后两日，即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汪精卫不顾一切，乃悍然宣布分共，国共双方正式决裂。七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宣言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中共党员，苏兆征直陈政见不合辞职，谭平山称病辞职，其他诸同志均奉中央命辞职，退出国民政府。

二十四、武汉国际人士及其撤退

武汉时期中共与国际组织接触频繁，故富有国际气氛，世界各国工农代表自二月十六日起先后到达武汉，在武汉参加省委所属各工会、农会工作，经时约五个月之久。这些代表分属于第三国际，少共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农民国际与妇女国际等组织。第三国际代表以印（度）共书记为主要负责人（罗易 Roy）。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团以美共书记柏尔特 Beraud、英共委员汤姆森 Tomson、法共书记多里阿 Dolio 等为主要成员。农民国际代表团代表为卜里茨 Blitz、约克 York 等。

一、罗易：罗易 Roy 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六日到武汉。罗，印度人，孟买富商子，留英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一九一五年被迫离开印度流亡瑞士，一九二四年致函英工党政府请求特赦未准，进入俄。他是印度共产党创建人之一，来中国时年四十许，其妻安娜 Ama 年十八岁，苏联人，随来武汉任秘书。罗易高自期许，遇事乐观，平日好大喜功，惟无远虑，但当时颇受重视。平山谓：“远来梵僧会念经，理有固然！”罗易与汪精卫往还稠密，汪见罗称先生，礼貌甚恭，罗自谓能影响汪，不知汪心怀诡诈，反玩罗易于股掌之上。国际指示武装二万共产党员文电到武汉，罗不加思索认为奇策，谓立刻可以扭转当前局势，因欣然往告汪，汪遂反目，据此分共，罗大窘，知上汪当，后悔不迭。罗离中国返莫斯科，无事可做，后不满意斯大林言行，乃自行返印度。罗回印度两年后于一九二九年七月公开自组新政团。

二、柏尔特：柏尔特 Beraud，美国人，少入加州大学读书，后赴欧洲游学，参加工人运动，为美国共产党创建人，被选为美共中央书记。柏体貌清癯，朴实诚笃，到中国后对各项现实政治问题详细观察分析至当，然后始作决定，对中国革命工作协助颇多。柏擅长说理，下笔如行云流水，实美洲工人运动中杰出人才。一九二八年仍留中国上海工作，柏对中国革命问题认为应循工人运动正轨，中道而行，用

最少牺牲获最大成效。如果路线失误，纵暂获成就，亦难免后日灾难。柏对于国共分裂，认为非出于偶然，今后如能认清路线，国共不合作，中国革命亦能成功。一九二八年柏返国。

三、**汤姆森**：汤姆森，英国利物浦工人，工人世家（三代均做工），英工会领袖，英气勃勃，年逾五十，皓首东来，遇事老成持重，备受群众尊重。汤姆森阅读收回英租界对外宣言，对文中谴责英国资产阶级为国际盗匪 Bandit 一词大为激赏。但对若干中国革命具体问题常示谦抑，询之则所知不足对。

四、**多里阿**：多里阿 Dolio，法国共产党创建人，年富力强，正直不阿，对中国革命十分热爱，热烈赞扬中国工人运动的勇敢与成就。尝出席省委会议讲解法国工人革命中诸问题，热情洋溢。某次出席汉阳兵工厂工厂委员会议，他介绍法国克鲁梭军火工厂工作经验。他说：“革命到重要关头的时候，军火工人就能给工人暴动夺取武器。”他又说“真专制该反对，假民主尤应打倒，几世纪来法国工人阶级付出重大代价，争取民主，但仍然没有肃清压迫和剥削，不劳而食的人仍是组成统治阶层的中心人物。反抗统治阶层的人都被强迫劳动，政治上发号施令的人，都是自己贱视劳动，把劳动当作囚犯专业，命令他人劳动的家伙。”多里阿被选任法国共产党书记。

五、**苏联顾问**：苏联驻留中国工作人员大致可分为下列几类：苏联派遣的顾问团，主要担任国民政府政治顾问及军事顾问。政治顾问以鲍罗廷为主要负责人，军事顾问以布留陔尔为主要负责人。外交官有广州、长沙、汉口、上海等地苏俄领事及商务人员。此外还有远东银行，进口出口商行，附义勇舰队运输用船舶等。于上述经常驻留中国人员外，尚有其他临时考察人员等。

苏联全部军事顾问约五十余人，其分配如下：布留陔尔（加仑）任各军总顾问，罗加觉夫任总参谋长，切列沙多夫任副总参谋长，罗兰任参谋部顾问，葛尔培伯特任第一军首席顾问，杰卜罗斯基任第二军首席顾问，马赤利克任第三军顾问，帕罗任第四军顾问，雷林任第五军顾问，波列盛科任第六军顾问，兹金任第七军顾问，奥尼依奇任第八军顾问，科密任航空处长，西尔哥耶夫任航空处顾问，西曼洛夫任海军处长，哥列尼任海军顾问，拉德哥维奇任石井兵工厂顾问，贝士查斯特洛夫任炮兵顾问，卡拉卓夫鄂利金任黄埔军校顾问，工程兵顾问为雅阔夫列夫。军委会政治部顾问四人，即斯乃德，马麦耶夫，铁罗尼，政治部高级顾问为基珊加等。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事变基珊加、罗加觉夫、察洛班洛夫等被遣送归国。苏联派在冯玉祥国民军方面（一九二五至二七年）总顾问为乌斯马洛夫，顾问团团长为喀尔便科，参谋长为西尔哥耶夫。各军顾问为马厉洛与西林等。方振武军

顾问为安特里斯，弓富魁军顾问为洛加等。当时各军政治顾问是建立在苏联军火物资基础上，各军军长初期为欲获得武器援助起见，对苏联顾问奉若神明，言听计从，但是后来随军火供应减少，顾问地位亦渐下降，最后遂沦为不足轻重的闲散职务。又各军事顾问既居客卿地位，大都无实权，只与上层联络，不问军队内部事务，所以一旦被解除职务时，对于军事毫无影响。

1. 布留陔尔：俄国军事顾问中以布留陔尔为最重要，布留陔尔 Bluchel（本罗马大将军名），到中国后改名加仑。布留陔尔一九二四年来中国（一九二五年从广东回北京一次），被聘为国民政府高等军事顾问。布留陔尔地位与鲍罗廷相埒，国民革命军事学校及国民军各军军事顾问数十人均受布留陔尔节制。布为南俄农民，出身行伍，受有严格的军事训练，少入陆军大学，好学不倦，在苏联国内革命战争时代屡立战功，任军长职，作战经验极丰富，曾出任远东共和国军区司令。布在各军事顾问中年纪较轻，来中国时不过三十余岁，刚毅木讷，沉默寡言，每出席会议静聆各人意见后，然后发言，发言简明扼要，辩解确切，有当于事理，故聆其片言，可以决断大事。

布留陔尔在广东时于东征、南征、北伐诸役，随军出发，不辞辛劳，每遇重大战役，必殚思竭虑，深谋远计，以定计划。作战时复亲临战场，观察敌情变化，多方肆应，故屡战皆捷。布在广东时曾亲率第三军南讨邓本殷，将邓本殷全军歼灭。北伐时随军作战。布留陔尔为人谦虚，虽屡著功勋，然不矜不伐，自视欲欲然，恒若不足。到武汉后出席中央会议，当时局势渐告紧张，布留陔尔尝说省委、中央负责人应懂得军事领导工作，工会、农会会员应轮流参加军事训练，才能应付敌人军事袭击，保卫革命利益。布留陔尔又尝向省委训练班讲演军事问题。他对世界大战作战方略极有研究，他说我们党员也应该准备学习更大的战役知识。他对第一次欧洲世界大战史了如指掌，说帝俄军队在谭伦堡之役失败，主要决定因素为兵团运输太缓，反之德国陆军运动十分灵敏。德国在大战前建有若干国防性铁路，此诸铁路完全没有商业性收益可言。而国内横断铁路七线亦全部改成双轨，其最重要者则改为三轨或四轨，在毗邻法国边境建有双轨十三线，比国及卢森堡边境有双轨五线，单轨三线，各军事要区之车站更设置有待避线及军用月台等。反之，帝俄在德国边境仅有双轨二线，单轨三线，所以兵员虽多，反为少数德军所战败。

布留陔尔在武汉政府瓦解后，最后离开武汉，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六日由上海乘轮经日本返俄国。布归国后在国内党争中被处分落职。

2. 鲍罗廷：Michel Borodin 为国民政府政治高级顾问，鲍为国际代表中杰出人物，俄国人，少游学英国、德国，英德文均能写作，来中国时年五十左右，才气纵横，风怀超迈。鲍夫人年四十余，亦通晓

英德法文，同来武汉工作。鲍身体魁硕，貌类蒙古人，好骑马，有辩才，析理明通，杂以诙谐，四座滄然。鲍作风开朗，不植私党，常对翻译工作者告诫说：“政党是革命武器，应该常把磨刀砺石怀在身边，才能保持锋锐，对付敌人。但同志间应化除私见，才能勇于革命，怯与私斗。”

鲍罗廷于六月一日被解除高等顾问职，随后赴江西庐山休养。七月十五日武汉分共后，鲍不自安，即于七月二十四日自庐山返汉口，二十七日离武汉赴河南，经陕西、兰州回国。鲍回国时心情极不舒畅，从未看到中国革命成功为憾！回国后深自悔憾，不多论列中国问题。一九二九年五月写“中国革命的前途”一文中说道：“中国无产阶级集中在租界地区，与农民隔离，势孤力弱，难以完成革命，农民战争有决定意义，党应全体领导农民，如资本主义国家的党，从事工会运动一样。”因为一九二九年间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工会阵地已被向、李所断送，所以鲍发出此种无可奈何的呼声。

七月十五日以后，武汉国民党左派核心完全消失，苏联及国际代表于七月二十七日全部离武汉归国，仅留长沙、汉口、上海等处领事及商业代表等在中国，农民国际代表最后撤离汉口。

鲍夫人陷狱：鲍罗廷夫人在武汉时尝以国际妇女代表名义参加湖北省委妇联会工作，又常偕谢怀西到武昌、汉口各纱厂向女工作讲演，由谢担任翻译（谢原系上海晏摩氏女学英语班学生）。一九二七年三月一日鲍夫人因事返国所乘为苏联轮船米亚列宁号，轮船过浦口时为张宗昌军队所扣留，鲍夫人被送北京拘留，在监历时四个多月，直到七月十二日北京高等审判厅推事任隽运用大赦令，释放回国。

六、苏联领事馆撤退：一九二七年八月间长沙领事馆被封闭，七月十六日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院封闭俄国远东银行。七月二十六日，南京国民党宣布取消莫斯科中山大学名义。十二月十四日南京国民党政府宣布对俄撤销承认俄领事，停止苏俄国营事业，驱逐俄侨，逮捕俄籍共产党员。二十三日上海俄领事下旗回国，二十九日广州俄领事经香港回国。十二月十五日，南京蒋介石政府正式宣布与苏联断绝国交（延续至一九三二年二月止），苏联援助国民党工作至是宣告结束，上距一九二三年，两党合作前后经历四年。

[注1]：罗易与汪精卫往还极密，先是四月十二日上海事变后，汪精卫自作演说词（《向导》五月间一九四期刊出），该文意气激昂慷慨，持论义正词严，情感“真挚”，娓娓动听，可谓集狐媚之大成，不过同时文中汪又不能自掩其伪装，如云：“贫弱者思想不过欲取富贵者而代之，所以一有机会，即谋取得特殊地位。”用意本已显明，但罗易逢人便夸汪思想进步，着实高人一等，称赞不置。

[注2]：鲍罗廷于一九二四年受孙中山聘为革命委员会顾问，聘书称如遇会长缺席，鲍有表决权。聘书存湖北博物馆。鲍回国后担任莫斯科新闻英文报编辑，后因间谍罪与司徒朗同入狱。

二十五、中共全党组织新部署： 巩固全国革命阵地，加强斗争实力

溯自中共建党以还（一九二一年至二七年上期），由于政治路线方向正确与决策合宜，同时党内组织采取精诚团结，万众一心，艰苦卓绝，戮力向前，摧毁强敌，因此七年之间，结集了强大的革命动势与动量，造成一九二七年的全国范围内的革命高潮。在革命高潮期间，中共党组织扩大党员与团员达五十万人，工会、农会等革命组织实力超过四百万人，革命武装近五万人。与此同时，政治威信提高，革命各条战线，汹涌澎湃，沛然莫之能御！大革命高潮时期，显著的成就，便是第一次与第二次北伐完成后，扫荡北洋军阀的专制恶毒。武汉革命政府拥有长江流域广大地区和亿万人口（两广、湘、鄂、赣等省区）与资源。当时在中共支持下收回汉浔租界，削弱封建势力，给予反动势力以沉重的打击。武汉政府时代，革命形势发展迅速，由此更进一步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统一全国，指日可期，完成民主社会革命任务并进而开辟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康庄大道，前途是充满无限希望的。但是遗憾的是：不幸在关键时刻，由于党经验欠缺，人谋不臧，决策失当，致使大革命事业功败垂成，这样酿成历史上的国民党统治的黑暗时代，这种历史转变的关键应以一九二七年六月为分界线，由此可证明湖北省委扩大会议的历史意义是何等重大。

在大革命高潮时期直接领导武汉革命者为中共武汉中央局（中共中央武汉办事处），具体从事武汉实际革命工作的为中共湖北省委。从一九二六年北伐军到武汉时起至一九二七年七月止，前后十一个月时间，中共中央局及其所直属湖北省委、江西省委与湖南省委等，在长江流域从事建党、建军、建立工农革命组织，推动革命进展，各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全党同志壮志凌云，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卓著

成效，其中最显著的历史伟绩：如奠定武汉政府基础，铲除贪污，建设廉洁政治；收回汉口与九江的英国租界；发展工农群众革命组织；建立革命武装部队；顺利完成中共五大会决议；临危不乱多次击退夏斗寅、杨森、刘佐龙等武装叛乱，凡此诸端都是在武汉中共中央时期完成的。上述革命业绩声光广被，影响深远，均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

按：中共四届中央正式自上海迁到武汉是一九二七年四月中事，同时中共中央书记随中央迁移来到武汉至七月离汉口时止，中央书记前后驻武汉时间为三个月。

武汉革命危机表面化始于郑州会议（一九二五年五月），自尔以后，中共中央即开始计议有关应变诸项问题，其经过前面已扼要叙述过，此处所说只是属于中共党内组织新部署事务。中共在七月十五日以前几个星期，中共中央及省委鉴于当前环境下既不能另辟空间，别开局面，又不敢背城借一，冒险决战，盱衡局势，乃采取首先是重新调整工会斗争阵营，包括充实各省工作，加强工会、农会斗争实力。另一方面决定中共中央迁往上海，全党一切工作转入地下，作长期斗争，用工农组织力量，推翻国民党新军阀的专制政府。七月间中央连次会议论关于与国民党决裂后党、工会、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对策，主要作成下列各项决定。

中央委员之一部分赴各省市调整充实地方党部，亲身参加指导工农群众运动。基于这个原则决定派到湖南工作者有文虎与润之，到江西工作者有陈潭秋、刘俊山，到北方有王荷波与韩麟符，到广东者有邓中夏、阮啸仙、彭湃、苏兆征等。派到上海者有陈延年、陈乔年、项英、史文彬、林育南、李求实等。此外又派周唯真到四川，柯庆施到安徽，王儒廷到云南，谭寿林到广西等省工作。中央决定上述措施以后，各省工作迅即稳定下来，在新基础上向前发展。又为了使一部分干部有提高理论学习机会，乃又派遣一部分党员到莫斯科学习。当时决定赴莫学习干部有：夏曦、罗章凤、汪奕、李梅羹、曾钟圣、熊受暄、何叔衡等三十余人。

中共中央本身因武汉反共无地可容，乃决定迁往上海继续工作，仲甫令秘书处人员先行赴沪，筹备迁移各事，并亲自决定《向导》停刊（出刊至二〇一期），在中央重迁上海途中耽搁的日子，中央对外暂停工作。

以上诸组织部署大都是经过中共中央与湖北省委联席会议做出决定的。其总的精神是要求在敌方强大攻势到来的时候作好准备，坚决作战，这样才能做到败而不溃，再接再厉，屡败屡战，戮力向前。在往后若干年，白色恐怖笼罩全国，暗无天日的艰难岁月中，全党组织虽然转入地下秘密工作，但是仍然保持革命朝气，使中国革命逆流而进，取得

相当成就。直到一九三一年王、博篡党，叛离革命，倒行逆施，实行党内残酷斗争，毒痛全党，中国革命组织始遭破坏，至一九三二年间白区工作全部瓦解，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的重大教训！无论首从，各应分任其咎。

附录：郑超麟一九八二年一月五日给罗章龙信

文虎兄：

去年十二月十八日来信，收到已有十二日了，只因寻觅我自己的讲话底稿，没有趁早回答你，请恕罪。昨日找到了我一九七九年在武汉讲话的底稿，发现其中关于五大所讲的话都是废话，不值得摘录给大方之家看。我以中央工作人员身份，作为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的代表列席了大会，但说不出这次大会的政治意义和历史地位，当时又无具体文件供我分析，以致所讲毫无价值。我只讲了大会一些表面现象和花花絮絮。你如果需要研究这次大会，我不妨介绍你去看一本书，《罗易赴华使命》。那是我几个月以前才看到，其中附有罗易在大会上的几次发言的记录，以及其他三十多篇的当时文件。书是人民大学翻译出版的，也许你早已看到了。

此外，你问我关于当时湖北省委的变迁，那么我是五大以后新中央改组湖北省委时才奉派去工作的，直到这年八月中旬复回中央为止。我去以前湖北省委的人事变迁，我自己也弄不清楚。幸而最近我看到了人民出版社内部发行的《党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三期（你当然早已看到，不要我介绍），其中有一篇《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七年湖北党组织概况》，所说事实基本可信，但并非完全可信，我自己亲见的事情就有许多被它写错了的。例如，文章说省委机关由武昌迁汉口之后才成立汉口市委。事实恰好相反。事实是：汉口市委撤销之后，省委机关才由武昌迁到汉口来。

据我所知，五大以前湖北组织称区委，张国焘为区委书记，不仅是“事实上的书记”（如文章说的），而且是名义上的书记。张国焘当时是中央常委，要办全党中央的大事，照顾不到湖北工作，事实上是罗章龙做区委书记。五大开会时，湖北代表团团长就是罗章龙。开会是在四月二十七日在武昌第一小学礼堂内举行。湖北代表团以东道主身份，坐在主席台下第一排座位上，我坐在后面几排。我看见，陈独秀宣布开会后，罗章龙就站起来代表湖北代表团宣读它建议的大会主席团人选。罗章龙提出这个名单，不经过讨论就通过了。这个名单有党内斗争的火药气，即除陈独秀外一切同陈独秀接近的人都没有列入这个名单内。

五大以后中央改组湖北区委为省委。张国焘不能再兼省委书记了。于是发生了问题。有人说，瞿秋白和张国焘争夺湖北地盘。他们二人在中央合作反对陈独秀，但在最重要的湖北地盘上互相争夺。结果张国焘的大将罗章龙不能

做湖北省委书记，瞿秋白的大将张太雷做了湖北省委书记。但罗章龙做了新成立的汉口市委书记（组织何孟雄，宣传向警予），管汉口、汉阳；省委书记则只管武昌和外县。换言之，市委管工人，而省委管农民。我参加省委常委，但在省委机关设于武昌期间，我没有接触到湖北省总工会以及武汉三镇的工人运动问题。

以上所答，也许不是你所要问的。我不再写下去了。

我希望罗章龙能够把他所参加所知道的当时中央内部斗争写出来，为后人留下史料。

顺祝——

新年愉快！

郑超麟 1982.1.5.

二十六、南昌兵暴

湖北省委紧急行动方案既未被采纳，但当时革命危机问题日益恶化，后来朱培德、冯玉祥继续反水，唐生智、何健步调一致，张发奎唯汪之马首是瞻，于是武汉中共遂处于内外夹攻状态。所以目前急需解决现实方面政治与军事问题，这就意味着：在不举行武汉暴动的前提下，叶贺军队处置问题。当时大家认为亟需寻求一个空间（非纯地理空间，而是政治空间），安顿此项武装力量。不用说目前政治上是没有真空地带，环顾四境，必须通过打硬仗方式去开辟。

一、决策经过：关于出征路线问题，党内酝酿已历多时，上自中央、鄂省委以及各军部党组织均十分关心这个问题，议论纷纷已非一日。根据当时敌势分析：东面蒋介石与帝国主义串通一气，正在反共高潮中；北面冯玉祥倾全力反共与蒋互相呼应，打击中共；四川方面群众组织过于薄弱，党员极少，川军势众，且地势险阻，所以未加考虑。在七月中旬前后，中央会议曾经对于出征路线展开讨论。先是老鲍对中国革命战略问题曾提出过西北路线，憧憬新疆天山北路河西走廊及其附近长城迤南地区。理由是西北为远离帝国主义统治地区，同时又靠近苏联，缓急可恃。当时西北军阀力量比较薄弱，此种理论在部分同志头脑中尚存印象，但此时老鲍将返国，西北形势恶化，党尚在启蒙状态，所以无法贯彻此种建议。当时特立负军事全责，乃提出打回广东的问题。（平山附议。）会议上主张打回广东的意见的同志认为广东是老革命根据地，有海口可以接受外援，过去党与群众基础相当强大，且给养丰富，军需取给便利，人地条件均较熟悉，因此主张回师广东，重建革命根据地，以后再行相机北伐。但是当时湖北省委不赞成远征广东路线，建议回师湖南，以湖南为根据地，然后选择时机南进广东，北出长江，进退均可自主。主张回湖南的理由是：湖南党与民众组织具有历史基础，湖南是革命暂息的火山，驾轻就熟，

易于重燃。又新军阀内部唐生智、谭延闿与程潜诸人间互争地盘，矛盾重重，可以利用其互相排斥，且地近武汉，朝夕至，湘东、湘北、湘西，声东击西，随时可以进军。湖北省委主张回师湖南或直向湘北出兵，进入长沙或先取南昌、九江，继而即转旗西行，由赣边进入湘东。因赣西与湘东驻防军队寥寥无几，可以乘虚而入，袭取长沙，同时当地工农革命组织可遥为声援。湖北省委也不赞成直接进军广东路线，理由是广东地处偏隅，环以岭海，当地粤桂军阀号地头蛇，军力相当强大，难攻易守，劳师远袭，步行行军，费时旷日，成败之数难以逆睹！以上意见主要是文虎、代英、郭亮等所主张。但是由于随北伐来到武汉的不少同志，特别是广东籍的指战员赞成回师广州的实居多数，所以最后决定出征路线是避开湖南，迂回江西，进入东江湖汕，然后再攻取广州。根据上述战略部署，避开湖南东进江西，绕道入粤，行军路线上绕了一个大圈子，比原来北伐时中路出师行军路线还要长达千里，而且是炎天盛暑，山地行军，所以遇到不少困难条件，这是当初未及估计到的事。

二、兵力组成：南昌军事实际兵力大致是这样的。先是唐生智领四集团军，其所属二方面军，归张发奎统率，二方面军直辖十一军与二十军，其中二十军十二师师长贺龙，十一军二十四师师长叶挺，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二十五师师长原为李汉魂，周士第为二十五师七三团团团长），四军十师师长蔡廷锴等均受中共党领导，加上中央军校教导团、警卫团共约二万余人。临时又决定将党所掌握的武装与储存武器及一部分工人纠察队交给叶挺、贺龙的军队扩张军额。中共经过多次扩军后，南暴武装力量主要为第二十军，下辖第一、第二、第三师附教导团，特务营等共十个团。第十一军，下辖第二十四、二十五师共五个团。又第十师三个团（师长蔡廷锴），第九军一个团（团长朱德），共计人枪三万多人。

三、前敌委员会：出征军全部指战员，人数众多，军务浩繁，因此中共中央与湖北省委在会议上共同决定组织前敌委员会以领导前方党、政、军各方面的工作。前敌委员会主要成员如下：书记：特立，委员：叶挺、贺龙、谭平山、周逸群、恽代英、郭亮、王仲一等。中共党员参加南昌革命委员会工作者有：张特立、恽代英、高语罕、谭平山、朱德、王仲一、李立三、谢晋、李硕勋、周恩来、袁国平、刘伯承、贺龙、贺昌、刘昌群、叶挺、颜昌颐、郭亮、林伯渠、庞人侃、陶铸人、吴玉章、粟裕、陈赓、孟坚、陈毅、聂荣臻、周逸群、廖乾吾、周士第、柳直荀等三十余人。

四、革命委员会组织与政纲：南昌兵暴时仍是遵守国际指示：“退出国民政府，不退出国民党，重新树立左派以抗汪、唐。”根据这个

扶植国民党新左派政策，在八月一日宣布成立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组织成员如下：张特立、谭平山、陈友仁、蔡廷锴、朱德、宋庆龄、周恩来、贺龙、叶挺、林伯渠、吴玉章、李立三、恽代英、谢晋、郭沫若、徐特立、邓演达、彭泽民、何香凝、高语罕、于右任、张发奎、姜济寰、陈树人、方维夏、张曙时等二十五人，其中国民党左派十三人，共产党员十二人。工农委员会主席张特立，参谋长刘伯承，党务主任张曙时，宣传主任郭沫若，财务主任林伯渠，政治保卫主任李立三，江西省主席姜济寰。军队番号仍沿用第二方面军，共分三军十六团，又四个营。革命委员会发布宣言，内容强调国共合作，团结国民党左派分子。革命委员会公布没收二百亩以上地主的土地。（后改为五十亩以上。）九月十一日到汀州时，高举中国国民革命军闽南救党军事委员会旗帜。这就是南暴的政治旗帜。

五、动员准备与经过：七月间中共中央会议上，上述各军队开往江西既作决定，遂于七月上旬开始动员。最先贺龙率领二十军以东征名义离开武昌，向下游九江进发，驻在鄂东。七月下旬叶挺所部连续开往江西，叶、贺两军遂在九江会合。七月二十五日起叶军进驻南昌，次日即七月二十六日贺军续开南昌。七月二十七日特立奉令赶到南昌，指挥军事，受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前敌委员会在南昌陈家井六号），时中共诸军全部抵达江西，但军校教导团离武汉东开，上船前张发奎忽将全团新枪（九七步枪）缴去，改发三八式旧枪，每人只给少许子弹，教导团于八月四日船到达九江（时叶、贺军仍在南昌），该团又被九江张发奎驻军解除武装，因此教导团未参加南昌军事行动。又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因船只缺乏，沿途耽搁，行至中途，得悉大军已离南昌，遂停止前进，改往奉新，故亦未参加南昌兵暴行动。朱德在策动南昌内应方面起着一定作用，先是江西朱培德阴奉蒋令反共，于六月一日宣布，礼送苏联顾问与中共党员干部三百余人出境。苏联顾问由傅大庆陪同到武汉后，后偕来者有朱德、方志敏等人。朱培德，云南人，原为朱德部下，因此朱培德平日对朱德颇信任，任彼为教导团团长，该团有学员八百人。中央既决定东征，遂派朱德秘密返江西南昌联络当地军警（朱原兼南昌省会警察厅长），纠集约二千人共同起事。

叶、贺军动员东开时，当即引起汪精卫注意，七月二十七日我军进占南昌，二十九日汪精卫在庐山召集张发奎、朱培德等举行军事会议，决定下令叶、贺军队撤回九江。八月二日汪精卫、张发奎下山到九江，同时下令张发奎驻在南浔沿线军队迅速向南昌进驻。特立到达南昌后，原定八月十三日发动兵变，因见张发奎军进逼将临城下，乃提前于八月一日清晨发动兵暴，击溃朱培德军二个团。

六、八月一日之夜：八月一日，南昌市内参加暴动军队有：周士第之第四军二十五师，叶挺部十一军、贺龙部二十军，此外加上朱德部第十军军官教导团及南昌市警察一部分，保安队二大队和消防部一部共三万人。当时南昌城内有朱培德所部，有第三军二个团，第九军一个团，朱培德警卫一团，共约一万人（朱培德三军及九军分驻吉安、进贤等处）。八月一日上午一时起，叶、贺军围攻南昌市内敌军，俘敌一万多人。四时止，战斗结束。兵暴成功后，叶、贺军扩编为三个军（即九军、十一军与二十军），十五个团，其中十一军三个师，由董朗、蔡廷锴、周士第任师长，二十军三个师由贺锦斋、秦光远、周逸群任师长。

七、迂回向东江进军：此时张发奎军已迫近南昌，由于张军战斗力强大（均苏联供应武器），估计在南昌不易立足。又当时江西南部，赣江东西两岸，吉安、赣州等处驻有朱培德第三军，程潜第六军及赖心辉第九军等挡去南下入粤去路，前敌委员会乃决定向赣东南入粤。叶、贺军自八月五日起撤离南昌，至六日全军尽撤。八月七日全军经过临川、宜黄、广昌、瑞金等地，在会昌击溃钱大钧师，占领会昌。当时赣东南敌兵约有五师设防阻击，计蒋介石部钱大钧与王赣翰各一师在宁都、兴国，桂系黄绍竑率所部三师，即黄初旭一师在会昌，伍廷扬一师在信丰，吕焕炎一师在南雄堵截。双方在筠门岭激战，叶、贺军失利，遗失武器辎重无算，遂决计改道入闽，经长汀、武平、上杭，九月十一日到达汀州，复经山太埔、梅县向潮汕进攻，于九月二十三日攻下潮安，次日即占领汕头。于此应加指出：当叶、贺军从南昌出发，经抚州、南城、南丰、广昌、瑞金、会昌、长汀、上杭、大埔，直到潮州，行军经过五十余日，于九月二十四日始到达汕头。在此期间广东军阀已调兵遣将，严阵以待，时陈济棠、薛岳各遣一师，陈师于揭阳、丰顺一带，钱大钧残部由信丰回师移驻梅县。桂军吕焕炎、伍廷扬各一师，黄初旭一师，由赣南回师南移，到蕉岭、梅县进扑潮州。九月二十八日，叶、贺军在揭阳为陈、薛军所战败，十月三日敌攻占汕头，潮州同时陷落，计革命委员会在汕头办公时间前后十天。

八、南昌起义总结：南昌兵暴是近代中国革命史上规模浩大的军事斗争，其所组织的流动性政权——革命委员会——前后经历六十四天，最后虽告失败，但其意义重大，无可否认。至于革命委员会所以招致失败，就事变本身言，其主要原因如次：

1. 选定出征路线不当：革命委员会下令全军向广东进发，这是根据五大中央七月会议决议原则执行的，但是在决定这一政策时，忽略了敌我军事力量的对比，更没有权衡工农群众基础的作用与地理条件

等因素，因此，可以说入粤路线选择是不当的。因为当时粤桂军阀军队人数既众，武器精良，经过长期作战训练，所以是不能轻敌的。至于工农群众组织基础，当时湘、鄂、赣不下三、四百万人，且分布很广，而广东农民运动尚局促于海陆丰一带，农协会会员不过百万，福建、广西更少，约十万人，且限于偏隅。因此，当时如果将叶、贺军队自赣西开往湖南，便可以结合当地革命群众向湖南军阀发动广大攻势，而且唐生智军队内部互争雄长，战斗力亦比较差，如果蹈瑕抵隙，可能予以各个击破。但因当时海口吸引力甚大，又不少人仍憧憬第一次北伐前景象，所以最后还是舍近求远，冒险向敌军数倍于己的设伏地区进军，致受铩羽不振的打击。

2. 前敌委员会领导失职：前敌委员会是仓促组成的，本身组织虚弱，其所属军师及基层党组织强弱不均，因此上下呼应失灵，在战争中不易发挥最大限度的潜力；在政策方面顾虑重重，对左派分子过于迁就，局促如辕下驹，难逞其能。因此在政治、军事方面诸多失误，招致败局，这从作战部署方面就可以看到种种缺点。在作战部署方面，此次南征，时值早秋，酷暑行军，饥疲交困，以劳就逸，全失主动！由于天气炎热，行军缓慢，九月十三日全军到达潮汕，师次汤坑，广东军阀黄绍竑、徐景棠等以逸待劳，已在一个多月内集中十个师重兵构筑工事，深沟高垒，筑好袋形阵地，严阵以待，诱我军深入。我军喘息未定，敌情不知，仓皇应战，立陷重围。当时贺龙所部二十军三师不战而降（师长贺锦斋、贺炳炎），其它各师亦溃不成军，全部缴械。

3. 革命委员会缺点：当时革命委员会为新生革命政权，但就其前后观察，却流于形式，并未发生积极作用。革命委员会是打着国民党的青天白日的旗号，革命委员会组织成员二十五名，其中国民党十三名，号称过半数，左派既未在场参加，又未表态赞成，实际上委员会绝大多数均系消极因素。革命委员会的新左派诸人既都是名实不符或貌合神离的分子，因此总的说来革命委员会是脆弱无力，不足以担当艰巨任务，这是由于过去对国民党组织所采取的剥笋政策，此时已达到最后层次，箝尽心枯，剩余无几。所谓左派残余分子殆已无赢痿弱，不能自振。因此革命委员会遂徒托空名，成为无用之长物。革命委员会既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前敌委员会领导者为迁就新左派起见，更不能大刀阔斧进行大规模激发工农群众的动员工作，这使军事斗争处于孤立，既无巩固后方获得兵员与物资的源源供应，结果遂致陷于腹背受敌，孤军作战的困境。在汤坑失败以后，汕头失陷前，革命委员会知道大势已去，难以挽回，乃自九月三十日起第一批雇乘日本轮船海康号离汕赴香港。该轮两日后安全到达香港。自此以后新左派与

中共分道扬镳，各行其是，与中共脱离关系。

九、尾声：上述所论南征失策，不过举其荦荦大端，其中政治上联左政策为重要关键。如前所述，当时革命委员会组织本身力量固极薄弱，其所谓左派成员大都无群众基础，且又缺乏革命意志，乃一群政治投机分子，故一遇劲敌即自瓦解。兹就其主要成员个别简介如次：

1. 邓演达：邓演达，字泽生，原黄埔军校教育长，时兼任国民党农民部长，兼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一九二五年曾赴德考察，自视为左派理论中心，其出身原本军人，先后在武昌、保定，受过八年军事教育，曾任陈炯明第一师营长。好发表政论，请求加入中共，未果，乃倡导工农平民民主主义，颇思于国共外独树一帜。一九二七年六月，邓演达从汪精卫处获悉清共方案内容，大为惶恐，遂于六月十三日秘密离开武汉，到达郑州与苏联归国顾问一行，乘自备汽车至兰州，经内蒙陆行四十五日抵达莫斯科，欲留居以坐观时变，时值苏联清党，邓如惊弓之鸟，乃西行赴欧洲。南昌起义时，邓正在欧洲避难。

一九三〇年秋，邓演达自欧归国，纠合谭平山、章伯钧、彭泽民、季方策、宋庆龄等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独树一帜，自为领袖。又集合旧黄埔同学余洒度等组织黄埔革命同学会，此举深为蒋介石所忌，一九三一年冬十一月邓为蒋枪杀于汤山。国民党左派遂复销声匿迹。

2. 陈友仁：陈友仁乃武汉政府外交部长，七月十五日后即匿迹不露面，声称不预闻南昌兵变。八月十三日以出席日内瓦国际联盟代表名义偕家眷经苏联赴日内瓦。后在欧洲作寓公。宋○○时居上海法租界，自称与革命委员会无关系，旋任南京政府国府委员及国民党中央委员。

3. 蔡廷锴：蔡廷锴，八月七日军行至江西进贤县，蔡廷锴首先反水，脱离革命委员会，率所部第十师开往浙江转向南京投蒋。蔡廷锴此举引起全军震动，革命委员会初拟派兵追击蔡师，但恐分兵引起效尤，遂决定置之不问，听其自去。（蔡行动备受蒋介石嘉奖，后一帆风顺，历任军长、省主席及剿匪司令等职。）与蔡同行者，军过信丰时，陈业伟又将迫击炮连带走，离开革命委员会自去。

4. 姜济寰：姜济寰为谭左厂（延闾）智囊团人物之一，曾任长沙县长，大革命时期随谭左倾，为国民党左派活跃分子，八一以后离革命委员会，不知所往。

革命委员会除上述数人外，其余左派人物可谓自郅以下，不足指数，全是挂名虚职，号称两头蛇分子。

革命委员会于前述诸子外，其他诸人到香港视其宦囊丰高而定去向，如吴玉赴法国巴黎作寓公，谭平山赴比利时游历，更多的人则卜

居香港。当时群公纷纷出国养望，以待东山再起，成为一时风尚。仲一称彼为“衮衮诸公”，树溪则讥之为“脚底揩油”。某公闻二人言，夷然不以为意，说道：“我们暂时下车，歇歇脚，休息一会，你们把车子开到前边去，回头再来接我们就好。”津川笑问：“革命有这等便宜的事，真正岂有此理！”某从容解释道：“这并非岂有此理，有些人今日从这方的车子跳下来，搭乘对面开来的车子，朝后方跑，过了一些时候，将来总会有人把他们请回来坐上席的。这也是一种革命的车轮哲学，实际例子着实不少哩！”

参加革命委员会中共党员从汕头撤退时，由于时间仓促，有些人未及登上日轮海康号，乃分批单独赴香港，其中有潮汕失陷后单独雇木船漂海赴港者，如郭亮、柳直荀等一行十余人，坐木船漂海到香港，中途遇盗，七日夜始达码头，因系木船，遇者不注意，黑夜登岸。郭、柳后转辗归湖南。又据十一军连长于昆突围归沪时向文虎谈东江战事失利，主要由于作战计划疏略所致，又兼指挥不灵，仓促应敌，各师团未能发挥战斗力量，在历次战斗中，团长以上军官无多伤亡，特别是来自黔方队伍的二十军，平时素质较差，训练不足，缺乏集团作战经验，故一遇强敌即溃。如汤坑之役，二十军可谓全军败绩。当时但一¹曾用幽默口吻说：“此行往返水陆数千里，漂洋度岭，跑了一趟冤枉路，做了一次送礼专使，礼重情轻，说不出口，确实有些难为情！”汕头兵溃，○○逃香港后一去不复返，其部属多人亦逃港未返。

一九二七年杪在上海中央一次会议上，讨论到南暴问题，但一发言报告本人亲历所见，中间说到当时五届中央在七月末解体，八七会议后，临时中央忙于内部人事分配，对八一暴动后开赴广东军队，未曾作任何指示、采取任何措施，也未派一介之使，前往军前联络或指示机宜，听其所止，置之度外，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瞿秋白不耐烦，屡报以白眼，二洛（二国际代表洛米那则、洛埃曼）在座，默无一语。会后做出决定，南征失败，特立应负全部责任，给予暂行停职处分。特立当时亦未置辩。

¹ 但一，即恽代英 — 补注

二十七、中共八月汉口会议

中共“五大”会后举行过一次二中全会，决定中央迁沪问题。五大二中全会后，中央正在迁沪途中，国际代表忽然来到中国汉口，主持召开中共特别紧急会议。其缘起、经过情况如次：

一、中共五大中央迁往上海

一九二七年七月间武汉酝酿革命危机期间，在中共五大二中全会上，曾经郑重提出：巩固全国革命阵地，加强斗争实力，以及有关应变诸问题，决定准备对于反革命政变实行全面进攻。当时通过中央机关迁回上海以利指挥，并决定大部分中央委员分散到各省地方党部、武装部队、工会、农会等基层组织，加强领导，指挥实际斗争。

在五大中央执行上述重大政策与方略时，并决定在武汉方面成立长江局，该局所留人员不多，具有看守机关的性质。在中央迁沪过程中，迁沪工作尚未完成以前，各省工作联系暂时由长江局代任其事。所以中央工作在半月以内实际上陷于停顿，一切等候中央迁沪完毕后再作处理。

当全部中央人员紧急动员分途出发奔赴各方面工作时，却发生少数党员畏缩不前，临阵脱逃情事。如鄂省总工会向忠发席卷公款逃往湖南。刘少奇与瞿秋白等携眷匿居庐山，他们均系自由行动，下落不明。又如所周知，周佛海首先发表“脱离赤都武汉”文章，施存统发表“悲痛的自白”，李达在报上刊登脱离党启事，其他继起踵武投降南京者，亦不乏其人。

[注]：长江局位于汉口珞珈碑路。该路为外侨集中地区，房屋系公寓式两层洋房，对过为小花园，地址幽静，附近有俄式餐馆，高悬霓虹灯，有 Banko 字样云。

二、汉口会议缘起——国际东方部决策

正当五大中央离开武汉，迁往上海途中，大批中委及干部奔赴全

国各条战线，组织工农兵士全面斗争，向反动派进行反击的时候，此时国际东方部却在策划新的行动，对中共中央采取自上而下的全面改组，实行夺权。国际东方部决策经过是非常周密的，而且是采取突然袭击的行动。

先是当五月武汉政府出师再度北伐，收复河南时，那时冯玉祥率所部开出潼关，会师汴郑，国际闻讯，认为国民党左派势力伸张，整个北方可以底定，中国革命全局胜利在望！兴高采烈，有逾寻常。不料不到两个星期时间，自中国传来噩耗，武汉形势恶化，旋即急转直下，一日数惊。一九二七年六月，国际代表罗易等自中国撤离回到莫斯科，报告武汉异动情况，国际东方部聆悉如同晴天霹雳，一时感到手足失措，乃召集该部全体会议研究对策，最后决定为稳定局势起见，确定政治原则，中共继续支持国民党左派，中共可以退出武汉国民政府，但不得退出国民党，仍应在国民党内联合左派，用国民党左派名义反对宁、汉政府。

按：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武汉政府分共反水后，原先号称国民党左派分子谭延闿、孙科与实力派军人冯玉祥、张发奎、朱培德等均跟随汪、唐而去，陈友仁与邓演达出国避难。剩下所谓左派分子人数既少，并无实体存在，有之亦不过瞬息多变的魔影，所谓“支左”实际是“支无可支”。但当时国际指示仍“胶柱鼓瑟”、“刻舟求剑”，不知改变。所以南昌起义时，仍用国民党左派名义，起义军队仍树青天白日旗帜，所以八月一日贺龙自南昌发布宣言，强调总理遗教与拥护三民主义，通观全文纯属国民党口吻，无丝毫工农革命气氛！因此，当时有人误认为：“没有‘左派’就没有革命”。这是当时流行的“逻辑”！但是客观事实的演变，前项政治逻辑终于破产，中共党员已再无人理会，改弦更张是全党与革命群众共同的意向。东方部有见及此，不得不转移了方向，同时为了维持国际威信起见，决定自上而下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撤换书记，另派继任人选，部署既定，乃立即派代表赴中国召集特别（紧急）会议，贯彻执行。

三、国际代表东来

大革命正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国际所派遣的代表 Nomminotz、U. Neuman（以下称二洛）首先到达上海。时中央迁沪尚在途中，所以双方没有接触，二洛乃乘轮溯江西上，来到武汉。时在七月下旬，国际代表到达武汉先由苏联驻汉领事关系找到长江局（Blitz 亦在汉），国际代表乃向长江局联系，开始进行一切工作。此次国际代表东来，带来一个方案，其主旨在召集一个特别会议，超越五大所选出的中央，另行成立一个中央。当国际代表见到长江局负责人罗亦农，告以此行任务时，亦农听说甚为诧异，不知所措。答称：“五大中委几乎全部

离开武汉，会如何开得成。”对方称说：“这样正好，我们决定另立中央，与五大中央无干。”因问瞿秋白何往，亦农说：“也不在武汉，听说到牯岭避难去了，现在住址不明。”国际代表：“我们立即举行会议，一边设法找他。”当经商定于八月七日举行紧急会议，由长江局通知有关方面代表到汉口出席会议。

四、汉口八月会议经过

这个特别会议（紧急会议），由二洛单方决定于八月七日在汉口举行。汉口会议在汉口鄱阳街惠罗洋行楼上举行（该洋行原为俄国商行，附近一带均外籍商人居住。布里次即寓居惠罗洋行二楼）。

由于时间短促，参加会议代表主要为长江局及留汉共青团方面成员，外省只有湖南、九江代表参加，其它各地因路途较远均无代表参加。汉口会议由于筹备非常仓促，所以会议时间很短，因此一切文件均在会后补写发出。汉口会议政治报告中主要内容：A. 强调大革命高潮中国际路线的正确与中国党领导的错误。B. 强调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核心问题，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社会经济的主要内容。C. 武装工农，确定在湘、鄂、赣、粤四省地区举行秋收暴动。

[注]：八月会议后，临时中央原决定发动湘、鄂、粤、赣四省暴动计划，由长江局通知各省执行，但除湖南外，即长江局所在的湖北亦无动静，江西亦然，广东远在南方，寂无下文，俱属空谈。

出席八月会议代表事先既不知道会议性质，故无从准备，临时又未见到任何系统文件，只凭国际代表所作简单报告，所以也就无法开展讨论。就这样，大家听取报告完毕，就算会议即告完成。此次会议出席人员均系临时决定，所以来去匆匆，无所得益。汉口会议结束多时，临时中央乃发布“告全党同志书”及“最近农民斗争决议案”、“最近职工运动决议案”和“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等几个文件，这些文件均未经会议讨论通过，是事后补写的急就章。会议此种掩耳盗铃伎俩，真乃形同儿戏，令人啼笑皆非！

五、汉口会议指派临时中央书记

在八月会议举行时间，关于临时中央负责人的问题，国际代表提名瞿秋白任书记，但阿双（秋白号）仍未露面，通过长江局专派交通员辗转探索，才寻到他的踪迹，随后又派人到九江把他叫回汉口。他到汉口立即被任为临中书记，但他初表示不愿意干，自称“无才无绩，不能胜任”。但国际代表坚决叫他干下去，他最后只得半推半就，粉墨登场。因此，有人嘲笑阿双说：此番推戴经过，颇似历史上“刘盆子故事”，大类沐猴而冠。据亦农告人说：“二洛曾说过，当时如阿双还不露面的话，只好由我担任书记，姑且维持局面。”阿双既就职，遇事有国际代表作主和支持，亲加“耳提面命，襁抱提携”，渐

渐能够自己主动。最后羽毛渐丰，也就不免自行舞弄笔墨，肆无忌惮起来！

[注]：瞿秋白简历：瞿秋白小字阿双，江苏常州人，其家世代书香，祖为清朝显宦，后家道中落，父拓弛不羁，生活放荡，中年以后酷信道家导气之术，守庚申，参星斗，服丹砂求作地仙，遂为黄冠（作道士，弃家），◇◇远游死于异乡。其母身染恶疾，自经身死。阿双童年孤苦，曾皈依佛教，宅心虚无。后考入北京俄文专科学校，毕业后长期做翻译工作（舌人）。攻心计，善勾结，辗转依附东方部以求得官自显，后与向忠发、◇◇◇等勾结。于一九三五年在福建为宋◇◇所捕杀¹，行刑前发表“多余的话”。

六、临时中央严重渎职问题

临中成立以后，高高在上鲜所作为，当时工农兵革命运动事实上陷于瘫痪状态，与此相应便发生重大渎职问题。临中主要渎职行为造成南昌暴动、秋收暴动与广州暴动的连续失败，牺牲惨重，招致党与革命实力的浩大损失！

1. 南昌军事行动于八月一日爆发，国际代表是七月下旬来到中国的，他亲自知悉此事，汉口会议举行已在南昌军暴后一个星期。就常情判断，对于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是国际代表与临时中央应该密切注视并采取积极措施去争取胜利的。但是事实却完全相反，汉口会议并未把南暴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对当前这样重大问题竟未加以讨论，或专门研究。在此千钧一发的时候，临时中央对于江西方面军事行动，既未发出一项指示，指示作战机宜，又未派出知兵大员随军协助，甚至更未派遣一介使者到前方进行联系，或提供有利于军事的情报，或派人协助解决有关后勤事项的问题。当时临中对此客观上只是隔岸观火，漠不关心，视同秦越。坐令前线几万大军，盲目行军，在失去与后方联系情况之下，进入东江方面敌军预设的袋形阵地，陷于重围。造成全军溃散，几万人一齐缴枪（突围北去者为数不多），铸成大错的严重后果。这是国际代表与临时中央共同应该负责百啄不能辞其咎的。

2. 湖南秋暴原是临中成立时决定的。论理更应十分重视，全力以赴。但临中对此除最初原则上作过一次决议外，以后并未作过具体指示。如对于作战部署，亦未作过安排，只是坐待捷报。以致坐失机宜，最后造成平、浏战役先后失利，全局皆非！

至于广州暴动是国际二洛和临中亲自发动的，而且是在南暴与秋暴之后举行。论理应接受上两次暴动的经验与教训行事，但事实却完

¹ 原述瞿秋白被捕杀时间有误，征得提供原稿者同意据史料更改。——补注

全相反，在作战计划中对敌我估计不正确，粗心大意，结果又重蹈覆辙。终于是一败涂地，精锐全失，死伤惨重。而且在战斗中又发生指挥军事人员◇◇◇、◇◇◇临阵脱逃，落港逃生情事。

反观敌方对军事行动却采取统一指挥，联合一致行动，前方与后方互相配合。如广东，粤桂军阀对汕头实行包围作战，湖南军阀对平江、浏阳也是采取统一作战部署，据此双方形势优劣互见，胜负之数，早已可以预卜。据长江局同志峻川说：“国际代表与临时中央，在八月会议前后时间忙于布置内部人事，并集中注意力到各省，继续作夺权部署。所以对于军事无暇顾及，坐视未理，客观上是听其自生自灭！”又当时国际代表坐镇上海，君临其上，发号施令，担任对临中的实际指导，所以应负连带责任！

综观上述三暴失败经过，临时中央疏忽失职是十分显明的，但是二洛、阿双等人却以种种理由为藉口加以辩护，如云：“历次军事行动，都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进行，失败是难免的。”但是这种说法的理由是不完全充分的，古今中外军事上以少击众获得成功者，其事例屡见不鲜。如大家所熟悉的三国赤壁之战，北方曹操军号称八十万人，江南东吴周瑜有军四万人，加上刘备军一万人，两军合计不到五万人，会战结果北军失败，而南军胜利。

又如苻坚南征，夹淝水而阵，当时北方苻坚兵精锐六十万人，南方军只八万人，东晋以谢拓为大都督、谢玄为前锋，力战却敌，苻坚兵大溃，八公山上草木皆兵！

此次南昌军事发动时，中共所拥武装力量约枪支五万人，加上工农武装为数称足，如运用适当，指挥得人，很有可能克敌制胜，有计划地逐步引导革命走向成功之道路。

七、上海十一月扩大会议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临时中央在国际代表领导参加下，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地点在上海英租界西区，出席者为五大一部分中委，各区及省委书记与少共中央代表等四十余人。

1. 政治决议：上海扩大会议，根据国际代表的政治报告，通过一个政治决议，即“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案”。该决议分析中国目前形势，认为中国革命性质是“不断革命”“现在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剧的进展，中国革命的进程，必然要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进入社会主义的道路。”（非革命阶段论）又称：“中国革命形势正在‘不断高涨’”，“现在全国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又认为应该“组织城市工人暴动去领导农民暴动”。

上海会议后迭奉国际指示向全党发出号召，立即紧急动员，雷厉

风行，采取具体措施，以期贯彻政治决议案的精神与实质，即在全国范围内的实行广泛的暴动政策。于是广州暴动（十二月十一日）与各省兵暴，及城市工人暴动次第发生。（详见四十二章）

2. 全国工农运动新计划：出席上海扩大会议多数代表鉴于自汉口会议以来，由于临时中央领导力量孱弱不振，致使全国范围内工农革命群众运动阵地一片荒凉，反革命势力有增无减，情势岌岌可危，乃应客观形势的迫切的需要向扩大会议建议，一致建议恢复中央工委，加强城市工人运动。经过热烈讨论，一致通过恢复中央工委、农委及军委的机构，并责成文虎拟定全国工运新计划，彭湃草拟农运工作方案，旋经分别提出会议通过计划，并决定文虎担任中央工委书记，彭湃担任农委书记，◇◇担任军委书记。在扩大会议上，文虎建议应加强中央及地方工运战线，强化工会组织宣传鼓动方面工作，具体办法首先把中央工委组织充实起来，从广东召回苏兆征，从北方召回史文彬，从湖北调回项英、林育南等，分别加入中央工委及全总、铁总、海总工作。工委在宣传方面，出版“奋斗”、“中国工人”等刊物。在组织方面开办工运训练班，与工农武装干部训练班等。扩大会议恢复中央工委、农委与军委机构，并重新部署各该方面工作充实人力，这是差强人意的措施。并且使广暴以后的残破局面逐渐恢复正常，重新积聚力量充实革命元气。

3. 关于纪律问题决议：扩大会议通过三个组织决议，大革命失利同时南昌暴动与秋收暴动先后失败，党内舆论哗然，议论纷纷，临中对此为解除当前所处困境起见，乃做出下列三个决议，将革命失败责任推卸给他人承担，自己却逍遥局外。

第一个决议是对于武汉大革命失败而发的，即开除谭平山党籍的决议，理由是谴责他在大革命时期动摇退却，并宣传组织第三党，对革命失其忠诚，对党离贰，进行分裂，应给予组织处分，开除党籍。

第二个决议认为南昌暴动失败，应由前敌党政军总负责人担任书记职务的张国焘担负全责，决定停止工作（其他副职人员免议），并给予警告处分。

第三个决议认为湖南秋收暴动失败关键在平浏战役指挥不当，前敌负责人◇◇◇不能辞其咎，因此决定撤销其政治局候补中委的职务。国际代表提出上述三决议客观上减轻自己的责任，同时也开脱其他有关人员的责任，如此可以藉助于三个决议以重新树立临中的威信。会议上对于临中失职问题，为顾全大局起见，也就“既往不咎”了。

4. 扩大会议尾声：在扩大会议上文虎提出“关于湖南秋收暴动”的书面报告，甚为详细，并附有平浏作战行军草图。二洛阅后很动容，并约文虎面谈秋暴细节。他们表示以前完全不悉内情，临中把这方面

消息都未给他们阅看。

上海会议讨论南昌问题时，特立在上海，但未让他出席陈述意见。会后将一纸决议派人转致，亦未当面交递，特立大为不满，说：“我要找洛米那则讲话！”洛未见面，随又写信申辩，洛亦未理会。这个决议直到中共六大会，才自动失效，特立再当选为中委。

平山见扩大会决议，拍桌叫骂说：“岂有此理！番老要把我和仲甫做替罪羔羊，决办不到。”因与邓泽生等商议，决定组织第三党，正式与中共分裂。扩大会议上阿双曾倡议◇◇应与谭一例处分，但讨论结果，未通过。事后他语老寡妇云：“处分就处分，于我何干！老◇◇给我走的道路太窄了，左右为难，洛亦胡闹！他本人难道完全不明白吗？真是错怪了人。”又说，“他叫我穿高褙，踩钢丝索，又不给撑伞，这怎么行？”会后不久洛告他，奉指示要他到莫学习。他默不作答。后派人催促动身，他告其人说：“我不打算去！不愿坐洋房！”后遂连发三信公开批评临中路线的错误，信中又指名责说：全总就是◇◇，◇◇就是全总。

又，扩大会上有人向洛提出讨论关于中国革命责任问题，洛感到尴尬，回避而不肯谈，语翻译说：“现在没有时间，以后再说吧！”离席而去。当时会上有人主张仍谈下去，阿双说：“我没权谈这个问题，还是等以后再说。”春木半开玩笑地调侃道：“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哪有儿子诉说老子的道理！”

八、结论

汉口会议在中国革命与中共党史历程上是一个明显的标志。在汉口会议以前，中共领导革命虽然曲折艰难，但是仍然循照正常轨迹运行。溯中共革命在中共领导之下，发轫于二十年代（一九二〇至二七年），历备艰辛，始达到相当成就，一九二六年冬乃获建立武汉革命政权。在此前革命进展期间，虽然遇到重重阻力与挫折，但从大体趋向观察革命是前进不止的，政治路线一般是没有遭逢到严重的失败。但是自汉口会议起与成立临时中央后，中国革命形势却引起质的变化，从此以后，中国革命势力乃一蹶不振，由此至一九三一年第二个临时中央成立，革命颓势仍长期继续存在。追源祸始，实与当时临时中央错误的政治路线息息相关的。为了总结一九二五至二七年中国大革命失败的经验与教训，前章已对于中共中央五大会前后的政治上的错误政策加以论究，本章只就汉口会议临时中央时期所发生的事项略加以分析与判断。

1. 库迭达的一幕：首先应行指出，东方部导演的八月会议，虽然名曰“会议”，按其实质不得称为会议，因为它既无合法根据，又没有构成会议的形式与条件，只能说是政客导演的阴谋诡计的一幕。由

于汉口会议按其性质是于党章规定以外，鼓动几个不逞分子，向中共中央进行夺权，另行成立非法的临时中央，所以也就是中共党内第一次非法分裂党的行动；这种非法行动所采取的形式是不光明磊落的，是封建时代历史上宫廷政变（库迭达 Gudetar）的重演。

中国共产党是与广大革命群众有血肉联系的党。中共中央的产生与存在是通过全体党员的意志，并由中共成文法（中共党章）所规定的，无论何人都不能用任何藉口，对此妄有所变更的；如果野心家不按党章规定而擅自成立中央，篡窃党中央大权，那便是非法行为。这是起码的常识。但东方部却冒天下的大不韪，违背中国革命权益，悍然于超越中共五大权力之上，召开汉口会议，解散合法中央，另立非法中央，并任意指派一个于法无据与众不孚的人作傀儡，命他代行中央职权。这是完全违法乱纪不得人心的。

同时还应该说明，一九一八年第三国际在莫斯科成立之时，曾由各国共产党会议通过第三国际组织法与规章（十三点）。中共是一九二二年按照规章加入第三国际作为国际一支部的。按照规定国际兄弟党间，必需遵守民主精神，彼此平等对待，并互相尊重、互相支持与友好相处。这是历来国际兄弟党间共同守则。但是这次东方部召集汉口会议却违反平等、互助的精神，破坏第三国际章程，践踏国际兄弟党相处准则，违反公理，任意横行霸道，实行以大国役使小国，以强凌弱，以上压下，违背国际革命道义，莫此为甚！而且事实上，在国际方面自从汉口会议恶例一开，以后变本加厉援例发生，在第三国际内更仆难数。在中国，一九三一年东方部再度策划召开四中全会，成立以王明、向忠发、刘少奇等人为仆从的第二个中共临时中央，这也表明是再度对中共进行分裂党的组织。其后果严重，毁党与危害革命罪恶昭著，可谓后先一辙！

2. 三次左倾路线及其质变：自汉口会议以后，临时中央的政治面貌以前后连续出现的三次“左倾”路线为其代表。三次“左倾”路线的发生与发展，用临中的话说，就是：“抢占左方高地！”“唯我独左！”“从左到左！”“左之又左！”临时中央就是按照这些行动口号轮番接力前进。对于当时中国革命利益来说，这些行动口号都是错误的，应该受到纠正。因此广大党员群众对于临时中央所决定的错误政策不得不奋起抵制，予以合理批评。临中负责人却固执己见，坚持错误，一意孤行。并对提不同意见的同志，肆行造谣诽谤，诬为“右倾”并加以种种罪名，这样双方便展开争论。当时大多数五大中央委员为了保卫党与革命利益起见，支持广大党员群众的正确意见；对于临时中央的荒谬意见，针锋相对，予以反击。这样便形成持久的路线

斗争。由于东方部米夫¹完全支持临中意见与主张，对批评者十分嫉视，不怀好感，助长临中气焰。所以此时党内有些人，明知临中不对，但处于积威之下，为了明哲保身起见，不免苟且求容，甚至随声附和，从风而靡。这样使临中错误路线得到庇护，没有及时纠正过来，造成党与革命的重大危害。临中错误路线继续发展下去，正常的路线斗争遂被迫停止。由是滚滚逆流，汇合成为党内思想战线上的狂澜。此际临时中央乘机利用，大造利于自己的舆论，“众口烁金”“积非胜是”，以售其奸，终于造成颠倒黑白，以伪乱真，歪风邪气……这样，便使党内具有原则性的路线斗争发生质变！于是正常的路线斗争遂告失败。临时中央在东方部支持下，更进一步把路线斗争变成小集团的宗派斗争，自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直到王明、刘少奇一伙人，先后代起都是在进行宗派斗争，互相倾轧，排除异己，把一个具有革命传统的中国共产党变成了地下小朝廷。党的组织渐趋削弱，中国革命大业沉霾昏垫，蒙受到铩羽不振的打击！

3. 临中的组织路线与瓦解过程：临中的组织路线，是与其政治上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平行产生的。首先应该指出，汉口会议所采取的组织手段是违反党纪与党章的。当五大中央迁沪期间，密孚闻知立即派二洛乘虚而入，直趋汉口，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旧的合法中央立被解散，任命了一个众望不孚的人为政治傀儡。密孚在导演惠罗洋行一幕成功后，自诩手段高明，但却极不得人心。这是全党皆知的事。东方部密孚在汉口会议后，志得意满，予智自雄，在临中会议上便趾高气扬，目空一切起来。他对临中颐指气使，如对待奴仆。往往滥用“否决权”否决会议通过的决议，他作威作福，独断独行，操纵会议，咄咄逼人。大家对他喧宾夺主，气焰凶横，感到无可奈何。东方部平日坐镇莫京具有无上权威，遥制中国革命。东方部派到中国工作的人大都是属于下驷人物。如一九二七年共产国际代表罗易 Roy，年少不更事，受汪精卫愚弄，以共产国际机密电私示汪，汪遂以此为口实，宣布国共决裂。东方部所派遣到中国担任指导工作者的二洛也是一般干部，既不甚通晓革命哲学与理论，又缺乏革命实践经验；平日深居简出，更不了解中国具体情况，对于中国经济、政治、敌我斗争的复杂情况均茫然无所知，只凭钦差大员身份，以国际路线为护符，闭门造车，师心自用；自以为是，强不知以为知，遇事照本宣科，削足适履。他们在中国工作时，诸般决策悉由主观片面决定，并不反映客观事实。所以遇到实践，就如同盲人瞎马乱闯起来。他们高高在上，不是决策失当，错出主意，就是胡乱指挥，贻误革命也就丝毫不足为怪的了。

¹ 米夫，文中又作密孚、米孚等。 — 编者注

在上海会议上，多数出席代表曾建议讨论有关大革命成败的问题，总结其经验教训。大家一致认为长期以来，大革命取得的经验教训是很丰富的。中国革命历程经时很长，事象繁赜，而且中共组织备历险阻与艰辛，她付出了惊人的代价，所以对于总结大革命经验教训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由于事实上国际对于大革命失败负有重大责任，所以心怀惴惴不安，不愿接触到这个实际问题，因此不敢公开承认错误，同样理由，所以对于大革命成败经验也就掉以轻心，没法如实地认真总结出来。直到无法敷衍时，只有推卸责任，嫁罪于人。这不过是自欺欺人，明眼人是完全知道的。临中干部政策任人唯亲，只凭个人恩怨，不讲实效。东方部所信任厮养的傀儡仆从，通过事实证明，大都是才具平庸，愚呆无能，不知革命为何物，而又品质恶劣，阿谀献媚的驯顺奴仆。所以临中的干部政策是敌我不清，贤愚不分与是非不明。其所亲信的厮养走卒，大都革命赘瘤与群众渣滓！

在汉口会议前后党内生活引起了很大的变化。大革命时期党内民主普遍建立，党员生活在革命大家庭中，在政治与生活方面一般是互相关切、互相勉励，团结一致，相忍为国，共同向敌，不断去争取革命胜利。当时党员生活是比较健康与愉快的。但是在临时中央时期，党员生活情况完全不同。由于临中的组织路线，是建立在宗派统治与残酷斗争上面；他们工于掩盖错误，文过饰非，推诿责任，实行偷梁换柱，指鹿为马，以此愚弄他人。他们表面上虽然披着革命伪装，满口马列词句，但其行径却另是一样。他们为了个人私利不惜残害同志出卖组织，可见“对革命完全失其忠诚”（反四中全会提纲语）。

临中少数人高踞上层，为所欲为，原来的党内民主已被取消，党的规章制度已成空文，失其存在。他们以惩办制度代替说服劝导，领导阶层横行霸道，违法乱纪，无恶不作。这种倾向发展到第二个临中时代，而益变本加厉，倒行逆施起来。当向忠发、王明窃据临时中央领导时，他们以个人为中心，穷凶极恶，两面三刀，到处进行无原则的斗争。其属下敢怒而不敢言。向等更公开倡言“顺我者生，逆我者死！”“你死我活，决不客气！”丧心病狂，莫此为甚！于是临中一手造成当时的地下恐怖。其后果是全党混乱失序，同舟敌国，岌岌不可终日。党组织由瘫痪而分崩离析，濒于瓦解。经过长期积蓄的力量大部化为乌有。“十年成事不足，一旦毁之有余！”到了一九三三年，临中已日暮途穷，奄奄一息地步。他们把在白区的革命力量丧失百分之百，在苏区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五，于是临时中央仓皇脱逃，迁入江西苏区，国际代表则撤离中国，一去不返。

如前所述，从汉口会议到一九三一年四中全会，前后连续出现三次左倾路线，翻云覆雨，实行以错误路线代替错误路线，其实只是错

上加错。在此期间中共三次错误路线的渊源及其发号施令者，均来自东方部，其政策监护执行者为驻在中国的国际代表团。其代理人先后多次换马（如向忠发、王明等），却是江河日下，“一蟹不如一蟹”！总此诸因，在积重难返的情势下，造成对于中国革命的严重后果！

总结起来，这是中国革命的不幸，历史的遗憾，同时也是国际的悲剧！（密乎本人被处决，一九四〇年共产国际宣告解散）这一切难道不是为亲者所痛，为仇者所快吗？！中国革命大业蒙受这严重挫折之后，实际上延长至二十年始获复兴机运。在此期间中国人民水深火热的长期持续的灾难，与临中倒行逆施是具有因果关系的，这又是逻辑的必然结果！

二十八、湖南秋收起义¹

秋暴准备

国共分离时中共中央派文虎与润之回到湖南执行中央巩固党群组织，加强对敌斗争，在湖南秋暴时期，二人均驻湖南指导工作。

一、湖南关系全局：七月间文虎参加武汉党中央最后举行的中央局会议，会议集中讨论有关善后与打开局面的具体事项，包括中委工作及地方省委人事调整问题。在讨论时大家认为武汉固然是极重要的革命阵地，但是过去曾在武汉长驻的中委及省委原则上须一律离开武汉，并充实到更迫切需要的前线上去。在决定调动名单前，仲甫用铅笔写了一张腹案初稿和大家商量，同时询问文虎对此有何意见，文虎对于北方、上海、广州等处干部充实问题提供了几点意见，仲甫说：“你自己打算到何处？”文虎答：“最好仍回北方。”仲甫说：“北方虽然重要，但目前工作在湖南尤为重要，如果湖南局势改观，则迅速影响到东南全局，所以希望你仍是到湖南去走一趟，主要是收拾马变后残局，整顿省委，恢复工会阵容。”文虎点头说：“可以，就这么决定吧！”文虎回到胭脂山省委办公处，召集省委会议，在会上（特立连日未到省委，准备东征）把今天中央决定各事通知大家，经过讨论后，凡需离开武汉的中委和省委一律准备交代，限三日内成行，省委机关立即转移，另建地下省委，向新任省委办理交接事宜。会后林育南兄弟、向警予、许白昊、龙大道等均到，在汉口会谈，商量汉口、汉阳、江岸、硃口各区工作布置问题。七月中旬武汉形势紧张万分，政治部、中央军校不少干部，纷纷自由脱党，沿江东下投向宁方。此

¹ 《党史研究资料》（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印）1995年第5期（总期第214期）刊印罗章龙“忆湖南秋收起义”一文，编者按说明“是罗老未刊稿《亢斋回忆录》的一部分”。该文与本文稍不同，系刊时有改动。— 补注

时汉口组织部却接受了几个工人入党，其中二人为江岸机厂工人，二人为汉阳兵工厂工人，一人为硚口纱厂女工。某夜晚在江岸举行入党联组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十分感奋，认为不同寻常，会后组长某同志讲说见危授命的精神。会毕已深夜，工会派手摇车送文虎、白昊等回汉口，在循礼门附近因调车频繁，手车几乎与火车头相撞，紧迫间手车撞翻，人幸无恙。

二、乘济川号赴湘：文虎于诸事安排定妥后即准备动身赴长沙，当山中央秘书处派来一个同志帮他料理行李等事。初拟乘火车赴长沙，但徐家棚工会负责人不同意坐火车，说车上盘查极严，不容易通过，建议改乘轮船。可是轮船码头上下均有困难，后来朱宝廷告文虎平湖门外有一艘私商货船不载旅客，直航长沙，已交涉好，可以附乘入湘。文虎离武汉前往别春木，春木说他亦不愿久居此地，即当赴沪并云后会有期，当在上海！随即到仲甫寓，仲甫出迎意态如常，但怅惘之情仍难自掩，随问文虎何时动身？文虎答：“今晚动身。”仲甫说湖南工作目前应注意整顿，将来可作革命复兴根据地，但仍须注意全局，勿偏一方。又云只要不把身体拖垮，就可以转败为胜，并表示中央秘书处可派专人护送到长沙。文虎说，不必送，本人虽离湘多年，但乡音未改，行路可得不少方便处。遂同进餐，餐毕辞出。回寓蔡以忱夫妇来会，文虎约蔡同行，蔡云：“二人目标更大，可能同时落网，还是分开走方便些。”因与蔡约定到长沙后接头办法而去。随后朱宝廷来引文虎登轮。该轮大副徐冬林是党员，水手均徐自己亲信，大副允许把文虎作为亲戚带到长沙去。文虎当晚被引到船上与大副见面，大副虽不知文虎为谁，却殷勤招待，让出自己铺位给文虎住。文虎从大副口中方悉该轮名济川号，原系军阀肖耀南所有，后被逆产处没收，让与唐老太爷，唐老太爷即唐生智之父，用该轮经营武长线货物运输。时唐老太爷亦在船上，年已七十多岁，另有搭客张国威及其眷属数人，围坐大餐间作方城戏。张国威身体肥胖，自言体重二百多磅，性情急躁，时向大副催促要开快车，大副笑答：“你不知道这是老太爷的船呀！”（意思是说船已陈旧）（按：后来一九二七年十月蒋唐战争内唐败退，十一月十二日张国威因唐军节节败退，请唐生智下野，唐见大势已去，乃乘日轮逃往日本，临行前诱张至寓，将张勒毙于浴室中。）在轮上从张唐闲谈中闻及有关肖耀南事，据云：肖耀南既杀施伯皋，受舆论谴责，内不自安，尝语人：此举实为吴佩孚所误，致开罪全国，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北上，肖忽暗中联孙反吴，准备在武汉组织革命政府，旋为吴侦悉，被吴谋害服毒而死，军阀行径，诚多反覆。

三、一局残棋：船抵长沙时，因装有私货，为避开大西门税务人员耳目起见，在北门外码头停泊卸载抛锚，文虎随即登岸，时已近深

夜，相偕到大副家休息。第二日省委即派交通来接。随后蔡以忱夫妇也到达长沙。第三天上午文虎出席湖南省委会，作了关于武汉中央会议的详细报告。自马日事变以来，省委工作几陷于停顿，至是局势始渐趋稳定，一切工作均须从头做起。时省委负责人书记彭公达，组织夏明翰，宣传龚际飞，农民部易礼容，军委李子骥，省总工会翦去病，文虎以中委身份兼任宣传部长及工委书记。此外省委工作干部尚有毛润之、罗学瓚（组织部）、林蔚（秘书处工作，后任醴陵县书记）蔡以忱、何资琛、毛泽民、庞人杰、王基永、龚际飞、刘鄩、庞人佩、王则鸣、曹伯韩等。（郭亮参加南昌起义，随军去汕头）妇女干部有：朱舜华、李杰英（郭亮妻）、易震寰、石觉非、章宗亮、杨玉梅、熊季真。湖南省总工会干部有：谭汉镇、肖汉云、彭万兴、欧阳梅生、沈汉臣、袁晓照、涂国钦、潘福岩等。全省及长沙市委工作干部原有：王岳斌、曹子俊、张玉英、黄人白、杨福涛、顾群、蔡声硕、熊志高、颜南山、梁桂生、熊巽泉、杨昭植、许仲武、胡德成、余庆和、宁希威等。粤汉铁路总工会有：易庆和、伍海清、熊介龄、肖怀清等。株萍铁路工会有：石作珍、吴汉卯、王义和等。女工部有：罗启雾、田雪梅、王岳斌等。工会在秋暴中湘东湘南成立特委，并在各县重建县党委。湖南外县党委主要干部：安源有刘昌炎、朱绍莲、李涤生、朱景棠、谢怀德、方福胜等。醴陵有刘毅、汤正清等。水口有刘东轩、罗同锡、陈枚生、李保华等。浏阳有陈昌、潘心元、王德吾、聂永辉等。平江有罗纳川、毛简青等。汝城有朱青勋、李涛等。（朱在一九二七年八月间汝城战斗中牺牲）宜章有高静仙、杨子达、毛科文、胡少海、胡世俭、张际春等。攸县有罗震等。道县有陈河清等。石门有袁任远等。（罗震、陈河清等均先后牺牲。）

当时省委办公机关在浏阳门外肇嘉坪某号旧式楼房，有房约十数间，其后邻左家花园。秘书处、组织、宣传各部部长均集中办公于此，不作开会用。此外工委机关二处设在富雅里保节堂附近某号，宣传部设大西门外河街礼和洋行弄内，农民部在北门外八角大樟树大屋，河西农会工作接头处设在水陆洲洞庭庙附近与裕湘纱厂工会秘书处同居。总交通处设在小吴门外某里内。

按：湖南省委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三日向中央报告

全湘党经整顿后有七县委，特委十一处：1. 岳阳、临湘、湘阴书记杨孔万。2. 安乡、南县、华容书记李运钧。3. 益阳、沅江、安化书记廖如愿。4. 常德、汉寿、桃源、临澧、慈利、石门书记潘心源。5. 沅陵、古丈、麻阳、溆浦、芷江书记丁基础。6. 桂阳、新田、临武、加禾、宁远、兰山书记袁昨非。7. 茶陵、攸县、安仁、酃县书记潭天民。8. 衡阳、衡山、常宁、◇◇耒阳书记陈佑魁。9. 零陵、道县、江

通运输线。(5)各县就地发动暴动,配合统一行动。(6)组织并武装长沙工人及郊区农民,一齐响应攻城。

二、派中委毛润之赴铜鼓:会后大家在花厅内团团而坐,主要是讨论关于省委工作问题,最后,文虎问润之说:“你身体不好,天方盛暑,此去路途遥远,能受得住?”润答:“不要紧,可以去的,希望老兄在长沙多住几时。”此时傍边明翰插言道:“决定派泽民同去,一路照拂,谅无妨碍。”润之走了,明翰告文虎说:“润之虽未学军事,但曾在四十九标当过兵,况有湘军血统(其父亦曾当过多年士兵),不难成为打仗里手(内行)哩!”润之于八月十六日登程,经安源、浏阳,于九月四日到铜鼓。二星期后,泽民自浏阳回省,报告沿途遇到张家坊民团哨兵盘诘情形,及脱险经过,省委方知润之已安抵军中。润之到达铜鼓山口开始军事布置,即召开会议,会议上决定就全部武力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第一师下辖四团:第一团即原武汉政府警卫团,由苏先骏任团长。第二团即安源矿警队与萍醴农民自卫军合编之团,由王先亚任团长。第三团即原二十军独立团。第四团即夏斗寅部降兵改编为一团,共约三四千人。

三、计划夺取长沙:同时决定秋收暴动军事计划总任务是夺取长沙,第一、第四两团由修水出发,先攻取平江,再打长沙,第二团自萍乡、醴陵进攻浏阳,会师长沙。上项计送到省委,经省委同意即日施行。自八月初间起,省行委即积极行动,准备策应暴动,占领长沙。省委在准备过程中,召集了几次动员会议,决定武装本市工人及郊区农民。省委军委主持召开了军事行动会议。在小吴门内某里举行留长沙中委及湖南省委各部负责人与军事干部全体参加会议,主要是讨论工人武装编队及关于作战准备等问题。当决定按地区编为几队,并讨论设法取得各种武器武装工人及其它具体行动事项。会议时接到长江局来信,内称:“武汉三镇暴动已准备就绪,立待发动,以汉阳兵工厂为主力,码头工人数千已组织参加行动,武汉暴动发动时,立即可以占领汉阳、汉口、武昌三镇。”事后证实以上所云均属想象之词,毫无事实根据。这次会议是在白色恐怖极度严厉下举行,在会场前后门布有三道便衣武装岗哨,把盒子炮、手提机枪藏在菜担篓内和人力车座中,准备有警时击退军警突围,但会议经过一天未出事故。

四、丝茅冲会议:农民武装准备会议是在北门外丝茅冲距城约十里大石碑附近农庄举行,当地群众基础很好,一切顺利,参加者为省委工、农、军各部负责人及重要军事干部。主要讨论布置近郊农民准备武装策应,围攻长沙的执行细则,解决武器弹药、联络等问题。会议通宵达旦,会场有武装农民守卫,往来出席人员由哨兵分段护送,以防万一。

五、江神庙会议:江神庙会议是在水陆洲洞庭庙船工家举行。当地群众基础亦好,所以会议在白天举行,主要任务是组织水陆洲划工、船工布置接应沙西农民武装队伍进城,准备在小河搭浮桥,大河集中划子渡船,并组织担架队备用。会毕文虎在江神庙附近江边偶与向忠发相遇,因问向几时来长沙,向答:“来已月余。”文虎复问:“有介绍信否?离武汉时见白昊、亦农否?”向答:“均未见到,我乃自行离鄂来湘,现住洞庭庙街,请给我找工作。”文虎漫应之。返城后,文虎向武汉来人询及向事,都称不明究竟,月来武汉机关连续被破获不少,此事与向是否有关亦难断定。又经过数周方判明向是在混乱中自由行动离开组织,总工会帐目存款亦未作交代。文虎第二次见向室内陈设宁波木器,一妇人油头粉面,一榻横陈在抽鸦片,向见有人至急令妇人离室他避,诡称其妻胃病复发所以抽烟,文虎与向接洽知其码头生活积习仍深,不易改变,但认为只要大德不缺,一切可以相谅,所以并未加深究。后来向与李立三臭味相投,造恶多端,良非偶然。

六、宣传鼓动会议与武器储备:暴动宣传鼓动会议在大西门礼和洋行某里举行,讨论宣传鼓动工作。会议决定临时筹办一个刊物在工农群众中发行,用通俗语文宣传暴动政策,并印行传单在城乡散发,又决定在暴动成功后刊行日报,由龚际飞负责筹办。暴动中需要大量弹药武器,除秘密购买或策动反动军队士兵拖枪归顺等方式取得外,同时还设法自制各种武器。当时安源矿上的炸药库钥匙由工人同志某掌管,取出炸药后用锡片裹炸药装上雷管与引线,制成手榴弹。在安源制成后,由李涤生用箩筐运到长沙车站,上面覆以红辣椒,先在工会卸下,夜深人静,运往指定地点备用。又在农村中有各种土制武器,如鸟铳、大号过山鸟铳、土驳壳枪、松树炮等。其土法所制炸弹,用玻璃管装硝酸加黑铅金属灌中央,四周用炸药硫磺铁片填满密封之,即可用。投掷声音宏大,二十公尺内有杀伤力。还有用步枪子弹装发的大手枪及火药枪等。

七、浏平战役:平浏醴方面军事行动原定于九月上旬分路发动攻势。九月八日,第三团进入浏阳东乡,攻下白沙市(◇◇随军),前进三十里,到东门市,遇到当地团队鲁忠修率队袭击,伤亡甚大,退驻排埠。士兵多湖北人,相率溃散,三连连长不辞离军。由于交通阻隔,不能将战况通知第二团,故各路行军不能互为声援。

萍乡方面先是矿警队早于九月十日(中秋节)发动占领安源,将矿警队二百人、工人纠察队五百人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团长王先亚),计三营八连约二千人,攻萍乡未下,向西攻打老关,即占领老关。九月十二日攻下醴陵,缴枪八十支,续进攻株州,敌人溃退。九月十四日敌增援反攻醴陵,第二团乃向浏阳进军,于九月十五日攻

占浏县城。因当时第二团不知第三团在东门失利及在排埠被阻事，故仍按预定计划攻占浏阳。此时东门之敌急驱浏赴援，从浏阳东门入。十七日下午王先亚率军从西门突围出向南市街背进，敌军火力极旺，过浏水时，死伤甚众。此时驻排埠第三团，竟未出动夹击浏阳敌军，坐失机宜，致造成南市街重大死伤。第二团退出浏阳城后退醴陵涑口游击，一九二九年改编为湘赣独立师第三团。九月九日第四团进攻平江长寿街，在长寿街战斗中因内部反水，勾结敌军夹击第一团，第一团在金坪受创，乃向浏阳退却，平江一路完全无功。以上各军在平浏作战，不满十日先后溃走，主要由于敌势强大，但我方谋虑不周，统率无方，联络失机，亦难辞咎。

八、湘南军事失败：在湘南方面，省委曾命令在桂东县何成举率领一个团，由农民自卫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一团，向资兴、衡阳进攻，策应工农革命军向长沙进军。何团随即占领汝城，在汝城被敌军袭击退出城外瑶岭休整，停止前进。由于各路军事迭遭挫败，围攻长沙计划遂告搁浅，同时长沙市郊工农武装暴动亦因孤掌难鸣，迅被镇压下去。

九、秋暴损失：于此应特为指出者，秋收暴动前后数年间在农村方面白色恐怖尤为普遍，特别是湖南境内由于秋收暴动所引起的牺牲是极其严重的，中共党员、赤色工会、农会干部与群众被杀者不下十万人。其中浏阳、平江占半数，约五万人，军阀屠戮残酷异常，千百人同时异地一朝毕命，虽古代屠城坑降，不过如此。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凶年饥岁，历二十年而未止！在秋暴期间浏阳城战失败中死伤惨重，其中如黄昆吾、张氏兄弟等死事极烈。黄昆吾，浏阳东乡达浒人，原长郡中学学生，参加肖乐天部起义，后为留法勤工俭学生，归国后参加湖南农民运动，秋暴中率领本乡农民武装围攻县城，战败落荒走西乡普迹，乡农会携一牛赠彼作逃亡旅费，行近长沙郊外，牛被军队夺去，并械送团局，黄于审讯时出其不意奋勇击伤团局人员数人，冲出包围，敌兵追击，被乱刀砍死。黄在中学时，自负奇才，注解孙吴兵书，以匡救国事为己任。出国后在巴黎蒙达尼工厂工作，将平日自著有养晦斋诗文多篇悉焚去，山是气质大变。一九二七年到武汉晤文虎，意欲参加军队随军北伐，以建军功，后见事机不谐，乃返湖南，终为敌所戕。与黄先后罹难者尚有张氏兄弟，张斧、张钺、张弩三人在作战中牺牲。其他姓名未明者不计其数云。

十、三湾改编：平浏各路军围攻长沙计划失败后，九月十九日到文家市集合，经过短期休整，后乃决定警卫团与农民自卫军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三团，伍中豪任营长，时罗荣桓任三团九连党代表。安源矿警队与醴陵农民自卫军合编为第一团，向井冈山进发，九月二十四

日路过泸溪镇受敌军江宝定营伏击，损失严重，卢德铭战死。以后军中续有逃亡，师长余洒度不告而去，陈继之亦逃。军次三湾，成立前敌委员会，重行改编军队。在三湾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实在只有二营共七连人。三湾改编后十月到达宁岗古城，官兵约一千人。王佐、袁文才派人到古城联络，送袁马枪一支，筹赠军饷六百元，继又送王、袁步枪一百支，扩充两连，王、袁决定一团进驻井冈山北麓茅坪。一团到井冈山休整一月后下山攻取遂川，得现款五千元，解决给养问题，后退出。十二月进攻茶陵，战失利，三十一团团长成浩拟投敌，连长刘庚，副连长周伯坚，党代表何成兴均离开队伍，即撤成团长职，以张子清代成为团长。引兵回井冈，将事变中成浩等四人处死，十三人撤职。一九二八年春朱德率兵来会，开各军联席会议。一九二八年五月各军会议决定成立工农红四军，下辖五个团，即二十八团（朱德所部），团长◇◇◇，营长粟裕、胡少海、杨至诚。二十九团（宜章农民自卫军改编），三十团（湖南暴动队伍改编），三十一团（湖南秋收暴动队伍改编），团长朱云卿，党代表何挺颖，营长苏先骏、王贲民等。三十二团（原王佐、袁文才部队），水口山工人纠察队则编特务营。一九二七年秋收暴动至是告一段落，开始井冈山时代。

于此应指出者，秋收暴动向平浏进攻，正是叶贺军队在向潮汕进军的时候，此时数千里外，两方孤军作战，既不通声气，更不相支援，势成两橛，临时中央高高在上，毫无主张于其间，此种行径，可谓不负责任，渎职已极！结果两败俱伤，全局隳堕！

长沙暴动经过

长沙暴动与浏阳各地军事先后挫败，同时，长沙城内湖南省委主持的暴动计划亦迭遭破坏，因此遂失去扭转全局的力量。现在就省委在策动暴动期间与敌人斗争过程择要记叙如次：

一、猴子石爆破军车：在暴动高潮中，双方剑拔弩张，曾发生不少惊心动魄的事。当时敌方对萍浏不稳情况，早有所闻，因此敌军在株萍铁路上调兵遣将，军运频繁。我方为支援萍、浏、醴方面军事行动起见，决定破坏株萍铁路军运，阻敌增援。某日傍晚我方探悉有兵车一列自长沙车站开赴醴陵，我方乃决定炸毁该军运列车。预先在长沙南门外猴子石附近设伏埋置炸药，兵车开到，触及地雷，轰然一声，路毁车翻，死伤极众。当时因铁路破坏程度颇大，立即修复不易，军队遂下车步行。执行爆炸同志在对面山上望，军队离车后，始乘

芦苇洲预伏小舟安全离去。

二、密使被获：八月初旬省委曾将关于暴动军事问题布置写成通知前敌委员会，由交通处负责人物色二位可靠郊区农民同志前往浏阳送信，临行前，子冀¹把其中一人叫到跟前当面叮嘱沿途小心在意，一定要把信送到。该青年挺胸答道：“你放心，我一定把信送到，如意有不诚，红炮子穿心！”言讫大踏步而去。二人出城一先一后相距半里，行经黄花市（入浏阳通道）遇团兵盘查，前行者身边无信，挺身向前受检查，后者乘间走小路登山越岭绕道过去。二人随后会合，更番前进，终于通过层哨检查把信送到。但是后来另一次交通失事，出城不远，信被抄获，将信洗出，全部获悉准备暴动计划（该信后在湖南国民党所办日报刊布），大为震动。立即加紧戒严，广布侦探，刺探有关暴动情报，当时省委内部谈话，避免“秋暴”二字，语及此事，以“秋阳婚事”为代。

三、自由告讦：敌方一面调动军队防守长沙及各专区中心城市，一面全市宣布戒严，动员全部人力物力及宣传机关进行反共工作，特别是在长沙，铲共委员会日夜办公，仇鳌、曹伯闻等公开宣扬要对共产党斩草除根，一个不留。公安局长周安汉奉令亲自领队巡逻街巷，带同眼线捉拿共产党及工会会员，男女学生及其他嫌疑犯，闹得满城风雨，鸡犬不宁。当时，长沙市实行十家连保，十家之中如发现一个“暴徒”，九家同罪入狱。又实行自由告密，不拘任何人，一纸告讦，即予捕杀，至于各县团局，上行下效，一片杀声，更是刑人如同儿戏。

四、反共宣传会上斗争：八月下旬正当暴动高潮与白色恐怖交织时期，国民党湖南省党部铲共委员会在长沙教育会广场召开反共宣传大会，到场党、政、军、警各界数千人，由仇鳌、周安汉、曹伯闻、曹典球等人主持会场，讲演共产党暴动杀人放火罪恶，正在气氛激昂中，台下忽然有人向主席台上掷用布裹的圆形爆炸物，顷刻冒烟，台上人见状惊慌失措，急忙往台下逃走，同时又有人向台上连续投掷巨石几块，顿时会场秩序大乱，听众纷纷作鸟兽散，军警立即包围会场，搜捕投掷爆炸物的人。纷扰多时，竟无所获，随后在会场门外捕去嫌疑市民一人，不问情由即行处斩。另一贩卖油条小孩，偶因湿泥污手，乃随手撕去沿街张贴的反共标语一角，用以指手，适为巡逻军警瞥见，遂加逮捕，以暴徒论罪，就地正法。宣布罪状文告说：“该暴徒憨不畏死，罪无可逭”云。

经过铲共宣传大会，国民党省党部、省政府决定九月一日起在长沙市内举行一次大规模户口清查运动，由党政军首长带头参加，带同

1 《党史研究资料》中“子冀”为“李子骥”。— 补注

眼线，挨户进行检查，日夜轮班工作，如此持续了十天未有间断。清查时发现可疑人一律拘捕，经过眼线指证姓名者，一律处死。有时在街上行走，遇到熟识“暴徒”或行迹可疑者，不问情由，予以拘捕。

五、龚际飞等牺牲：在这次持续半月的大搜查中，省委各机关全部被清查过，大家镇静应付，勉强过去。不幸的是宣传部、工人部等几处在搜查时先后被破获，宣传部秘书龚际飞，工人部秘书翦去病夫妇，省总工会组织部长庞人健等均被逮捕处死，全案牺牲三十余人。

龚际飞，湘乡人，兑泽中学学生，湖南学生联合会副主席，大革命前偕王基永（湘乡人，学联正主席）等领导湖南青年运动，极有劳绩。一九二七年任中共湘省委宣传部秘书，时住大西门外下河街宣传部办公处，同住者有石觉非（女）、曹凤英（女）等五人。该屋前临河街，后为菜圃，地极隐蔽，但因此反引起警探注意。前后经过几次户口清查，均未出事，最后一次警探同一湘乡籍探员深夜排闥直入屋内搜查。该探过去为联中学生，瞥见际飞，大呼此人即学联会主席，有名的头号共产党员，当即予以逮捕，并捕去同屋男女同志五人。临去时派人守候，翌晨又捕去三人（均宣传部工作同志），送往铲共委员会拘押，随全部处以死刑。罪名是：“反革命罪魁，国法不容，立予正法，以昭炯戒。”

六、庞人健等牺牲：工人部机关二处均在富雅里内，周安汉事先得报，总工会负责人庞人健匿居长沙市内，经过长期调查，探明庞妻来往路径，因而踪迹庞人健住址所在。周安汉原与庞相识，一夕深夜，周安汉本人带同军警一排直至庞寓，时庞已入睡，军警撞门进内，从床上将庞拘走，解往铲共委员会审讯。委员会仅询问姓名，庞因审讯者均其旧识，未发一言，即被判处死刑，推往浏阳门外斩首，并命其妻亲往殓尸，解回原籍监视。

庞人健乃庞人铨之弟（庞人铨与黄爱组织裕湘纱厂工会为赵恒惕所杀），湖南高等工业学生，人顾长清瘦，极具胆识，深入险地，如履坦途。文虎常在庞家开会住宿，深夜庞妻率女工在屋外放哨巡风，通宵达旦，会后又分别护送各人出门，亲见其安全抵家始返报庞，庞乃就寝，率以为常。

在清查户口期间，省委秘书处田德沛（湘西人）出外工作，在藩正街上遇到同乡某（时任密探），立谈间，即报警拘田。法官向与田谈，劝田反水，做协捕工作，田不理，下狱，后判处死刑，绑赴刑场，时经过省委秘书处后门，为其妻姜保英瞥见，立即晕厥，妻苏醒后神智失常，终日坐晒台上望刑场痛哭，随后出外不归，不知所往。

七、翦去病等牺牲：庞人健被害后约半个月，敌方继续破获机关多处，翦去病亦全家被逮捕。翦去病住所在教育会坪侧保节堂附近，

有楼房十余间，翦偕章宗亮住楼下，文虎住楼上，厨司为杨姓农民，女工即杨妻曹淑媛，二人均共青团员。在庞人健被害后，文虎与翦夫妇议他迁，但一时无适当房屋，加之人口众多，如无充分准备，迁居亦容易引起邻居注意，故只有勉作镇定，徐图迁居。不料军警已从他案觅得章宗亮线索，遂于庞案发生后约半个月后，公安局实行搜查翦宅。在翦宅被搜时，文虎适因赴肇家坪开会，会议延至午夜方散，文虎因市内戒严，街道不能通行，宿秘书处，遂免于被拘。翦被捕时并未搜查出证据，但因翦曾任省总工会要职，其妻大革命期间曾任宁乡县长，铲共委员会办案人员多认识翦、章二人，故将其全家逮捕处刑，无一幸免。又捕去长沙泥木工会中坚干部杨福涛、张汉藩、任树德等，均加以杀害。

翦被逮后不久，湖南省委办事处亦被查抄（时文虎已离湘赴沪），书记彭公达，宣传部、组织部、妇女部负责人王咏梅等被捕。彭公达于被捕后降敌，交出组织名单，并为敌作伥，立功赎罪，湘省委遂大部落网，牺牲众多，只易礼容、夏明翰、罗学瓚等少数人逃出长沙。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湘潭人，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马变后即留在长沙工作，激昂慷慨，口头决心甚坚。彭与◇◇◇为中表亲，◇◇极称其能，但文虎在长沙时，听罗学瓚说：“公达嘴劲大，言过其实，决不能独当一面。”后果如所言云。

总结：秋暴失败的消极因素

首先我们可以肯定，秋暴进攻长沙计划是已告失败。造成秋暴失败消极因素颇多，从客观与主观双方加以观察，这些因素有属于政治的，也有属于军事的，也有属于自然条件和其它条件的，大略分析为下列各事。

就全局观察，自七月十五事变以后，我们党的政策便已失却主动，南昌暴动中共武装主力数万人调离湘赣二省，这是一大失策，从此两湖革命力量十分空虚！

反之，敌人方面所集结武力则数倍于我方，当时，湖南政局由唐生智控制，湖南省主席周斓。湘中十二县驻兵为何健、鲁涤平、叶琪、许克祥等几个师，加上民团、挨户团不下十万人，众寡悬殊，显属事实。军警密布，铲共组织遍布全乡各地，白色恐怖空前猖狂！反动政府既无崩溃迹象而革命民众组织则涣散无力，因此更无革命强大力量促以施行反击，所以这时匆匆举行全省暴动是失机宜的，是时间的错误。

从时间条件观察，秋收暴动是正在农忙收割季节举行，各地区行军作战，在发动农民参加作战这方面受到很大的局限性，这种情况与前一年北伐战争时代的情景比较大不相同。行军作战，既少耳目，又少翼蔽，因此孤军往来，极易为敌所乘。

从军事指挥作战方面，四个团改编以后虽然表面上隶属一个师，但是实际上却分驻平、浏、醴、萍四个县，互不相统摄，这便造成“将不知兵，兵不认将”的情况。各团彼此之间关系疏远，匆匆出征，作战时各行其是，不能灵机应变，也就是说不能对变化的局势肆应无碍。

反之敌方军事部署却是统一指挥，比较机动灵活，运用自如一些。如在浏阳城郊争夺战中，敌军增援，源源而至，又占领有利地形，我军陷于包围后全凭消耗，后来再衰三竭，力竭方始突围，这些显然是与师、团长的指挥无方有以造成。

从第一团方面分析，也发现不少消极因素，如警卫团向修水移动，总的精神是为了“避战”，又士兵多鄂籍，怀有思乡思想，加之近月以来政治教育与军事训练都放松了些，所以指战员士气不旺，临战缺乏“钜鹿作战”的精神，大敌当前，不能突破。

再说第四团原系夏斗寅部败兵所收编，政治上与第一团有严重分歧，政治上极为不稳，本来早已成为问题，但是第一团顾虑多端，因循未予解决，未能采取快刀斩乱麻的手段解决问题，于是就酿成变生肘腋的祸患，终于影响全局。在这个问题上，卢德铭事先疏于防患，临变失去果断，实不能辞其咎。

第三团在估计敌方力量时也有失误的地方，如东门市团防队乃当地大族鲁、左等姓招募在乡军人所组成，装备颇齐，军事训练有素，战士成份多属地主阶层，时常出外参加反共作战，是具有相当战斗经验的。且该队以主待客，地形熟悉。但这些都为团长忽略，因此东门之役引起我方损失不小。

总结上述情况可以说秋暴失利关键在于：一败于平江，再败于南市街，由是便无接近长沙希望，原定计划全部不能实现，分析其原因是众寡悬殊与主客异势！

从地理条件方面来说，秋暴地区分布湘东北丘陵地带，山区交通条件极感不便，行军作战，全靠步行，无公路汽车，故军队运行远落敌方之后，加之电讯器材缺乏，方圆数百里间传令通讯均有困难，于是不能在最大限度内发挥我方全部作战力量。

这样，当时湘南方面虽有部分农民武装，但因距离较远，所以未能响应湘北行动，这也是原定方案意料所不及的。

还有在军队组织方面，我方后勤组织简陋，补给困难，医药条件缺乏，伤兵处理由于病床担架不足，加上天气炎热，疾疫流行，也是

造成减员条件之一。

总之自八月初至动员出征展开攻势，时间仓促是事实，所以一切方案计议未周，于是造成全军重大减员。还须着重指出的：八月一日南昌暴动后六日，即八月七日临时中央又决定秋收暴动，两次暴动在连续进行，按理在作战计划方面应有适当部署，采取联合作战行动，双方互相支援，但当时临时中央对于南下大军漠不关心，如同隔岸观火，叶贺军于九月十三日到达潮汕，旋即战败，与浏阳军事失利时间相距不很远。

按：文虎向中央会议所作湖南秋暴报告，内容大致与本文吻合，该报告题为“关于湖南秋暴经过”，报告人为中央特派驻湖南中央委员文虎，记录者刘鄩，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可备参考。

十一月中央扩大会议对湖南秋暴作了决议，大要说秋暴失败平浏方面由于润之失职，决定撤销其中央委员职务，国际代表用意有掩饰自己的错误。

二十九、文虎重莅武汉

湖南省委所计划的秋收暴动全部失败，但上级命令仍坚持贯彻武装暴动政策，因此湖南省委正在设法重整旗鼓，将长沙市郊所余人力全部投入未来新的暴动（即后来的灰日暴动）。当文虎亲赴水口及湘东各县视察归来时间，忽接上海来电，嘱文虎即动身赴中央商议工作，并参加中央扩大会议。文虎于接到临中来信即准备到上海出席临中扩大会议，并在省委会上提出讨论。当经会议决定：由文虎代表省委在扩大会议作工作报告，并将秋暴过程中有关各项问题整理成报告，由文虎带沪参考。文虎离开省委时重新调整人事，宣传部工作由任◇◇、何资琛代理。省委新增调来工作人员有：涂正楚、仇寿松、罗春桓、向钧、姚韵梅（女）、林蔚（秘书，后赴醴陵工作，任县委书记牺牲）等。文虎待诸事交接完毕，于十月初离湘赴汉转沪。

一、文虎离湘：文虎离湘前夕，适逢近邻失火，火势熊熊，距住所不过几十公尺，救火水龙纷集，街上讹传共产党军队进城放火，满街军警出动戒严，如临大敌！纷扰中刘鄩手携衣包先赴小西门外码头等候下船，文虎随后亦至。关于刘鄩此次同船赴汉事，于此须略加说明。先是文虎在省委宣传部负责时，由于会议繁忙，实际事务均由刘鄩与龚际飞二人相助处理，龚牺牲后则由刘独任其事。

二、刘向契阔：刘鄩，安化烟溪人，周南女校高材生，在校时各科成绩冠于全班。其父鹏万为湘军高级军官，殁于战阵，兄右文，弟右武，均现役军官。其幼年生长兵间，善骑术射击，故人称为将门之女。一九二七年春，鄩在新化锡矿山做工人运动，任纠察部长。在马日事变后，锡矿山局长吴宗伯率矿警三百人围攻工会，杀邹剑武与肖石月二人，刘鄩率武装纠察队突围而出，占领矿区附近要隘，继续与大矿主刘铁逊、杨次百等周旋，作战经过三昼夜，终因寡不敌众，死伤累极，刘鄩带领驳壳枪队十余人冲出重围，向湘乡山区撤退，最后

遂脱险到长沙，在省委宣传部工作。刘鄩在省委工作时因熟习长沙社会情况，故常在市街活动，每外出时恒青衣于帕，身怀短枪，出入城郊联络工农会员，往来无阻。文虎赴沪开会，时省委因工作需要专派刘鄩至中央商洽有关湖南省委各项问题，刘鄩白请与文虎同行，二人遂决定于十月初动身赴武汉转沪。当时长沙市轮船铁路军警检查十分严密，武汉码头管制亦严。刘鄩建议先乘木帆船至汉阳鹦鹉洲起坡，可以避免惹人耳目。刘有同乡在汉阳鹦鹉洲木材厂，旅居颇便，二人乃决定乘帆船北航。时秋末冬初，湘江水位下降，舟行风波不大，经三日即抵城陵矶，五日渡洞庭湖，凡七日夜船泊鹦鹉洲，登岸后至某木厂留宿一晚。刘鄩即渡江至汉口华景街访问毛佩文，毛遂派人接引文虎与刘鄩至某家（寓德华里四号）暂住。

二人在寓守候两日后，向警予得讯即来寓相晤，刘鄩与向在周南女学原为前后同学，久别重逢，畅谈半日，临去时约定次日黄昏再来引文虎与刘鄩同到长江局去。次日薄暮电灯已明，警予应时来寓，文虎与刘鄩即随向到长江局。

三、长江局见闻：长江局位置在英租界某洋行内，有汽车行，室内陈设颇华丽，壁炉地毯，侍役白衣白帽，俨然洋商气派。时已七时，亦农留文、刘、向三人同进晚餐。亦农性格豪迈，高视阔步，乃大开大阖一流人物，平时抵掌剧谈，漫无拘束，白昊常戏称他为“国际巨人”。自言长江局工作遇事直接请示二洛（洛米那则与洛埃曼），二洛对他遇事肯听从。亦农时方与李哲新婚，意气扬扬，掩不住内心喜悦。餐后，文虎与亦农二人促膝共谈，从亦农谈话中，知道洛米那则与秋白已赴上海。据亦农说：“国际代表对湖南暴动原先怀有极大期望，认为纵然不能会师武汉，长沙是一定可以夺取到手的。”文虎把湖南情况据实向亦农详谈，亦农说洛米那则到上海后总会有办法的。文虎说：“兵凶战危首先要知彼知己，过去湖南省委对此疏忽，所以一切军事行动不如人意。你是长江局负责人就应该对全局真正负起责任，运筹帷幄工作做好后，才能决胜千里之外。”亦农说：“说老实话，我实在没有这等本领，如果我干不下去，就只好走路。”文虎道：“不是这等说法，你只要能临事郑重考虑，就可以干得好的。”随即谈到南昌军队去向，文虎问亦农是否知道最近情形，亦农说：“江西方面一点消息也没有，不知道他们搞甚么名堂？”文虎建议湘赣鄂三省军事行动应取得密切联系。此时张皓从外进来说道：“他们总共有好几万人，点火把走夜路，人多不怕鬼，一定能搞出个名堂的。”向说：“也说不定，但要看事实如何？”三人谈至夜深始散，主要是谈关于鄂东农民暴动情况。从这次谈话中听到种种说法，如云：“中国贫困，失业众多，是资本主义剥削的根源，也是进行战争的凭藉，在

战争中浪费一些人力资源，也是不可避免的事。”等等如此。警予告文虎说：“亦农是临时中央的坚决支持者，他同何资琛一样又是不断暴动论者。他说群众革命潜力只有用火暴去播，才能激发出壮大革命声势。”一次他与硚口区负责人谈话说：“八七会议开过已久，你们为什么不动作起来？我们一定要拿出决心表现力量，也可以让国际代表看看场面。”当时亦农反复说明暴动政策只要能把红旗挂出来，就是挂几个小时也是好的。硚口区负责人答：“我不是不懂这些道理，但是没群众使唤，听你怎样播也播不出名堂来。”

文虎随后又出席长江局会议，当时与湖北省委等同志会晤，同时见到来自江西省委以及鄂东特委等处工作同志，谈到各方面有关工作。当时长江局组织有罗亦农（书记）、许白昊（组织）、马骏山（秘书）、任旭（组织）、向警予（妇委）、杜林（宣传）、陈春和（海员）、张金保（硚口女工）、董昌荣等。少共省委：关向应、刘昌群（麻哥）、李子芬等。江西省委：刘俊山（书记）、方志敏、邵式平、于溟涛、严北溟、王秋心、丘迪（农民部）等。武昌区重要干部为：学联曹壮父，省农协陈荫林、邱群生、符向一、刘振一等。汉阳区委张皓、龙大道、许白昊及欧阳梅生等。

四、汉阳越狱事：文虎、刘鄩在武汉期间从当地同志谈话中获悉汉阳越狱事实。据说，有曾在省委宣传工作的女同志章桂楠（武昌女师学生）在武汉政府分裂后返汉阳乡间避难，行至蔡甸，被军警识破立予拘送汉阳县政府下狱。该县长夫人为其旧同学，因向县长说情保出，暂居县署。时汉阳狱中有政治犯四十余名，内有汉阳籍黄埔学生数人，计议越狱。事为章桂楠所闻，因通知妇联转告李明珂设法施救。李夤夜至县署与桂楠密议采里应外合办法。在旧历除夕，合署戒备松弛，章桂楠私取县长警卫手枪，藉巡查为名闯入监内，先将同志释出几人，他们立即用枪击毙看守，大开监门，将全部政治犯释放。此时狱外由李明珂鸣枪接应，大伙遂随章、李冲出县署，暗夜中乘混乱出城向鄂东而去。据说，桂楠已赴上海，住林贞家。

五、江城别绪：刘鄩在汉寓居时，深居简出，偶一外出，必在灯火黄昏以后。一夕到警予处谈话，夜深始归，路过兰陵路剧院，忽遇国民党部同乡某跟踪。鄩迅速行至江边跳上舢板划至鹦鹉洲宿一晚，次日始返寓。鄩未归寓时引起大家一场虚惊。警予闻讯后即禁止鄩外出，有事时警予必亲自往来代劳。警予与刘鄩见面必长谈，二人互称神交。警予生于乙未（一八九五），时年已三十五岁，然卷发如云，目似点漆，气韵非凡！自言平生有几大转变。一九一五年在周南女校毕业，回溆浦自办小学，尝自誓：愿生命永在东方献身教育，诲人不

倦，人称为女圣。约五年后辞去小学校长，仍返周南任教，加入新民学会，如春冰初解，此一变。逾年出国到巴黎，结婚时已二十八岁，随即归国，在上海参加工作，先后生育孩子数人，日夕不离家庭一步，居然贤妻良母。一九二六年忽然抛却家庭，独身赴莫斯科东方大学，耽于理论学习，此为第二次转变。在莫学习时间生活情感突变，纵情肆志，与十年前判若两人。一九二七年四月归国，即废去婚约，独身参加工会下层工作，此为第三次转变。警予生活三变正与刘鄩目前处境相同，所以二人遂成莫逆。

一九二七年冬十月，文虎决定偕刘鄩离汉口搭乘英商怡和轮船直赴上海。行前忽见硃口女工部负责人万时珍匆匆赶到，说省委疏散时，曾将西班牙式柏朗宁手枪一支托伊保管，问如何处理？文虎即着她送亦农处。刘鄩说长江局不乏手枪用，因将手枪带往上海，转给军委备用。

文虎、刘鄩动身赴沪前夕，警予到德华里话别。警予对刘鄩说：“我前番与文虎在汉阳渡口遇险未死，心境泰然！我目前已毫无挂碍，今后决心守在硃口工作，相信你们不久会来的。”谈至深夜，文、鄩送警予回硃口，时繁星灿天，潮汐满江，三人徘徊沿江大道，互道“珍重”而别。

船到上海，文虎与刘鄩共住三洋径桥湘益公旅社，中央交通处得讯，派交通来旅馆谈话。第二天下午苏兆征偕苏大嫂手携点心盒前来旅馆作探亲访问，二人见面，劫后重逢，彼此欣然。黄昏时候，文虎随即把行李搬至苏寓暂住。当晚文虎与阿苏谈话，将自七月武汉分共后详细经过告苏，苏见文虎所谈湖南情况与长江局报告有出入，特别是与向忠发所谈情况不同，因说道：“向不负责，太不可靠，以后还能做工作吗？”阿苏向文虎说：“你来参加中央扩大会议，可以把湘鄂情况谈出来，并向扩大会议多提具体建议，我已向中央及国际代表建议你以后留上海中央工作，大家在一道遇事可以共同商量，共同负责。我已要秘书处为你安顿了住的房子，位置距此不很远，你休息一两天就可以搬过去住。”后经临中正式决定，文虎留在上海中央工作。

三十、临时中央扩大会议与泛暴动主义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在上海（一说在庐山，不确）召开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因“八七”会议否认五代会，是超越中央召开的，所以这次会议不称五届二中全会，只称扩大会议。参加扩大会议的人以瞿秋白集团中央干部为主，此外有部分五届中委如文虎、阿苏、老史、老项等参加。扩大会议距“八七”会议约四个月，瞿秋白预定策动一个全国性的暴动高潮，后来国际文件称第一次盲动路线是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开始就是这个理由。（其实第一次盲动路线应是从“八七”开始，而不是从十一月开始。）

一、暴动发动群众：在中央扩大会议上，由瞿秋白作政治报告，主要是渲染“八七”会议后暴动政策的重大胜利，目前革命高潮来临，已届普遍暴动夺取最后胜利的阶段，具体主张是用暴动来发动群众，而不是组织群众去发动暴动。但是会场上对瞿秋白报告发生许多分歧意见，特别是当时全总负责人力持异议，说：“全国工会与党组织由于国民党反动，元气损耗太大，近几个月才渐告恢复，目前形势还不到全国暴动时候，应积聚实力，养精蓄锐，谋而后动，才能有决胜把握。”秋白急忙道：“现在就是最好时机，不必再迟疑了，应按国际决议指示精神办事，一切由我负责。”老史、老孟等先后发言，力斥其误，认为暴动应该在赤色工会群众有组织的领导下进行，而不是单凭极少数孤立于群众组织以外的先锋分子去冒险幸图一逞。因此夺取反动派影响下的工人群众艰苦工作是不可避免的必经之路，决不能绕过这条路而寄托暴动胜利于其它渺茫的无根据的希望上面。但是当时国际代表听不进这些话，说这是“暴动条件”派，闭聪塞明，一概不理。散会后阿苏向老史（文彬）说：“要暴动不知从何处着手，难道暴动外就无工作可做，这是怎么搞法？”在中央扩大会议上秋白有气无力，频打呵欠，项英在会后轻语说，瞧他精神萎靡，肩耸背弓，齿

牙黄黑，似有大烟瘾，那副模样真是急死人！据实说起来，当时租界燕子窝极为普遍，精神疲弱，身体乏力者趋之若鹜，亦无足异！

在扩大会议后紧接着是发动广州暴动、长沙灰日暴动与北方暴动，并先后在浙江绍兴与兰溪、江西万安发动农民暴动，但均归失败。由此至一九二八年六代会，尚在各地继续不断消耗所余无几的有生力量。在有些人看来，既然是奉命行事，非暴动也着实无法交差，这是当时临时中央的处境实情。

此外，江苏与浙江省、北方区等处来上海参加中央扩大会议的同志对全国广泛性暴动，也都认为不当，但少数人一意孤行，独断独行，真可谓盲人瞎马在乱闯！

广州暴动

一、酝酿准备过程：十一月扩大会议以后，紧接着就是广州暴动。先是武汉政府时代武汉中央分校建立以中共党团员为中心的警卫团，后改为教导团，隶属张发奎第四军（张时为国民党左派）。武汉分共时张率第四军经九江回广州，师次广州，张以该团中共分子占优势，派兵将该团包围勒令缴械，徒手随张回到广州。张到广州后，驱除桂系武力，向东西江用兵，因感力量不足，仍发还教导团枪械，令其担任防守广州市内任务。时教导团驻黄花岗四标营，有兵员约一千三百人，其中党团员约二百人（大都是下级军官）。

十一月十七日，张发奎与桂系火并，桂系军阀退出广州，张发奎令第四军李汉魂师驻惠州石龙对抗陈济棠。许志锐师驻西江肇庆，薛岳师驻江门，缪培南师驻西江，对抗黄绍竑、白崇禧等。广州后方仅有教导团、警卫团、保安队等少数部队留守，所以后方非常空虚，时省委书记张太雷将当前广州形势报告苏联驻粤领事转告国际代表。国际代表向上级请示，奉到指示决定暴动，在东山俄领事馆会议上，省委决定于十二月七日成立行动委员会，命令教导团党员公今寿、谢扶民等事先清除该团内不稳分子，并由蔡申熙联络警卫团第三营五百人枪，同时组织工人纠察队约二千人（七个支队，少数有枪支）共同行动。暴动原定十二月十七日¹发动，但张发奎已有所闻，在广州市内宣布特别戒严，省委乃决定提前于十一日晨二时开始发动。

二、进攻部署：先是省委十二月七日在秘密条件下召开工农兵代表会议，出席代表八十余人，选出工农兵会议执行委员等。原决定十二月十三日行动，张发奎侦悉情况，拟解除教导团武装，乃决定提前于十一日凌晨三点半发动。

¹ 本处所涉计划暴动日期与后文的12月13日有出入，未予核实。——补注

十二月十一日凌晨教导团士兵与工人赤卫队首先包围教导团的一部分不稳官佐，拘捕十五人，经处分后，乃决定计划：先分路围攻炮兵团、警卫团、公安局等，然后派兵占领政治分会各厅、银行、电讯局，占领监狱释放政治犯。当时进攻路线是教导团三营九个连决定分乘汽车进攻下列目标：四标营由一、二连主攻，三、四连攻取观音山、石井兵工厂，五、六连攻市公安局及宪兵司令部，七连负责解除西关宪兵队武装，八连负责攻占广九车站，九连袭取炮兵团。

另一方面决定工代会中坚队伍分别由铁路、海员、机器、榨油、汽车、印刷、港口、省港罢工工会、邮政、电报、运输、石井兵工厂等组织工人赤卫队七个联队，每队三百人，共二千一百人。另组成汽车队担任市区交通，肃反队担任公安，宣传队担任鼓动，救护队担任红十字会工作，再加上郊区农民赤卫队，共五千多人，行动前，按指定地点集中。

工人赤卫队作战部署计划如下：一联队助攻公安局，二联队攻取第六区署与第七区署，三联队袭取保安队（太平戏院），四联队进攻四署及大佛寺保安队，五、六、七联队攻占其它警察区署。经过两小时激战，先后攻克省政府、观音山、市公安局、军械局、宪兵司令部、财政厅、邮电局等机关，缴收步枪八千支，大炮三十尊，其它军需物资不可计数。惟二十四师师部、第四军军部二处坚守未攻克。

三、广州苏维埃：起义时，广州工农民主政府人民委员会地址设原市公安局，广州工人代表会地址在学宫街渭滨书院，中共广东省委设明星戏院。

广州暴动后即成立苏维埃政府，组织工农兵代表会议，执行委员十六人：主席苏兆征（苏时在上海全总，由张太雷代），内务兼外交委员黄平，海陆军委员张太雷，总司令叶挺，秘书长恽代英、参谋长徐光英，肃反委员杨殷，劳动委员周文雍，土地委员彭湃，司法委员陈郁。委员会计划扩军三个师，但因武器兵员补充问题一时未能解决，致未实施。

革命政府同时公布政纲如下：打倒帝国主义，拥护苏联！打倒国民党蒋介石、张发奎、汪精卫。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保证人民自由权利。大工业、运输、银行收归国有，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工人监督生产，提高工人工资。恢复和扩大省港总工会一切权利。一切土地归农民，没收地主土地。改良士兵生活，规定每月饷银二十元。

四、鏖战经过：先是张发奎所部粤军于十月中旬开到广州，桂系黄绍竑、李宗仁见势不敌，乃退出广州。当时张所部为薛岳师（三千人）、新编第二师（四千人）、军官教导团（一千三百人）、炮兵团（一千人）、警卫团（二千人）。在广州河南驻防为李福林第五军（三

个团），此外加上其它保安队与军舰多艘，合计敌军兵力约五万人左右。

在广暴时张发奎所部大部开赴粤桂边界，广州市内兵力较弱。当十一日晨张发奎、朱辉日、黄琪祥、陈公博等闻警即逃往河南海幢寺第五军军部，并令宝璧军舰向长堤轰击，另一军舰江大亦开炮助战。时张发奎见援兵不至，亲乘电艇赴江门，次日晨邓龙光率兵一团赴援（留两团守江门），随后肇庆林翔又率兵一团至广州。此时五军从江北调到潘枝一团，在广州东沙登岸反击。同时张发奎据乘江大、宝璧二军舰向长堤炮击，十二日晨薛岳军三千人回师攻广州，冲入市内，此际陆续回来集结广州敌军约五万人。十三日清晨，敌军从韶关回师前锋占领观音山，十二时敌军大队到达观音山，双方在观音山进行争夺战。在广州市内争夺战中，教导团因连日孤军作战，内外援绝，敌军源源而至，武器精良，火力强盛，遭受重大伤亡。

十四日敌军并在东山苏联领事馆前（一说在公安局前）枪杀苏联副领事，拘捕苏联正领事等六十余人，驱逐出境。据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外人方面发表调查：张发奎、李福林在市内逮捕枪杀兵民二千多人，东北校场及河南杀死兵民二千多人，与在阵地牺牲者合计达五千人。在敌军四面合围战斗中，张太雷在乘汽车赴东山苏联领事馆途中于十二日晨中流弹阵亡，其他委员临阵失踪或落港，军中无主，士兵大部溃散或阵亡，余部向北城外花县撤退，十六日到达花县，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师，下辖十、十一、十二共三个团，有一千二百人。师长叶镛，党代表袁裕（国平），十九日部队从花县向东江出发向从化、龙门进军，约经过十日到达紫金县龙窝，通过公平，一月中旬即达海丰（海陆丰暴动在十月三十日成立苏维埃）。从此以后，中共潜伏在广东旧军队中的组织力量一律毁灭无遗。此次战斗张太雷阵亡，影响全局颇大，叶剑英、叶挺、徐光英临阵脱离指挥，陈郁、黄平等重要负责人乘乱军中落海走香港，全局混乱，遂失抵抗力。

五、李济琛立平共纪念碑：广州暴动被张发奎军压平后，陈济棠与陈铭枢以平共为名，又从东江向广州进攻，张发奎节节败退，师长许志锐阵亡。黄绍竑领军自梧州东下，会师广东，张发奎自知不敌，令四军退往江西，本人下野，四军军长改任缪培南，张发奎本人逃往香港。李济琛回到广州，立平共纪念碑，宣扬共产党杀人放火，汪精卫、张发奎助共为乱的罪行。尔后李济琛任广州政治分会主席，陈济棠任第八路军总指挥，陈铭枢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继续杀戮共产党与工人不止。

六、张太雷行谊：张太雷，字春木，常州人，天津南开大学学生，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一九二二年派往苏联出席远东各民族会

议，为代表，自后长期任英文翻译工作。鲍罗廷来中国后改任鲍翻译。扩大会议后赴广州工作，生如迅雷烈风，死若昙花忽谢，心境虚明，声光烂然。代英后归沪为文虎道及春木阵亡时事云：十二月十二日下午二时，春木与苏联领事同车赴观音山，中途遇敌兵狙击，一弹飞来适中胸部，春木连呼：“有鬼！”顷刻间血流满车座，不及施救，遂气绝。代英并诵其挽双国士诗一绝。春木身后无子女。¹

长沙灰日暴动

与广州暴动差不多同发动的，有长沙灰日暴动，但其规模较小。先是一九二七年八月至十月间长沙党与工会连遭损失。

一、曾华湘夫妇等牺牲：当时长沙党员与工会仅余裕湘纱厂一部分力量，该厂因未参加秋收暴动，故保存地下工会，由曾华湘任主席。一九二七年十月湘省委书记到长沙后，即奉临时中央命令发动长沙暴动，任弼时从上海来湘，并决定由工会主席曾华湘领导小队工人二十余人，向长沙进军，暴动于十二月十日发动，国民党长沙党部事先闻讯，即派兵渡河到牛头洲镇压，包围裕湘纱厂，捕去曾华湘夫妇及张华实等数十人，随即将曾华湘夫妇枪毙，同时牺牲者有张华实等二十余人，地下工会组织消灭，此次长沙暴动号称灰日暴动。

二、彭任事件：灰日暴动失败后，湖南省委北门外木厂、学宫街、营盘街等处机关连续遭到破坏，省委书记彭公达、宣传部长任卓宣、军委书记王一飞等均被捕，彭即投敌任职于省政府，捕捉漏网同志。一九二八年一月王一飞在长沙被害，先后被难者有罗月梅等二十六人。任亦同案被捕，判处死刑，与王等一同绑赴浏阳门外十字岭枪决。时正日暮，事毕，行刑者匆匆离去。任卓宣弹中肩项，非要害，未死，倒卧血泊中，当时任昏迷不省人事，凌晨始苏，痛不可忍。适有农民进城挑粪，任呼救，农民背任回家医治，伤口渐合。彭公达侦知其事，再度往捕，将任从床上拖走，送到铲共委员会处刑，法官陈迪光重行判任以斩刑，任即辩按法不应两次判刑，法院乃向何键请示，何说：“任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遂释之，任遂事敌，宣称仍不放弃宣传马克思理论。

彭投敌后，于是长沙、安源、水口山、锡矿山等地党组织与工会组织因灰日暴动破坏无余，湖南省委书记何资琛自长沙到上海如庆重生，但何向临中作报告时却说革命浪潮日益高涨，高潮是潜藏在地下，一旦爆发，便同火山一样，平常的人是看不见的。国际代表闻何语，

¹ 张太雷夫人王一知，与前夫施某有一子女，携身边。— 补注

大为激赏，打算仍派何回去。何大窘，即避不见面，脱离临中。（何后加入陈独秀反对派，签名政治意见书，从陈至江津共居。）

三、郭亮被害：湖南省委残破一时不易恢复，郭亮反湘后奉临中命在岳州重组湘鄂赣边区特委，继续贯彻执行暴动政策。特委有干部六、七人，群众线索十余人，郭赤手空拳，不能发动，后一度策动麻田兵变亦告失败。一九二八年三月中旬，特委干部苏先骏到长沙接洽工作，时长沙省委机关已被破坏，书记彭公达反水，即将苏夫妇二人诱捕，并从苏口供中知郭亮现居岳阳城外木船上，乃劝苏立功赎罪。苏遂于三月十七日夜带领湖南军事分校学兵队一连到岳州将郭亮及同住妇女三人捕获，二十八日押解长沙交铲共法院审讯。当经过湖南省主席鲁涤平、湘政治分会主席程潜（一九二八年一月至四月期间程潜任政治分会主席）明令将郭亮在长沙司门口斩决，悬首示众。与郭同时被害者尚有三人（化名马淑纯、马志纯及付凤君，不悉真名）。郭身后遗子一人，名志成（乳名多难）。

其它南北各省暴动

山前所述可见以湖南与广州为中心的暴动闹得马仰人翻，损兵折将，但临中仍先后于其它地区进行暴动。临时中央由武汉搬迁到上海时，四顾茫然，在上级命令急于星火紧急状态下，先后又在江浙、广东与北方依样画葫芦，断断续续地发动各地暴动。这样就造成所谓暴动三阶段，即暴动！（指两湖秋收暴动阶段）暴动！！（指广州暴动阶段）再暴动！！（指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全国大暴动阶段）暴动到最后阶段竟使中国革命主要阵地已陷于不能动弹的瘫痪状态！临时中央当时对于统治南北的军阀，只要他们中间有一点风吹草动，无不视为革命高潮来临的信号（如一九二八年蒋冯战争爆发，六月张作霖出关被炸死，均认为暴动条件成熟）。下面就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间，南北各地发动暴动事例纪其要：

一、琼崖：一九二七年八月广东省委命令广东琼崖岛上王文字、王文明在乐会、万宁等处组织农民暴动，先后成立琼崖苏维埃政府，旋即失败，逃入深山。

二、海陆丰：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日海陆丰暴动，十一月十八日海陆丰组织苏维埃政府，一九二八年后被围攻，战事失利。

三、浙江：一九二七至二八年间，浙江在执行盲动主义政策时，决定在杭州、温州、海门等地发动大规模暴动，但均未成功。在此期间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组织部长罗学瓚（湘潭人），沈干城（肖

山人，沪杭甬铁路工会会长，铁总执行委员）、贝介夫（杭州人，黄埔四期）、郑叔衡、周定、王一定、葛汉臣（杭州总工会会长）、王家漠（宁波人，省委）、沈乐山（闸口工会主任）、赵济猛（省委宣传部长）、陆铁铮、朱效巡、曹阿堂、池耕襄（崇德人，浙省工委主任）、胡友生、项志成（省委交通）等干部，均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先后被浙江省军警逮捕杀害。后来国民党在浙江平阳县杀革命干部及群众一千五百人，该县曾举行人头展览会，县长张韶舞亲自主持大会。

四、江苏：江苏省委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发动江苏宜兴暴动，由万益领导占领县政府，成立苏维埃政府。二日被当地警察及商团袭击，万益率队退出县城，遇伏兵，万益被俘，当日被杀。同时牺牲史家桢等二十余人，党组织全部瓦解。

十一月九日，发动无锡安镇农民暴动，十日被敌围攻，溃散。十一月十四日晚发动江阴农民暴动在后塍镇，有农民一队攻入公安局，当日失败。十一月十五日发动崇明农民暴动，杀收租员一人，旋上海援兵至，暴动失败，死亡十数人。海门农民暴动由陆铁强领导，陆被捕，农民被军队开枪杀三人，陆亦被杀。

五、南京：一九二八年夏决定津浦南段暴动，当时在津浦铁路徐州工会群众组织已经恢复，铁总特派员兼南段工会主席姚佐唐奉中央行委命令发动暴动。姚佐唐估计力量，熟察地形，认为时机尚未成熟，难期必胜。但当地行委坚决要姚下令发动，说：“你只下令就是，成败可以不管！”姚不得已，遂执行命令，暴动尚未行动起来时，敌已派兵包围，于九月中旬将姚佐唐、孙津川、贺瑞麟等十余人逮捕下狱，十月六日判处死刑。南京市共青团书记史砚芬（五月五日下午）亦被杀害。孙津川，皖寿县人，沪宁路工会主席兼书记。贺瑞麟，徐州人，南京市委组织部长。孙、史、贺等被捕，南京党与团组织消灭。

六、姚佐唐：姚佐唐，安徽桐城人，自云中学毕业考入某工业专科学校机械技术，后进徐州津浦铁路机车厂作工，为徐州皖帮工人领袖。一九二二年文虎从北京到开封领导陇海罢工，归德桥梁厂工人程胜贤等闻讯，派代表迎接文虎到陇海东段去参加工会成立典礼。姚佐唐在徐州召集工人群众开会讨论加入工会问题，交通系派人暗中散布谣言，破坏书记部声誉，姚佐唐仗义执言云：“书记部是北大学生所组织，他们是心地纯洁的学生，他们为工人利益赴汤蹈火，勇往直前，交通系是一群极其下流的政客，他们瞎编书记部的坏话，实在是桀犬吠尧，太不自量！”在“二七”罢工时，姚佐唐奉书记部命奔走各路策动同盟罢工，交通系藉煽动工潮罪名开除姚的工作。一九二七年北伐时，姚佐唐转到京汉铁路工作，组织工人敢死队，随军出发，在河南作战，

军次临颖，足负重伤，被送后方医院，锯去一足，遂成残废。姚身体虽残，但仍有进无退，重返战场。大革命失败后，党内斗争乘机窃发，姚内心悲愤，彷徨失措，虽遭瞿宗派集团打击，直到被捕入狱，党内斗争仍烈，在绑赴雨花台刑场前，法官问他有无遗囑，家在何处？姚大声答话：“我的家在北京，就是劳动组合书记部！”法官见其视猛声厉，不敢再问。姚遂从容跛行登车而去！姚佐唐被害后，津浦沿线各地党组织继续被破坏，牺牲前后凡三十余人，党的工作停顿三年之久。

七、张兴万谈话：南方暴动连串失败消息传到上海，国际代表仍然执迷不悟，无动于衷，照常在下令催促北方各地行动。临中奉命惟谨，表面上更不敢承认国际政策失败。某次领导江西万安暴动的张兴万来到上海，曾在会上说：“当今农村比较空虚，大可兴风作浪，我们随时可以乘虚抢到一座城池，但是此得彼失，保持不久，因而牺牲重大，如果大风暴从上海、武汉等大城市出发，全国风靡，那么大势更顺，成功就更迅速。退一步说，工人运动必须与农民运动平衡才好办。”但是这些话并没有引起临中应有的重视。

八、北方暴动：在北方，临中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匆匆决定，发动河北延庆县暴动。由辛朴田领导农民反对旗地征款，农民六千人进围延庆县城，县长唐玉书被迫承认停止旗地征款，农民胜利。是年秋，辛朴田在北京被警察总监陈兴亚逮捕，囚北京狱中。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九日判处死刑，被杀于天桥刑场。

辛朴田乃新安县及端村人，一九二五年与韩麟符共同领导河北农民运动。曾赴广州，一九二六年在第六军政治部工作。被害时二十九岁。

延庆暴动熄灭以后二月，又下令强迫发动玉田农民暴动，由于方舟领导。玉田书记解学海担任玉田、丰润、遵化农会会长，杨春林任总指挥，刘自立任参谋长。九月中旬攻入玉田，次日退出，随乘虚攻入遵化县城，旋又退出，在鲁家峪被敌包围，战不利全军覆没。十一月于方舟、解学海、杨春林、刘自立等在丰润沙流河被俘，解往县城。一九二八年春四人被杀于玉田。当地农会组织瓦解。

九、安徽暴动：一九二七年冬安徽方面芜湖暴动，万诚牺牲（万诚，巢县人）。皖北农民暴动薛祚汉牺牲（薛，阜阳人）。潜山农民暴动余大化牺牲。安徽各次暴动均未成功。又陕西同志魏野畴从杨虎城军队退出后到安徽阜阳，策动高桂滋部特务团组织农民暴动，后被高建白军包围，战败被俘，魏亦牺牲。

十、北方局阴差阳错：在北方暴动失败后，北方党员群众一致痛悼死者，同时又悔恨临中决策失当，谴责北方局阴差阳错，造成不必

要的损失。他们说：“十年合硝（制造黑色火药），一铤轰光！太不思前顾后。”在北方局会议上，韩麟符慷慨陈词道：“自一九二一至二七年间，北方党与书记部在工、农、兵、学生、市民中撒遍了无数革命种子，这些种子，因势利导，辅以正确策略，自然会发芽茁壮开花结果的。但是如今却不然，强把种子掘出来，用火硝去炒着，这样干下去，自然是枉费牺牲，得不到什么好结果的。”有人称此为阴差阳错，自取灭亡！

一九二七年十月，张阎战争发生，十月六日北方局奉命决定在三特区，南口、北京、天津、唐山、京东等处，准备暴动计划，由于当地党与全总所属工会反对，暴动计划始告搁浅。于此更须明白指出者：临时中央期间自秋收暴动、广州暴动至北方暴动等，其中绝大部分是由于强迫命令所发动的。

泛暴动结论

以上所述诸事实，由于文献失征，诸多阙载，但即此可以窥见其梗概，并吸取教训。其中如广州暴动规模较大，对革命影响较为深远，党内评论滋多，兹略论其要如次：

从总的战略观察，当时正当南暴与秋暴两次新败之后，中共军力损失奇重，党与群众的革命组织力量正在休整，所以中央扩大会议中委多人对广暴决策力持慎重，主张积聚力量以图大举，但是主持者急于求表现，不顾革命利害，遂造成重大错误。

国际方面是制定政策者，直接推动泛暴动工作的是临中，但事过境迁，国际的言论后又渐呈改观，前后判若两人。一九三〇年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会讨论中国问题时，正式宣称：“中国大革命浪潮已经过去，在许多工业中心里，由于遭受反动势力屠杀压迫的结果，工人运动是相当消沉。”又云：“目前形势中最大危险是工农运动的先锋估计形势不正确，过分低估敌人力量，脱离群众前进，溃散自己的力量，使敌人得以各个击破。”（全会决议）

关于广暴评价，国际方面于一九二八年六大会时判定广州暴动是退兵一战，其说当否，当时各代表看法不同，究未作为定论。在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东方部马基亚 Mazia 之国际第九次代表大会批评广州暴动的错误，并承认这个错误的造成，当时指导的国际代表负有责任。同时枯西木夫 Kuziumof 亦云：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会批评广州公社的错误。临中却搁置不发。国际既指示暴动于前而又在事后三年力陈其误，其错误果在何处，文中亦无明文交代。一般意见是认为：广州暴动没有无产阶级强大组织力量基础，广州暴动原是军事袭击性质，乘敌后方空虚，一举占领广州。如果在敌援兵麇集以前，迅速整军而退，往农村建立据点，其结果远比被包围待歼为好。但是当时错认革命高潮

已临，所以计不及此，结果遂肇全军覆败惨剧。于是中共自建党以来惨淡经营的武装力量，一耗于三河坝，二耗于湘东，三耗于广州，遂致在短期内面对抗敌军事斗争一蹶难以复振。至于当时国际代表指导下的临时中央对广州暴动讳言失败，他们唯恐因此会受到党内同志责难，所以先发制人，大肆宣传广暴的政治胜利与中央政策的一贯正确性。为此临中强调广州暴动是革命高潮产物。目前中心任务仍是坚持暴动政策，它是国际所决定的政策，党必须坚决执行等等。当时临中言行所产生的错误已十分明显，但由于积重难返，他们浑浑噩噩，认识不清，而且改过无勇，所以为时不久，故态复萌，李、向、王、博左之又左，接踵而起，再度成立第二个临中，最后遂为祸更大，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注]：广州屠杀市民凶手为张发奎、李福林、薛岳、缪培南、蒋光鼐、黄琪翔等。旋桂军回到广州乘机肆虐，所杀尤多，黄绍竑、李宗仁、李济琛等实为元凶，但事后彼等互相推诿，企图掩饰罪恶，显属不合。

三十一、大革命失败前后 中国南北新旧军阀反共大屠杀

本文所纪中国南北（新旧）军阀反共大屠杀约自一九二七年四月起至一九三〇年止。自国共分离后，中国革命名存实亡，南北军阀，新旧嬗递，旗帜虽易，本性难移！他们对于共产党员与劳动人民屠杀镇压，变本加严，旷代鲜见，现略揭其要，以见一斑！

武汉政府分共以后，在中国南北以蒋介石、唐生智、程潜、冯玉祥、李济深为首的军阀统治仍然复活，在枪杆政治之下，自国共合作以来中国工农人民所争得的若干民主权利，悉被国民党军阀全部夺去。国民党军阀为消灭中国革命起见，联合北方军阀对于中共及工人农民实行大规模的残酷斗争，造成当时弥漫全国的白色恐怖。蒋介石对革命党人所采取的政策是见着就捉，捉着就杀，唐生智在两湖实行四六对开屠杀共产党，冯玉祥在北方更是挥舞大刀诛锄革命党人，杀了一个三翻满贯，因此有人说蒋、冯等的统治是以人头指标显示出来的。现就一九二六至三〇年期间，中国南北各地区军阀统治下的屠杀政治择要记述如下：

一、北京苏联大使馆案（一九二七年）：北京方面发生一震惊全国的惨案，此即北京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案。此事在去岁冬间文虎赴北京时曾经说到，现就全案发生经过扼要介绍如次。

一九二五年夏季以后，北方工作全面展开。原北方区委委员大部分分散到北方铁路、矿山及天津、郑州、石家庄等城市，领导当地革命斗争，北京工作主要由守常主持。

1. 大使馆兵营生活：一九二六年三月国立各校风潮迭起，守常亲身参加三月八日铁狮子胡同示威行列，群众发生重大伤亡。王怀庆下令通缉“三八”祸首，因市内环境日益险恶，当时北大内部派系复杂，

北方区负责人不能安居，乃从大使馆苏联党负责人建议，于三月二十二日迁入使馆办公。在此前区委也常借苏联大使馆举行人数较多的会议，但会毕即离开使馆。守常个人在使馆设有临时床位，以备于必要时留宿使馆内。办公地点系使馆迤西一座平房。帝俄时代使馆内有卫兵约一连驻守，十月革命后空无人居。营房一排数间，附有厨房、浴室、洗衣间等，前有空地，院墙转角有平台即升旗台，地势高亢，镰斧巨旌高悬空中，在东长安街遥远处即可望见。

守常移居营房即鲜外出，工作余暇，在院内空地散步，或作体操，有时亦练习射击。守常有防身勃朗宁手枪一支，系前张兆丰自军中送来，并附有子弹五十发。守常既迁入兵营居住，作为经常开会及办公处。不久区委各部工作人员也随同迁入。守常夫人赵纫兰亦携男女二孩同住，并正式成立食堂。兵营内熙来攘往，门庭若市，经时既久，北大方面几乎人知此事。

一九二六年秋，有同志多人先后从北京来到上海，谈及北方区委工作，兼说到使馆界兵营生活情况，大家听到十分为此事耽心。文虎乃将此事告知仲甫，仲甫亦认为不妥，因决定要守常离开北京，北方区另物色替人。但迁延逾时，因无适当人选，暂告搁置。

2. 中央决定守常离京：一九二六年冬（秋），北伐军占领汉口时，上海中央决定派文虎到武汉去，行前文虎晤仲甫谈本人在北方时间长，北方一大片经手各事得前往部署妥为交代。仲甫当表示同意云：你即可动身到北京去，处理工作外，还有一桩重要事，就是把守常拉来上海，并协助办理北方区交接等事。文虎问是否中央另派人接替区委工作。仲云：“暂时无人可派。守常离京，即由区委就地推定韩麟符或范鸿勃暂行代理。”文虎北上登程前，仲甫又亲到文虎处说此去是定要把守常请来，最好同他一道走，时间不能再拖延。

3. 文虎赴京：文虎抵京时，顾不得其它事情，先到西斋用电话同守常联络，随后即到使馆营房晤守常。守常一见面便问，“听说中央决定你去武汉，何以又来北京？北方人少事多，你来得正好。”文虎乃将中央决定详细告诉守常，并转达中央再三请他南下，本人将先到上海，再去武汉，如此二人一路可同行。（当时，从北京到武汉沿途军警盘查颇严，文虎同行可以照拂。）守常问：“党中央几时迁武汉，你何时动身？”文虎把中央筹迁武汉工作步骤一一告知。守常沉吟片刻，双手作微摊状说：“我嘛，去是应当去，但是你看我怎么走得开？”文虎说：“区委事暂由鸿颀、麟符等看守，想亦无碍。”守常说：“别的事务且不说，目前形势紧急，国共两党联合作战包括直、鲁、豫、热、察广大区域。而且国民党内部反动派潜滋暗长，令人舌敝唇焦（指王昆仑、许宝驹等）怎能一日无人主持？我去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影响大局，万一出点甚么乱子，就不容易收拾了。……”文虎解释道：“中央亦估计到这些方面，但是目前更为重要的是南北全局，不能单顾一方。”守常意有所动，微微首肯说：“我一定去，可是不能走得太急，得从容布置一下，你看怎样？”文虎说：“我一定等你同走，有甚么要做的事你立即告我去办。”这样越说越多，直到夜深，他强文虎休息，二人议论才定。

晚间与守常谈话结果，为防止突然发生事故，决定区委全部分批离开使馆向外疏散，另在城郊及丰台、唐山等处，建立据点，并将领导中心一部移往天津租界，同时加派得力人员加强张、察一带工作。工会组织由铁总增加力量，另行筹措。文虎关于北方区委历年资料文件积存甚多，经过整理后决定一部存使馆保存（后全部被军警搜去），一部装入特制木箱，经封锁后由文虎托人送交北大总务课登记安置在北河沿骑河楼第三院大讲堂储藏室内。这些文物一直放到抗日战争前还是很完好的，直到日寇占领北京任命汤尔和为北京大学校长，根据有人告密为献媚日人计，才将这几箱文件交与日军处理。当时日军取去大部，其余也荡然无存。（详见北大总务处一九五一年给北大同学罗璈阶信）

文虎在京停留几天邀同北京区委各部门同志将各事安顿后，即准备动身南行，因往问守常何日可以成行。守常笑答云：“因为要安排的事太多，一时实在忙不过来，你且先行，我随后就到。”守常并告文虎，据使馆负责人估计半年内断无意外发生，要文虎转告大家放心，说罢取出预写好的三封信交文虎。一致中央，首述近日处理各事节略，次说明二月内一定离京转武汉。一致武汉政府委员某，信略称我军已抵武汉，应乘胜北伐中原，会师郑汴，未有“何日破壁飞去”语。一致新任京汉铁路局长刘维炽信，大意是说路局行政应与全国铁路总工会步调一致，一切关于国共合作问题可与文虎商洽协办。

九月杪，文虎从北京回到上海，抵沪往见仲甫，详细报告北行经过，仲甫阅守常信，颇蹙额自语道：“两月时间太长，还是早来的好。”文虎留沪几天即乘轮赴武汉，但心志忐忑不安，后连托人带信到北京敦促守常南下。后来知道大使馆地下工作情况不久便引起北京军警注意，他们取得使馆界帝国主义协助，通过北大内部奸细作了长时间调查，最后终于出动军警，实行一网打尽的毒计。

4. 四月六日事变及全案名录：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北京警察总监陈兴亚，奉张作霖政府（内阁总理）命令，命侦缉处长吴郁文，保安队长王澄（时任宪兵排长）率兵一营进入东交民巷使馆界，得到领袖公使荷使欧登科同意，搜查苏联大使馆，当场逮捕守常同志等六十余人，同时搜查远东银行及中东铁路办事处，被捕人员当即押送顺城王

府刑讯。

四月二十八日，北京政府特别法庭（审判长何丰林，军法官颜文海）正式宣判：李大钊、谭祖尧、邓文辉、谢伯俞、莫同荣、姚毅、张伯华、李良连、杨景山、范鸿劫、谢承常、路友于、英华、张挹兰、阎振三、李昆、吴平地、陶永立、邓培明、方伯务等二十人死刑立即执行。又判决舒启昌等四人徒刑十二年；李云贵等六人徒刑二年。尚有俄人粤钮夫等三十多人拘警厅未审。关于二十人执行死刑情况目击者报告，是日下午二时在西城地方看守所开始执行，刑场列队二十人。守常同志刑前不改色，态度沉默，昂首瞩天，第一个徐步走向绞刑架下引颈就义。当绞索套在项上时辘轳轮转，身躯渐渐下坠地下土坑中，但闻脚上铁镣震颤，隐隐作声，经过十五分钟始气绝。

其余十九人随守常后登上绞台，寂静无声，依次被害。共历时五时至下午七时始毕。（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北京顺天时报曾纪其事，并附二十人照片）官方出版有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一九二八年八月十日大公报史学周刊引。

被难人二十人中履历不尽为外间所知，其中如：

- a. 范鸿劫，湖北武昌人，中共党员。北京区委宣传部任英文翻译，北大英语系学生，被害时年二十八岁，原定四月结婚，未婚案发。
- b. 陶永立，直隶保定人，保定中学毕业学生，中共党员，北京区委组织部工作。
- c. 杨景山，京兆人，北大学生，中共党员，北京区委宣传部工作。
- d. 张挹兰，湖南人，北大学生，中共党员，北京区委妇女部工作。
- e. 张伯华，系北大教授高仁山化名，被害后不久其妻与蒋梦麟结婚，外间因疑高被害与此有关。
- f. 阎振三，山东人，中共党员，大使馆工人，先一日阎外出，在街上被捕，次日被押至大使馆。
- g. 谭祖尧，湖南湘潭人，中共党员，北大教员。谭被害，其妻李婉玉闻讯自杀。

但其他诸人多用化名，真实姓名不详。

守常在狱中二十二天，曾写“自述”一篇，慷慨陈述平生言行，对于大使馆案自愿承担全部责任，希望释放其他同案诸人。夫人赵纫兰、女儿星华牵连入狱（长子宝华时住中学，华适宿校内闻讯逃出虎口），一月后始被释。

以上系根据铁总、北京及天津地委报告。守常同志等被难后乃北方建党以来最大损失。五月十五日张作霖政府下令封锁苏联大使馆，旋刊布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北京顿成恐怖世界。

国民党部负责人徐谦、顾孟余纷纷逃赴南方，北方工作顿时陷于

涣散状态。事后查明此案与交通系有关，实为“二七”惨案之继续。国民党右派阴谋家亦曾与“大帅府”通情，冀收渔人之利。

二、江西杀机开端：在江西方面反共仇杀事件远在武汉之前，武汉正在开展反对蒋介石运动中，忽传江西赣州发生谋杀陈赞贤、梁一清事，群情愤激，知蒋实为幕后主持凶犯，一致申罪致讨。先是一九二六年八月，中共江西省委派陈赞贤到赣州主持工运。截至十二月间，当地组织工会会员已达一万五千余人，选陈为赣州工会委员长，工人反资本家斗争在蓬勃发展。当地资本家刘甲第为资方利益起见，乃勾结县长郭玘与赣州驻军新一师党代表倪弼等，受蒋介石指示，于三月六日上午联合设计以约陈开会为名，将陈骗入县署。陈至时，埋伏卫兵群起枪击，陈赞贤奋勇抵抗，众寡不敌，身受十八枪，弹痕满身，遂仆地，与陈同时被害者尚有梁一清。自三月十六日起国民党南昌省、市党部，九江市党部，九江总工会先后被 AB 团段锡朋、程天放、周利生等唆使流氓打手袭击捣毁。四月十二日以后继续又惨杀工会领袖及共产党员袁孟冰、王环心、曾天宇、杨超、李建康、王宗渊、宋大勋、帅开甲、张国澍。后又方志敏、张胡天、刘畴西、寻维洲、张如痴、周群、曹仰山、吴先群等均先后蒙难。

[注]：曾天宇农运负责人，杨超为江西特派员，宋大勋、帅开甲在永丰被杀，张国澍在萍乡被杀。以上据严北溟、方志敏、于溟涛从江西到武汉向中央报告时口述。

三、江苏、上海：先是北伐军蒋介石所部第一师于三月二十日到达上海南市，该师党代表鄧悌、团长胡宗南，奉蒋介石命令，于三月二十二日包围南市某会馆，将该会馆上海总工会所驻守工纠察队一百二十人全部缴械拘留。时第一师有共产党三十人亦被拘禁。当时北伐军到上海者为第一、二两师，师长严重思想较左，倾向武汉政府，对于蒋不利。蒋恐其不利于己，到沪后乃将其调赴苏州驻扎，另调周凤岐师到上海防守。周师原属孙传芳部队投降所改编，本对中共不满，又亟思向蒋邀功，乃担任进攻上海工会纠察队任务。蒋另一部分武装为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青红帮所组织的共进会，秘密驻在法租界各地待命伺机而动。

蒋介石军事部署既定，在四月八日乃于原上海市政府外另组织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并令上海总商会宣布退出上海市政府，加入临时政治委员会。九日，上海宣布戒严，局势紧张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在双方尚未冲突前一日（即十一日），张啸林等设计先暗杀汪寿华（何今亮），然后利用上总顿失领导时乘机发动军事进攻。十二日拂晓四时，先由共进会所组织的流氓武装队伍数百人（臂缠工字袖章），闯入闸北向上总纠察队挑衅，二十六军乘势包围湖州会馆攻击纠察队，

同时围攻南市、浦东、吴淞等地纠察队，杀死纠察队五十余人，俘去百余人，上总乃宣布全沪同盟罢工，并举行示威游行，周军袭击游行队伍，逮捕三百余人，斗争失败。

此次敌军围缴工人纠察队长枪三千支，机枪二十挺，枪杀工人、市民一百五十人，总工会纠察队长周异三及李玉阵亡。◇◇◇、顾顺章等事先闻讯得脱。

蒋介石于战事结束后宣布封闭上海总工会，解散工人纠察队。十四日解散上海市政府，实行大规模屠杀中共党员及工会会员，上总工会领导人何今亮、余立亚均在四一二之役牺牲。同时在南京，蒋派军警捕去侯绍裘（南京江苏省国民党部负责人）、谢文锦、张应春等（均中共党员），将其杀死，沉尸下关江中。四·一二以后，南京政府指定上海市党部杨虎、陈群、陈德征、潘公展、张延颢、马超俊、谌小岑，工整会与工总会，陆京士、朱学范、水祥林（三人分任工整会正副主席，警备司令部军法官），南市公安局袁良、马绍文等设立联合机构，专门继续缉捕中共政治犯，分别解往南京或就近交龙华警备司令部处决。上海方面中共同志及赤色工会会员被杀于龙华郊外者前后不计其数。杨虎以后自一九二八年至三〇年时，熊式辉任上海警备司令，司令部军法处长黄学非，熊与黄狼狈同恶，刑人尤多。

1. 何今亮：何今亮，原名何松龄，亦名何绍元，浙江绍兴人，一九二一年赴苏联学习，一九二二年任赤塔远东职工会中国工人部主任，后到海参崴工会工作，与梁伯台共同主持华侨工会事务。一九二四年返国后改名汪寿华（因其母姓汪），任上海总工会组织部长，五卅中上总工作以今亮规划之力居多，后任上总委员长。今亮参加革命极久，素为统治阶级所深忌，蒋介石既决定夺取上海实际政权，首先破坏上海市民会议，瓦解市民政府，在向上海总工会施行攻击前，乃设计先谋杀何今亮。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下午，杜月笙约请何今亮到法租界杜宅会谈，李震瀛（上总组织部长）伴何同往，李未入内，在外等候，今亮入内至梯边，伏兵起，鸣枪狙击，何即殒命。（翌日报载捕何送龙华处死乃系杜饰词。）

2. 余立亚：四一二之役英勇赴敌，牺牲壮烈，上海工人无所不知，有余立亚者。立亚，长沙市余家塘人，长沙第一中学毕业后即到北京大学旁听，加入北大马克思学会。一九二二年留学法国，由巴黎赴东大学习，一九二四年回国，即赴河南工作，旋任铁总秘书。一九二六年冬原定随文虎赴武汉工作，因吴淞重要，改留上海工作，担任淞沪铁路工会主任兼中共吴淞区委书记及武装纠察队大队长。立亚在斗争中任劳任怨，戮力向敌，深受吴淞工人所爱戴，但是同时为敌方所深恨。铁路当局交通系乃收买败类分子追踪立亚，时思加以暗杀。立亚

虽明知身处险境，但仍奋勇向前与敌苦斗。蒋介石到上海闻知此事，必欲获致立亚，杨虎乃悬重赏购其头颅，遂于一九二七年四月被军警所逮捕。立亚被逮囚于龙华狱中，提审时屹立庭上，瞪目向敌，一言不发，后三次复讯，法吏询问数十，仍不作声，敌愤极，判以极刑，即押至龙华狱外旷地处以腰斩酷刑。立亚容貌魁杰，好学问，雄才远略，躬行实践，不顾流俗毁誉，竭其智力贡献全部青春于工人运动的革命事业，其牺牲噩耗传出后，南北各地工人群众无不悲愤塞胸，如丧手足。立亚幼年丧父，其母独身二十年只此一子，爱护逾常，立亚去国八年始归国，归国后献身革命，专心致志，不及归省其母，其母乃挈立亚未婚妻到上海促立亚完婚，婚后未久，即罹难，时年二十六岁。当时上海清党反共，对政治犯量刑原则，中共省市以上重要人物斩首，其次枪毙，普通党员处徒刑十至十五年，坦白从宽，立功受奖。立亚与世炎为反动政府恨入骨髓，故二人均处腰斩。

3. 延年、乔年与白昊等：四一二以后，上海继续搜捕共产党员持续数年之久，直到向忠发、胡均和投敌，陈绍禹、秦邦宪成立临时中央，进行党内残酷斗争，里应外合，才将中共组织彻底摧毁，现分别记叙如后：

陈延年原任广东省委书记，李济深率先反共，延年被迫离粤到武汉，时上海经过四一二事变，情势危急，乃派陈延年到上海任江浙区委书记，并令王若飞、李立三同往上海工作，二人到沪见环境险恶，立即逃回武汉，延年独自留沪从事重整队伍以稳定党和工会工作。六月江浙区委改组为江苏省委与浙江省委。江苏省委负责人为：书记，陈延年；组织部，郭伯和；宣传部，韩步先；工委上总负责人，李泊之。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五日，陈延年在上海北四川路施高塔路恒丰里一〇四号被捕，被捕时延年曾向军警搏斗企图冲出，因此受伤。同时被捕的有郭伯和及韩步先（韩从莫斯科学习归来）。审讯时，延年伪称是厨工，经韩步先指证遂被杀害。韩步先为立功计，并引敌警到赵世炎住处北四川路志安坊190号逮捕世炎，并抄去现款38832元，世炎初押在英租界临时法院，随解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七月十九日凌晨被杀于枫林桥畔，时年二十七岁。

在延年殉国后八个月，一九二八年二月陈乔年又在上海被捕，与乔年同被捕者有许白昊（五大中委）、郑覆他（上海印刷工会负责人），被禁龙华狱中凡四个月，六月十五日被杀。

许白昊：湖北汉阳人，短小精悍，为武汉工人运动组织者，在斗争中艰苦卓绝，有逾常人。他首先发动汉阳兵工厂斗争，组织兵工厂工会。生平行事，与长沙郭亮为同型人物。

4. 罗亦农：一九二八年四月继续发生罗亦农被杀害之事。罗亦农

原名罗觉，湖南湘潭人，一八九七年生，后入湘潭中学。一九二〇年入东方劳动大学学俄文，前后五年，于一九二四年回国，任党校教员，一九二六年一月任浙江省委书记，八七会议任长江局书记，长江局暴动政策失败，赴上海工作，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五日在戈登路被捕，四月十一日在淞沪警备司令部被害。

亦农被难后，张宝泉被英租界巡捕房逮捕。张，陕西渭南人，在中央秘书处工作，被捕初只判为嫌疑犯，后经内奸某指证，被引渡到龙华司令部，严刑拷讯，于五月初被枪杀。

5. 彭湃、杨殷等：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上海敌方军警机关利用内线破获中央军委机关（在英租界新闻路经远里），当场捕去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等，即解往龙华警备司令部拘囚。居狱中凡七天，蒋介石得讯即电袁良将彭等于八月三十一日就地枪决。行刑前例设酒馔款待，彭用手推开，拒不进食，从容走赴刑场。惟张际春到刑场复被拉回，法官说，蒋校长有令，速往南京工作，遂挟张赴南京。张被优待，心极不安，后脱离蒋，仍复归队。二年后，陈赓亦被捕，遭遇与张相同。说者谓张、陈均黄埔军校优秀学生，故特宥其罪云。

彭湃原名汉育，字孟安，广东海丰龙津溪人，一八九六年生，家世富有，一九一七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一九二三年回家乡组织农民协会，曾任海丰教育局长，加入中共。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日领导东江农民暴动，成立海陆丰苏维埃政府。旧历除夕，彭亲书春联云：欠债欠租将刀还尽；有枪有炮快活过年。牺牲时年三十三岁。犹忆广东海陆丰苏维埃失败后，彭湃来上海工作，某次阿苏、彭湃、杨殷三人，就文虎寓商谈工作，寿林戏称他们为广东工农兵三雄。文虎一九二六年初见彭湃于广州，时见阿苏仪容俊秀，谈吐率真，可称人豪。杨殷字梦葵，久历江湖，为广东地下兵运工作杰出人物。但其外貌温文闲适，深谙韬略，不类武夫。阿苏既病歿，彭、杨复牺牲，广东工农兵三雄，一时光沉响绝，可为痛悼！

于此有一事足记，一九二八年四月五日中央交通处被破获，王荷波之弟警东被捕。警东时任全总交通，住威海卫路，因行迹可疑，被警探跟踪到家搜查，初无所获，探气极，无意中踢翻书桌，桌底朝天，文件忽露出，警探大喜过望，谓此行不虚，将王带走，转解带往南京被判无期徒刑，至一九三七年八月始出狱。

四、浙江：在浙江，与上海、南京同时发动清党屠杀，据张之珏口述，杭州在国共合作时成立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主任宣中华，组织部潘枫涂，农民部何赤华，此外尚有王宇椿、郑来臣、宣中禅等十余人均中共党员。一九二七年北伐军攻下杭州成立临时浙江省政府，由

宣中华代理主席。蒋随即命令解散浙江省临时政府，逮捕宣中华加以杀害。参加临时政府的国民党左派分子马叙伦等纷纷向蒋投降，积极参加清党工作。

一九二七年四月沈定一主持浙江清党工作，挟嫌报复，下令封闭工会农会，逮捕徐梅卿、于秀松等下狱，先后杀害中共党员及工人甚多。又杭州总工会在清党前夕，曾在湖滨运动场召开大会，反对张静江，当场与军警冲突，死伤工人十余人。据金志成报告，浙江宁波自一九二七年四月以后，宁波总工会即被国民党封闭，并下令逮捕陈焦琴（亦作胡焦琴，镇海女中校长，市委书记）、卓兰芳（市委委员）、陈鸿（和丰纱厂工人，工人部主任）、樊仲甫（县委书记）、王鲲、杨眉山、甘汉光、李崇照、陈良义、吴德元等九人，先后加以杀害。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日又逮捕张农等七人（敌方误认张农即文虎加以逮捕）。

五、冯玉祥在北方大屠杀：在北方，冯玉祥向来是自认联苏反共的民主军阀，联苏意在取得武器物资的援助，反共是出于“自卫”，就是说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国民军在北方时，在冯玉祥势力范围内，中共党与群众工作是备受限制的。冯对于苏联顾问也不让他们自由说话行动，说顾问只是供咨询，必在见问时才答话。因此可以说冯对于苏联与中共是常怀警惕，随时处于戒备状态。冯在陕西时对人民群众忍无可忍，发为抗捐抗税运动。冯认为中共捣乱后方，怀恨在心，隐忍未敢发作，直到宁汉冲突，冯认为时机已到，乃暗中策动反共，拆武汉政府的台，随后亲自出场，一马当先作为反苏反共的急先锋。冯玉祥于六月二十一日宣布反共，七月八日起大肆屠杀，其布置非常周密。先是冯部下曾罗致不少中共党员团员使为己用，郭春涛（原C.Y.团员）向冯提出北方中共党员详细名单，该项名单包括马克思学会及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党部、铁路工会中共党团负责人及成员名单，冯对郭大加赏识，根据所得材料，在本系势力范围内作成一网打尽计划。因此中共党员及重要干部漏网者少。

一九二八年冯玉祥在开封时利用中共党员作内线，先后将周以粟、张金刃、李泊之、任作民等逮捕，立即处死十四人。任、周等化名无证据被处徒刑。冯又首先向蒋介石建议中共党员不过十万人，以此作为捕杀处刑标准，三年之内，中共势力可以完全肃清。在大屠杀共产党以后，冯遇到失意时仍向苏联暗送秋波，用他自己的话说：“下面机关枪吵架，上面香槟酒碰杯！”继续取得支持，直到美洲作寓公时地位仍是如此。

六、湖北方面：武汉政府实行分共后大事屠杀革命民众，时唐生

智部下李品仙任武汉卫戍司令时期，实行“四六对开”杀人政策。八月五日，武汉卫戍司令部封闭总工会，大捕共产党员并加惨杀，先后逮捕中小学教员陈慕兰、刘仁诗，汉口市学生联合会何世昌，工人黄国昌、王达强、柳和青、邬留三，劳动童子团总队长王尔福等十余人，绑赴济生三马路刑场加以杀害。汉阳、武昌工会被封后工人牺牲亦多。九月二十一日武汉政治分会成立，唐生智控制武汉，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及工农群众。汪精卫于十月在所写文章“两件大事”中主张杀尽共产党，又于“十三日宣言”中说：“一个共产党和一条毒蛇、一只猛兽一样，决不听他留种于人世。”十一月十六日李宗仁所部夏威、胡宗铎抵汉口，十八日程潜到汉口，任胡宗铎为武汉卫戍司令，大批屠杀共产党人，陈荫潭等先后被害。胡宗铎、陶钧进占武汉时期，胡、陶在汉口开辟几处刑场，专为屠杀共产党员、工会会员之用。如济生三马路大智门广场、裕华纱厂桥堍和记蛋厂前面空地等处，每日刑人一次，多达五、六十人。胡、陶占领武汉五个月内，革命群众、中共党员牺牲不可胜计。一九二八年四月蒋桂战争，蒋胜桂败，胡宗铎、陶钧逃，率部遁至鄂西。时湘鄂政务委员会由程潜主持。程于一月二日命令武汉卫戍司令宣布将全市工会、农会、学生联合会、商民协会、妇女协会一律解散。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六日湘鄂政务委员会程潜下令，所有以前工会与厂方所订不利于资方的条件，一律取消。二月十五日湘鄂政务委员会程潜通令各县一律废止二五减租条例。

1. 杜永瘦：程潜在任内，一九二八年一月至五月间迭次破获湖北省委机关，杜永瘦（化名张一夫）等十余人先后牺牲。杜，荆门人，死难在三月三十日，临刑前三日致书其夫人韵文，劝其达观，继续干下去。信末云：“明晨拍拍的枪声是我们最后一刹那诀别的标志，听着吧，再见！”程并于五一节杀害向警予同志，此外又逮捕蔡瑾璜（麻城县委书记）、蔡济璜（兄弟二人均湖北黄安北乡七里坪人）、余大化（安徽潜山县委书记）及柳文杰等同志加以杀害。

2. 向警予：一九二七年临时中央扩大会议后，由于临时中央仍在变本加厉在武汉推行暴动政策，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程潜继续大力搜捕共产党，藉以镇压暴动。在一九二八年春，武汉湖北省委机关迭遭破获，向警予、夏明翰等先后被捕为程所杀。（武汉政治分会于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一日被南京政府下令撤销。）向警予系在汉口法租界被捕，同时被捕者有马俊三、赵世富、陈其科等四人。引渡后因禁经时，审讯多次，遂于五月一日（省委计划在五一节罢工暴动）将向等四人押赴汉口济生三马路刑场枪决。警予赴刑场时，有目击者见其坐车中，垂双辫，仪容整饬，意态从容，洋洋如平常，监刑者问其有无遗言，但摇首不语，遂就刑。

向警予（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二七年），湖南淑浦人。一九一二年入周南女学，一九一四年任淑浦小学校长。一九二〇年赴法国，一九二三年返国，任中共中央妇女部长。一九二五年赴东方大学，一九二七年三月回国离婚，任武汉市宣传部长。一九二八年春入狱，一九二八年五月一日被害，时年三十三岁。沉澹澹兰，奇英萎谢，滔滔江汉，遗恨千春。四人均葬汉阳扁担山。

警予被逮传说为向忠发秘书宋岳霖所告发，一说为向本人所卖。警予被害后，向忠发曾一度匿迹，行踪不明，后乃出面¹。在上海德隆（项英）见向忠发时曾讯以警予被害原委，向忠发神色不安，闪烁其词。究竟真相如何，疑莫能明。

七、武汉国民党左派被杀：

1. 耿丹：武汉政府宣布反共后，国民党左派分子首先被杀害者为耿丹（字仲丹，湖北人）。耿丹留学英国伦敦大学，曾与《新青年》通讯，耿后得经济学博士，归国后任武汉高师教务长。北伐军到武汉后被任为第十五军政治部主任。汪、唐宣布反共时，第十五军军长刘佐龙首先杀耿丹响应。（后十五军改编，刘下野。）胡宗铎、陶钧进占武汉后又捕杀詹大悲、李汉俊等人。

2. 詹大悲：詹大悲原名瀚，字质存，湖北蕲水人。原黄州府中学生，辛亥革命时为文学社及共进社创始人，与刘星澄办《商务日报》及《大江报》。辛亥首义任汉口军政分府主任，杀逃将张景良及刘镇祺，足证其勇于负责。詹在《大江报》时写社论题为：“大乱者救中国之良药也”，以此名震江表。少与焦达峰、王扬鹏（子畅）为友，故三人气质均相似，勇往直前有任侠精神。武汉政府成立后，詹大悲被任为湖北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时军书旁午，财政混乱如丝待理，詹延揽专家设置湖北财政整理委员会，以罗泰钧（葛菴）²主持其事。该会大刀阔斧，根除积弊，减轻人民负担，杜绝贪污，厉行廉洁政治，整顿结果，全省财政面貌一新，纳入新的轨道。詹大受感动，告人说：“我多年革命，但在建设方面未曾为人民做出甚么成绩，今日方明白只要有改革决心，物色志同道合的人一道干，没有革除不掉的旧习惯。”时夏斗寅占据鄂西擅揽赋税大权，詹商请泰钧前往宜昌办理统一财政事务，并由省府拨军队一营随行，归其统率，正准备出发，因夏斗寅难作，钧乃中止其行。

詹在任内努力奉公，直道而行，素为异己者所嫉忌。一九二七年

¹ 罗老告家人云：截止1992年底，他对向忠发数月行踪不明一事（1927年秋返上海后至莫斯科开“六大”前），始终未见记载资料。资料表明，向在1927年10月间赴苏联，率团参加十月革命十周年庆典。——补注

² 罗泰钧即罗章龙父亲，1928年因罗亦农在上海被害，误传其子被杀，惊骇成疾，不久去世。——补注

十二月桂系军阀胡宗铎、陶钧进占武汉时，即派军警将詹大悲、李汉俊、危浩生、潘康等逮捕。詹被捕时与李汉俊方对奕，时泰钧在詹寓，闻警乃伪作仆人，持扫帚，探警入室，不辩为谁，竟任其自去，罗遂脱险。李、詹二人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傍晚被枪杀于汉口济生三马路旷场。詹与焦达峰、王扬鹏三人均先后在国民党内部斗争中牺牲。

3. 李汉俊：李汉俊，湖北潜江人，对革命理论高自期许。北伐军到武汉后，李号空头左派，走访张特立，张不念旧嫌，优容之，李遂得任湖北省教育厅长。后来胡宗铎攻占武汉后，把李当共产党枪毙。时称李死非其罪，是现代甘露事变中的枉死鬼。

八、湖南：在湘省唐生智、程潜与何健等先后主持省政，唐生智曾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兼军事厅长。唐、程二人在任内大规模屠杀共产党员，其中知名者有郭亮、黄五一、龚际飞、翦去病、庞人侃（以上中共湖南省委），朱璋、刘肱成、周德一（平江县农委）、谢幼安、资党甫、邓宗翰、伍飞焘（耒阳县委）、王德吾（浏阳县委）、邓恒太、易忠久、阎昌奎（石门县委）、林蔚（醴陵县委）等均属重要负责人。当时传说民谣有云：“左派东安和尚，杀人如草般样，问他杀戒如何？道是四六对开。”（唐自谓所杀百人有六十人为枉杀。）其刑戮之惨可以概见。

[注]：一九二七年二月至十月湖南省政府主席为唐生智，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八年四月，湖南省政府主席为程潜，以后为鲁涤平及何健。

九、广东清党：在广东方面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李济深由上海返广州，与古应芬、李福林、陈孚木、邓彦华五人组成特别委员会，当即实行清党。由钱大钧派队进攻共产党工会、农会，发生武装冲突，拘捕二千多人。李济深在深夜派兵逮捕肖楚女（卧病在东山医院），装入麻袋用刺刀乱刺而死，死后投尸江中。同时逮捕邓培（铁总主任）、熊雄（黄埔教官）、杨其纲（黄埔科长）、李森（省港罢工委员）、刘尔崧（省委委员）、戴卓民、蔡林楨、何耀全（工会主席）及张秋人等杀害。事后查明李济深在分共时共杀一千余人，工人入狱、流亡者更倍此数。四月二十四日李宣称对英罢工结束，允许英国水兵进入广州市内。尔后李济深任广州政治分会主席兼第八路军总指挥，广东省主席，宣布停止反帝，首先欢迎港督金文泰到广州，表示与英亲善，随即亲自到香港拜访港督，协议声明共同反共。李后居香港，家资巨富，多财善贾，二十年后于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到佳木斯参加革命。

十、广西反共：广西方面自四一二以后逮捕共产党及工农学生等达一千多人，九月一日黄绍竑在南宁杀害雷天壮、雷沛涛、周仲武、

梁六度等二十三人，继又在桂林、柳州、贵县等进行大批杀害罗如川、梁砥、韦佩珠（女）等三十余人。

十一、川、滇、闽反共：四川方面，军阀刘湘于一九二七年春逮捕中共四川省委负责人杨闇公、郑右之、漆树芬等三人，旋在重庆被杀。福建军阀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在闽西施行对共产党及工农群众的大规模屠杀，共产党员张凯、林心尧等二十人牺牲。云南方面，当地军阀龙云派兵拘捕中共党员王懋廷、王儒廷（二王为兄弟，昆明人，北大毕业，北大马克思学会会员，云南省委负责人）与张廷瑞（字至刚，北大学生，劳动组合书记部云南特派员）等十余人，在昆明杀害。

十二、白色恐怖结论：

1. 上述记载可以见到曾经参加大革命时代统一战线的南北军阀，自他们的本性来说，其革命性是微乎其微的，其反动本质与屠杀劳动人民的恶毒是首屈一指的，这便是历史的严重教训：鸟兽不可与同群！

2. 前文所纪诸英贤事迹，限于见闻，未能全载，沧海遗珠，在所不免，此诸彦烈殇者浩然正气足与日月争光！其中孑遗仅存，志不可夺者亦代有其人，但多隐沦草莽，度其艰辛岁月，与屈事军阀，究不可同日而语！

附录：中共北方区劳动组合书记部（前期）、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后期）先烈名录（一部分）

北方区劳动组合书记部及铁总主要党员卅年间前后在工人革命运动中牺牲，或因公致死，或党内斗争被害者不可数计，其为公众所知者有李守常、史文彬、邓培、王荷波、辛克红、葛树贵、施洋、林祥谦、司文德、汪胜友、林元成、李味农、伦克忠、胡信之、高君宇、王瑞俊、林才咏、刘文银、彭礼和、吴先瑞、姚佐唐、孙津川、余立亚、辛璞田、于方舟、韩麟符、贺昌、项德隆、曾玉良、高克谦、马静臣、游天洋、白眉珊、安幸生、梁鹏万、王麟书、李兴昌、郭隆真、张昆弟、林育南、何孟雄、缪伯英、杨明斋、邓恩铭、李宝成、张世清、李求实、谭寿林、王忠秀、陶永立、姜英、李培良、张隐韬、王净尘、张廷瑞、范鸿劫、李梅羹、宋天放、王铮、王懋廷、李玉、杨宝昆、杨宝仑、李华天、郭恒祥、李彬、安体诚、袁子贞、马尚德、贺威灵、刘俊才、张振成、王仲一等百数十人，其事绩有已见书记部及中共刊物记载者。中共北方区曾刊行《劳动英烈传》¹，内容系辑北方书记部部分党员事略成书，该书由《工人周刊》社出版，作为该社丛书。

¹ 《劳动英烈传》疑为《革命战士集》之误，后者已由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重印，编入《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1982年出版。— 补注

I251
H555
V. 1



2007090094



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84942LV00003B/32/A



9 781933 447001

07 · 090094

罗章龙简介

罗章龙（1896-1995），湖南浏阳人。1912年就学于长沙第一联合中学，1918年4月与毛泽东等发起组织新民学会。同年8月考入北京大学，1920年初参与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5月，在与李大钊等人会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后，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1921年参与创办《工人周刊》，同年11月参与领导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1923年2月参与组织京汉铁路总工会，领导“二七”大罢工。同年6月参加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局委员。会后任中共中央会计，与陈独秀、毛泽东等负责中共中央日常工作。1924年参加共产国际五大，并出席在汉堡召开的第四次国际运输工会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国书记。1925年1月参加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927年任中共武汉中央局委员，中共武汉市委书记和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同年5月在中共五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任中共湖南省行动委员会执行委员，参与秋收起义领导工作。11月参加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召开的扩大会议，会后任中央工委书记，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和全总党团书记。1928年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31年初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前后，因组织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被开除出党。从1934年起，先后在河南大学、西北大学、华西协和大学、湖南大学、中南财经学院、湖北大学任教。1980年任中国革命博物馆任顾问，1995年2月3日在北京逝世。

整理者：无文 罗星原 罗平海

责任编辑：曾芸 王笑梅

封面设计：李格朗

U.S.A. \$24.99

ISBN 1-933447-00-1



9 781933 447001



溪流出版社

Fellows Press of America, Inc.